

犯罪行为心理学

理论、研究和实践

【英】Ronald Blackburn 著

吴宗宪 刘邦惠 等译

吴宗宪 校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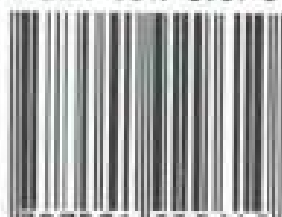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简介

本书回顾了心理学在对犯罪行为的解释和犯罪人的治疗及矫正中的贡献。本书的前半部分论述了刑事司法和犯罪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从社会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犯罪的本质；后半部分主要介绍了临床心理医师特别关注的有关犯罪人心理矫正的内容。本书几乎涉及犯罪人心理矫正工作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和主要的基础理论。因此，本书可作为心理医师、公检法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及有关专业大学生的必备读物。

Ronald Blackburn是英国利物浦大学临床与司法心理学教授，并在英国特殊医院系统中从事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研究和心理矫正工作，曾发表过 50 多篇 / 部论文 / 著作。

ISBN 7-5019-2961-0



9 787501 929610 >

ISBN 7-5019-2961-0/G · 184

定价：50.00 元

心理学丛书——心理学导读系列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犯罪行为心理学

——理论、研究和实践

【英】Ronald Blackburn 著

吴宗宪 刘邦惠 等译

吴宗宪 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 / (英) 布莱克本 (Blackburn, R.) 著；吴宗宪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10
(心理学丛书·心理学导读系列)
ISBN 7-5019-2961-0

I. 犯… II. ①布… ②吴… III. 犯罪-心理学
IV. D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378 号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1993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丛书策划：石 铁

责任编辑：朱 玲 张乃东 责任终审：杜文勇

版式设计：刘智颖 责任监印：吴维斌

*

出 版 人：赵济清 (北京东长安街 6 号，邮编：100740)

网 址：<http://www.chlip.com.cn>

E-mail: wqtw@public3.bta.net.cn

电 话：(010) 65262933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张：25.00

字 数：600 千字

书 号：ISBN 7-5019-2961-0/G · 184 定价：50.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1003 号

·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推荐序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犯罪与矫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罗大华

自1986年由周嘉桂翻译、美国汉斯·托奇主编的《司法和犯罪心理学》出版以来,国内图书市场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西方犯罪心理学方面的译著,介绍西方犯罪心理学的文章也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对西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现状的了解非常有限。为了提高国内的研究水平,翻译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由英国犯罪心理学家布莱克本(R. Blackburn)著的《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综合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几乎整个20世纪有关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有操作实践的介绍,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好书。综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知识涵盖面广。该书涉及心理学、犯罪学、刑法学、犯罪统计学、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心理治疗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相关专业知识的底蕴。

第二,理论与实践并重。该书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犯罪行为心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共分为15章,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阐述。如犯罪、犯罪学与心理学,犯罪的计量与犯罪的分布,犯罪人的分类,犯罪的社会与环境理论,个人性犯罪理论和犯罪的整合理论。二是结合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对反社会行为的生物因素、犯罪的家庭和社会因素以及犯罪人的个人特征进行了探讨。三是对一些典型的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如攻击行为与暴力犯罪、性变态与性犯罪、犯罪与精神障碍等。四是对犯罪的心理预防进行了探讨,如司法心理学和犯罪人、对犯罪人的心理干预、对危险犯罪人的治疗、干预的效果与伦理学。该书既注重理论上的归纳与分析,又注重心理学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三，注重实证资料的运用。作者不论是在理论探讨时，还是在实际应用的阐述中，都十分注重实证研究资料的运用。作者基本的写作手法是运用研究材料对问题进行分析。引用资料的时间从1904年到1992年，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成果，引用的研究资料多达1764篇，基本上对西方（尤其是英美）20世纪有关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充分反映了作者严谨、踏实的研究作风。

第四，该书把心理学研究中的很多成果，直接运用于对犯罪心理的分析，如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作者用不适当的超我（严厉的超我、薄弱的超我和越轨的超我）的形成和功能来解释犯罪行为。其它如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学习无能的研究、智力落后的研究成果等等，都在对犯罪心理的分析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国内近些年来尽管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有关的实证研究（无论是横向研究还是纵向研究）并不太多，绝大部分属经验总结性质的研究。此书的翻译可为同行研究人员打开眼界，不仅可以了解西方研究的情况，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也会从中受到启发，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此外，本书对于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从中可了解西方的研究情况，而且可以学到从不同角度了解犯罪人，更好地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治，以减少重新犯罪。

总之，本书的翻译出版是我国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界乃至刑事法学界的一大喜事。特写此序，以示祝贺。

2000年8月

作 者 序

给我的著作的中文版写这个序言，我感到非常荣幸。写作本书，是为了给那些准备在刑事司法系统工作的应用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一本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基本教科书，原定的读者是西方国家中讲英语的人。因此，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得知，原定读者群之外的人群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文版的翻译就是证明。

同时，我知道本书的文化局限性。尽管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别，但是，违法行为具有普遍性，许多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心理因素毫无疑问也具有普遍性。不过，西方心理学经常受到恰当地指责，认为它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而且忽视了对人类行为的文化影响，这在其他文化中可能是很重要的。尽管本书试图对犯罪行为进行国际性的探讨，但是，本书主要是对用英语发表的理论和研究的一项概括，因此，在这一点上也受到了同样的指责。我得让读者自己判断：本书提供的知识能否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能否将本书提供的知识与中国刑事司法研究人员的工作结合起来。

自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几个国家的犯罪心理学课程已经有了重要的发展。我已经高兴地得知，许多学生发现本书对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做了有益的介绍。我希望中国读者也会发现本书是一个有益的起点，能够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应用心理学理解犯罪行为。我也希望，通过更加广泛的读者的阅读，本书能够对跨文化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一份小小的贡献。我十分感谢吴宗宪研究员和刘邦惠教授在翻译本书中所作的努力。

罗恩·布莱克本 (Ron Blackburn)

2000年2月于利物浦大学

前 言

当弗雷泽·瓦茨（Fraser Watts）最初建议我为临床心理学家写一本关于反社会行为的书时，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在为临床学员讲授有关犯罪行为的临床课程和心理学的司法应用课程的几年中，我长期为缺乏一本综合性的教科书而苦恼。同时，在过去十年间，随着为精神障碍犯罪人提供的服务的发展，在刑事司法和精神卫生系统交叉部门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数量已经增加。因此，填补心理学文献中的空隙的机会似乎已经来临。

在预见到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后，特别是最终写成的教科书在范围上要大大超过最初的设想时，我的热情减弱了。要将准备对犯罪人开展工作的临床工作者必需的背景材料写入一本教科书，的确需要我对知识门类 and 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人为加工。转入精神卫生机构的犯罪人，并不是一个可以清楚界定的群体，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和犯罪行为都有差别；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们的兴趣和关注点，往往与那些在刑罚执行部门和教育部门工作的心理学家们的兴趣和关注点相重合。理解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dysfunction）怎样对犯罪行为起作用，往往也要以一套关于其他许多相关因素的知识为前提。不过，在有关犯罪的心理学探讨与其他行为和社会科学家的探讨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这方面，对犯罪人开展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应该成为精通精神卫生问题的犯罪学家。

所以，本书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为临床心理学实践提供简明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不过，我已经尝试在犯罪心理学的框架中扩展了这个目标。我也已经偶然地进入了社会学家、律师、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领域，但是要承认我在这些领域是一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毫无疑问，我的一些观点是不清晰的或者是简单化的。不过，我的目的一直是提请人们注意那些在解释或者干预犯罪行为的尝试中肯定会产生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我也要强调，心理学实践不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制约，而且也要受到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产生的这种更加广泛的知识背景的制约。

本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论述了刑事司法和犯罪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从社会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犯罪行为的性质。在这一部分，批判性地评价了主要的心理学理论；对有关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家庭与社会以及个人相关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临床工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些话题。在这一部分，考察了有关暴力、精神障碍与犯罪、性犯罪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评价了心理学家对刑事司法调查、预测和决策的司法贡献（forensic contribution）。最后几章讨论了犯罪人矫正、危险犯罪人矫治、犯罪预防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行为观点和认知观点，也讨论了干预的效果和伦理问题。

教科书意味着要概括现有的知识。教科书实际上就是对别人的作品和研究成果的概括。书后很长的文献索引反映了这一点。假定本书对大量文献进行了十分客观的选择，是很愚蠢的；我自己在近来的研究和干预中形成的对社会认知趋势的倾向和热情，将会是明显的。不过，我希望我能够避免理论上的狭隘观念。由于本书的范围广泛，我也希望本书对普通心理学家，包括讲授心理学与法律课程或者已经开始犯罪学研究的心理学家，以及引用犯

罪的心理学观点的其他精神卫生和刑事司法专业人员，都有一定用处。

离开别人的影响和支持而仅仅靠一个人的努力，是难以完成一本书的写作的。我乐意向一些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促进和形成我对犯罪人的兴趣的教师、同事和学生中，我特别愿意提到托尼·布莱克 (Tony Black)，他最早鼓励我在布罗德穆尔医院 (Broadmoor Hospital) 进行临床和研究工作；戈登·特拉斯勒 (Gorden Trasler)，他对心理学和犯罪问题的清晰思想，大大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感激戴维·法林顿 (David Farrington)、克莱夫·霍林 (Clive Hollin)、詹姆斯·麦圭尔 (James McGuire)、罗恩·塔洛克 (Ron Tullock) 和诺曼·韦瑟里克 (Norman Wetherlick)，感谢他们花费时间阅读了本书的章节草稿，提供了有助于消除一些缺点的评论。不用说，他们不对仍然存在的缺点负责。我也感谢丛书的主编弗雷泽·瓦茨和约翰·威利父子公司的温迪·赫德拉斯 (Wendy Hudlass)，不仅感谢他们耐心容忍了对时间的延误，而且感谢他们鼓励我因热情不足而断断续续地完成了此项写作计划。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西莉亚 (Celia)，感谢她长期的支持和宽容。

罗恩·布莱克本 (Ron Blackburn)

于利物浦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犯罪、犯罪学与心理学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刑法与刑事司法制度	2
一、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系统	2
二、犯罪的性质和刑事责任	4
三、刑法的进化	7
四、刑事司法制度和少年司法制度	8
第三节 刑罚哲学	9
一、报应与公平模式	9
二、功利主义	10
三、改造和矫治	11
四、监禁的目的	12
第四节 犯罪研究	13
一、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	13
二、犯罪学学派	14
三、行为、倾向和对犯罪行为的解释	17
四、解释的宗旨	19
五、自由意志和决定论	20
第五节 科学哲学与犯罪解释	21
一、原因解释与科学方法	21
二、反自然主义	22
三、批判现实主义	24
第六节 心理学与犯罪学	26
第二章 犯罪计量与犯罪分布	29
第一节 引言	29
第二节 犯罪计量	29
一、官方统计	30
二、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	32
三、被害调查	34
四、犯罪量度的使用	35
第三节 对犯罪人的司法处理	36
一、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置	37
二、法庭的处理	38
第四节 犯罪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39
一、社会经济地位	39
二、年龄	41
三、性别	42
四、种族	43

第五节 犯罪和少年犯罪的一般性和连续性	44
一、犯罪的专门化和多面性	45
二、犯罪和越轨行为中的连续性	46
三、犯罪生涯的多样性	47
第三章 犯罪人分类	51
第一节 引言	51
第二节 分类法中存在的问题	51
第三节 犯罪学中的分类	52
第四节 理论派生的分类	54
一、人际成熟水平	54
二、概念水平匹配	56
第五节 经验性分类	57
一、奎伊的行为分类维度	57
二、梅加吉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基础的分类	58
三、对不同体系的比较	59
第六节 精神病学分类和反社会行为	61
一、轴线 I	62
二、轴线 II: 发展性障碍	64
三、轴线 II: 人格障碍	65
四、对人格障碍的维度分类	67
第七节 病态人格与人格障碍	69
一、历史背景	69
二、精神病态的测量	70
三、病态人格与人格障碍分类	73
第四章 犯罪的社会与环境理论	75
第一节 引言	75
第二节 社会学理论	76
一、不同交往	76
二、紧张理论和亚文化理论	78
三、控制理论	79
四、标定理论	81
第三节 学习理论	82
一、社会化和越轨行为中的学习过程	83
二、犯罪中的条件反射和回避学习	85
三、操作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理论	85
四、学习理论与犯罪的社会学理论	87
五、对学习理论的评价	88
第四节 理性选择观点	89
一、环境犯罪学	89
二、犯罪决策与威慑假设	90
三、有限理性和犯罪事件	92
第五节 作为自我表现的少年犯罪	93
第五章 个人性犯罪理论和犯罪的整合理论	97
第一节 引言	97
第二节 精神分析与犯罪	97
一、社会化理论	97
二、在犯罪行为中的应用	99

三、精神动力学关于犯罪性假设的效度	101
第三节 艾森克的犯罪性理论	102
一、概说	102
二、人格的维度结构	103
三、人格的生物学基础	105
四、社会化理论	107
五、人格与犯罪	108
第四节 认知发展理论	111
一、概说	111
二、道德发展与少年犯罪	114
第五节 整合理论	116
第六章 反社会行为的生物因素	119
第一节 引言	119
第二节 遗传学与犯罪性	120
一、家庭研究	121
二、孪生子研究	121
三、养子女研究	122
四、染色体异常	124
第三节 体质研究	125
第四节 心理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	126
一、皮层脑电相关因素	127
二、反社会人格的皮肤电因素和心血管因素	129
三、生物化学因素	132
第五节 脑功能障碍与反社会行为	134
一、概说	134
二、癫痫和控制不良	135
三、多动症	136
四、神经心理机能障碍	137
第七章 犯罪的家庭与社会因素	141
第一节 引言	141
第二节 家庭模式与相互作用	141
一、儿童养育实践	142
二、家庭互动	144
三、家庭破裂	145
四、父母越轨	147
五、家庭规模与兄弟姐妹关系	148
六、社会经济剥夺	148
七、少年犯罪人之间的差异	149
八、对家庭与少年犯罪的评论	150
第三节 学校与群体影响	151
一、少年犯罪学校	152
二、同辈群体 ?	154
第四节 就业与婚姻	156
第五节 保护性因素	158
第八章 犯罪人的个人特征	161
第一节 引言	161
第二节 智力、成绩和认知活动	162

一、智力活动	162
二、学习无能和教育成绩	164
第三节 自我控制和冲动性	165
一、自陈调查	167
二、延迟满足	168
三、精神运动性冲动	168
四、时间定向	169
第四节 态度、价值和信念	170
一、自我概念	170
二、价值与信念	172
三、中和作用和归因过程	173
四、约奇逊和萨米诺的“犯罪人格”	174
第五节 社会认知和人际技能	176
一、角色采择、移情和罪恶感	176
二、人际问题解决	178
三、社会技能	178
第九章 攻击行为和暴力犯罪	181
第一节 引言	181
第二节 暴力和攻击的定义	181
第三节 暴力的模式	183
一、犯罪性暴力	183
二、家庭暴力	184
第四节 攻击的理论	186
一、生物学观点	186
二、心理动力学观点	188
三、学习和社会认知观点	189
四、社会心理学观点	191
第五节 攻击行为的前因	193
一、暴力行为的情境前因	193
二、新闻媒介时攻击行为的影响	193
三、酒精、毒品和暴力	195
四、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197
第六节 人格和攻击	198
一、攻击的一致性	198
二、攻击行为一致性的来源	199
三、个别差异和攻击	201
四、人格类型和暴力	203
第七节 暴力循环	204
一、儿童虐待	205
二、妻子虐待	207
第十章 犯罪与精神障碍	209
第一节 引言	209
第二节 精神障碍和医学模型	209
一、对医学模型的评论	210
二、犯罪行为和医学模型	212
第三节 法律与精神障碍	213
一、精神障碍犯罪人	213

二、法律规定的历史背景	215
三、精神错乱辩护	217
四、对精神错乱辩护的实证研究	218
五、无受审能力	219
六、减轻责任	220
七、精神障碍和刑事责任	221
第四节 精神障碍和犯罪	223
一、精神病人中的犯罪行为	224
二、犯罪人中的精神障碍	225
三、精神障碍和特殊犯罪	226
第五节 精神障碍和暴力	227
一、杀人和精神障碍	227
二、暴力和精神障碍的特定类型	228
第六节 监禁和心理健康	231
一、监禁的痛苦	231
二、监禁对罪犯心理活动的影响	233
第十一章 性变态与性犯罪	237
第一节 引言	237
第二节 性变态	237
一、性倒错	237
二、性唤起的评定	238
第三节 性犯罪和性犯罪人	240
一、发生率和流行率	241
二、累犯和犯罪性	242
第四节 性越轨的理论	242
一、生物学观点	243
二、心理动力学观点	243
三、学习理论	244
四、社会文化理论	244
第五节 露阴癖	245
第六节 性攻击	246
一、强奸犯类型学	247
二、文化因素	248
三、环境和情境因素	249
四、色情作品的影响	250
五、性攻击者的特点	251
六、性施虐狂	253
第七节 对儿童的性犯罪	255
一、儿童性虐待	255
二、儿童性骚扰者的类型	256
三、儿童性骚扰者的特点	257
第十二章 司法心理学和犯罪人	261
第一节 引言	261
第二节 司法心理学	261
第三节 心理学家和警方调查	262
一、犯罪人的特征描述	262
二、警察讯问	264

第四节	心理学家和刑事法庭	266
一、	作为专家证人的心理学家	266
二、	心理学证据的准备	268
三、	法庭中的心理学证言	269
四、	作为专家证人的心理学家的问题	270
第五节	犯罪学中的预测	271
一、	决定预测功用的因素	271
三、	刑事司法决策中的精算预测	273
第六节	危险性的临床预测	276
一、	危险性预测的结果研究	277
二、	临床预测过程	279
三、	危险性预测能够得到改进吗?	280
第十三章	对犯罪人的心理学干预	283
第一节	引言	283
一、	矫正和心理学干预	284
第二节	对犯罪人的心理学服务	285
一、	评估	286
二、	对犯罪人的治疗	286
三、	发展中的作用	287
第三节	心理动力学干预和人本主义的干预	288
一、	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	288
二、	人本主义方法	289
第四节	应用行为分析	290
一、	矫正机构计划	291
二、	社区干预	292
三、	行为干预应用概述	296
第五节	认知—行为矫正	297
一、	社会技能训练	298
二、	自我控制	300
三、	认知重建	301
四、	人际问题解决训练	302
五、	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	303
六、	认知行为干预概述	304
第十四章	危险犯罪人的治疗	307
第一节	引言	307
第二节	司法精神病人口的治疗问题	307
第三节	对性犯罪人的治疗	309
一、	评价	309
二、	躯体治疗	310
三、	心理治疗	311
四、	认知行为治疗	311
五、	复发预防	314
第四节	对危险犯罪人的干预	315
一、	精神药理学治疗	316
二、	精神动力学干预	317
三、	行为和认知治疗	318
第五节	对精神病态和人格障碍的治疗	320

一、精神药物治疗	322
二、个别心理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	323
三、治疗社区	324
五、认知行为疗法	326
第十五章 干预的效果与伦理学	329
第一节 引言	329
第二节 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329
一、预防少年犯罪的发展	330
二、转向	332
三、情境犯罪预防	334
第三节 有关“矫正无效”的争论	336
第四节 关于成功的干预	338
一、方法论问题	338
二、因人施治	339
三、成功的矫治计划的特点	341
第五节 刑事司法系统心理学家的角色冲突和伦理问题	343
后记	347
人名索引	351
参考文献	365

第一章 犯罪、犯罪学与心理学

第一节 引言

本书论述心理学对我们理解犯罪及其控制的贡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犯罪及其控制不仅是一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寻求解决个人问题和这类问题产生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应用学科。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犯罪理解为是一种完全心理学的现象,也不意味着心理学可以对怎样控制和预防犯罪提供关键性的答案。这些问题并不是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所能解决的。任何关于“犯罪问题”的“科学的”解决方法的主张,也都是不真诚的,因为某一社会用法律惩处的行为的种类、处置犯罪人的方式,都是由规范性的伦理制度决定的。科学可以渗透到这些制度中,但是不能替代这些制度。

犯罪研究已经吸引了许多学科的兴趣。解释犯罪的系统的尝试,是以几个世纪的哲学争论为基础,从19世纪后期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产生的。人类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分析犯罪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主要的理论来源于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尽管这些学科的观点有重叠,但是他们的理论都是在互不关心甚至相互反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认为犯罪是本能邪恶的人和那些认为犯罪是不恰当社会造成的人们之间的长期思想争论。不过,即使在一些学科内部,在严厉惩处犯罪人还是将犯罪人浪漫化方面,总是充满了矛盾心理。

心理学家对犯罪和法律的兴趣始于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学科诞生的时候。在1896年创建第一个心理学诊所之前,临床心理学的前驱者莱特纳·威特默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犯罪行为课程¹。斯坦利·霍尔在190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青少年的重要教科书中²,描述了对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不久之后的1908年,闵斯特贝格出版了《在证人席上》一书,赞扬对法庭行为的实验研究³。威特默的诊所也为第一家面向少年犯罪人的儿童指导诊所——芝加哥少年精神病态研究所(Chicago Juvenile Psychopathic Institute)提供了模式。芝加哥少年精神病态研究所于1909年由精神病学家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创建,它的第一个专业工作人员是心理学家格雷斯·弗纳尔德(Grace Fernald)。后来,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和监狱心理学家在向法庭、刑罚机构和个别犯罪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大学中,心理学是最大的一类犯罪学研究文献来源。不过,犯罪一直是少数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

1. 莱特纳·威特默(Lightner Witmer, 1867-1956),美国心理学家。——译注。

2. 指霍尔(G. Stanley Hall, 1844-1924,美国心理学家)的《青少年:它的心理学及其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一书。该书于1904年出版,分为2卷——译注。

3. 雨果·闵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 1863-1916),德国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译注。

然而,在最近20年间,对法律制度的兴趣急剧增加,英国心理学会(British Psychology Society)和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中心理学与法律分会的建立、专业性杂志以及10多本心理学与法律问题教科书的出版,就是证明。受到心理学家关注的不仅有证人、被害人和司法官员的行为,而且法律系统都被看成是检验像再认与记忆、决策、态度改变之类理论的丰饶的场所。尽管在英国法庭中,心理学家充当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的数量比美国少,但是,心理学家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都建立了一种司法角色(forensic role)。对法律程序的其他贡献包括选择、培训警察和治安法官(magistrate)、发展适用于警察人员的应激管理程序(stress management procedures)、向法律检查机构提供咨询,例如,询问儿童证人,在“测谎”中使用测谎器。

心理学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实验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各个专门领域,这种应用多种多样,任何单独的一个题目或者单独一本书都难以概括。“法律心理学研究”(psycholegal studies)侧重于法律实施和刑事司法制度,而不是侧重于犯罪行为,英国心理学会内1977年建立的“犯罪与法律心理学分会”(the Division of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代表了不同兴趣的聚集,其名称反映了对这两个方面的关注。不过,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的心理学观念和心理学原则与方法在干预犯罪人中的应用。因此,关注的焦点是“犯罪心理学”(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至于心理学与法律交叉的更广泛的方面,只有在它们与理解犯罪行为有关时,才加以讨论。

犯罪是一个法律概念,“犯罪(crime or offence)是一种可能引起刑事诉讼的法律过错行为(legal wrong),这种刑事诉讼可能导致刑罚。”犯罪学(criminology)是研究这类行为、将它们规定为犯罪的法律和社会试图用来控制和预防它们的手段的学科。不过,犯罪并不是一种直接的行为现象类型,因为刑法并不与人类行为的某个特定领域相关。犯罪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研究犯罪行为是为了揭示个人倾向,而社会学家研究犯罪是为了说明社会。所以,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论述刑法的性质、刑事司法和犯罪学。

第二节 刑法与刑事司法制度

刑法(criminal law)是规定什么是犯罪和如何处理犯罪人的法律的体系。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美国 and 英联邦国家的许多刑法,都体现在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中。不过,它们都起源于普通法(common law),普通法是诺曼底人统一(英格兰)后在英格兰通用的法律,它们是作为司法决定的一种惯例而存在的。这些制度互不相同,在苏格兰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有差别,在美国各州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所有发达的制度都处罚在盎格鲁—美国规定为叛国、谋杀、重伤害、盗窃、抢劫、夜盗(burglary)、纵火和强奸的行为。埃利斯(L. Ellis, 1987)指出,这种对有害行为的普遍关注有一种进化的基础,因为所有群居生活的动物都对伤害其成员的行为做出消极的反应。

一、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系统

法律规定了可能发生的事情。法律详细说明某种特定的行为会引起法律惩罚。不过,法律禁止的行为和法律规定的惩罚是多种多样的;法律的定义如同健康和疾病的定义一样,都

是有问题的。

从功能上讲,刑法与其他规则系统相类似。无论是明确规定的规则,还是不言而喻的规则,都在许多情境中对行为进行控制、通过规范群体成员的活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例如,在游戏中,在委员会、谈话或者特定的关系过程中,人们的行为都要遵从有关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规则,这些规则受风俗、习惯、传统和特定社会单位(social unit)的习俗的支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将这样的规则称之为“规范”(norms),即流行的有关通常的、公认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的标准,它们体现在群体成员公认的信念和实践中。没有这样的标准,就不能根据行为的意义将其划分为越轨的、不遵从的或者反社会的行为。

不过,规范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某种单一的信念或者标准。风俗(customs)仅仅指普遍的、公认的东西,而一些规范则是评价性的,它们描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性习俗(sexual mores)就是如此。同样,在一个社会单位中,也极少存在完全一致的评价、期望或其他规范;在典型的情况下,规范性判断主要是根据情境和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或地位做出的。因此,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极少被无限制地说成是某个群体的规范。

一些法律哲学家认为,法律仅仅是关于法庭如何对提交它们审理的案件做出判决的一般性预测。但是,曼海姆(Hermann Mannheim, 1965)则把法律看成是描述公民应该怎样行动的规则。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和克雷西(Donald Cressey)(1970)提出了区别刑法和其他社会规则的四个特征:第一,刑法是政治性的。这意味着刑法是由国家制定的,适用于所有公民。第二,刑法将具体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例如,1968年的《反盗窃法》规定:“如果某人出于持久地夺取他人财物的故意而不诚实地盗用属于他人财物的,该人就构成了盗窃罪。”第三,刑法平等地适用于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公民,而不管其地位如何。第四,刑法规定了通过国家授权的部门强制性地使用的刑事制裁(penal sanction)。尽管许多法律的实施缺乏强制性,一些法律很少被强制性地实施,但是,这种强制性地实施的可能性,是法律与其他规范相区别的最明显的特征。

那么,法律将哪些类型的规范或者规则强制性地实施呢?显然,一些规范性标准的维护,并不以违反它们会带来法律制裁相威胁。例如,尽管有关服装的传统是通过法律禁止“有伤风化”(indecent)而强制性地维护的,但是,法律与那些主要靠非正式的手段维护的风俗和传统的相似性极小。同样,尽管在一些国家,有关种族隔离的传统也是靠法律强制性地维护的,但是在其他国家,这种传统受到了法律的挑战。在历史上,宗教曾经对法律产生过影响,但是,随着近代国家的世俗化,这种现象几乎就要消失。一些宗教影响之所以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它们与商业或者政治利益恰好一致的缘故。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废除星期天交易法的努力⁴,一直受到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寻求减少商业竞争的商业利益的联合抵制。近来,大多数西方国家颁布了有关堕胎、同性恋、计划生育或自杀等问题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内容是与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教义相矛盾的。在基督教国家,《十诫》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在这些国家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更多的指导⁵。例如,除了美国的一些州之外,

4. 星期天交易法(Sunday trading laws)是指在一些地区禁止在星期天进行商业活动的规定。——译注。

5. 《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教徒必须遵守的诫条,包括崇拜唯一的上帝而不可拜别的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财物。摩尼教也有十诫,其内容略有不同。——译注。

通奸在法律上不是犯罪；但是，重婚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普遍被当做犯罪。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争论。人们很早就区分了**自然犯罪**（*mala in se*）和**法定犯罪**（*mala prohibita*），自然犯罪就是固有的道德邪恶，而法定犯罪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这种区分与长期存在的自然法（*natural law*）和人定法（*human law*）之间的哲学区分有关。自然法试图确定出一些普遍的道德准则，并且援引“神的”或者“理想的”法的概念，或者说是人性中基本上属于好的一面。科学的发展阻止了人们寻找这样一些绝对标准的尝试，但是，“正确”、“正义”的概念仍然包含着一些法律应该追求的非法律方面的原则。

沃尔芬登委员会（the Wolfenden Committee）在1957年将成人之间私下进行的相互同意的同性恋行为非犯罪化之后，法律是否应该执行道德准则就成了一个问题⁶。一些追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法理学家认为⁷，刑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预防个人侵害他人，而不应当是关注私人道德。其他人则反驳说，刑法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它应该继续执行道德准则。这种争论显然涉及到有关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假设，反映了人们对法律的功能缺乏一致的认识。的确，有许多法律起源于道德上的争议，特别是那些与性行为、药物使用或赌博有关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创造出了并不侵害他人的“**无被害人犯罪**”（*victimless crime*）。但是，曼海姆（1965）提出，法律和道德代表了相互重叠但是可以区分的不同规范标准。法律主要涉及外显的行为和顺从，而不涉及内隐的动机；法律关注的是禁止人们实施某些行为，而不是规劝人们进行符合需要的行为。不过，仍然有一些把不作为行为当做犯罪的法律例证，例如，不喂养自己的婴儿。

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法律与调整行为的其他一些规范成分是相重叠的。沃克（N. Walker, 1987）概括了法律的与社会有关的功能，指出了所关注的十四个方面。这些功能是：保护人们免受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侵害或者剥削；预防“非自然的”（*unnatural*）或者有害的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护财产和像婚姻之类的社会制度；预防骚扰公众的行为；收税；保卫国家；保障“强制性救济”（*compulsory benefits*），例如，儿童上学救济；预防不合理的歧视待遇；维持正义。尽管沃克提出，这些功能的核心是保持社会顺利运行和维护秩序，但是很显然，任何单一的准则都无法决定什么行为违反了刑法。

二、犯罪的性质和刑事责任

由于法律在文化和历史方面具有相对性，律师们会发现，除了一些招致法律惩罚的行为之外，很难识别出普遍的犯罪。犯罪（*crime*）就是侵害社会的危害行为，它不同于**侵权行为**（*torts*），侵权行为是侵害个人的民事违法行为。对于侵权行为而言，受到侵害的一方当事人而不是国家官员可以对其提起诉讼；可以要求获得损害赔偿而不是进行刑罚惩罚。但

6. 沃尔芬登委员会（the Wolfenden Committee）又称为“英国同性恋犯罪和卖淫委员会（Committee on Sexual Offenses and Prostitution）”。这个委员会于1957年发表了一项建议用法律约束性行为的研究报告，被称为“沃尔芬登报告”（Wolfenden Report）。这个报告根据精神分析、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建议，应当避免试图用法律来建立道德风尚的做法，认为法律应当过问的仅仅是那些有伤风化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的性行为，而成年人之间双方同意的同性恋行为不应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即不应当把成年人之间双方同意的同性恋行为当做犯罪。——译注。

7.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是，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区别，因为被判决犯有严重罪行的犯罪人也可能被要求对其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

尽管犯罪是侵害社会的行为，但是，犯罪不仅包括最严重的侵害行为，也包括许多造成轻微后果的侵害行为，犯罪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既包括最严重的死刑，也包括轻微的罚金。在传统上，人们把严重犯罪和轻微犯罪区分为“重罪”(felony)和“轻罪”(misdemeanor)；在英国，自1967年以来，将严重犯罪和轻微犯罪区分为“可起诉罪”(indictable offence)和“简易审决罪”(summary offence)⁸，但是，这些区分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取决于可以审理犯罪案件的法庭的类型。大部分犯罪人在低级法庭或者简易法庭审理，例如，治安法庭(magistrate's court)或者郡法庭(sheriff's court)，只有比较严重的犯罪才在高等法庭(现在是英国的刑事法庭[crown court])审理，有陪审团参加。

无法根据社会谴责的标准明确地区分犯罪。某种行为是否与法律相冲突，首先必须至少由一种人，即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的成员做出否定性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不必然是得到广泛公认的。例如，禁止抢劫的法律可能与大多数人对这种行为的谴责相一致，但是，对于无被害人犯罪或者几乎不受道德谴责的犯罪而言，并不存在这种一致的情况，例如，道路交通犯罪就是如此。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包括违反与商业或贸易行为有关的法律的行为以及侵害组织的职业性犯罪，这类犯罪不管它们对消费者的后果如何，实际上可能包括一些在某些商业领域内得到认可的行为。

尽管犯罪不是道德准则的同义词，但是在有关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要求中，仍然有一些重要的道德成分。普通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罪过即无犯罪”。因此，犯罪的要件包括**犯罪行为**(actus reus)和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罪过**(mens rea)⁹。这些是明确规定的要件，必须证实它们的存在。犯罪行为这个要件排除了非自愿行动(involuntary movements)，例如，在癫痫发作期间的行动：梦游行动，同时要求在危害后果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一些律师认为，对罪过或者犯罪心理(guilty mind)的要求意味着，只有在查明一个人具有道德罪过时，才能在法律上对其进行惩罚。尽管这可能曾经是普通法中的理由，然而，哈特(H. L. A. Hart, 1968)认为，现在不再是这样的：现代刑法所要求的是法律规定的行为，而不是道德过错行为。道德准则认为，惩罚不能够帮助他人的人是不公平的，这个准则反映了这样的法律观念，即人类是能够自由选择其行为的，这种法律观念构成了辩护理由的基础，可以利用错误、意外事件、挑衅、威逼、精神错乱等理由为被控犯有罪行的人进行辩护。

因此，刑事责任(criminal responsibility)意味着规定了进行法律惩罚的责任的条件。不过，“责任”这个术语有一些问题，因为它几种意义上使用，既可以在日常语言中使用，也可以在法律语言中使用。一些作者认为，刑事责任等同于“自由意志”(free will)或者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认为把它作为处置犯罪人的基础，是一种时代错误。在

8. “简易审决罪”又译为“简易罪”、“即决罪”，它是比较轻微的犯罪，它与“可起诉罪”的主要区别是：它比可起诉罪轻微；可以由治安法官独自审理判决，而不需要有陪审团参加。——译注。

9. 有的译者把mens rea一词翻译为“犯意”、“犯罪意图”，似乎不很确切，并且与日常生活中对“意图”一词的理解有很大差别。在日常生活中，意图仅仅指进行某种活动的愿望、意向，其内容并不一定是很清晰的。因此，将mens rea翻译为“罪过”或者“犯罪心理”似乎更为恰当。——译注

1957年的《英国杀人犯罪法》(the English Homicide Act) 中出现的“减轻责任”(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这个含糊的概念, 进一步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责任是指不同的心理能力。问题在于, 法律责任是将几种含义混合到一个概念中。

哈特(1968)的概念分析中区分出了责任的4种基本含义:(1) **原因**责任(causal responsibility), 这是指引起结果的责任;(2) **角色**责任(role responsibility), 这是指从特定角色中产生的职责或者义务;(3) **能力**责任(capacity responsibility), 这是指理解、推理和控制行为的能力;(4) **义务**责任(liability responsibility), 这是指对一定后果承担的责任。他将后一种责任分为法律义务(legal liability, 即接受法律惩罚的责任)和道德义务(moral liability, 即受到谴责或赞扬的责任)。作为义务的责任在法律中使用得最多, 这种责任的基本含义与回答或者反驳可能导致惩罚的控告有关。责任的其他含义为此提供了一些标准或条件。因此, 引起一些行为或者疏忽、具有必要的心理能力, 都是一些有可能使个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

所以, 证明存在罪过, 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一项条件, 但是, 有关某种犯罪的罪过的标准往往是含糊的。例如, 在美国法律中, 一级谋杀罪(first degree murder)的标准是进行了恶意(malice)的、预谋(premeditation)的、深思熟虑(deliberation)的行为, 存在杀人意图。1962年美国法学会(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制定的《模范刑法典》(the Model Penal Code)提出¹⁰, 罪过的要素应当仅仅存在于在下列四种心理状态下进行的行为中: 故意地(purposefully)、明知地(knowingly)、轻率地(recklessly)和疏忽地(negligently)¹¹。在英国, 法律委员会(the Law Commission)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不过, 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关注, 引起了有关人类行为的法律概念和一些心理学派的概念之间的重要分歧。对于行为主义者而言, 所推断出的意图并不具有原因方面的意义。在可能产生行为方面, 所推断出的意图仅仅具有字面上的差异, 它们是环境中偶然发生的现象的副产品。因此, 一些心理学家同意伍顿(B. Wootton, 1959)的观点, 认为法律应该废弃罪过, 而仅仅关注犯罪人的行为, 关注犯罪行为是否会重复发生。不过, 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主张, 应当科学地、注重实效地决定预防性措施, 不应该根据文化规范决定预防性措施。例如, 在一些国家, 通过切除犯罪人的肢体来预防犯罪。然而, 法律对意图(intent)的推断, 是以日常的归因过程为基础的, 根据当代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 这种归因过程对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关注人们的行为, 就可以排除对减轻情节的考虑。这种情况会导致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¹², 严格责任已经在重婚罪、法定强奸罪(statutory rape, 与未达法定同意年龄的女性进行的性交行为)、像道路交通犯罪或销售掺假食品之类的侵害“公共福利”犯罪中得到体现。严格责任从法律决策中废除了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标准, 任何扩大都会导致过分严厉的惩罚。

10. 《模范刑法典》(the Model Penal Code) 是美国法学会制定的一部供美国各州制定或者修改现代刑法典时参考的法典范本, 它本身虽然不是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典, 但是其中的法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译注。

11. 也有人将recklessly译为“轻率地”, 将negligently译为“过失地”。——译注

12. 严格责任是仅仅根据行为承担的责任。法律规定了这种责任时, 就不管行为人在进行违法行为时的心理状态。不管个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 都不影响个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責任。——译注

三、刑法的进化

当违反规范的行为受到强烈谴责或者阻碍群体目标的实现时，就会在群体内部实行制裁。不顺从风俗和传统的行为至多会引起谴责性的和排斥性的非正式制裁。但是在特定群体以及原始社会中，违反道德观念或道德准则可能会受到逐出群体的制裁。

当个人之间或者群体之间的竞争不能用非正式程序加以解决时，就出现了成文规则。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成文规则包括了可以普遍适用的正式制裁（formal sanction）。这些成文规则最初允许受害的个人进行报复，但是，由于族间仇杀或者世仇损害了社会秩序，人们就进一步发展起了补偿（compensation）或者赔偿（restitution）制度。最早的成文法律是巴比伦国王的《汉穆拉比法典》，它出现于大约公元前 2200 年。这部法典刻在一个石柱上，石柱现存于巴黎卢浮宫中。《汉穆拉比法典》详细规定了诸如租借契约、夫妻权利和义务、契约的使用之类的事情。它废除了私人复仇，对特定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的刑罚，例如，进行盗窃行为后应当赔偿的数额。不过，《汉穆拉比法典》包含着一些严厉的刑罚，体现了**同态复仇**（lex talionis）原则。

当某位权威人物正式裁定使用赔偿措施时，民事法律制度就产生了。通常认为，当侵害行为逐渐被看成是危害社会而非仅仅危害个人的犯罪行为时，刑法就从民法中脱胎产生了。刑罚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特定的行为有了理性的看法时，就有可能创立法律制裁（legal sanction），或者说，使用法律制裁来制止对公认的风俗或者道德观念的侵害。这些可能性包含着一种**一致论**（consensus）的观点，即认为群体对什么行为应该受到正式制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认为，发达的社会是由各自具有无法相容的利益的群体组成的。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有权者或有势者的利益。因此，统治群体（ruling group）以牺牲贫穷者为代价保护他们的利益，贫穷者的行为变成了法律惩罚的目标。甚至在表面上是为了共同利益而禁止行为时，就像在惩治谋杀、伤害、强奸的法律中那样，也是有选择性地禁止某些行为，以便使统治群体的行为不受惩罚。例如，英国的强奸犯罪法只是在近来才扩大到婚内性强制（sexual coercion in marriage）。

一些法律的产生显然是为了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例如，15 世纪产生的侵入法（trespass law）是为了保护日益发展的英国商人阶层的住宅，后来，产生了惩治偷牛贼、偷车贼以及惩治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法律。不过，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分析法的**激进犯罪学家**（radical criminologist）认为，中世纪后期刑法的产生，不仅仅是特殊利益群体的胜利，而且也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德观念的胜利，这种道德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精神的萌芽。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解释，可能低估了其他因素对中世纪法律发展的影响，因为新教伦理一直都在受其他宗教和道德的影响。例如，在 13 世纪时，司法活动由牧师主持进行，通过这些牧师，英国教会与普通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 14 世纪“犯罪”这个术语流行开来，近代刑法的基本概念确立的时候，当时的道德仍然对法律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像泰勒（Ian Taylor）这样的社会学家断言，法律制造犯罪，但是，法律与其他社会制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尽管有权势的人们通过法律将社会控制机制集中起来并加以正式化，但是，法律总是在公共舆论、压力群体（pressure group）的活动以及政府政策的

影响下制定和修改的。同样,刑事司法制度的运行也高度依赖于像预算限制、对后果的行政压力之类的因素,缺乏公众支持的法律是很难实施的。事实上,不受欢迎的法律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行为,就像沃尔斯特德法(Volstead Act)在美国导致禁酒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法律一直是与法律实施机构、政府、大众传播媒介和犯罪行为本身相互作用的。

四、刑事司法制度和少年司法制度

实践中的法律并不仅仅是一种书面的禁止目录,法律的实施是由刑事司法人员决定的,刑事司法人员包括警察、审判人员和刑罚管理人员。例如,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司法裁决会变成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警察可能会在坚决执行一些法律的同时,很少或者完全不执行另外一些法律。这些刑事司法人员在逮捕、起诉、量刑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中的偏见和不公平。有人提出,美国犯罪数量的增加,已经对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这样的压力,以至于使“分类司法”得到流行。¹³

司法这个概念涉及对一个人命运的道德正确性的评价,法庭因此支配着法律。不过,理想的法律目标是为了更大社会的利益而维持社会秩序。刑事司法制度具有预防和惩罚的双重功能。刑事司法制度的**预防功能**(preventive function)在两个传统原则中得到体现。第一个原则是“**国家之父原则**”(parens patriae)¹⁴,根据这个原则,在需要照管和保护时,国家担当起公民“父母”的责任,就像在强制患有精神病的人住院治疗工作中看到的那样。第二个原则是国家拥有警察权力以便保护公民免受违法者或者其他危险分子侵害的原则。这个原则既体现在通过法律惩罚对潜在犯罪人进行威慑方面,也体现在国家授权警察和法庭拘留尚未判决有罪、但是被认为有可能进行危险行为的人方面。欧洲和美国立法中对这两个原则的混淆,构成了近来人们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拘留予以关注的基础(参见第十章)。

刑事司法的**惩罚功能**(punitive function)来源于国家对违法刑法的人进行制裁的权利。法律惩罚意味着要使罪犯承担痛苦、损失或丧失权利。法律惩罚的形式包括死刑或者肉刑、拘留在矫正机构中、罚金、判令犯罪人只能在社区内活动。尽管监禁是刑罚制度的中心特征,但是只有不足5%的成年犯罪人被送进监狱服刑。大部分初犯被处罚金、缓刑令(probation order)、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或者缓刑(suspended sentence),他们中不到1/3的人后来再次被判刑。

把监狱作为一种刑罚使用,是比较晚的事情。直到18世纪时,主要使用地牢和看守所羁押等待审判或者公开行刑的人。近代监狱起源于18世纪时贵格会教徒(Quaker)改革“惩治所”(house of correction)的努力,这种努力导致了19世纪20年代时在费城和纽约建立第一批感化院(penitentiary)。直到19世纪后半期,监狱是改造的场所的观念没有发生变化。这种观念在1846年于马萨诸塞州为关押青少年犯罪人而首先建立的教养院(reformatory)中得到体现。大约在同时,英国根据1854年的教养学校法(the Reformatory Schools Act)建立了早期的少年犯教养学校(Approved Schools),今天称之为“社区教养所”(community home)。

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少年

13. 分类司法(triage justice)指在刑事司法中对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的做法。——译注

14. “国家之父原则”又译为“政府监护原则”。——译注

犯罪人”(delinquent)是进行了那种如果由成年人进行就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的人。由于司法管辖区的不同,少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之间的年龄界限从15岁到18岁不等。不过,少年犯罪(delinquency)也包括诸如离家出走、逃学之类的不良行为,这类少年犯罪是以未成年人的身份为基础确定的(因此称之为“**身份犯罪**”[status offence])。少年司法起源于一种准医学模式,根据这种模式,青少年犯罪人被看成是病人,需要对他们进行干预,例如,在社区中进行察看,以便制止和矫正行为障碍,少年法庭的基本哲学就是让社区承担起监护责任(“**国家之父原则**”)。单独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为了控制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而发展起来的,冲突理论家却把它看成是保护工业中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宾德(A. Binder, 1987)却认为,少年司法制度是在人道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的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在加拿大,少年犯罪立法的产生,反映了重要的“卫道士”(moral entrepreneur)们的活动,并不涉及工业统治阶级。

少年法庭的目标是决定怎样帮助或者矫正儿童。不过,少年法庭剥夺了儿童的正当法律程序,即辩护人代理权、交叉盘问证人权、拒绝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的权利。作为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的一种结果,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儿童的法律权利,这种认识在少年法规和法庭程序的变化中得到反映。同时,在美国和英国,人们都试图减少对儿童的法律干预。例如,对青少年犯罪人使用警察警告;¹⁵将青少年犯罪人转入社区计划进行处理,而不是送交法庭审理。在英国,苏格兰在这方面的发展较快,那里的少年司法自1964年的基尔布兰登报告(the Kilbrandon Report)之后被非刑事化,少年法庭被非正式的听证会所取代。相比较而言,苏格兰监禁的成年犯罪人多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仅仅少于北爱尔兰)。

第三节 刑罚哲学

“感化院”、“教养院”这些术语和美国的“矫正制度”(correctional system)概念,反映了在刑罚制度的发展中道德的影响作用。刑罚政策决不可能以任何单一的功能为基础,量刑实践随着政治气候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别。一些律师认为,刑罚在表明社会对违法行为的谴责方面是很重要的,而哈特(H. L. A. Hart, 1968)指出,这是刑事立法的功能,而不是刑罚的功能。不过,法律惩罚有几重目的,这些目的反映了三月份种哲学观念:报应、功利主义和改造。

一、报应与公平模式

罪刑相适应的观念是**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的基础,但是,法律报应(legal retribution)与报复(revenge)的区别在于:刑罚是由国家强制施行的,而不是由遭受侵害的被害人进行的。刑罚代表了国家对违法者的道德谴责,但是,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由合乎公平和公正的标准决定的。康德持这种观念,他认为,应当把犯罪人看成是了解自己行为后果的理智的人,刑罚维护了犯罪人的尊严。

报应(retribution)必然要追溯犯罪行为本身,要回顾对犯罪的解释问题,否则,刑罚

15. 警察警告(police cautions),警察在录取口供前对案件的有关人员所作的警告。——译注

的未来效果就不能与刑罚的道德功能联系起来。因此,报应与矫正(rehabilitation)是有区别的。报应关注犯罪人,重视威慑,从社会的观点考虑如何使用刑罚。以“公平模式”(justice model, just deserts model)表现出的报应主义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时得到刑罚学家们的广泛认可。在美国,监禁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Incarceration)建议,采纳“罪刑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commensurate deserts),这个原则意味着,应当根据造成的侵害和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决定刑罚,刑罚应当考虑公平的需要,而不是考虑控制犯罪的需要。

尽管这个原则受到许多自由主义者的欢迎,被他们当作为刑罚的合理存在辩护的唯一理由,但是,这个原则本身却具有保守性质。这个原则承认个人责任,认为社会对道德标准有一致的观念。但是,这个原则既不能解释恶劣的监禁条件,也不能说明应受惩罚的人们之间的差别。然而,在美国的一些州采用这种模式,那里已经废除了不定期刑。这个原则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英国从未广泛使用过不定期刑。例如,1991年的刑事司法法案(the 1991 Criminal Justice Bill)提出,刑罚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使刑罚与犯罪相适应”。

二、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为**古典犯罪学派**(the classical school of criminology)提供了基础,它是启蒙时代的产物。18世纪的刑罚过分严厉并且反复无常,既不受正当程序的约束,也没有人权观念。为了表示反对,功利主义者以人类理性和社会契约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法律惩罚理论。

意大利法律理论家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¹⁶,人类追求享乐的本性,可能导致干涉别人的福利和财产,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可以通过法律惩罚阻止这种行为,但是,法律惩罚应当与所造成的损害相适应,应当受正当程序的制约。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制造痛苦或者进行补偿。刑罚的对象应当是个人的行为。不应当考虑个人的动机或者情节。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于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¹⁷,精心阐述了这些原则。他的动机理论认为,包括犯罪在内的人类行为,是为了求乐避苦而进行的。人类行为受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的支配,并且通过明智地使用奖惩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起来。伦理上的“功利原则”将道德上的善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同起来。法律惩罚应当促进社会的幸福,并且应当通过施加足以超过犯罪所得快乐的痛苦来“预防危害行为”。边沁根据对不同类型行为的相对痛苦的“幸福计算”,发展了一种复杂的针对不同犯罪的刑罚体系。

像报应论一样,功利主义指向的对象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不过,贝卡里亚和边沁在判处刑罚时如何掌握刑罚幅度的标准方面,是不相同的,因为对社会有用的(标准)不一定就是公平的(标准)。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刑罚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使用刑罚时应该着眼未来而不是追溯过去。功利主义者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刑罚应当足以阻止个人再次

16. 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是意大利犯罪学家和经济学家,犯罪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17. 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犯罪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进行犯罪（个别威慑或者**特别威慑**），应当威慑潜在犯罪人进行犯罪行为。因此，不管威慑主义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探讨实际使用的或者威胁性的刑罚的效果，还是作为一种有关社会控制的社会学理论，它们都来自功利主义。

尽管这些观念对刑事司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它们都太简单，以至于不能顺利地转化为实践，而且法庭也认为它们太简单，以至于在使用刑罚时必须要考虑犯罪人的情节，或者要考虑监禁可能产生的效果。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法学家们使用“减轻情节”（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部分责任能力”（partial responsibility）的观念对早期的古典学说进行修正时，就产生了“**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福柯（M. Foucault, 1978）将这种发展归因于识别对社会有危险性的个人的需要。尽管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和责任观念继续存在，但是这些观念已经把着眼点转向了犯罪人。正如泰勒所指出的（1973）：“新古典主义者接受古典学派关于单独的理性人的观念，同时关注人的过去和未来。”

三、改造和矫治

新古典学派倡导的刑罚个别化，与矫治哲学（philosophy of rehabilitation）相吻合。矫治哲学是在19世纪末产生的，它是早期的改造（reformation）观念和新的实证科学所倡导的决定论相结合的产物。改造是中世纪关于赎罪的宗教观念所固有的内容，这种宗教观念认为应当通过受苦对危害行为赎罪，并且公开承认进行危害行为的人要避免将来再次犯罪。18世纪的贵格会教徒也相信，孤独可以使犯罪人通过对过去犯罪行为的沉思而获得改造。改造学说是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相一致的。少年司法制度把法律干预看成是预防儿童变成犯罪人的一种机会。

在英国，1895年的格拉德斯通委员会（the Gladstone Committee）建议，通过监禁，应当使犯罪人在身体和道德方面得到改善，变得比他们进监狱时更好。改造犯罪人的方式包括道德教诲、劳动和教育。改造学说承认自由意志，而矫治观念深受精神分析疗法在监狱中应用的影响。精神动力学的理论也影响了缓刑服务的发展。

矫治学说认为，犯罪是个人的缺陷或者适应不良的产物。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到犯罪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犯罪行为方面。矫治并不是刑罚的一种替代措施，因为法律有助于预防初次犯罪，却无助于预防被判刑的犯罪人的重新犯罪，不过，法律制裁提供了帮助犯罪人适应社会的机会和手段。刑期可以是不确定的，以便有时间改变犯罪人，什么时候释放要取决于“矫治”的情况，或者取决于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这样的“专家”对犯罪人的危险性是否得到降低的判断。

尽管改造学说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支持¹⁸，但是矫治学说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攻击，政治上保守的人们将其看成是“温和的选择”，而政治上激进的人们则将不定期刑看成是对个人权利的干预。不过，矫治经常被当做扩大使用却不具有治疗性质的监禁措施的一种借口。1962年，美国法学会的《模范刑法典》将法律的目标表述为“清楚地告知人们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促进对犯罪人的矫正（correction）和改造”。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收集的证据暗示，矫治计划在降低累犯方面大多是无效的；临床医师

18. 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是指英国历史上1837—1901年之间的时期，这一时期被一些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主要特征是思想守旧、道德保守。

认为能够判定（人们的）危险性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证实。社会学家也认为，对个别犯罪人或者家庭的“治疗”转移了对社会不平等的注意力，这些社会不平等要对犯罪承担很大的责任。因此，在人们看来，矫治不仅是不成功的，而且也是强制性的，它将人们引向了歧途。结果是导致了刑罚政策的转变：从改造目标转向了报应和威慑。而且，这些倾向具有持久性。赫德森（B. Hudson, 1987）提出，公平模式没有得到一种更加公正的法律惩罚制度，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矫治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四、监禁的目的

尽管只有不足5%的罪犯被判处监禁，但是，监禁代表了死刑之外的最严厉的犯罪控制形式。由于法律惩罚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因此，无论是对刑罚的正当理由，还是对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许多人认为，刑罚的效果大多是消极的。例如，刑罚人员的重新定罪率很高，这似乎意味着监狱既没有矫治他们，也没有转变他们。情况普遍表明，监狱不仅是“犯罪的学校”，而且对犯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具有危害作用。

对矫治的怀疑引起了对监狱目的的重新评价。人们究竟能够合理地期望监狱实现什么目的呢？报应主义哲学强调对已经造成的损害的惩罚，在监禁中首先应该考虑提供人道主义的管理和约束，但是并没有完全抛弃作为一种刑罚政策的矫治。莫里斯（M. Morris, 1974）认为，报应和威慑是监禁的适当的目的，把这些目的与改造尝试混合起来是不恰当的。不过，他指出，矫治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他提出，监禁的指导原则应当是促进转变，而不应当是鼓励强制性治疗；应当鼓励对自由生活的适合性进行不同等级的鉴定，而不应当鼓励对释放的适合性进行假释预测。然而，其他人则强调监禁的功利目标。例如，克拉克（R. V. G. Clarke, 1985）主张，证据并不能证明改变个人的尝试是正当的，将重点放在威慑、剥夺犯罪能力（incapacitation）和情境预防（situational prevention）方面是更可行的。

在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监狱释放后2年内的重新定罪率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成年男性大约为60%，成年女性大约为40%，但是，年轻犯罪人和重新犯罪人的重新定罪率很高。赞布尔（E. Zamble, 1990）也估计，在加拿大，从监狱释放后3年内的重新定罪率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稳定在40%~50%之间。这样的数字并不能明确地支持威慑的效果（参见第四章）。不过，大多数初次入狱的罪犯都不会重新犯罪；对一些入来讲，监禁可能是一种威慑因素或者改造经历。尽管一些研究发现，监禁在降低累犯方面的效果比非监禁刑要差一些，但是，在刑罚种类和犯罪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例如，沃克（N. Walker）和法林顿（D. P. Farrington）（1981）在对英国罪犯的一项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刑罚种类对大多数累犯的重新犯罪可能性几乎没有影响；被重新定罪的人中，85%以上的人不考虑刑罚种类。不过，在初犯中，那些被判处缓刑的人的重新定罪率要高于那些被判处监禁或者罚金的人。因此，尽管一般人都认为监狱是犯罪的学校，但是，表明监禁具有犯因性效果的证据是微弱的；在监狱中获得新的犯罪技能的罪犯仅仅是很少的一些人。

监禁显然具有剥夺犯罪能力的功能，因为监禁可以暂时阻止犯罪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这不包括犯罪人对其他罪犯或者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因此，普遍增加刑罚（集体性剥夺犯罪能力）或者对特殊群体增加刑罚（选择性剥夺犯罪能力），对犯罪率可能有一定的

效果。由于监禁中断了犯罪生涯 (criminal career)¹⁹，剥夺犯罪能力的效果取决于个人的犯罪率和在整个犯罪生涯中监禁的持续时间。因此，在剥夺犯罪能力的研究中，可以根据被监禁罪犯的犯罪历史估计其他的刑罚对犯罪率的效果。

在刑期较长的情况下，对犯罪数量下降的估计是很不相同的，因为这类估计依赖于对个别犯罪人年平均犯罪率的假设：犯罪活动怎样被令人满意的“市场”所代替，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有多少没有被逮捕。不过，长期刑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就是监禁人数的增加。例如，布罗迪 (S. R. Brody) 和塔林 (R. Tarling) (1980) 对两组英国的样本的估计表明，当平均刑期不足 1 年时，18 个月的最低强制性刑罚 (minimum mandatory sentence) 就可以减少 17% ~ 25% 的犯罪，但却要以在监狱中服刑的时间增加 4 倍为代价。他们也估计，刑期缩短 6 个月会增加 1.6% 的定罪率，在监狱中的时间会减少 40%。

尽管可以对有较高犯罪倾向的或者危险的犯罪人进行选择性地剥夺犯罪能力的工作，但问题是需要提前识别出这样的犯罪人。布罗迪和塔林 (1980) 发现，尽管 52 名危险犯罪人中的一小部分后来实施了多于其所占比例的暴力犯罪，多增加的 5 年刑期仅仅预防了他们中的 9 人不再实施暴力犯罪。这与对预测危险性的困难性所进行的其他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参见第十二章)。因此，剥夺犯罪能力的策略产生了公正和公平方面的问题。不过，大多数犯罪人并没有再次进入监狱的事实证实，改变刑期对犯罪率的总体效果是很小的。

第四节 犯罪研究

一、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并不是指一种自然的或者同质的行为类型，这个事实造成了识别犯罪学研究对象的困难性，也给建立“犯罪” (crime) 或者“犯罪行为” (criminal behaviour) 理论带来了困难。由于许多犯罪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报告，也造成了其他一些问题；同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偏见也可能决定哪些人被司法部门宣判为犯罪人 (参见第二章)。因此，犯罪学家们的关注焦点一直是有所不同的。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应该把犯罪学界定为研究法律规定的犯罪的学科 (条文主义 [legalism])，还是应该把犯罪学界定为也研究包括有害但不违法的反社会行为的学科 (反条文主义 [anti-legalism])。一些早期的犯罪学家持反条文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自然犯罪” (natural crime)，即被普遍认为是有害的反社会行为。塞林 (T. Sellin, 1938) 指出，法律不应当规定一门科学学科的术语，在对“行为规范”的研究中不可能发现普遍的类型。戈特弗雷德森 (M. R. Gottfredson) 和赫希 (T. Hirschi) (1990)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犯罪仅仅是受到社会制裁的行为方式之一，犯罪和越轨行为 (deviance)、罪恶行为 (sin)、疏忽大意 (recklessness) 有同样的原因：过度自私。

许多社会学论著遵从这种方向，把犯罪归在“越轨行为”这个更大的标题之下。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认为，犯罪研究应该超出被划分为犯罪的那些行为的范围，因为犯罪

19. 犯罪生涯 (criminal career) 是指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一时间卷入犯罪活动，并且在较长的时期内继续进行犯罪行为直到最后停止犯罪行为的现象。——译注

行为如果是由权势群体 (powerful group) 的成员实施的话, 就很有可能不被起诉, 这样的权势群体如商业公司、警察。施文丁格夫妇 (H. & J. Schwendinger, 1970) 进一步指出, 被识别为反社会的东西肯定与人权有关, 犯罪学家应当研究诸如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之类的现象。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另一种类似的见解, 来自越轨社会学中的**标定观点** (labelling perspective)。这种观点认为, “越轨并不是行为本身的一种特性, 而是在行为人与反应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特性。” 根据这个观点, 对越轨行为的分析主要围绕怎样界定越轨行为、怎样对越轨行为作出反应, 特别是法律执行部门怎样对越轨行为作出反应这些问题而进行。这种观点会荒谬地将关注的焦点引向法定犯罪人。

范贝里 (R. Vambery, 1941) 为了替条文主义辩护, 提出了这样的反驳观点: 那种认为区分犯罪与非罪 (noncrime) 缺乏科学基础的观点, 可能鼓励集权主义社会制定出专断的法律。塔潘 (P. Tappan, 1947) 坚决支持这种观点, 认为对反社会的判定是以变化无常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 这种价值判断没有犯罪的法律定义那样精确。他主张, 法定犯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只有那些被法庭宣判犯了罪的人才是犯罪人。” 不过, 许多调查人员现在根据自我报告的行为确定少年犯罪, 从法律上讲这些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但是这些行为并不必然地引起法律的注意。韦尔福德 (C. Welford, 1975) 提出了一种不很严格的辩解, 认为一些行为本来就具有犯罪的性质, 因为它们普遍受到谴责; 犯罪学关注的对象应该是严重犯罪, 而不是无被害人犯罪 (victimless crime) 或者身份犯罪 (status crime)。然而, 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条文主义。

宾德 (A. Binder, 1988) 发现, 仍然缺乏一种普遍一致的观点。心理学家把反社会行为与少年犯罪等同起来, 强调不能用非法律的术语界定少年犯罪。不过, 争论的核心是作为一种行为现象的犯罪的概念界限。冲突论的犯罪学家和激进犯罪学家提出反对, 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例如, 哈廷 (C. A. Hatjen, 1972) 认为, 犯罪的法律定义取决于权势群体的利益, 犯罪研究中的优先问题, 应当是分析刑法的政治发展。这种观点是**法律社会学**发展的基础, 它用违法分析 (analysis of lawbreaking) 代替了违法研究 (study of lawbreaking)。这种明显的政治性探讨, 涉及到“自觉地改变刑罚的工作”。因此, 犯罪学变成了一种规范性学科 (normative discipline) 而不是一种科学的学科, 或者变成了罗克 (P. Rock, 1979) 所说的“一种世俗理论 (secular theory)。”

尽管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缺乏心理学成分, 但是, 一种普遍的特征就是, 违法者的**认识** (acknowledge) 要受到法律惩罚。因为在这方面, 违法行为仅仅在量方面与其他受到社会制裁的**违反规则行为** (rulebreaking), 例如, 欺骗行为, 有所不同。违反规则行为是犯罪心理学理论关注的一种有意义的但是并不任意决定的问题。例如, 儿童的偷窃或者攻击行为并不是犯罪, 但是这些行为是以后的少年犯罪的前兆, 它们与以后的少年犯罪有联系, 因此要在下文中的加以讨论。不能将反社会行为与犯罪和少年犯罪等同起来, 因为任何相似性都必须根据经验来确定。尽管必须根据法律概念来确定犯罪, 但是, 研究犯罪的人们却可以不受这样一种法律概念的束缚。

二、犯罪学学派

所有的科学观察都是“以理论为指导的”, 所有的理论也都是伴随着价值观的, 不过心理学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一直是缓慢的。同样, 人们关于犯罪原因和控制的观点, 包含在

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道德推理、人格特征有关的概念体系之中，这些概念体系可以分为保守的观念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尽管有关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正式理论并不总是与意识形态体系相联系，但是它们至少包含着有关人性和社会的假设。因此，可以根据哲学基础对犯罪学理论进行分类，将它们划分为四个流派：古典学派（classical school）、新古典学派（neo-classical school）、实证主义学派（positivist school）、反人类学学派（antipositivist school）。

如上所述，**古典学派**是功利主义哲学的产物。不过，该学派关于人类总是有自由意志和理性的假设，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怀疑。**新古典学派**认为，有必要考虑与犯罪有关的个人情况。新古典学派的修正，构成了整个20世纪刑事司法的基础，但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犯罪学却一直被**实证主义**统治着。

实证主义认为，人文科学应当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应当重视实证的“事实”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如同在心理学中那样，实证主义在犯罪学中的应用，也依赖于这样的假设：人类行为是受其他因素决定的，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实证主义犯罪学始于19世纪的统计学家们的工作，但是在意大利医生和人类学家龙勃罗梭（C. Lombroso）的著作中²⁰，最初却强调生物学因素。龙勃罗梭的著作《犯罪人论》初版于1876年，该书发展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犯罪行为是先天性冲动（congenital impulse）的结果，大多数犯罪人都是“生来犯罪人”（born criminal）。从生物学上来看，生来犯罪人是原始人，是人类早期祖先“隔代遗传的”结果。据说这种犯罪人表现出原始人进化的“烙印”，例如，前额后斜，浓眉突颞，身体不对称，还表现出一些心理“烙印”，包括痛觉缺失，缺乏道德感，鲁莽逞能。龙勃罗梭后来提出，只有少数犯罪人是“生来犯罪人”；他识别出了一种“倾向犯罪人”（criminaloids）类型，这种犯罪人的越轨行为是环境对其“软弱本性”产生压力的结果。

实证主义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和责任学说，认为实行罪刑相称并不能预防社会免受危险犯罪人的侵害，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涉及犯罪原因。他们提出对个别犯罪人而不是对犯罪行为进行科学研究，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犯罪人具有病态性格。犯罪性（criminality）是实施犯罪的一种倾向，它应当成为关注的目标。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刑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变犯罪人或者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而不应当致力于惩罚具体的行为，龙勃罗梭倡导使用不定期刑。生来犯罪人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但是，其他犯罪人则是可以改造的。识别这些犯罪人和危险的犯罪人，需要有分类方法和矫治方法。这种学说给那些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以“专家”的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犯罪学的发展是实证主义者与统计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相互联合的产物。加兰（D. Garland, 1985）注意到，当时英国刑罚政策的危机，使得政治家们能够接纳有可能对付犯罪的科学方法。当一些实证主义者赞同环境决定论的时候，龙勃罗梭对个人异常（individual abnormality）而不是社会条件的重视，更容易被当局接受。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第一个大学教授职位和内政部研究局（Home Office Research Unit）之前，英国的犯罪学没有研究机构，但是由于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努力，英国的犯罪学的发展是很大的。相比较而言，犯罪学在美国的发展受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的控制，这

20.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被看成是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对西方犯罪学贡献最大的少数杰出犯罪学家之一。——译注

或许是因为美国文化更容易谴责社会秩序的缘故。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在许多犯罪学文献中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从一定程度上讲，犯罪有时似乎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发明。

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批评。逻辑实证主义(logic positivism)不能对科学的发展提供适当的标准，因为它不能解释科学家们的认知活动，也不能解释社会对科学理论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在心理学、犯罪学领域也受到挑战，人文主义社会学家、冲突理论家和激进犯罪学家都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把实证主义描述成为不人道的、在矫治的外表下鼓励不公平的刑罚政策、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相结合。这些批评的主要目标尤其指向决定论、个别化、矫正主义(correctionalism)和对越轨行为的矫治，把它们看成是非理性的现象。有人指出，当实证主义在采纳决定论时，就把人们看成是被动的对象，否认人们的选择权和创造性。实证主义也把个人和社会群体当成原子论中离散的实体对待，忽视了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关注个别犯罪人时，实证主义不加鉴别地接受社会的现状，认为犯罪人违反了全社会一致的道德标准。同样，在把个人和家庭的越轨行为当做病态现象时，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提供了正常的基本标准，而忽视了在立法中的经济和致治影响。进一步讲，实证主义在探讨前提影响因素时，忽视了越轨行为的意义，从犯罪人的立场来看，越轨行为可能是理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激进犯罪学家们发展了一种具有致治色彩的犯罪学学说，这种学说追求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这种学说采取了“温和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把越轨行为看成是针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需要而做出的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它认为犯罪学应该集中研究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研究其他人怎样对犯罪行为做出反应，越轨者又怎样对别人的排斥做出反应，政治和历史因素怎样决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互动。对于在进入平等社会之前刑事司法系统如何对付犯罪的问题，则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议。

激进犯罪学受到社会学家们的批评，包括受到一些对其政治立场持赞同态度的社会学家们的批评。人们认为，激进犯罪学通过将社会指责为“病态”而过分强调犯罪的政治性质，认为它对犯罪人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看法，假定有权势的人们具有无限制的自由。激进犯罪学也忽视了进行支持其意识形态论文的经验性研究，对犯罪、刑事司法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简单化，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犯罪分布差异的事实不支持激进犯罪学。而且，激进犯罪学所依赖的假设使得它具有主观性，不能算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

扬(J. Young, 1986)承认激进犯罪学缺乏影响力，他将其归因于“左派理想主义”(left idealism)的发展，这种学说简单地采用实证主义，而忽略了犯罪和犯罪人。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激进现实主义犯罪学”(radical realist criminology)，这种犯罪学要“严肃地对待犯罪”，承认犯罪对易受伤害者的影响。这种更加注重实效的左派现实主义(left realism)保留了致治目标和早期激进犯罪学有关犯罪的假设，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主张。不过，它寻求和比较传统的犯罪社会学理论的结合，同时又认为这些传统理论是“偏袒的”理论，主张必须从犯罪人、被害人、国家和公众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犯罪。这种新的理论也认为，犯罪学理论应当更多地与法律和秩序方面的实践干预相结合，特别要优先考虑犯罪预防、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犯罪对被害人的效果。但是，这种新理论仍然对自由改革和个人主义持不赞同态度，但不排斥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除了对传统犯罪学的激进批判之外，对实证主义的反应表现出几种趋势。一种趋势是古典主义的复活和对理性决策、威慑的兴趣；另一种趋势是采取了“公平”模式。自由主义

的犯罪学观点在一些尝试中得到体现,例如,通过对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而减少刑事司法干预的尝试,将青少年犯罪人转入社区计划的转向计划。不过,实证主义仍然是主流犯罪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戈特弗雷德森(M. R. Gottfredson)和赫希(T. Hirschi)(1987)重新考察了对实证主义的批评,认为实证主义与特定理论、刑罚政策或刑罚观念的结合是早期实证主义者表现出的热情的一种结果,但是实证主义并不赞成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有关犯罪的科学探讨,其科学性特征是通过方法、技术或程序原则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具体的理论或观点体现出来的”,实证主义和古典选择理论之间并不具有兼容性。不过,作为一种方法论,实证主义的适当性仍然是成问题的,这一点将在以后讨论。

三、行为、倾向和对犯罪行为的解释

我们已经看到,古典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关注犯罪行为,而实证主义关注个人实施犯罪的**倾向**(tendency)。在考虑“犯罪”的原因时,这种差别就显得很重要,这种差别也是造成许多混淆的一种来源。在心理学中,它与“人—情境”争论(person-situation debate)有密切联系。由于个人和情境的原因作用也是犯罪学中的一个问题,这种争论值得给予一定的注意。

这种争论的核心在于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这个概念以及人格概念本身的功用。“人格”(personality)这个术语一直被人们用得模糊不清,通常用来指人们所具有的、将人们与别人区分开来一些品质。我们可以说某人具有“有趣味的”或者“反社会的”人格。在这种意义上,人格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评价,但是,人们常常将人格具体化,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行为、情绪、认知过程等之外的神秘实体对待。人格理论家主要探讨人格的心理学功能,认为人格决定人们之间的差别,提出了一批容易混淆的“人格”定义。但是,正如霍尔(C. S. Hall)和林赛(G. Lindzey)(1970)所指出的,这些人格定义受理论的支配,“如果不在用来考察人格的理论参照框架方面达成一致而给人格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人格”这种“东西”(thing),把人格看成一种探讨领域是更恰当的。广义上讲,这个领域是研究可以将人们识别和区分开来的行为规律(即倾向或者特质),研究在理论上认为对那些行为规律负责的过程和结构。

米切尔(W. Mischel, 1968)断定,经验性资料并没有证实用“广泛的反应倾向”给人格下定义是恰当的。行为主义者认为这一结论支持对行为的情境控制,但是更普遍的观点认为,行为是由人—情境的互动决定的。米切尔后来修改了他的观点(1984),这种争论在互动论(interactionism)之后已经平息。但是,许多心理学家仍然谨慎对待特质的概念。对特质概念的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功用,仍有很多疑问。

行为是个人的一种功能,还是赋予行为以情境作用的一种功能?尽管行为(behaviour)是心理学辞典中最常使用的术语,但是给行为下的定义往往很少,人们往往把行为理解为一种**动作**(act)和**倾向**(tendency)。看看这样一些话:“A在学校憎恨B”;“A具有攻击性”。这两句话都指“行为”,但是,第一句话描述具体的动作,而第二句话则指反复进行攻击行为的**倾向**。认为行为是情境的一种功能的观点,通常指具体动作而言。但是,具体动作或者事件(occurrence)(至少)是情境的一种功能,因为它取决于环境和条件:如果B不出现在特定情境中的话,A就不会憎恨B。因此,把行为说成是“情境的特性”(situationally

specific)、实际是一种同义反复,识别出某种特定行为的东西,就是行为发生的情境

另一方面,如果“行为”就是一种倾向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个人的一种特征(property),这些特征是个人所具有的,是个人早年历史的产物。像“社会性的”、“攻击性的”这些术语,具有和“广场恐怖的”、“恋童癖的”这些术语一样的情况。这些术语都描述个人具有的倾向或者能力,它们仅仅在有关的条件下才表现出来。一些情境决定个人是否按照倾向行动,但是不管个人是否进行这样的行动,个人都具有这种倾向。在这种意义上,“人·情境”争论是在互有矛盾的、关心对特定情境的反应的实验者和对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临床医生、特质理论家之间进行的。

因此,动作和倾向都需要不同的解释。某个具体的动作,是情境和个人的一种功能。情境为动作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和机会,但是只有个人才有能力进行这种动作。不过,当个人按照一定倾向行动时,情境仅仅是表现倾向的机会,而不是原因。依此类推,水表现了可溶解于水中的盐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来自盐的化学特性,而不来自盐和水的接触。

不过,具体的动作只有在作为更加一般的行为的样本时,才会引起心理学的兴趣,因为科学不关心独一无二的、不能重复的事件。在个别情况下,之所以关心某个特定的动作是因为个人具有重复这种动作的倾向。如果“情境分析”表明,A在学校憎恨B的理由是保护自己免受B的不正当伤害,A也没有憎恨人们的习惯,那么,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关注A的行为。相反,如果A在学校多次憎恨别人,那么,我们就要探讨A为什么有这种攻击倾向。行为主义者反对说,如果这种“行为”仅限于在学校发生,那么,这就是一种“特定反应”,而不是一种特质。但是,关注的焦点是倾向(disposition)。这可能是一种比通常用特质术语描述的倾向更为狭窄的倾向。正如阿尔斯顿(W. P. Alston, 1975)所注意到的,如果反对特质的唯一理由是它们的宽泛性,那么,将其限制得狭窄一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确切地说,这是互动论者的解决方法。因此,如果不把人们描述为“攻击性的”话,可能对区分特定情境中表现出的那类反应更加有用,例如,“受到批评时的口头攻击”。不过,这仍然是对特质的描述。像倾向这样的术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倾向这样的术语对所有的法律性表述都是不可缺少的。

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特质的预测效用。特质是特定行为的较差的预测因素,其典型的效度系数是0.30的相关。这通常意味着,特质的差异只能解释所预测行为中的9%。不过,根据奥泽(D. J. Ozer, 1985)的研究,这意味着一种普通的因素可以解释特质测定和标准中发现的30%的差别,这几乎是一个不重要的数量。然而,特质概括了平常的、可能发生的行为,不应该指望利用它预测特定的行为,除非已经知道其他的条件。当对一般性特质的测定与不同情境中表现出的一般性行为有关时,效度系数就会高于0.30的水平。特质可以预测多数的行为,但是不能预测特定的行为。特质提供了描述整个行为时所需要的最初因素。

由于特质指的是能力(capacity)而不是不变的行为,它们不足以说明某个特定的动作,说明特定动作需要参照与特定情境有关的个人的信念或期待。这是对米切尔的批评的反驳。如果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具有一致性的话,就必须参照一般倾向解释这种一致性。人格理论越来越求助于认知—动机因素来解释这些现象。

犯罪行为理论之间在关注焦点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把关注焦点放在**犯罪**(crime)上,有的则放在**犯罪性**(criminality)上。犯罪可能是指很多的犯罪活动,也可能是指特定

的犯罪行为,而犯罪性是指从事这类行为的倾向。大多数心理学的“犯罪”理论试图解释犯罪性,或者将这类理论加以扩展用来解释犯罪活动(criminal activity),而不是用来解释犯罪举动(criminal act)。可以举艾森克(H. J. Eysenck, 1977)的著作为例。艾森克把犯罪性看成是“与智力、身高、体重同样的延续性特质(continuous trait)”。那些反复进行犯罪行为的人,很有可能表现出极端性的这类特质,这些特质是个人的反社会倾向的前因,当个人拥有的这些特质达到显著的程度时,就构成了犯罪行为的一种必要的原因;对于一些理论研究者来讲,就构成了犯罪行为的一种充分的原因。但是,这种特质本身并不是犯罪行为,也不是犯罪行为发生的背景。不过,这些问题人们几乎没有给予关注。因此,强调的重点是“远期”原因因素(distal causal factor)。这种解释被看成是“历史性的”或者“发生性的”解释。

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者和反实证主义者关注犯罪行为,关注的焦点是最近因素(proximal factor),即与犯罪的实施有关的更直接的情境。萨瑟兰(E. Sutherland)和克雷西(D. Cressey)(1970)注意到,这种关注的可能是“机械的”、“情境性的”和“动态的”。这些区分与“个人”、“情境”和“人-情境互动”概念相对应,那些强调犯罪行为的人往往反对犯罪的“倾向论”观点,也反对关注远期因素,例如,生物结构、早年的家庭环境。吉本斯(D. C. Gibbons, 1971)指出,一些犯罪行为差不多就是对直接环境中的刺激和诱惑的一种反应。

不过,上述讨论清楚地显示,比较作为“犯罪”原因的“情境”与“倾向”或者近因与远因,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显然,早期的家庭经历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成年人会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同样清楚地是,一些人有强烈的犯罪倾向,这些犯罪倾向只能用早年的历史来解释,而不能用直接的情境来解释。这些倾向在特定行为中的表现,也不是由情境“引起”的,因为这种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行为能力,具有发现特定情境中的“刺激”或者“诱惑”的能力。正如萨瑟兰和克雷西指出的,近因并不是与犯罪人早年的生活经历分离的,因为“……个人是根据自己获得的倾向和能力解释情境的”。

主张用“犯罪性社会条件”(criminogenic social conditions)而不是用“倾向因素”解释犯罪性,同样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社会条件属于可以解释个人具有的倾向的因素,但是它本身并不能解释犯罪行为,因为人们会对同样的社会条件作出不同的反应。这并不是否定社会条件或者社会情境在解释犯罪行为中的作用,而是需要进行简短的讨论,需要明确“解释”的含义。

四、解释的宗旨

除了在把探讨重点放在犯罪还是犯罪人方面有区别之外,犯罪学家们在寻求不同类型的犯罪原因方面也有所不同。萨宾(T. R. Sarbin, 1979)从古老的哲学出发区分了最初原因(original cause)、直接原因(efficient cause),以及有效原因(effective cause)或形式原因(formal cause)。直接原因是犯罪行为的前体,原则上讲,人们之间的各种行为在这种直接原因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形式原因与犯罪的行为或者犯罪的人有关。激进犯罪学家对这些特别感兴趣,他们把刑法看成是犯罪的形式原因。沃克(N. Walker, 1987)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古老的谈论方式”,这意味着如果不再把杀人或者盗窃看成是犯罪行为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停止进行这类行为,这很明显是荒谬的。这种差别将人们的注意

力引向那些决定是否将违法者交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社会组织和决策规程。刑事司法决策近来一直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本书第二章将对此作一些论述。不过,犯罪行为的直接原因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那些探讨犯罪人的背景特征的早期实证主义者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出现的前提具有多重性。例如,伯特(C. Burt, 1925)在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人格和社会背景中发现了170多种特征。他认为,少年犯罪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能找到一种单一原因。因此,不同的犯罪人受到的犯因性影响(criminogenic influence)是不同的,这些影响或者它们的相互结合足以构成决定因素。这个常识是一致的:像交通肇事这样的事件可能是由几种不同情况造成的。不过,这已经导致了对“多因”和单因理论在解释犯罪方面的相对价值的长期争论。可以用剑桥少年犯罪人发展研究(以下简称“剑桥研究”)来说明多因论²¹,这项研究从对一群伦敦青少年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发现了少年犯罪的若干个人和社会相关因素,这项研究最初的目标是寻找与特定理论无关的(或者根据多种理论进行的)预测因素。这样一种研究具有折衷主义的倾向,并且低估了理论对观察的影响。

另一类理论是单因论,这类理论可以承认几种因素或变量。例如,特拉斯勒(G. B. Trasler, 1978)提出,犯罪的普遍特征是不能抑制社会禁止的行为,研究的重点应当是有关的心理学过程、影响这些过程的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然而,犯罪包括了极不相同的行为现象,某种单因论的解释根本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犯罪。一种解决方法是,通过将犯罪人或者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亚群体来减少犯罪行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许多调查人员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参见第三章)。戈特弗雷德森(M. R. Gottfredson)和赫希(T. Hirschi)(1990)批评了这种方法,认为犯罪构成了一种概念体系,可以用一种单一的一般性理论解释。不过,在某种抽象水平上划入一种概念体系的事件,在另一种水平上可能会划入其他的概念体系中去。正如沃克(1987)指出的,寻求一种统一的犯罪理论,就如同寻找一种单一的疾病理论。

五、自由意志和决定论

除了犯罪学学派之外,自由意志(free will)和决定论(determinism)的问题,也是法律和心理学之间常见的争论来源之一。法律采用古典学派观念,认为人们在道德上是自由的,因此要对犯罪负责;而心理学是一种实证主义学科,它赞同决定论;在极端情况下,心理学否定人应该受到谴责的观念。布莱克曼(D. E. Blackman)、马勒(D. J. Müller)和查普曼(A. J. Chapman)(1984)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基本范式冲突”(basic paradigm clash),认为“……从支持决定论的一般观点的经验性证据不断增加的情况来看,进行决定论的分析似乎是更加有理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不是能够用经验性方法就可以解决的,即使在更加广泛的哲学争论中也不容易解决。

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决定论,都没有一致同意的含义,但是,主要的理论观点可以分为三种:严格决定论、温和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严格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认为,

21. 剑桥少年犯罪人发展研究(the Cambridge Study on Delinquent Development)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犯罪学家韦斯特(D. J. West)等发起的一项有关少年犯罪人发展的长期追踪研究,后来由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犯罪学家法林顿(D. P. Farrington)接着主持。——译注

人类的行为完全由主体之外的因素决定，选择是无意义的。古典精神分析学和激进行为主义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把决定论与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等同起来，认为目前的知识应当允许我们预见未来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在心理学中，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没有证据证实普遍存在着完全的可预见性。

这种假设的更进一步的困难在于，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有一种外因，这似乎排除了理性思考。赞同决定论的科学家不能免除自己行为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们既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决定论之外，也不能从自己的理智选择中得出结论。但是，一些人认为，理性是与决定论相一致的，因为可以进行选择本身就无法选择。

后一种观点是与温和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相一致的。温和决定论认为，自由和决定论是可以相容的。因此，人们可以进行选择，但是，人们的选择总是要受到制约的。尽管将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相结合，但是实证主义者已经接受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目前在心理学中是没有争议的。加兰（D. Garland, 1985）发现，一些早期的实证主义犯罪学家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但是它却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因素，这种观点近来得到一些心理学家的赞同。这种观点保留责任的概念，并使英国的新古典主义者接受了实证主义。

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 view）更进了一步，它认为行为是完全不受约束的，认为人类的选择是完全不能预见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前因，因为自由包含着可能性，那些赞同自由选择的人通常暗示某类特定的原因，这类原因可能允许个人进行某种行为而不进行另一种行为。在有能力做出有目的的、自觉的选择的主体中，可以发现特定原因。例如，格拉泽（D. Glaser, 1977）提出，“思想往往是由那些通过经验获得的因素决定的……但是，通过思考产生的思想往往也有一定的自由创造性。”班都拉（A. Bandura, 1986）也把自由看成是“自我支配力（self-influence）的运用”，自我支配力对行为起决定性的作用，它使个人进行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自我支配力对思想起着原因性的作用。因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的状况。

萨平顿（A. A. Sappington, 1990）把近来在心理学中存在的自由意志论，看成是为自由意志概念提供科学基础的一种尝试。如果人们具有进行新的选择的能力，可以从指导人们行为的目标中进行选择，那么，人类的知识就可以促进科学预测的发展。人类的选择是否是完全自主的，对“做出选择”的传统标准是否可以检验，这些都是自由意志论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心理学与法律之间的差距要比行为主义者之间已有的差距要小。

第五节 科学哲学与犯罪解释

一、原因解释与科学方法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观点：单一的犯罪类型有单一的前因或者单一的原因会同样地导致单一类型的犯罪。不过，成问题的是，实证主义者很重视寻找对犯罪行为起作用的前因。事实上，在实证主义学说中，原因（cause）和解释（explanation）并不具有人们通常赋予它们的那些意义。为了理解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和可以替代的观念，需要考察所使用的这些术语。

作为将自然科学应用于人类行为的一种尝试,实证主义采取了“标准的自然科学观念”、决定论的前提是,任何事件都有前因(antecedent cause)。科学讨论可以观察的事实,必须通过操作性定义将理论术语转化为可以观察的现象。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前因与其后果(consequential effect)之间的规律性,进而说明普遍性的规律。人们利用现有的前因知识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是对某种规律(或者理论)的严格检验。解释是根据对规律的演绎而进行的。如果某种现象属于某类独特的事件,那么,就要根据可以适用于所有这类事件的规律确定的影响因素,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

在现代科学中,人们并不广泛使用原因的概念。不过,哈勒(R. Harré, 1985)区分了原因的两种基本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原因等同于产生(generation)。在这种意义上,原因就是产生结果的力量或者能力:结果就是由可能引起它的产生机制引起的。所以,火药爆炸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化学结构。雷管的使用仅仅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结果是一种自然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第二种意义上的原因等同于时间上的连续(succession)。原因仅仅是在结果之前存在的事件,纯粹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联系。这种含义来自于休谟(D. Hume)²²,他认为,存在或者客体并没有我们可以了解的特定性质,我们所了解到的仅仅是“感觉印象的持久联合”。对这种联合的任何归因分析,都是从“未来与过去相似”这个假设中推论出来的。所以,在原因是“产生”这种意义上,原因仅仅是一种逻辑必然性(logical necessity),是一种错觉。

休谟的原因概念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它是实证主义的核心。询问“为什么”发生这种联合,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解释不涉及产生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进一步讲,解释和预测是相对应的,唯一的差别在于:解释是从结果追溯原因,而预测是从一定的原因推测未来的结果。

实证主义在心理学中有很大的影响,被大部分激进的行为主义学说所采用。斯金纳(B. F. Skinner, 1953)更喜欢用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功能关系”代替“因果关系”,这种功能关系“仅仅表明,不同的事件有可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连续发生”。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关系进行预测,可以通过控制原因来控制行为。朱利弗(G. E. Zuriff, 1985)再次证实,行为主义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心理学翻版,预测和控制行为的能力是对其有效性的一种实际检验。

在科学哲学中,对实证主义的反对来自几个方面,这些反对可以分为反自然主义(anti-naturalism)和现实主义(realism)。激进犯罪学家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是以拥护有关人类行为的功能概念为基础的。这里所关注的是通过对实证主义的演绎来解释犯罪这类行为事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可以简短地介绍一下近来在哲学、心理学和犯罪学中发展起来的一些观点。

二、反自然主义

反自然主义者包括新维特根斯坦一派的自然哲学家²³。他们认为,人类行为是无法用自

22.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和历史学家。——译注

23. 维特根斯坦(Josef Johann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哲学论》(1921)和《哲学研究》(1953)等著作,其学说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有很大影响。——译注

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的。这派学者尤其反对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应用于人类行为。他们主张,人类行为不是由**法律约束的**(law-governed),而是由**规则指导的**(rule-following)、行为中的规律性来自意向作用(intentional agency),这种意向作用反映了人类根据规则自觉调整其行为的能力。这派学者中的一些人承认,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式对自然科学是合适的,但是反对那种认为心理学中的观察在理论上是中立的观点,指出所观察到的“事实”是受理论支配的,观察者只能通过以前的理论概念来获得(所观察事实的)意义。这种观点反对行为主义者对“可以观察的”事物与不可观察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先于我们对它的描述。与反自然主义相关的是解释学的传统(hermeneutic tradition),这种解释学传统认为,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通过理解对行动的社会意义做出解释。

认为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理解(understanding)而不是利用规律进行解释(explanation)的观点,来源于早期对实证主义的挑战,这是奥尔波特为了研究人格而区分**一般规律研究法**(nomothetic approach)和**特殊规律研究法**(idiographic approach)时引入的²⁴。这种区分一直被看成是两种分析模式之间的一种对比:参照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群的一般规律解释行为,参照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群的一般规律理解某人独有的特征。霍尔特(R. P. Holt, 1962)把这种区分看成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认为一种独特的描述需要寻求独特的术语,而且霍尔特也认为这两种术语都是没有用处的。不过,这种区分仍然存在。马塞尔(J. C. Marceil, 1977)指出,奥尔波特混淆了“理论”(个人有独特的特性)与“方法”(研究个人而不是研究群体),认为尽管奥尔波特主张在理论上使用了“特殊规律研究法”这个术语,但是经常含糊地用来指对单个个案的研究。不过,人们有意将心理学中一般规律性的观点适用于**特殊的**有关情况,而在个案分析中可能仍然使用一般规律研究法,例如,临床心理学中的**功能分析**就是如此。

对解释的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分析,是由沃克(M. A. Walker, 1987)提出的。他反对实证主义关于解释和预测之间有对应关系的假设,认为解释并不需要预测,例如,工程师对桥梁倒塌的解释就是如此。沃克区分了或然性解释和可能性解释。**或然性解释**(likelihood explanation)是指科学的一般规律或对科学的可能性(probability)的论述;**可能性解释**(possibility explanation)实质上是指历史性的论述,尤其用于解释理由。但是,处在某种顺序中的每个事件,都可以用不同的规律或者或然性解释进行说明。或然性解释适合于说明规律性,但是,不适合于说明没有规律的或者意外的事件,例如,犯罪。沃克认为,社会科学中的概括,是典型的低水平的相关,很难用来解释犯罪事件的**必要条件**,更不要说解释犯罪事件的充分条件。因此,可能性解释适合于社会科学,尤其适合于犯罪学。

沃克认为,期望对犯罪的解释具有“科学性”是不合理的。博顿利(A. K. Bottomley, 1979)也认为,犯罪学中探讨得最普遍的是对特定个案或者特殊类型个案的**回溯性解释**(retrospective explanation),即“根据与有关行为人为行为的主观意义相一致的理解”,对个案进行解释。这种解释需要分析动机和理由,而不需要依赖经验性概括。这种探讨是针对犯罪事件进行的,它承认许多犯罪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

博顿利的观点和一些临床医生的观点有所不同。例如,米施尔(T. Mischel, 1964)认

24. 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是美国心理学家,以研究人格问题著称。——译注

为、凯利 (G. A. Kelly) 的个人建构理论是与遵从规则的隐喻相一致的, 理解病人的构想就是要根据病人的观点来看待行动²⁵。这是对行为的解释, 同时也包含了预测。但是, 临床医生获得的有关统计规律性的一般规律或者知识, 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解释或者预测, 因为它们并不反映病人自己的规则。

博顿利和米切尔都认为, 一般规律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几乎没有用处。不过, 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 对行为的理解应当排除根据一般原则所作的解释。然而, 当某个犯罪人的行动产生于特殊的个人规则时, 如果认为有关人类如何掌握和使用规则、这些规则如何变化的一般理论完全不影响解释, 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理论就是没有采取实证主义形式的或然性解释, 这种观点在批判现实主义哲学 (critical realist philosophy) 或者先验现实主义哲学 (transcendental realist philosophy) 中得到发展。

三、批判现实主义

巴斯卡 (R. Bhaskar, 1979) 详细阐述了现实主义的科学观点, 还有几位作者探讨了现实主义的科学观点在心理学中的应用。现实主义的科学观点承认反自然主义关于人类行为力量原因首要性 (the primacy of agency counts of human behaviour) 的观点, 但是, 却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点是不正确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不同的探讨对象, 不过, 它们都有共同的方法论原则。主要的批评目标是休谟的原因论及其在原因解释中的应用。

现实主义首先认为, 世界是由真实的、然而往往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存在 (entity) 构成的, 由于这些存在具有产生结果的原因力量 (causal power), 因此, 它们会引起物质性的结果。科学所关心的是建立并使用经验性方法证实有关这些原因特性的理论模式。实证主义“规律”的前因仅仅是使某种存在的力量得以实现的激活条件 (activating conditions) 或者促成条件 (enabling conditions)。它们只能作为原因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解释。因此, 原因解释包括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 但是不包括对“怎么样”问题的回答。不过, 解释并不等同于预测, 因为原因力量仅仅是作为能力或者倾向而存在的, 这种能力或者倾向只有在具备促成条件时才能得到实现。正像实验室外面的世界时一个开放系统那样, 这些能力或者倾向也是不可预测的。因此, 科学的目标是解释, 而不是预测和控制; 对理论的有用性的恰当检验是解释力, 而不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

能够使人类根据世界 (world) 采取行动的原因力量, 存在于意识之中, 存在于建立世界模式和进行推理与思考的能力之中。从产生性的、非休谟主义的意义讲, 以动机、意图、信念形式存在的理性就是原因, 对它们的解释需要注意普通的语言, 这些语言是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使用的语言。尽管可以在生理学或者社会学的水平上探讨行为的产生机制, 但是这并不需要二元论或者还原论 (reductionism)²⁶。心理依赖人脑, 但是, 心理是“一种真正自然发生的物质力量, 它的自主性仍然是受制约的”。

25. 个人建构理论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又译为“个人构念理论”、“个人结构说”, 是一种强调认知因素的人格理论。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凯利 (George A. Kelly, 1905~1967) 提出。其中的 construct 一词又译为“构建”、“构念”等, 主要指个人形成的思想、观念等。

26. 还原论 (reductionism) 通常指生物学中试图把生命运动形式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形式, 用物理化学规律取代生物规律的一种思潮。——译注

创建理论和进行研究的现实主义方法，与实证主义截然不同。现实主义方法主张对科学家们实际从事的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说明。在对犯罪的解释方面，现实主义方法具有明显不同于反自然主义的观点。第一，根据行为的主观意义或象征意义来理解行为是不够的，因为这没有指出构成行为理由的信念和动机。因此，这不是原因性解释。第二，认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差别是错误的。心理学是揭示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对个人行为的解释既要涉及原因规律的应用，又要涉及对个人经历、个人特征、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的分析。正像西科德（P. F. Secord, 1983）指出的，这意味着纯粹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实验室试验可以恰当地解释一般人的能力或者原因力量，但是只能指出人们可能做（can do）什么，而不能指出人们在开放的社会中**将会**做（will do）什么。能力是否能够得到实现，取决于促成条件和制约条件的存在情况，这些条件包括能力或者倾向。应用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出那些在实验研究中发现的力量起作用的内外条件。在对犯罪的心理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分析意味着，解释的对象是犯罪人的意图、目标和信念体系，它们发展的条件，激活它们的个人和情境特征。

现实主义的观点同意博顿利的观点，即强调对犯罪的理解和许多犯罪的不可预测性。不过，它也要求用犯罪人的特征进行原因解释。这样的分析不同于实证主义的观点，它对犯罪行为如何发生的问题是含糊的，也不能阐明应该解释什么。以赫希（T. Hirschi, 1978）的论著为例，赫希在解释少年犯罪时，提出了一种有关原因概念的实证主义分析。他否认原因是一种**力量**（force），而仅仅把原因看成是少年犯罪的一种“真实的相关因素”（nonspurious correlate）。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诸如性别、年龄、种族、社会阶级、教育成绩之类的因素。然而，有点不一致的是，他接着认为，区别“产生某种结果的原因和**阻止**某种结果的原因”，是武断的。他后来指出，少年犯罪行为是“由在实施犯罪当时存在的各种原因决定的”，但是他又补充说，他更加喜欢的理论能够“从行为人的欲望和对情境的评价中识别出少年犯罪行为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原因提供理由，引起动机”。因此，赫希的原因概念一方面就是年龄、性别、教育成绩之类不加区别的相关因素，另一方面就是欲望和评价。从现实主义者的批评来看，很明显只有愿望和评价产生少年犯罪行为，因为它们就是理由和原因。尽管年龄、性别或教育成绩提供了使个人具有特定愿望和信念的条件，但是，这些因素（本身）不可能产生少年犯罪行为。

实证主义者对原因和促成条件的混淆，在犯罪学的许多预测研究中尤其明显（参见第十二章）。事实上，像年龄或性别这些因素只能预测少年犯罪行为的**倾向**。要解释这样一种倾向怎样发展，就需要一种适合于年轻人、男性、黑人、工人阶级等特征的理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识别出使这种倾向能够变成少年犯罪行为的条件。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倾向一直是实证主义者解释犯罪的焦点，但是，它还是没有从少年犯罪行为本身中明确地区别出来。不过，赫希（T. Hirschi）和戈特弗雷德森（M. R. Gottfredson）（1988）指出，“……我们必须区分两个重要的概念：作为一种事件的犯罪（crime）和作为一种个人特征的犯罪性（criminality）……这种区分提醒我们，犯罪性不一定要通过犯罪表现出来，犯罪还需要犯罪人以外的条件。”他们的理论是实证主义的，但是，犯罪性的概念却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犯罪性是一种在开放社会中可能或者不可能得到实现的能力或倾向。

上述对科学哲学进行简要介绍的目的在于，阐明最有可能用哪一种理论来恰当地解释犯罪。尽管哲学不可能提供科学理论本身的内容，但是，它可以提供确定什么构成科学或

知识的方法论原则。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那样, 尽管许多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仍然是实证主义的, 但是, 认知论者和社会学习理论者越来越关注决定人类能动作用的那些能力。托奇 (H. Toch, 1987) 指出, 对犯罪的分析需要个案研究, 在个案研究中, 可以用动机和意义来解释个人的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和精神分析学可以为个案研究提供知识基础。尽管托奇把这称之为“补充性实证主义” (supplementing positivism), 但是, 这种观点脱离了机械决定论。

第六节 心理学与犯罪学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传统上都要涉及哪些人变成犯罪人和为什么变成犯罪人的问题, 而社会学则涉及哪部分人口会变成犯罪人和为什么变成犯罪人的问题。因此, 在解释犯罪中, 需要关注这些学科之间的学术分工问题。不过, 在犯罪学中, 这三种学科之间的分工充满竞争, 而且互不信任。这种相互反感屡见不鲜, 例如, 把对犯罪人的临床研究描述成“矫正主义” (correctionalism), 轻蔑地把心理学对少年犯罪的探讨看成是“驯服者的遗传, 与犯罪学或者社会政策的发展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 利利 (J. R. Lilly)、卡伦 (F. T. Cullen) 和鲍尔 (R. A. Ball) (1989) 与扬 (J. Young) 和马修斯 (R. Matthews) (1992) 都严厉批评心理学的观点, 认为它们与政策的关系太密切, 这种批评所持的理由是可疑的: 理解个别犯罪人的尝试鼓励了保守的观点和刑罚政策, 否认犯罪与社会有关。这种对抗状态是错误的, 它代表了一种狭隘的、否定心理学分析的合理性的学科霸道作风。无论是心理学, 还是社会学, 都不能自动地解释犯罪行为。

这种分工可以追溯到这三门学科的起源。精神病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法庭精神病学” (alienism) 或者“心理医学” (psychological medicine),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和社会学作为单独的学科产生时, 精神病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专业地位。精神病学不仅为新产生的犯罪学提供了许多基本概念, 而且也致力于查明法庭上所有被告人的心理状态。不过, 在英国, 心理学对犯罪几乎没有兴趣, 其主要的兴趣在于把自己建设成为独立于哲学的实验性科学。赫恩肖 (L. S. Hearnshaw, 1964) 的研究发现, 英国对少年犯罪进行的最早的心理学探讨, 可以追溯到1853年由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的妻子——玛丽·卡彭特 (Mary Carpenter) 出版的一本书。但是, 在伯特 (C. Burt, 1925) 那本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之前²⁷, 早期对犯罪人进行的大多数心理学研究, 都是由监狱医生进行的。在精神分析学而不是学院心理学的影响下, 心理学家们参与创建了1931年成立的少年犯罪研究与治疗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Treatment of Delinquency), 这个研究所后来称为“病态人格诊所” (the Psychopathic Clinic), 以后又被称为“波特曼诊所” (the Portman Clinic)。英国犯罪学的早期发展受到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影响, 伍顿 (B. Wootton, 1959) 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衡的”。

在美国, 早期对犯罪学产生影响的也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 这一点从人们对少年犯罪

27. 伯特 (Sir Cyril Lodowic Burt, 1883~1971) 是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被认为是英国20世纪前半期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这里所说的那本书, 是指伯特于1925年出版的《青少年犯罪人》 (The Young Delinquent), 书中论述了170多种与犯罪相关的因素。——译注

人的适应、智力和犯罪、心理学动力学理论的兴趣中可以看出。随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这些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逐渐衰落。大约从1930年起,美国犯罪学逐渐被社会学所支配。惠勒(S. Wheeler, 1962)发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精神病学对其他学科的排斥造成的,部分是由于社会学建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并且避免了向心理学的变化造成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社会学内部建立了自己的学科分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试图解释个人犯罪行为,同时掩饰自己的解释与心理学解释和精神病学解释的相似性。

人们有时候认为,这些学科的独特贡献在于不同的**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例如,布劳(T. H. Blau, 1981)提出,对**犯罪率**的研究属于社会学家的范围,他们探讨与社会结构(例如,经济因素,生态因素)有关的犯罪的发生率和分布。对**个别犯罪人**的研究,属于心理学家的范围,他们把犯罪行为与犯罪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历史、直接情境联系起来。不过,这混淆了分析单元和**解释因素**(explanatory factor)。总的犯罪率不能脱离对其有影响的个人特征。例如,犯罪率与贫穷程度或贫民区住房的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贫穷和住房条件会直接引起犯罪行为,因为这种联系可能是以和这些条件有关的个人特征为中介的。如果认为总体水平的相关反映了个人水平的相关,那么,就是一种“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同样,个人特征与犯罪之间的相关也可能来自无法测定的宏观社会现象。因此,社会学机制和心理学机制都有可能影响犯罪率和个别犯罪人的行为。学科分工的基础就是解释因素的类型,即社会结构或者个人特征。

实际上,这些学科对犯罪的探讨是相互重叠的,因为社会学家也研究个人特征,例如,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中的态度和个人行为。在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西科德(P. F. Secord, 1986)区分了社会学中的3种社会心理学:(1)**心理社会学**(psychological sociology),它将宏观社会现象与个人特征(例如,社会角色)联系起来研究;(2)**符号相互作用论**(symbol interactionism)²⁸,它探讨社会情境赋予相互作用的意义(meanings),把意义看成是社会产物而不是个人产物;(3)**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它也研究个人怎样解释情境,但是强调特定情境中意义的独特性。后两门学科强调主观的观察方法,强调“人类行为的情境性、文化性、语言性和历史性”。所有这些学科在越轨社会学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直到最近,对犯罪的心理学研究仍然主要依靠心理动力学理论或行为模式(behavioural model)理论,而行为模式理论是从动物学习而不是从社会心理学中产生的。

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尽管注意了群体过程,但是它强调客观实验,仍然关注父母训练对个人的作用。这种情况包含着**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即用个人的倾向、信念、能力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哲学观点。这意味着,社会学对群体的研究来源于构成群体的个人特征。不过,进来许多的科学哲学家排斥这种观点。巴斯卡(R. Bhaskar, 1979)在阐述集体主义时认为,社会并不仅仅是由当时的人们创造的,因为社会中还有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社会是一种仅仅存在于人们行为中的抽象物,而行为总是表达和利用社会规范,例如,语言、经济条件或阶级结构。因此,社会现象是真实的,它们对个人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社会学不仅研究群体现象,而且也研究社会

28. 又译为“象征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等。——译注

结构怎样为人类行为提供条件。心理学适当地关注人们所具有的认知和情绪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塑造它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系受人类主观能动作用的影响。

心理学的这种观点在社会认知理论的相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中得到明显的反映。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有目的性的，人类根据理智和信念行动。在人类的行动中，个人因素、行为和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决定。这与行为主义的单向决定论(unidirectional determinism)形成对比，行为主义把行为看成是被动的身体运动，而不是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莫里斯(M. Morris, 1987)等认为，当代行为主义承认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应用性行为分析中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却采取单向的环境决定论，因为只能通过改变环境来影响行为。朱利弗(G. E. Zurrieff, 1985)在为行为主义进行的一项全面的辩护中认为，行为主义无法解释行为，因为行为语言(action language)和反应语言(response language)“用不同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不容易将这两种结果体系(resulting system)联系起来。”这是对行为主义在解释人类社会行为方面的局限性的一种有益的见解，因而也适用于对犯罪行为的理解。

在犯罪的心理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个人主义的理论。不过，对犯罪的心理学分析不可避免有关人类行为的性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类的问题。例如，一些理论用社会学习解释少年犯罪，但是正如卡尔文(M. Colvin)和波利(J. Pauly)(1983)所观察到的，通过奖励和惩罚塑造行为的方式本身，是由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结构决定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使用强化物的方式和强化物的可得性。因此，犯罪的社会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对同一现象提供不完全的解释。

第二章 犯罪计量与犯罪分布

第一节 引言

自19世纪早期以来,对犯罪分布进行统计学分析一直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如同医学中的流行病学一样,这项研究产生于人们对控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视,并且与社会学对犯罪的生态学和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的兴趣是一致的。心理学家普遍忽视流行病学,部分原因是与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相关的现场研究(field study)水平较低,部分原因是它所参考的医学术语具有模糊性。但是,这类研究是对个人犯罪行为研究的补充,心理学理论需要了解已知的犯罪的人口特征,需要了解犯罪的自然历史。

直到20世纪50年代时,有关犯罪的知识主要来自官方数据资料,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就认识到,存在着有关未登记犯罪和未查明犯罪人的“黑数”(dark figure)。对官方统计可靠性的怀疑,已经促使人们广泛使用其他的统计资料,包括准官方数据(例如,保险公司档案,对少年犯罪人群的参与观察,犯罪人传记),对犯罪活动的现场观察(例如,对商店行窃行为的现场观察)。不过,除了官方记录,最经常使用的计量方法是对犯罪或者对社区中被害经历自我报告(self-report)。本章考察识别犯罪和犯罪人的方法,考察这些方法揭示的犯罪人特征。

第二节 犯罪计量

尽管把某个事件认定为犯罪或者把某个人认定为犯罪人,要取决于复杂的决策过程,但是,人们仍然为了多种目的而进行犯罪统计或犯罪人统计。**犯罪率**(crime rate)就是每个单位中犯罪的总数,但是,犯罪率是**流行**(prevalence)、**频率**(frequency)或**发生率**(incidence)的产物。流行就是人们在某一时间内实施的犯罪的数量;而频率或发生率则是每个犯罪人实施的犯罪的数量。使用这些流行病学术语就是承认,不同群体之间或者不同时间阶段犯罪率的差别在流行、发生率方面是有变化的。

流行和发生率与特定的犯罪单位(unit of crime)有关,这个时间维度也在**犯罪生涯**(criminal career)的概念中得到反映¹。犯罪生涯的概念意味着,卷入越轨行为需要进入某种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随着时间而发展,并且像传统的职业角色那样,受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影响,这些社会制度和规则决定着生涯采取(role adoption)和生涯过程(career process)。**生涯犯罪人**(career criminal)这个更具体的术语意味着,充分广泛深入地卷入

1. 犯罪生涯(criminal career)是指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内卷入犯罪活动,并且在较长时期内继续进行犯罪行为直到最后停止犯罪行为的现象。——译注

犯罪而使犯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卢肯比尔 (D. Luckenbill) 和贝斯特 (J. Best) (1981) 对犯罪生涯和传统职业生涯之间的相似性提出怀疑, 因为越轨生涯 (deviant career) 是短暂的, 对工作经历来讲不一定是很重要的, 它也不受一些公认规则的制约, 这些规则规定了工作经历所需要的资源、升迁顺序或离开时间。不过, 从犯罪生涯观点来讲, 犯罪活动的不同成分, 例如, 最初卷入 (initial involvement)、频率和结束, 需要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犯罪或者不同犯罪人类型之间的区分, 通常要依靠法定犯罪分类。当然, 法定犯罪分类可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划分的, 例如, 财产犯罪与人身犯罪。不过, 法律分类与行为分类大体近似, 而且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是有限的。对犯罪和犯罪人进行分类的系统尝试, 将在第 3 章中论述。

人们也根据**严重性** (seriousness) 区分犯罪。尽管这种区分往往是根据对特定犯罪类型所具有的危害的判断进行的, 但是, 瑟斯顿 (L. L. Thurstone, 1927) 以及后来的塞林 (T. Sellin) 和沃尔夫冈 (M. E. Wolfgang) (1964) 发展了犯罪严重性心理测验量表。塞林和沃尔夫冈发现, 法官、警察和大学生能够使用类型量表 (category scale) 或者比例量表 (ratio scale) 评定犯罪的严重性, 他们很同意这些人员对犯罪严重性的排序, 造成人身伤害或者物质损失的犯罪被认为是更严重的。其他人使用不同的方法, 对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不同的文化和时间中进行了犯罪严重性方面的排序研究, 其结果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在犯罪严重性方面有一种超越整个西方社会的规范一致性 (normative consensus)。这有利于在刑法中达成一致而不是产生冲突, 也有利于量刑政策和刑事司法机构内部的资源配置。不过, 对犯罪严重性的判断会由于年龄、教育的差异而有不同, 一致性可能是由于对量表建构和计量中的人为修正进行了过高估计的缘故。对攻击行为的认知表征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所做的研究发现, “严重性”并不是单一维度的, 人们根据攻击行为的正当性、挑衅程度或者发生可能性区分这类行为, 而不是根据单一的严重性程度进行区分。

一、官方统计

最容易接触到的犯罪率信息, 来自对警察记录的犯罪所进行的官方统计。不过, 在一种犯罪被记录之前, 人们必须知道并且向警察报告这种犯罪。报告犯罪可能是刑事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决定。在美国城市中, 巡逻警察和少年之间的大多数非交通方面的冲突, 都是由市民挑起的。在英国, 77% 至 96% 的被警察记录的犯罪, 是通过公众的报告而发现的。但是, 并非所有被报告的犯罪都被警察记录在案, 最终体现在统计中的犯罪数量, 取决于官方机构的行为。因此,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 应该建立统计, 而统计也反映了具有自己的目标和偏见的人们对复杂事件的过滤活动。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每年发布**犯罪统计** (criminal statistics)。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犯罪统计来源于警察机关每月向内政部报告的 8 类可起诉罪 (indictable offence) 或应报告罪 (notifiable offence) (见表 2.1)。在美国, 类似的资料通过 1930 年创立的联邦调查局 (FBI) 的《**统一犯罪报告**》 (Uniform Crime Reports, 缩写 UCR) 发布。《统一犯罪报告》将犯罪分为两部分: 第一类犯罪比较严重, 或者称之为“**指数犯罪**” (index crime) (参见表 2.2)。对于“严重”犯罪或者不严重犯罪的分类有点随意性, 在英国, 应报告罪包括 1/3 以上涉及 25 英镑以下损失的财产犯罪; 而在美国, 涉及 50 美元以下损失的盗窃, 则

被划入第二类犯罪。

在19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构记录的应报告罪达到3 785 000起(后来已经上升到5 000 000以上)。这个数字比1987年下降了5%,但是自1979年以来却上升了43%,20年间增加了3倍。正如在表2.1中所看到的,财产犯罪构成了犯罪的主要部分,人身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和抢劫犯罪)仅仅占6%。应该注意到,犯罪的增长在不同犯罪类型之间是有差别的。抢劫犯罪在10年间增加了2倍以上,而性犯罪仅仅增长了1/5。不过,犯罪的增长在每种犯罪类型内也不是相同的。在盗窃犯罪中,盗窃汽车在1979至1988年间增长了123%,而在同一时期内,盗窃商店仅仅增加了6%。然而,这些总数掩盖了警察机构之间的广泛差别。

表 2.1 1988 年由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构记录的应报告罪

犯罪类型	犯罪 (千)	在总数中 的百分比	每 10 万人口中 的发生率	自 1979 年来 的变化 / %	破案率 / %
人身暴力犯罪	158.2	4.3	315	+63.2	75
性犯罪	26.5	0.7	53	+20.5	75
抢劫	31.4	0.8	63	+152.0	23
夜盗	817.8	22.0	1628	+47.2	29
盗窃	1931.3	52.0	3844	+33.5	34
诈骗和伪造	133.9	3.6	266	+10.8	71
刑事损害	539.9	16.0	1182	+81.3	24
其他	22.7	0.6	45	+150.0	96
合计	3715.8	100.0	7396	+43.4	35

资料来源:《19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统计》,内政部,1989年。

表 2.2 1988 年美国警察记录的指数犯罪

犯罪类型	犯罪 (千)	在总数中 的百分比	每 10 万人口中 的发生率	自 1979 年来 的变化 / %	破案率 / %
谋杀和非预谋杀	20.9	0.2	8.4	-13.4	70
强奸	92.5	0.7	38	+8.4	52
抢劫	543.0	3.9	221	+1.1	26
重伤害	910.0	6.5	370	+29.4	57
夜盗	3218.1	23.1	1309	-13.4	14
盗窃	7205.9	55.3	3135	+4.5	20
盗窃汽车	1432.9	10.3	583	+15.3	15
合计	13923.1*	100.0	5664	+1.8	21

*纵火除外。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1988年统一犯罪报告》。

尽管犯罪定义方面的差别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有一定影响,但是,美国的财产犯罪也占犯罪总数的3/4以上(参见表2.2)。美国整个严重犯罪的比率似乎比英国低,自1979年以来10年间犯罪的增长也较低。另一方面,暴力犯罪在整个犯罪中占较高的比例,暴力犯罪的比例大大高于英国。例如,在19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杀人和强奸犯罪的比率分别为每10万人口1.2和5.7起,而在美国,分别为每10万人口8.4和37.6起。

上述表格也显示了**破案率**(clear-up rate),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起诉的犯罪的比率。总体来看,1988年在英国记录的犯罪中,1/3多一点的犯罪被宣布无罪开释,尽管这个数字的绝对数在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是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是下降的。这种下降并不必然反映警察工作效率的下降。对犯罪嫌疑人的认定,更多地取决于向警察报告的内容,而不取决于小说中描绘的侦查工作。人身犯罪的破案率较高,这更多地反映了在这些案件中被害人对犯罪人的认定。

已记录犯罪(recorded crime)和个人犯罪的数量并不一致,因为一些犯罪人实施了多种犯罪,一些犯罪是由群体实施的。不过,低的破案率表明,**已知犯罪人**(known offender)仅仅占实际实施了犯罪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在英国和威尔士,1988年被警告或发现犯有可起诉罪的人为527 000人,其中85%是男性,47%的年龄在21岁以下。盗窃是最多的单项犯罪(49%),暴力犯罪人占13%,性犯罪人占2%。在不起诉罪(nonindictable offence)或者简易审决罪(summary offence)中有罪者的数量相似,而违章驾车犯罪人(motoring offender)在整个1 777 000犯罪人中的比例高达40%。尽管自1986年引入确定刑罚(fixed penalty)以来,违章驾车犯罪人在法庭受审的数量很少,但是,伍顿(B. Wooton, 1959)早年所观察到的那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伍顿当时的观察发现:“今天的典型犯罪人是驾车违章者”。

1988年,已知严重犯罪人(known serious offender)的数量刚刚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多一点。但是,法林顿(D. P. Farrington, 1981)根据1977年有关初次定罪的不同年龄组犯罪人的资料估计,这些犯罪中人的**累计流行率**(cumulative prevalence)为:17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11.7%和2.1%;21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21.8%和4.7%;43.6%的男性和14.7%的女性犯罪人超过预期寿命(lifespan)。这些可能是过高估计的数据,但是它们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在一生中可能会因为犯罪而被定罪。另一方面,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表明,在那些被定罪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变成重复性犯罪人(repeated offender)。沃尔夫冈(M. E. Wolfgang)、费格利奥(R. Figlio)和塞林(T. Sellin)(1972)发现,在10 000名1945年生于费城的少年中,35%的人到18岁时曾因为非交通肇事犯罪而被逮捕过,大约1/3的人曾经因为指数犯罪而被逮捕过,但是只有占总数6%的人变成了累犯。这6%的累犯实施的犯罪占犯罪总数的52%,占严重暴力犯罪的70%以上。英国内政部的一项研究(1987)发现了类似的结果:1953年在英国出生的少年中,将近1/3的人到28岁时,被判决犯过一次罪;但是只有6%的少年被判决犯过6次或者更多次罪;这6%的少年占被定罪总数的70%。斯塔廷(H. Stattin)和马格纳森(D. Magnusson)在瑞典的研究(1991),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二、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

在自我报告式研究中,通过匿名问卷或者访谈的方式,让个人记录卷入犯罪的情况,调

查的内容是在特定时间内个人参与特定行为的情况。大多数自我报告式研究集中于青少年,大多数研究典型地描述在一定时间内参与非法活动的情况,这些非法活动中的很少一部分引起过警察的注意,例如,威廉斯(J. R. Williams)和戈尔德(M. Gold)发现(1972),对13岁至16岁的美国少年的研究表明,其中88%的人承认在过去3年中参与过1次或者更多次的可起诉犯罪(chargeable offence),但是只有9%的人被警察抓获过,只有3%的少年犯罪行为被警察处理过。

这样的调查表明,从未违反过法律的男性青少年是很少的,人们有时候据此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一名犯罪人。不过,这种情况意味的仅仅是卷入犯罪的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人们卷入不同犯罪类型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卷入严重犯罪的情况较少。在剑桥研究中,69%的少年承认打破过对手的家的窗户,但是只有9%的少年承认打破窗户进入室内偷窃。同样,大部分少年承认与别人打过架,但是,只有少数人承认使用过武器。威廉斯和戈尔德(1972)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少年中,60%的人在犯罪严重性评定量表中的得分是零。

自我报告式研究显然发现了许多警察不知道的犯罪,而一些研究发现,那些在自我报告式研究中获得高分的人更有可能被逮捕,官方已知的少年犯罪人得的分数比守法少年要高。韦斯特(D. J. West)和法林顿(D. P. Farrington)发现(1973),在16岁时有高的自我报告分数的人中,几乎有一半的人有过一次正式定罪记录,而自我报告分数低的人中只有11%的人有过一次正式定罪记录;其余的自我报告分数高的人中,44%的人到21岁时有过一次正式定罪记录,而自我报告分数低的人中只有15%的人到21岁时有过一次正式定罪记录。总体来看,自我报告分数高的人中,70%的人在以后变成了官方少年犯罪人(official delinquent)²。因此,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并非与官方少年犯罪(official delinquency)无关,一些研究发现,这两类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5左右。另一方面,高的相关是不可能得到承认的。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研究的23名少年中,20人报告说在过去3年中有过20次或者更多次的犯罪行为,但是,只有1人因为指数犯罪而被逮捕过。

自陈式量表有几项测量错误,直到最近,这类量表的内容、问题数目或者回答表格都几乎没有标准化。所使用的测量题目是从普遍存在的潜在违法行为中抽取的,很少强调严重行为,简单化的量度往往有很高的偏态分布。同时,尽管有人报告了0.85到0.99的短期再测信度,不过,回忆方面的问题仍会削弱信度。

效度研究已经使用了情报提供者(informant)的报告、测谎仪、社会愿望量表(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对照自我报告的警察接触和官方记录等方式。尽管一些自陈式少年犯罪量表的同时效度很高,但是,它们的反应定势(response sets)的自由度仍然有待建立。吉布森(E. Gibson, 1975)提出,反应定势的自由度受到默认(acquiescence)的强烈影响;休津加(D. Huizinga)和埃利奥特(D. S. Elliot)(1986)认为,至少有20%的研究对象有可能隐瞒或者忘记了他们的少年犯罪,而同样多的研究对象会夸大他们的少年犯罪。

2. 官方少年犯罪人(official delinquent)和官方少年犯罪(official delinquency)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条件并由警察记录在案的少年犯罪人和少年犯罪。“官方少年犯罪”通常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相对应。——译注

不同研究样本之间的效度是有差别的。例如,欣德朗(M. J. Hindelang, 1981)等人发现,黑人青少年比白人青少年更有可能少报告警察已知的犯罪。正如休津加和埃利奥特所观察到的(1986),自我报告式少年犯罪量表的心理测量特性,与在社会心理学中普遍使用的测量手段相似;但是,对于可计算事件的测量,必须进行比态度测量中还要严格的评定。

自我报告在一些方面优于官方测量手段,对于所选择的内容的范围来讲也是适当的,但是,这与官方犯罪统计不同。因此,官方测量手段有可能识别最严重的犯罪人,而自我报告则会识别比较轻微的犯罪人,不过,这两类测量手段在总的犯罪率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大于犯罪人自己的犯罪次数方面的差距。

三、被害调查

犯罪调查(crime survey)将访谈活动局限于社区中那些在过去6个月或者12个月中遭受过犯罪侵害的人身上。在一些国家,进行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犯罪调查。美国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犯罪调查是在1967年进行的,调查涉及到10 000个家庭。自1972年以来,每年进行的全国犯罪调查(National Crime Surveys, NCS),涉及到132 000个美国家庭。1982、1984和1988年进行的英国犯罪调查(the British Crime Surveys, BCS),访谈了11 000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家庭中的一个16岁以上的人,在苏格兰最初访谈了5000个家庭中的一个16岁以上的人。

犯罪调查中发现的被害(victimization)远远多于官方统计中显示的被害数字。例如,1982年的英国犯罪调查估计,住宅犯罪(夜盗、汽车盗窃、恶意破坏)是警察记录的4倍以上,人身犯罪(伤害、抢劫、人身盗窃、性犯罪)是警察记录的5倍多,不过,在所有已报告的被害中,1/3涉及盗窃、破坏汽车。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犯罪数量。犯罪调查排除了一些犯罪类型,例如,商店盗窃、无被害人犯罪;被害人也有可能不向访谈者报告所有的犯罪,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家庭争执的犯罪。但是,许多“黑数”似乎包括很少或者根本不造成人身伤害或者物质损失的轻微犯罪。

尽管人们向警察报告大多数汽车盗窃,但是,对于其他盗窃的报告率很低。总体而言,向警察报告的犯罪只有1/3左右。斯科甘(W. D. Skogan, 1977)发现,在1973年的全国犯罪调查中,84%没有向警察报告的犯罪的损失在50美元以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人们提到的最常见的不报告警察的理由是犯罪很轻微,或者警察对此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对犯罪严重性的主观评价,也与报告的可能性有很大的相关。不过,一些严重犯罪不会被报告,其原因可能是为了避免诉讼。1984年的英国犯罪调查询问了报告犯罪的理由。1/3的调查对象提到了通知警察的义务,1/3的调查对象强调个人利益,例如,找回财物,16%的调查对象提到了报复的欲望。

不过,“黑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警察在处理投诉时根据自由裁量权对犯罪立案少的结果。例如,在1988年的英国犯罪调查中,75%被报告的车辆盗窃、65%被报告的夜盗和仅仅38%被报告的抢劫反映在犯罪统计中。立案数量很少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警察对事件的不同分类。但是,博顿利(K. Bottomly)和皮斯(K. Pease)指出了某一事件没有被当做犯罪立案的3种主要理由(1986):第一,控告可能是虚假的、错误的或者后来被撤回;第二,警察认为所报告的事件很轻微,参与者应该受到谴责,事件不可能被查清,或者肇事者是儿童;第三,官方定义中的含糊之处可能导致将几种犯罪计算为一种犯罪。--

些犯罪也可能被当做“不是犯罪”而被注销，但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犯罪率仅仅在6%左右。不过，立案少和注销案件的现象有地区差别，这种现象是一种有组织性的活动。例如，在英格兰，诺丁汉郡几年来记录的犯罪率最高，但是，法林顿（D. P. Farrington）和多兹（E. A. Dowds）发现（1985），大量的被害现象只能解释大量已报告犯罪率中不到1/3的犯罪率。这种差距反映了对轻微犯罪立案方面的差别，也反映了犯罪人更容易承认犯罪方面的差别。

由于访谈只对住户的一个家庭成员进行，犯罪调查容易产生抽样误差会遗漏高风险群体，例如，年轻男性、出差人员、旅游者；对基础发生率（base rate）低的犯罪（例如，强奸）的估计容易产生错误，犯罪调查也依赖回忆的准确性以及被害人报告其经历的意愿。犯罪描述中存在的差别往往比官方统计中的差别要大，对犯罪的分类既取决于被害人的解释，也取决于访谈者的解释。因此，由于犯罪类型的不同，犯罪调查既有可能受报告过分（over-reporting）的影响，也有可能受报告不足（under-reporting）的影响。不过，犯罪调查提供了大量官方统计中没有的信息，例如，大多数犯罪被害人是年轻人、穷人或少数民族。犯罪调查也有助于破除犯罪的神秘性，因为在犯罪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犯罪行为是轻微犯罪。

四、犯罪量度的使用

在通常情况下，收集犯罪统计资料要满足一些目的，例如，阐述社会政策，评价刑事司法制度，创建某种理论。不过，官方统计显然不能准确揭示犯罪事件的发生率，因此，一些人认为不能依靠官方统计。例如，博克斯（S. Box, 1981）断言，官方数据不是犯罪活动的一种有效量度（valid measure），因为它们“仅仅是刑事司法管理中所有那些任意决策的体现者”。

这样一种论断是有问题的，因为效度有一个程度问题，效度必须根据测量的对象和测量的目的来判断。布洛克（C. R. Block）和布洛克（R. L. Block）注意到（1984），并不存在“真实的”犯罪发生率数字，犯罪发生率要受被害人或刑事司法人员的决策过程、官方统计、自我报告的影响；犯罪调查不能反映所发生的一切犯罪。犯罪调查和官方统计有一定的重叠。官方统计的信度和效度会被一些错误所削弱，但是与犯罪调查的比较表明，尽管官方统计总体上低估了总犯罪率，在比较轻微的犯罪中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在杀人或者盗窃汽车这样比较严重的犯罪中的差距是可以忽略的、是很小的。欣德朗（M. J. Hindelang, 1974a）也发现，犯罪调查和《统一犯罪报告》在犯罪类型的排列顺序和地理分布方面是一致的，官方数据是测量犯罪的**相对分布**方面的有效量度。当考虑犯罪严重性和犯罪频率时，自我报告数据和官方数据也表现出明显的聚合度³。因此，不能从总体上忽视官方统计的效度，在一些情况下官方统计的效度是足够的。

但是，必须认识到官方统计的局限性，在考虑犯罪水平的变化时更应如此。在过去30年间，除了日本之外，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犯罪都急剧增长，英国和美国尤其如此。不过，这些增长有很多是错觉，在20世纪发生的严重犯罪比在前工业社会时期更具有地方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犯罪增长可能反映了程序因素的影响，例如，立法方面的变化；也反

3. 聚合度（degree of convergence）是指两种现象之间具有较高正相关的程度。这里指自我报告数据和官方数据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或一致性——译注

映了犯罪行为实际变化的影响。例如，法林顿和贝内特（T. Bennet）估计（1981），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64年的盗窃犯罪法（the Theft Act of 1964）和1968年的刑事损害法（the Criminal Damage Act of 1968）使可起诉罪的数量增长了21%，这实际上是对以前的许多不起诉罪重新分类的结果。警察记录的暴力犯罪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降低轻微暴力犯罪的立案标准引起“净增长”的结果。尽管在过去20年间，英国发生的威胁生命的严重犯罪增长了2倍多，暴力犯罪总数下降了大约7%，但是，不太严重的犯罪却增长了5倍。

犯罪增长也反映了被害人报告犯罪情况的变化。1981~1987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构记录的犯罪增长了41%，而同一时期的英国犯罪调查发现犯罪增长了30%。官方数据和被害数据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向警察报告的犯罪数量的增加来解释。不过，所报告的犯罪数量和实际发生的犯罪数量的增加合在一起，会大幅度增加已记录犯罪率（recorded crime rate）。梅休（P. Mayhew）等人对1972~1987年间的被害数据进行的考察发现（1989），夜盗犯罪增长了20%，而同一时期犯罪统计报告的增长数量则为125%，这反映了实际犯罪增长很少但是公众报案比率大幅度增加的现象。

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犯罪率实际上是不断增长的，但是，这种增长可能小于官方统计中的数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犯罪增长率可能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而少年犯罪可能有一定下降。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犯罪率增长有关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威尔逊（J. Q. Wilson）和赫恩斯坦（R. S. Herrnstein）提出（1985），社会在自我控制和延迟满足方面的投入的变化，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类变化的程度似乎是有争议的。自选购物方式增加了偷窃的机会和奖赏，汽车和其他消费品到处可见，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犯罪增长的因素。处在最危险的犯罪年龄阶段的人口比例的变化，可能是未来引起犯罪增长的一种因素。例如，科恩（L. E. Cohen）和兰德（K. C. Land）发现（1987），1946~1984年间美国杀人犯罪率和车辆盗窃犯罪率的变化，深受15~24岁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模式的影响，也受人口密度、失业率和监禁率的影响。

第三节 对犯罪人的司法处理

除了官方统计存在的问题之外，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偏见也影响对罪犯（convicted offender）的识别。不仅有许多犯罪人逃避了侦查，而且也有许多嫌疑人没有被定罪，对犯罪人的司法裁决同样受到法外因素（extra-legal factor）的影响，例如，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对犯罪轻重与否或犯罪持续性的法律考虑。有争论问题的不仅包括犯罪人是否代表了一般犯罪人，而且也包括刑事司法系统是否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正义要求。标定理论家和冲突理论家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例如，钱布利斯（W. Chambliss, 1969）认为，司法人员的裁决对无权者是有偏见的，所属的阶级支配着那些受到法律检查的人，这些人会被判处重刑。

从发现犯罪到定罪量刑这个过程来看，存在着一个将决策者和决策这两个相互影响的“节点”（node）连接起来的网络。这个过程中的“节点”包括报告犯罪，记录犯罪，识别和逮捕犯罪嫌疑人，保释或者羁押，起诉，定罪，量刑，执行（disposal）。在各个“节点”上的决定，不仅要受到规则、指导原则的制约，而且要受到组织政策、组织压力的影响，要

受到决策者个人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在这个网络的几个节点上脱离刑事司法程序,只有少数人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最后被当做犯罪人处理。很多人知道不起诉犯罪嫌疑人,特别是不起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决策的例子,被提起正式的刑事诉讼的白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要少于“普通”犯罪,这些事实表明,司法裁决中存在着偏见,司法裁决有利于更有权势的人。不过,成问题的还有:是否存在着侵害无权势者利益的系统性偏见?

一、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置

有关刑事司法人员怎样处置犯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环节的决策方面:(1)逮捕犯罪嫌疑人;(2)警察与被逮捕人员之间随后发生的行为;(3)法庭的量刑决策。对影响逮捕的决定因素的比较一致的描述,来自在美国城市中进行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陪同巡逻的警察进行观察。在打电话给警察的事件中,只有少数事件才引起逮捕行动。是否逮捕取决于犯罪的严重性、控诉人的意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例如,布莱克(D. J. Black)和赖斯(A. Reiss)观察了在3个城市中遇到的281起警察与少年之间的冲突,发现只有15%导致逮捕,犯罪的严重性是导致逮捕的最重要的因素。被逮捕的黑人嫌疑人占21%,而被逮捕的白人嫌疑人只占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人少年的犯罪更加严重,是由于控诉人的坚持;在黑人少年案件中,控诉人更有可能是黑人。伦德曼(R. J. Lundman)、赛克斯(R. E. Sykes)和克拉克(J. P. Clark)的研究(1978)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但是,皮列文(I. Piliavin)和布莱尔(S. Briar)发现(1964),黑人青少年更有可能被逮捕,那些对抗性的青少年、衣着和外表“桀骜不驯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被逮捕。布洛克和赖斯(1970)、伦德曼等人(1978)也发现,那些对抗性的青少年和很温顺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被逮捕,但是,大多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非暴力性的行为。然而,史密斯(D. A. Smith)和维舍(C. A. Visher)在24个美国城市中获得的更多的证据表明(1982),种族影响逮捕。黑人犯罪嫌疑人更有可能被逮捕,对抗性的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被逮捕;但是,白人犯罪嫌疑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对抗性态度,在控制了犯罪严重性和控诉人行为之后,种族差别仍然存在。在街头冲突中是否做出逮捕决定,很可能受直接感受到的特征和有关少年犯罪“类型”的刻板印象的制约。

警察自由裁量权对是否起诉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给予正式警告(formal caution)、是否按照非正式程序处理,都有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警察增加了使用警告的数量,对青少年犯罪人和那些进行了轻微财产犯罪或性犯罪的人尤其如此。尽管警告会被记录在公开的统计中,但是,这种做法使犯罪人不受法庭审判。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由于可起诉罪而被警告的犯罪人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10%上升到了1988年的28%,对10~13岁的少年犯罪人使用警告的比例增长更快(男性从27%增长到86%;女性从40%增长到95%)。因此,年龄和性别是影响警告决定的重要相关因素;犯罪历史和犯罪严重性也是影响警告决定的重要相关因素,大多数初犯都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不过,警告使用率在警察之间是有差别的,对累犯使用警告的比率之间的差别更大。尽管警察之间的地区差别可以解释一部分这样的差别,但是,犯罪人的特征也可能对这种差别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兰多(S. F. Landau, 1981)在5个伦敦警察分局调查了1444件直接起诉少

年或者将少年移交少年局 (the juvenile bureau, 在这里更有可能给少年以警告) 的案件的警察记录, 发现以前的犯罪、年龄、犯罪区域、种族都对起诉决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过, 在犯罪类型和种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 进行夜盗、暴力犯罪或扰乱治安犯罪的人比进行盗窃或盗窃汽车犯罪的人犯罪更容易被起诉; 黑人青少年比白人青少年更容易被起诉。

二、法庭的处理

如果被警察起诉, 犯罪人随后就会与其他可能影响司法结果的人接触, 例如, 律师、缓刑官 (probation officer)、社会工作者。在美国, 被告人可以通过与律师合作进行辩诉交易 (plea-bargaining), 这种活动会导致大多数被告人认罪。这种辩诉交易在英国没有得到正式承认, 但是, 它可以使一些被告人根据其身份而获得好处。纽曼 (D. J. Newman, 1956) 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但是, 社会经济地位肯定会影响所雇佣的法律工作人员技能的发挥, 而这种法律技能的发挥水平又会影响最终结果。缓刑官和社会工作者也会通过向法庭提出建议的方式影响量刑。在英国少年法庭中, 社会调查报告是影响监禁裁决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报告由其性质决定必然会受法外因素的影响。例如, 哈根 (J. Hagan, 1875) 发现, 加拿大的缓刑官对于比较严重的犯罪、对抗性的犯罪人、有色人种犯罪人、下层阶级犯罪人, 很少向法庭提交有利于犯罪人的建议。

有证据清楚地表明, 法庭之间在宣告无罪率、使用不同刑罚和刑期方面, 存在着差别。对于判决严厉性的差别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在法庭受审的少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的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在对一个美国少年法庭进行的研究中, 托马斯 (C. W. Thomas) 和凯奇 (R. Cage) 发现, 在犯罪严重性和以前的犯罪记录相同的情况下, 具有男性、黑人、逃学、出身于破裂家庭这些特征的人, 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理; 但这些特征与判决 (disposition) 的联系相对而言是较弱的。另一方面, 科恩 (L. E. Cohen) 和克卢格尔 (J. R. Klugel) 发现 (1978), 在 2 个信奉不同司法哲学的美国少年法庭中, 判决严厉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犯罪和以前的犯罪记录, 而不把种族和阶级看成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对英国法庭的调查中,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不过, 彼得森 (R. Peterson) 和哈根 (J. Hagan) 提出 (1984), 法庭对黑人的处理随时间而变化, 并且受犯罪性质的制约; 近年来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处理更宽容。

韦尔弗德 (C. Welford, 1975) 认为, 几乎不存在证明法律执行或法律惩罚中存在歧视的证据, 法律因素是司法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不过, 利斯卡 (A. E. Liska) 和陶西格 (M. Tausig) 指出了种族具有不同影响效果的证据, 也指出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效果较小的证据, 在司法系统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迄今为止的证据似乎表明, 法外因素可能并且经常在决定什么人最终被当做官方少年犯罪人或者犯罪人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不过, 犯罪人的特征只能解释司法裁决中的一部分差别, 这种差别也是由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的, 例如, 当地的组织政策。

对于犯罪人特征怎样影响司法裁决的问题, 一直关注不够。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 警察和法官有阶级和种族偏见, 这种观点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例如, 警察可能对犯罪人有消极的刻板印象, 科尔曼 (A. M. Colman) 和戈尔曼 (L. P. Gorman) 发现 (1978), 所调查的一些英国警官比对照组更保守、更专横。不过, 对犯罪人的心理归因也可能影响警察的决定。沃纳 (J. S. Werner) 等人发现 (1975), 警察认为青少年应当是有礼貌的、与人

合作的、在遇到询问时应该回答问题；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的有关社会技能的培训，会得到警察的较好评价。弗里曼（A. Freeman）等人（1978）发现，与警察打交道时的不恰当反应，也属于少年犯罪人的社会技能缺陷。

法官的特征也是很重要的。帕尔斯（T. S. Palys）和迪沃斯基（S. Divorski）证实（1984），量刑差异的最有可能的来源是法官的主观方面，例如，矫正、保卫公众，都是法官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也是他们在案件中所强调的东西。由于对犯罪控制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和人格因素有关，个别差异可以解释许多量刑方面的差异。不过，组织的要求可能会限制法官个人特征的作用。例如，塔林（R. Tarling, 1979）发现，尽管治安法官（magistrate）之间在量刑方面有差异，但是英格兰法官（judge）之间的量刑有很大的-一致性。当刑事司法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可能会产生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决不是不能受限制的。

第四节 犯罪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犯罪的一些特征是可以确定的。在城市地区、城镇和城市中心较差的地区，犯罪率较高；官方知道的犯罪人更有可能是男性、年轻人和黑人（这仅仅是指美国的情况）。大多数少年犯罪人是与其他人一起犯罪的；尽管大多数成年犯罪人是单独实施犯罪的，但是，只有少数少年犯罪人是单独实施犯罪的。不过，这些特征可能不是静态的；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的资料，往往不能证实官方统计资料表明的那些犯罪相关因素。纵向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有关犯罪人背景的信息⁴，下文中的讨论是以4项主要的纵向研究的结果中抽取出来的：

1. 由沃尔夫冈（M. E. Wolfgang）等人进行的第一次费城同生群（birth cohort）调查（1972），调查对象是1945年出生的9945名少年⁵；
2. 第二次费城同生群调查（1986），调查对象是1958年出生的13160名少年和14000名少女⁶；
3. 剑桥研究（the Cambridge study, 1982; 1990），研究对象是1953年出生的411名伦敦少年；
4. 全国青少年调查（the National Youth Survey, 1985），调查对象是1700多名美国青年，在这项调查中，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进行了自我报告式少年犯罪调查。

一、社会经济地位

犯罪学中的一项传统假设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人从事非法活动的比率很大。这一假设得到了由肖（C. R. Shaw）和麦凯（H. D. McKay）进行的生态学研究的支持（1942），他们的研究证实，芝加哥犯罪率的人口统计学分布，与该城市最贫穷地区中的住宅相吻合。他们认为，象收入水平、失业率、贫民区家庭

4. 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期调查和接触，从而揭示心理行为发展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法。又称为“追踪研究”（follow-up research）。——译注

5. 通常简称“第一同生群”（Cohort I）。——译注

6. 通常简称“第二同生群”（Cohort II）。——译注

的比率这些生态因素,是对社会上处于劣势的人们进行选择隔离的结果。人们认为,解组区域(disorganized area)通过迫使那些缺少财产和地位的人们进行犯罪、社区无法控制其成员的方式,助长犯罪传统(criminal tradition)。

尽管不同区域的社会特征与总犯罪率(aggregate crime rate)之间的相关性高于个人水平上的相关性,但是,犯罪率与社会经济地位低之间的反比关系,似乎与官方数据相一致。例如,1963年对17岁的英国少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13.8%的下层工人阶级少年、6.1%的上层工人阶级少年、4.2%的下中层阶级少年和0.8%的上中层阶级少年曾经被宣判犯过一次可起诉罪。丹麦的纵向研究也显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低与后来的犯罪(later criminality)之间存在着很小的负相关。在费城同生群调查中发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少年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少年之间,在后来变成少年犯罪人方面的差异为19% (在第一同生群)和18% (在第二同生群)。

早期的自我报告式研究发现的阶级差异(class differential)很小。有人认为,这方面的明显差别会刺激人们怀疑对少年犯罪人的处理过程中存在偏见。不过,蒂特尔(C. R. Tittle)、维勒迈兹(W. J. Vellemez)和史密斯(D. A. Smith)对35项研究的考察发现(1978),阶级和少年犯罪之间的平均相关,在官方数据中要比自我报告数据中显著,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2次测量期间,这种相关程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接近于零。另一方面,布雷思韦特(J. Braithwaite, 1981)对大量研究的调查发现,官方数据绝对支持存在阶级差异,而自我报告式研究则显示存在较低水平的阶级差异。

埃里奥特(D. S. Elliott)和休津加(D. Huizinga)对早期的自我报告式研究的方法论是否适当提出了怀疑(1983)。他们通过使用量表区分犯罪的不同种类和类型、区分犯罪发生率中的不同流行趋势后发现,全国青少年调查的数据表明,在严重人身犯罪和严重财产犯罪的发生率方面,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他们提出,早期的研究由于存在偏见,对抽样和犯罪的频率分布进行限制。不过,在一项对使用具有可比性的方法获得的数据进行的重新分析中,韦斯(J. G. Weis, 1987)发现,阶级与官方少年犯罪数据和自我报告少年犯罪数据之间,都仅仅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欣德朗(M. J. Hindelang)等发现(1981),在同时提供官方数据和自我报告数据的研究中,少年犯罪与阶级之间的相关有集中的趋势,在两种数据中都接近于零。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社会阶级的测定。索恩伯里(T. Thornberry)和法恩斯沃思(M. Farnworth)注意到(1982),阶级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大多数研究通常根据主要薪水收入者的职业所测定的,是家庭社会地位(family social status)。他们发现,对于成年人而言,可以根据个人地位(personal status)、特别是根据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ttainment)、工作稳定性来识别犯罪人,但是,不能根据个人出身的家庭的社会地位来预测少年犯罪和成年犯罪。不过,犯罪与家庭地位或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并且可能仅限于这种分布的极端状态。在剑桥研究中所调查的工人阶级同生群中,经济剥夺(economic deprivation)可以预测早期的少年犯罪;而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学龄儿童的一项自我报告式研究发现,少年犯罪与父母失业有关,但是与父母的职业等级(occupational level)无关。用失业和福利状况测定阶级,会发现在阶级与官方记录的暴力犯罪和自我报告的暴力犯罪之间,有更一致的相关。因此,犯罪率中的任何阶级差异,都可以反映经济上遭受剥夺的“下层阶级”的分布状况。

在北美,已经进行了很多相关的研究,而在其他国家中,社会地位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但是,拉特(M. Rutter)和吉勒(H. Giller)的研究发现(1993),如同在美国一样,可以得到的数据显示,英国的阶级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没有以前想象的那样密切。犯罪与社会经济地位低之间的这种弱相关是以什么为中介的,仍然不清楚。认为不平等的机会分布造成对非法行为的压力、贫穷的邻居助长犯罪传统这样的假设,是社会学中常见的问题,但是,在心理学理论中,却将少年犯罪行为与群体和家庭价值观的内化联系起来(见第四章和第五章)。不过,蒂特尔(C. R. Tittle, 1983)指出,没有一种重要的犯罪学理论明确地预测阶级差异。

二、年龄

犯罪学中对少年犯罪的关注,反映了大量青少年卷入犯罪的情况。有关逮捕或定罪的横剖性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表明,青少年(adolescent)和年轻成年人(young adult)中的犯罪率很高,年龄分布曲线(the age distribution curve)一致地显示:犯罪从10岁开始急剧上升,在15岁和18岁之间达到一个高峰,21岁以后逐渐下降。例如,19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犯可起诉罪的男性的年龄是18岁,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7.6,而10岁的可起诉罪犯罪人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0.8,20岁的可起诉罪犯罪人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6.2。女性可起诉罪犯罪人的年龄是15岁(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1.6),而10岁的女性可起诉罪犯罪人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0.1,20岁的女性可起诉罪犯罪人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0.9。在美国,因为犯有《统一犯罪报告》中确定的指数犯罪而被逮捕的犯罪人的年龄是17岁,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其中男性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5.8,女性在每100人中的比率是1.2。

不过,高峰年龄并非对所有犯罪都是一样的。在美国,财产犯罪的高峰年龄在男性中是17岁,在女性中是16岁。早期的《统一犯罪报告》中的数据也显示,像夜盗、盗窃汽车和恶意破坏这样的犯罪的高峰年龄在青少年阶段的中期,而像诈骗、贪污等其他财产犯罪的高峰年龄在较晚的成年期。自我报告式研究的数据显示了类似的模式,这类数据表明,财产犯罪的总体高峰年龄(overall peak)在15岁和17岁之间,但是,商店行窃和轻微偷窃的高峰年龄要小于暴力犯罪或者诈骗犯罪的高峰年龄。这些数据似乎反映了一种流行的高峰年龄。很少有人考察犯罪发生率,犯罪发生率可能不会有和年龄一样的模式。

对年龄分布的解释,使用了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例如,在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产生时发生的身体力量或者行为实验(behavioral experimentation)的变化、在成年期早期犯罪的明显的“自动减轻”(spontaneous remission)。这些现象在有关犯罪生涯终止的纵向研究中受到特别关注。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戈德弗雷德森(M. Gottfredson)和赫希(T. Hirschi)的批评。他们认为(1990),年龄分布因时间、文化、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是,年龄分布反映的是犯罪的分布,而不是犯罪倾向(criminal propensity)的分布。他们指出,犯罪倾向是稳定的,犯罪倾向的原因在所有年龄阶段都是相同的。因此,纵向研究并不会比横断研究产生更多的有关犯罪性的信息。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反驳,因为年龄分布在不同犯罪或者不同时间阶段,都是有变化的,但是,犯罪行为 and 犯罪倾向之间的区别则需要进一步观察。

三、性别

性别差异是有记录的犯罪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988年,在美国因为指数犯罪而被逮捕的男性,是女性的3.7倍,财产犯罪中的男性犯罪人是女性的3.1倍,暴力犯罪中的男性犯罪人是女性的7.7倍。在10到14岁的人群和21岁及21岁以上的人群中,犯罪人之间的性别比率最小:男性分别都是女性的3.8倍;而在青少年时期,犯罪人之间的性别比率最大(17到18岁的青少年犯罪人中男性是女性的4.7倍)。英国的模式也类似:可起诉罪犯罪人中的男女比率是5.6(即男性是女性的5.6倍)。男女性别差异在青少年早期很小(在10到13岁的犯罪人中,男性是女性的4.8倍),成年犯罪人中的性别差异也很小(21岁和更大年龄的犯罪人中,男性是女性的5.3倍),而在青少年后期性别差异最大(在17岁到21岁的青少年中,女性是女性的7.2倍)。在各个年龄阶段,盗窃犯罪的性别差异都很小,而夜盗、抢劫和暴力犯罪中的性别差异都较大。事实上,盗窃和诈骗在女性犯罪中占很大的比例,在英国,这两种犯罪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占80%左右。

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对女性犯罪的有偏见的报告和处理,而不一定反映真正的性别差异。例如,人们认为,当男性在处理女性犯罪人时,会表现得更“侠义宽容”。另一方面,少女在传统上更有可能因为“道德性”违规行为和身份犯罪而被剥夺自由。在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中发现的性别差异,比在官方统计中发现的性别差异要小;在像卖淫、逃学或者离家出走这样的传统“女性”少年犯罪中,性别差异很小,这种研究结论似乎支持人们对是否存在偏见的怀疑。后来的研究也发现,尽管男性中的犯罪流行率和犯罪发生率都很高,但是,参与犯罪的等级次序(rank order)所显示的**模式**(pattern)在男女两性之间是相似的。不过,在比较严重的自我报告的犯罪中,性别比率与官方数据接近。根据被害调查对女性参与人身犯罪做出的估计,也与官方数据相接近。

对于男性在犯罪中占绝对多数的现象的原因,几乎没有一致的认识。由于这种现象在严重人身犯罪中最明显,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象显然反映了男女之间在支配性、攻击行为和养育方面的普遍差异,而体格或激素平衡也是重要的因素。这种假设很难证伪,在女性犯罪方面的差异,也与女性在文化角色中的从属或者无权程度相关。不过,性别角色差异并不是任意的,可能是生物学差异的一种反映。传统的女性角色限制女性接近帮派(gang)或者犯罪亚文化群(criminal subculture),更限制了女性参与犯罪的机会。这种机会假设与女性在商店行窃和支票欺诈犯罪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是一致的。

女性社会化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她们的社会化更多地受到父母的控制和监督,也更强调“护幼道德”(ethic of care),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服从的现象。龙勃罗梭(C. Lombroso)和弗洛伊德(S. Freud)都相信,实施犯罪的女性抛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但是韦德姆(C. S. Widom, 1978a)进行的一项评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她发现,女性犯罪人在家庭中承受很大的压力,女性犯罪人更有可能表现出教育成就低、智力低、婚姻解体(marital disorganization)等特征。尽管人们已经提出较高的精神病理学比率,但是,很少有人比较男性犯罪人和女性犯罪人,很少有人比较引起女性犯罪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引起男性犯罪的原因。不过,生物素质(biological predisposition)在女性中起的作用可能要大于男性。

女性犯罪人数的增加,已经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女性已经变得更具有暴力性和反社

会性。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17岁的男女犯罪人之间的性别比率在1953年出生的人群中是7.1, 而在1963年出生的人群中已经降低到5.3。史密斯(D. A. Smith)和维舍(C. A. Visser)也发现(1980), 从1940年到1975年所报道的美国的的研究中, 存在的性别差异逐渐变小。另一项研究发现, 纽约少年犯罪的性别差异从1902年的60:1减小到1932年的8:1, 这说明犯罪中的性别差异变小的趋势, 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产生。但是, 斯蒂芬斯迈尔(D. J. Steffensmeier, 1980)指出, 在美国, 男女犯罪人之间的绝对差异对大多数犯罪而言, 实际上已经扩大了; 只有像盗窃、伪造和诈骗这些财产犯罪中, 女性犯罪人的相对比例已经增加。对31个国家的一项纵向比较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观点。在女性犯罪增加这个问题上, 其他的数据资源缺乏一致性。史密斯和维舍(1980)发现, 到1975年为止, 自我报告式研究中发现的犯罪性别差异的减小幅度, 要比官方数据中显示的明显。但是, 坎特(R. J. Canter, 1982a)对1977年和1967年的自我报告式研究的结论的一项比较发现, 只有在吸毒和饮酒的流行率方面, 男女性别差异是增加的。劳布(J. H. Laub, 1987)也报告说, 1973年和1981年的被害调查表明12—17岁的女性实施人身犯罪的数量是下降的, 只有在大龄群体(older group)中的数量有轻微上升。因此, 人们夸大了女性犯罪的严重性, 犯罪性别差异的变化似乎主要与传统的男性犯罪有关, 例如, 商店行窃、福利欺诈。

可以推测, 女性犯罪数量的增加, 是女权主义和更大的妇女解放的一种后果。因此, 女性进入传统上由男性控制的领域, 会增加非法和合法的机会。可是, 费格拉-麦多诺(J. Figueroa-McDonough, 1984)发现, 女权主义取向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近来一些国家中女性犯罪的数量与工业化和一般经济机会之间的相关程度, 要大于女性犯罪与女性接受教育或者女性参加劳动就业之间的相关程度。尽管妇女运动已经减弱了法律程序中的“侠义宽容精神”, 但是, 女性在犯罪模式和犯罪参加方面的变化, 可能反映了犯罪的普遍增加, 这似乎没有证实有关新的妇女解放性犯罪人(emancipated female criminal)类型的观念⁷。

四、种族

人们认为, 外国移民大量进入美国, 20世纪初期美国黑人移居北部城市之后, 少数种族人口在犯罪中的数量变得过多。但是, 肖(C. R. Shaw)和麦凯(H. D. McKay)(1942)进行长期研究获得的数据表明, 尽管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 但是, 犯罪率高的城市区域仍然保持很高的犯罪率。后来的调查也显示, 芝加哥的少年犯罪率在一些种族构成急剧变化的区域很高, 但是在那些黑人稳定居住的区域, 少年犯罪率并不高。

不过, 美国的官方数据继续表明, 黑人在犯罪人中的数量过多, 这种现象在刑罚机构的犯人中更加明显。目前, 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1%左右, 但是在1988年, 黑人占财产性指数犯罪的犯罪人的33%, 占暴力性指数犯罪的犯罪人的47%。1987年伦敦的官方数据同样表明, 具有非洲—加勒比海血统的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逮捕, 在暴力犯罪中更是如此。少数种族人口也占英国监狱人口的11.5%, 但是他们仅占总人口的5%。

7. 妇女解放性犯罪人(emancipated female criminal)是指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女性犯罪人。一些西方犯罪学家曾经认为, 妇女解放运动增加了妇女的就业机会等, 这类变化促使女性犯罪人的数量大大增加, 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犯罪人类型。——译注

相比较而言,早期的自我报告式研究没有发现证实存在种族差异的证据。这些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官方数据因偏见的存在而被夸大。但是,欣德朗(M. J. Hindelang)等人发现(1979),当考虑犯罪的严重性时,官方数据和自我报告数据之间的差距就消失了;自我报告式研究发现,严重犯罪和暴力犯罪在黑人中有很高的流行率。埃里奥特(D. S. Elliott)和艾吉顿(S. S. Ageton)证实了这一观点(1979)。欣德朗(M. J. Hindelang, 1978)也发现,被害调查和《统一犯罪报告》中的数据都一致地证实,黑人参与强奸和抢劫的比率很高,但是并没有一致地证实由于进行伤害行为而被逮捕的黑人的流行率。这两种数据支持在处理伤害案件中存在偏见的推测。近来的美国数据集中地显示,黑人在严重犯罪中的数量过大,但是,被害研究却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青少年的犯罪数量是下降的。

英国有关这个问题的数据有限。拉特(M. Rutter)和吉勒(H. Giller)发现(1983),在1970年以前,黑人和亚洲移民的少年犯罪率并不突出,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表明,有西印度血统的儿童(children of West India origin)进行少年犯罪的比率很高。从伦敦获得的更近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尽管在居民中白人占85%,西印度血统的人占5%,但是,在因为抢劫罪被逮捕的人中,西印度血统的人却占54%。另一方面,亚裔儿童的犯罪率比土生的白人儿童要低。在美国,一些种族群体,例如,日本人的犯罪率低于平均犯罪率。拉什顿(J. F. Rushton, 1990)比较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杀人、强奸和重伤害的发生率,发现当对一个国家的主要种族进行分组时,尽管存在明显的种族内差异,但是,蒙古人种(Mongoloids)的犯罪率最低,黑人种族(Negroids)的犯罪率最高,高加索人种(Caucasoids)的犯罪率介于两个种族之间。

尽管司法过程中对犯罪人的偏见不能完全解释黑人在美国和英国的犯罪中数量过多的现象,但是,种族歧视限制了少数种族群体可以得到的经济和就业机会。一些理论预测,这种状况(而不是种族本身)会引起进行犯罪的压力。乌斯顿(J. Ouston, 1984)发现,事实上,当对家庭的社会地位加以控制时,种族差异就消失了。其他为人们所知的犯罪相关因素,例如,家庭规模(family size)或者父母监督,可能也很重要。不过,拉什顿(J. F. Rushton, 1990)主张,所观察到的种族差异也与大脑重量和智商、成熟程度(rate of maturation)、生殖行为、人格、气质方面的差别相关,他的观点支持一种以基因为基础的进化论解释。这些差别在犯罪行为中的可靠性、这些差别的相关因素的可靠性,都是不清楚的。尽管不能因为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而完全忽视这种观点,但是,证据似乎是间接的、次要的。

第五节 犯罪和少年犯罪的一般性和连续性

犯罪行为理论通常都是一般性地解释犯罪的。不过,犯罪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分布,显然取决于犯罪的种类和严重性。然而,有关犯罪人的流行观念以及一些理论都假定,持续性犯罪人(persistent offender)将特定类型的犯罪专门化,像夜盗犯罪人(burglar)、强奸犯罪人这样的术语,并不仅仅简单地表示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而且也意味着一种反复进行这种犯罪行为的倾向。本节讨论怎样通过犯罪活动的类型或者模式以及犯罪活动的频率(frequency)、持续(duration)来区别犯罪人。从一定程度上讲,犯罪生

涯在类型以及程度方面是不同的,因此,试图描述一般的犯罪理论,其用处可能是有限的。

一、犯罪的专门化和多面性

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数据一些多变量统计研究,试图确定是否存在犯罪行为的特定因素或者因素群(clusters)。欣德朗(M. J. Hindelang)和韦斯(J. G. Weis)描述了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1972)。他们识别出了7类因素群:一般越轨行为、交通违章或逃学、攻击行为、盗窃、恶意破坏、两类吸毒因素。结果发现,少年犯罪行为是多维性的,而且所指出的因素群与某种潜在的一般因素(underlying general factor)之间存在正相关。对自陈式量表的因素分析通常会产生某种对大多数少年犯罪行为都起作用的一般因素,其他的因素只能解释很少的公共方差(common variance)。因此,少年犯罪人的行为可能是多面性的,而不是限于某类特定的少年犯罪行为。

对官方数据很少进行这类分析。克莱恩(M. W. Klein, 1984)发现,在导致少年犯罪团伙成员被逮捕的40种法定犯罪之间,很少存在显著相关。他提出,少年犯罪行为是偶然选择的、或者说是“自选类型”(cafeteria style),而不是按照一定模式实施的。根据对33项研究的调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多数研究没有证实少年犯罪行为中存在模式化或者专门化现象,这一结论受到了斯塔廷(H. Stattin)和马格努松(D. Magnusson)的支持(1991)。在对一项纵向研究中追踪研究的人们实施的犯罪行为模式进行的聚类分析中,他们发现青少年中存在6种模式,成年人中存在7种模式,但是他们认为专门化是有限的。

其他的研究指出,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行为或者犯罪行为中的一般因素,是一般越轨行为(general deviance)的更广泛维度的组成部分。在对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杰塞(R. Jessor)和杰塞(S. L. Jessor)发现(1977)、在对饮酒行为、非法吸毒、性早熟、少年犯罪行为的测定中,发现了显著的一般性(generality);这些行为与违反常规(unconventionality)的那些人格因素有关。奥古德(D. W. Osgood)等人在1988年发表的对类似测定进行的一项分析中,支持这种假设,认为在青少年、大学生、年轻成人中存在某种共性因素(common factor);他们也证实,在这些人的行为中存在着纵向稳定性(longitudinal stability)。因此,那些从事某种社会排斥的行为的人,也更有可能从事其他社会排斥的行为。剑桥研究进一步支持这种观点。根据在18岁时进行的谈话,发现少年犯罪人在一些与“反社会性”有关的特征方面,例如,纹身、敌对态度、不稳定的职业、结交反社会的朋友、酒后驾车、大量吸烟、饮酒、赌博、吸毒,与守法少年有所不同。到研究对象32岁时进行访谈中,在持续性犯罪人也发现了类似的特征差别。

认为缺乏专门化的进一步的证据,也来自纵向研究。纵向研究追溯一类犯罪接着另一类犯罪的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发源地。沃尔夫冈(M. E. Wolfgang)、费格利奥(R. Figlio)和塞林(T. Sellin)考察了第一个费城同生群中的少年到18岁时的逮捕历史(1972),将犯罪分为5大类型:伤害(injure)、盗窃(theft)、损害(damage)、非指数犯罪(nonindex)、综合类型(combination)。他们发现,由于某类犯罪而被逮捕者,很少会接着实施同一类型的犯罪。伯斯特(R. J. Bursik, 1980)批评了这种分析,认为在考虑犯罪类型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专门化的证据,在财产犯罪中尤其如此。罗杰克(D. G. Rojek)和埃里克森(M. L. Erickson)也发现(1972),有证据表明男性少年犯罪人有

一定的重复进行财产犯罪的倾向,女性实施的身份犯罪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他们认为,犯罪活动中的多面性(versatility)更加明显。

不过,对第二个费城同生群的追踪研究在研究对象达到26岁时获得的调查结果发现,存在着证实专门化的显著迹象,在男性实施的财产犯罪、女性身份犯罪、黑人男性实施的抢劫犯罪中更表现出专门化的迹象。霍兰(T. R. Holland)和麦加维(B. McGarvey)也发现(1984),在成年犯罪人中存在着很高的向非暴力犯罪转化的可能性,但是向暴力犯罪转化的可能性很低,没有发现在暴力犯罪中存在专门化现象。梅德尼克(S. A. Mednick)和坎德尔(D. B. Kandel)发现了不同的现象(1988),他们在对一个丹麦同生群追踪到27岁时的调查发现,存在着专门化现象。初次暴力犯罪人(first-time violent offender)接着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几乎是初次财产犯罪人(first-time property offender)接着实施财产犯罪的可能性的2倍;在少年犯罪和成年犯罪中都是如此。不过,其他一些对暴力犯罪生涯的研究指出,尽管一些犯罪人以很高的频率重复实施暴力犯罪,但是,大部分犯罪人并不是这样的;很少有一些暴力犯罪人把自己限制在仅仅实施暴力犯罪方面。费城同生群的研究也表明,在成年累犯中存在着犯罪严重性不断加重的现象,而在少年中并没有这种现象。但是,霍兰和麦加维(1984)的研究发现,实施某种暴力犯罪之后更有可能实施非暴力犯罪。

在少年中,犯罪的专门化可能是例外,而不是规律。成年犯罪人似乎更有可能将犯罪专门化。不过,尽管犯罪人具有可能违反一般的社会规则(而不是选择性的社会规则)的倾向,但是,犯罪行为似乎不可能发挥可以互换的心理功能。正如阿尔克(H. A. Alker, 1972)所指出的,表面看来不同的反应可能对个人具有相同的功能,同样,类似的反应对不同的个人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对法律上的犯罪定义的不适当依赖,可能会模糊表面上的多面性生涯中存在的规律性。

二、犯罪和越轨行为中的连续性

犯罪中的年龄分布意味着,许多少年犯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再实施少年犯罪,只有一些少年犯罪人接着变为成年犯罪人,这种观点得到了纵向研究的支持。沃尔夫冈(M. E. Wolfgang, 1983)追踪第一个费城同生群的样本直到30岁。有过在18岁之前被逮捕的历史的少年中,39%的人在成年之后继续被逮捕,而守法少年中只有9%的人在成年之后继续被逮捕。前一类人占被逮捕的成年人的75%。同样,在第二个费城同生群中,38%的少年犯罪人和10%的少女犯罪人在成年之后继续被逮捕,这两类人占有所有成年被逮捕者的58%。麦科德(J. McCord, 1979)描述了对200名美国少年的长达30年的追踪研究,这些少年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进行的剑桥—萨默维尔计划(Cambridge-Somerville Project)的对象。她发现,在少年时代被判决犯有严重犯罪的人中,47%的人后来变成了成年犯罪人,而守法少年中只有18%的人后来变成了成年犯罪人。在所联系到的那些成年犯罪人中,42%的人有过少年犯罪记录,而那些没有犯罪的成年人中,只有15%的有过少年犯罪记录。尽管百分比由于样本和犯罪记录的标准的不同而有差别,但是,证据显示,大多数少年犯罪人,特别是少女犯罪人,不会继续发展成年犯罪生涯。不过,尽管许多少年犯罪人在成年后不会变成犯罪人,但是,大多数成年犯罪人都有少年犯罪记录,这表明在一些犯罪人中存在明显的犯罪行为的连续性。

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在越轨行为中更加普遍。几项研究指出, 儿童时期反社会行为的巨大差异性以及早年开始、高的发生率、环境之间的一致性, 都与后来的反社会行为有关。在对儿童控制个案、黑人男性和越南战争退伍老兵的长期追踪中, 罗宾斯 (L. Robins, 1978) 发现, 成年人的酗酒、吸毒、暴力行为、工作困难、犯罪行为等问题, 与早年的打架斗殴、不良性行为、逃学、饮酒、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被逮捕等问题有关。儿童期反社会行为的数量和种类, 是比某种特定的行为更好的成年越轨行为的预测因素。她在 3 个样本中发现, 23%~41% 的反社会儿童后来变成了严重的成年越轨者, 而大多数后来的反社会成年人 (65%~82%) 在早年被诊断为反社会儿童。这再次意味着, 大多数越轨行为会“自动减轻” (spontaneous remission), 行为问题持续发展的仅仅是少数。罗宾斯的研究结论影响了晚近的反社会人格或者精神病态人格的概念 (见第三章)。这些研究结论与戈德弗雷德森 (M. R. Gottfredson) 和赫希 (T. Hirschi) (1990) 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认为, 存在着稳定的犯罪性, 犯罪性与普遍缺乏自我控制有关。不过, 洛伯 (R. Loeber, 1990) 指出, 存在着 3 种可以识别的越轨行为发展道路。第一种发展道路是**攻击性—多面性道路** (aggressive-versatile path), 它由早年的行为问题开始, 发展到暴力行为, 走这种道路的人可能进行财产犯罪, 也可能不进行财产犯罪。第二种发展道路是**非攻击性道路** (nonaggressive path), 它从非攻击性的行为问题开始, 发展到财产犯罪。第三种发展道路是**药物滥用道路** (substance abuse path), 尽管在按照前两种道路的发展中也存在药物滥用问题, 但是, 这是一种独立发展的道路。吉尔摩 (M. R. Gillmore) 等人报告说 (1991), 存在着证实青春前期少年儿童的这些问题有差异的证据。

从标定理论的观点来看, 犯罪行为中的连续性可能是犯罪行为的一种后果, 因为官方对少年犯罪人的处理, 会通过儿童接受越轨认同 (deviance identity) 而导致进一步的越轨行为, 或者产生“越轨加剧” (deviance amplification)。法林顿 (D. P. Farrington)、奥斯本 (S. G. Osborn) 和韦斯特 (D. J. West) 发现了一些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 但是, 这些证据仅限于紧接着 18 岁之后初次被定罪而增加的自我报告的犯罪和敌对态度。不过, 在那些 14 岁之前被初次定罪的人中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也没有发现它对大龄少年犯罪人 (old delinquent) 有持续的效果。标定理论不可能解释大量在犯罪中观察到的连续性。

三、犯罪生涯的多样性

纵向研究已经特别注意了早年进行少年犯罪的人们的认同 (identification), 其目标是发展识别这样的危险者的预测指标, 确立可能的“原因性”影响。那些变成少年犯罪人的人, 在上学的早年期间, 更有可能具有较差的行为问题历史和较差的教育成绩。家庭因素, 例如, 贫穷、家庭规模大、父母有犯罪行为史, 也是少年犯罪的重要预测因素。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考虑这些因素的理论重要性, 但是, 现在的兴趣在于具有不同的犯罪生涯的犯罪人之间的差别。对于许多犯罪人而言, 少年犯罪显然是一种过渡性现象; 但是, 对于一些犯罪人而言, 少年犯罪是一种稳定的特征。例如, 在第一个费城同生群中, 在那些到 18 岁时被识别为少年犯罪人的少年中, 46% 的人是一次性犯罪人 (one-time offender), 35% 的是非慢性累犯 (nonchronic recidivist), 只有 18% 的人是慢性累犯 (chronic recidivist, 指实施了 5 次或者更多次犯罪的人)。在第二个费城同生群中, 这样的数字分别是 42%、35% 和 23%。在英国的一组样本中, 在 28 岁前初次被定罪的人中, 55% 的男性和 78% 的女性是

次性犯罪人。显然,从大量偶然地或者很少实施少年犯罪的人中识别持续性犯罪人或者慢性犯罪人(chronic offender)、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重要的。

韦斯特(D. J. West, 1982)根据犯罪活动开始和继续的情况,区分出4种生涯模式:(1)少年一次性犯罪人(juvenile one-time offender);(2)迟发犯(latecomer);(3)暂时性累犯(temporary recidivist);(4)持续性累犯(persistent recidivist)。剑桥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有关这些模式之间差别的数据。例如,一次性少年犯罪人仅仅在背景方面与守法少年有轻微的不同。另一方面,持续性累犯被定义为至少被判定犯有2次少年犯罪和1次成年犯罪的人,与整个样本相比,持续性累犯更有可能出生于规模较大的低收入家庭,父母更有可能有犯罪历史,更有可能在10岁之前被认定智力较低和惹很多麻烦。一个简单的指标将教师对惹麻烦行为(troublesomeness)的等级评定中的高分、父母或者同胞中的犯罪记录联系起来,这个指标可以识别出85%会变成持续性累犯的人和5%具有危险性的其他人。应该注意的是,49%的持续性犯罪人无法用这个指标识别出来(虚假否定),而那些被识别为具有危险性的人中,有50%的人实际上不会变成累犯(虚假肯定)。在少年犯罪的预测中,这种预测错误是常见的。被虚假肯定的人(the false positive)早年经历了家庭不幸,但是不会继续变成累犯,他们有其他社会问题,可能会失业、会产生社会隔离、在成年后会生活在很差的环境中。

早年开始(犯罪生涯)也可以预测持续性犯罪行为。人们往往会发现,累犯第一次被逮捕的年龄要比一次性犯罪人首次被逮捕的年龄小。在两个费城同生群中,人们发现,在犯罪数量与初次接触警察之间,有接近一致的负相关。在剑桥研究中,25岁之前识别出的23个慢性犯罪人(实施6次或者更多次犯罪行为)都在15岁之前被首次定罪。但是,并非所有早年的少年犯罪人都会变成累犯。

布卢姆斯坦(A. Blumstein)、法林顿和莫伊特拉(S. Moitra)试图将**持续犯**(persister)和**暂时犯**(desistor)区分开来⁸。他们根据从4项纵向研究中获得的犯罪历史资料发现,未来被逮捕或者定罪的概率,会随着每次后继的犯罪而增加,可以高达0.6,然后稳定在0.8左右。他们认为,概率的增加反映了暂时犯的停止,也反映了累犯中持续犯的比例的增大。他们使用剑桥研究中获得的资料发现,在与破坏行为、社会缺陷(social handicap)、低智商、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差有关的7项儿童测度的指标方面,用其中4项指标进行识别,发现65%的持续犯、20%的暂时犯和7%的守法少年,具有实施慢性犯罪的危险。在注意到虚假否定(false negative)和虚假肯定问题之后,他们提出,可以发展这样一种指标,在持续性累犯年龄很小时就可以识别出他们。不过,邓福德(F. W. Dunford)和埃里奥特(D. S. Elliott)批评用官方犯罪记录识别生涯犯罪人(career offender)的做法⁹。他们使用从全国青少年调查获得的自我报告数据,以犯罪严重性、频率、持续性为基础,识别不同类型的生涯犯罪人。尽管他们的生涯犯罪人类型主要是根据逮捕记录区分的,不过也参考了少年犯罪态度,但是,用自我报告数据识别出的持续性的、严重的犯罪人,却不能根据官方数据识别为慢性犯罪人。这些数据与剑桥研究中获得的数据不一致,因为它们仅仅是从3年的时间中获得的。

8.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里的“持续犯”应当是指持续性累犯,“暂时犯”应当是指暂时性累犯。——译注

9. 生涯犯罪人(career offender)的含义相当于“慢性犯罪人”。——译注

人们发现,持续犯和暂时犯在后来的特征方面也有所不同。奥斯本(S. G. Osborn)和韦斯特(D. J. West)对持续性犯罪人、到19岁时停止犯罪的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进行了访谈(1980),并且在他们达到24岁时进行了社会行为方面的比较。结果发现,持续犯和暂时犯在18岁时表现出一些严重反社会的越轨行为的症状,例如,不稳定的职业、打架斗殴、酗酒、抽烟、赌博,而守法少年没有这些症状。不过,到24岁时,暂时犯的反社会的越轨行为比持续犯大大减少,接近于守法少年;这表明,暂时犯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到32岁时,暂时犯继续酗酒和参与打架斗殴,但是住所和职业比持续犯要稳定。

近来,在一些无控制的研究中对暂时犯进行了访谈。特拉斯勒(G. B. Trasler, 1979)、威尔逊(J. Q. Wilson)和赫恩斯坦(R. S. Herrnstein)(1985)都提出,停止(desistance)是改变强化相倚(reinforcement contingency)的一种反应,当守法少年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受到奖赏时,就发生停止现象。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社会网络中的变化和人际联系的增强,会使少年犯罪人和中年慢性轻微犯罪人(middle-aged chronic petty offender)放弃犯罪。不过,卡森(A. Cusson)和平逊纽特(P. Pinsonneault)根据与17名以前的抢劫犯的谈话(1986),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一个重要因素是犯罪的消极后果的延迟威慑效果。这3项研究的数据表明,停止是对个人目标和对行为变化的社会支持的可得性进行综合性重新评价的一种结果。除了无控制的回溯性数据的限制之外,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停止”的认定问题,因为犯罪人可能在“停止犯罪”数年后又重新实施犯罪。

人们较少关注那些在成年后第一次犯罪的迟发犯。如前所述,迟发犯的数量比持续性犯罪人要少,在一些调查中,迟发犯占成年犯罪人的1/4或者更多。在剑桥研究中,对迟发犯与持续犯、暂时犯以及未被定罪者(unconvicted men)的比较发现,尽管迟发犯在童年时有可能被划入低智力人群,但是,他们较少经历早年的家庭不幸,父母犯罪的情况也不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未被定罪者类似。另一方面,迟发犯比未被定罪者更有可能在学校惹麻烦,在14岁时有更高的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分数,在18岁时更有可能具有反社会态度。到32岁时,他们在家庭和职业稳定性方面,与未被定罪者相似,但是比未被定罪者更有可能酗酒、打架斗殴和产生精神病学问题。因此,迟发犯表现出一些持续犯的特征,但是似乎较少实施犯罪。

第三章 犯罪人分类

第一节 引言

任何科学的发展，都要依赖描述性分析体系，因为这种体系可以识别所研究领域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性。尽管许多犯罪学研究的基础是犯罪或者犯罪人的数量，但是，犯罪理论、犯罪控制或预防方法的发展，却需要描述性分析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分类(classification)有两重意义。首先，它是指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一种体系；其次，它是指要将个别研究对象纳入某种体系的不同类型中。后一种意义就是临床评价和诊断的常见目标，但是，本章主要论述分类体系，可以根据这种体系识别犯罪行为或犯罪人的类型。

第二节 分类法中存在的问题

分类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与类型的特征和结构安排有关的问题，其中的大多数问题可以用精神病学分类来说明。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反对分类的观点，即认为“分类”(typing)会给个人打上消极的、烙印化的标签，会否定个人的独特性。但是，对事件或者人物的分类，是语言的一种固有特征；当流行非正式的、判断性的刻板观念时，烙印化(stigmatisation)更有可能发生，就像在监禁机构中常见的那样。分类虽然忽略了个人的独特性，但是并不否认个人的独特性，而是为了更重要的目的而强调共同性。分类不仅是科学和专业活动中进行交流所必需的，而且也是进行决策和预测所必需的。

传统的模式是林奈植物分类(Linnean classification of plants)¹。特征、事件或者个人都可以根据某种共同原则划入不同的类型，例如，形状或者功能的多样性。类型(class)是根据类型成员的必要的、足够的标准确定的，属于一种类型的事物是同质的，类型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不过，认知研究发现，自然语言中的类型概念和科学中的类型概念很少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人们往往根据大多数成员而非所有成员共有的一些典型特征(prototypical feature)来划分类型。例如，“羽毛”、“翅膀”、“飞行”是“鸟”类共有的典型特征，“游泳”则缺乏典型性，燕子是鸟类中比鸭子更好的一个例子。在精神病学分类中，由于接受了多型类型(polythetic class)的概念，这样一些特征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根据多型类型概念，可以仅仅根据一些定义标准(defining criteria)来识别类型地成员。在这些术语中，同质性(homogeneity)是相对的，它要求成员之间相互类似而不是完全相同。

1. 林奈(Carolus Linnaean, 1707-1778)是瑞典博物学家，创立双名法，最早阐明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为近代分类学奠定了基础。——译注

传统的单型分类 (monothetic classification) 根据全有或绝无标准 (all-or-none criteria) 将对象归入离散的类型中。但是, 与怀孕不同, 心理学特征很少有采取这种全有或绝无形式的。像个人倾向、越轨反应这些概念, 可能更适合于用**维度** (dimension) 来定义, 维度可以区分出极端情况, 但是不会产生离散类型 (discrete class)。维度可以根据频率或者强度的可计量连续体确定个体的位置, 允许在评价经验性关系中有更大的精确性和灵活性。不过, 用来界定某种范围的独立维度, 不同于相互排斥的类型, 因为个体在所有维度上都可以有一定位置。所以, 可以使用经验性方法, 例如, 谱系聚类分析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对那些在若干维度上处于相似位置的个体进行分组, 以此进行类型划分。这种分类保留了自然发生的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产生根据连续的而非双重的标准界定的多型类型。尽管在精神病学中, 由于偏爱日常分类思维而排斥维度描述, 但是, 精神病学中的分类, 往往使用人为的正常和异常界限。

分类产生于四种方式。第一, 可以根据有关**典型类型** (ideal type) 的主观印象划分类型。当观察者发现一些特征有明显的共变性 (covariation) 时, 这种典型类型代表了组内成员共有的典型特征。许多精神病学类型, 例如, 克莱克利 (H. Cleckley) 的精神病态者概念, 就起源于这种方式。第二, 通过某一理论主要关注的特征来划分类型, 就像在弗洛伊德 (S. Freud) 的神经官能症理论中的情况那样。第三, 从实用出发, 将特别感兴趣的若干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在剑桥研究中使用时间因素区分犯罪生涯 (criminal career) 的做法就是如此 (见第二章)。第四, 从经验出发使用多元统计方法进行分类。多元统计方法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ethod) 一直是变态心理学和犯罪学都很感兴趣的方法。

在任何情况下, 类型的概念都是理论术语, 必须接受可靠性检验; 一种分类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的基础。分类的性质和分类的适当性, 取决于可靠的标准、使用的一致性、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理论相关性。许多分类体系由于没有使用一种共同的分类原则, 因而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例如, 精神病学分类继续通过所观察到的功能失调 (例如, 抑郁障碍) 来识别一些类型, 通过发病原因 (例如, 器质性人格障碍) 来识别一些类型, 通过理论 (转换性癔症) 来识别其他类型。这种情况导致类型之间互不排斥 (即互有交叉)。尽管精神病学分类的信度近来已经得到改善, 但是, 许多类型的效度仍然有待增强。

第三节 犯罪学中的分类

无论是犯罪, 还是犯罪人, 都不是同质的; 分类需要满足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 要满足刑罚机构中进行**管理决策** (management decision) 的需要。刑罚机构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机构外部社会公众的安全, 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和犯人的安全; 要根据犯人的年龄、性别、危险程度、刑期、训练需要将犯人安置在不同类型的监禁环境中。犯罪人的特征同样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危险性或者对假释的反应 (见第十二章)。第二, 满足改善**矫治决策** (treatment decision) 的需要。即将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划分在最适合于实现监督、训练或回归社会的日的的类型中。第三, 满足理论认识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的需要。例如, 建立有关特定类型犯罪或者犯罪人的原因理论。一种分类体系不可能同样完满地满足所有的目的, 而必须从特定的目的出发对分类体系进行判断。

尽管许多理论和研究继续使用简单的二分法, 例如, 区分少年犯罪人与守法少年、犯

罪人与守法者,但是,大多数调查者认识到需要降低犯罪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许多研究根据犯罪中存在的不明确的维度,例如,频率(累犯与一次性犯罪人)、严重性(无被害人犯罪与有被害人犯罪)、动机(获取性与攻击性),进行实用主义的类型划分。但是,除非与理论联系起来,否则,这样的分类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一种从法律的立场提出的观点认为,任何类型学都必须参照犯罪行为;一些分类也把重点放在犯罪行为上。夏肯(M. R. Chaiken)和夏肯(J. M. Chaiken)描述了一种实用的分类体系(1984)。在这种体系中,他们从8个维度对犯罪行为进行了分类,这8个维度是:伤害、抢劫、夜盗、贩毒、盗窃、汽车盗窃、诈骗、伪造或信用卡诈骗。当对每个维度进行“是、否”二分法选择时,256个可能的结构(configuration)中,只有10个可以解释59%的犯人。尽管可以用这种方法区分出同质的类型,但是,可能的类型的数量依赖于对维度与更小维度的数量的任意决定,法律对犯罪的描述不能恰当反应犯罪的行为特征或功能重要性。例如,对杀人、酒后驾车的研究表明,这些类型中的个人特征是不同的。

一些社会学分类根据与犯罪有关的社会模式(social pattern)对犯罪人进行分类。一些犯罪行为体系(criminal behavior systems)从犯罪行为与社会传统的相互作用方面,对犯罪行为进行了描述;这种分类将犯罪人与他们所认同的观念结合了起来。例如,根据经常进行盗窃活动、采用欺骗守法或扒窃手段、具有一定技能、在犯罪人中有较高地位、有支持犯罪活动的社会网络等特征,将职业性盗窃与“业余性”盗窃和其他犯罪行为(像白领犯罪)区分开来。一个相关的概念是**角色生涯**(role career),这个概念根据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环境、犯罪人的生涯、有关的自我态度和角色态度,识别犯罪**角色**(criminal role)。吉本斯(D. C. Gibbons, 1965)将少年犯罪人划分为9种角色生涯;将成年犯罪人划分为15种角色生涯,包括职业盗窃犯、开车兜风者(automobile joyrider)、精神病态伤害犯(psychopathic assaultist)、非暴力型性犯罪人。这些主张忽略了通常的分类原则或类型互相排斥的分类要求,试图将这样的分类应用于犯罪人,就会发现极少有犯罪人适合某种类型,这是不奇怪的。吉本斯(1988)现在相信,按照这种方式划分犯罪人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大多数违法者的显著特征是行为的多样化,而不是生涯的专门化。

尝试降低犯罪人的异质性的心理学方面的活动,一般都规避法律的规定。人们用并非犯罪人所独有的特征区分犯罪人类型,但是又认为这些特征在犯罪人中更为常见。一种特别的关注焦点是个人对特定管理或矫治方式的不同反应。一些犯罪学家对这样的分类表示怀疑,因为它们在表面上看来具有“临床”向,而且与精神病学分类相似。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矫治意味着帮助犯罪人,而不意味着根除疾病。用发展的、认知的或社会方面的特征区分心理学类型,并不意味着任何越轨行为与非越轨行为的没有连续性。

梅加吉(E. I. Megargee, 1977)提出,一种有用的犯罪人分类应当符合7项标准,即全面覆盖所有的犯罪人,每一种类型有明确的操作定义,可靠的编目方法,类型之间有恰当的区别,对变化的敏感性,矫治相关性,应用的经济性。自龙勃罗梭以来,人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分类,但是符合这些要求的分类寥寥无几。布伦南(T. Brennan, 1987a)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或者理论方面的体系,已经被证明是几乎没有用处的;晚近关注的是从定量方法或者经验性方法中产生的体系。尽管所有的分类都要依赖不很明确的理论假设,但是,目前人们感兴趣的体系可以分为两类:从明确的理论中区分类型的体系,从经验中获得类型的体系。

第四节 理论派生的分类

心理动力学家根据无意识动机和心理结构 (psychic organization) 中的缺陷区分犯罪人类型。马歇尔 (R. J. Marshall, 1983) 将以前的分类加以整合, 划分出 4 种主要的少年犯罪类型: 正常帮派少年犯罪人 (the normal gang delinquent), 神经症性少年犯罪人 (the neurotic delinquent), 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 (the psychopathic delinquent), 精神病性少年犯罪人 (the psychotic delinquent)。尽管前 3 种类型在犯罪人分类中比较普遍, 但是, 心理动力学的分类似乎具有趣闻轶事的色彩, 也得不到有关应用性调查的支持。

那些区分认知和人际发展的顺序阶段的理论, 对于识别少年犯罪人类型具有重要的价值。最突出的是科尔伯格 (L. Kohlberg) 的道德发展理论 (将在第五章讨论)。与分类有更加直接的关系的理论体系, 是由沃伦 (M. Q. Warren, 1971, 1983) 和帕尔默 (T. Palmer, 1974) 发展起来的人际成熟水平分类 (interpersonal maturity level classification), 由亨特 (D. E. Hunt) 和哈特 (R. H. Hardt) 描述的 (1965) 概念水平模式 (the conceptual level model)。

一、人际成熟水平

沙利文 (C. Sullivan)、格兰特 (J. D. Grant) 和格兰特 (M. Q. Grant) 受新精神分析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启发, 在 1956 年提出了一种阶段理论, 从个人与他人和社会机构的交往的增加, 并结合人们形成的有关社会、自我和他人的不同概念, 看待概念的发展。这个理论包括 7 个整合阶段 (I-levels), 简单地加以描述就是: 区分自我 (self) 与异物 (nonself) 的阶段 (I-1); 区分人与物体的阶段 (I-2); 区分简单社会规则的阶段 (I-3); 了解别人的期望的阶段 (I-4); 移情理解和区分角色的阶段 (I-5); 区分自我与社会角色的阶段 (I-6); 高级移情水平和理解自我与他人的整合过程的阶段 (I-7)。

在任何阶段或水平的固着, 决定着目标和期望之间的相对一致性, 也决定着生活中的“处世哲学”, 能够达到第 7 阶段 (I-7) 的人非常少。尽管在人际成熟水平与反社会行为之间没有因果联系, 但是, 人们认为发展水平高于第 4 阶段的人不大可能与社会冲突, 大多数少年犯罪人的发展水平处在第 2 阶段 (I-2)、第 3 阶段 (I-3) 或者第 4 阶段 (I-4)。但是, 沃伦在这些阶段内, 又根据人际反应模式的特征, 区分出 9 种少年犯罪亚类型。表 3.1 概述了这 3 种水平及其相关的反应模式。为了研究的目的, 可以把这 3 种水平的人简称为“消极遵从者” (passive conformist, Cfm)、“追求权力者” (the power oriented, Cfc 和 Mp)、“神经症者” (the neurotic, Na 和 Nx), 这 3 种水平的少年犯罪人分别占加利福尼亚州青年管理局社区矫正计划 (the California Youth Authority's Treatment Project) 中的少年犯罪人的 14%、21% 和 53%。哈里斯 (P. W. Harris, 1983) 的研究证实了少年犯罪与类型 (而不是发展水平) 之间的联系。哈里斯发现, 大多数青少年都可以归入不同人际成熟水平中, 只有 1/3 的青少年可以归入亚类型中, 这些青少年更容易发生适应不良现象。他也发现, 归入 Cfc、Mp 和 Nx 亚类型的青少年, 更有可能是官方少年犯罪人。另一方面, 戴维斯 (J. C. Davis) 和克罗普利 (A. J. Cropley) 发现 (1976), 一次性犯罪人的成熟水平高于累犯。

表 3.1 人际成熟水平体系, 表明整合水平的特征和 9 种亚类型(根据沃伦, 1983)

I-2 水平	<p>对自己的需要采取自我中心的态度; 把别人看成是“给予者”或“拒绝给予者”; 不能理解或预测别人的反应</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不合群—攻击型 (Aa)。当遇到挫折时, 主动提出要求和进行攻击行为。 2. 不合群—被动型 (Ap)。当遇到挫折时, 发牢骚, 鸣不平, 退缩不前。
I-3 水平	<p>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行为对别人的效果, 但是对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别理解不多; 认为环境是可以操纵的, 是用力量组织起来的; 缺乏内在价值观; 依赖外在的、黑白分明的规则。</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消极遵从型 (Ctm)。服从当时有力量的人。 4. 文化遵从型 (Cfc)。服从特定的由少年犯罪同龄朋友组成的参照群体。 5. 反社会操纵型 (Mp)。暗中损害权威人物以便为自己夺取权力。
I-4 水平	<p>用别人的期望看待自己; 重视地位和别人的尊重; 采取与别人一样的角色, 包括认同英雄人物; 将严格的标准内化, 但是这种标准会产生不适当感、自我批评和罪恶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 神经症—潜意识显露型 (Na)。为了避免意识到的焦虑和自我谴责而对潜在的罪恶感作出反应。 7. 神经症—焦虑型 (Nx)。用情绪障碍症状对不适当感和罪恶感引起的冲突作出反应。 8. 情境—情绪反应型 (Se)。通过潜意识显露行为对面临的家庭或个人危机作出反应。 9. 文化认同型 (Ci)。通过坚持少年犯罪的信念来对越轨的价值体系做出反应。

通过有一定结构的谈话确定个人所属的水平和亚类型。因为尽管水平 (level) 要高于类型 (type), 但是, 这个体系的信度是令人满意的。另一种方法使用了杰斯内斯调查表 (Jesness Inventory), 这是一个包括 155 道题目的问卷, 可以测量 10 种与评价少年犯罪有关的因素, 例如, 价值取向、不成熟、社会焦虑。根据这个量表, 识别人际成熟亚类型的分数, 可以和按照谈话程序挑选的标准组相对照。这个调查表的量度更经济, 也更可靠, 杰斯内斯 (C. F. Jesness) 和韦奇 (R. F. Wedge) 已经证实了这些量度的结构效度 (1984), 他们发现, 在具有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特征、态度和与少年犯罪有关的量度的亚类型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不过, 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谈话程序是否产生更加有效的辨别力。

人际成熟水平体系主要用于为开展因人施治而进行的分类。假设不同成熟水平的犯罪人由于不同的理由而犯罪, 那么, 就需要给予不同类型的干预, 以便降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尽管这种体系最初用于被军事法庭判刑的海军军人, 但是, 在 1961—1976 年间, 这种体系已经被广泛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州青年管理局所属的少年矫正所 (juvenile ward) 中, 特别是用于社区矫正计划中。这个体系的目标是, 确定是否可以通过最优化的措施, 即把不同人际成熟水平的人安置在不同的环境中、配备不同的矫治人员、采用不同的矫治措施, 从而达到降低累犯可能性的目的。例如, 把“神经症性”少年犯罪人放在社区中监督的效果很好, 而把“追求权力性”少年犯罪人首先安置在传统的矫正机构中效果可能更好。同样, I-2 型、I-3 中的 Cfc 亚类型对行为矫正法的反应要比对相互作用分析法的好, 而对 I-3 中的 Mp 亚类型的青少年来讲, 情况正好相反。

这些不同的结果支持这个系统的结构效度,这个系统目前在几个国家的刑罚机构中使用。不过,还必须对人际成熟水平理论进行仔细地研究。例如,人际成熟水平理论是否与发展的不同成分相一致,人际成熟水平理论是否反映了某一个维度或者不同维度内的变化。由于这种理论与其他认知发展理论相类似,它的优点不是很清楚。奥斯丁(R. Austin, 1975)在对这个理论进行的几项检验中发现,尽管人际成熟水平理论以社会成熟为核心,但是,它的量度与智力和道德态度的关系更密切。他对这种分类程序的效度提出怀疑。对亚类型的区分,似乎是未经检验的假设;它们是否与所说的水平相联系、是否互相交叉,都没有得到解释。尽管这个系统是一种复杂的区分少年犯罪人及其需要的方法,但是,同样有用的区分可以通过更基本的认知和人格维度来实现。例如,已经一致地发现,在人际成熟水平与一般智力之间有大体0.3的相关性。史密斯(D. E. Smith, 1974)发现,可以用艾森克的人格维度有效地区分出杰斯内斯的类型,使用艾森克的冲动性、精神质(psychoticism)和神经质(neuroticism)量表可以更加有效地区分出杰斯内斯的类型。

二、概念水平匹配

概念水平模式起源于哈维(O. J. Harvey)、亨特(D. E. Hunt)和施罗德(H. M. Schroeder)的概念体系理论(conceptual systems theory, 1961)。这个理论和人际成熟水平理论具有一些类似的理论来源,它也假设,社会化过程经历不同的阶段;人际定向(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方面地认知在这些阶段逐渐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理论提出了4种水平:(1)自我中心(egocentric),特征是具体思维,“客体我”定向(“me” oriented);(2)规范定向(norm-oriented),特征是缺乏批判性,接受—探索(acceptance-seeking);(3)独立(independent),特征是探求,过分自信,“主体我”定向(“I” oriented);(4)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特征是认知的复杂性,“我们”定向。尽管有证据证实在少年犯罪人中存在着无组织的、原始的概念水平(sub-1),但是,这一体系较少用来解释原因,而是较多地用于因人施治。

这种模式认为,当个人的概念水平与环境特征相适应时,个人的功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概念水平与环境结构(例如,规则、控制、支持、谈判)的程度之间存在反比关系。概念水平较低的个人,其功能在有高度结构和较小模糊性的环境中发挥得更好;概念水平较高的个人,其功能在有低度结构并具有变通性的环境中发挥得更好。个人与环境不匹配,会导致紧张和混乱,环境计划是实现“同时匹配”(contemporaneous matching)所必需的,同时匹配会产生稳定性或者“发展匹配”(developmental matching),而它又会促进变化。

这个体系已经在教育领域和临床领域中得到了发展,但是,赖茨马—斯特里特(M. Reitsma-Street)和莱希德(A. W. Leschied)描述了近来将这一体系应用于矫正计划的构想(1988)。通过一种简单的、准投射性的程序,对个人的概念水平进行评价;重建居住环境或训练环境中的日常生活、期望、活动与社会气氛,使它们与不同水平的犯罪人群体相匹配。尽管对概念水平与犯罪人相匹配的效果缺乏长期的调查,但是,它对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建议,提供了一种富于创新精神的犯罪人矫正观念。

第五节 经验性分类

经验性方法使用那些通过对行为项目(item)的因素分析识别出来的维度评价个人,或者通过对个人(individual)的聚类分析描述的类型评价项目或维度评价个人。不过,休伊特(L. Hewitt)和詹金斯(R. L. Jenkins)的一项早期的研究(1946),聚集了根据对一个儿童指导诊所中500名“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ren)的个案描述获得的项目。他们区分出了4类儿童,并把他们分别称为“未社会化的攻击性行为”(unsocialized aggressive behaviour, UA)、“社会化的少年犯罪”(socialised delinquency, SD)、“过度压抑型”(overinhibited, OI)和“身体缺陷型”(physical deficiency)。与“社会化的少年犯罪”型儿童相比,“未社会化的攻击性行为”型儿童攻击性和破坏性更大,缺乏对群体的忠诚;这类儿童以后容易形成精神病态人格。希诺哈拉(M. Shinohara)和詹金斯(1967)支持这种分类的效度,发现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中,“未社会化的攻击性行为”型儿童比“社会化的少年犯罪”型儿童更有可能把自己描绘成心理学上的越轨者。一项为期1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社会化的少年犯罪”型少年犯罪人不大可能违反假释规则,也不大可能变成成年犯罪人。不过,由于这种分类是从个案历史资料中产生的,由于它的统计方法粗糙,也由于在最初的研究中只有少数儿童可以明确地归入互不重叠的类型中,所以,这种分类的用途是有限的。在把这个分类应用于英国少年犯罪教养院(approved school)的少年中时,费尔德(E. Field, 1967)同样发现,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归入某一单独的类型中²。

一、奎伊的行为分类维度

更系统的分类是奎伊(H. C. Quay, 1877a, 1987a)的分类。奎伊从少年犯罪人以及临床患者、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中获得自我报告、个案史、行为评定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因素分析,区分越轨行为的维度。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但是,奎伊区分出的4种主要类型来源于有关儿童行为障碍研究的其他研究。这4种类型目前被称之为:未社会化的攻击型(unsocialised aggression, UA);焦虑—退缩—烦躁型(anxiety-withdrawal-dysphoria, AW);注意缺陷型(attention deficit, AD);社会化的攻击型(socialised aggression, SA)。

前两种类型在所有的测量工具中似乎都是一致的,并且都对“外化”和“内化”因素的反应中得了高分。这两种因素是测定儿童问题时普遍存在的因素。这两种类型也有成年人对照组。未社会化的攻击型(UA)在不同的场合被描述为行为障碍、病态人格、攻击性或者无法控制,其明确的特征包括攻击性、不服从、破坏性、不可信任、狂暴。焦虑—退缩—烦躁型(AW)被描述成人格问题、退缩、神经质或者控制过度,其明确的特征包括过分敏感、羞怯、不喜欢社交、忧郁。其余的两种类型在区分中缺乏一致性。社会化的攻击型(SA)即社会化的少年犯罪、亚文化,主要出现在个案史资料中,反映了团伙性少年犯罪的情况。这类少年犯罪人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包括结交坏朋友、参加结伙偷窃、忠实于少年犯罪朋

2. 本书对休伊特和詹金斯分类的描述过于简单,而且具体内容与其他文献有所不同。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可以参见吴宗宪的《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6~480页。

友、逃学、夜不归宿。注意缺陷型(AD)以前被描述成“不成熟—能力不足型”(immaturity-inadequacy), 这种类型在观察者的评定中十分突出。这种类型的特征是先占状态³、注意不稳定、做白日梦、行动迟缓、冲动性, 它与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 DSM-III)中的注意缺陷活动过度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相类似。

根据少年犯罪人在特定维度上的最高得分, 将他们归入某一类型之中。各个因素是根据从不同测量工具中获得的综合分数来测定的, 但是, 在更多情况下是根据《行为问题清单》(the Behavior Problem Checklist)中的评定分数测定的。未社会化的攻击型(UA)和焦虑—退缩—烦躁型(AW)的信度令人满意, 其余两种类型的信度稍差。在不同的研究中积累的有关效度的证据表明, 不同类型的人对实验室试验和刑事司法干预的反应有所不同。

奎伊(1984)描述了将这种体系扩大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情况。成年人内部管理系统(the Adult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AIMS)识别出5种因素, 分别称之为: 攻击—精神病态型(aggressive-psychopathic), 操纵型(manipulative), 情境型(situational), 能力不足—依赖型(inadequate-dependent), 神经症—焦虑型(neurotic-anxious)。这5种类型都可以用评定量表和个案史清单来测定。目前, 这个分类在几座美国监狱中被用于促进“内部管理”, 其目的是将犯人划分为更具有同质性、更容易管理的小群体。这一体系的使用, 已经成功地根据犯人对矫正制度的反应对犯人进行了分类, 并且减少了严重的矫正机构事故。

奎伊的研究证实了这样的观点, 即对不加选择的少年犯罪人几乎没有效用的理论或干预措施, 仍然可以适用于同质小群体。不过, 这种分类是有局限性的。第一, 不同评价工具中的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 充其量属于中等。用综合性的、多工具的测量解决这个问题尝试并不成功, 因为它们混淆了人格特质(指未社会化的攻击型、焦虑—退缩—烦躁型)与心理障碍症状(指注意缺陷型)⁴、社会越轨行为(指社会化的攻击型)。第二, 这些因素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例如, 奎伊报告说(1984), 成人内部管理系统的攻击性—病态人格量表与操纵性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8; 能力不足—依赖量表与神经症—焦虑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8。这些相关情况表明, 对几种因素的区分是成功的。第三, 这个系统模糊了维度与个人之间的界限。根据最高的因素得分对个人进行分类, 但是由于根据所有因素对个人评分, 因此, 这种程序导致了人为的分类, 人为的分类只是大致相当于自然产生的分类。所以, 可以通过对因素得分的多维度模式的识别, 对这个体系进行界定。

二、梅加吉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基础的分类

通常使用聚类分析识别多维度剖面图类型, 一些调查者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区分特定犯罪类型中的同质人格亚类型。不过, 最广泛地应用于未经选择的犯罪人的类型论, 是以明

3. 先占状态(preoccupation)是指沉溺于自己的某种观念之中, 影响了对周围事物的接触和理解的现象。
——译注

4. 心理障碍的英文是mental disorder。这个术语在心理学中通常被翻译为“心理障碍”, 而在精神病学中, 通常被翻译为“精神障碍”。——译注

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基础的犯罪人分类体系 (the MMPI-based crimi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这是由梅加吉 (E. I. Megargee) 根据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 (Tallahassee) 的联邦矫正所中服刑的青年男性犯人的研究发展起来的。对标准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剖面图样本的层次聚类分析, 区分出了10种类型, 大部分类型在其他样本, 包括女性犯罪人和精神障碍犯罪人中都有发现, 但是, 这种分类对少年的适用性尚不清楚。

梅加吉和博恩 (M. J. Bohn) (1979) 将这种体系应用于这个联邦矫正所所有的1214名犯人, 发现将计算机化的分类原则和对剖面图的检查相结合, 就可以对96%的剖面图进行分类。根据字母顺序排列这些类型, 并用与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发展、家庭、犯罪、在矫正机构内的行为以及心理学访谈和测验资料有关的116个因素, 对这些类型进行比较。结果在97%的比较项目中, 发现10种类型之间有显著差异, 这个结果支持同时效度和预测效度; 在这些类型中, 有7种类型的比较明显的特征, 已经被其他调查者所证实。表3.2显示了10种类型的显著特征和归入每种类型的联邦矫正所犯人的百分比。这些类型是按照越轨行为逐渐加重的顺序排列的, 正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剖面图所界定的那样。

扎戈 (L. D. Zager, 1988) 总结了对这种体系所做的研究, 指出这种体系可以在不同矫正机构的犯人中发现, 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不同矫正机构的犯人, 可以预测在矫正机构中的适应情况, 也可以预测释放后的适应情况。尽管在它对变化的敏感性和它在预测对干预措施的反应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 但是, 人们认为这个体系很有希望在一些联邦矫正机构中得到采用。

不过, 关于这个体系的效用, 仍然有一些局限性。第一, 这个体系是从标准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剖面图中获得的, 尽管这个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测量了很多有适应问题的样本,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也继续在美国临床医生中普遍使用, 但是, 这个体系在心理测量学上是有瑕疵的。临床量表有高度的相互关联性, 因素分析表明, 它们测不出比众所周知的神经质和内倾—外倾维度更多的内容。因此, 剖面图类型之间的差别, 部分地反映了程度而不是类型之间的差别。第二, 相关的问题是, 区分出10种剖面图类型是否有根据。有几个剖面图是相互重叠的, 少数剖面图可能有同样的区分能力。尽管梅加吉和博恩 (1979) 认为, 可以用未检验的因素充分地区分出这10种类型, 证实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 它们没有提供一种先验的标准, 以便确定这种分类体系是否是最佳的, 是否可以不用聚类分析方法中的程序原则。第三, 是否可以交叉使用其他的聚类分析方法复制这些类型, 这是聚类分析程序中的一个确定模糊性的必要步骤。第四, 在发展这种类型论的过程中采用的归纳方法是非理论性的。在这种意义上, 对标准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的依赖, 意味着一种严重的缺陷, 因为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并没有适当地反映任何严密的人格理论。

三、对不同体系的比较

某一范围内的事物可以按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 某种分类的效用依赖于它的目的。上述各种分类的产生目的是不同的, 有的是为了研究而发展起来的, 有的是为了管理而发展起来的, 还有的是为了矫治而发展起来的, 而且, 这些分类在理论基础、主要的心理学特征、评价方法、产生过程中调查的犯罪人等方面, 都是不同的。所以, 不能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比较和相互交换的。同时, 它们并不相互排斥, 而是有一定的相互重叠。

沃伦 (M. Q. Warren, 1971) 试图了解文献中报道的16种分类体系之间的幅合度, 发

表 3.2 梅加吉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基础的分类体系*

类型、犯人百分比, MMPI 量表模式	突出特征和管理需要
条款型 (Item, 19%) 没有一个量表得分高	稳定, 适应良好; 大多数是社会化的; 是毒品和酒精违法者; 属于中产阶级; 容易管理; 没有矫治需要
安逸型 (Easy, 7%) 正常, 但是在第 4 和第 3 量表得分高	适应非常好; 聪明, 但是取得的成就不大; 有舒适的家庭环 境; 较少越轨或暴力行为; 需要激发他们发挥潜能
贝克型 (Baker, 4%) 第 4、第 2 量表得分高	适应差; 焦虑; 消极被动; 退缩; 有酗酒问题; 在监狱中惹 事生非; 需要给予心理治疗或咨询
艾布尔型 (Able, 17%) 第 4、第 9 量表得分高	支配欲, 敌意, 见机行事; 不道德; 接受自己; 有社交技能; 高度的累犯倾向; 需要给予结构性的、面对面的治疗
乔治型 (George, 7%) 第 4、第 2 量表得分高	没有攻击性; 进行毒品和酒精犯罪; 聪明; 有不良家庭; 接 受犯罪的价值观; 高度的累犯倾向; 没有明显的缺陷, 但 是需要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德尔塔型 (Delta, 10%) 第 4 量表得分高	享乐倾向; 自我中心; 聪明; 家庭关系差; 监狱适应不良; 高 度的累犯倾向; 不愿意配合心理矫治
朱庇特型 (Jupiter, 3%) 第 9、8、7 量表得分高	大部分是黑人; 焦虑; 人际适应不良; 家庭不稳定; 在监狱 中有暴力行为, 但只有中等程度的累犯倾向; 需要严格管理
福克斯特罗特型 (Foxtrot, 8%) 第 9、4、8 量表得分高	支配欲; 暴力倾向; 社会化不够; 文化水平低; 具有混乱的、 贫困的背景; 有多种犯罪纪录; 高度的累犯倾向; 需要严 格管理
查理型 (Charlie, 9%) 第 8、6、9、4、7 量表得分高	敌意; 退缩; 缺乏同情心; 攻击性; 有多种犯罪纪录; 有学 习和职业技能缺陷; 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预后较差**
豪型 (How, 13%) 大部分量表的得分度高	智力低, 成就差; 焦虑; 消极被动; 退缩; 攻击性; 早年有 少年犯罪和人际问题; 有累犯倾向; 有心理障碍

* 关于梅加吉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基础的分类体系的更详细的描述, 可以参看吴宗宪的《西方犯罪学史》,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 864-865 页。

** 预后 (prognosis) 是医学术语, 对疾病变化和痊愈情况的预测。——译注

现下列 6 种类型在不同分类体系中的概念是相类似的:

1. 不合群型 (asocial)。包括人际成熟水平中的 I-2; 詹金斯和奎伊分类中的未社会化的攻击型 (UA); 概念水平匹配分类中的原始的概念水平 (sub-1);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一版, DSM-I) 中的被动—攻击型和攻击型。
2. 遵从型 (conformist)。包括人际成熟水平中 I-3 内的消极遵从型 (Cfm) 和文化遵从型 (Cfc); 詹金斯分类中的社会化的少年犯罪型 (SD); 奎伊分类中的不成熟—能力不足型和社会化的少年犯罪型; 概念水平匹配分类中的水平 1 (level-1, 即自我中心水平)。
3. 反社会操纵型 (antisocial manipulator)。包括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中 I-3 内的反社会操纵型 (Mp);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一版, DSM-I) 中的反社会人格。

4. 神经症型 (neurotic)。包括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中 I-4 内的神经症、潜意识显露型 (Na) 和神经症、焦虑型 (Nx); 詹金斯分类中的过度压抑型 (OI); 奎伊分类中的焦虑—退缩—烦躁型 (AW); 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一版, DSM-I) 中的社会病态人格; 概念水平匹配分类中的水平 2 (level-2, 即规范定向水平)。
5. 亚文化认同型 (subcultural identifier)。包括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中 I-4 内的文化认同型 (C1); 詹金斯和奎伊分类中的社会化的少年犯罪型; 概念水平匹配分类中的水平 2 (level-2, 即规范定向水平)。
6. 情境型 (situational)。包括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中 I-4 内的情境—情绪反应型 (Se); 概念水平匹配分类中的水平 2 (level-2, 即规范定向水平)。

有关这些分类的效度或者这些分类之间重叠程度的数据很少。杰斯内斯 (C. F. Jesness) 和韦奇 (R. F. Wedge) 发现 (1984), 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与其他有关认知发展水平的分类体系有显著相关, 包括与亨特 (D. E. Hunt) 的概念水平匹配分类之间有 0.45 的相关。杰科维克 (G. J. Jurkovic) 和普伦蒂斯 (N. M. Prentice) 也发现 (1977), 奎伊的分类与科尔伯格 (L. Kohlberg) 的道德发展理论有一定的相关性, 精神病态型少年犯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低于对照组, 也低于社会化的攻击型 (SA) 或焦虑—退缩—烦躁型 (AW) 少年犯罪人。卡邦尼 (J. L. Carbonell, 1983) 尝试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和詹金斯的人际成熟水平分类相互交叉应用于成年犯罪人, 尽管这两种分类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 但是, 这种联系主要是由于人际成熟水平中的 I-2 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分类中的大多数越轨者的重叠引起的。她认为, 总的来看, 这些分类体系之间机会没有重叠。

迄今为止报告的唯一一种多元交叉分类 (multiple cross-classification), 是由范胡赫斯 (P. Van Hoorhis, 1988) 在成年罪犯中使用 5 种分类体系 (人际成熟水平分类、梅加吉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为基础的分类、奎伊的分类、亨特的概念水平匹配分类、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分类) 的尝试。结果发现, 这些分类体系之间的幅合度在中等以下。例如, 3 种发展阶段分类体系之间有正相关; 最高的相关在人际成熟水平分类和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分类之间, 相关系数是 0.3。奎伊的成年人内部管理系统 (AIMS) 中的攻击—精神病态型与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中的 I-3 水平、梅加吉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分类中的查理型和福克斯特罗特型也有相关性。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分类和成年人内部管理系统都可以预测违反监规纪律行为, 而受害的犯人更有可能处在概念水平匹配体系中最底的水平和人际成熟水平分类中的低水平上。在不同分类体系中的“神经症型”或“情境型”之间, 几乎没有发现存在对应性。由于范胡赫斯使用的样本仅仅是 52 人, 因此, 这些结果都是暂时性的, 但是, 这些结果突出地显示了犯人的同质性。

第六节 精神病学分类和反社会行为

对犯罪人的心理学分类已经脱离精神病学分类而得到独立的发展, 心理学分类更加关注力量的模式 (pattern of strength) 和缺陷的模式 (pattern of deficit), 而不注意识别精神障碍。但是, 犯罪人和临床病人之间应该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犯罪与主要的精神障碍之间的联系, 将在第十章中讨论, 不过, 由于反社会行为 (antisocial behaviour) 在几种精神病学分类中都涉及到, 因此, 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些论述。这里集中围绕美国精神病

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 DSM-III-R, 1987)进行讨论,因为这个版本比以前的版本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承认。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试图通过用操作性标准界定不同类型的方式,改善精神病诊断的可靠性。一种精神障碍的概念如下:

……临床上重要的行为或者心理综合征或者模式,出现在个人身上,并且与目前的忧伤(一种痛苦的症状)或者能力丧失(一种或者更多的功能区域损伤)或者日益加重的死亡、痛苦、能力丧失、严重失去自由的危险有关。

越轨行为或者与社会的冲突并不是个人功能失调的症状,因而明确地排除在分类之外。分类是从多个轴线进行的,因为临床医生希望能够从精神障碍(轴线I和轴线II)、躯体障碍(轴线III)、心理社会应激源的严重性(轴线IV)和综合功能水平(轴线V)方面评价和解释遇到的问题。轴线I(axis I)包括主要的临床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等);轴线II包括发展障碍和人格障碍。轴线I和轴线II之间的区别,含蓄地承认“疾病”(illness)和“人格”(personality)这两个概念是有分别的,也承认这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经常共存的。

一、轴线I

轴线I包括精神药物使用障碍(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disorders)和性障碍(sexual disorders)。精神药物使用障碍与犯罪行为有关联,而一些性障碍与性犯罪有关联(参见第十一章)。轴线I也包括冲动控制障碍(impulse control disorders),这是一种剩余的分类,当某种行为不能清楚地归入某类心理障碍时,就划入这种类型。冲动控制障碍的基本特征是:(1)不能控制某些冲动、驱力或者诱惑,使其导致伤害本人或他人的行为;(2)在行为之前有不断增加的紧张或者唤醒;(3)在进行某种行为时体验到快感、满足感或轻松感。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 DSM-III-R)列举了5种具体的类型(见表3.3)。间歇性爆发障碍(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以前被称为“爆发型人格障碍”(explo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它与“发作性控制不良综合征”(episodic dyscontrol syndrome)相类似(参见第6章)。其他障碍属于已经废弃不用的一种类型——“单狂”的剩余部分,⁵这种类型认为反复进行的越轨行为有一种病理性的“固着观念”(fixed idea),这种类型不仅包括间发性酒狂(dipsomania)和女色情狂(nymphomania),而且也包括漫游狂(drapetomania)。它们都是假设原因(hypothetical causes),而不是描述,反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在实现理论中立的描述这种积极目标方面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区分冲动控制障碍与“真正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因为在冲动控制障碍中,个人从行为中获得快感。这有点武断,因为从紧张中“放松”(release)是冲动控制障碍和强迫行为的定义中都有的特征,而且在传统上,“病理性”赌博、偷窃或纵火都被看成是强迫行为。在一些刑事司法管辖区,强迫行为被当做“不可抗拒的冲动”(irresistible impulsive),可以据此进行精神病辩护(见第十

5. 单狂(monomanias)是19世纪前期提出的一种精神疾病名称,后来被“偏执狂”(paranoia)一词所取代。——译注

表 3.3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冲动控制障碍的具体类型^{*}

1. 间歇性爆发障碍	间歇性地发生不可控制的暴力冲动,导致严重的毁物伤人行为;与应激源不相称;在两次发作之间没有一般化的攻击性;不是由中毒、精神病、器质性障碍或其他人格障碍所引起的
2. 偷窃狂	经常不能抗拒偷窃既无个人用途又无金钱价值,因而并不需要的物品的冲动;偷窃之前感到紧张,偷窃之后感到轻松;不是由愤怒、报复、行为障碍或反社会人格障碍所引起的
3. 病理性赌博	沉溺于赌博;在赌博过程中不断加大赌注;不赌博就感到激怒;“追逐”损失;不尽义务,作其他行为的牺牲品;不顾法律或社会后果而持续赌博
4. 纵火狂	偶尔进行故意的纵火行为;纵火前感到紧张,纵火期间感到满足或放松;对火焰及相关特征充满好奇心或者被它们所吸引;纵火行为背后没有获益、愤怒或者掩盖犯罪的动机
5. 拔发狂	不能抗拒拔自己毛发的冲动;拔毛发之前感到紧张,拔毛发期间感到满足

*. 本表中的若干术语有不同的译名,例如,偷窃狂(kleptomania)又译为“偷窃癖”,纵火狂(pyromania)又译为“纵火癖”,拔发狂(trichotillomania)又译为“拔毛发癖”。——译注

章);对“强迫性犯罪”(compulsive crime)的犯罪性质也有争论。

从一些概念来看,冲动控制障碍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效度是成问题的。“冲动”被认为是一种循环推论,是根据它所引起的行为而推论出的原因;“不可抗拒的冲动”同样是从人们对已经发生的行为的观察中推论出来的。而且,可以通过排除那些具有直接的“明显”动机的行为来识别它们。因此,当纵火行为中没有获取物质利益、愤怒、思想意识、掩盖犯罪的动机,也没有受妄想或幻觉的影响时,纵火行为就变成了纵火狂。不过,这降低了对“无理性的”或者“无法凭知觉可以理解的”(这两种情况的)社会判断标准。正如克雷西(D. R. Cressey, 1969)所注意到的,事实上,当行为人和观察者都不能用通行的、流行的或者相互认可的动机解释行为时,就会贴上“强迫行为”的标签。例如,当显然无法用经济需要解释富有的商店行窃者为什么偷窃价值很小的物品时,就很可能认为这种行为有“病态”需要。不过,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不很确定的假设,即对一般的商店行窃可以用经济需要进行适当的解释。

像偷窃狂这样的概念意味着,行为有内在的动机,或者说行为受自身动机的强化。但是,如果可以证实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es),那么,这个概念就变得多余起来。伯特(C. Burt, 1925)发现,偷窃狂和纵火狂都是虚假的科学术语,对反复进行的少年犯罪行为的仔细分析一般都会表明,它们是与“心理冲突”(mental conflict)有关的替代性活动或者象征性活动。晚近的研究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吉本斯(T. C. N. Gibbens, 1981)发现,一部分重要的但是数量较少的商店行窃者是情绪抑郁的,这种轻微偷窃似乎具有提供“治疗”、表达恶意、惩罚自己或别人的功能。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也认为(1984),这些假定存在的障碍,可以用社会学习方面的术语来理解。他们把偷窃狂和纵火狂看成是证实有缺陷的社会技能的不适当形式。杰克逊(H. F. Jackson)、格拉斯(C. Glass)和霍普(S. Hope)对纵火累犯进行了类似的分析(1987),

认为纵火是自尊差、缺乏自信的人摆脱环境控制的一种习得方式。其他的理论分析同样是似是而非的,但是,如果不使用假想的“狂”这样的术语⁶,也可以清楚地解释强迫性伤害行为(compulsive harmful behaviour)。

对冲动控制障碍的分类并不能识别那些具有可以辨别的特征的心理障碍。当人们不能为自己的那些反复进行的越轨行为找到“可以接受的”、“合理的”原因时,就提出这些虚构的类型进行解释。重复进行的攻击行为、商店行窃、纵火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往往都是与个人不能完全理解的那些个人危机、冲突或功能失调有关的。尽管可以根据动机(或者强化物)的类型,对重复进行的越轨行为进行更细的分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之间的任意区别的分类,是没有什么科学效用的。

二、轴线 II: 发展性障碍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DSM-III-R)根据“在婴儿期、童年期或者青春期第一次出现的障碍”这样的标准,区分出了几种具体的发展性障碍,例如,智力落后(mental retardation)、弥漫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即孤独症[autism])、特殊发展障碍(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s,学习、语言、言语、运动技能的不适当发展)、儿童和青少年焦虑障碍。与反社会行为联系比较密切的是破坏性行为障碍(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它是指在男孩中多发的“外显性”症状模式,在学龄前儿童中常见,其具体类型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包括不注意、冲动性和活动过度方面的发展不适当,表现为经常烦躁不安、注意涣散(distractibility)、讲话太多、很难保持注意、静坐困难。在早期的文献中,这种综合征状被描述为**多动症**(hyperactivity),强调运动不安,并且与一个原因方面的概念——**轻微脑功能失调**(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MBD)交替使用。目前,轻微脑功能失调这个概念更多地反映了注意方面的内容。不过,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轻微脑功能失调这些概念的效度,仍然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儿童的注意和运动问题是“亚临床”(subclinical)脑损伤的症状,这种观点受到越来越多地怀疑。不同国家在诊断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对这些术语的不同看法:在北美,大约有1/2的儿童精神病患者被诊断为多动症,而在英国,智力正常的儿童中只有1%的人被诊断为多动症。

品行障碍是指持久存在的反社会行为,其特征是侵犯别人权利,违反与年龄相适应的社会规范,通常在青春期前期开始。典型的品行障碍包括偷窃、离家出走、说谎、纵火、逃学、非法侵入(breaking and entering)、破坏财物、残忍对待动物、暴力性行为、打架斗殴。品行障碍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群体性品行障碍、单独性品行障碍、未特定品行障碍。

对立违抗性障碍较少涉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这类品行障碍主要发生在家庭中,主要特征是否定性、敌对性、违抗性的行为,例如,发脾气(loss of temper)、违抗成人要求、容易恼怒、赌咒发誓。

6. 这里的“狂”的英文是manias,这个词单独使用时,是指“躁狂症”;在作为词尾使用时,是指“狂”、“癖”。从上下文来看,这里似乎是指后一种意思。——译注

应该注意的是,青少年中的品行障碍就相当于少年犯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品行障碍的类型与奎伊的注意缺陷、未社会化的攻击型之间,分别存在对应关系,当然,品行障碍也可以包括社会化的攻击型。不过,对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DSM-III-R)中分类的独立性,仍然是有争议的,把对立违抗性障碍当做一种独立的障碍类型,缺乏经验的或理论的基础。多动症一直与儿童行为问题有联系,例如,攻击行为、偷窃行为,但是,这种联系的性质一直是不清楚的,早期著作中论述的诊断标准就包含了这样的问题。因素分析研究已经显示,多动症、品行障碍或攻击行为是有不同相关性的独立因素,也可以用不注意(inattentiveness)区分多动症。然而,对这些因素的评定通常有很高的相关性;对多动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的诊断有很大的重叠性。多动症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将在第六章中论述。

三、轴线 II: 人格障碍⁷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是指由于个人倾向(personal disposition)而不是由于心理功能崩溃或中断引起的心理问题。司法精神病学领域接触的对象中,很多人有这些障碍。调查表明,人格障碍在监狱罪犯中普遍存在(见第十章)。确凿的数据较少,因为对人格障碍类型的划分,尤其受到一个更综合性的概念——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的影响。对这些人格障碍的兴趣,也受到有关特质(trait)概念的效用的争论的限制;在精神病学界,存在着是否应当把它们看作心理障碍的争论。

轴线 II 中包括的人格障碍,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人格障碍类型的兴趣。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强调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把人格特质定义为“理解、适应、思考环境和自我的持久模式”。当特质“失去灵活性和适应性”并且导致社会性功能失调或内心苦闷时,特质就构成了人格障碍。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DSM-III-R)中已经区分出 11 种人格障碍类型,但是将施虐型人格障碍(sad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和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self-defeating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两种暂时性的类型作为附录加以论述。表 3.4 论述了 13 种人格障碍类型的典型特征和界定标准。

分类是多型的,对类型的划分需要提出一些定义标准。应当注意的是,犯罪行为似乎符合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PD)的标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与早期的病态人格概念有一些密切的关系。黑尔(R. D. Hare, 1983)发现,在两个加拿大监狱中,39%的犯人符合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标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吸毒者、精神障碍犯罪人中也很普遍。不过,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例如,边缘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在进行反社会行为的人中也很普遍。

尽管给每种人格障碍类型提出了操作性定义,但是,对人格障碍的临床判断的可靠性仍然是很低的。例如,梅勒索普(G. Mellsoy)等人发现(1982),平均判断间信度(mean

7. 在精神病学文献中,“人格障碍”、“病态人格”、“变态人格”、“精神病态”等术语,表达了大致相同的含义,对不同术语的使用更重要的似乎反映了使用者的个人偏好,而不一定在内容上有实质性的差别。从目前的精神病学文献来看,人们逐渐倾向于更多地使用“人格障碍”这个术语,1984 年的《中华医学会精神疾病分类》就采用了这个术语。——译注

表 3.4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人格障碍类型的特征

类型	普遍倾向和典型特征
偏执型 (paranoid)	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卑鄙的或者威胁性的(期望进行剥削、怀疑别人的诚实、心怀嫉妒怨恨)
分裂型 (schizoid)	对社会关系不重视、缺乏情绪体验、不能表达情绪(孤独、冷漠、对批评或赞扬无动于衷、严重缺乏情绪体验)
分裂型 (schizotypal)	存在人际关系缺陷、思维、外表和行为有怪癖(社会性焦虑、没有密友、思维怪异、知觉异常、言语奇怪)
反社会型 (antisocial)	15岁以前有品行障碍、自15岁起表现出不负责任的、反社会的行为(工作纪录差、进行非法行为、打架斗殴、借债不还、冲动性、鲁莽、做父母不负责任、缺乏一致的依恋、做事不后悔)
边缘型 (borderline)	心境、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象不稳定(人际关系紧张、心境不稳定、强烈的愤怒、认同障碍、冲动性、自残、失去恐惧感)
表演型 (histrionic)	夸张的情绪表达、过分寻求注意(寻求注意和赞赏、自我中心、不适当地吸引别人、夸张的和浅薄的情绪表达)
自恋型 (narcissistic)	夸大幻想或行为、缺乏同情心、对评价过分敏感(利用别人、妄自尊大、感觉应当受到赞美、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对批评心烦意乱)
回避型 (avoidant)	社会不适感、害怕消极的评价、怯懦(容易被批评伤害、害怕陷入窘境、回避交往、在社交场合沉默寡言、夸大危险)
依赖型 (dependent)	依赖和顺从(需要得到再保证、依赖别人作决定、害怕被抛弃和受批评、缺乏首创精神)
强迫型 (obsessive compulsive)	追求完美和缺乏变通(树立严格的标准、过分重视细节、犹豫不决、坚持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情)
被动攻击型 (passive aggressive)	对别人提出的关于适当的社会和职业表现的要求消极抵抗(做事拖拉、闷闷不乐、怨恨别人的建议、回避义务、有意妨碍、工作缓慢而不情愿)
施虐型 (sadistic)	残酷、贬低和攻击性(威胁别人、侮辱别人、对别人的痛苦感到兴奋、迷恋武器和暴力)
自我挫败型 (self-defeating)	回避快乐的经历或者追求会产生痛苦的关系(刺激别人抛弃自己、自我牺牲)

interjudge liability, kappa) 仅仅为0.41, 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判断一致率最高。临床医生之间判断一致率的这种低水平、严重限制了对这种分类的使用。这种现象反映了许多标准具有推论性质, 也反映出临床医生仅仅根据有限的观察作出是否具有某些特质的判断时存在的问题。然而, 通过发展问卷、评定量表和有计划访谈的方式, 可以提高判断的可靠性。

对人格障碍分类的信度, 还没有进行大量的探讨。尽管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 是根据米隆 (T. Millon, 1981) 提出的理论分类和晚近以来对变

态人格的精神动力学论述起草的,但是,目前的分类在一些方面偏离了这些论述,没有反映一种一致的人格模式。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承认类型之间的交叉重叠;建议在某个人符合一个以上的人格障碍类型时,进行多元诊断。然而,为了提高这种分类的效度,应当增强类型内部的一致性和类型之间的区别性。有关特定人格障碍类型的效度的证据是有限的,总体上来看也是很弱的。尽管莫里(L. C. Morey, 1988)发现,集中到不同类型中的标准与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中提出的那些标准有着广泛的相似性,但是,目前确定的这些类型似乎不可能代表对稳定的适应不良素质的最佳分类。

四、对人格障碍的维度分类

尽管人格障碍的概念假定与正常人格之间存在数量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区别,但是,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中使用的分类不合逻辑地暗示,人格障碍之间、人格障碍与正常人格之间存在着中断(discontinuity)。一些人尝试用维度的术语描述这些人格障碍。例如,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把这些人格障碍看成是缺乏技巧的行为(1984),他们提出,可以把标准区分成不同的行为维度,用不同的行为维度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社会性功能失调(social dysfunction),例如,不适当的自信,失调的社会认知,社会焦虑。

人格障碍主要是对人际行为(interpersonal behaviour)规范的违反。为了描述人际行为而用经验性方法建立的维度体系,就是在利里(T. Leary, 1957)的著作中最早产生,后来由其他一些作者加以发展的人际圈(interpersonal circle)。人际行为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一个环形图(circumplex)来代表,这个环形图由权力或控制(支配—顺从)与联系(敌意—友好)两个直角维度以及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不同相互作用构成。也可以根据这个体系把人际模式(interpersonal style)看成是围绕支配和敌意两个轴线形成的圆圈的组成部分,这些人际模式在人格障碍类型中有清晰的对应模式。不过,由于这些组成部分没有精确的边界,有关不同人格障碍类型的观念,会完全变成一个实用的虚构物。这样一种体系可以更加现实地描述正常人格和变态人格之间的连续性。

图3.1简要显示了人格障碍类型与这种模式的联系。由人际特质(interpersonal traits)构成的连续的圆圈,以敌意、退缩等简明的标签为标志,里面的圆圈代表了正常的范围,外面的圆圈代表了相当固定的模式,它们反映了敌意和支配的不同结合。因此,回避型人格障碍代表了敌意—顺从,而自恋型人格障碍代表了支配—敌意。这种分析表明,可以用更少的模式代表人格障碍的范围。由两个圆圈等构成的这种模式,也提供了一种对上文中已经描述的犯罪人分类进行整合的方式。例如,奎伊的未社会化的攻击行为和焦虑—退缩维度,似乎与圆圈中的强制—顺从(coercive-compliant)和退缩—爱好社交(withdrawn-sociable)两个轴线分别对应。

尽管对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中的分类与这个模式之间的关系,只是进行了有限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个模式是有理论基础的,可以用来进行解释和干预。人际理论认为,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一般按照互补模式进行,即社会行为“吸引”别人的相反的(支配—顺从)或者相容的(友好—友好或者敌意—敌意)行为。卡森(R. C. Carson, 1979)提出,在有关其他人可能会作出什么反应的信念与别人

的证实性反应(confirmatory reaction)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人们的行为与他们对别人行为的期望是相一致的。例如,一个有敌意的人预期不愉快的生活经历会导致敌意,这样的人会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以证实他对别人可能作出的反应的预期。因此,固定的人际模式被看成是自我实现预言⁸,它会阻止对更适当、更有技巧的行为的学习。因此,消除这些机能失调的信念,是心理治疗的一个中心目标。这种模式成为晚近解释个人一生中攻击倾向的一致性的研究活动的基础(见第九章)。

尽管参照人际维度是对人格障碍进行分类所必需的,但是,这还是不够的。一些标准涉及个人内部倾向(intrapersonal disposition),例如,自我态度(self-attitude);描述人格的其他维度体系也可能是有关的。人们现在比较一致地认为,大多数特质可以归入5种主要的维度之中,即外倾、愉快(agreeableness)、神经质、认真(conscientiousness)、乐意体验(openness to experience)。前两种维度限定了人际圈。威金斯(J. S. Wiggins)和平卡斯(A. L. Pincus)检验了这5种维度与人格障碍量度之间的相关性(1989),发现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和回避型人格障碍清晰地投射到人际圈中,对所有5种维度特别是对神经质维度的参照,提供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描述。施罗德(H. M. Schroeder)、沃姆沃斯(J. A. Wormworth)和利夫斯里(W. J. Livesley)证实了人格障碍的范围与人格维度之间的幅合度(1992)。神经质维度的突出性,可能来源于它和自尊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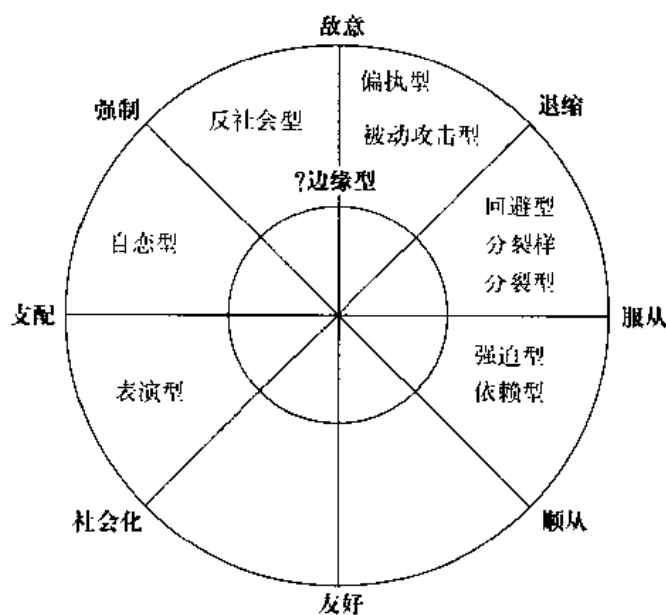


图 3.1 人格障碍类型与人际圈之间的假定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89)的研究。

8. 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又译为“自我应验的预期”,社会相互作用的核心概念,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信赖和期望不仅影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而且也影响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能鼓励他人力争不辜负自己的信任和期望。——译注

第七节 病态人格与人格障碍

一、历史背景

在对反社会行为的讨论中,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的概念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应当强调指出,“病态人格者”(psychopath)这个术语是一种人格建构(personality construct),而不是“犯罪人”(criminal)的同义词。尽管病态人格者已经成为反社会者(antisocial individual)或者社会损害者(socially damaging individual)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病态人格这个术语是从德国精神病学中产生的,因此,病态人格的字面意思是心理受到损害的人(psychologically damaged person)。

病态人格这个术语不再出现在正式的分类中,但是,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二版,DSM-II)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中,仍然描述了病态人格。对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议的,皮克特(P. Pichot, 1978)和米隆(T. Millon, 1981)将人们对这个概念的含义的争论,追溯到了德语国家的精神病学家和英语国家的精神病学家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用法。施奈德(K. Schneider, 1950)支持克雷佩林(E. Kraepelin)对病态人格的10种类型的描述⁹,明确将反社会人格排斥在变态人格的标准之外,他用统计学的术语把反社会人格解释为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病态人格就是给自己或他人造成痛苦的变态人格。有点反常的是,病态人格这个类的概念与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中人格障碍这个大的类型是相对应的。

施奈德的概念在英国没有得到广泛采纳。在英国,19世纪的**悖德狂**(moral insanity)这个概念导致了在1913年的《智能缺陷法》(Mental Deficiency Act)中采用了“**道德性痴愚**”(moral imbecile)这个法律类型,并且最终导致了《英国精神卫生法》(the English Mental Health Act)中的一种类型——**精神病态障碍**(psychopathic disorder)¹⁰:“一种持久的心理障碍或心理能力丧失……它会导致个人进行异常的攻击行为或者严重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从德国采纳了病态人格这个概念,但是,这种类型与施奈德的概念并不相同。事实上,这种定义并没有参照人格,唯一的定义特征就是反社会行为,并从反社会行为中推论出“心理能力丧失”(disability of mind)。

对病态人格这个术语的类似转化,也发生在美国精神病学中。在美国精神病学中,病态人格这个术语和**社会病态**(sociopathy)这个术语是交换使用的,社会病态指任何形式的社会越轨行为。卡普曼(B. Karpman, 1948)明确抵制了施奈德的病态人格概念,甚至抵制人格障碍的概念。他提出,施奈德的一些病态人格类型属于**原发性病态人格者**(primary psychopath),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是无法遏止的本能的表现,不受良心或者罪

9. 克雷佩林(E. Kraepelin, 1856-1926)是德国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之一,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精神病分类系统,对精神疾病的科学分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译注

10. 悖德狂(moral insanity)有不同的程度:程度较轻者,称之为“道德性痴愚”(moral imbecile);程度较重者(对人完全丧失同情心和道德观念,但是智能保持正常),称之为“(重度)悖德狂”,俗称“道德性白痴”(moral idiocy)。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把道德性痴愚理解为一般性悖德狂,并且也往往把“道德性痴愚”翻译为“悖德狂”。——译注

恶感的束缚。施奈德的其余的病态人格类型属于**继发性病态人格者** (secondary psychopath)。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是由动力障碍 (dynamic disturbance) 引起的, 把他们划分为神经症患者或者精神病患者更为恰当。麦科德 (W. M. McCord) 和麦科德 (J. McCord) 也赞同狭义的分类 (1964), 把病态人格者看成是 “一种不合群的、攻击性的、高度冲动的人, 他们很少或者没有罪恶感, 不能与别人保持长期的感情联系。” 不过, 原发性病态人格者和继发性病态人格者这两个概念, 已经被一些研究者采用来区分反社会人群中的焦虑性越轨人格 (anxious deviant personality) 和非焦虑性越轨人格 (nonanxious deviant personality)。

克莱克利 (H. Cleckley, 1976) 采取了与卡普曼类似的观点, 把大多数人格障碍类型看成是神经质人格 (neurotic personality) 或者精神病性人格 (psychotic personality)。但是, 克莱克利提出了一种可以用 16 项标准界定病态人格的 “独特临床实体” (distinct clinical entity), 例如, 外面迷人, 不可信任, 缺乏悔过, 自我中心, 不能与他人建立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克莱克利的概念在指导精神病学研究方面, 已经产生了影响, 但是, 也受到批评, 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刻板观念。

不过,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中的反社会人格概念, 受到了罗宾斯 (L. Robins, 1978) 的研究的影响, 这种类型是根据详细的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行为 (socially undesirable behavior) 界定的。尽管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 DSM-III-R) 中增加了缺乏悔过的特质, 但是, 这种类型的人格特质仅仅限于易激动性 (irritability) 与攻击性、冲动性和鲁莽性。

二、精神病态的测量

由于人们给精神病态 (psychopathy) 所下的定义极为不同, 因此,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恰当操作定义, 这是不奇怪的。现有的量度反映了有关精神病态的不同假设和不同的调查人员对特定测量方法的偏好。过去 30 年间的大多数研究依赖下列的一种或者两种量度。

1. 克莱克利的标准

莱肯 (D. T. Lykken, 1957) 和黑尔 (R. D. Hare, 1986) 推广了克莱克利的精神病态概念, 把它作为识别越轨人口中的精神病态者的基础。所进行的评价是一种综合性评定, 通常评定个人的生活历史资料是否符合克莱克利的 16 项标准, 而不是仔细评价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已经获得了满意的评定者之间的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但是, 对这种量度的使用一直依赖这样的假定, 即克莱克利的概念是有效的, 他的标准具有内在一致性¹¹。

2. 精神病态者清单

为了提供一种更加客观的量表, 黑尔 (R. D. Hare) 通过对克莱克利的标准和文献中有关精神病态者的其他特征的评定进行因素分析, 发展了一种清单——精神病态者清单 (the Psychopathy Checklist, PCL) (见表 3.5)。这个量表的项目既反映了社会越轨行为的历史, 也反映了克莱克利强调的人际敏感性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方面的缺陷, 并且根据个案历史资料 and 有计划访谈进行了评定。犯罪人在这个量表上的得分的高低, 可以

11. 克莱克利识别精神病态者的 16 项标准的内容, 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 541~542 页。

表 3.5 精神病态者清单的项目

1. 圆滑善辩，表面迷人；
2. 从前曾有过人格障碍的诊断；
3. 自我中心和夸张的自我价值；
4. 易于厌烦，易于波动，缺乏稳定性；
5. 有病理性说谎或欺骗行为；
6. 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缺乏对人的忠诚态度；
7. 缺乏悔过自责心理；
8. 情绪或情感浮浅、表面化；
9. 冷酷而缺乏同情心；
10. 寄生式生活方式；
11. 性情暴躁，行为控制不良；
12. 乱伦的性关系；
13. 发育期早年的行为紊乱；
14. 没有现实的长远计划和生活打算；
15. 极易冲动；
16. 对子女不负责任；
17. 不稳定而多变的婚姻关系；
18. 少年劣迹和违法行为；
19. 多次犯罪，由于态度不端正很少得到释放或缓刑处理；
20. 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
21. 有许多犯罪行为，但缺乏充分的犯罪动机和目的；
22. 滥用酒精或药物，但这不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原因。

注：第 2 项、第 22 项在修订后的病态人格者清单中被删去。

本表根据黑尔（1980）论文，复制获得 Pergamon Press Ltd 的许可。

通过他们在行为量度和实验室量度方面的差别显示出来，并且支持这个量表的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尽管人格特征和静态越轨生活史资料的混合，限制了这个量表对犯罪人的非临床研究的效用，但是近来的分析显示，两种间接因素（oblique factor）具有分辨力：一种是与自私、无情与悔恨有关的人际维度；另一种是与社会越轨生活方式有关的维度。

3.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中的第 4 个量表——精神病态量表（Pd），是以心理失调的少年犯罪人组成的标准组作参照，用经验性方法发展起来的，犯罪人样本在这个量表中的得分通常最高。尽管在一些研究中用这个量表测量病态人格，但是，这个量表的内容主要与不顺从、和家庭及权威人物的冲突有关，它似乎更适合于解释违反社会规则行为，而不太适合于解释病态人格本身。一项更具体的标准将第 4 量表与第 9 量表——轻躁狂量表（Ma）结合起来，后一种量表与冲动性或“无意识行为表现”有关。第 4~9 量表剖面图在犯罪人中很常见；在梅加吉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量表分类中，这种犯罪人被称

为“艾布尔型”(Able)。这种类型是联邦矫正所(FCL)研究中的第二大群体。这种模式与原发性病态人格者的概念相一致,因为它在测量情绪性的量表中的得分相对而言比较低。当与评定焦虑(第7量表和第10量表)、心境(第2量表)、越轨知觉或人际经验(第6量表、第8量表)的量表相结合时,就与继发性病态人格者的特质相一致。

对心理变态谋杀犯、对符合英国精神卫生法中精神病态障碍类型的犯罪人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剖面图进行的聚类分析,把第4~9量表剖面图当做4种主要模式之一。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82)发展了人格与社会化特别医院评定问卷(Special Hospitals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SHAPS),用来测量对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别起作用的因素。这个问卷由10个量表组成,它主要根据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的项目发展而来,但是,主要的差别可以用两个因素来概括。第一个因素是好战性(belligerence),这个量度可以测量冲动性、敌意与顺从;第二个因素是退缩(withdrawal),这个量度可以测量羞怯、差的自尊与社交性(sociability)、信心。可以通过在第一个因素上的高分,在经验性分类中区分出原发性精神病态者和继发性精神病态者,但是,在第二个因素上的高分,会区分出另一种极端性的类型。

4. 社会化量表

社会化量表(Socialization Scale, So)是从高夫(H. G. Gough)的加州心理调查表(1969)中抽取的54个项目组成的一个量表,用来测量个人对社会价值观内化的程度,并且用来了解个人接受社会价值观约束的程度。这是目前使用的最有效的自陈式量表之一,该量表在区分严重少年犯罪人和轻微少年犯罪人方面的点二列相关为0.73(N=10296)。高夫(1948)报告说,精神病态者的核心特征是无能力承担“被类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的角色。有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即社会化量表可以指明角色采择能力(role-taking ability)¹²。因此,尽管一些调查人员把低分数作为精神病态者的效标,但是,海布伦(A. B. Heilbrun, 1982)为此目的使用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中的第4个量表——精神病态量表(Pd)减去社会化量表的分数后所剩的分数。

5. 奎伊的行为维度

如前所述,未社会化的攻击性行为、品行障碍或精神病态因素可以一致地从奎伊对少年犯罪人的自我报告和行为评定项目的分析中获得。在几项研究中,这类因素上的分致被用来识别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psychopathic delinquent)。

现有的证据显示,这些不同的量度相互具有相关性,但是,相关程度没有高到可以互换使用的程度。一位调查人员的“精神病态者”并不必然地与另一位调查人员的精神病态者相对应。黑尔(R. D. Hare, 1985)在274名犯人身上比较了上述量度的分数。结果发现,克莱克利(H. Cleckley)的评定、精神病态者清单的分数和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之间的组间相关,从0.57到0.80不等;而这三者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中的精神病态量表(Pd)、社会化量表(So)、精神病态量表减去社会化量表之间的相关性,从0.21到0.44不等。因素分析方法可以很清楚地将观察者的量度与自陈式量表区分开来。黑尔提出,自陈式量表在评定犯人中的精神病态者方面,没有什么用处。不过,这个结论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因为观察者的评定和自我报

12. 角色采择能力又译为“角色承担能力”,是指个人理解、采纳和承担社会角色的能力。——译注

告反映了不同的个人特征。由于每种方法都有其测量方面的局限性,所以,在理想的状态下,对人格结构(personality construct)的评定需要多种量度。由于精神病态者是一种理论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可知的实体,因此,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量度,不同量度的效用只能根据外部相关因素和理论相关因素来判断。对忽视个人的自我意象和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的人格所进行的任何评定,必然都是片面的。

三、病态人格与人格障碍分类

晚近的病态人格者概念的发展,几乎不参考人格理论或人格障碍分类;卡普曼和克莱克利认为,后者是没有必要的。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中的分类显然没有反映这种观点。有必要阐明病态人格的概念和人格障碍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例如,病态人格是否属于人格障碍的“窄谱”(narrow-band)分类中的一种,就像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类型所暗示的那样,或者病态人格是否属于包含几种类型的一种“广谱”(broad-band)概念或者更高等级概念,这些都是仍然不清楚的。克莱克利的评定、黑尔的精神病态者清单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之间的相关似乎表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与克莱克利的“独特临床实体”是等同的。不过,克莱克利和其他人认为与病态人格有关的特质,在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为其他人格障碍确定的标准中也可以发现,例如,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分裂样人格障碍、施虐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因此,把精神病态者看成是一种更高等级的类型,可能是更为恰当的。在对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的项目进行的层次分析中,莫里(L. C. Morey, 1988)发现了两种上位类型(superordinate cluster): 忧虑沉思(anxious rumination)和无意识行为表现(acting out)。后一类型包括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和表演型人格障碍中得到的项目,它似乎与克莱克利的概念更接近一些,而不与狭义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接近。哈特(S. D. Hart)和黑尔(1989)也发现,精神病态者清单与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和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评定相关,并且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病态人格是一种上位概念(superordinate construct)。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被看成是精神病态者或反社会者的人们,是否会组成一个人格特质相同的群体?目前的一些定义搞混了分类标准,而且不可能界定一个同质类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标准中所包含的反社会行为,与人们用特质界定人格障碍的目的不一致。越轨行为可能是人格特征的一种后果,也可能不是人格特征的一种后果,但是,越轨行为本身不是特质,而是属于**社会越轨行为**(social deviance)范畴的一个不同的概念。由于人格障碍和社会越轨行为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可能表现出人格障碍和社会越轨行为中的一种;也可能既没有人格障碍也没有社会越轨行为;但是还有可能既表现出人格障碍,又表现出社会越轨行为。社会越轨行为既不是人格障碍的必要标准,也不是人格障碍的充分标准,没有什么先验的理由期望进行类似的社会越轨行为的人们,会同样属于某一人格偏离类型。事实上,现有的数据表明,那些符合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标准的人,也有可能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中的其他类型的标准,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

通过对那些要评价其特质的人们(包括可能会被确定为精神病态者的人们)的剖面图进行聚类分析,可以适当地检验同质性(homogeneity)。已经进行了几项这样的研究。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75a)从符合英国精神卫生法中的精神病态障碍的犯罪人中,区

分出4种独特的人格模式；其他人的分析也从谋杀犯、男性暴力犯罪人、暴力性精神障碍犯罪人中区分出同样的模式（见第九章）。根据这4种模式的形态特征，可以将它们描述为：（1）原发性精神病态者（primary psychopath），其特征是冲动性、攻击性、敌意、外倾；（2）继发性精神病态者（secondary psychopath），其特征是冲动性、攻击性、敌意、社会性焦虑和退缩；（3）受控制者（the controlled）或顺从者（the conforming），其特征是防御性、擅长社交、非攻击性；（4）受抑制者（the inhibited），其特征是非攻击性、退缩、内倾。因此，这项研究发现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人有两组，而不是只有一种类型的精神病态者。不过，对观察者的评定的分析，产生了相冲突的结果。泰尔（P. Tyrer, 1988）根据对人格障碍特质的评定区分出了一类“社会病态者”（sociopath）。另一方面，布莱克本和梅伯里（C. Maybury）发现了2类精神障碍犯罪人（1985），用克莱克利标准评定这2类犯罪人时，得分很高，一类是攻击冲动型，另一类是退缩型。

但是，如果参照一种维度而不是一种分类体系，那么，就很容易理解精神病态和人格障碍分类之间的关系。尽管克莱克利把病态人格称之为“实体”（entity），这意味着病态人格是一种离散的类型，但是，这也反映了一种古怪的道德假设：可以把社会不需要的特质限于人类的一小部分。像自我中心、无情（callousness）这样的特质在程度上是很不相同的，对黑尔的精神病态者清单的统计学发展，清楚地支持一种连续的维度。实际上，几项因素分析区分出了一种一般维度（general dimension），可以用在克莱克利标准中显得突出的那些特质界定这种一般维度，例如，自我中心、不负责任、对人不热情。布莱克本和梅伯里（1985）证实，这种因素与人际圈（表3.1）中的敌意轴线密切结合在一起；哈珀（T. J. Harpur）、黑尔和海克斯迪安（A. R. Hakstian）发现（1989），精神病态者清单也与这个轴线紧密吻合。不过，在精神病态者清单区分出的两种因素中，“自私、无情”维度与人际圈的联系更加密切，并且与强制—顺从轴线相对应。

可以把精神病态看成是人际圈的一种维度。但是，需要有两种维度来确定个人在人际空间（interpersonal space）中的位置。例如，如果精神病态大体上相当于强制—顺从维度，那么，一些“精神病态者”就可能是擅长社交的，而其他人则会是退缩的（也见图5.1）。这与原发性精神病态者和继发性精神病态者的区分相一致。这也表明，几种人格障碍类型，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样人格障碍，尽管有不同的人际模式，但是在“精神病态者”这个维度上，都可以有类似的位置。这种维度解释与把病态人格作为一种上位概念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和更多的人格障碍类型相一致。但是，从这些方面来看，精神病态者的分类概念仅仅是一种实用的虚构，等到改善人格障碍的分类之后，精神病态者的概念就可能会成为多余的了。

第四章 犯罪的社会与环境理论

第一节 引言

在第一章中已经区分了犯罪性和犯罪行为，犯罪性 (criminality) 是一种违反规则的倾向，而犯罪行为 (criminal act) 是具体的行为事件。犯罪理论并不总是清楚地阐明它们所要解释的这些现象，尽管晚近的一些理论关注了促进或者抑制犯罪的因素，但是，大多数理论所关注的却是犯罪性而不是特定的事件。犯罪理论在解释犯罪性方面很不相同，有的把犯罪性看成是一种一般倾向，而有的则把犯罪性看成是一种特殊倾向；有的把犯罪性看成是远因 (distal determinant) 造成的一种结果，有的则把犯罪性看成是近因 (proximal determinant) 造成的一种结果；有的认为这些原因因素存在于个人自身，有的则认为这些因素存在于环境之中。应该重申，后一个问题并不等同于“个人—情境”问题，“个人—情境”问题是有关影响特定事件的近因的问题。个人在某种情境中实施或者抑制犯罪，涉及到这种倾向的性质和起源。

对少年犯罪的大多数理论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都来源于社会学，这些研究试图发现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中的犯罪原因。由于这类犯罪原因只能在个人层面上通过心理过程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因此，在社会学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之间，没有确切的界限。不过，许多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中的控制理论家都假定¹，人们具有追求享乐的和越轨的本性，因此，应该关注对遵从 (conformity) 的解释问题。在传统上，人们用社会化过程解释遵从，认为社会化过程促进人们遵守社会规则，特别是促使人们遵守调节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道德规则。所以，一些理论家用更加普遍的道德学习的失败，来解释犯罪行为。这些理论家用来解释道德标准和行为性质的超理论假设²，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一般都涉及自我控制或遏制 (restraint) 的内化机制的发展问题，自我控制或遏制会导致诱惑抗拒 (resistance to temptation)。因此，把犯罪行为看成是这种机制有缺陷或者暂时崩溃的结果。哈特肖恩 (H. Hartshorne) 和梅 (M. A. May) 的经典性研究认为 (1928)，不存在能够抗拒欺骗的一般倾向，直接的情境因素决定儿童是否会屈服于诱惑。后来重新进行的分析表明，在他们的资料中，实际上有一种明显的一般倾向。本书第二章中引用的证据也显示，犯罪性反映了违反规则的一种一般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会持续一生。

不过，尽管社会化理论承认原罪 (original sin)，并且关注对越轨行为的遏制或抑制的

1. 控制理论家 (control theorist) 是指赞同控制理论的研究人员。在西方犯罪学中，控制理论属于犯罪原因理论中的一种类型，这类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具有犯罪的本能，犯罪发生的原因是对这种本能控制不够。——译注

2. 超理论 (metatheory) 是指用来阐明某种或某类理论的一类理论。——译注

发展,但是,社会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更普遍地假定人类在本质上是遵从的,只有在社会影响力迫使人们进行越轨行为时,越轨行为才会发生。这种强调犯罪倾向由社会造成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会学中能够产生多种犯罪和少年犯罪的理论。心理学对犯罪的解释,通常来自更加一般化的发展和学习理论。

注重犯罪的个人因素的理论,将在下一章中论述。本章论述那些涉及社会环境中的原因过程的理论。由于社会取向的理论往往试图解释社会过程怎样引起个人在违法倾向方面的个别差异,因此,这类理论有一定的任意性,而个人取向的理论则强调社会过程的结果。由此可见,在强调重点方面是有区别的。由于社会学更加强调犯罪的社会因素,所以,首先简述社会学的犯罪概念。

第二节 社会学理论

科尔文(M. Colvin)和波利(J. Pauly)区分出了6种主要的有关犯罪的社会学理论(1983)。这6种主要的犯罪理论是:学习理论(即不同交往理论)、紧张理论、控制理论、标定理论、冲突理论、激进犯罪学理论。冲突理论和激进犯罪学理论在第一章中已经加以简述,其余4种理论代表了“主流”犯罪学,将在本章论述这4种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一些社会学教科书中找到综合性的评价。

一、不同交往

作为对早期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实证主义的回应,最初的社会学理论都重视寻找社会环境中的“病态”犯罪原因,而不是从个人身上寻找犯罪原因。早期的生态学研究发现,内城区有很高的少年犯罪率,少年犯罪与贫穷、高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社会问题相关(参见第二章)。因此,犯罪的原因是**社会解组**³,在社会解组状态下,社会制度对行为的规范控制力崩溃。尽管人们现在承认,这些相关并不能成为犯罪的所有原因,但是,生态学研究提出,犯罪传统(criminal tradition)与传统价值体系并存,而来自低经济阶层的青少年团伙则为少年犯罪行为提供了支持。不过,萨瑟兰(E. H. Sutherland)更喜欢**不同社会组织**(differential social organization)的概念⁴,这个概念意味着具有潜在的冲突性规范的不同亚文化传统,而不意味着犯因性社会部分和病态的社会部分。他的**不同交往理论**(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产生于1939年,后来又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不同交往理论阐述了犯因性传统(criminogenic tradition)传递的过程,这个理论由9个命题组成:

1. 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获得的,也不是由个人发明的。
2. 犯罪行为是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而习得的。

3. 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是指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社会凝聚力降低的一种社会状态。——译注

4. 埃德温·哈丁·萨瑟兰(Edwin Hardin Sutherland, 1883-1950)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最著名的犯罪学家之一,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监狱协会主席等职,对不同交往理论、白领犯罪和职业犯罪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译注

3. 对犯罪行为学习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亲密人的群体中。非人的交往媒介在犯罪行为的产生中只是消极地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
4. 犯罪行为的学习包括犯罪技术、犯罪动机、内驱力、合理化和态度。
5. 动机和内驱力的特定方向，是从赞许的或不赞许的法典解释中习得的，取决于亚文化群中对法典（规范）的支持。
6. 一个人之所以变成违法者，是因为赞许破坏法典的解释超过了不赞许破坏法典的解释，这些解释是从周围的文化中吸收获得的。
7. 不同交往可能在出现频率、持续时间、历史优先性、强度或情绪效果方面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与犯罪行为和非法行为的交往在这些方面是不同的。
8. 通过与犯罪的或非犯罪的榜样的交往来学习犯罪行为的过程，包含了在其它学习中所有的全部机制，而不仅仅是模仿。
9. 不能用一般的需要来解释犯罪行为，因为同样的需要和价值是犯罪行为和非犯罪行为的基础⁵。

这个理论涉及到与犯罪规范（criminal norm）接触的比率（ratio），而不涉及犯罪交往（criminal association）本身。这个理论也论述了对犯罪的和非犯罪的行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的不同接触，包括守法者对越轨定义的赞同，而不仅仅指与犯罪人的过多接触。尽管萨瑟兰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不重要的，但是，格拉泽（D. Glaser, 1956）认为，直接的人际接触不一定是必需的，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将不同认同（differential identification）与个人赞同的真实或者想象的参照群体结合起来。德夫洛（M. C. DeFleur）和昆尼（R. Quinney）认为（1966），前6个命题构成了这理论的精华，他们简洁地重新表述为：“公开的犯罪行为发生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一套犯罪动机、态度和技术；在初级群体的符号互动过程中⁶，当对犯罪规范的接触超过对非犯罪规范的接触时，就会发生犯罪学习。”

然而，这个理论在几个方面仍然是含糊的，而且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无法检验的。这个理论仅仅解释犯罪倾向的获得，而没有论述犯罪行为的维持和实施，也没有论述个人在交往中的不同接受性（differential receptivity）。这个理论很难将“定义的过量”（excess of definition）量化；如果尝试检验这一理论，就必须从熟悉或结交少年犯罪人方面界定不同交往。几项研究发现，少年犯罪人更有可能结交、认同少年犯罪人朋友，他们之间有类似的行为。这些研究的结论与不同交往理论是一致的。但是，赖斯（A. Reiss）和罗兹（A. L. Rhodes）发现（1964），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恶意破坏行为和轻微偷窃中。不过，这些相关的研究结论仅仅反映了少年犯罪人选择少年犯罪人朋友的一种倾向，而不同交往对犯罪的任何效果都可能是间接的。例如，杰克逊（E. F. Jackson）、蒂特尔（C. R. Tittle）和伯克（M. J. Burke）发现（1985），在成年人中，与犯罪熟人（criminal acquaintance）的

5. 这里对萨瑟兰不同交往理论的论述，是作者的转述，而不是萨瑟兰著作的原文。原文的译文可以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03-405页。

6. 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又译为“首属群体”，是指人际关系亲密的社会群体，例如，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体等。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是指人们通过语言、表情、行为等“符号”进行的相互作用。——译注

不同交往，会间接地通过增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而不是直接地或者通过改变态度增加自我报告的犯罪。不同交往理论也是一种不完善的理论，因为它是以有关人类学习的含糊的心理学假设为基础的。例如，模仿（imitation）似乎是指模仿（mimicry）。但是，晚近对这个理论的表述，通过论述犯罪行为获得的机制，吸收了心理学中的学习概念。因此，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个理论。

二、紧张理论和亚文化理论⁷

默顿（R. K. Merton, 1939）不赞同那种认为越轨行为产生于对基本冲动的控制崩溃的观点。他指出，不遵从（nonconformity）反映了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压力。失范（anomie）是指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分离；当某种文化推崇有价值的成功目标，但是阶级结构却限制接近这些成功目标时，就会产生失范。下层阶级很少有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所以，他们会由于志向和期望之间的分离而体验到挫折或紧张。尽管大多数人接受可以得到的目标和手段，但是，有一些人却会排斥目标而接受传统的手段，或者排斥传统的目标和手段，转而进行非法行为。失范意味着，人们认为自己相对而言是受到剥夺的，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富裕社会中犯罪率高的奇怪现象。

尽管所看到的机会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是，少年犯罪人仍然缺乏技能和机会。一些研究指出，少年犯罪人通常并不是在过高的志向的推动下犯罪的。伯纳德（T. J. Bernard, 1984）向这种证据提出了挑战，认为紧张理论从人们对更严重的、下层阶级的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中，获得了支持。不过，晚近的一些论述从个人的目标与个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机会之间的差距方面，对紧张做了更加一般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机会与个人所属的阶级无关。

亚文化理论或者文化越轨理论者赞同萨瑟兰关于阶级文化或亚文化之间存在规范冲突的观点。对于一些亚文化群来说⁸，少年犯罪行为是正常的；对那些男性、下层阶级、都市的青少年亚文化群来说，更是如此。科恩（A. K. Cohen, 1955）认为，工人阶级文化赞同及时享乐的价值观，这不符合学校系统教授的“中产阶级测量标尺”（middle class measuring rod）。因此，工人阶级的青少年就会感受到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人阶级的青少年接受占优势的成功价值观，但是，那些在学校遭到失败的工人阶级青少年，则会用防卫性的反向作用否定这些价值观⁹，在少年犯罪团伙中嘲笑这些传统价值观。尽管科恩认为失范性挫折（anomie frustration）与年长犯罪人有关，但是，他也认为青少年团伙具有非功利性、恶性性、消极性的特点。米勒（W. B. Miller, 1958）

7. 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认为，犯罪行为是由于人们难以获得实现合法目标的手段时产生的紧张情绪引起的；亚文化理论（subcultural theory）又称为“文化越轨理论”（cultural deviance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人们遵从亚文化规范的结果。——译注

8. subculture 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在一个社会的某且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模式，这种意义上的subculture 一词通常译为“亚文化”；另一种含义是指由奉行这些价值观念和行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种意义上的subculture 一词通常译为“亚文化群”。——译注

9. 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又译为“反应形成”、“反相形成”，精神分析学术语，指以性质相反的方式表达某些不能接受或者无法实现的潜意识愿望或目标的现象。通常所说的“矫枉过正”、“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等成语所表达的意思，就属于这种现象。——译注

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关的文化影响就是下层阶级社区的影响。下层阶级社区有一些核心信念(focal concerns),包括惹麻烦、强硬、聪明、兴奋、命运和自主,这些核心信念在受到同辈群体支持的反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尽管因紧张而产生的动机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儿童养育方式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相同的同辈群体提供了学习男性角色的最初机会。

克洛沃德(R. A. Cloward)和奥林(L. E. Ohlin)认为(1961),下层阶级的邻里提供了参与非法活动的不同机会(differential opportunity)。他们将失范理论与不同交往理论相结合,认为一种少年犯罪亚文化不仅预先决定对越轨角色的学习,而且也预先决定实施越轨行为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平均分布的。他们区分了3种亚文化群:(1)犯罪亚文化群(criminal subculture)。这种亚文化群具有社会接受的观念,他们主要从事功利性财产犯罪;(2)冲突亚文化群(conflict subculture)。这种亚文化群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暴力色彩,是解组的贫民窟的产物;(3)逃避亚文化群(retreatist subculture)。其成员是在越轨行为和合法行为中都没有获得成功的人,这种亚文化群的成员有药物滥用行为。

马茨阿(D. Matza, 1964)注意到,亚文化理论对工人阶级中的犯罪“过度预报”(overpredict),有关犯罪亚文化的证据不足。例如,贫困地区的居民并不特别地容忍少年犯罪,少年犯罪团伙并不像亚文化理论者所说的那样到处流行和得到社会的支持。在有少年犯罪团伙的地方,只有少数少年犯罪团伙成员实施比较严重的少年犯罪。事实上,少年犯罪人的大部分犯罪行为,都发生在两、三类团伙中,实施暴力犯罪的更有可能是单独的少年犯罪人。更多晚近的研究者采纳了一种冲突观点,他们否定存在着一致性文化(consensus culture)的观点,而认为阶级之间的对抗产生了多种类型的对立文化(counterculture)¹⁰。现在,静态的少年犯罪亚文化观念似乎是成问题的。

三、控制理论¹¹

紧张理论和亚文化理论认为,人们在本能上是遵从的,进行越轨行为是外力强迫的结果;而控制理论则认为,需要解释人们为什么遵从“传统秩序”。在这方面,控制涉及个人的遏制因素、与超我(superego)和自我(ego)类似的内化的规范、社会机构(例如,家庭、学校或邻里)的控制性影响力(controlling influence)和权威。例如,雷克利斯(W. C. Reckless, 1961)用**内部遏制**(inner containment)和**外部遏制**(outer containment)分析遵从。内部遏制包括有利的自我概念、目标定向、挫折耐受力、服从规范。外部遏制包括有意义的社会角色、社会认可。违反这些遏制因素的人,要遭受惩罚、社会排斥或者丧失未来的机会。因此,个人是否屈服于诱惑,要取决于预期的奖赏和预期的代价之间的平衡。

10. 对立文化(counterculture)是指不同于主流文化甚至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又译为“反正统文化”。——译注

11. 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个标题之下,本书作者实际上论述了赫希等人的两种理论:一种是赫希较早提出的社会控制理论;另一种是赫希和戈德弗雷德森(M. Gottfredson)在1990年系统论述的犯罪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crime),或称之为“低的自我控制理论”(low self-control theory),“倾向—事件理论”(propensity-event theory)。关于这两种理论的详细论述,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18-527页、第617-628页。

有较大影响力的控制理论是赫希 (T. Hirschi, 1969, 1978, 1986) 的社会控制理论¹²。赫希提出, 遵从取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bond), 即“遵从奖赏” (stake in conformity); 当这种联系薄弱或者破裂时, 就会发生越轨行为。联系的相关因素包括: (1) 对他人的依恋 (attachment), 这通过良心、内化的规范和关注别人的想法等表现出来。(2) 对传统目标的奉献 (commitment)。(3) 卷入 (involvement) 与少年犯罪活动不相容的传统活动。(4) 有关传统价值观的道德正当性的信念 (belief)。由于每个人都会受到诱惑的影响, 因此, 没有涉及特定的越轨动机。这个理论所关注的是一般的犯罪性, 而不是特定犯罪的实施问题。

在横断式自我报告调查中发现¹³, 联系成分与少年犯罪之间存在负相关, 这个结论支持这样的观点, 即遵从奖赏会阻止少年犯罪, 而不会引起紧张或者亚文化性反抗 (subcultural rebellion)。不过, 在一项纵向研究中, 阿格纽 (R. Agnew, 1985) 发现, 联系成分不能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他提出, 控制因素可能主要对轻微的少年犯罪有重要的作用。

这个理论没有论述社会联系 (social bond) 怎样发展或者破裂的问题, 也没有论述薄弱的**联系**怎样引起越轨行为而不是导致个人“不越轨”的问题。几位理论研究者认为, 社会联系的薄弱只能部分地解释越轨行为, 个人越轨动机的差别应当予以考虑。埃里奥特 (D. S. Elliott) 等人赞同这个观点 (1985), 他们提出了一种将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整合起来的理论 (参见第五章)。

不过, 赫希和戈德弗雷德森 (M. Gottfredson) 近来已经重新证实了这样的观点, 即不必用特殊的动机解释犯罪, 犯罪是人类不受约束的求乐避苦倾向的一种自然结果。他们强调, 有关犯罪行为的古典选择理论与实证主义关于犯罪性是实施犯罪的倾向的观点之间, 存在着兼容性; 但是, 他们把犯罪性看成是**自我控制** (self control) 的一种功能。他们认为, 犯罪行为是直接满足人类共同的欲望的行为, 几乎不需要计划、努力或技能。犯罪行为取决于机会和诱惑, 与其他社会谴责的行为, 例如, 饮酒、吸烟、吸毒、非法性行为甚至事故等密切相关, 当人们缺乏自我控制时, 这些行为都有可能发生。那些具有这种一般倾向的人, “有可能是冲动性的、不敏感的、身体性的 (与心理性的相反)、冒险的、目光短浅的、非言语性的。”之所以宁愿选择低的自我控制 (low self control) 而不选择“犯罪性”, 是因为实证主义者论述了后一种原因, 从而在动机方面区分了不同的犯罪。由于犯罪和类似行为中唯一共同的成分是缺乏自我控制, 因此, 没有必要区分犯罪的类型或者犯罪人的类型。

可以认为, 这种一般理论与从儿童期开始的越轨行为的稳定性、与犯罪人的多面性而不是专门化、与犯罪和其他社会越轨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的事实, 是一致的。低的自我控制的根源被认为在于有缺陷的儿童养育活动, 而这种儿童养育活动本身就是养育者 (caretaker) 缺乏自我控制的一种功能。除了家庭之外的社会机构几乎不起作用; 紧张理论、

12. 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 (social control theory) 最初在《少年犯罪的原因》(1969) 一书中得到全面系统的论述, 由吴宗宪等翻译的该书的中译本已于1997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书名为《少年犯罪原因探讨》。

13. 横断研究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是指在同一时间内对不同年龄组的对象进行的调查研究。——译注

文化越轨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没有认识到本能的、短期的享乐主义是所有犯罪共有的成分。

除了强调犯罪行为并不仅仅是犯罪倾向的后果之外,这种理论与有关社会化的其他个人水平的理论相类似(参见第五章)。不过,或许是由于他们保留了实证主义者关于独立的、单向性的“原因”,赫希和戈德弗雷德森没有将行为一倾向区分应用于养育者,没有将社会条件或者儿童自身的特征归因于父母的行为。不过,尽管他们提出个别差异“可能对有效的社会化的前景有影响”,但是,他们否认犯罪人有任何特别的享乐需要或价值观。最后,有人的认为,低的自我控制在精神病态者的特征中得到证实,也在反社会人格中得到证实,但是,都没有另外讲述低的自我控制的性质,也没有另外讲述怎样独立地测量低的自我控制引起越轨行为的问题。关于这个概念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将在第八章论述。

四、标定理论¹⁴

标定理论(labeling theory)认为,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反应可以改变越轨行为的进程。尽管没有一种完全一致的标定理论,但是,标定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像“犯罪人”(criminal)、“残疾人”(handicapped)这类标签的特征和来源,关注使用这些标签的条件,关注这些标签对被标定者的后果。对这种理论的一种影响,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种现象:官方犯罪统计中下层阶级的成员比例过大,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中的比例不相称。另一种影响是实证主义者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即某些行为怎样通过社会界定而具有了犯罪的性质?标定理论也反映了象征互动论者对行为的意义,反映了有关社会怎样确定自我的意义的问题。

标定理论有3个假设:(1)行为从固有性质来看并不是越轨的,犯罪是根据社会原因,特别是有权势者的利益而给予行为的一种标签。(2)刑事司法人员的反应受犯罪人的特征,例如,年龄、种族或阶级的影响,而不受犯罪行为特征的影响。(3)公开贴上“犯罪人”或者“少年犯罪人”的标签,会导致一种越轨的自我意象,从而会促成一种少年犯罪生涯(delinquent career)。因此,这一理论的兴趣点在于**继发越轨行为**(secondary deviance),继发性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机构的烙印化的一种适应。最初的越轨行为(原发性越轨行为)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为这种越轨行为仅仅在被人们这样标定的时候,才成为一个问题。上文中曾经讨论了在处理犯罪人的过程中存在偏见的证据,标定对自我概念的效果将在第八章中讨论。人们对标定理论的批评包括,认为它把重点放在“竞争失败者”(underdog)的越轨行为,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有权者的越轨行为上;将态度、自我概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韦尔弗德(C. Welford, 1975)进一步认为,犯罪的严重性比刑事司法决策中的差别对待更重要。尽管一些支持者也采取消极的反应,但是,马拉什(M. Morash, 1982)发现,公众的标定并不对青少年产生同样的影响,它对严重少年犯罪人几乎没有效果。克莱恩(M. W. Klein, 1986)同样发现,卷入司法系统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女性、白人或初次犯罪的青少年,有更大的影响。

14. 标定理论中的英文词label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名词,指的是“标签”;而是作为动词,指的是强调贴标签的过程,即“标定”(labelling)。以前曾经有人将这种理论翻译为“贴标签理论”、“标签理论”。——译注

尽管冲突理论家考虑了权势群体对越轨行为的犯罪化的影响,但是,缺乏有力的有关标定影响少年犯罪生涯的证据,而且近年来这方面的兴趣已经下降。普卢默(K. Plummer, 1979)为标定的效用辩护,认为对标定的批评不适当的集中在一些庸俗的标定理论观点上。心理学对期望证实(expectancy confirmation)或者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研究也证实,标签和刻板印象会歪曲知觉,这又会对交往的对象产生影响。不能轻视标定过程对少年犯罪发展的作用。

第三节 学习理论

尽管将学习原则应用于干预犯罪人的活动已经30年了,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心理学家发展起一种综合性的犯罪的学习理论。人们往往武断地认为,对犯罪行为、非犯罪行为的获得与保持,受同样的原则的支配,因此,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犯罪理论。不过,这种观点并不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没有一种行为在本质上就是犯罪的,大多数犯罪中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仍然在每个人的全部本领之内。因此,一种适当的解释不能仅仅阐述行为获得的过程,而且也要阐述学习的内容或者学习的失败。适当的理论必须解释人们怎样实施他们明知被社会禁止或者受道德谴责的行为。

学习理论有不同的形式,包括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或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或观察学习,这些在行为主义的传统中都有其起源。不过,就像在其他领域中那样,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有关犯罪的“行为”理论,而是可以区分出3种不同的流派:(1)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它以激进的行为主义哲学为基础。(2)新行为主义(neo-behaviorism),它吸收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也吸收了莫勒(O. H. Mowrer)、米勒(N. E. Miller)和赫尔(C. L. Hull)的学习概念,这一流派在艾森克(H. J. Eysenck)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见第五章)。(3)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它强调认知在学习中的作用。在干预的水平上,这些理论与行为矫正、行为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大体一致。不过,后者包括了不同模式的一种混合,其中的一些模式把认知当做“内隐行为”(covert behavior)(见第十三章)。另一方面,社会学习理论日益关注认知,把认知看成是经验的建构,现在又把社会学习理论称之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人们往往忽略这些差别,并且把那些用模仿解释犯罪行为观点都称之为“社会学习”。就其基本含义而言,“社会学习”强调许多人类学习活动发生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指特定的学习原则,但是,从根本上讲,社会学习理论不同于以经典条件反射或者操作条件反射为基础的模式。社会学习理论不仅关注通过模仿(modeling or imitation)进行的认知学习,而且也要求有关如何控制行为的知识。这与激进行为主义中的反心理主义(anti-mentalism)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斯金纳(B. F. Skinner, 1953, 1978)把内隐事件(private event),例如,意向、期望,看成是“行为的早期阶段”,主张“它们没有什么创造性或初始性功能。”

社会学习理论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学习理论和哲学立场,它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激进行为主义。第一,符号加工(symbolic process)并不仅仅是与可观察到的行为地位相同的“内隐反应”(covert response),而是提供了评价和调节行为的参照机制(reference mechanism)。第二,强化相倚(reinforcing contingency)为那些因期待某种特定结果而

进行的行动提供了关于结果与诱因的信息¹⁵，而不仅仅起行为的自动塑造者的作用。第三，尽管激进行为主义把活生生的人看成是自动控制环境的影响的被动接受者，但是，社会学习理论把人看成是环境的利用者和创造者，提出一种相互决定论 (reciprocal determinism)，认为思想与行为、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学习”分析，忽略了这些差别，它可能承认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效果，但是对知识的作用采取了一种机械的观点。

社会学习理论有两种主要的犯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和少年犯罪是社会化的失败；另一种观点认为，反社会行为本身是一种习得的现象。在论述具体的理论之前，首先讨论所涉及的学习过程。

一、社会化和越轨行为中的学习过程

尽管新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受到精神分析观点拥护者们的反对，但是，新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仍然大量依赖经过转化的精神分析概念，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进行的、大量旨在确定道德抑制内化中存在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在两种主要的理论观点指导下进行的。

早期的应用吸收了莫勒和米勒的双过程理论 (two-process theory)，这种理论刺激了行为疗法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与惩罚相关的线索 (cue)，包括动觉线索 (kinesthetic cue)，成为条件刺激，这些条件刺激会预先引起恐惧或焦虑这样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会成为一种厌恶性驱力 (aversive drive)；只有通过工具性逃避 (instrumental escape) 或回避行为，例如，对惩罚性反应的抑制，才可以减轻这种驱力。所以，社会化依赖以条件性焦虑为基础的反应抑制。如果父母的训练无效，或者儿童缺乏形成条件反应的能力，就会使个人无法获得社会化的遏制 (socialized containment)。这种回避学习的驱力减轻模式是不恰当的，因为证据表明，焦虑或者自主唤醒 (autonomic arousal) 都不是成功的回避学习所必需的。

另一种观点反映了社会学习理论对认知学习和中介 (mediation) 的重视。例如，阿伦弗雷德 (J. Aronfreed, 1968) 认为，内化是对自己行为的认知表象和评价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受内部和外部线索的控制，而内部和外部线索是通过厌恶性条件反射、积极强化和模仿建立的。班都拉 (A. Bandura) 和沃尔特斯 (R. H. Walters) 在解释社会发展时 (1963)，也使用了各种认知学习原则。强化相倚和行为的进行 (performance) 有关。不过，操作性塑形 (operant shaping) 是一个很低水平的过程，不能解释新颖反应，行为的获得 (acquisition) 主要取决于通过对榜样行为的观察而进行的模仿。

模仿涉及在认知水平上的接近学习 (learning by contiguity)。在婴儿中，通过激发起他们的模仿来保证人际反应的安全，到后来，则通过操纵活动或者实现个人功效 (personal efficacy) 来保证人际反应的安全。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模仿过程，而会导致对信息和规则性操作的新颖组织。这是新反应模式的一种来源，也是对以前获得的行为进行抑制或者仅抑制的一种来源，它会促进亲社会行为 (prosocial behavior)¹⁶ 和越轨行为。不

15. 相倚 (contingency) 是指一个事件的出现往往伴随另一个事件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操作条件反射实验中，根据对象的反应给予的强化，称为“相倚性强化”。——译注

16. 亲社会行为通常指对他人有益或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行为，包括旁观者对侵害行为的干预、仁慈、礼貌、合作、捐助、助人、友谊、同情等。通常将亲社会行为分为两大类：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译注

过,这是一个选择过程,榜样的影响是由地位或威望、所观察到的榜样行为的后果、观察者对社会影响的敏感性决定的。模仿与心理动力学的认同(identification)概念是等同的(参见第五章)。不过,精神分析学家把认同看成是应付预期性恐惧(antecedent fear)的一种防御性过程,预期性恐惧的内容是害怕失去爱或者受到竞争性父母的伤害。实验性研究则提出,儿童更有可能认同和模仿有权控制奖赏的榜样,而不认同和模仿有令人忌妒的地位的人。

应当强调模仿的选择性质,因为这是有关反社会行为的文献中被滥用得最多的、发生在其后必然是其结果式的解释之一。人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所观察到的别人的行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境的要求使用所观察到的内容。

社会学习理论尤其强调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认为社会化有赖于对自我控制反应的获得。自我调节涉及自己确立的目标或标准,也涉及自己产生的后果——自我惩罚或自我强化。这会促使人们采纳相倚原则说明预期的行为、操作标准、实现或者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后果。因此,自我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符合或者违反自己确立的标准时发生的自我强化和自我惩罚反应的一种功能。尽管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内部反应在自我控制中的作用,但是,它忽略了统一的内部道德力量,例如超我的作用,认为自我调节能力是根据情境动力学选择性地激起的。自我克制的影响力也可能被认知重建所抵消,因为认知重建对通常情况下会受到谴责的行为提供道德理由。例如,接触越轨榜样,进行旨在谴责或贬低被害人的说服力沟通,低估后果,转移责任,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些属于“中和技术”(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它们在解释犯罪行为的社会学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参见第八章)。

成年人或同辈朋友是自我控制性反应形成的榜样,他们也可能通过强化相倚更直接地塑造行为。尽管社会化依赖对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和强化,而这些亲社会行为与现存的越轨模式不同,但是,更应当注意那些控制反社会行为的厌恶性方法。不过,在心理学文献中,**惩罚**(punishment)对人类行为的效果是有争论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一种公认的定义。操作条件反射论者认为,惩罚就是对给予刺激时伴随的反应的抑制,或者是对正强化物的取消。其他人反对这种循环性的功能定义,认为惩罚就是厌恶性刺激。

尽管斯金纳(B. F. Skinner)主张,惩罚在控制行为方面仅仅有暂时的破坏性效果,但是,实验室试验证实,惩罚可能是一种建立反应抑制的有效方式,惩罚的效果取决于象时间选择、强度、惩罚时间表或替代性反应的可得性这样的参数。问题在于,在自然条件下,厌恶性刺激在多大程度上会促进对越轨行为的抗拒。由于双过程理论承认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形成,因此,它特别重视在社会化中对惩罚的使用和惩罚的时间。所以,在一个反应序列(response sequence)中,早先使用的痛苦性刺激会引起恐惧,这种恐惧会适应能够引起反应的线索;同时,早先使用的痛苦性刺激也会引起反应抑制和对越轨行为的抗拒。反应序列中后来的惩罚会产生“有罪的”条件性情绪反应,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在反应抑制方面没有什么效果。不过,支持这种分化的实验性证据,依赖于使用对身体有害的刺激的实验室情境。这样的研究由于三种原因而缺乏普遍性。第一,它们不能利用人类的符号过程。例如,在培养年幼儿童对越轨行为的抗拒力方面,对规则的口头阐述或陈述比有害的刺激更加有效,口头阐述或陈述不同于时间选择或强度这样的强制因素。第二,在自然条件下,惩罚很难在时间上与越轨行为恰好相合。第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惩罚,要依赖于对

不良行为的**道德判断** (moral judgement), 惩罚的效果取决于受罚者对惩罚的正当性的认识。

使用厌恶性刺激本身并不是社会化的最有效成分。实际上, 父母的惩戒技术不仅涉及施加厌恶性刺激, 例如, 体罚、口头批评, 而且涉及正强化物的撤消或者取消, 正强化物的恢复依个人是否有顺从或者自我批评性反应、个人对推理的使用情况而定。对父母惩戒行为的研究发现, 在社会化中起关键作用的, 是使用惩罚的人际环境, 而不是惩罚本身(见第七章)。

二、犯罪中的条件反射和回避学习

有关犯罪行为的早期学习模式, 吸收了双过程理论。莱肯(D. T. Lykken, 1957)提出, 精神病态者不会对焦虑反应产生条件反射, 因此, 不能避免会招致惩罚的行为。不过, 汤恩(J. E. Tong, 1959)提出, 过度的条件反射性焦虑会导致攻击行为或性攻击之类的恐慌反应, 而缺乏焦虑会导致冲动性犯罪或刻板化的轻微少年犯罪, 因此, 这两种情况都会引起少年犯罪行为。这些观点都集中探讨自主反应性(autonomic responsiveness)的个别差异, 把它作为反社会行为中的关键因素。

特拉斯勒(G. B. Trasler, 1962, 1978)更加全面地将这种范式(paradigm)应用于犯罪行为, 把犯罪行为看成是社会化的失败的结果。他提出, 社会化是通过对在惩罚性反应之前的刺激产生恐惧性条件反射发展起来的, 这种惩罚性反应通过被动回避学习而引起反应抑制。大多数少年犯罪行为被看成是父母训练方法无效的反映, 父母训练方法受亲子关系、在使用惩罚程序的方式和一致性方面存在的家庭和阶级差别的影响。不过, 特拉斯勒同意莱肯的这种观点, 即一些人抗拒训练是因为比较缺乏获得条件反射性恐惧反应的能力。这种理论与艾森克的理论有一些类似, 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讨论。

三、操作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理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 少年犯罪和犯罪行为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现象(operant), 它们是通过强化结果形成和维持的。这种看法在几种有关犯罪人矫治的观点中都有体现。但是, 只有少数几个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斯金纳式的犯罪解释¹⁷。杰弗利(C. R. Jeffery, 1965)提出, 犯罪行为是操作条件反射行为, 犯罪行为通过它引起的环境中的变化而维持, 财产犯罪通过获得偷来的赃物而得到强化, 伤害犯罪通过除掉对手而得到强化。犯罪行为受直接的环境性强化刺激的控制, 并且在行为人会因为其行为而得到强化的环境中发生。因此, 社会文化差别和直接的厌恶性后果的缺乏, 是犯罪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对犯罪行为的操作性控制, 同样是威尔逊(J. Q. Wilson)和赫恩斯坦(R. S. Herrnstein)的犯罪理论(1985)的核心, 但是, 由于他们的分析也吸收了经典条件反射机制、个别差异和社会学因素, 所以, 将在第五章加以论述。

威廉斯(M. Williams, 1987)也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行为主义观点。他认为, 少年犯罪就是受辨别刺激(discriminative stimuli)和“预期后果”(anticipated consequence)控

17. 斯金纳式的犯罪解释(Skinnerian account of crime)就是指操作条件反射性的犯罪解释。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是杰出的美国心理学家, 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发展了操作条件反射理论, 认为操作条件反射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译注

制的一种操作条件反射现象。他提出了一种少年犯罪类型论,这种类型论根据被害人是否在场(辨别刺激)、强化物是外部的(物质利益)还是内部的(性活动)、反应是言语性的还是非言语性的,对少年犯罪进行分类。他认为,这可以提供一种鉴别适当干预的基础。

不过,对犯罪行为的更常见的解释,是社会学习方面的解释。尽管班都拉(A. Bandura)的最初研究涉及了对攻击性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他后来也将社会学习理论仔细地应用于攻击行为(见第九章),但是,他没有提出专门的犯罪理论。然而,班都拉和沃尔特斯(R. H. Walters)(1963)注意到了社会学习理论的原理在少年犯罪行为中的应用,这些应用构成了后来的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

班都拉对犯罪采取了一种控制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偏爱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通过预期的自我谴责(内化的道德制裁)、对社会地位要冒风险的认知评价(非正式制裁)或者对要受法律惩罚的危险性的认知评价(正式制裁),可以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人们发现,所有这3种制裁方式都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成反比。此外,亲社会行为的好处超过反社会活动的诱惑。亲社会行为依个人能力而定。不过,这些都不是固定的特征,而是根据个人、情境和违法行为的性质,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到一起。

社会化的失败,反映了发展自我控制性反应的失败。例如,可以从少年犯罪人更喜欢直接的奖赏而不喜欢延迟的奖赏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根据紧张理论,当由于缺乏机会或者技能而无法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时,就会使个人选择替代性的、非法的手段,而不会延迟奖赏。这些缺陷是由家庭和同辈群体中的示范性影响(modeling influence)引起的。例如,班都拉和沃尔特斯(1959)发现,攻击性少年犯罪人的父亲在社会上得到的奖赏比守法少年的父亲更少,也更不可能成为别人仿效的榜样。因此,少年犯罪人和精神病态者的自我调节系统是有缺陷的,这种有缺陷的自我调节系统使他们对越轨性影响更加敏感,更有可能出现反社会性反应,但是,这种有缺陷的自我调节系统是受选择性辨别刺激控制的。在少年犯罪群体中,实施反社会行为会被别人仿效,并且会受到直接强化和替代性强化,从而会减弱竞争性抑制(competing inhibition)。这样的行为一旦形成,就会由于不间断的正强化超过了惩罚的抑制效果而持续下去。

不过,费尔德曼(M. P. Feldman, 1977)提出,有关社会化的研究过分强调儿童对反应抑制的学习,更重视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期对侵犯行为的学习。人们认为,对违法行为(transgression)和攻击行为(aggression)的研究,分别类似于对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的研究;经典条件反射在对攻击行为的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替代性强化和直接强化是学会财产犯罪行为的重要来源。犯罪行为的实施,有赖于是否有违法的榜样和有关的技能,也有赖于目标的诱因价值(incentive value),还有赖于所认识到的被查获、受惩罚的危险。犯罪行为的保持,是外部强化和自我强化的间歇程式(intermittent schedule)的一种功能。费尔德曼认为,标定理论是与操作条件反射原理相一致的,是对少年犯罪角色发展的一种有用的解释。他也承认个别差异所起的作用。不过,可以用艾森克的人格维度解释这些问题,人格维度与模仿和强化的关系是纯理论性的。

布朗克曼(C. J. Braukmann)、柯里金(K. A. Kirigin)和沃尔夫(M. M. Wolf)也认为(1980),少年犯罪行为是通过同伴示范和同伴强化而学会的。但是,他们也注意到,如果个人没有学会在学校中获得奖赏和避免消极后果的必要技能,就有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少年犯罪同伴的影响。他们指出,进行越轨行为或者传统行为的诱因,会受可以获

得的强化物的“强化值”(reinforcement value)的影响,强化物与控制理论中的依恋(attachment)概念有关。他们引证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和虞犯少年(predelinquent)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与虞犯少年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程度之间¹⁸,成反比关系;虞犯少年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一致性。

有关少年犯罪发展的直接的研究很少,但是,帕特森(G. R. Patterson, 1982, 1986)在家庭环境中对反社会少年进行的现场研究证实,早期的家庭训练对后来的少年犯罪行为是有作用的。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将在第七章论述。

四、学习理论与犯罪的社会学理论

几位社会学家吸收学习理论来扩展萨瑟兰关于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观点。伯吉斯(R. L. Burgess)和艾克斯(R. L. Akers)(1966)、艾克斯(R. Akers, 1977, 1990)都根据操作条件反射和模仿的原理,重新表述了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¹⁹。“亲密人际群体”(intimate personal group)就是那些控制个人的主要强化源的群体,包括想象的或描绘出的参照群体;因此,不同交往是这些群体的不同强化值的一种功能。“定义”(definition)就是可能直接受到强化,也可能对其他行为起辨别刺激作用的行为的规范或意义。越轨行为就是由于受到正强化而被认为是允许的行为。换言之,通过言语化的负强化,将那些可能受到自我谴责或他人谴责的“不赞成违法的”定义中立化。越轨后果并不是由赞同越轨行为的定义过多引起的,而是由对他人的言语表达的不同正强化引起的,当然,越轨行为也可能直接受到强化。

因此,对不同交往理论的重新表述认为,如果越轨行为受到了不同于顺从行为的强化,或者认为越轨行为比顺从行为更需要或者更正当时,个人就会参与越轨行为。定义作为规范意义的中介,其作用超过了严格的操作性解释。艾克斯注意到,这种模式与象征互动论是一致的,与班都拉的社会认知论也是一致的。由于不同强化依赖于社会结构,这种模式将几种社会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加以整合,并将这种模式应用于不同的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

这种重新表述受到人们的批评。亚当斯(R. Adams, 1972)认为,这种重新表述偏离了严格的操作条件反射原理,而哈尔巴施(K. Halbasch, 1979)认为,这种重新表述没有公正评价萨瑟兰的理论。不过,艾克斯(R. Akers)等人对这一理论与青少年中自我报告的吸毒和饮酒的关系,进行了检验(1979)。他们用自陈式量表测量了模仿、定义、不同交往和不同强化。多元回归分析证实,这些因素可以单独地或者联合地解释很大一部分药物使用方面的越轨行为。不过,成问题的是,虽然已经证实自我报告的药物滥用与朋友赞同和使用类似药物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否就是对这种模式的一种强有力的验证呢?

对不同交往理论的唯一实验性检验,是由安德鲁斯(D. A. Andrews, 1980)完成

18. 虞犯少年(predelinquent)是指有可能进行少年犯罪行为的少年。这类少年的性格、行为等方面已经表现出他们可能会进行少年犯罪的征兆。——译注

19. 伯吉斯和艾克斯对萨瑟兰理论的重新表述,称之为“不同交往—强化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reinforcement theory)。由于这种重新表述使用了很多与操作条件反射有关的心理学术语,对一般人来讲比较难懂。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11~414页。

的。他注意到,用认知社会学习原理对不同交往理论的重新表述,其主要含义是支持对不同交往理论的原因和实践意义进行的控制性检验的。他描述了一系列实验性研究,这些研究检查了在监狱和缓刑服务中进行干预时,相倚和人际条件对犯罪态度和犯罪行为的效果。这里的相倚(contingency)是指对犯罪模式和非犯罪模式的接触;这里的人际条件(interpersonal conditions)是指亲密人际群体。例如,监狱犯人进行的反犯罪学习(anticriminal learning),是对群体性咨询计划中呈现的犯罪模式和非犯罪模式进行不同接触的产物。同样,缓刑犯的态度改变和累犯率,显然受缓刑官的态度和人际技能的影响;反犯罪态度(anticriminal attitude)的增强与低累犯率密切相关。因此,这些研究证实,重新表述的不同交往理论对于影响犯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具有预测效度。

这种理论认为,如果对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个人或者群体性的犯罪模式进行过多模仿,受到这种犯罪模式过多的社会强化的话,犯罪行为就会产生。这种理论已经受到一定的经验性支持。不过,除了安德鲁斯的研究之外,这种支持都来自横断性研究,这些研究仍然肯定不同交往为犯罪行为的学习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例如,不论是不同交往理论,还是用不同强化进行的重新表述,都强调单向的环境影响,而没有考虑这些环境影响与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是个人因素可能决定人们接受或抗拒犯罪性影响。不同交往也不可能代表少年犯罪行为发展中的唯一的原因过程。詹森(G. F. Jensen, 1972)报告说,尽管不同交往(少年犯罪的定义)是经常性的,但是,父母的控制对少年犯罪仍然有独立的效果。马茨尤德(R. L. Matusueda, 1982)重新分析了这些数据,指出依恋父母这种现象对少年犯罪的效果是间接的,是以不同交往为中介的。不过,帕特森(G. R. Patterson, 1986)的数据显示,家庭经历是少年犯罪人发展的重要先兆。

人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认为,社会学习理论可以和赫希的控制理论结合起来。赫希(1978, 1986)承认,他的理论和社会化的学习理论之间具有一些相似性;但是他认为,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这种观点与控制理论关于犯罪是非社会的这种观点之间,存在不一致。他自己的数据似乎与不同交往理论相冲突,因为他自己的数据显示,对传统秩序的奉献(commitment)程度低的少年,可能会结交少年犯罪朋友,这样的少年既不会依恋别人,也不会对别人产生影响。但是,康格(R. D. Conger, 1976)注意到,赫希的数据实际上显示,奉献与少年犯罪朋友的数量之间有相互作用。对于具有奉献传统的少年而言,不管他们的少年犯罪朋友有多少,他们进行少年犯罪的可能性都较低;但是,那些很少遵从奖赏的少年,在仅仅结交了几个少年犯罪朋友时,就会进行很多的少年犯罪活动。这并不是根据控制理论作出的预测,因为控制理论忽视了对其他越轨者的依恋的作用,而是和社会学习理论相一致的,因为社会学习理论预测,依恋与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传统行为或越轨行为奖赏的程度。康格认为,控制理论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仅仅解释了遏制因素而没有解释少年犯罪伙伴对少年犯罪行为的促进。他指出,社会学习理论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有关社会联系怎样影响越轨行为的解释。

五、对学习理论的评价

尽管学习理论的倡导者们没有提出统一的犯罪理论,但是,他们阐述了环境中的犯因性影响转化为个人行为的关键性过程。在这方面,他们对发展犯罪理论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力。不过,正如尼茨尔(M. T. Nietzel, 1979)观察到的,他们对犯罪行为分析,主

要是将几个简单原则应用于复杂的现象。例如，他们没有解释少年犯罪行为的普遍性，因为操作条件反射原理和社会学习理论都承认学习的相对特殊性（relative specificity），也没有解释年龄和性别差异。学习理论的倡导者几乎没有考虑个别差异的作用。尽管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人因素是个人的整个历史的产物（products），个人历史以新经验的影响为中介，但是，个别差异的作用主要局限于技能缺陷方面，技能缺陷限制了个人获取奖赏的能力。学习理论的倡导者几乎没有注意目标、期望、信念或社会刺激的特征，而这些因素可能决定个人的依恋或不同交往。例如，“强化值”并不是强化物的一种固有特性，而是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学习理论的倡导者所关注的仍然是单向决定论，社会学习理论的潜力仍然有待挖掘。

有关学习理论的效度的证据也是很有限的。尽管这些学习理论的解释与人们已知的父母和同辈群体对少年犯罪的影响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支持性证据主要依靠从实验室的类似情况作出的推断，依靠相关的自我报告式调查；自然研究的结论仍然是偶然的例外，而不具有规律性。

第四节 理性选择观点

实证主义模式不重视推理的作用，与此相反，边沁和贝卡里亚的古典功利主义则把犯罪行为看成是对犯罪行为的代价和收益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在过去的20年间，古典功利主义有了重要的复活，其标志是人们对实施犯罪行为决策中的认知决定因素和情境决定因素的重视。尽管没有一种单一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模式，但是，理性选择模式的共同假设认为，大多数犯罪行为是以一定程度的手段一目的思考为中介的，当然，从客观上来看，这种思考可能是不系统的、不完全符合理性的。即使那些在观察者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冲动性犯罪和暴力犯罪，也是符合理性选择模式的。不过，尽管理性选择模式明确承认心理学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但是，这种模式具有跨学科性，它的晚近的来源是犯罪的情境观点。

一、环境犯罪学

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五种相互交叉的、把犯罪看成是在特定物理环境中发生的事件的观点。这些观点假设，犯罪人根据环境机会和情境抑制因素（situational constraint）选择什么时候进行犯罪的。不过，这些观点没有涉及决策过程。

第一种观点是由关注城市规划的建筑师和地理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像建筑设计、土地使用、空间布局等因素，对抢劫、盗窃、恶意破坏等犯罪具有原因效果，这些犯罪是缺乏监视（surveillance）的结果。例如，纽曼（O. Newman, 1972）发现，在纽约的住宅区中，犯罪率与楼房的高度，特别是与是否具有私人房主和一般人都都不经常使用的“准公用”出入口或者进出通路密切相关。他提出了防卫空间（defensible space）的概念，在这种空间中，人们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进行监视，就可以减少犯罪行为的机会。不过，人们已经发现，设计特征的效果取决于像年龄、家庭结构、居民密度这样一些社会因素。

第二种观点从人与财物的时空位置的角度探讨犯罪机会。人们需要通过像工作、抚养子女、购物、休闲之类的日常活动（routine activities）满足基本需要。这些日常活动决定人

们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从而决定个人目标和财物目标的位置和易受侵害性(vulnerability)。以个人及其财物为目标的掠夺性犯罪(predatory crime),是在同时存在3种最低限度因素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事件,这3种最低限度因素是:(1)已有动机的犯罪人;(2)适宜的目标;(3)缺乏有能力的保卫者。后两种因素尤其取决于日常活动的模式,它们会影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科恩(L. E. Cohen)和费尔森(M. Felson)支持这种假设(1979),他们指出,可以根据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日常活动的变化,有效地预测同一时期美国人身犯罪和财产犯罪模式的变化;而日常活动的这些变化,是受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的,例如,已婚妇女就业的数量、人们独自生活、离开城镇去旅行、消费品的大小和重量。

第三种观点是从情境犯罪预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概念中产生的。根据情境犯罪预防的概念,犯罪是直接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应当关注的是对犯罪的最近的而不是遥远的影响。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不再迷恋犯罪学理论中的“倾向偏好”(dispositional bias),但是并不承认环境决定论,也不否认个别差异的重要性。“生涯犯罪人”(career criminal)在动机的推动下创造犯罪的机会,而情境抑制因素对冲动性犯罪人或情绪紊乱性犯罪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可以把许多犯罪恰当地理解为普通人在特定压力的驱使下进行的理性行为,是在遇到特定的机会和情境诱因时进行的理性行为。”“机会性”犯罪尤其取决于可以得到的适宜情境,这类犯罪包括商店行窃、逃税、恶意破坏行为。例如,在缺乏监视的地方,比如,空建筑、缺乏监视的公共汽车上,恶意破坏行为就可能发生。所以,可以通过加强监视或者“目标加固”,例如,用钢制作的电话硬币盒子取代容易受侵害的铝质盒子,就可以预防或减少这些犯罪行为。在第十四章中,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犯罪决策与威慑假设

理性选择观点中很突出的一种主张是**威慑假设**(deterrence hypothesis)。一般而言,威慑是指任何预防或阻止某种行为的过程。在考虑顺从行为时都要涉及威慑。不过,传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都把顺从(compliance)看成是内化的规范或道德约束的一种后果,而威慑假设强调外部控制。在涉及犯罪行为时,威慑特别指利用人们对外部制裁的恐惧而阻止人们进行某种行为,这种意义上的恐惧是指对消极后果的认识。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区分出**一般威慑**(general deterrence,具有威胁性的刑罚对潜在犯罪人的效果)和**特别威慑**(specific deterrence,实际的刑罚对犯罪人未来的行为的效果),但是,在这两种威慑中都存在一些类似的内容。

边沁认为,当可以计算的惩罚代价超过了越轨行为可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或利润时,就会产生威慑效果;威慑效果取决于惩罚的必然性、严厉性和及时性。这种观点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长期存在,但是却被社会科学家们普遍忽略。威慑效果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经验方面,都是很复杂的,并且往往与有关刑罚、特别是死刑的观念混在一起。一种常见的反对观点认为,犯罪是冲动性的或者是情绪性的,与缺乏对后果的理性思考有关,人们对法律制裁的认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准确的。难以制定利用对刑罚的恐惧来影响行为的法律。例如,法律制裁可能会通过其他过程,比如,强化对规范的道德义务,增加人们的顺从行为。

不过,对这种假设的当代表述强调,威慑是一种可变的过程,对个人和行为有不同的影响。例如,有人提出,威慑更有可能对夜盗、逃税之类的**工具性犯罪**(instrumental crime)产生效果,而对伤害、性犯罪等**表达性犯罪**(expressive crime)没有什么效果。工具性犯

罪就是追求物质目标的犯罪，而表达性犯罪就是追求非物质目标的犯罪。法定犯罪（*mala prohibita*）更有可能受到外部控制的影响，而自然犯罪（*mala in se*）更有可能受到内部控制的影响。目前的观点也承认，人们在冒险意愿、遵守规范、决定得失的客观情况方面，是各不相同的。目前的观点也承认，由年轻人、情绪紊乱者或者犯罪人组成的群体，可能对制裁的威胁缺乏敏感性。

有人认为，刑释人员的犯罪率上升、累犯可能性也更大的现象，是与一般威慑或特别威慑的原理相矛盾。与这种观点相反，安德尼斯（J. Andenaes, 1974）指出，经历过诉讼的大多数初次犯罪人，不会再次犯罪。他也引证了1919年英国利物浦的警察罢工和195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警察罢工的例子，警察罢工之后，抢劫犯罪和夜盗犯罪上升。因此，他坚决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具有**综合性的**预防作用。也有一些证据证实，立法**可能**影响行为。例如，1967年，英国大张旗鼓地宣传《道路安全法》（the Road Safety Act），该法规定，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的人驾车是非法的。这样宣传之后，因道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下降了大约1/4，不过这种情况后来没有保持下去。对于许多犯罪而言，改变刑罚的必然性和严厉性的效果，可能是微小的。

威慑假设使用了个人水平上的心理过程，但是，许多经验性研究却关注群体水平上的犯罪率。经济学家一直是理性选择观点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把一般威慑看成是犯罪控制的主要工具。他们的分析是以边沁的这种假设为基础的，即犯罪人选择进行预期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因此，进行某种犯罪行为的决定，取决于犯罪行为和守法行为在收益和代价方面的平衡。犯罪的收益可能是金钱性的（金钱或者物品），也可能是非金钱性的（享受或者精神回报）。犯罪的代价包括资源的损失、享受的丧失、合法机会的丧失、法律惩罚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后果。法律惩罚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后果，就是逮捕、定罪的可能性与判决的严厉性产生的后果。对犯罪代价的估计也受个人的“冒险态度”的影响；经济学家假设，决策者一般是不愿意冒险的。这种模式认为，如果付出的代价超过可能的收益，犯罪就不会发生。不过，经验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惩罚成分方面。

人们已经使用经济计量学模式检验总犯罪率（aggregate crime rates）与有关法律惩罚的必然性和严厉性的总合量度（aggregate measures）之间的关系。后一类总合量度的例子包括警察破案率、特定类性犯罪的平均刑期。研究结果一般认为，刑罚对一些犯罪（强奸、谋杀、抢劫、夜盗）是有威慑效果的。一项严谨的研究是埃里希（I. Ehrlich, 1975）对美国的死刑进行的研究。埃里希认为，在过去30年间，每年多执行1起死刑，平均会减少7~8起谋杀犯罪。这个结论已经引起争论，社会学家对有关刑罚的经济计量学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类研究使用了不可靠的刑罚指标。

人们也批评经济学分析仅仅限于实际的刑罚威胁，而没有关注预期的刑罚威胁。例如，班都拉（1982）指出，法律制裁的任何威慑效果，都有赖于关于刑事司法系统的效率的信念；守法者通常高估了危险性。对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和对危险性认识的个人水平的分析，没有一致地证实法律惩罚的威慑效果。一些研究支持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认为刑罚的必然性比刑罚的严厉性更重要，但是也认为，预期的个人被逮捕的危险性比预期的一般危险性更重要。例如，克拉斯特（D. S. Claster, 1967）发现，少年犯罪人与守法少年在对严重犯罪的破案率或者定罪率的估计方面有差别，少年犯罪人对自己被抓获的可能性估计过低，从而提出一种“神奇豁免”效果（magical immunity effect）。不过，詹森（G. F.

Jensen)、埃里克森 (M. L. Erickson) 和吉布斯 (J. P. Gibbs) 发现 (1978)、尽管预期的对个人的危险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密切相关、但是, 预期的一般危险也是很重要的。

几项研究比较了法律制裁的影响与其他因素。施瓦茨 (R. D. Schwartz) 和奥林斯 (S. Orleans) 报告说 (1967)、那些接触到赞同顺从行为的道德观念的纳税人较少进行逃税行为, 而那些接触到赞同使用刑罚的道德观念的人, 更有可能进行逃税行为。蒂特尔 (C. R. Tittle, 1977) 发现, 越轨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强化值, 对预期的、可能进行的越轨行为的潜在影响, 要大于对正式制裁的恐惧。不过, 对诸如失去地位、失去别人的尊敬这样的非正式制裁的恐惧, 也是很重要的。在芝加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泰尔 (T. R. Tyrer, 1990) 也发现, 个人道德、有关法律当局的合法性的认识, 对顺从行为的影响力要大于通过外部结果进行的威慑。这个研究结论与传统的社会化理论很吻合, 而与利己主义的威慑理论假设不太吻合。

不过, 其他人发现, 制裁的效果是有条件的, 制裁对那些不太遵守社会规范的人的效果更大。但是, 皮列文 (I. Piliavin) 等人的研究 (1986) 没有证实这种观点, 他们发现, 无论是正式制裁, 还是非正式制裁, 都对高危人群 (high-risk group) 的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有影响, 预期的犯罪收益是最突出的影响因素。以前的研究可能过分强调不太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类犯罪行为更有可能受到非正式控制。布里奇 (G. S. Bridges) 和斯通 (J. A. Stone) 也发现 (1986)、几乎没有证据证实特别威慑对犯人有效果, 他们提出, 对于经验丰富的犯罪人而言, 可能的收益超过要付出的代价。

有关风险知觉 (risk perception) 的心理学研究, 已经探讨了在假设情境中判断是否存在犯罪机会的问题; 所假设的情境在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收益或损失的数量方面是不同的。雷迪格 (S. Rettig) 和罗森 (H. E. Rawson) 发现 (1963)、学生对不道德选择的偏爱, 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 但是, 惩罚的严厉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犯罪人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不过, 克劳斯 (H. H. Krauss) 等人发现 (1972)、精神病态者对预期的收益更敏感。西格尔 (R. A. Siegel, 1978) 也发现, 当金钱损失不肯定的时候, 精神病态者对惩罚的敏感性较差, 这种研究结论支持 “神奇豁免效果”。相反, 卡罗尔 (J. S. Carroll, 1978) 发现, 无论是对犯罪人, 还是对守法者, 金钱收益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金钱收益的影响力是刑罚的 2 倍。他也发现, 个人有可能仅仅考虑一种维度。对于 1/2 的研究对象而言, 这种维度就是收益的数量; 对于 1/3 的研究对象而言, 这种收益就是抓获的必然性或者刑罚的严厉性。因此, 对于少数人而言, 严格的威慑效果是有限的。

三、有限理性和犯罪事件

克拉克 (R. V. G. Clarke) 和科尼什 (D. B. Cornish) 尝试将决策理论与犯罪整合起来 (1985)、将传统犯罪学理论的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他们提出了 3 个基本假设: (1) 犯罪人通过一定程度的理性决策追求自己的利益。(2) 应当解释的是犯罪, 而不是犯罪人, 也应当解释犯罪特性 (crime-specific) 和情境特性 (situation specific)。(3) 应当区分犯罪事件 (criminal event) 和犯罪卷入 (criminal involvement)。事件是在特定场所选择的犯罪行为, 特定场所决定着动机、方法和人员方面的差别。卷入是指在犯罪行为开始、继续或停止的不同时间点上决策的结果, 而这些决策是传统的犯罪学因素, 例如, 气质、同辈朋友或人口统计学地位的一种结果。尽管克拉克和科尼什强调, 事件和卷入引起不同的决策

模式,但是,他们并不依赖某种特定的决策模式,例如,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认为,公司犯罪涉及广泛的计划活动。

经济学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式(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 model)强调一种最优合理性(optimal rationality)或**规范合理性**(normative rationality)。根据这种模式,决策者收集和整理各种相关的信息,成倍地(multiplicatively)将它们结合起来。这种模式受到人们的批评,被认为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人类信息加工模式,它在把信息编辑成简单的、主观的表象时,受到生物学因素和时间的限制,因而表现出**有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后一种观点受到行为决策理论家们的支持,行为决策理论家们发现,主观可能性是受判断探索法(judgmental heuristics)支配的,例如,记忆中是否有现成的实例;由于对决策问题的描述或者“想象”不同,同样的决策问题会导致不同的选择。

晚近有关犯罪决策的经验性研究,与有限理性的观点更加一致。例如,卡罗尔(J. S. Carroll, 1978)发现,犯罪人和守法者都用单一的维度判断犯罪机会,这种观点表明,犯罪人在判断潜在犯罪(potential crime)的可行性时,忽略了潜在犯罪的一些方面。不过,卡罗尔注意到,犯罪决策也可能是有序的,以至于犯罪人在不同时间考虑不同的维度,或者在犯罪生涯的不同阶段考虑不同的维度。一项对商店行窃者的过程追踪分析(process-tracing analysis)支持这种观点;在这项研究中,对商店行窃者在百货商场进行模拟的商店行窃活动期间的心理,进行了过程追踪分析。结果发现,老练的商店行窃者对犯罪机会的许多特点都很敏感,但是仅仅对接近决策的几种心理活动进行了评价。老练的商店行窃者与商店行窃新手是有区别的,商店行窃新手主要考虑与变成一个商店行窃者有关的决策问题。

犯罪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心理学中的认知倾向一般是一致的,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控制理论也是一致的。例如,赫希(1986)注意到,事件与卷入之间的区别,和作为事件的犯罪与作为一种倾向的犯罪性之间的区别,是等同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前者,而控制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强调后者。艾克斯(R. Akers, 1990)进一步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和控制理论都可以归入社会学习理论的范畴,不过,这种观点可能过高估计了社会学习理论对决策理论家分析认知过程的贡献。

然而,人们对犯罪控制问题的关注,增强了近来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视。晚近以来,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情境决策方面,理性选择理论可能忽略了个人背景和更加广泛的社会环境对选择的制约。这种观点支持有关个人责任的法律观点,也支持有关刑罚的报应观点。尽管这种理论论述了被传统理论忽略的犯罪因素,但是在目前,这种理论缺乏一种综合性的认知理论,而仅仅代表了一种功利主义哲学和若干决策理论的混合物。

第五节 作为自我表现的少年犯罪

角色理论认为,社会行为是赋予的或期望的社会角色的一种功能。角色理论在社会学中有较长的历史传统,但是,角色表现(role performance)主要是由情境要求(situational demand)决定的。一些心理学家近来提出,少年犯罪行为是确立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一种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是与认知结构有关的一种动机行为。例如,戈尔德(M. Gold, 1978)指出,学校中产生的少年犯罪行为,是增强自尊、避免在学习和社会角

色竞争中遭受失败的现实的一种手段(参见第八章)。

霍根(R. Hogan)和琼斯(W. H. Jones)提出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分析理论**(socioanalytic theory, 1983), 这个理论吸收了进化论、**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和**符号互动理论**的成分。这一理论认为, 人格的关键结构包括4部分: (1) 自我概念(self concept)或者同一性(identity), 它是从父母—子女互动中产生的有关自我的观念, 也是个人愿意让别人相信的东西; (2) 自我表现或者角色扮演, 它是用来投射自我意象(self-image)的策略; (3) 个人的参照群体²⁰, 它是个人内心中有关重要他人的期望的观念²¹; (4) 有关敏感性(sensitivity)和能力(competence)的人际技能, 这种技能与如何认识别人的期望有关, 它通过角色表现将别人的期望与自我意象联系起来。这些结构对于注意、认可(approval)、地位、预见性(predictability)这些一般的人类需要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人们认为, 犯罪人与守法者在所有这些结构上都是不同的。在童年时代缺乏人际能力、对成人权威充满敌意的个人, 会形成一种不合作的、反抗性的人际模式。当与这种差的教育技能和机会相结合时, 这种人际模式会导致个人采取越轨角色。参照群体是由类似的人组成的与个人接近的同辈群体, 个人会通过自我意象而将自己对参照群体的认同加以夸大。由于气质、模仿经验和社会机会的不同, 典型的自我表现就是一种有关强硬、被别人疏远、鲁莽、自我显示(exhibitionistic)的意象。选择犯罪生涯尽管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决策, 但却是一种理性的决策, “对于许多工人阶级的男性来说, 作一名犯罪人就是他们的社会认同”。霍根和琼斯提供的数据表明, 这的确是少年犯罪人所投射的意象。

埃姆勒(N. Emler, 1984, 1986)同样把少年犯罪看成是一种非病态的、理性的社会认同, 青少年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少年犯罪符合他们自己的情况。在青少年中, 少年犯罪是在不同青少年之间有差别的一种普遍的行为特征, 而官方少年犯罪则是少年犯罪的极端表现。少年犯罪行为并不是秘密进行的; 无论是在与同伴的社会互动中, 还是在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行为中, 少年犯罪行为都是通过显而易见的方式相互联络的。自我表现与个人在熟人圈子内建立和维护**名誉**(reputation)的较长期目标有关, 名誉是接近所需资源的手段。因此, 人们提出, 以不赞同权威的方式表现的自我, 是技能缺乏的一种表现, 这种行为的目标是在青少年同辈群体中建立和维护名誉。

赖克尔(S. Reicher)和埃姆勒(N. Emler)提供的证据表明(1986), 少年犯罪行为表达了这样一种印象, 即青少年具有强硬的、残忍的和大胆的倾向, 很多少年犯罪人赞赏这种倾向。他们提出,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 社会认同是在中学时代的早期形成的, 而能力分组的经历和教育的失败²², 会使许多青少年拒不服从正式权威(formal authority), 排斥作为正式权威基础的“社会契约”观念。周围存在的少年犯罪传统, 会向青少年提供相关的

20. 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是个人用来作为评价自身、别人或社会事件的标准的社会共同体。参照群体既可以是现实的群体, 也可以是想象的群体。——译注

21.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指对个人的认识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人, 通常包括父母、同辈朋友、教师等。——译注

22. 能力分组(streaming)是英国学校中对同一年级的学生按照总的能力或者智力差别划分为不同班级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有利于教师根据各个班级的能力或者智力情况进行“因材施教”, 但是, 却会损害被分到“能力或者智力较低”的班级内的学生的自尊心和志向, 从而阻碍他们未来的积极发展。——译注

另一种认同，并在同辈群体内支持这样一种认同。建立和维护在这种群体中的地位，与那些为了获得适当的名誉而进行的少年犯罪行为是相关的。

自我表现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少年犯罪是有社会意义的行为，是在非病态过程的推动下产生的，而不是“没有头脑的”不顺从行为。自我表现观点与亚文化理论有联系，因为亚文化理论区别了工人阶级的“核心信念”；自我表现观点强调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卷入，因此它也与控制理论有一致之处。在有关少年犯罪的社会学研究中，也发现了支持少年犯罪朋友和学校失败的重要性的证据。不过，霍根和埃姆勒都没有适当地说明少年犯罪的异质性。尽管霍根明确地把气质和早年的家庭经历作为青少年时期选择少年犯罪角色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赖克尔和埃姆勒的分析并没有清楚地指出青少年的个人特征对学校失败的影响程度。最后，自我表现观点似乎预测，当青少年同辈群体解散时，少年犯罪就会停止。这种观点没有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一些少年犯罪人会继续变为成年犯罪人。

第五章 个人性犯罪理论和犯罪的整合理论

第一节 引言

把社会和文化过程作为越轨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的理论，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处在同样环境的个人没有按照同一的模式发展。因此，这类理论似乎不可避免地认为，在成长的早年中产生的个别差异冲淡了社会环境的效果。本章讨论三种一般的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关注那些作为越轨行为发展中介的“内部”因素，同时也应该注意，人们都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发展的。本章的最后部分讨论晚近的一些犯罪整合理论¹。

第二节 精神分析与犯罪

正如拉扎勒斯(R. S. Lazarus, 1980)指出的，弗洛伊德对变态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即人们经历忧伤但是不能应付自己的忧伤，因为人们总是记得童年时期的事情，这些事情妨碍他们形成良好的成人感觉。尽管弗洛伊德几乎没有谈到犯罪，但是，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对犯罪表现出广泛的兴趣，他们总是把犯罪行为看成是病态过程的一种表现。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犯罪的精神分析学观点，不过，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神分析学犯罪理论。下文中将尝试概括比较正统的精神动力学观点²。

一、社会化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从生物学来看，个人具有追求自我享乐的本能，生来就具有与社会群体的要求发生冲突的破坏性冲动。为了保证社会的生存，个人自己必须控制或者引导这些冲动。这种控制或者引导，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第一，继发过程的产生。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是自我(ego)的心理过程，它与本我(id)的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相反³；自我的原发过程是受现实原则指导的。因此，现实性

1. 整合理论(integrated theory)通常是在吸取几种理论学说的长处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理论观点。对原来各不相同的理论学说进行整合，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说，是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犯罪学理论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译注

2. 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又译为“心理动力学”，它是指强调心理能动性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一种理论体系，由于这种理论体系主要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因此，在很多场合，精神动力学往往与精神分析学交替使用，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另一种名称。——译注

3. 这些都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使用的术语。本我(id)又译为“原我”、“伊德”，是人格结构中追求生物本能欲望的那部分成分，本我按照“快乐原则”活动，引导个人进行获得快乐的活动，而不顾及这些活动是否违反社会规范。本我的这种活动过程被称为“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接下页)

思维和想象的发展,允许通过使用幻想、计划或者抑制情感自动向外部释放而延迟满足。

第二,在释放本我驱力的过程中,自我受超我(superego)的指导⁴。超我代表了对群体标准的社会化。尽管最初认为,超我是一种无意识的力量,但是,现在人们认为超我主要是意识或者前意识(preconscious)⁵。超我有两种成分:(1)良心(conscience)。良心代表了道德规则,它将违反道德规则的冲动加以中和,防止这些冲动通过自我的防御机制进入意识⁶。(2)自我理想(ego-ideal)。自我理想代表了个人追求的标准,它为自我提供积极的价值和目标。在精神动力学的液压模式(hydraulic model)中,自我和超我是心理系统中相互平衡的两个部分,本我中产生的能量必须通过直接的、转化的或者中和的方式加以释放。如果违反超我标准的那些强烈冲动强行进入意识或者转化为行动,超我就会以让自我体验到罪恶感的方式对本我的攻击性能量(aggressive energy)作出反应。因此,自我根据超我标准调节行为,从而避免罪恶感引起的痛苦。

超我的形成取决于在儿童与父母的关系中性心理和自我的发展,也与儿童5岁左右时对恋母情结的解决情况有关⁷。在此之前,随着儿童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他们的良心逐渐得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主要取决于外部制裁。从儿童沉溺于原发性自恋状态开始⁸,婴儿明白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必须与那些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object)建立关系。这些对象关系以父母的感情和赞同为核心,父母既是满足的来源,也是挫折的来源。随着儿童发展到口欲期、肛门期和性器期⁹,自我的发展会促使儿童控制追求快乐的冲动,以确保继续获得父母的赞同。因此,令人满意的亲子关系对早年的发展来说是很关键的,这种关系受到削弱,会产生固着(fixation)现象,当个人以后产生危机时,会倒退到这个固着点(fixation point)。例如,在肛门期发生的冲突,可能导致反抗和虐待倾向,在需要服从的场合会产生这样的倾向。

(接上页注3)又译为“初级过程”。自我(ego)是指理智的我,它引导本我按照社会允许的方式活动,引导和调节本我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自我的这种活动过程被称为“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又译为“次级过程”。——译注

4.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超我(superego)是指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代表了人格结构中的社会和文化规范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自我理想”,它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二是通常所说的“良心”,它负责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的惩罚。——译注

5.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无意识(unconsciousness)是指个人不能认识到的心理活动,主要由原始的本能的能量、欲望、冲动组成;意识(consciousness)是指个人能够认识到的心理活动。前意识(preconsciousness)是介于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一个层次,指暂时被遗忘的过去的经验,平时人们不能感觉到前意识的内容,但是在需要时可以回忆起来。前意识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充当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检查员”的角色,控制着有意识的活动,无意识的内容只有经过伪装才能进入意识中。——译注

6. 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又译为“防卫机制”,是指个人在精神受到干扰时保持心理平衡的手段。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防御机制是个人在潜意识中自动进行的用来克服因本我和自我冲突而产生的焦虑,保护自我的方法。防御机制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译注

7. 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是指儿子亲母反父的复合情绪,存在于性器期阶段(从3岁到5岁左右),根据精神分析学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情结会在个人心理上引起乱伦的罪恶感。——译注

8. 原发性自恋(primary narcissism)是精神分析学术语,指婴儿最早产生的自恋情欲,类似于子宫内平衡(intrauterine equilibrium)的一种状态。在原发性自恋状态下,儿童陷入自己的理想。——译注

9. 这是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口欲期(oral stage)从出生到1.5岁;肛门期(anal stage)从1.5岁到3岁;性器期(genital stage)从3岁到5岁左右。在不同的阶段,儿童分别把嘴唇、肛门、生殖器的活动作为快感的主要来源。——译注

随着性器期的开始,对异性父(或母)亲的乱伦欲望、对同性父(或母)亲的敌意,在男孩中会因为受罚恐惧(fear of counteraggression)或者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而产生紧张¹⁰;在女孩中会因为害怕失去爱而产生紧张。这类冲突可以通过认同和摄入有威胁性的父亲或者母亲的特点这种防御性的方式得到解决,例如,采取他们所想象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所以,儿童能够通过放弃外部对象的投入和整合这种投入而摆脱恋母情结奋斗(oedipal strivings)。在这个阶段,可以通过**认同攻击者**(identification with aggressor)巩固良心。因此,男孩还可以通过内化父亲察觉到的对他的攻击而避免父亲惩罚的威胁,用它来对付自我,把与母亲的对象关系作为一种感情关系而不是作为一种占有关系加以维护。自我理想是通过**情感依附认同**(anaclitic identification)形成的,通过这种认同,将所爱对象的合乎需要的意象加以吸收。这种活动可以恢复童年期失去的自恋,提供一种愿望实现(wish fulfillment)的力量和自尊。尽管早期的理论认为,超我基本上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但是,后来的理论认为,超我标准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处在发展之中。

精神分析学家对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功能差别仍然有争论,但是一致同意关于内部道德力量控制行为的基本观点,这种内部道德力量的发展取决于满意的亲子关系。不过,晚近的发展理论较多受到自我心理学家和像沙利文(C. Sullivan)这样的新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对经典的本能模式提出了质疑。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是一种以精神分析概念为基础的折衷观点,但是也吸收了习性学(ethology)¹¹、进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成分。依恋理论的关注焦点是出生后的第一年中婴儿—保育员依恋(infant-caregiver attachment)的性质和对后来的认知与道德发展的决定作用。早年的依恋影响后来的行为,这种影响是通过对依恋关系的内化实现的,依恋关系是一种有效的双向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模式。例如,可以在焦虑—回避型婴儿(anxious-avoidant infant)和焦虑—抗拒型婴儿(anxious-resistant infant)中发现不安全的依恋,这些婴儿会预期得不到别人的支持,会认为别人是不可信任的。这样的儿童以后可能会选择和形成紊乱的相互作用,重现以前经历过的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在晚近对人格障碍、儿童虐待和性犯罪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更多认知取向的理论。

二、在犯罪行为中的应用

不适当的超我的形成和功能,是精神分析学解释犯罪行为的核心。正如格拉夫(E. Glover, 1960)指出的,“犯罪是不成功的教养的一种结果。”不过,不能完全不考虑超我,在整个动力系统中都必须看到超我的作用。由于行为取决于心力系统(psychic energetic system)的平衡,任何成分结构的紊乱都会产生适应不良的行为。例如,可以预期,超我缺陷可能与自我控制中的缺陷和不能延迟满足有关。进一步讲,紊乱的亲子关系不可能仅仅存在于恋母情结阶段,超我问题会与各个发展阶段产生的无意识冲突相联系。这些冲突会推动以后生活中的越轨行为,当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早年的冲突情境时,越轨行为就会

10. 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是精神分析学术语,指男孩害怕失去生殖器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因为男孩以母亲为爱恋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乱伦情绪而产生的,产生这种情结的男孩害怕父亲会割去自己生殖器,因而产生深深的焦虑。——译注

11. 习性学(ethology)又译为“动物行为学”,研究动物在自然生活环境中的行为特点、行为的适应意义和行为特点的演化来源的科学。——译注

发生。因此,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了犯罪行为的3种主要来源,这3种主要来源与严厉的超我、薄弱的超我或者越轨的超我有关。

1. 犯罪行为可能反映了严厉的超我(harsh superego),类似于神经症

无论是在症状性神经症中,还是在犯罪性神经症(criminal neurosis)中,都存在着被压抑的无意识冲突,唯一的差别是,在症状性神经症中,无意识冲突是作为个人功能中的自我适应性改变(autoplastic change)而被体验到的;在犯罪性神经症中,无意识冲突是在改变环境的环境改变性尝试(alloplastic attempt)中“无意识显露的”。例如,在“强迫性”盗窃中,偷盗行为或被盗物品象征着冲突。这种观点的一种变体认为,神经症性犯罪人(neurotic criminal)有一种惩罚性超我(punitive superego),他们体验着对被压抑的童年期愿望的极端的无意识罪恶感(unconscious guilt)。无意识显露的愿望是追求法律制裁部门的惩罚。换言之,少年犯罪可能代表了对安全、认可或地位的需要的替代性满足,这些需要在家庭中都得不到满足。未实现的无意识愿望可以升华,也可以通过能够提供所需要的认识或地位的其他行为而找到表现方式,例如,在帮派少年犯罪中,就可以实现未实现的无意识愿望。尽管斯托特(D. Stott, 1982)没有使用弗洛伊德的正统模式,但是也把少年犯罪看成是追求家庭中的个人影响(personal effectiveness)和社会依恋的情感需要遭受挫折时的一种解决方法。根据对英国城市格拉斯哥的少年犯罪人的观察,他提出少年犯罪行为通常都是对家庭压力(family stress)作出的反应,其动机包括逃离家庭、通过追求刺激而回避压力、敌意、检验忠诚、补偿性冒险心理(compensatory bravado)。

2. 薄弱的超我与犯罪行为

薄弱的超我(weak ego)一直对病态人格有影响。实际上,像自我中心、冲动性、无罪恶感、无同情心这些描述个人的词汇,都是一种心理动力学的描述。尽管一种早期的论述区分出了“冲动支配性”性格(impulsive-ridden character),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表现出没有受到过超我或者发展性固着(developmental fixation)改变的原始本能需要,但是,大多数作者提出了将未解决的恋母情结固着和前性器期固着(pre-genital fixation)结合起来的观点。例如,格拉夫(E. Glover, 1960)把精神病态者看成是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发生固着的人,这种固着涉及到对父母双方的敌对性认同(hostile identification);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精神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是对虐待行为的控制问题。”他把精神病态者看成是从体质来看就具有攻击倾向的人,认为使用投射是一种防卫方式。当与不能满足儿童依赖需要的亲子关系经历相结合时,就会发生自恋固着(narcissistic fixation),导致自我中心和滥用倾向(exploitativeness)。近来解释自恋性人格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此外,在口欲期和肛门期发生的挫折,会加剧精神病态者本能的虐待倾向,就像儿童摄取敌意而将其投射到遭受挫折的父母身上一样。不过,格拉夫提出,超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而是由在不同阶段发生的认同所形成的层次构成的。由于亲子关系差可能仅仅限于父亲或者母亲中的一方,仅仅限于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因此,超我的各个部分都有可能产生缺陷。所以,精神病态者的行为只有在发生危机时才会朝越轨方向发展。格拉夫的解释与肯伯格(O. Kernberg, 1975)对“边缘性人格组织”(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的描述相类似,这种人格组织包括反社会人格。

鲍尔比(J. Bowlby, 1979)的假设与此有关。鲍尔比认为,母亲和儿童之间依恋关系的中断,是以后的越轨行为的一种重要征兆。他最初提出“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

观点的依据,就是对表现出“无情性格”的少年盗窃者在5岁之前与母亲分离的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不过,这些研究结论实际上是不能重复的;无论是从方法论上来看,还是从概念基础来看,人们都对分离的效果提出了怀疑。拉特(M. Rutter, 1971)的分析指出,母爱剥夺的概念中存在含糊不清的内容,他的评价中几乎没有发现支持分离本身具有原因意义的证据。不过,他发现的一些证据表明,不能形成对保育员(caretaker)、而不一定是对母亲的依恋联系这种现象,对以后的少年犯罪有重要的影响。晚近对精神病态的解释强调这种内容,在这些解释中,把敌意和明显缺乏焦虑看成是对依赖和无力感(powerlessness)这些痛苦感情的一种防卫反应,这些痛苦感情是在早年的母亲遗弃和母亲反复无常中产生的。

3. 越轨超我与犯罪行为

少年犯罪行为的第三种来源是这样的情形,即超我标准得到正常发展,但是,超我标准的内容却反映了**越轨认同**(deviant identification)。当犯罪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良好,儿子摄取了父亲的犯罪特性(criminal attribute)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少年犯罪行为反映了罪恶感的缺乏,但是其中并没有精神结构的异常。一种相关的观点是约翰逊(A. M. Johnson, 1959)论述的“超我缺陷”(superego lacunae)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少年犯罪人一般来说得到了适当的社会化,但是缺乏对特定类型的越轨行为的抑制力。当父母鼓励进行犯罪活动,把犯罪活动当做对自己的无意识冲突的替代性满足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例如,担心自己的商店行窃历史的母亲,可能过分注意儿子进行偷窃活动的可能性,她的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促成儿子的商店行窃行为。

三、精神动力学关于犯罪性假设的效度

精神分析没有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犯罪理论,也没有解释犯罪的一些特征。例如,这种理论没有解释犯罪行为的年龄分布。尽管青春期少年犯罪的增加可能真地与潜伏期结束时婴儿时代冲突的重现有关¹²,但是,这不能解释青少年后期的停止现象。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女孩不会体验到阉割焦虑,她们就不能像男性那样彻底地解决恋父情结,因而会形成薄弱的超我。这种现象与犯罪中的性别差异并不一致,也与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表现出比男性强的道德取向(moral orientation)的事实不符。

这种理论似乎是以下列主张为基础的:(1)社会化依赖于童年早期对社会规则的内化;(2)薄弱的父母—婴儿关系对后来的犯罪行为具有原因性的作用;(3)在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恋母情结阶段遇到的紊乱的家庭关系所造成的无意识冲突,是一些犯罪行为的原因。第一个假设并不是精神分析学独有的假设;第二个假设在其他一些理论中也有,但是,对家庭因素怎样影响少年犯罪的解释有所不同(见第七章)。第三个假设是很独特的,因而也是这个理论的关键。

应当强调的是,这种理论并没有把所有的犯罪都看成是无意识冲突的结果。克兰(P. Kline, 1987)指出,许多获取性犯罪(acquisitive crime),例如,白领犯罪以及一些攻击性犯罪,都是“自我犯罪”(ego crime),这些犯罪涉及理性目标和计划,而使用精神动力学理论进行的解释,只能限于“非理性的”犯罪行为。现有的证据也表明,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态者只占犯罪人的一小部分,不过,斯托特(D. Stott, 1982)相信,大多数持续性少

12. 潜伏期(latency period)是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从6岁到12岁左右。——译注

年犯罪人都表现出一些适应不良的现象。不过,迄今为止,认为一些犯罪人是因为无意识冲突而犯罪的主张的基础,主要是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进行的临床观察,在通常情况下,这种临床观察是有效的。

克兰(1987)指出,可以使用阈下刺激技术(subliminal stimulation technique)检验是否存在冲突和是否使用了防御机制,并且提出使用这样的技术可以获得能够检验和证伪的预测。不过,这些程序的效度是成问题的,这种理论并不能适当地预测冲突什么时候会表现为环境改变性症状(alloplastic symptom),而不会表现为自我适应性症状(autoplastic symptom)。神经症性冲突也可能同样是犯罪原因引起的一种后果;费尔德曼(D. Feldman, 1964)指出,精神动力学倡导者忽略了卷入犯罪对人格紊乱的反向效果。

然而,不可能立即抛弃精神动力学假设。精神分析是试图系统论述感情体验现象的唯一的理论,与一些使用得太多的实证主义的批评相反,精神分析被证明是可以证伪的,并且已经在几个方面经受了检验。心理学家对无意识过程的排斥,已经开始消散,随着认知的“进化”,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第三节 艾森克的犯罪性理论

一、概述

艾森克(Hans J. Eysenck)的人格理论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并且继续刺激人们进行研究。不过,对这一理论的许多方面仍然是有争议的,特别是与犯罪有关的那些内容更是充满争议。这里集中讨论1964年提出的犯罪性理论(theory of criminality),这一理论后来在艾森克本人的著作(1977)、艾森克与古汀逊(G. H. Gudjonsson)合著的著作(1989)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犯罪性被看成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倾向(disposition)。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特质,犯罪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正常行为表现为利他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无被害人但有可能反社会的行为,还有可能表现为侵害被害人的犯罪行为”。这种理论集中研究“主动反社会的、精神病态的犯罪人”,这种犯罪人代表了社会化不足的极端例证。这一理论不适用于家庭谋杀犯(family murderer)和“不适当”型犯罪人(inadequate criminal),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一理论不是一种适用于所有犯罪行为的理论。这一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不能服从规则的原因。

这一理论从三组命题中推断犯罪人的特性。第一组命题是与人类气质差别有关的人格描述模式(descriptive model of personality)。人类的气质在3个独立的维度上有差别:(1)神经质—稳定性(neuroticism—stability,缩写为N);(2)精神质—超我(psychoticism—superego,缩写为P);(3)外倾—内倾(extraversion—introversion,缩写为E)。神经质—稳定性维度和外倾—内倾维度已经通过若干成功的问卷加以界定,例如,莫兹利人格调查表(Maudsley Personality Inventory, MPI)和艾森克人格调查表(EPI)。后来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1975)可以测量N、E和P维度,还包括一个效度量表(Lie scale,缩写为L)。不管名称如何,这个量表要求严格遵从的特质,或者说缺乏对经验的开放性。

第二组命题涉及到人格的生物学基础(biological basis of personality)。艾森克提出

的证据认为, N、E 和 P 维度受遗传的影响, 人格具有生物学的基础。N 维度被认为反映了边缘系统和自主系统的更大的反应性 (reactivity), 会导致对压力的更强烈的情绪反应。有很高的“内驱力” (drive) 水平。潜在的 E 维度代表大脑皮层唤醒水平或者唤醒性 (arousability), 它受皮层网状回路 (cortico-reticular circuit) 的活动的支配。外倾性格者的唤醒水平比内倾性格者要低, 可以预测外倾性格者不大容易形成条件反射; 而是会寻求更多的紧张刺激以便维持“快乐情调” (hedonic tone), 也就是意识的快乐状态; 对痛苦不太敏感。P 维度目前与循环性雄激素 (circulating androgen) 有关。

第三组命题就是社会化的控制理论 (control theory of socialization)。像弗洛伊德那样, 艾森克认为人具有追求享乐的本能, 社会化涉及获得像“良心”、“超我”这样的遏制因素。道德或者规则遵从 (rule-compliance) 是对诱惑的不随意情绪反应的一种表现, 是通过经典性条件反射形成的, 是父母和其他人对反社会行为进行惩罚的一种结果。因此, 对诱惑的抗拒可以通过唤起条件性焦虑反应, 促使个人避免进行要受到惩罚的行为。“良心的确是一种条件反射。”由于外倾性格者对惩罚的痛苦不太敏感, 形成条件反射的能力也较差, 因此, 在同等条件下, 他们比内倾性格者更难社会化。

这种理论并不认为犯罪性本身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成年人的行为取决于他们在童年期形成的条件反射的性质以及儿童条件反射能力 (conditionability) 的大小, 但是, 艾森克首先考虑的是个别差异。尽管艾森克承认犯罪人是异质的, 但是, 他预测, 作为一个群体, 犯罪人更有可能是外倾性格者, 会表现出较低的唤醒水平和较差的条件反射能力。不过, 根据赫尔 (C.L. Hull) 关于内驱力与加强优势反应 (prepotent response) 的习惯力量相互作用的理论, 可以预测犯罪人在 N 维度上的得分会比较高。然而, 外倾性格者也是“神经质的”, 因此, 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可以进一步预测, 犯罪人在 P 维度上的得分也会较高。这种预测并不是从理论中推论出来的, 而是从研究结论中得出的, 因为研究表明, 在精神病患者的亲属中犯罪性和精神病态更流行, 据此可以认为, 会引起精神疾病的遗传素质也会在反社会倾向中得到反映。人们注意到, 在 P 维度上得高分者的特质 (敌意、社会不敏感、残忍) 在精神病态者身上有表现。所以, 可以认为, 在 P 维度上得高分是原发性精神病态者 (primary psychopath) 的特征, 而继发性精神病态者 (secondary psychopath) 会在 N 维度和 E 维度上得高分。但是, 作为一个群体, 精神病态者和犯罪人在所有这 3 个人格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是较高的。

这一理论中最有力的解释成分显然是将 E 维度和低唤醒水平、社会化不足联系起来。这个观点与有关 N 维度和 P 维度的预测不同, 有关 N 维度和 P 维度的预测几乎没有解释力 (explanatory power)。有关犯罪人中的唤醒和条件反射的心理生理学研究, 将在第六章中讨论, 这里主要讨论与人格维度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不过, 首先要讨论一些基本的假设。

二、人格的维度结构

“神经质” (neuroticism, N)、“精神质” (psychoticism, P) 这些容易使人误解的概念, 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中得出的, 即神经质 (N) 和精神质 (P) 是那些导致主要的精神疾病的遗传素质的表型表达 (phenotypic expression)。因此, N 和 P 就是“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所“共有”的特性。不过, 在精神病学中区分出“神经症患者”这种症状模式, 反映了有关神经症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经症患者这个术语在这种理论的框架之外

没有精确的含义。因此,“神经质”是抽象概念的一种具体化(reification),在美国的调查者中,并不明确区分神经质和特质性焦虑(trait anxiety)。事实上,神经质在自评式问卷中是很普遍的,用来测量焦虑倾向、抑郁、敌意、低的自尊或消极情感性(negative affectivity)。这些特性并不是“神经症患者”所独有的,也是许多“精神病患者”和人格障碍者的特性。不过,如果神经质可以测量特质性焦虑的话,那么,所预测的犯罪人在神经质维度上得高分的现象,就很难与缺乏条件反射性焦虑的现象相吻合。

精神质(P)的含义更缺乏确定性。没有证据表明,精神质量表可以测量精神病的遗传素质或者精神疾病的先兆。也没有理由把精神病素质与缺乏“超我”等同起来,根据这种理论,超我是E维度的一种功能。艾森克经常提到,可以恰当地把精神质理解为“精神病态”,其他一些调查者也赞同这种解释。

内倾—外倾也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人们对它是否属于一种单独的维度提出了怀疑。问题的症结在于外倾性格(E)和外倾性格者行为中的“社交性”、“冲动性”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社交性**(sociability)意味着合群性、喜欢谈话、群体性投入(group involvement)、不退避或退缩,而内倾性人格者更喜欢安静的活动,羞怯,表现出社会性焦虑(social anxiety)或“神经症性内倾”(neurotic introversion)。**冲动性**(impulsiveness)意味着轻率行动,无所顾忌,在特质理论家中通常指快速决策或者对外部刺激自动作出反应。不过,心理学理论中的冲动性更多地是指对内部情绪“冲动”的控制。

在艾森克的层次模式中,社交性和冲动性是首要特质,首要特质与其他特质,例如,自信心(assertiveness)或者支配性(dominance)相关,产生E维度上的高分。对艾森克人格调查表(EPI)中的E量表的研究支持这个观点。艾森克指出(1974),条件反射能力与冲动性的相关程度高于与社交性的相关程度,冲动性是犯罪性中更重要的外倾性格成分。不过,在后来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E量表中,没有冲动性这个术语,现在把冲动性看成是精神质(P)的一种成分。如果冲动性在理论上与E维度(低唤醒水平、条件反射能力弱、良心有缺陷)有重要的相关,并且与精神质(P)也相关的话,那么,这种犯罪性理论就有严重的缺陷。

但是,一些作者认为,社交性和冲动性代表了独立的维度。由于精神质与冲动性、不遵从性和缺乏遏制相关,因此也可以认为,精神质是广义的冲动控制维度的一种成分,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中的E和P维度与其他人已经识别出的独立维度——社会外倾性格(social extraversion)和冲动性相对应。尽管艾森克提出了一种层次模式,但是在实际上,像社交性和冲动性这些特质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二维环形图来表示。图5.1显示了这样一种排列,这是根据卡斯鲍姆(G. G. Kassebaum)、库奇(A. S. Couch)和斯莱特(P. E. Slater)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证实的结果排列的。卡斯鲍姆等人认为,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中的两种主要因素实际上就是N(神经质)和E(内外倾性格),但是也认为,主参照轴45度处的向量(vector)对于说明主参照轴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可以使用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与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或社会性(sociality)、冲动性与控制量表来界定这些向量。在这种分析中,社交性和冲动性都是与E(外倾性格)和N(神经质)相关的独立维度,但是,社交性和冲动性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艾森克关于相关因素群的研究结果,可以归结为对冲动性和运动方面、而不是情绪控制方面的强调。实际上,艾森克认为构成P维度的许多特质(支配性、男子气、攻击性),都可以用这个复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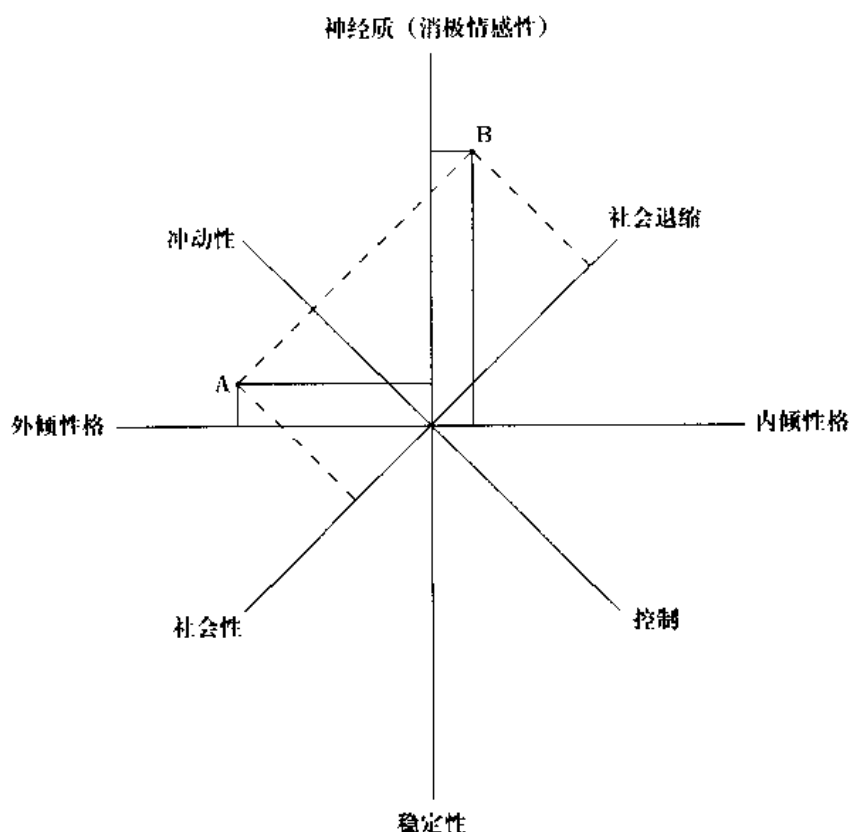


图 5.1 冲动性、社交性与神经质、外倾性格的关系 (A 代表原发性精神病态者, B 代表继发性精神病态者)

排列很好地予以解释。

如果把冲动性和社交性解释为确定二维空间的轴的一种旋转 (rotation), 那么, 它们就代表了造成个别差异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格雷 (J. A. Gray, 1981) 修订艾森克理论的实质内容。尽管格雷区分了 N 和焦虑, 把他的旋转称之为冲动性和焦虑, 但是, 格雷的维度就是图 5.1 显示的冲动性和社会性退缩 (也就是“社会性焦虑”)。不过, 格雷理论在犯罪性方面的应用, 主要集中于焦虑和社会性退缩方面, 而不是集中于冲动性方面。

三、人格的生物学基础

那种认为 N 维度的基础 (substrate) 在于边缘系统的激活阈限 (threshold of activation) 的理论, 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把 P 与雄激素联系起来的假设也有待研究。这里讨论将 E 维度和皮层唤醒 (cortical arousal) 联系起来的假设的意义。

脑电图 (EEG) 可能是皮层唤醒的最直接的测量指标, 但是, 脑电图不能前后一致地区分出内倾性格者和外倾性格者, 不过, 根据这种模式提出的一些预测却得到了支持。例如, 人们预期在 3 种条件下, 内倾性格者会表现出较高的条件反射能力, 这 3 种条件是: (1) 部分强化; (2) 无条件刺激微弱; (3) 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之间的间隔时间短。当缺乏这些条件时, 外倾性格者就会表现出较高的条件反射能力, 艾森克引用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不过, 条件反射能力会在生理系统泛化的观点, 值得怀疑。现在, 条件反射理论的发展强调经典条件反射的信息方面, 而不是强调简单的反射弧模式。

根据唤醒原理 (arousal postulate) 提出的一种进一步的预测认为, 外倾性格者寻求更多的刺激来支持积极的“快乐情调” (hedonic tone), 因此, 外倾性格者有更高的**最佳刺激水平** (optimal level of stimulation)。艾森克注意到, 少年犯罪活动往往是由于厌烦和冒险而产生的; 鲍德温 (J. D. Baldwin, 1985) 则提出, 寻求刺激 (sensation seeking) 是青少年男性中很突出的特性, 它可以解释犯罪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其他研究者也认为, 低唤醒、寻求刺激与越轨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奎伊 (H. C. Quay, 1965, 1977b) 明确将“刺激渴求” (stimulus hunger) 与精神病态联系起来; 法利 (F. H. Farley, 1986) 提出, 少年犯罪人更有可能是低唤醒者和寻求刺激者。埃利斯 (L. Ellis, 1987) 在介绍“唤醒理论”时假设, 有 8 种行为模式与不适度唤醒有关, 这 8 种行为模式是: 抗拒惩罚; 冲动性; 儿童活动过多; 冒险; 娱乐性吸毒 (recreational drug use); 主动进行社会交往; 多种性体验; 学业成绩差。埃利斯认为, 所有这些行为模式都与“犯罪性或精神病态”有关。

不过, 外倾性格、寻求刺激和唤醒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很清楚。通常用朱克曼 (M. Zuckerman, 1969) 编制的朱克曼寻求刺激量表 (Zuckerman's Sensation Seeking Scales, 缩写为 SSS) 测量最佳刺激水平, 但是, 这方面的研究表明, 寻求刺激与冲动性有关, 而与社交性无关。寻求刺激也与精神质和社会化不足有关, 这几个因素共同界定外倾性格是一种独立的因素, 可以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中的 E 量表测量外倾性格。不过, 寻求刺激并不是 E 量表的一种直接功能。

最佳刺激水平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它表示一种**更好的水平**或者标准, 背离这个水平或者标准, 就会引起寻求刺激或者回避刺激的行为。因此, 具有推动作用的是这种假定的标准和当前的输入水平之间的差距, 而不是唤醒水平本身。不过, 这种假定的标准的性质, 仍然是不清楚的; 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 为什么高的最佳水平应当与低的唤醒水平有关。实际上, 有证据表明, 对“厌烦”的厌恶, 是从不断增加的自主唤醒 (autonomic arousal) 中产生的。

最佳刺激水平理论强调刺激强度的非特异唤醒效果, 但是, 有关感觉剥夺的研究证实, 对刺激剥夺者有强化作用的不是刺激强度, 也不是刺激的变异性, 而是**刺激中所包含的信息**。因此, 一些研究者提出, 人们以不确定或者不协调的形式寻求一种**最佳信息水平** (optimal level of information)。这些不是“原始”刺激所固有的特征, 而是取决于怎样评价刺激。尽管新颖的或复杂的刺激具有唤醒作用, 但是, 这种效果是信息加工的一种结果。如果刺激渴望意味着对更好的最适度不协调性 (optimum of incongruity) 的背离, 那么, 寻求刺激行为就应当与中枢认知控制机制 (central cognitive control mechanism) 这个中介有关, 而不是与非特异唤醒水平的降低有关。

朱克曼 (1984) 认为, 还不能证实最佳刺激水平与低唤醒之间有联系, 至少就寻求刺激而言是如此。晚近的研究显示, 寻求刺激者有一个容易兴奋的中枢神经系统, 更容易被唤醒, 也更有可能被唤醒。现在, 朱克曼认为, 寻求刺激者是为了补偿大脑儿茶酚胺系统的低紧张性¹³, 大脑儿茶酚胺系统控制着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由于去甲肾上腺素系统涉及到

13. 儿茶酚胺 (catecholamine) 是脑、交感神经末梢等组织产生的一种化合物, 包括去甲肾上腺素 (noradrenaline)、肾上腺素 (adrenaline) 和多巴胺 (dopamine), 它与身体内的代谢活动觉醒、睡眠、兴奋、欣快情绪、攻击行为、精神障碍等有密切关系, 也对调节体温、维持血压和神经内分泌活动有重要作用。——译注

刺激选择和对无关信息的过滤,因此,去甲肾上腺素系统与对信息流的控制有密切联系。

寻求刺激似乎与外倾性格或者唤醒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这种结果不能消除唤醒与外倾性格之间的假定联系,但是,却会损害犯罪性理论,因为艾森克预测,犯罪行为意味着寻求刺激,犯罪行为取决于外倾性格与最佳刺激水平之间的联系。

格雷(J. A. Gray, 1981)也极力缩小唤醒在个别差异中的作用,认为个别差异与特定的前脑系统(forbrain systems)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焦虑”这个维度的基础是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这是一个隔离海马系统(septo-hippocampal system),它对惩罚或者没有得到预期的奖赏这些条件刺激做出反应,是被动回避的中介。行为抑制系统与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是对奖赏或者非惩罚性条件刺激做出反应的中介,是冲动性的基础,不过,这种系统的生物基础尚不清楚。人们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抑制系统的反应性有缺陷,这种缺陷使精神病态者对威胁性刺激缺乏敏感性。精神病态者在行为抑制系统的活动性方面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使得他们对威胁性刺激缺乏敏感性。福尔斯(D. C. Fowles, 1988)认为,这种缺陷表现为皮肤电系统的反应不足。没有人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激活系统存在功能失调,但是人们认为,抑制接近反应的惩罚这种条件刺激的失败,导致对精神病态者的追求奖赏行为失去抑制。

不过,奎伊(1986)提出,在儿童的行为问题中,品行障碍是行为激活系统的一种功能,情感缺陷障碍反映了行为抑制系统的活动不足,而社会性退缩则是行为抑制系统活动过度的结果。这种观点似乎与格雷假设的这些系统的人格相关因素相一致。应当强调的是,所有的人在这两个维度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一些人的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激活系统的功能可能表现出极端的情形。例如,在图5.1中,A和B代表了两个人的位置,这两个人都具有高冲动性,因此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激活系统都是活动过度的。不过,B表现出社会性退缩,他的行为抑制系统也应该是活动过度的;而A的行为抑制系统应该是活动不足的。实际上,A应该归入通过经验方法区别出来的原发性精神病态者中;B应该归入通过经验方法区别出来的继发性精神病态者中。

四、社会化理论

那种认为社会化是以焦虑或者恐惧的条件作用为中介的主张,是很难证实的。尽管人们普遍承认惩罚在儿童训练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多人认为,同样应关注儿童的受社会赞许的行为。对父母子女相互作用的观察进一步发现,越轨家庭对越轨行为进行正强化(见第七章),而社会学习理论家则强调模仿在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强调认知自我调节在社会化中的发展。因此,人们批评艾森克的理论建立在过分狭窄的人类发展概念的基础上,而这种人类发展的概念来源于对动物的实验室研究。根据赫布(D. O. Hebb, 1964)关于认知不协调在恐惧反应中的作用的经典研究,人们对恐惧获得的条件反射模式一直是有争论的,近年来这种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

在上文中已经注意到,内倾性格者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很高的条件反射能力。由于没有证据认为条件反射能力是一种普遍性的特质,这种能力与社会化的关系依赖于对眨眼条件反射或者皮肤电条件反射的接受,眨眼条件反射或者皮肤电条件反射与自然情绪条件反射相类似。令人怀疑的是,内倾性格者和外倾性格者在获得条件反射性反应方面的差异,是

否能够恰当解释现实生活差异。正如帕辛厄姆 (R. E. Passingham, 1972) 所指出的, 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存在有利于内倾性格者的条件反射的条件, 例如, 微弱的无条件刺激, 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之间的间隔时间短。格雷 (1981) 同样主张, 条件反射与社会化的联系仅仅表现在, 内倾性格者的生理素质对恐惧更敏感, 对那些与厌恶性无条件刺激有关的条件更敏感。

雷恩 (A. Raine) 和威纳布莱斯 (P. H. Venables) 描述了在正常青少年中对社会化理论的一项检验 (1981)。在这项检验中, 他们使用了一种皮肤电条件反射范式, 这个范式的参数有利于内倾性格者。他们从有关社会化和人格的自陈式测验中抽出一种因素, 根据研究对象在这种因素上的得分, 按照社会化的程度对他们进行分组。研究的结果没有发现不同组中的研究对象在条件反射方面有差异。尽管这项研究不支持艾森克的理论, 但是, 有关社会阶级与条件反射相互作用的研究, 部分地支持艾森克的理论: 中产阶级家庭的反社会少年的条件反射能力比一般少年差, 而下层阶级家庭的反社会少年的条件反射能力比一般少年强。这种观点与艾森克的理论相一致, 因为艾森克的理论认为, 在犯因性环境中生长的内倾性格者, 仅仅因为他们的条件反射能力强就会变成反社会者 (但是, 怎样直接通过条件反射形成反社会行为, 是不清楚的)。不过, 数据资料并没有验证这种预测, 因为社会化的量度与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中的 E 量表无关。

特拉斯勒 (G. B. Trasler, 1962, 1978) 的社会化理论没有受上述批评的影响。尽管他也认为, 社会化的行为依赖条件性焦虑, 而不依赖直接环境中的厌恶性相倚 (aversive contingency); 他特别将社会化的行为与被动性回避学习 (passive avoidance learning) 联系起来。因此, 与惩罚有关的线索会唤起条件性焦虑, 而抑制会受到惩罚的反应则可以降低这种条件性焦虑。不过, 这并不依赖于一般的条件反射过程, 人们认为, “厌恶抑制性条件反射” (aversive inhibitory conditioning) 是一种原始的、相对独立的学习形式, 人类在灌输或者参照规则或者原则时, 都要利用这种认知能力。与艾森克不同的是, 特拉斯勒强调言语中介, 而艾森克认为言语中介在社会化过程中起次要作用。

在惩罚形式方面, 特拉斯勒更重视取消赞扬 (withdrawal of approval), 而不重视体罚; 认为预期的赞扬失去或者不能得到赞扬在功能上和预期的痛苦是一样的。使用“赞扬性”养育方法的父母, 将会是更有效的社会化力量, 因此, 中产阶级和完整家庭中的社会化情况是最佳的。他更强调与儿童教养有关的社会条件。犯罪性更有可能反映了适当的教养条件的缺乏, 而不是对教养活动的反应能力的欠缺。特拉斯勒怀疑那些与条件反射能力有关的人格因素对大多数犯罪人的重要性。不过, 精神病态者代表了“越轨行为的典型例子”, 他们的学习社会抑制所必需的机制有缺陷。这并不是由于条件反射能力方面存在的任何一般化的缺陷造成的, 而是由于对惩罚线索的反应性方面的特殊缺陷造成的。特拉斯勒认为这种缺陷与格雷的行为抑制系统中的缺陷相似。

五、人格与犯罪

上述的讨论指出了艾森克的一般理论中存在的若干缺点, 这些缺点使人对艾森克理论在解释犯罪性方面的适当性产生了怀疑。但是, 对反社会行为与外倾性格、神经质、精神质有关的预测的检验, 主要考察了人格与犯罪的关系。使用艾森克问卷的早期版本的一些研究, 几乎没有产生支持这种理论的结果。科克隆 (R. Cochrane, 1974) 概述了到 1972 年为止的

20项研究的结果。只有1项研究显示少年犯罪人是明显外倾性格的人,而有5项研究发现少年犯罪人更加内倾。后来的研究更多地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果,当然,它们的结果并不总是像预期的那样。法林顿(D. P. Farrington)、拜伦(L. Biron)和勒布朗(M. Le Blanc)进行的一项尖刻的评论(1982),对艾森克问卷的效度提出了怀疑。他们对官方犯罪人和对照组进行了16项比较,结果发现,在大多数比较项目中,犯罪人的精神质和神经质得分更高,但是,E量表(外倾性格)上的得分并不同样高。相反,7项自我报告式研究表明犯罪人与外倾性格有联系,只有少数几项使用这种量表的研究发现犯罪人与精神质有联系。犯罪人与神经质没有明确的联系。

法林顿等人描述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进行的一项自我报告式少年犯罪人研究。这项研究也表明,犯罪人与外倾性格和精神质有联系,神经质和外倾性格方面得分高的少年和少女表现出一种实施了更多的少年犯罪的趋势。剑桥研究中的资料也表明,外倾性格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密切相关,而神经质与官方少年犯罪密切相关;但是在研究对象16岁时发现,明显的神经质和外倾性格与成年期的官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都有关系。当考虑少年犯罪人在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方面的得分时,这些联系都不复存在,因此,法林顿等人指出,外倾性格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反映了一种反应偏向(response bias)。他们也排除了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与精神质之间的相关性,认为精神质是量表建构中的一种人为概念,因为所选择的项目夸大了少年犯罪人与正常少年的差异,不过,这种主张没有得到证实。

尽管法林顿等人认为艾森克的理论缺乏证据支持,但是,他们的数据中存在的一些一致性,这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很明显。例如,拉什顿(J. F. Rushton)和克里斯特汀(R. D. Christjohn)发现(1981),在所研究的7个儿童和大学生中,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与外倾性格和精神质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与效度量表(L)上的得分之间存在负相关。他们关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与3种人格因素(外倾性格、意志坚强和精神质)关系密切的研究结论,似乎不赞成用反应偏向进行的简单解释。戈默(M. Goma)、佩雷斯(J. Perez)和托拉比亚(R. Torrubia)概述了在西班牙进行的研究(1988),发现正常少年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与精神质和外倾性格显著相关。与法林顿等人的评论相一致,他们也发现被监禁的犯人在P(精神质)和E(外倾性格)量表上的得分高。不过,艾森克(S. B. G. Eysenck)和麦格克(B. J. McGurk)发现(1980),拘留中心的青少年犯人在P、E和N量表上的得分都比对照组要高,在冲动性维度上的得分也同样。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对学龄儿童的反社会行为的观察研究。萨克劳夫斯(D. H. Saklofse, 1977)发现,P量表可以有效地区分被教师认为行为表现良好或者行为表现较差的那些少年。鲍威尔(G. E. Powell)和斯图尔特(R. A. Stewart)同样报告说(1983),教师对反社会行为的评定与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中的P量表相关。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莱恩(D. A. Lane, 1987)发现,在学校中有严重行为问题纪录的儿童,在P和E量表上的得分较高,而在P量表上的得分与对敌意的评定有关。在一项为期5年的追踪研究中,用P量表上的高分预测了官方少年犯罪,但是官方少年犯罪人在N量表和效度量表(L)中的得分低。另外,P量表上的得分与犯罪的次数和持续性相关,也与暴力犯罪行为相关,但是与E量表和N量表上的得分的相关不显著。在这些研究中,与反社会行为关系最密切的是P量表。不过,伯曼(T. Berman)和佩塞(T. Paisey)发现(1984),严重的(暴力性的)少

年犯罪人在P量表、E量表和N量表上的得分比不太严重的(财产性的)犯罪人要高,而在效度量表上的得分要低。

关于艾森克对精神病态的预测,目前仅有有限的证据。黑尔(R. D. Hare, 1982)发现,加拿大一所中等警戒度监狱中的犯人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各个量表上的得分,都很接近常模,但是,P量表和精神病态清单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与厌烦和冲动性这些项目的相关性最高。不过,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87)发现,在精神障碍犯罪人中,P量表的得分与艾森克的预测相反,艾森克预测P量表可以识别原发性精神病态者,而布莱克本发现,继发性精神病态者在P量表上的得分最高,继发性精神病态者也比原发性精神病态者更加内向。原发性精神病态者和继发性精神病态者在N量表上的得分都比较高,但是,原发性精神病态者在寻求刺激量表上的得分最高。后一种结果与以前关于精神病态者的研究相一致,但是,在研究中已经发现,寻求刺激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官方少年犯罪和青少年中的严重反社会行为相关。

最一致的研究结果是,精神质(P)与官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都相关,也与不属于犯罪的未社会化行为相关。也有一些证据显示,在P量表上的高得分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人和持续性犯罪人的特征,但是,并不必然是原发性精神病态者的特征。尽管在N量表上的高得分在官方犯罪人中很常见,但是至少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可以用N量表上的低得分预测少年犯罪。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犯罪人比正常人更加外向,但是,这不是一项得到强有力支持的研究结论,对外倾性格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的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自我报告式研究。这似乎反映了外倾性青少年夸夸或者吹嘘其不良行为的倾向,也反映了在理论上对外倾性格的重视。E量表不能一致地识别官方少年犯罪人,这种情况严重的削弱了这一理论的可信度。

艾森克提出了几种有关E量表预测失败的理由。一种理由是年龄的影响。自我报告式研究通常适用于学龄儿童,而对犯罪人的研究中更有可能以监狱犯人为研究对象。艾森克提出,外倾性格与儿童和少年的反社会行为的联系更密切,神经质在成年犯罪人(older criminal)身上更明显。不过,艾森克也承认,他的理论更适合于持续到成年期的犯罪行为,而不太适合于少年犯罪行为。在一项研究中,艾森克等人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比较了不同年龄的监狱犯人和对照组,发现各个年龄的监狱犯人和对照组在P量表和N量表的得分上都是不同的,但是,E量表只能区分40岁以下的监狱犯人和对照组。这项研究结论不同于那种认为外倾性格主要在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中显著的观点。持续性犯罪人在P量表上的得分似乎高于在E量表和N量表上的得分。

关于E量表不能预测监狱犯人的另一种理由是,监狱犯人在**社交性**方面的得分,可能由于对他们社会行为的限制而被压低。这个理由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在社交性人格测验中的得分,反映了几乎与实际行为相同的**偏好行为**(preferred behavior)。根据动机理论,对偏好活动的剥夺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弱这方面的兴趣。短刑犯也不像长刑犯那样外向。比较可信的解释是,与反社会行为有关的,是外倾性格中的冲动性成分,而不是社交性成分。有一些证据证实,冲动性既与官方少年犯罪有关,也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有关。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个理论现在将冲动性与神经质、而不是外倾性格密切联系起来,这削弱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关于E量表不能区分犯罪人的第三种理由是,认为犯罪人具有**异质性**。艾森克强调指出,

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人。在一项研究中,艾森克等人发现(1977),艾森克人格问卷可以区分具有不同犯罪生涯的犯罪人类型,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在P量表和N量表上的得分做出的。聚类分析研究已经识别出人格测验分数的模式,这些模式表明,这一理论可能仅仅与一些犯罪人类型有关。在对少年犯罪人和对照组进行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因素群比较中(1981),麦格克(B. J. McGurk)和麦克杜格尔(C. McDougall)发现,神经质内倾和稳定的外倾因素群在少年犯罪人和对照组中都出现,但是,神经质—外倾和精神质—神经质—外倾因素群仅仅在少年犯罪人中出现,这些模式在艾森克的理论中表现得很清楚。麦科伊万(A. W. McEwan, 1983)在年幼少年犯罪人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并且也发现,精神质和外倾得分高的人最有可能被定罪。不过,尽管这种观点有希望阐明人格与犯罪的关系,但是,不能认为它是对艾森克理论的恰当检验,艾森克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反社会者和遵从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犯罪人之间的差异。例如,在P量表和E量表上的得分高的犯罪人与在N量表和E量表上得分高的犯罪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可能从这种理论中推论出。

可以肯定地说,艾森克的犯罪性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尽管试图检验艾森克理论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但是,这些结果大部分与艾森克理论的中心命题无关,艾森克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外倾性格、外倾性格的生理基础和社会化过程。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与精神质维度之间的联系比它与外倾性格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是,精神质的意义含糊不清,缺乏一种将精神质与社会化联系起来的理论,这种联系目前几乎没有解释力。不过,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在少年犯罪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P量表上的得分比较高。显然,外倾性格者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具有实施少年犯罪行为倾向的人,也有一些犯罪人在人格方面是外倾性的,认为犯罪人中的大多数属于外倾性格者的这一关键预测,没有得到充分一致的支持,因而使人难以信任这一理论。

第四节 认知发展理论

一、概述

各种社会化理论都求助于超我、良心或者自我控制的发展,这些理论都把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更加普遍的道德发展失败的组成部分。在这些理论中,道德是通过条件反射、模仿或者认同获得遵从行为、形成信念所必需的,道德代表了对社会规则的内化,这种内化是通过父母、教师和同辈朋友的影响实现的。根据这种观点,有关对错的道德辨别(moral discrimination),主要是源于生物需要的感情性反应(affective response),或者说是在追求社会奖赏和避免惩罚的过程中产生的感情性反应。因此,道德行为是对有关文化标准的非理性遵从(irrational conformity)。

道德的社会化模式已经受到皮亚杰(J. Piaget, 1959)和科尔伯格(L. Kohlberg, 1976, 1987)的挑战¹⁴,他们认为,道德是受自我实现和认识现实的认知需要推动的。道德发展涉及到认知发展;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儿童主动通过社会互动经验来建构(construct)道德

14. 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和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又译为“柯尔伯格”,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对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研究。——译注

判断,而不是通过被动地通过将社会化力量的标准内化来建立道德判断。与道德准则有关的是道德推理过程(即人们怎样思考与获得信念)的**结构**(structure)或方式,而不是道德信念的**内容**。

在皮亚杰的构造理论(structural theory)中,道德推理是智力发展的结果,是由认知结构对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发生的顺序转化(sequential transformation)组成的。道德推理阶段是由认知发展的一般阶段决定的。因此,儿童的具体运算思维阶段与多种推理有关,在这种推理中,把成年人的规则看成是不可改变的。随着儿童向形式运算阶段过渡,在思维方面也发生向自主推理的转变,在这种推理中,儿童把规则看成是群体一致意见的产物,正义变成了调节人际互动的理性原则。

科尔伯格根据对一般正义原则的更加高级的理解,界定道德推理的发展,其核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受平等性(equality)和相互性(reciprocity)的调节。不过,他扩展了皮亚杰的理论,提出了3种推理水平,每种推理水平又包括2个阶段(见表5.1)。这些水平代表了自我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关系的3种模式。**前习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level)与具体运算思维有关,这是青春前期儿童以及少数少年和成年人的特征。在这个水平上,儿童根据孤立的自我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在**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level),个人能够从群体或社会的角度判断各种关系,大多数青少年和成年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在**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level),个人根据自己信奉的一般道德原则理解社会规则,只有少数成年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每个水平的第二个阶段都比一般情况要高级。例如,在第3阶段,个人分享两个人之间或者更多人之间相互照料、信任或者忠诚的关系;在第4阶段,这种关系产生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确定每个阶段的内容包括:什么是正确的东西、认为正确的理由、用来判断是否正确的社会观点,每个阶段都代表了一种在逻辑上一致的、相互联系的观念结构。因此,6个阶段构成了一种比较复杂和抽象的、有层次顺序的道德推理模式;每种道德推理模式是前一个阶段的逻辑发展。在每个阶段,第一个小阶段(substage)受现有的权威规则的调整,而第二个小阶段受公平和个人责任感的调整。现在认为,第6阶段是第5阶段中第二一个小阶段的精细化,而不是一个单独的阶段。

根据这个顺序发生的变动,被认为是不变的和普遍的。向下一个阶段的进步,取决于认知发展、社会观点或角色采择(role-taking)的适当水平¹⁵,这些水平是推理模式转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尤其取决于认知刺激、对话的社会经验和通过群体参与进行的交换,也取决于因接触更高阶段的逻辑而发生的认知冲突的体验。因此,学习理论用遵从榜样的可得性、奖赏和惩罚相倚,解释环境对道德发展的影响;而科尔伯格强调**角色采择机会**(role-taking opportunities)。这个假设构成了道德发展原则在教育中应用的基础。

可以用几种方式评价道德判断的水平。道德判断谈话(moral judgment review, MJT)

15. 角色采择(role taking)又译为“角色扮演”,是指关于自己与他人角色的设想。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901-1978)认为,人的自我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别人的意见,像他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自己。设想处于他人角色,从他人角色的观点观察自己,是顺利实现人际相互作用的必要条件。——译注

表 5.1 科尔伯格理论中道德发展的水平和阶段

道德发展水平	每个水平的特征与阶段
水平 I 前习俗水平或前道德水平	<p>特征是：道德和自我服务价值观尚未分化；个人受外部规则和社会期望的支配。</p> <p>第 1 阶段（服从与惩罚定向阶段）：正确的行为就是服从以惩罚为后路的规则的行为，行为受强有力的他人的支配。进行正确的行为的理由是避免惩罚。</p> <p>第 2 阶段（工具性目的与交换阶段）：正确的行为就是符合个人直接兴趣的行为，也就是可以公平交换的行为。强调的重点是，在认识别人的需要的同时，满足自己的需要。</p>
水平 II 习俗水平	<p>特征是：根据社会遵从、相互人际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确定道德价值，个人已经认同或者内化他人的规则和期望。</p> <p>第 3 阶段（人际和谐与遵从阶段）：正确的行为就是符合个人预期角色的行为。根据良好的意图、信任、忠诚和对他人的关心判断行为。</p> <p>第 4 阶段（社会和谐与制度维护阶段）：正确的行为就是实现自己认可的义务，拥护法律、对群体、社会或机构有贡献的行为。</p>
水平 III 后习俗水平或原则化水平	<p>特征是：根据公认的标准和普遍的道德原则区分特定社会制度的规则和习俗，根据规则和他人的期望辨别自己。</p> <p>第 5 阶段（社会契约、效用和个人权利阶段）：正确的行为就是拥护自己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和规则的行为，之所以拥护是因为它们是社会契约。</p> <p>第 6 阶段（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普遍的有关正义、人权和人格尊严的伦理原则判断是非。之所以支持法律和社会准则是因为它们来源于这些原则。进行正确行为的理由是个人的理性信念和对普遍的道德原则的有效性的认可。</p>

向研究对象提出了假定的道德两难情境 (moral dilemma)，在这种情境中，让研究对象选择究竟是根据公认的权威采取行动，还是根据人类福利需要采取行动。通过查明研究对象的反应来确定他们对惩罚、个人关系、良心之类问题的推理，并按照主导阶段或者与阶段顺序有关的道德成熟度得分，对研究对象的反应进行编码。早期的评分程序因其主观性而受到批评，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种标准化的、有令人满意的心理测量特性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客观的、自我控制的程序，这种程序与道德判断谈话有很高相关性，但是，这些程序依赖于对道德争论的理解和偏好，而不依赖于自然产生的结果，也不产生同样的结果。

科尔伯格的理论代表了向柏拉图和康德的古典理性主义的一种回归，这一理论强调理性的作用，而不强调外部经验的作用，把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假定道德标准是绝对的，认为道德标准与历史和文化因素无关。不过，尽管科尔伯格的理论已经成为主流心理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这一理论的观念和经验基础都仍然有争议。例如，人们认为，这一理论关于正义的普遍概念的观点，是道德中心的，特别是符合美国的理想的。社会学习理论家也对道德发展的阶段概念提出了挑战，认为道德推理的水平因道德推理的内容而异，人们有选择性地使用他们所理解的道德原则。但是，这一理论的效度已经获得了重要的支持。例

如,斯纳雷(J. R. Snarey, 1985)检查了45项跨文化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关于普遍道德原则不变接续(invariant progression)的主张。他发现,第1阶段到第4阶段的普遍性获得了重要的支持,但是资料显示,较高的阶段并不完全是道德中心的,它们需要更加多元的定义来适应非西方的文化。人们也认为,科尔伯格的理论和方法中存在性别偏见,它以牺牲在女性中占优势的“护幼道德”(ethic of care)为代价,强调有关正确和正当的男性化理想。人们并没有普遍发现道德判断中存在性别差异。农纳—温克勒(G. Nunner-Winkler, 1984)认为,女性对非任务性关系的偏好,与自我力量有关,而不是与道德定向有关。

二、道德发展与少年犯罪

科尔伯格所提出的理论,既不是一般的行为理论,也不是特殊的少年犯罪理论。不过,他认为道德推理是道德行为的极其重要的中介,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显然,人们会根据道德原则进行推理,但是并不按照道德原则去做,相反,亲社会行为也不一定是由这些道德原则引起的。道德发展理论承认,像注意、自我力量、移情唤起(empathy-arousal)或情境因素之类的非道德因素,会影响道德行为;道德推理对行为的效果,不仅表现在影响对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而且也影响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研究表明,道德决定也受道德价值偏好中的任务特征和个人差异的影响。因此,道德思维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道德发展与少年犯罪的关系同样是复杂的。少年犯罪并不是不道德行为的同义词;道德阶段与身份犯罪之间的关系,或者道德推理与道德推理削弱时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桑顿(D. Thornton, 1987a)通过观察发现,尽管较高道德阶段的推理不大可能赞同一种犯罪生涯,但是,在所有阶段都可以发现为违法行为辩解的现象,例如,违法行为不涉及惩罚(在第一阶段),违法行为会维护关系(在第三阶段),违法行为会保护基本人权(在第五阶段)。道德判断中缺乏性别差异的现象,也不支持在道德推理与少年犯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观点。詹宁斯(W. S. Jennings)等人认为(1983),这种关系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证明任何原因性主张是正当的;这种关系充其量提供了一种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前习俗阶段将义务局限于遵守任何规范,而后习俗水平的推理使个人远离少年犯罪,这是必要的。没有必要将其他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牵扯进来。

最简单的预测是,一般而言,少年犯罪人会表现出发展延缓(development delay)现象,他们的道德成熟度低于守法少年。迄今为止的若干研究普遍支持这一结论。典型的研究结论是,在年龄、性别、智商和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少年犯罪人在科尔伯格的道德判断谈话(MJI)中的道德成熟度得分低于守法少年;在很多研究中,许多少年犯罪人的道德判断水平相当于第二阶段的水平。阿巴思诺特(J. Arbutnot)、戈登(D. A. Gordon)和杰科维克(G. J. Jurkovic)注意到(1987),在19项使用科尔伯格的道德判断谈话(MJI)的有对照组的研究中,只有3项没有发现显著差异。进一步的支持来自一项超级分析(meta-analysis)¹⁶,这项超级分析的对象是15项有对照组的少年犯罪人研究。这项超级分析的对象包括了科尔伯格进行的

16. 超级分析(meta-analysis)是指对已经进行的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的再次分析。有人将这个术语译为“元分析”,从中文含义来讲是不恰当的,正好将中文的“元”这个词的意思反用了。——译注

未发表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了0.74的显著的平均效果量(mean effect size)。桑顿(D. Thornton, 1987a)也描述了未发表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道德阶段与教师对反社会行为的评定之间有联系。在使用道德争论而不是道德推理结果进行的若干研究中,报告了不太一致的结果。因此,少年犯罪人对习俗水平道德推理的理解,可能超过了他们进行这种推理并在实践中应用这种推理的能力。

一种理论假设认为,道德不成熟是少年犯罪人在家庭中缺少角色扮演机会的结果。一些研究支持这种假设。在那些父母鼓励参与活动和一起解决问题的儿童中,发现了比较成熟的道德推理现象,父母对这些儿童使用归纳性训练技术(inductive disciplinary techniques);缺乏这样的条件可能是少年犯罪人道德发展中的一种重要因素。例如,赫金斯(W. Hudgens)和普伦蒂斯(N. Prentice)发现(1973),少年犯罪人的母亲表现出的道德推理水平,明显低于守法少年的母亲。但是,别人的一项研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历了缺乏父亲或者替代父亲的少年犯罪人,尤其会表现出低的道德推理水平。

不过,认为少年犯罪人更有可能处于前习俗推理水平的结论,肯定是有道理的。原因是:第一,这仅仅限于官方少年犯罪人。研究表明,在道德阶段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没有发现确定的关系。例如,埃姆勒(N. Emler)、哈泽(N. Heather)和温顿(M. Winton)发现(1978),少年犯罪人表现出的原则水平推理能力比同样情况的少年犯罪要低,而在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测量中的得分比守法少年要高,但是,在对原则水平推理的测量与对少年犯罪的测量之间缺乏关系。楚基莫托(R. N. Tsujimoto)和纳迪(P. M. Nardi)发现(1978),尽管道德判断可以预测在自我报告式避免偷窃测量中的分数,但是,道德判断与更一般化的规则遵从量表不相关。

第二,少年犯罪人在道德推理方面的相似性要小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相似性。许多少年犯罪人(在一些情况下是大多数少年犯罪人)的道德推理处在习俗水平,累犯的道德推理水平往往更低。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的道德推理水平更有可能停留在前习俗水平,这种现象与前习俗水平所具有的自我中心、追求享乐的推理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证据证实,年长少年犯罪人的道德推理更有可能停留在第三阶段,道德成熟度低的少年犯罪人可能以较慢的速度发展,但是不会停滞在前习俗水平。

道德发展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似乎因犯罪类型的不同而有差别。桑顿(D. Thornton)和里德(R. L. Reid)注意到(1982),在熟虑性犯罪(prudent crime)中,前习俗水平的道德推理会认为犯罪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个人的利益在价值上超过了惩罚的危险;而在轻率性犯罪(imprudent crime)中,犯罪行为不大可能与道德阶段有联系。他们发现,和预测的相一致,进行熟虑性犯罪(抢劫、夜盗、盗窃)的累犯的道德推理更有可能处于前习俗水平,而对照组或进行轻率性犯罪(不涉及物质利益的伤害)的累犯很少数出现这种情况。在熟虑性犯罪人和轻率性犯罪人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差异。伦威克(S. Renwick)和埃姆勒(1984)也发现,在道德推理阶段与学生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道德推理的第四阶段与学生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而道德推理的第五阶段与学生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他们指出,这些阶段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相混淆。

尽管只有很少的犯罪人的道德推理处于前习俗水平,但是,表明许多犯罪人的道德推理达到习俗水平的证据,却使人对这样的主张产生怀疑,即道德发展水平较高可以阻止青

少年卷入少年犯罪。几位评论者指出,道德推理处于习俗水平的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可能与情境压力或者个人内心的困扰有关。例如,药物成瘾者的道德成熟度要高于其他少年犯罪人。杰科维克(G. J. Jurkovic, 1980)也注意到,对假定的道德两难情境的解决,不可能与少年犯罪人对问题情境的经历直接有关;少年犯罪人的行为表现不可能与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相称。其原因可能是情境压力,例如,某一机构的“道德气氛”,也可能是其他认知技能的缺陷。

现有的证据表明,道德发展与少年犯罪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前习俗水平的道德推理似乎在年轻少年犯罪人和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中最明显。仍然不清楚的是,道德推理怎样与和道德无关的人格相互作用、怎样与影响道德行为的情境因素相互作用。关于道德信念的内容,特别是道德信念的感情负荷(affective loading)怎样影响道德行为的问题,人们仍然有争议。一些人认为,价值观的内容可能与行为之间具有强烈的功能性联系。也有人提出,如果将道德判断与道德性格特性(moral character trait)、控制理论提出的依恋和奉献或者厌恶性条件反射历史联系起来的话,道德判断可能会有更大的预测力。古布斯(J. C. Gibbs)和施内尔(S. V. Schnell)(1985)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科尔伯格提出的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观点,应当是更加社会性、感情性的理论的补充,而不是对社会道德发展的恰当解释。一些其他的观点将在第八章讨论。

第五节 整合理论

人们已经证实,没有一种传统的犯罪学理论对犯罪性或犯罪行为具有超过中等水平的预测力;如果将这些理论中更加合理的成分整合起来的话,可能会具有更大的预测力。例如,艾克斯(R. Akers, 1977, 1990)用强化的原理解释变成越轨者的过程。失范理论、亚文化理论和冲突理论区分了决定强化模式和强化程式的社会条件,而控制理论阐述了发展过程的后果。标定理论反映了与后来的越轨行为有关的不同强化。

埃里奥特(D. S. Elliott)、休津加(D. Huizinga)和艾吉顿(S. S. Ageton)在1985年提出了一种整合理论,将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整合起来。他们认为,少年犯罪是在积极动机的推动下发生的,在学校中失败的经历、与越轨同伴的联系(见第七章),都会引起这类动机。这种整合理论认为,个人发展的顺序过程,依赖于在先后相继的社会化机构中的经历,因此,这种整合理论超过了单一成分的理论。不过,科尔文(M. Colvin)和波利(J. Pauly)认为(1983),这样的分析忽略了冲突理论和激进理论所强调的宏观社会结构。他们提出,在家庭、学校中和与同辈朋友之间进行的社会化经历的形式和内容,是由更加广泛的阶级结构组成的控制系统决定的。因此,在工作场所中受权威控制的经历,决定个人与传统秩序的联系性质,这种联系可能是消极的(被疏远),可能是中间性的(进行计算),也可能是积极的(符合道德)。这种控制关系又会在儿童养育中得到重复,在学校中被老师加以选择性地强化,也会被具有类似社会化经历的同辈朋友所强化。

尽管这些社会学整合吸收了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但是,它们符合单向环境决定论的传统,没有注意个别差异。不过,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整合以威尔逊(J. Q. Wilson)和赫恩斯坦(R. S. Herrnstein)为代表,他们在1985年描述了一种综合性折衷理论(general eclectic theory),将操作条件反射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但是也吸收了经典条件反

射、平等理论和艾森克、科尔伯格提出的个别差异因素。他们的理论的核心是，把犯罪性看成是实施“掠夺性犯罪”的一种倾向。但是，他们的分析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把犯罪行为看成是人们面临诱惑或者犯罪机会时进行选择的结果。犯罪的选择取决于对犯罪行为的强化和惩罚后果与对守法行为的类似后果之间的比率。犯罪行为的纯奖赏包括物质利益和心理后果，例如，赞赏、情绪满足、恢复平等；犯罪行为招致的损失包括“良心痛苦”、谴责、报复。守法行为的价值在于未来，包括不受法律惩罚所带来的利益、避免社会声誉的损失、避免遭受谴责。因此，在考虑未来后果的能力方面存在的个别差异是很重要的，这些差异可能具有生物根源。威尔逊和赫恩斯坦接受艾森克关于良心是一种条件反射的观点，但是认为，当机会很有利或者就在眼前时，后果就更多地由个人对危险的计算来决定，这种计算是操作条件反射的一种功能。冲动性和对时间的轻视，会使个人缺乏操作条件反射学习的能力。此外，个人对犯罪行为和守法行为的价值的不同看法，是由个人在移情、正义这些情操方面存在的差异引起的。不过，价值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为强化物的总供应量越大，小额奖赏对犯罪行为的效果就越小。

人们认为，这种理论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是一致的，不过，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是不完善的。因此，紧张理论关注对守法行为的强化物（例如，工作机会）的可得性，但是，忽略了其他因素，例如，制裁。控制理论强调与守法行为有关的强化物，但是忽略了时间观念或冲动性方面的个别差异，而这些个别差异的作用可能大于有关强化物。亚文化理论也强调社会强化物的作用，但是忽略了人们在接受越轨群体和正常群体影响方面的个别差异。

作为一种心理学模式，这种理论没有尝试将认知中介（例如，预期后果、对公平的评价）结合到一种非认知性的操作条件反射模式中。不过，尽管把“奖赏”与“强化物”交替使用，但是，这一理论仍然重视奖赏的本来含义，而强化物的操作性含义则是指任何能够加强行为的后果。因此，没有清楚地阐述那些对犯罪具有强化作用的后果的种类。吉布斯（J. P. Gibbs）把这种理论看成是对社会犯罪学（sociological criminology）的一种“挑战”，科恩（L. E. Cohen）和麦卡勒克（R. Machalek）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1989），尽管个人是进行观察的适当单位，但是，进行分析的适当单位却是**行为策略**（behavioral strategy），行为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进化和人口中其他策略的分布。因此，选择侵占别人资源的策略，取决于其他人所采取的选择的社会动力学，就像选择侵占别人资源的策略取决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差异一样。

最折衷的整合是法林顿（D. P. Farrington, 1990, 1992）的整合。他在解释剑桥研究中获得的资料时，吸收了特拉斯勒（G. B. Trasler）的社会学习理论、亚文化理论、机会理论、控制理论、不同交往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标定理论。反社会倾向取决于像低唤醒、冲动性、缺乏移情、缺乏良心这样的人格因素，也取决于内化的信念，还取决于追求物质利益、追求在密友中的地位、追求刺激的动机。这些信念之所以在工人阶级的儿童中得到增强，是因为对短期目标怀有阶级偏见；而亲社会信念的相对缺乏，是由缺乏监督、严厉而反复无常的惩罚、对父母和同辈朋友的模仿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儿童也可能选择非法的或受到谴责的方法来满足这些动机，因为他们遭受到很大的学业失败，职业地位也很低，而这些现象又是缺乏刺激的环境导致的低智力的一种结果。是否实施犯罪取决于对代价和收益的估计，也受社会强化物以及像冲动性之类的个人特征的影响。对于犯罪人来说，消极的标定使得他们更难用合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成功的犯罪活动又会强化他们的犯罪

信念。犯罪行为的开始，尤其与贫穷、低智力、儿童养育差有关，而同辈朋友、越轨家庭成员可能会使犯罪生涯持续下去。犯罪生涯的停止受结婚、稳定的职业、迁移出犯罪区等因素的影响。

这样的折衷整合观点把行为人看成是多种原因的被动接受者，大大忽略了各种有关人类行为性质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是不同理论的基础。例如，控制理论假设，人具有享乐的本性，而亚文化理论否认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假设社会遵从是一种自然秩序。同样，科尔伯格的理性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与艾森克和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相结合。因此，将不同理论进行整合的尝试，还不能证明比传统理论优越，因为缺乏一种前后一致的“人的模式”。

第六章 反社会行为的生物因素

第一节 引言

人类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但是，许多犯罪学家坚持认为犯罪仅仅与生物禀赋有关。这种看法不仅鼓励了那种认为犯罪人存在先天缺陷的观点，而且也将研究的注意力从犯因性社会条件转移开来。这种看法似乎包含着极端性的犯罪控制方法，包括遗传工程、精神外科手术。因此，人们往往认为，生物学观点受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社会问题医学化和右翼政治观念的消极影响。

这样的批评往往是以曲解为基础的，但是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把遗传对犯罪的影响看成是“遗传障碍”的研究人员，几乎没有为阐明问题做出贡献，他们把不遵从行为等同于缺陷或者疾病。一些神经病学家根据很少的临床现象，夸大脑病理现象在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学研究者的政治性观点不可能是同质的，也不具有科学信念的效度。不过，很少有人赞同片面的生物决定论。朗格(J. S. Lange)在其著作《命运的犯罪》(1931)中，描述了对犯罪性进行的最早的孪生子研究，他的研究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这样一种主张的例子，即遗传决定什么人会变成犯罪人。不过，朗格仅仅肯定“个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倾向，个人生长的周边环境，这些都是必要的，这些都是命运。”晚近的研究人员同样赞同一种生物社会互动论，认为“天性”与“教养”是相互依赖的。例如，活动水平的气质差异、社会反应性、情绪性都是在出生后不久出现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的效果依赖于机会和不同社会环境的作用。因此，社会化并不是一种儿童消极地接受父母影响的单向过程。相反，保育员(caretaker)的行为部分地也是由孩子的特征决定的¹。

也必须强调，尽管生物学对犯罪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相联系，但是，这类研究并不必然属于忽视心理学或社会分析的还原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分析有不同的水平，每种分析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含义。例如，某种行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是“犯罪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但是，这样的翻译是有局限性的。不过，尽管可以把行为看成是生理系统的一种应急功能(emergent function)，但是，不能完全用生理系统来描述行为，因为脑活动提供了行为的原因(发生)机制，制约着行为的方式。所以，生物过程是一种像社会过程一样的犯罪原因，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片面的社会决定论。

生物过程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和间接的，并且对各种越轨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现有的证据足以显示，犯罪学不能忽视生物学分析水平的价值。一些

1. 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保育员(caretaker)应当包括父母和其他看护，照料孩子的人，而不仅仅是指幼儿园的保育员。——译注

研究已经探讨了临床人口中神经系统的结构异常对其反社会行为可能具有的作用²，但是，心理学家更感兴趣的是正常的生物差别怎样对犯罪性起作用，因为犯罪性是一种不正常的倾向。正常的生物差别可能反映了先天的、生来的、体质水平的影响。在这里，“先天的”（innate）是指从父母身上获得的遗传特征以及可能的突变效果；“生来的”（congenital）是指在出生时就具有的成分，包括宫内环境和围产期环境³；“体质”（constitution）是指个人从基因型—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表现型特征⁴。人们假设，体质是比较固定的，不仅包括身体形态或体格，而且也包括生理和内分泌功能。所以，本章讨论这些水平上的犯罪行为的相关因素。

第二节 遗传学与犯罪性

通常认为，基因（gene）确立了行为的范围（limits），而环境决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发展。行为遗传学家通过“遗传力”（heritability）估计确定遗传作用大小的工作，就反映了这种观点。不过，这种观点承认独立的原因，并且有理由怀疑：基因与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依存的互动，是否允许这样一种分类。由于更重要的似乎是理解基因可能怎样对犯罪性起作用，而不是基因对犯罪性起多大作用，因此，将不提及这样的估计。

有关遗传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的一项研究假设，不存在特殊的犯罪基因，复杂的人类行为也不是“预先安排的”。基因型通过提供基本的行为成分而提供了发展的最初方向，这些行为成分通过学习而吸收到更大的适应单位（adaptive unit）中，他们通过酶、激素和神经元这些先后相继的中介来影响表现型，并且通过与学习和气质有关的稳定的神经特性，对犯罪性产生作用。不过，一些进化理论提出，基因影响犯罪行为的动机。例如，埃利斯（L. Ellis, 1988）吸收了生殖策略中的“r/K 选择”连续体学说⁵，认为这种选择可以通过资源竞争而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物种生存。在“R”选择的情况下，物种繁殖了大量的后代，怀孕和照料年幼者的时间很少；而在“K”选择的情况下，物种繁殖的后代很少，因而可以将大量时间用于养育后代的活动。人类属于K选择的情况，不过人们之间存在个别差异。埃利斯提出，犯罪被害（criminal victimization）反映了R选择。他认为，这一观点可以解释关于有被害人的犯罪（victimful criminality）与下列因素之间有联系的比较一致的研究结果：大家庭、早熟与低的出生体重、早年的性活动、男女乱交（promiscuity）、破裂家庭、

-
2. 临床人口（clinical population）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包括受到临床观察、诊断、治疗的病人和其他人，其中当然也有犯罪人。——译注
 3. 围产期环境（perinatal environment）是指怀孕后期到小儿出生后一定时期的环境。目前围产期的计算方法有3种：（1）自孕期28周至出生后1周；（2）自孕期28周至出生后4周；（3）自孕期20周至出生后4周。——译注
 4. 基因型（genotype）又译为“遗传型”，是指某种生物的全部遗传组成的总称；表现型（phenotype）是指以基因型为基础的可见的形态和行为特征。——译注
 5. r/K 选择（r/K selection）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对付环境的两种自然选择策略。R 选择是指在气候不稳定、天灾频繁的环境（例如，寒带或干旱地区）中，环境促使动物种群处于扩展增大过程的现象。K 选择是指在气候稳定、天灾稀少的环境（例如，热带雨林）中，动物种群数量达到或者接近环境负载量水平的现象。——译注

儿童忽视与虐待,寿命短。埃利斯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是R选择的特征。

不存在从基因型到表现型之间的单一通路。斯卡(S. Scarr)和麦卡特尼(K. McCartney)提出(1983),基因型对表现型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产生的,可以通过基因与父母提供的环境的结合,也可以通过对其他人和生物上有差别的个人的不同反应,还可以通过那些个人对环境的不同选择。对犯罪性的遗传学研究试图通过几种研究设计,包括家庭研究、孪生子研究、养子女研究、染色体研究、区分先天因素对这些复杂通路的影响。

一、家庭研究

家庭研究或者家系研究(pedigree study)比较反社会行为在犯罪人和守法者的血缘亲属中的分布。一项一致的研究结果是,犯罪父母很有可能有犯罪子女(见第七章)。例如,在剑桥研究中,有犯罪父亲的少年变成少年犯罪人的数量,是那些没有犯罪父亲的少年的2倍。对犯罪少女的家庭研究也发现,她们的越轨亲属要多于其他少女,她们的家庭中存在的病态现象也多于反社会少年的家庭。但是,家庭因素在犯罪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男女是同样重要的。不过,家庭研究不可能清楚地区分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

二、孪生子研究⁶

同卵孪生子(MZ)具有同样的基因型⁷,而异卵孪生子(DZ)之间仅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⁸,他们之间就像其他同胞兄弟姐妹一样。因此,孪生子研究是以这样的逻辑为基础的,即在养育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同性别的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之间的表现型差异,反映了遗传影响。这种关联差异通常通过双方都进行犯罪行为的犯罪孪生子的百分比来表示⁹。

已经报告了大约12项涉及不同数量研究对象的孪生子研究。朗格(J. S. Lange, 1931)通过一些渠道发现和研究了13对同卵孪生子和17对男性异卵孪生子,结果发现77%的同卵孪生子双方都因为犯罪而被监禁,而仅有12%的异卵孪生子之间存在这种一致性。其他的孪生子研究也一致地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不过所发现的犯罪一致率的数量有所不同。在早期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同卵孪生子的犯罪历史一致率平均为60%,异卵孪生子的犯罪历史一致率平均为30%。戈茨曼(I. I. Gottesman)、凯里(G. Carey)和汉森(D. R. Hanson)注意到(1983),只有在成年孪生子中差异才是显著的。在对少年进行的6项研究中,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的一致率分别为87%和72%,这表明遗传对少年犯罪的影响极小。不过,罗(D. Rowe, 1983)报告了对256对中学生孪生子的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同卵孪生子中的少年犯罪量度的相关性分别为男性0.66、女性为0.47,

6. 孪生子研究(twin study)又译为“双生子研究”、“双胞胎研究”等。——译注

7. 同卵孪生子的英文是identical twins或者monozygotic twins,通常使用缩写MZ来表示。识别同卵孪生子的主要指标是:性别相同、血型相同、触珠蛋白(一种血清蛋白质)型相同。如果3项指标中有一项不同,就不是同卵孪生子。一般认为,同卵孪生子之间的遗传素质相同或者极其接近。当然,同卵孪生子之间在外形上也十分相似。——译注

8. 异卵孪生子的英文是fraternal twins或者dizygotic twins,通常使用缩写DZ来表示。异卵孪生子之间的遗传素质和身体外形,只有普通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译注

9. 双方都进行同样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孪生子在孪生子总数中的比率,称为“孪生子一致率”(pairwise concordance)。——译注

都高于异卵孪生子中的少年犯罪量度之间的相关性, 后者的相关性分别为男性 0.48、女性 0.47。尽管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之间的犯罪一致率差异, 肯定了遗传对犯罪的影响, 而且所有的相关性都是显著的, 但是这些研究也表明, 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都受到环境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使用了经过选择的孪生子作为研究对象, 而且使用了不可靠的孪生子鉴别方法。晚近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的孪生子研究中, 发现了更低的一致率, 在这些研究中使用了从国家档案局发现的、未经选择的孪生子作为研究对象, 并且用血液鉴定法鉴别孪生子。克里斯滕森 (K. O. Christiansen, 1977b) 研究了从丹麦发现的所有 3586 对孪生子。在成为犯罪人的男性孪生子中, 同卵孪生子的一致率为 35%, 异卵孪生子的一致率为 13%; 而在成为犯罪人的女性孪生子中, 同卵孪生子的一致率为 21%, 异卵孪生子的一致率为 8%。因此, 在所有孪生子中, 绝对的不一致率 (discordance rate) 是较高的, 这表明不存在重要的遗传效果。不过, 达尔加德 (O. S. Dalgaard) 和克林莱恩 (E. Kringlen) 在挪威进行的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 (1976), 在男性孪生子中, 同卵孪生子的一致率仅为 26%, 异卵孪生子的一致率为 15%。这个差异并不显著, 作者也认为, 遗传对犯罪的作用是“不存在的”。

但是, 所有的研究都发现, 在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之间的差异是相似的, 而挪威和丹麦的研究结果之间的这种差异仍然是无法解释的。达尔加德和克林莱恩 (1976) 认为, 同卵孪生子在表现型方面的相似性表明他们受到了父母的更加相似的对待; 在对一起抚养的孪生子的研究中, 仍然可能会混淆这一点。然而, 斯卡 (S. Scarr) 和卡特-萨尔茨曼 (L. Carter-Saltzman) 发现 (1979), 尽管有高达 40% 的父母和孪生子看错了接合性 (zygosity)¹⁰, 但是, 心理测量中发现的孪生子之间在一致率方面的相似性, 与实际的接合性的关系比认识到的接合性更密切。因此, 同卵孪生子在环境相似性方面的更多的经历, 可能是他们的遗传相似性的一种效果 (effect)。

可以得到的孪生子数据肯定遗传对犯罪性有一些影响, 但是在缺乏分开养育的孪生子数据的情况下, 这个观点是无说服力的。近来的研究表明, 在智力、人格、兴趣和社会态度等许多量度上, 分开养育的孪生子和一起养育的孪生子同样相似。

三、养子女研究

出生后不久被领养的儿童与生父母的相似性超过与养父母的相似性, 这是支持遗传影响的一种强有力的假定证据。有关养子女犯罪性的研究, 使用了两种设计: 第一种研究设计是, 发现放弃自己子女而让别人收养的犯罪父母, 将他们的子女与守法养父母所收养的子女相比较。例如, 克劳 (R. R. Crowe, 1972) 发现, 在被监禁女犯的 52 名养子女或先证者 (proband) 中¹¹, 有 8 人有过逮捕记录, 而作为对照组的 52 名养子女中, 只有 2 人有过逮捕记录; 这两类养子女因为交通犯罪而被逮捕的数量分别是 19 人和 8 人。6 名先证者 (而不是对照组) 也符合反社会人格的标准。卡多莱特 (R. J. Cadoret, 1978) 也发现, 在

10. 接合性 (zygosity) 主要是指精子和卵子融合形成新细胞的特性。融合后形成的新细胞称为受精卵。——译注

11. 先证者 (proband) 又译为“溯源者”、“基人”, 在医学中是指一个家系中最先发现患有某种遗传性疾病的人。在对犯罪行为进行的家系研究中, 先证者是指作为研究起点或基础的研究对象。——译注

生父母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者的18名养子女中,4人成年后也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者,而对照组的25名养子女中,没有一人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者。

第二种研究设计与交叉寄养(cross-fostering)相似,并以相同的养子女样本开始。将犯罪养子女和守法养子女与生父母和养父母的犯罪性相比较。例如,在丹麦对143名犯罪养子女和守法养子女进行的研究中(1975),哈钦斯(B. Hutchings)和梅德尼克(S. A. Mednick)发现,当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犯罪人时,36.2%的儿子变成了犯罪人;当只有生父为犯罪人时,21.4%的儿子变成了犯罪人;当只有养父为犯罪人时,11.5%的儿子变成了犯罪人;当生父和养父都不是犯罪人时,只有10.5%的儿子变成了犯罪人。这些数据与遗传对犯罪有影响的观点相一致,也与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相一致。但是,后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进行的研究指出,犯罪类型与酗酒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博曼(M. Bohman)、克洛宁格(C. R. Cloninger)、西格瓦德森(S. Sigvardsson)和冯诺林(A. von Knorring)发现(1982),生父是犯罪人但不酗酒的养子有明显的犯罪性,但是同样不酗酒;生父和养子的犯罪主要都是一些轻微犯罪和非暴力性犯罪。相反,酗酒者的犯罪行为更有可能是暴力性犯罪,酗酒者的犯罪行为与生父的酗酒有相关性。这表明,遗传对轻微犯罪有影响,但对暴力犯罪没有影响。不过,对于一些犯罪人来讲,暴力行为与酗酒有关,酗酒本身可能受遗传的影响。

梅德尼克等人进行的一项更加深入的养子女研究(1984),调查了14427名丹麦的养子女,其中有981名男性和212名女性,这些人都有过一次或者一次以上的定罪记录。当生父母和养父母(父亲或者母亲)都是犯罪人时,24.5%的养子女变成了犯罪人;当只有生父母是犯罪人时,只有20.0%的养子女变成了犯罪人;当只有养父母是犯罪人时,只有14.7%的养子女变成了犯罪人;当生父母和养父母都不是犯罪人时,只有13.5%的养子女变成了犯罪人。这表明,生父母的影响效果比养父母的影响效果要大。尽管在生父母的累犯行为与其子女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这种正相关只存在于财产犯罪中,而在暴力犯罪中不存在这种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博曼等人的研究结果(1982)相一致。不过,生父母实施的犯罪的数量的影响效果要大于犯罪的类型,这表明一般性素质具有遗传性,而特别素质没有遗传性。

在这些研究中,只有少数有犯罪父母的养子女变成了犯罪人,这表明在一定环境中,遗传对犯罪有中等程度的(modest)影响。不过,收养前的影响,包括围产期并发症(perinatal complication),是由母亲的生活条件决定的。斯托特(D. Stott, 1982)注意到,怀孕期间的压力、胎儿期照料较差、早熟都会增加儿童残疾的危险性,例如,生理缺陷、发育迟缓、行为障碍。在低收入群体中,这样的压力最有可能发生,非婚生子女的犯罪母亲最有可能来自低收入群体。斯托特指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养子女的犯罪性与其生父母的犯罪性之间的关系。梅德尼克等人的观察(1984)支持这种可能性,梅德尼克等人发现,犯罪生母的影响力大于犯罪生父的影响力。

不过,围产期障碍(perinatal difficulty)可能仅仅对比较严重的犯罪人是重要的。例如,刘易斯(D. O. Lewis)、沙诺克(S. S. Shanok)和巴拉(D. A. Balla)发现(1979),在矫正机构的少年犯罪人中,37%的人有围产期障碍史,一小组暴力少年犯罪人中的大多数人有围产期障碍史;而不监禁在矫正机构的少年犯罪人中,只有8%的人有围产期障碍史。梅德尼克和坎德尔(E. Kandel)也报告说(1988),可以间接表明围产期问题的轻微生理异常,与财产犯罪无关;但是当个人生长在不稳定家庭时,轻微生理异常与暴力犯罪有关。应该注意的是,围产期环境对有犯罪生父母的养子女的严重犯罪,可

能是有影响的。

四、染色体异常¹²

23对染色体的正常补体的变异¹³，通常是从细胞分裂误差中产生的，这种变化代表了先天就有的遗传因素，但是并不代表遗传获得的遗传因素。这些少见的异常，是由染色体核型(karyotype)的形状决定的¹⁴，它们与反社会行为有关。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偏离男性染色体(46, XY)和女性染色体(46, XX)正常形状的性染色体模式。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表现为47, XYY补体的男性和47, XXY形状的男性，有后一种染色体形状的男性的特征，被称为“克兰费尔特综合征”(Klinefelter's syndrome)。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XYY核型在智力落后者中比较常见，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也显示，监狱犯人和精神障碍犯罪人中XYY男性的比率较高。例如，普赖斯(W. H. Price)等人发现(1966)，在英国苏格兰国立医院的315名患者中，有9名是XYY男性。这家医院是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犯罪人的一个特别医院，但是，在随机抽样的对照组中没有发现XYY男性。大多数XYY男性身材较高，智力落后，有人格障碍。不过，与对照组患者的进一步对比却发现了相似的智力，只有在人格测验中发现了临界差异(marginal difference)。后来的研究证实，XYY核型在矫正机构的反社会人群中，特别是在精神障碍犯罪人中，有较高的流行率；但是也发现，在普通人群中大约有0.1%的发生率。

最初的研究似乎是为了说明犯罪行为的遗传决定性，而且也用正常的Y染色体对犯罪的影响来解释最初的研究。研究表明，犯罪中的性别差异反映了由Y染色体决定的男性特质；具有多余的Y染色体增强了男性特质，密切了男性特质与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然而，具有额外的X染色体也与犯罪性有关，XXY男性的特征可以从矫正机构的少数样本中推测出来。在一项避免了抽样偏向的研究中¹⁵，威特金(H. A. Witkin)等人对1944~1947年间出生在哥本哈根的4591名男性中90%的人进行染色体核型分类(1976)，结果发现，这些人的身高超过184厘米，从中发现了12名XYY男性和16名XXY男性。在XYY男性中，41.7%的人有犯罪纪录；在XXY男性中，18.8%的人有犯罪纪录；在其余的人中，9.3%的人有犯罪纪录。这些数据证实多余的Y与犯罪性有关；XYY男性和XXY男性的犯罪主要是轻微犯罪和非暴力犯罪¹⁶。由于XYY男性和XXY男性智力都比较低，XYY男性有异常

12. 染色体(chromosome)是指细胞有丝分裂时出现的、易被碱性染料感染着色的丝状或棒状小体。它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有关性决定的染色体为性染色体，其余为常染色体。人的体细胞有46个染色体，其中44个(前22对)是常染色体，2个(第23对)是性染色体。正常男性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正常女性有2个X染色体。——译注

13. 补体(complement)是人和动物新鲜血清中的一种非特异性物质。——译注

14. 染色体核型(karyotype)又称为“染色体组型”，是指细胞分裂中期染色体按其特性进行的系统排列并分组编号。各种生物染色体核型是各不相同的。——译注

15. 抽样偏向(sampling bias)是指在选择研究对象中存在的偏向，例如，从监狱犯人、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中选择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就具有抽样偏向。——译注

16. 在这一句话的原文中，作者使用了the former(前者)一词，但是似乎指代不明，看不出“前者”是指XYY男性，还是XXY男性，因此，译者用“前者”指代这两种男性，以便与“后者”(即文中所说的“其余的人”)。——译注

的脑电图。所以,作者提出,染色体异常通过遗传障碍(genetic disorganization)和发育不足(developmental failure),对犯罪性产生非特异性作用。对这些样本的进一步研究显示,尽管XYY男性的血浆睾酮水平很高¹⁷,但是,这不是引起犯罪行为的介质。

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方面是46,XY男性的Y染色体的长度。一些研究发现,在犯罪人中,这个Y染色体的长度可能更长。例如,卡恩(J. Kahn)等人发现(1976),尽管染色体长度不能区分工厂工人和少年犯罪人,但是,具有较长的Y染色体的对照组成员更有可能在以前有犯罪纪录。这种在此之后的研究结果不具有说服力,其他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果。多拉斯(E. Dorus, 1978)注意到,尽管证据表明了控制睾丸、精子发生和身材的Y染色体的基因位点¹⁸,但是,Y染色体对行为的作用可能是很小的。原来人们推测,XYY模式创造了一种反社会的“超男性”(supermale),但是无法证实这种推测,这导致了人们对这种罕见现象的兴趣的下降。

第三节 体质研究

越轨心理特性与外部生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因为与颅相学和观相术有联系而受到人们的嘲笑。颅相学和观相术对龙勃罗梭(C. Lombroso)的“犯罪人类学”产生过影响。龙勃罗梭在早期认为,犯罪人代表了一种遗传学上的原始的、低劣的人种,他们有很多的生理异常,例如,颅骨异常,耳朵异常,脸部异常,这些异常是龙勃罗梭通过尸体检验和人类学测量发现的。龙勃罗梭的观察结果因为统计学方法不完善而受到批评,但是,后来的研究证实,身体外貌(physical appearance)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阿格纽(R. Agnew, 1984)发现,在那些被认为外貌缺乏吸引力的学龄儿童中,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更多。布尔(R. Bull, 1982)也指出,警察和一般人具有一些关于犯罪人“类型”的刻板观念,从被逮捕的犯罪人的外貌来判断,这些刻板观念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不过,这种联系可能反映了一种自我实现语言,即人们会对那些面部没有吸引力的人做出消极的判断,而这些人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体型的研究遵循了一种试图将体格与气质和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欧洲传统。谢尔登(W. H. Sheldon, 1949)用胚胎学的3个概念评价体型¹⁹:(1)内胚层体型(endomorphy),特征是肥胖、滚圆;(2)中胚层体型(mesomorphy),特征是肌肉发达、呈三角形;(3)外胚层体型(ectomorphy),特征是瘦长。谢尔登也提出了与3种体型相对应的气质类型:(1)内脏优势型(viscerotonia),特征是放松、追求享乐;(2)身体优势型(somatotonia),特征是精力充沛、喜欢冒险;(3)头脑优势型(cerebrotonia),特征是自我克制、孤独。谢尔登使用1到7的等级从照片上评定这3种体型,他发现,对200名大学生的进行评定的平均数是3.2,3.8和3.4,每种体型的标准差为1.2;相匹配的200名男性少年犯罪人的体型是3.5-4.6-2.7,从中可以看出,在少年犯罪人的体型中,中胚层体型多而外胚层体型少。他

17. 睾酮(testosterone)又称为“睾丸素”,是睾丸所分泌的雄激素,能促进人和动物雄性器官和副性特征的发育和成熟,并维持其正常。——译注

18. 基因位点(gene loci)是遗传学术语,指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特殊位置。——译注

19. 关于谢尔登的体型与犯罪研究,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2~285页。

根据偏常或“失望”(disappointingness)标准,例如,精神缺陷、犯罪、正常,将少年犯罪人分为几种类型。被分入犯罪组的人有极端的体型(3.4-5.4-1.8)。哈特尔(E. M. Hartl)、莫尼里(E. P. Monnelly)和埃尔德金(R. Elderkin)对谢尔登研究过的少年犯罪人进行了一项30年的追踪研究,在研究中使用了一种类似的分类,结果发现,最严重的犯罪成年人的体型是3.5-5.0-2.3。除了犯罪人中的中胚层体型多于“正常”人之外,犯罪人在男性形(andromorphy)评定中的得分也很高,男性形是衡量第二性征中的男子气的一种量度。

谢尔登的研究受到了萨瑟兰(E. H. Sutherland)、科蒂斯(J. B. Cortés)和加蒂(F. M. Gatti)的批评。这些人的批评认为,谢尔登的“少年犯罪人”具有选择性,谢尔登的体型分类程序缺乏可靠性,谢尔登的少年犯罪人类型具有任意性。实际上,谢尔登的“犯罪人”是根据其他形式的“失望”的缺乏,而不是仅仅根据少年犯罪历史区分出来的。萨瑟兰(1951)用少年犯罪的法律标准对谢尔登的研究对象做了重新分类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多数少年犯罪人在体型上与守法少年没有差别。不过,科蒂斯和加蒂(1972)指出,这项重新分析忽略了少年犯罪与中胚层体型之间的联系。在他们自己对100名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进行的研究中,他们发现,57%的少年犯罪人是中胚层体型,16%是外胚层体型,而对照组中具有中胚层体型和外胚层体型的人分别为19%和33%。吉本斯(T. C. N. Gibbens, 1963)也发现,在56名英国少年犯罪人中,内胚层性的中胚层体型占优势。埃普斯(P. Epps)和帕内尔(R. W. Parnell)发现(1952),英国的少女犯罪人比大学生更加男子气,但是她们的体型更矮、更重。麦坎德利斯(B. R. McCandless)、珀森斯(W. S. Persons)和罗伯茨(A. Roberts)发现(1972),中胚层体型与矫正机构内男性的官方少年犯罪或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没有联系;在剑桥研究中,也没有发现少年犯罪人有什么体格特征。

这些研究中都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例如,体型分类的可靠性,少年犯罪人或对照组缺乏代表性。艾森克(H. J. Eysenck)和古汀逊(G. H. Gudjonsson)相信(1989),用身体的高度和宽度评定体型更恰当。现有的数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少年犯罪人在体型上肌肉发达、身体健壮。但是,中胚层体型既不是少年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少年犯罪的充分条件,体型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仍然不清楚。体型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以有关的气质因素为中介的,例如,自信水平、活动水平。因为科蒂斯和加蒂(1972)发现,中胚层体型者把自己描述成明显好动的、支配性的和攻击性的;而外胚层体型者把自己描述成回避社交的,这些都支持谢尔登的假设。中胚层体型和男性形的结合也可能反映了较高的睾酮水平和更强的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同龄群体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强化强硬(toughness),而刑事司法人员也会对强硬的外貌做出更加消极的反应。

第四节 心理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

遗传效果会在神经系统的稳定特性中得到表现,因此,人们一直在大脑皮层活动和自主活动的外围纪录或者生物化学化验中寻找犯罪性的相关因素。尽管早期的研究是描述性的和非理论性的,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艾森克、特拉斯勒(G. B. Trasler)和格雷(J. A. Gray)等人的理论(见第5章),这些理论将神经系统的功能与人

格、动机、学习联系起来,近来又将神经系统与信息加工联系起来。人们已经提出,作为攻击性、寻求刺激、消极回避学习、条件反射能力和情绪反应性中介的生理机制,可能与反社会倾向有重要的联系。因此,研究中特别注意了对病态人格的研究。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类研究主要是相关性研究,而心理生理差别则是对实验条件的心理反应的一种后果,也是稳定的生理差异的一种后果。例如,对“应激源”的自主反应²⁰,可能就是更多地取决于对事件的认知评价,而不太取决于个人自主神经系统的内在特性。人们之间的生理差异也可能反映了对不同环境历史以及遗传影响的适应。

一、皮层脑电相关因素

从头皮电极纪录的脑电图²¹,是一种由许多节律(rhythm)和瞬时变化(transient change)组成的复杂波形,它反映了大脑皮层神经群的活动。脑电图的成分通常用振幅和频率来描述,在传统上把节律分为4个频带:(1) δ 波,频率为每秒0.5~3次;(2) θ 波,频率为每秒4~7次;(3) α 波,频率为每秒8~13次;(4) β 波,频率为每秒14~30次。临床工作人员的兴趣集中在睡眠或者受到刺激时波形的异常变化方面,这种异常变化可以通过肉眼观察确定,但是,有关“异常”的概念却具有任意性。“异常”包括异常的灶性峰电位发放(focal spike discharge),但是,更多的是指中颞区或后颞区的弥散性慢波活动或 θ 波活动过度。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将这些变化解释为发育迟滞、与情绪表达有关的边缘系统核(limbic system nuclei)异常、大脑皮层唤醒水平异常,因为从放松到警觉状态的变化通常伴随着 α 波节律的振幅减小和频率增大。不过,它们的功能作用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并没有与大脑深层部位的结构异常完全一致。在正常成年人中,有脑电图异常的大约占15%;在年幼儿童中,有脑电图异常的占25%以上。脑电图异常的基本的振幅和频率特征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被认为是异常的现象,往往可能代表了对正常的数量上的偏离,而不代表对正常的性质上的偏离。

有关脑电图与行为障碍相关性的大量文献表明,攻击性个人和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具有频率过快的异常现象。例如,在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战斗部队进行的一项早期研究中(1942),希尔(D. Hill)和沃特森(D. Watterson)发现,在攻击型精神病态者中,65%的人有脑电图异常;在不适当型精神病态者中,32%的人有脑电图异常;在神经过敏者中,26%的人有脑电图异常;在由普通人组成的对照组中,15%的人有脑电图异常。不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不一致的结果,而且,文献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对脑电图的分析和主观分类不正确,实验人员有偏见,没有适当控制年龄、记录条件等因素。暂时性情境影响也可以解释一些研究结果,因为在单调的条件下, α 波或者 θ 波频带的慢波活动会随着厌烦和困倦而增加。例如,金德鲁(P. Gendreau)等人证实(1972),对犯人的单独监禁会引起脑电图变慢。

使用可以重复的精神病态测量方法和脑电图定量方法的研究,对反社会人格中异常的程度提出了怀疑。辛多克(K. Syndulko, 1975)等人没有发现在精神病态性门诊病人和没

20. 应激源(stressor)是指引起应激状态的刺激因素。——译注

21.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是高等脊椎动物大脑皮层的神经组织经常出现的、持续的、自发电性的电位变化。——译注

有患精神病态的门诊病人中存在 α 波或者 θ 波活动的差异。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79b)也发现,精神病态性精神障碍犯罪人和非精神病态性精神障碍犯罪人在这些方面没有差异。不过,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休息时,继发性精神病态者的 θ 波活动多于原发性精神病态者,而其 α 波要慢于原发性精神病态者。霍华德(R. C. Howard, 1984)也发现,在继发性精神病态者中有很多的慢波活动。哈珀(T. J. Harpur)等人发现(1986),在黑尔精神病态者清单上得分适中的监狱犯人,其 α 波的振幅要大于得分很高或者很低的监狱犯人,但是得分很高和得分很低的监狱犯人之间没有差别。脑电图异常包含着皮层唤醒水平低的意义,它不是精神病态者一致具有的特征。

尽管人们对暴力性成年人和多动儿童中脑电图异常的证据很感兴趣,但是,这种证据并不明确。威廉斯(D. Williams, 1969)发现,在206名习惯性攻击型犯罪人中,65%的有脑电图异常;而在127名偶然性攻击型犯罪人中,只有24%的有脑电图异常。与此不同的是,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75b)没有在习惯性攻击型精神障碍犯罪人的 α 波或者 θ 波振幅,与非攻击性精神障碍犯罪人有什么区别。根据对精神病态者的资料进行的评论,脑电图异常似乎在那些同时还表现出其他人格偏离的攻击性犯罪人中,更为常见。

在对矫正机构中的成年犯罪人或者少年犯罪人进行的非选择性抽样的研究中,报告了混杂的研究结果。在对丹麦青少年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梅德尼克(S. A. Mednick)等人(1981)将研究对象在1-13岁时获得的脑电图资料与6年后的少年犯罪历史联系起来。那些被逮捕过两次或者更多次的青少年,其早年脑电图中的 α 慢波活动要多于守法少年。在瑞典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的、为期12年的追踪研究。这些研究中的少年犯罪人,主要是财产性犯罪人,这种情况表明,脑电图异常并不是暴力性犯罪人所特有的。同时,脑电图异常也不是犯罪人所特有的,徐(L. K. G. Hsu)等人发现(1985),在1/4的少年犯罪人和少年精神病患者中有类似的脑电图异常。因此,脑电图中的大振幅、慢波可能与产生社会问题的危险倾向的增大有关,而不仅仅与反社会行为有关。

近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定位图分析(topographic analysis)和事件相关电位²²,而它们是无法从原始的脑电图中分离的。人们尤其关注信息加工的特异反应性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可能的联系。雷恩(A. Raine, 1989)对有关精神病态者感觉诱发电位的研究进行了评论,发现多种方法都排除了任何肯定性结论。他调查了长刑犯人的迟P3成分(late P3 component),将它与对事件的主观意义或关联(relevance)联系起来,发现与其他人相比较,精神病态者对可见的目标刺激产生边缘P3波(parietal P3 wave),其P3波的振幅大于对非目标刺激产生的边缘P3波的振幅。精神病态者在“边缘指数”(parietal index)上的得分很高,边缘指数源于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的图案与物体装配分测验,这种得分与P3波振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种结果支持其他一些认为精神病态者更注意直接感兴趣的事件的研究结果。雷恩提出,精神病态者更熟练地注意任务相关事件(task-relevant event),这种现象可能是寻求刺激和低唤醒的一种相关因素。不过,对他的结果可以进行别的解释。例如,他的“边缘指数”也是场独立性的一种量度²³。

22.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是指有心理因素参与引起的诱发电位。诱发电位(evoked potential)是指在外界刺激作用下从头皮上记录的相应电位变化。——译注

23. 场独立性(field independence)是指个人在认知和行为中较少受到环境线索的影响而富于主体性的倾向。如果个人的认知和行为深受环境的影响,就具有“场依存性”(field dependence)。——译注

在调整刺激强度或者**增大—减小** (augmenting-reducing) 刺激时, 也可以观察到诱发电位的个别差异。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 一些人的早 P1-N1 成分 (early P1-N1 component) 的振幅会增大, 而其他人的振幅会减小。增大—减小的概念产生于对动觉图形后效 (kinaesthetic figural aftereffects, KFA) 的研究, 这种研究发现, 那些缩小所感知的物体大小的人, 会要求更多的感觉刺激, 以避免厌烦的产生。因此, 具有减小倾向的人, 对痛疼的耐受力更大, 但是, 对感觉剥夺缺乏耐受力, 这些人的性格也更加外向。在少年犯罪人中发现的具有减小倾向的人, 比对照组中的守法少年要少, 这个结论与那种认为犯罪人有更强烈的“刺激渴求”的假设是一致的。西尔弗曼 (J. Silverman)、布施鲍姆 (M. S. Buchsbaum) 和施蒂尔林 (H. Stierlin) 使用诱发电位标准发现 (1973), 男性少年犯罪人表现出的增大倾向, 比守法男少年或犯罪少女都要强。寻求刺激也与诱发电位的增大有关, 这种现象和皮特里 (A. Petrie, 1967) 的概念所预期的相反。戴维斯 (C. Davis)、考尔斯 (M. Cowles) 和科恩 (P. Kohn) 注意到 (1983), 有关动觉图形后效和诱发电位测量方面的明显矛盾的研究结果, 是由程序差异和语义含糊造成的。他们认为, 皮特里所说的减小实际上是诱发电位的增大,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神经系统的“敏感性”很小。

有几项对精神病态者的研究, 检查了**伴随性负电位变化**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CNV) 或者“期望波” (expectancy wave), 它们是在一项预先警告反应时间的实验中产生的, 但是结果并不一致。麦卡勒姆 (C. McCallum, 1973) 发现, 精神病态者在—项会立即见成效的任务之前出现振幅更小的伴随性负电位变化, 但是, 辛多克 (K. Syndulko) 等人 (1975) 没有证实这一点。芬顿 (G. W. Fenton) 等人发现 (1978), 精神病态性犯罪人的伴随性负电位变化的振幅高于其他犯罪人。相反, 雷恩和威纳布莱斯 (P. H. Venables) 发现, 伴随性负电位变化与学龄儿童的社会化之间没有关系。这些不一致似乎反映了精神病态标准的差异, 也反映了任务要求的差异。霍华德 (R. C. Howard)、芬顿和芬威克 (P. B. C. Fenwick) 发现 (1984), 在—项简单的会立即见成效的任务中, 较高的伴随性负电位变化的振幅与社交性相关, 这是原发性精神病态者的一种特征。在麦卡勒姆、辛多克等人的早期研究中研究的对象, 大多数似乎都是继发性精神病态者。尽管在冲动性犯罪人和守法者在避免白噪音时, 其伴随性负电位变化的振幅较低²⁴, 但是, 这种现象随测量地点而变化。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没有搞清楚精神病态的心理生理学意义。

二、反社会人格的皮肤电因素和心血管因素

对反社会行为的自主神经系统因素的研究, 大部分都检查了精神病态性犯罪人的皮肤电 (ED) 活动和心率 (HR) 活动²⁵, 还有一些这类的研究检查了具有精神病态特征或者社会化不足特征的守法者的皮肤电活动和心率活动。在涉及到回避学习的实验任务中, 当把反应相倚电休克 (response contingent electric shock) 作为—种惩罚范式 (punishment paradigm) 时, 精神病态者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回避惩罚方面的缺陷, 但是, 已经比较—

24. 白噪音 (white noise) 是指由各种频率组成的各种成分之间具有同样振幅而在相位上无系统关系的非周期性复合噪音。这种噪音像白光—样把各种频率成分都结合在一起。——译注

25. 心率 (heart rate, cardiac rate) 是指单位时间内心脏搏动的次数。—般以分钟为时间单位。——译注

致地发现,精神病态者在**被动回避学习**(passive avoidance learning)中存在人们所假设的缺陷。施莫克(F. J. Schmauk, 1970)发现,当惩罚涉及到金钱损失时,原发性精神病态者和继发性精神病态者的行为表现与其他人相似。预期的皮肤电反应和回避反应平行发生。因此,精神病态者并没有表现出被动回避方面的一般性缺陷;当受到动机推动时,他们可以学习回避惩罚。认知因素也决定精神病态者对惩罚的反应性。例如,西格尔(R. A. Siegel, 1978)发现,当肯定会受到惩罚时,精神病态者的压抑反应和其他人相似。当不一定会受到惩罚时,精神病态者就较少表现出压抑,从而显示出一种个人免疫性(personal immunity)方面的信念。

纽曼(J. P. Newman)、韦德姆(C. S. Widom)和内森(S. Nathan)认为(1985),精神病态者的被动回避缺陷仅仅限于个人既有可能得到奖赏、也有可能受到惩罚的情境。他们指出,精神病态者过分关注奖赏,这种倾向妨碍了他们对惩罚线索的注意。他们赞同用注意来解释,而不赞同用动机来解释,认为动机性解释不能改变优势反应定势(dominant response set),这种定势导致避免惩罚缺陷。在一项相继的进行辨别或者不进行辨别的任务中,同样的反应可能会受到次级强化物的奖赏,也可能会受到剥夺次级强化物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在被动回避方面的缺陷,都比其他人严重。不过,在没有竞争性目标的情况下,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都同样学会抑制要受到惩罚的反应。这种模式类似于大鼠的隔膜损害的效果;可以看成是与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抑制系统(BIS)活动不足。但是,由于这种结果并不能证明对惩罚线索不敏感,它们似乎与行为激活系统(BAS)活动过度更具有一致性。

有关精神病态者在**伤害性刺激**(noxious stimulation)之前的皮肤电和心率反应的研究证实,精神病态者在预见惩罚方面存在缺陷。例如,当预先警告在特定的刺激之后会受到电击时,精神病态者产生预期皮肤电唤醒的可能性小于其他人。不过,早期的研究也发现,精神病态者的皮肤电条件反射较弱。黑尔和奎因(M. Quinn)进行的一项研究(1971),涉及到伤害性无条件刺激和愉快性无条件刺激,也涉及到皮肤电反应和心率反应的记录,这项研究证实,精神病态者条件反射能力的缺陷仅仅限于对伤害性刺激的预期反应,并且也仅仅限于皮肤电系统。这些研究结果与艾森克关于精神病态者存在一般性的条件反射能力缺陷的假设相抵触,但是与存在行为抑制系统缺陷的假设相一致,主要表现在皮肤电反应减少方面。

引起精神病态者皮肤电反应减小的威胁性厌恶刺激,会导致更大的心率反应。黑尔(1978)提出,心率和皮肤电反应的分裂,反映了“皮层调谐”(cortical tuning),而皮层调谐又通过颈动脉窦的压力感受器涉及心血管诱发性皮层唤醒降低。因此,精神病态者有一种保护性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减弱厌恶刺激的影响。这种模式仍然没有得到检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朱克曼(M. Zuckerman)和科莫(P. G. Como)发现(1983),心动加速、诱发电位增大与强刺激有关。

没有一致的证据证实,精神病态者普遍对简单的、非厌恶性的刺激定向反应(orienting reactions, OR)不足,但是,在继发性精神病态者、精神分裂性犯罪人中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不过,一些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定向反应的习惯化(habitualization)比率来区分精神病态者,这种比率在一定程度上不受自主反应性或者条件反射能力的影响,并且与较强的皮层条件反射性相联系。黑尔(1968)发现,精神病态者对于音调的心脏定向反应习惯

性地比较慢,但是对于皮肤电的定向反应并不慢,并且将这种分裂与困倦和低皮层唤醒联系起来。布莱克本(1979b)也发现,当研究对象困倦时,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和皮层活动发生这样的分裂,但是,继发性精神病态者的皮肤电习惯化很快,而心脏习惯化较慢。

一种相关的现象是,当研究对象没有受到刺激时,皮肤电记录中出现非特异性波动(nonspecific fluctuations, NSF),这种现象与警觉和注意资源的分配有关。在继发性精神病态者中已经发现了低频率的非特异性波动:那些在社会化量表上得分低的犯罪人,也表现出低频率的非特异性波动。沙林(D. Schalling, 1978)指出,非特异性波动经由普通的脑干兴奋机制与皮层唤醒水平产生联系:低频率可能反映了缺乏意象生动性、角色采择缺陷和移情缺陷。在继发性精神病态少年犯罪人中发现缺乏情绪意象生动性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缺乏情绪意象生动性也与社会化量表上的低得分有关。

另一种引人注意的皮肤电因素是反应恢复期(response recovery time)。梅德尼克(S. A. Mednick, 1975)指出,自主恢复慢会使恐惧减弱对被动回避反应的强化作用消失;较慢的恢复可能是反社会者的特征。西德尔(D. A. T. Siddle)等人发现(1976),极端反社会的少年犯罪人表现出很慢的皮肤电恢复期,恢复慢也与犯罪人在社会化量表上的低得分有关。不过,皮肤电恢复期的真正作用仍然不清楚。

没有发现精神病态者具有自主唤醒水平(autonomic arousal level)低的特点,但是,一些证据表明少年犯罪人的心率(cardiac rate)较低。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记录了很多英国学龄儿童在等待适度紧张的医学检查期间的脉搏率(pulse rate)。那些后来变成少年犯罪人的儿童的脉搏率明显低于守法少年。雷恩和威纳布莱斯(P. H. Venables)也发现(1984),未社会化的学龄少年的心率较慢。不过,马利范特(R. Maliphant)、沃森(S. A. Watson)和丹尼尔斯(D. Daniels)发现(1990),低的心率可以识别被教师评定为具有破坏性的7~9岁的儿童。威纳布莱斯和雷恩(1987)引证丹麦的研究表明,有犯罪父亲的儿童的心率比父亲不犯罪的儿童要低,但是,这不是有精神病态者父亲的儿童的特征。这些作者认为,低声调心率(low tonic heart rate)可能与低水平的皮层唤醒有联系,而低水平的皮层唤醒一般与轻微少年犯罪有关,但是与精神病态无关。低水平的皮层唤醒可能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因为在那些社会背景较少犯困性的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生物学影响的作用很大。

迄今为止的研究,仅仅对犯罪人和精神病态者的心理生理特征做了有限的说明。最一致的研究结论是,当精神病态者预期或者体验厌恶刺激时,他们的皮肤电反应性不足。尽管这一结论似乎意味着行为抑制系统活动不足,但是,精神病态者仅仅在有限的条件下才表现出被动回避缺陷,而不是一般地对惩罚线索不敏感。尽管年幼少年犯罪人似乎更有可能具有减小刺激的倾向,但是,精神病态者一般并不削弱感觉输入(sensory input),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唤醒水平低。莫森(A. R. Mawson)和莫森(C. D. Mawson)提出(1977),研究数据中的不一致现象,可能反映了精神病态者具有一种从低的唤醒和反应状态到高的唤醒和反应状态波动的倾向,但是,这种不一致性的更可行的理由可能是被鉴别为“精神病态者”的犯罪人的异质性。例如,一些证据显示,低的唤醒和反应性可能是继发性精神病态者的特征,这种人表现出社会焦虑或者精神分裂现象。这一观点对恐惧唤醒或者焦虑唤醒在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提出了怀疑,因为这种类型可以通过高水平的焦虑倾向识别出来,从而可以认为有过度的行为抑制系统。福尔斯(D. C. Fowles, 1988)指出,精神分裂样

退缩反映了从行为激活系统活动不足中产生的接近动机的缺陷。

三、生物化学因素

由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通过广泛的反馈回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激素也可能通过对正常发育以及对暂时状态的效果而影响行为。因此，可能从产量 (production) 和一些激素的水平，特别是从性腺分泌的雄激素和雌激素、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中，寻找犯罪行为的可能的相关因素和有关的气质因素。

雄激素 (androgen) 在胎儿的性别分化、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出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人们把睾酮 (testosterone) 看成是解释犯罪行为与性别和年龄普遍相关、男性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的一种可能的因素。例如，埃利斯 (L. Ellis, 1987) 指出，过度的雄激素水平会通过降低唤醒水平而增加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古德曼 (J. Goodman, 1976) 试图将女性的反社会行为与雄激素过量联系起来，他从 400 名研究对象中鉴别出 7 名具有攻击行为和性亢进历史的犯罪少女，发现其中的 6 人在子宫内或童年早期受到过雄激素的影响。

不过，有关睾酮水平的人格相关因素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珀斯基 (H. Persky)、史密斯 (K. D. Smith) 和巴苏 (G. Basu) 发现 (1971)，生产率 (rate of production) 和睾酮水平与青少年犯罪人在巴斯—德德基敌意调查表 (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 的等级呈正相关，对年长守法者不是这样，然而后来的几项研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果。例如，奥尔伍斯 (D. Olweus) 等人发现 (1980)，睾酮水平与男性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对挑衅的反应情况有联系，但是与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体型、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社会化量表 (So) 没有联系。相反，戴兹曼 (R. Daitzman) 和朱克曼 (M. Zuckerman) 发现 (1980)，睾酮水平与寻求刺激、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外倾性格相关，也与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神经质和社会化相关。

从对犯罪人的研究中获得的结果同样缺乏说服力。埃伦克兰茨 (J. Ehrenkranz)、布利斯 (E. Bliss) 和希尔德 (M. H. Sheard) 发现 (1974)，攻击性犯人中的睾酮水平要比那些不自信的犯人高，但是，攻击性犯人和非攻击性犯人没有区别，与社会支配性犯人也沒有区别。拉德 (R. T. Rada)、劳斯 (D. R. Laws) 和凯尔纳 (R. Kellner) 也发现 (1976)，少数严重的暴力性强奸犯的睾酮水平要高于其他的强奸犯，也高于对照组。不过，马蒂森 (A. Mattson) 等人发现 (1980)，尽管少年犯罪人睾酮分泌的平均水平高于对照组，但是没有发现青少年犯罪人的睾酮水平与攻击性评定之间没有关系。不过，用来降低性犯罪人的睾酮水平的药物，对于与性无关的攻击性没有影响。证据没有一致地显示睾酮水平与犯罪性直接相关。梅热 (A. Mazur, 1983) 认为，睾酮与攻击性的关系不如与支配性的关系那样密切。

睾酮可能通过大脑神经递质的活动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睾酮抑制单胺氧化酶 (monoamine oxidase, MAO) 的活动，单胺氧化酶通过代谢活动产生几种神经递质，这可能会使去甲肾上腺素这样的单胺酶在大脑中大量积累。男性血小板中单胺氧化酶的活动比女性低，而单胺氧化酶活动低则与“抑制解除性”气质因素，例如，冲动性、寻求刺激和社会化不足有关。单胺氧化酶活动低也与脑脊髓液中的一种羟色胺代谢物——5-羟基吲哚乙酸 (5-HIAA) 的低浓度有关。沃克南 (M. Virkunen)、德琼 (J. DeJong) 和巴特克 (J. Bartko) 发现 (1989)，冲动性犯罪人和累犯中的 5-羟基吲哚乙酸水平特别低。人们也

发现,在自杀的患者、有过行为障碍和攻击行为历史的患者中,5-羟色胺乙酸的水平降低,但是在进行过预谋性暴力行为的患者中,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因此,考克拉(E. Coccaro, 1989)指出,低的羟色胺与低的“冲动攻击性”有关。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雌激素通过在月经周期,特别是在**经前紧张**(premenstrual tension, PMT)中发生的激素变化对女性犯罪产生影响。尽管对经前紧张是否作为一种“综合征”继续存在争论,但是,经前紧张的症状包括心情抑郁、易激惹、疲劳、肌肉紧张、头痛。多尔顿(K. Dalton, 1961)指出,经前紧张使女性由于易激惹或者懒散而更容易进行越轨行为。她发现,在156名月经正常、在访谈之前的28天时间内实施其犯罪行为的女犯中,49%是在月经前8天内或者月经期间(经前及行经初期)实施犯罪行为的²⁶,而预期的发生率应该是29%。这个高峰时间在盗窃犯罪中很明显(56%),其中63%的人有经前紧张症状。在因违反监规而受到惩罚的女犯中,54%的违反监规行为也是在此高峰时间发生的。汉兹(J. Hands)、赫伯特(V. Herbert)和坦南特(G. Tennent)同样发现(1974),在保安医院中,精神紊乱的女性在来经前一周更有可能因为行为问题而被隔离开来。在美国的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英国,已经成功地用经前紧张综合征进行减轻个人责任的辩护。不过,道本(P. T. d'Orban)和多尔顿发现(1980),女性暴力犯罪更有可能在经前及行经初期发生,他们没有发现女性暴力犯罪与经前紧张之间有联系。因此,在经前及行经初期发生的反社会行为明显增多的现象,并不是暴力行为所特有的。由于严重的经前紧张症状仅在20~40%的妇女中发生,因此,这些症状既不是对女性犯罪的必要解释因素,也不是对女性犯罪的充分解释因素。韦德姆(C. S. Widom)和艾姆斯(A. Ames)指出,由于迄今为止的研究都是以对经过选择的女性进行的回溯性研究为基础的,犯罪与月经周期之间的联系的程度仍然值得怀疑。

人们已经报告了在**低血糖**(hypoglycemia)状态下发生的犯罪行为,这种状态与胰岛素分泌的增加有关。低血糖状态可能在饥饿、食用含糖过多的食物,特别是在饮酒之后出现,其后果包括无法保持注意、易激惹等脑功能损害。人们认为,饮食习惯与反社会行为有关;一些有争议的数据显示,减少糖的摄取量可以减少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的不良行为。研究也表明,暴力行为与葡萄糖新陈代谢方面的机能失调有关。可以通过让空腹者口服葡萄糖之后的血糖下降,即葡萄糖耐受测验(glucose tolerance test)来测定对低血糖的敏感性。亚与纳—托拜厄斯(J. A. Yaryura-Tobias)和尼泽罗格卢(F. A. Neziroglu)发现(1975),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与葡萄糖机能失调、脑电图异常有联系。沃克南(M. Virkunen, 1988)报告说,习惯性成年暴力犯罪人从低血糖中恢复得较慢。他也发现,那些其暴力行为与饮酒有关的杀人犯罪人在空腹之后胆固醇水平很低;长时间不吃食物的饮酒往往是犯罪行为的前兆。他提出,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胰岛素分泌的增加尤其敏感。究竟激素的变化怎样引起暴力行为,仍然不清楚。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低血糖倾向可能反映了内分泌异常,但是,低血糖倾向在一般人口中也是不同的。例如,反应性低血糖与学生中自我报告的攻击性有关。

儿茶酚胺中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一直备受关注,因为早先人们假设:肾上腺素的增加与恐惧有关,而去甲肾上腺素的增加与攻击性有关。这些假设现在看来太简

26. 经前及行经初期(paramenstruum)是指行经前4天和行经最初4天 ——译注

单,但是,一些研究已经检查了与反社会行为有关的尿中的儿茶酚胺,这些研究的原理是,反社会者可能对预期的紧张缺乏反应。例如,在等待审判的犯罪人中,精神病态者在临审判前肾上腺素没有增加,这说明他们在这种情境中缺乏紧张反应或者缺乏卷入。晚近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反社会者在紧张状态下较少分泌肾上腺素。尽管奥尔伍斯(D. Olweus)等人发现(1980),睾酮水平与男性青少年中因受威胁而激怒的状态有关,但是,奥尔伍斯(1986)报告说,在适当紧张状态下尿中的肾上腺素水平,在那些缺乏焦虑的外倾性格者中低,在那些被认为不会进行**非激怒性**(unprovoked)攻击行为的人中也较低。他也发现,持续性恃强凌弱者(persistent bully)的肾上腺素水平较低。不过,奥尔伍斯认为,肾上腺素增加与大脑皮层警觉的关系更密切,而不是与紧张的关系更密切。奥尔伍斯指出,非激怒性攻击行为是具有低唤醒特征的人寻求刺激的行为。马格努森(D. Magnusson, 1988)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用来解释多动青少年面对适度紧张时肾上腺素没有增加的现象。他也发现,那些在13岁时肾上腺素分泌少的人,后来在18~26岁时变成了犯罪人。

迄今为止的生物化学研究,已经检查了互不联系的人群中相对独立的内分泌反应,但是,威纳布莱斯(P. H. Venables, 1988)试图根据向运动性(ergotropic)和向营养性(trophotropic)之间的平衡,或者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之间的调谐来整合激素与心理生理资料。他注意到,胰岛素分泌在正常情况下与肾上腺髓质激素相反,但是,睾酮会通过降低单胺氧化酶来增加儿茶酚胺的分泌量。一些研究认为,低的皮层唤醒水平、低的心率、低血糖倾向、低的肾上腺素分泌都是严重反社会者的特征,这些特征都与迷走—胰岛素优势(vago-insulin dominance)或者副交感神经系统平衡相一致。这种解释的难点在于,这些特征在非暴力性少年犯罪人中更加明显,而低血糖又与暴力行为有联系。

第五节 脑功能障碍与反社会行为

一、概述

脑损伤可能是由围产期并发症、头部伤害、肿瘤、感染或者接触像空气中的铅这样的有毒物质造成的,但是,这些条件并不会一律都要引起结构性损伤。正如拉特(M. Rutter, 1982)所指出的,严重的脑损伤之后肯定会发生心理紊乱,但未社会化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例如,沃克南(M. Virkunen)、纳迪拉(A. Nuutila)和胡斯克(S. Huusko)发现(1976),在507名头部受过伤害的退伍军人中,受伤30年后实施被判处监禁刑的犯罪的人,不足6%。在不知道脑部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脑部病变仍然很难查明。大多数研究是根据间接症状进行的,例如,医疗史、“软”神经症状、脑电图记录、神经心理测验。可以查明**脑功能障碍**(brain dysfunction),但是不一定能够查明**组织损伤**(tissue damage)。

即使能够查明脑损伤与反社会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也难以确定脑功能障碍与社会经济条件或气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原因性意义。这个领域的研究也以有关脑—行为关系的含蓄假设为基础。在传统的有关脑组织的层次概念中,人们认为大脑皮层控制更原始的皮层下区域(subcortical area)。根据这些观点,原始、攻击性的行为可能是脑混乱的**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代表了皮层下活动摆脱抑制性控制的一种释放。这种观点产生

了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到,例如,“控制不良综合征”(dyscontrol syndrome)的概念,关于行为障碍、多动症、反社会人格的“抑制解除精神病理学”。换言之,反社会行为可能是脑病理学的一种消极症状(negative symptom),因为脑损伤造成了支持认知发展和社会化所必需的功能缺乏或功能缺陷。

二、癫痫和控制不良

癫痫(epilepsy)又称为“循环性发作”(recurrent seizures),是大脑放电混乱的一种症状。在许多情况下,发作活动的来源无法知道,原发性癫痫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可以发现特异性异常病灶。由于人们认为颞叶与边缘核(limbic nuclei)之间的联结涉及攻击行为,因此,对这个区域的异常现象特别感兴趣。尽管大多数癫痫患者在心理上都是适应良好的,但是,大约1/3的癫痫患者表现出心理问题。不过,这不一定是直接的生物效果,往往是个人体验到由社会反应或者个人控制感降低所造成的烙印后的反应。癫痫也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癫痫在贫困群体中更加流行。因此,癫痫与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支持大脑异常对反社会行为具有原因性影响的明确的证据。

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估计,大约有5%的人患有癫痫。证据显示,犯罪人中的癫痫患病率更高,至少在犯人中是如此。冈恩(J. Gunn)和伯恩(J. Bonn)发现(1971),英国犯人中癫痫的流行率是0.71%,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低的估计。冈恩等人后来的一项调查发现(1991),犯人中癫痫的流行率仅仅是0.5%。惠特曼(S. Whitman)等人发现(1984),美国监狱中有2.4%的男性犯人有过癫痫发作史。不过,刘易斯(D. O. Lewis)等人发现(1982),矫正机构内的少年犯罪人中,18%的人有过癫痫发作史,但是,他们的癫痫判定标准受到批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患有癫痫的人是否会自动地、没有认识地(自动症)实施犯罪行为?颞叶癫痫(TLE)是否会增大暴力行为的可能性?自动症(automatism)引起法律界的关注,因为它可以否定行为的犯罪性质,但是,似乎很少用癫痫解释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例如,冈恩和芬顿(G. Fenton)发现(1971),在187名患癫痫的犯罪人中,只有13名是在癫痫快要发作时实施犯罪行为的,只有3名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属于自动行为。尽管马克(V. H. Mark)和欧文(F. R. Ervin)主张(1970),暴怒反应(rage reaction)往往与精神运动性发作有关,但是,罗丁(E. A. Rodin, 1973)在150名患者诱发性发作的照片中,没有发现任何攻击行为的案例。德尔格得-艾斯库塔(A. V. Delgado-Escueta)等人拍摄了从大量研究对象中选择的13名患者的发作情况,因为这些人被怀疑在癫痫发作期间进行攻击行为。他们在7个人中发现了初期攻击行为(incipient aggression),但是在所有的案例中,这类行为都是短暂的、不能持久的、缺乏目的的。他们认为,犯罪行为不符合自动症的片断特征,因而不可能是癫痫发作的表现。因此,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犯罪行为与癫痫发作有联系,在这些情况下,犯罪行为很有可能是发作后意识模糊的反映。

颞叶癫痫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假定联系也受到挑战。昂斯特德(C. Ounsted, 1969)报告说,在患颞叶癫痫的成人和儿童中,发现有1/3以上的人有暴怒发作或者攻击性爆发(aggressive outburst),不过,这个数量可能反映了选择偏向,真正的流行率并不清楚。罗丁(1973)发现,在700名被送到癫痫诊所的人中,只有4.8%的人有攻击行为史,并且无法根据发作的性质将他们与非攻击性患者区分开来。芒格斯(D. Mungas, 1983)同样发

现,无法用颞叶异常区分暴力性神经症门诊病人和非暴力性神经症门诊病人。赫兹伯格(J. L. Herzberg)和芬威克(P. Fenwick)也发现(1988),无法用脑电图、CT扫描或者神经心理测验区分攻击性患者和非攻击性患者,他们的攻击性患者有大量的癫痫早期发作症状、更多的儿童行为问题、更低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成就。他们认为,这些患者的攻击行为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脑损伤。

在两项比较患癫痫的犯人不患癫痫的犯人的研究中,发现患癫痫的犯人也可能实施暴力犯罪。冈恩和伯恩(1971)发现,暴力犯罪在那些原发性癫痫患者中更常见,而在颞叶癫痫患者中并不常见。相反,刘易斯(D. O. Lewis)等人发现(1982),在97名少年犯罪人中,对暴力历史的评定与精神运动性癫痫之间有0.38的相关。在78%的研究对象中,他们至少识别出一种癫痫症状。不过,他们关于暴力行为和癫痫的标准都很宽泛。

人们对**控制不良综合征**(dyscontrol syndrome)的概念仍然有争议。这种综合征假定,颞叶和边缘系统的发作引起暴力行为,即使在缺少可以观察到的发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门罗(R. Monroe, 1978)提出,“癫痫样”控制不良(epileptoid dyscontrol)的特征是轻微刺激引起间歇性的、爆发性的暴力行为发作,两次发作之间适应正常。马克和欧文(1970)提出了一种更加宽泛的控制不良概念,他们区分出的主要症状包括酒精中毒期间的身体攻击和暴力行为、冲动性性行为、严重的交通违章。

控制不良被看成是边缘系统病灶异常部位的癫痫样放电。不过,有关这些放电现象的证据,都是以脑电图异常、围产期损伤、头部损伤、多动、学习无能、软性神经症状(soft neurological sign)这样的间接指标为基础的,也参考了轻微脑功能障碍。临床研究发现,在非激惹性暴怒或者攻击行为复发之后进行神经病学或精神病学评价时,发现这些症状在患者中很常见。门罗(1978)报告说,30%的暴力犯人表现出这些症状。不过,控制不良仅仅描述了行为综合征与脑病理症状之间的一种相关性,但是,对行为综合征的界定是含糊的,脑病理症状的确实性也不清楚。巴赫-亚-丽塔(G. Bach-Y-Rita)等人注意到(1971),童年剥夺、家庭暴力或家庭破裂,都可以解释他们的患者中控制不良的暴力行为。

人们还没有识别出攻击行为的特异性神经激发因素(specific neural trigger)。芒格斯(D. Mungas, 1983)的研究指出,脑功能障碍对暴力行为的作用是间接的、非特异性的。他从频率、严重性、激惹因素、组织等方面分析了神经症门诊病人的暴力行为,用聚类分析方法识别出5种同质小类型(homogeneous subgroup)。2种小类型表现出经常进行严重的、相对而言非激惹性的和混乱的暴力行为的控制不良特征,但是,他们都很容易受发作的影响,他们在其他神经障碍,包括颞叶障碍方面与非暴力性病人没有区别。芒格斯提出,暴力行为倾向与个人以前的历史有关,脑功能障碍可能削弱了具有暴力行为倾向的个人的控制力。脑损伤也与酒精耐受力下降引起的暴力行为有关。

三、多动症

人们认为,许多儿童行为障碍是围产期或婴儿早期发生的脑损伤造成的脑功能障碍的症状,有害的医疗史似乎在少年犯罪人中更为常见。例如,对医疗记录的分析表明,尽管围产期问题仅仅在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和暴力性少年犯罪人的历史中很多见,但是,一般的少年犯罪人和犯罪少女更有可能在婴儿期遭受头部损伤和脸部损伤。这样的历史表明,少年犯罪与轻微脑功能障碍(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MBD)和**多动症**(hyperactivity)

有一定关系²⁷。从学习无能（见第八章）的标准对轻微脑功能障碍和多动症进行诊断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

正像在第三章中论述的那样，对多动症和儿童品行障碍的诊断存在一定的重叠。不过，表现出多动行为的儿童，并不都是反社会的；当多动症与品行障碍相结合时，反社会特征就非常明显。儿童多动症被看成是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期发生反社会行为的前兆。对临床患者的追踪研究发现，尽管运动问题和注意问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强度方面有所下降，但是，被诊断为多动症的人会表现出持久性的坐立不安和分心现象，这些现象伴随着学业成绩差、自尊低和反社会行为。萨特菲尔德（J. H. Satterfield）、霍庇（C. M. Hoppe）和谢尔（A. M. Schell）比较了来儿童诊所就诊8年后多动症青少年和对照组青少年由于严重犯罪而被逮捕的情况（1982）。他们根据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中、高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结果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多动症儿童中，58%的人后来有逮捕记录；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多动症儿童中，36%的人后来有逮捕记录；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多动症儿童中，52%的人后来有逮捕记录。而在对照组中，这个百分比分别是11%、9%和2%。此外，25%的多动症儿童后来被判刑入狱，而在对照组儿童中，只有1%的人后来被判刑入狱。一项研究也发现，多动症儿童更有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产生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例如，韦斯（G. Weiss）等人发现（1985），在一项为期15年的追踪研究中，23%的多动症儿童后来产生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对照组儿童中，只有2.4%的人后来产生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是在成年期对这两组研究对象进行诊断中发现的唯一差别。

不过，多动症似乎与影响越轨行为的其他特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例如，兰伯特（N. M. Lambert, 1988）发现，童年期的弥漫性攻击行为（pervasive aggression）或者弥漫性多动症（hyperactivity hyperactivity）都可以预测以后在17岁时发生的品行障碍，但是，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时才能预测官方少年犯罪。马努扎（A. Mannuzza）等人进行的一项回溯性研究也发现，多动症起一种间接的作用。在成年前期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多动症儿童比对照组儿童遭逮捕的多（39%比20%）、被定罪的多（28%比11%）、被监禁的多（9%比1%），不过，几乎可以用成年前期的反社会行为障碍来解释这种现象。尽管多动症者表现出这些障碍，但是，仅仅多动症本身并不能引起后来的犯罪行为。

只有很少一部分多动症儿童在后来表现出反社会行为，但是，除了坐立不安和不能保持注意的儿童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社会训练问题之外，多动症对犯罪性所起的作用的性质仍不清楚。现在看来，早期把多动症归因于轻微脑功能障碍是太简单化了，因为现有的证据并没有确切地证实多动症是脑损伤的症状；作为一种推测性原因，轻微脑功能障碍是以脑损伤有相同的行为后果这种不确定的假设为基础的。不过，人们继续从生物学角度看待多动症。例如，萨特菲尔德（D. A. Satterfield, 1978）提出，坐立不安反映了低唤醒水平引起的寻求刺激现象。但是，兰伯特（1988）发现，多动症儿童产生的少年犯罪行为既与早期的生物因素有关，也与后来的家庭和社会特征有关。因此，包括父母和其他人的反应在内的其他因素，对于多动症儿童反社会性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27. 多动症又称为“注意缺陷性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原注

四、神经心理机能障碍

人们使用神经心理测验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推断脑功能障碍, 因为这类测验能够区别已经知道有脑损伤的人。不过, 使用这类测验确定一般人的损伤部位, 是成问题的, 当这样使用神经心理测验时, 它们会诊断出过多的脑损伤。这类测验涉及复杂的认知功能, 而这些认知功能又依赖于多种脑系统的协作; 尽管认知缺陷意味着可能有脑功能障碍, 但是, 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将认知缺陷归结为结构性损伤, 是一种推测性的结论。

在一些研究中, 将犯罪人在神经心理测验中的表现作为脑功能障碍的证据。关于认知缺陷的早期证据主要来自智力测验, 例如,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WAIS) 或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WISC) (见第八章), 少年犯罪人的操作智商 (performance IQ, PIQ) 优于言语智商 (verbal IQ, VIQ)。人们假定, 言语智商与大脑左半球的功能 (语言加工、序列分析) 有一定联系, 而操作智商与大脑右半球功能 (空间和性质分析) 有一定联系。因此, 可以用大脑左半球单侧化 (lateralization) 的降低来解释少年犯罪人的操作智商优势²⁸。加布里埃利 (W. F. Gabrielli) 和梅德尼克 (S. A. Mednick) 的研究 (1980), 支持这一观点, 他们发现, 12 岁时单侧化分数高、右半球占优势的儿童, 后来变成了少年犯罪人。

伯曼 (A. Berman) 和西格尔 (A. M. Siegal) 比较了官方少年犯罪人与年龄、社会地位相似的守法少年在霍—里神经心理成套测验 (HRB)²⁹ 中的情况 (1976)。这项研究发现, 少年犯罪人不仅操作智商症状明显大于言语智商症状, 而且在构成这套测验损害指数的 7 项测验中, 有 5 项测验得分很差。少年犯罪人表现出的认知缺陷模式, 仅仅表明了运动和注意技能或者大感觉功能 (gross sensory functioning) 方面的轻微功能障碍, 而没有表明在问题解决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问题解决能力需要语言、知觉和非语言概念技能。莫菲特 (T. E. Moffitt, 1988) 在新西兰进行的一项自我报告式少年犯罪人研究中, 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莫菲特使用了一种复合性测量方法, 从 850 名 13 岁的研究对象中选择最具反社会性的男性和女性, 在选择中让这些完成了一套评价记忆、语言性功能、“操作性” (额叶) 功能的测验。男性少年犯罪人在言语智商、操作智商、语言性测验和记忆测验中表现出显著的缺陷, 但是并没有在测量非语言性功能或额叶功能的测验中表现出这样的缺陷。相反, 女性少年犯罪人主要在后两种测验中表现出缺陷。

不过, 其他研究指出, 左半球或者优势半球的单侧化缺陷更有可能是暴力性犯罪人和精神病态性犯罪人的特征。尤得尔 (L. T. Yeudall) 和弗洛姆—奥克 (D. Fromm-Auch) 概括了使用霍—里神经心理成套测验进行的研究, 发现 89% 的暴力性犯罪人表现出异常的测验剖面图, 这意味着主要是左半球和前皮层功能障碍。在 60% 的精神病态者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不过, 在没有精神病态症状但却表现出人格障碍和感情障碍的犯罪人中, 测验发现的缺陷主要是前皮层和右半球功能障碍。这也是 99 名持续性少年犯罪人中主要的模式,

28. 单侧化 (lateralization) 是指人的大脑两半球在功能上的差异。大部分成人的语言功能主要由左半球执行, 而对于各种视觉空间和非语言刺激的加工主要由右半球进行。一般认为, 单侧化是在出生到青春期间之间逐渐完成的。——译注

29. 霍—里神经心理成套测验 (Halstead-Reitan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battery, HRB) 是指由美国的霍尔斯特德 (W. Halstead) 首先设计, 经里坦 (R. M. Reitan) 加以发展, 最后形成为供成人、少年和幼儿使用的三套神经心理测验, 由多个分测验组成, 主要用来测量脑与行为的关系。——译注

其中的84%表现出异常的霍—里神经心理成套测验剖面图，而在守法少年对照组中，仅有11%的人表现出这种剖面图。不过，在这项研究中，暴力性少年犯罪人的数量尽管很少，但是他们不同于非暴力性少年犯罪人。

使用其他成套测验的研究也指出，在少年暴力性犯罪人和成年暴力性犯罪人中存在明显的神经心理功能障碍，在前皮层或左半球发生的缺陷最为常见。例如，克里尼克（Y. Krynicki, 1978）发现，可以根据单侧性测验（laterality test）所表明的左半球功能障碍，将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和器质损伤性青少年与非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区别开来，但是无法在同一类型内部进行互相区别。布赖恩特（E. T. Bryant）等人也发现（1984），可以根据鲁—内神经心理成套测验的各个量表来区分暴力性犯人与非暴力性犯人³⁰。根据这一测验，在被诊断为脑损伤的犯人中，73%的犯人属于暴力性犯人；而在没有诊断为脑损伤的犯人中，只有28%的犯人属于暴力性犯人。研究人员根据CT扫描推断，脑损伤主要发生在额颞区（frontal-temporal areas），不过，塔特（R. E. Tarter）等人指出（1983），只有在一小部分犯罪人中才有神经心理损伤。他们比较了那些使用不同的成套测验没有发现神经异常的暴力性犯罪人、非暴力性犯罪人、性犯罪人，但是没有发现这些犯罪人之间有显著异常。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1987），他们也没有发现在操作智商超过言语智商的症状与少年犯罪人的暴力行为历史之间有任何联系。

精神病态者可能具有额叶和左半球功能障碍，这个见解受到了有保留的支持。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额叶损伤与冲动性的、缺乏抑制的和轻率的行为有关。现在人们相信，额叶与随意行为的整合、调节和方向有关。额叶—边缘系统联结也是格雷行为抑制系统的组成部分。戈伦斯坦（E. E. Gorenstein, 1982）假设，包括精神病态在内的抑制解除综合征（disinhibitory syndrome）的缺陷，同样限于额叶损伤引起的缺陷，而从几种测量来看，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性患者都容易有额叶功能障碍。精神病态者的行为表现支持这一假设，表明在反应定势的调整中存在明显损害。不过，黑尔（1984）在使用精神病态清单选择的精神病态性犯人中没有发现这些结果。

黑尔（1979）使用速示文字认知任务，也没有证实这样的假设，即精神病态者的左半球单侧化比较弱。但是，后来的研究使用了更复杂的语义加工技术，这些研究显示，精神病态者语言功能的特别单侧化可能较差。黑尔指出（1988），精神病态者语言的脑组织整合功能较差，不能很好地整合感情成分和将认知与行为联系起来的其他成分。黑尔推测，这涉及到和遗传“密切相关的”脑损伤，而不涉及结构性脑损伤。

迄今为止，对犯罪人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存在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例如，研究对象数量少，缺少对照组，过分依赖矫正机构内的犯人。不过，米勒（L. Miller, 1988）指出，语言技能和调节功能的损伤是受额叶控制的，这方面的损伤在反社会人群中有一定的一致性。他认为，这种损伤是发育不足（developmental failure）的症状，而不是神经损伤的症状；在紧张状态下，少年犯罪人，特别是那些暴力性和冲动性少年犯罪人更不可能使用内部言语调节注意、感情、思维和行为。

30. 鲁—内神经心理成套测验（Luria-Nebraska neuropsychological battery, LNNB）是由前苏联神经心理学家鲁利亚（A. R. Luria, 1902-1977）编制的一套神经心理学测验方法，后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研究人员修订成美国版本的神经心理测验，包括11个分测验。——译注

第七章 犯罪的家庭与社会因素

第一节 引言

上一章的论述表明, 具有遗传根源的个人特征在犯罪行为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白板 (tabula rasa)¹, 他们的特征并不完全是由环境塑造的, 而且也受自身发展的影响, 而自身的发展又受到别人的反应的制约。在早年出现的个人气质和问题解决方面的个别差异, 似乎更取决于生理活动的基本参数, 而个人复杂的心理功能的分化, 只能通过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

本章讨论犯罪性发展中的社会影响。同时, 也要讨论对行为障碍和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的研究, 因为这些因素不仅是后来的社会越轨行为的重要先兆, 而且它们本身似乎也有与犯罪性同样的前因。在传统上, 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作为社会化主要机构的家庭, 研究邻里、学校、工作场所的影响, 而对婚姻的研究则被看成是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 下文中将讨论这样的研究。在社会化过程中, 不仅通过父母传递文化习俗 (cultural mores), 而且终生吸收与社会角色转变有关的价值和标准。因此, 还将讨论除了家庭之外的社会影响对犯罪性的效果。

第二节 家庭模式与相互作用

在对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的家庭环境的比较中, 发现了若干有一定规律性的相反的情况。这里概述的许多研究结果, 在希利 (W. Healy) 和格卢克夫妇的早期著作中已经有论述², 但是, 这些研究在后来的一些纵向研究 (例如, 剑桥研究)、长期追踪研究 (例如, 在美国马萨诸塞进行的剑桥—萨默维尔青少年研究) 和一些横剖比较研究中得到证实³。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大多数有关犯罪的家庭因素的研究, 都受到精神分析学关于出生头 5

1. 白板 (tabula rasa) 是一个哲学和心理学术语, 指人出生时未受外界和自身影响的纯洁的心灵。17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曾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白板说”。——译注
2. 希利 (William Healy, 1869-1963) 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 少年犯罪研究的著名先驱者。格卢克夫妇都是 20 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 对少年犯罪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指谢尔登·格卢克 (Sheldon Glueck, 1896-) 和埃莉诺·格卢克 (Eleanore Glueck, 1898-1972)。——译注
3. 剑桥—萨默维尔研究 (the Cambridge-Somerville study) 是指 1937-1945 年间在美国波士顿市郊区的剑桥和萨默维尔两地进行的少年犯罪社区处遇研究和计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少年犯罪社区预防研究和计划之一, 由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克拉克·卡伯特 (Richard Clark Cabot) 发起, 研究对象包括 650 名 12 岁以下的问题行为儿童, 其中 325 名是处遇组, 325 名是对照组。这项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译注

年间发育迟缓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的影响,在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中仍然可以看到对早期关系的关注。不过,晚近的研究集中于到青年期前后的父母子女相互作用,而且这类研究更多的受到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的指导。这不仅涉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转变,例如,使用直接观察、访谈、回溯性报告(retrospective report),而且也涉及研究重点的变化,即在培养和传递技能与行为标准方面,从重视儿童的情感需要转向重视保育员的效果。尽管受到大量关注的因素之间相互重叠,但是,可以将这些因素分为2类:(1)**功能性因素**(functional variable)或者人际过程,这些因素对行为有直接效果;(2)**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variable),例如,家庭规模,这类因素的影响是间接的。本章将在儿童养育实践、家庭关系、家庭破裂、父母越轨、家庭规模和社会经济剥夺等标题下,论述这些内容。

一、儿童养育实践

儿童养育实践(child rearing practice)包括一系列会促进亲社会发展的父母行为,但是,这里主要探讨惩戒技术(disciplinary technique)。尽管无法总能将这类技术与其他日常冲突相区别,但是,这类技术决定了父母在阻止、预防和改变子女的不良行为中使用的比较一致的模式。人们往往孤立地研究这类技术,仍然缺乏公认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对家庭功能的观察。因此,这个领域仍然有大量不确切的术语。例如,少年犯罪人或攻击性儿童家庭中的惩戒实践,经常被描述成严厉的、惩罚性的、不严肃的、反复无常的,被认为是母亲能力(mothering ability)“差”的表现。不过,这些普遍性的、体现价值观的描述,显然没有识别出那些最有可能引起反社会发展的养育技术的特征。

将这些资料组织起来的尝试,主要围绕惩戒冲突(disciplinary encounter)的内容、模式和一致性而进行。霍夫曼(M. L. Hoffman, 1977)在一项研究中,区分了在惩戒对抗(disciplinary confrontation)中使用奖赏和惩罚的模式,具体包括3种模式:(1)**体罚式管教**(power assertion),特征是使用体罚、批评、威胁、物质剥夺;(2)**爱的取消**(love withdrawal),特征是使用非体力性的方式表达谴责、感情拒绝(withholding of affection);(3)**归纳**(induction),特征是进行推理,指出儿童的行为对于他人的后果。在正常儿童中,道德发展与父母更多地使用归纳之间有正相关,与父母使用体罚式管教之间呈负相关,但是与爱的取消之间没有一致的联系。在社会化过程中,体罚式管教之所以相对无效是因为,这种管教方法依赖于惩罚者是否在场和对惩罚者的恐惧,而且,这种管教方法也提供了敌对行为的一种榜样。感情取消(withdrawal of affection)方法对已经建立了感情的关系来讲效果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归纳方法更有可能教给相倚规则(contingency rule),更有可能引起与进行中的越轨行为不相容的反应,更有可能利用儿童的移情能力。

几项研究显示,少年犯罪人的家庭更有可能使用体罚式管教技术。班都拉(A. Bandura)和沃尔特斯(R. H. Walters)发现(1959),少年犯罪人的父母经常使用嘲笑和体罚,而守法少年的父母更多地使用归纳和爱的取消。其他研究发现,年幼品行障碍儿童的母亲在子女进行越轨行为和其他行为之后,比其他母亲更有可能使用命令和批评。不过,麦科德(J. McCord, 1979)发现,父母对儿童的攻击行为是儿童以后进行人身犯罪的重要先兆,但不是以后的财产犯罪的重要先兆。

然而,惩戒冲突(disciplinary encounter)的内容离不开相互作用的模式。麦科比(E. Maccoby)和马丁(J. A. Martin)用一种复杂的模式概括对儿童的母性行为(1983)。在这种模式中,围绕两个独立的模式安排相互作用的不同模式,这两个维度是:(1)感情(affection):接受、热情对排斥、敌意;(2)控制(control):命令、限制对不苛求(undemanding)、宽容。这种描述把少年犯罪人的家庭看成是严厉但是却不严格的,因为这两个维度代表了不同维度中的极端情形。将这些维度加以结合后,可以提出4种不同的父母行为模式:

1. 权威型(authoritative),特征是接受—命令;
2. 纵容型(indulgent),特征是接受—不苛求型;
3. 独裁型(authoritarian),特征是排斥—命令;
4. 忽视型(neglecting),特征是排斥—不苛求。

独裁型与使用体罚式管教相联系,尤其会对儿童产生道德发展水平低、攻击性强、自尊低等消极影响。不过,有缺陷的社会化也可能是由纵容型和忽视型模式引起的,研究文献涉及了少年犯罪中的独裁型和忽视型父母行为模式。

惩戒模式的后果因使用惩戒的强度、频率和一致性的不同而有区别。反复无常的或者不一致的惩戒可能意味着,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使用惩戒技术方面缺乏一致性,这两种情况在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例如,经常报告一个家庭中母亲放纵与父亲严格的情况。不过,行为主义的观点强调非相依后果(noncontingent consequence)的不一致性。帕特森(G. R. Patterson, 1982, 1986)在其论著中夸大了这种观点,他的实用主义的研究计划的目的是,建构一种有关强制性家庭过程(coercive family process)的社会学习理论,以便解释学龄前儿童和青春前期儿童的反社会行为。

帕特森的观察发现,无伤大雅的讨厌儿童的行为,例如,叫喊、抱怨、取笑、不理睬,在所有家庭中都是常见的。然而,随着使用有效的、非身体性的惩罚进行强化,随着优惠权利的取消、安排从事家务杂事,这类讨厌儿童的行为就会减少,并且会与教给儿童竞争性亲社会行为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行为相依现象似乎与其他调查者描述的父母行为的归纳模式和权威模式有关。在反社会儿童中,讨厌行为可能会持久存在,而越轨家庭也可以根据无缘无故地经常使用惩罚的现象加以区分。对连续性相互作用(sequential interaction)的微观观察表明,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相互性强制互换(reciprocal coercive exchange)发生的频率很高。母亲更有可能在发生越轨行为之后关注儿童,与儿童产生相互作用,用威胁性“唠叨”对儿童的越轨行为做出反应。她也可能对儿童进行长时间的强制互转,有时候会发展到身体虐待行为。父母关注、相互作用的得到或者恢复,会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产生正强化;而父母的惩罚被儿童的抵抗所终止时,儿童的攻击行为就会受到负强化。除了塑造攻击行为之外,父母也会强化儿童的强制性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可能会泛化到家庭内外的其他情境。

因此,帕特森强调,越轨家庭的特征是使用严厉但是并不一致的惩罚,而不是使用惩罚本身。不过,他区分了家庭中对反社会儿童采取的两类惩戒模式,这两类惩戒模式与儿童不同类型的越轨行为相联系。**社会攻击者**(social aggressor)欺负和殴打同胞兄弟姐妹,并且经常大发脾气;而**偷窃者**(stealer)表现出一种说谎、多动、纵火、偷窃的模式。社会攻击者的父母更有可能表现出一种卷入性模式(enmeshed style),即轻微的不良行为引起

情绪激动和很多的命令与批评, 强制性互动尤其可能会发生在这种家庭中。偷窃者的父母可能不会与儿童纠缠到一起, 他们会表现出一种放纵性模式 (lax style), 即只有很少的一些反社会行为受到惩罚。当使用惩罚时, 不考虑这种惩罚是否具有相依性。这两种模式在矫正儿童的越轨行为方面都是无效的。

放纵性模式和卷入性模式似乎与麦科比 (E. E. Maccoby) 和马丁 (J. A. Martin) 描述的忽视型模式和独裁型模式相类似。不过, 放纵性模式与后来的少年犯罪的联系似乎更密切。在 8 岁时就成为偷窃者的人中, 到 14 岁时 84% 的人有过与警察接触的记录; 在 8 岁时就成为社会攻击者的人中, 到 14 岁时 24% 的人有过与警察接触的记录; 正常少年在 14 岁时与警察接触的数量为 21%。到 14 岁时, 偷窃者中有 2/3 的人已经变成了慢性犯罪人。社会攻击者进行少年犯罪行为的比率较低似乎有点奇怪, 但是, 这种分类仅仅与家庭中的行为有关, 洛伯 (R. Loeber) 和斯托瑟莫-洛伯 (M. Stouthamer-Loeber) 注意到 (1986), 大多数强制性家庭的儿童表现出两种模式。

放纵性模式与对儿童行为的不适当**监督** (supervision) 或控制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是指父母是否知道儿童的行踪、交往、家庭之外的自由活动、儿童自己的回家规则; 一些研究发现, 不适当监督或控制是官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重要相关因素。不适当监督也是攻击性少年成长中的特征。在威尔逊 (H. Wilson, 1980, 1987) 对一个贫穷内城区 (deprived inner city area) 的少年进行的研究中, 母亲监督差在区分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中的作用, 要大于社会不利条件或父母犯罪。

尽管对儿童惩戒的监督具有明显的实际相关性, 但是, 这个术语几乎没有解释力。帕特森把监督看成是母亲技能 (maternal skill) 的重要成分, 它与处理冲突的效果和社会强化的使用有关。帕特森将它看成是少年犯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为许多越轨行为都没有受到惩罚。不过, 赫希 (T. Hirschi) 和戈德弗雷德森 (M. Gottfredson) 指出 (1988), 监督与犯罪实施的关系更加密切, 而与犯罪性发展的关系不太密切, 犯罪性可能在很早就产生了。与此明显一致的是这样的研究结果, 即父母监督与大龄青少年的少年犯罪的关系更为密切, 而与青春前期儿童的少年犯罪不太密切。

二、家庭互动

在惩戒模式中发现的极端的排斥和冷漠, 似乎更加普遍地扩展到少年犯罪人家庭内的相互作用。一些纵向研究发现, 在少年犯罪人的早期生活中, 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见不同、争吵、敌对态度、婚姻不稳定或者破裂。婚姻不和谐也与少年的品行障碍有关, 但是与少女的品行障碍无关; 还与少年的攻击行为在家庭之外的泛化有关。

少年犯罪人的父母更有可能对他们的子女表现出消极态度; 不过, 与父亲或者母亲的消极的相互作用是否更加重要, 尚不完全清楚。格卢克 (S. Glueck) 和格卢克 (E. Glueck) 发现 (1950), 少年犯罪人的父亲和母亲都对他们的子女缺乏感情, 而守法少年的父母则不是这样。但是, 班都拉 (A. Bandura) 和沃尔特斯 (R. H. Walters) 发现 (1959), 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比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受到损害; 少年犯罪人的父亲对他们的儿子更不热情、与他们的儿子一起度过的时间更少, 而守法少年的父亲不是这样。汉森 (C. L. Hanson) 等人发现 (1984), 冲突性的父子关系是儿童卷入犯罪的先兆。另一方面, 在麦科德 (J. McCord) 的纵向研究中, 母亲对 5~13 岁的儿童缺乏感情的现象, 与儿子后

来的财产犯罪有重要的关系,但是与儿子的人身犯罪没有关系。人身犯罪与父母冲突和对儿子的攻击行为有关系。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反映了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的影响力的变化。当然,也可能是一种累积效果,因为父母亲的排斥对后来的少年犯罪的效果,要大于仅仅父母一方排斥的效果。

少年犯罪人也描述了对他们的家庭的消极看法。伯盖特(R. Bhagat)和弗雷泽(W. I. Fraser)发现(1970),少年犯罪人用一种不太喜欢的语气评价他们的母亲,而守法少年则不是这样;少年犯罪人认为他们的父亲不大像理想的父亲,这也与守法少年形成对照。少年累犯也在穆斯家庭环境量表(Moos's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上认为他们的家庭缺乏凝聚力、缺乏感情表达,也认为家庭缺乏成就和娱乐,而守法少年则没有这样的评价。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也与缺乏和父母的感情卷入有关,还与亲子冲突多、父母信任低、缺乏亲密交往有关。不过,坎特(R. J. Canter, 1982b)发现,缺乏家庭依恋与少年犯罪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与少女犯罪的关系不太密切。

缺乏卷入也表现为,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一起进行的闲暇活动更少。法林顿(D. P. Farrington)和韦斯特(D. I. West)报告说(1990),12岁的儿童与父亲之间极少共同开展活动的现象,是他们20岁以后进行犯罪的重要预测因素。当他们共同开展活动时,父子之间更有可能产生不和谐。例如,赫瑟林顿(E. M. Hetherington)、斯托维(R. J. Stouwie)和里德伯格(E. H. Ridberg)的观察发现(1971),在结构性互动期间,少年犯罪人的家庭较少表现出温暖,而较多地表现出敌意,相互之间有很多的消极期望,不大可能达成共识,而守法少年的家庭不是这样。在对缺少父亲家庭中母子互动的观察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中缺乏积极的交往和感情。

在一些家庭中,不和谐扩展到父母对子女的身体虐待。第九章中将讨论家庭暴力,但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身体虐待的经历是一般的少年犯罪的先兆因素,更是暴力犯罪的先兆因素。韦德姆(C. S. Widom, 1989a)评价了有关童年时期的身体虐待与后来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证据,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的暂时性结论。大多数受到身体虐待的儿童后来都没有变成反社会者;一些研究表明身体虐待可能不是少年犯罪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例如,麦科德(J. McCord)的追踪研究显示,父母排斥的经历是重要的,但遭受虐待本身并不是重要的,因为遭受过排斥的儿童中有50%的人实施了严重少年犯罪,而遭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中只有20%的人实施了严重少年犯罪,得到父母关爱的儿童中仅仅有11%的人实施了严重少年犯罪。布朗(S. E. Brown, 1984)也发现,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与所报告的忽视和感情虐待之间有联系,但是与身体虐待之间没有联系。不过,韦德姆(1989b)描述了一项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这项研究的对象是被官方认定为受到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她发现,这些儿童到成年后更有可能进行犯罪。在男性中,42%的人变成了犯罪人,而对照组中仅有33%的人变成了犯罪人;在女性中,16%的人变成了犯罪人,而对照组中仅有9%的人变成了犯罪人。虐待也与后来的暴力犯罪有密切联系,当然,暴力犯罪仅仅由男性实施。这个领域内研究结果中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不同的虐待标准造成的。

三、家庭破裂

长期以来,人们发现犯罪人更有可能来自缺少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破裂”家庭。例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对法庭送来的儿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奇尔顿(R. J. Chilton)和

马克尔 (G. E. Markle) 发现 (1972), 28% 的白人男性少年犯罪人来自单亲家庭, 而全国白人的单亲家庭比率是 13%; 59% 的黑人男性少年犯罪人来自单亲家庭, 而全国黑人的单亲家庭比率是 43%。矫正机构内的犯罪人来自单亲家庭的比率最高。不过, 由于缺乏完整家庭本身可能影响有关是否监禁少年犯罪人的裁决, 因此, 这样的研究结论可能夸大了单亲家庭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在剑桥—萨默维尔研究中发现, 童年期缺少父亲并不能预测后来的少年犯罪和成年犯罪。社区调查也发现了一种比较微弱的相关关系。赫希 (T. Hirschi, 1969) 没有发现缺少父亲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之间存在一致性的关系。尽管其他人报告说存在这样的关系, 但是, 兰金 (J. H. Rankin, 1983) 发现, 缺少生父或者生母仅仅与某些少年犯罪有联系, 特别是与逃学、离家出走这样的身份犯罪有联系。

总体而言, 缺少生父或者生母对少年犯罪似乎都有一定的效果; 缺少父亲家庭的少年也会表现出更强的暴力性和更低的道德发展水平。不过, 只有少数人适当地研究了缺少生父或生母的理由、缺少生父或生母的时间; 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抽样差异。例如, 坎特 (R. J. Canter, 1982b) 的研究认为, 缺少生父或生母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 在少年中更加明显, 而在少女中不太明显。奇尔顿和马克尔 (1972) 的研究发现, 在大龄儿童中更加明显, 而在年幼儿童中不太明显; 在白人青少年中更加明显, 而在黑人青少年中不太明显。不过, “破裂家庭” (broken home) 的概念是含糊的, “完整” 家庭与 “破裂” 家庭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单, 它主要依赖家庭生活的自然概念而不是功能概念。

对父母缺少的理由的研究发现, 当家庭破裂是由离婚、遗弃、父母分居而不是由死亡造成的时候, 单亲家庭与犯罪的联系最明显。同样, 被鉴定为社会化差的学生, 所报告的父母离婚率高于社会化较好的学生的父母离婚率, 但是社会化差的学生没有报告很高的父母死亡率。麦科德 (J. McCord)、麦科德 (W. M. McCord) 和瑟伯 (E. Thurber) 的观察发现 (1962), 尽管缺少父亲家庭的少年被定罪的数量多于完整家庭的少年, 但是, 他们在这方面与完整家庭的少年并没有差别, 而是与冲突家庭的少年有差别。因此, 可以认为, 破裂家庭对少年犯罪的效果主要是由家庭不和谐造成的, 这种家庭不和谐既可能在离婚或者分居之前发生, 也可能在离婚或者分居之后发生。这一结论也可能适用于离婚家庭中儿童的品行障碍。莱希 (B. B. Lahey) 等人发现 (1988), 在就诊儿童中, 品行障碍与父母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明显相关, 但是与父母离婚之间并不相关, 这表明, 离婚与品行障碍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由父母的反社会倾向造成的, 而不是由父母的离婚造成的。

不过, 离婚或者分居对留家父亲或者留家母亲 (remaining parent)⁴, 通常是留家母亲的压力, 可能会加剧留家父亲或者留家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冲突。单亲家庭的母亲可能会遇到社会支持降低、经济困难、家务负担过重等问题。有证据表明, 在离婚后的头一年养育活动会恶化。这可能取决于母亲的特征, 因为麦科德等人 (1962) 发现, 当母亲温和而没有越轨行为时, 缺少父亲家庭中少年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一些研究认为, 破裂家庭会增加自我报告的身份犯罪, 特别是少年的身份犯罪的可能性, 这种研究结论也支持麦科德等人的观点, 因为当母亲疏于管教时, 更有可能发生逃学和离家出走行为。

一项有关的假设认为, 母亲的额外负担减少了监督的机会。帕特森 (G. R. Patterson) 和斯托瑟莫-洛伯 (M. Stouthamer-Loeber) 引证的麦科德未发表的研究表明 (1984), 由

4. 留家父亲或者留家母亲是指离婚或者分居之后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父亲或者母亲。——译注

于家庭地位的不同,进行适当的监督的概率也不同。完整家庭进行适当的监督的概率是0.70,父母有冲突的家庭是0.50,只有缺乏柔情的母亲的破裂家庭是0.20。缺乏监督也可以解释斯坦伯格(L. Steinberg, 1986)的研究结果,斯坦伯格认为,挂钥匙儿童(latch key children)的母亲因上班而不在家⁵,他们在放学后更有可能受到同辈朋友的压力而参与反社会行为。不过,这种现象因母亲的惩戒模式的不同而有区别。

另一种假设认为,缺少父亲本身是很关键的,因为儿童缺少男子行为的榜样。培根(M. K. Bacon)、蔡尔德(I. Child)和巴里(L. H. Barry)对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preliterate society)进行的一项跨文化研究(1963),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在父亲不参与儿童养育活动的社会中,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的发生率都很高,他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缺乏男子气认同以及后来的男子气关注的机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破裂家庭对男孩的影响更大,而同辈群体为什么对缺少父亲家庭中少年犯罪的影响更大的原因。不过,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不和谐家庭对少年犯罪的影响要大于因死亡而破裂的家庭的原因。

一种社会学观点认为,家庭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化机构和控制机构,而且也是确定个人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来源。根据这种观点,破裂家庭可能通过改变家庭的社会关系而引起少年犯罪,例如,通过创造离婚家庭的儿童是越轨者的刻板观念引起少年犯罪,因为这种刻板观念会导致自我实现预言效果。破裂家庭与官方少年犯罪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关系不太密切,这一结论与这样的观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可以解释继发越轨行为,但是并不能解释由于破裂家庭和完整家庭中的不和谐关系而产生的初次越轨行为(primary deviance)。

四、父母越轨

犯罪人有犯罪父母的可能性要大于守法者。例如,在剑桥研究中,后来变成少年犯罪人的少年中,37.9%的人在10岁时父母一方就有了犯罪记录,而守法少年在10岁时父母一方有犯罪纪录的只有14.6%。家庭犯罪性也可以预测20岁以后的持续犯罪性以及暴力犯罪。反过来讲,少年犯罪人更有可能产生少年犯罪子女;人们已经发现攻击行为也有类似的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现象。这种现象似乎也适合于品行障碍,因为莱希(B. B. Lahey)等人发现(1988),在有品行障碍的就诊儿童中,50%的人有一位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父亲或者母亲(主要是母亲),而具有其他障碍的就诊儿童中,只有11%的人有一位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父亲或者母亲。

人们已经提出了几项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种联系反映了父母和儿童共有的遗传因素,但是,这种解释似乎更加适合于持续性犯罪行为,而不太适合于短暂性少年犯罪。第二种解释认为,这种联系涉及到父母对反社会行为的塑造。在剑桥研究中,当父母的犯罪行为延续到子女养育期时,这种联系最为明显;在18岁以后初次犯罪的人中不存在这种联系。不过,韦斯特(D. J. West)和法林顿(D. P. Farrington)没有发现犯罪父母直接塑造或者卷入儿子的犯罪活动的现象。尽管他们认为,警察也可能对犯罪家庭给予更多的监视,但是,他们认为无效的儿童养育活动是一种更有可能的因素,因为在控制了其他

5. 挂钥匙儿童(latch key children)是指父母都参加工作因而自带家门钥匙的儿童,他们在放学回家后自己开门进屋。 译注

因素之后发现, 犯罪父母最明显的特征是对子女的监督差。威尔逊 (S. Wilson, 1980) 在英国伯明翰的研究发现, 生活在贫穷住宅区的父母的犯罪行为也与放纵性儿童惩戒方式有关。

不过, 父母的犯罪行为与无规律的就业和对福利救济的依赖有关, 这会增加家庭压力 and 促使家庭破裂; 通过其他方式也发现, 少年犯罪人的父母是越轨者。麦科德 (J. McCord, 1986) 发现, 当父母越轨行为与父母攻击性和冲突相结合时, 父母越轨行为的影响效果最强烈; 当父亲尊重母亲和关爱儿童时, 父母越轨行为的影响效果相对较弱。科尔文 (I. Kolvin) 等人也发现 (1988), 后来变成犯罪人的少年的父母, 更有可能被描绘成攻击性的、“无能的”。因此, 越轨父母不能提供规范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榜样, 这是对父母犯罪性的影响效果的更进一步的解释。

五、家庭规模与兄弟姐妹关系

家庭规模大是另一种公认的少年犯罪相关因素。在剑桥研究中, 少年犯罪人更有可能来自有 4 个或者更多子女的家庭。赫希 (T. Hirschi, 1969) 发现, 在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中存在类似现象。尽管家庭规模似乎不是犯罪少女的重要相关因素, 但是, 累犯也来自大家庭。

当父母有犯罪行为时, 对家庭规模与其他家庭因素之间的联系的解释就要复杂一些。大家庭更有可能生活在贫穷而过分拥挤的住宅中; 而在有少年犯罪儿童的大家庭中, 父母往往是犯罪人。因此, 尽管更大的压力和家庭解组是可能的解释因素, 但是, 家庭收入、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是这种联系的解释因素; 父母犯罪行为的影响可以排除在外。大家庭也更难进行惩戒活动, 对儿童的监督可能会不足; 但是在赫希的研究中, 在控制了监督因素之后, 家庭规模的效果仍然存在。一种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是, 这种家庭中的儿童不大可能得到父母的关注和爱护, 从而限制了儿童亲社会技能的发展。独生子是不大可能变成少年犯罪人的, 少年犯罪人有可能是排行中间的儿童。不过, 赫希发现, 在控制了感情联系和与父母的相互作用之后, 家庭规模的效果仍然存在。相反, 在把少年犯罪人和犯罪少女与年龄相近、没有犯罪的同胞兄弟姐妹进行比较时, 赖茨马—斯特里特 (M. Reitsma-Street)、奥福德 (D. R. Offord) 和芬奇 (T. Finch) 发现 (1985), 少年犯罪人报告在早年与父母之间有积极的相互作用的情况较少。因此, 后来变成少年犯罪人的大家庭儿童受到父母的差别对待, 也是有可能的。

最有可能的因素是受少年犯罪兄弟姐妹的影响。格卢克 (S. Glueck) 和格卢克 (E. Glueck) 发现 (1950), 他们所研究的少年犯罪人中, 65% 的人有少年犯罪兄弟姐妹, 而守法少年中只有 26% 的人有少年犯罪兄弟姐妹。由于这种影响在小家庭和大家庭中都起作用, 因此, 它可能比家庭规模更加重要。不过, 家庭规模的影响效果取决于家庭中兄弟的数量, 而不取决于姐妹的数量, 这表明存在一种“传染”效果。因此, 家庭规模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这种联系, 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儿童更多地把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当做社会学习的榜样和来源。

六、社会经济剥夺

尽管现在认为少年犯罪与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很微弱, 但是一般人还是认为, 少年犯

罪人容易来自生活条件差的家庭。例如，贫穷、住房差、过度拥挤、依赖救济。这些因素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公认。在剑桥研究的研究对象中，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占多数；在这项研究中还发现，家庭收入低是后来的少年犯罪的一种相对独立的预测因素。在其他几项研究中也发现，少年犯罪人的家庭更有可能依赖救济。赫希（1969）也发现，尽管少年犯罪与社会阶级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少年犯罪与父亲失业之间有联系。

这些条件的心理效果又被它们与其他因素，例如父母犯罪性、父母监督之间的联系搞模糊了。不过，它们不可能对犯罪行为直接产生影响，因为剥夺是一个相对的术语，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术语，少年犯罪人并不会仅仅因为缺少食物或者衣服而偷窃。而且，并非所有的贫穷家庭都会产生少年犯罪人。例如，在威尔逊（H. Wilson, 1980）发现，在贫穷地区，社会不利条件与松懈的监督有联系，但是与自我报告的严重少年犯罪没有联系。

紧张理论和亚文化理论认为，这些效果是以生长在这种条件下的儿童获得的规范为中介的。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见第五章）。社会生活条件差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会助长某些价值观和标准，这些价值观和标准是在工人阶级中更加明显的那些儿童养育特征的例子。这些价值观和标准包括更经常地使用体罚式管教，这种管教方式又会更加重视外部强加的规则，而不太重视自我指导；使用“有限的”语言交流模式，而不是使用“详尽的”语言交流模式；重视现在，而不重视未来。经济困难也可能是压力的一种来源，这样产生的压力会损害父母养育技能。不过，现有证据并不允许在这些条件之间进行选择。

七、少年犯罪人之间的差异

大多数有关家庭因素的研究，都集中于这些因素对作为一种总体后果的少年犯罪的非特异性效果，而很少关注这些因素与特定类型越轨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不过，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麦科德（J. McCord, 1979）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区分了预测人身犯罪和财产犯罪的不同类型的家庭预测因素。人身犯罪与家庭冲突、缺乏母爱、缺乏监督有关，财产犯罪主要与缺乏母爱和监督有关。人们在早期也注意到，帕特森（G. R. Patterson）所研究的偷窃者主要来自放纵性家庭，所研究的攻击者主要来自卷入性家庭和强制性家庭，而表现出这两种模式的儿童则来自最严重的强制性家庭。

休伊特（L. Hewitt）和詹金斯（R. L. Jenkins）也发现（1946），社会化的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大多来自具有忽视、放纵特征的家庭，而未社会化的攻击性儿童一般都具有遭受父母排斥的历史，焦虑退缩性儿童具有父母控制过度的历史。詹金斯（1960）比较了精神病态性退伍军人和神经症性退伍军人，发现精神病态性退伍军人更多地描述了父母冲突和父亲的排斥，但是，他们对母亲的态度更加消极。福多（E. Fodor, 1973）也发现，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描述他们较少得到父亲的养育和奖赏，评价他们的母亲不求上进，而其他人没有对其父母进行这样的评价。

赫瑟林顿（E. M. Hetherington）、斯托维（R. J. Stouwie）和里德伯格（E. H. Ridberg）把守法少年的家庭与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神经症性少年犯罪人、亚文化性少年犯罪人进行了比较（1971）。后3种少年犯罪人类型是根据奎伊（H. C. Quay）的维度在行为互动量度和一种父母问卷中的表现区分出来的。亚文化性少年犯罪人的父母较少表现出婚姻冲突，也不太排斥他们的子女，但是却纵容子女。神经症性少年犯罪人的父母往往排斥子女，而且对可能对子女使用体罚式管教。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与神经症

性少年犯罪人的家庭相似,鼓励儿子在家庭之外进行攻击行为。在支配关系方面也存在差异,在亚文化性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中,父亲可能居支配地位;在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的家庭,父亲支配的程度可能较小;而在神经症性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中,母亲可能占据支配地位。犯罪少女家庭中的这类差异不明显。

这些资料中表现出一种暗示性的趋势。在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和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的家庭中,更有可能发生父母冲突,更有可能遭受父母排斥,更有可能使用体罚式管教;在亚文化性少年犯罪人和偷窃者家庭中,父母更加放纵,也更容易忽视他们。不过,这些结论肯定是暂时性的。

八、对家庭与少年犯罪的评论

在横剖研究和纵向研究设计中,一直用家庭因素区分少年犯罪人;家庭因素既是官方少年犯罪的标准,也是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标准。对于品行障碍和攻击行为来说,也是如此;对于其他一些越轨行为,例如,吸毒、酗酒来说,仍然是如此。研究发现,少数一些家庭因素可以解释大部分犯罪行为,这也证实了家庭的作用。例如,在剑桥研究中追踪的研究对象达到成年时,4.6%的家庭可以解释48%的有罪宣判。不过,由于一些原因,家庭因素与目前或者后来的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意义,仍然是推测性的。

第一,家庭因素与目前或者后来的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的强度通常是不太大的。在剑桥研究中,当排除了官方少年犯罪的影响时,大多数家庭因素不再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相关。这表明,警察对已知的越轨家庭的注意,可能加大了家庭对少年犯罪的作用。这一观点不可能解释少年犯罪与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之间的联系,在对年幼儿童的品行障碍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这种观点强调,家庭因素只能解释很少一部分越轨行为。

第二,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仍不清楚。在一项超级分析中,洛伯(R. Loeber)和斯托瑟莫-洛伯(M. Stouthamer-Loeber)发现(1986),相对预测力在同时研究(concurrent study)和纵向研究之间是不同的;但是,像监督、父母排斥、父母子女卷入(parent-child involvement)这些功能性因素的预测力,都要强于结构性因素。麦科德(J. McCord, 1979)发现,父母越轨行为、监督、冲突与对儿童的态度之间的相关程度达到0.40;而洛伯和斯托瑟莫-洛伯(1984)报告说,监督、惩戒效果、社会强化的使用与问题解决之间的相关程度在0.14~0.73之间。

这种相互依赖性仍然有待阐明。但是,这些因素总体与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要大于单一因素与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当父母双方(而不是其中一方)进行排斥时,少年犯罪和品行障碍更有可能发生;在父母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存在父母排斥的情况下,监督与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但是在缺乏这些情况的条件下,监督与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性不太显著。这些因素究竟具有加法效应还是具有乘法效应,还不清楚。但是,一些调查人员已经尝试综合应用多项因素预测少年犯罪。例如,格卢克预测指数(Glueck prediction index)包括母爱、父爱、母亲监督、父亲管教和家庭凝聚力;使用这个指数,可以很好地预测后来的少年犯罪。在剑桥研究中,家庭收入低、家庭规模大、儿童养育活动不稳定、智商低、父母有犯罪行为,是比较独立的少年犯罪预测因素。在63名具备2项或者3项预测因素的少年中,46人(73%)在32岁时被宣判有罪;而在其余的人中,只有30.7%的人在32岁时被宣判有罪。不过,尽管这种联系非常显著,但是,2/3以上的少年犯罪人

并不是来自高危险群体的,这说明有很高的虚假肯定预测率(false positive prediction rate)⁶。同样,科尔文(I. Kolvin)等人发现(1988),在那些经历了一种或者多种剥夺(婚姻不稳定、父母疾病、儿童照料差、社会依赖、过度拥挤、母亲技能差)的人中,一半以上的人后来有犯罪记录,但是,研究对象中2/3以上的犯罪人没有经历过剥夺。这一研究结论再次表明,家庭因素的作用是不太大的。第三,认为家庭因素与犯罪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家庭因素与少年犯罪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反映了第三种因素的影响,例如,遗传因素,儿童的气质。换言之,父母养育活动差可能是由贫穷、住房条件差这些结构因素引起的压力的一种结果,也可能是儿童本身的少年犯罪造成的压力的一种结果。因此,家庭互动过程是否会加剧越轨倾向,仍然不清楚。

学习理论家把这种关键因素看成是父母管教活动的效果的反映。帕特森(G. R. Patterson, 1982, 1986)认为,父母管理技能差是主要原因因素。差的父母管理技能意味着,父母在监控儿童行为、讲述规则、对越轨行为的相依惩罚、强化遵从行为、调解争执等方面存在缺陷,其结果是儿童学会使用越轨方式满足其需求。同样,在缺少分享和交流的情况下,父母无法把符合规范的价值和问题解决技能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反社会儿童不仅在入学时讨厌同辈朋友和老师,而且也缺乏自助技能、亲昵技能和学习技能。这些特征导致学业成绩差,进一步受到家庭以及同辈朋友的排斥、自尊低,这些结果累积起来就会导致少年犯罪。对父母技能的重视与控制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家庭不能强化儿童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

另一种因素可能是儿童通过模仿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越轨行为而发展越轨行为方式的机会。社会学习理论和依恋理论都预测,依赖关系的破裂不仅会引起儿童的敌意,而且会降低儿童认同或者模仿父母的动机。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男性少年犯罪人不大可能把他们的父母作为角色榜样。

可以说,缺乏父母关爱是很重要的,父母对儿童的排斥似乎是少年犯罪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无论是心理动力学理论,还是控制理论,都可以预测到这一点。但是,这也与父母技能缺陷和模仿假设有关。不能机械地使用技能,技能的应用有赖于推动应用技能的动机。那些发现自己的孩子很讨厌的父母,不大可能与孩子进行积极的互动,也不大可能关注孩子的社会训练。反过来讲,儿童也不大可能模仿冷淡或者敌视他们的父母。他们也更有可能受到家庭之外的影响的干扰。

第三节 学校与群体影响

少年犯罪发生的高峰时间,是义务教育期间和紧接义务教育后期的阶段。这个阶段学业成绩差,会增大少年犯罪的危险性,从官方少年犯罪标准 and 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标准来衡量都是如此。成年犯罪人也更有可能有学业成绩差的历史。不过,学校的原因作用仍然是不清楚的。一些理论家认为,教育系统通过向工人阶级的孩子灌输他们不愿接受的中产阶级的标准而引起少年犯罪。激进犯罪学家进一步认为,发展全民教育是为了确保对大多数数人进行社会化,以便使他们服从和愿意完成工业所要求的任务:那些破坏性的,变成少

6. 指预测可能要犯罪的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犯罪的比率。——译注

年犯罪人的人，抗拒让人们从事异化劳动的要求。

尽管有证据表明，那些在学校中遭受失败的人会疏远学校，对学校充满敌意，并且也更有可能逃学和过早辍学，但是，一些理论家指出了学业失败的学生的一些特征，例如，智力有限、缺乏满足班级要求所必需的社会技能、缺乏建立同辈朋友关系的社会技能，智力与其他少年犯罪相关因素的联系，将在第八章讨论。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分析都认为，学校因素相对而言是不变的，不能认为学校本身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不过，学校之间在教育哲学和社会组织方面有所不同，在促进或者抑制少年犯罪方面也有所不同。

一、少年犯罪学校

众所周知，不同学校的学生进行少年犯罪的比率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是否由学校内部的过程所引起，或者这些过程可能是什么样的过程，人们并不太清楚。在对伦敦内城区20所中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鲍尔（M. Power）等人发现（1967），年度少年犯罪率从不到1%到19%不等，这些犯罪率在6年多时间中都是一致的。这些犯罪率差异与学校所在社区的少年犯罪率无关，这表明，校内因素可能对少年犯罪起作用。雷诺兹（D. Reynolds, 1976）也发现，英国威尔士的9所中学的少年犯罪率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由社会阶级或者学校接受的学生的能力水平造成的，而是由于校内过程造成的。不过，剑桥研究的结果向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法林顿发现（1972），挑选进行研究的同生群（cohort）的6所小学，其学生后来的少年犯罪率是不同的，而且，在大多数小学生进入的13所中学的少年犯罪率也明显不同。不过，少年犯罪多发学校（high delinquency school）所接受的那些在8岁时被老师认为“惹麻烦”（troublesome）、在10岁时被同伴认为是“惹麻烦”的儿童占有很大的比率。这种差别可以预测后来在少年犯罪方面的差别：在那些惹麻烦最多的少年中，44.6%的人变成了少年犯罪人；而那些不太惹麻烦的少年中，只有3.5%的人变成了少年犯罪人。由于惹麻烦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少年学习的中学类型的影响，因此，法林顿认为，学校本身对少年犯罪的影响很小。他将一些学校中很高的少年犯罪率归因于这些学校所招收的学生的特征，父母会选择声誉更好的学校，而学校也会选择品行良好的学生。

法林顿的一般性结论受到了拉特（M. Rutter）等人的支持。拉特等人（1979）研究了伦敦内城区的12所综合学校。他们检查了学校过程因素，例如，教学技能、奖惩的使用、学生参与、4种结果量度（旷课、学校中的行为、学业成绩、少年犯罪）之间的联系。同时，控制了新生父母的职业和学业成绩等特征。学校少年犯罪主要与新生有关，少年犯罪多发学校招收的能力很强的新生极少。其余的结果量度相对而言不受新生的影响，但是，所有4种结果量度在集合水平（即学校水平）上明显相关。尽管新生是很重要的预测因素，但是，少年犯罪与下列过程因素也明显相关：教师在计划课程方面的高度自主性，教师只讲授他们自己的课程的倾向，不同的（而不是分组的）纪律标准，经常用“站队”、额外劳动进行惩罚，很少赞扬学生的劳动，很少期望学生会照管自己的资源，学生同辈群体缺乏稳定性。

这项研究因为在选择过程因素方面的非理论性而受到批评，研究结果中也没有直接指出任何明显的社会心理含意。尽管学校新生的少年犯罪倾向会明显影响学校的少年犯罪率，但是，学校的一些特征也会影响少年犯罪的状况，其他一些研究的研究结果也具有启发性。例如，哈格里夫斯（D. H. Hargreaves, 1980）根据对一所中学的参与观察提出这样的假

设,即一些能力分组方式促成了少年犯罪性亚文化的形成。雷诺兹(1976)也注意到,少年犯罪多发学校容易进行强制性的、严苛的纪律惩戒,而少年犯罪少发学校更有可能通过协商而“休战”,在这些学校中,一些规则并不是严格地执行,例如,有关禁止吸烟、逃学行为的规则。

哈格里夫斯(1980)在概括少年犯罪多发学校的显著特征时,试图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他提出,在学校风气、学校的社会组织中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班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相互影响的,学校的少年犯罪水平可能是学校为了提高学校声望和维护学校秩序而制定的政策的附带后果。他提出,“典型的”少年犯罪多发学校坐落在比较贫穷的邻里地区。学校的选择或父母的选择都会使比较有能力学生在能力分组中流失。更重要的是,学校员工怀有学生能力差的信念,从而造成学校员工的奉献差和学校员工的频繁流动。

针对这种背景,关键的政策决策应该考虑学生和员工的能力分组问题,考虑学校增强其权威的问题。第一,应当实行一种灵活的能力分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应当有规律地根据学业成绩升级或者降级,从而将能力好的学生和能力差的学生分开。相比较而言,在一种稳定的能力分组制度中,创造了一种比较同质的同辈群体;而在一种灵活的能力分组制度中,更有可能造成能力差小组的少年犯罪性亚文化与能力强小组的学习亚文化(恃才傲物、刻苦学习)之间的两极分化。第二,当学校员工的流动造成“差的”教师被安排到能力差小组时,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就会加剧。“差的”教师更有可能对学生怀有消极的期望,当允许执行规则时,这样的教师很可能成为“越轨行为激发者”,或者采用强制手段控制班级。严格执行那些学生并不认为是合法的规则,例如,禁止自由着装,通过否认能力差小组学生所渴望的成人地位而进行“地位剥夺”(status deprivation),就会加剧他们对学校的反感。

哈格里夫斯承认,这个过程是推测性的,支持性证据仍然是支离破碎的。不过,有一些与能力分组、标定和教师惩戒活动的效果有关的研究结果,哈格里夫斯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是很重要的。第一,能力分组并不是一致地与少年犯罪有联系。芬利森(D. S. Finlayson)和洛克伦(J. L. Loughran)发现(1976),无论是在少年犯罪多发学校,还是在少年犯罪少发学校,属于能力强小组中的学生都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努力;但是,只有在少年犯罪少发学校内属于能力差小组的学生中,少年犯罪人才会在数量上占优势。尽管美国的一些研究指出,按学习成绩分组对少年犯罪有一种促进效果,但是,瓦特罗斯基(M. D. Wiatrowski)等人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1982),没有证实这一点。

也有一些证据证实,把学生标定为越轨者与少年犯罪有联系。在对美国中学生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中,埃里奥特(D. S. Elliott)和沃斯(H. L. Voss)发现(1974),在那些后来退学的人中,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很大,退学学生的少年犯罪在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减少了,这表明反社会行为受学校加给他们的“失败角色”的影响。他们提出,教育失败和学校对这种失败的反应结合起来,决定了反社会后果。这种观点得到了梅纳德(S. Menard)和莫尔斯(B. J. Morse)的研究(1984)的支持。梅纳德和莫尔斯认为,在学校中受到消极标定、与少年犯罪伙伴的交往,可以有效地解释13岁的学生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中的大部分越轨行为,而智商和学习成绩(academic performance)没有这样大的解释力。人们也发现,学业成绩(school performance)与教师期望有关,这说明对能力差的学生不同对待,可能对行为有重要影响。

很多人关注教师惩戒活动与班级行为的关系,而不太重视教师惩戒活动对少年犯罪的作用。但是,教师惩戒活动将校内的破坏行为与校外的少年犯罪联系了起来,这样的惩戒活动可能对少年犯罪产生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少年犯罪多发学校内的强制性惩戒活动,使得这种学校的学生把他们的老师看成是使用其权力的独裁者。对班级内行为矫正的研究,也突出地显示了教师的管理技能在加剧或者控制破坏行为方面的作用。例如,格雷厄姆(J. Graham, 1988)发现,有效的规则执行涉及到惩罚制度,在这样的惩罚制度中,教师使用的制裁应该是有系统的、可预测的、立即实行的和一惯性的,这种惩罚制度类似于权威型父母模式(authoritative parental style)。这再次说明,教师期望可能是很重要的。教师很容易形成对学生的未来能力的期望,并且很容易根据自己对学生未来成就高低的期望区别对待学生。那些教师认为不会取得大成就的学生,尤其容易因为失败而受到批评,但是很少因为成功而受到赞扬,教师对这样的学生很少给予情感支持。

一些有启发性的证据显示,将一些学生“边缘化”的学校过程,可能会促使学生转而进行少年犯罪。反过来讲,一些学校可能会抑制这种转化过程。这无疑反映了学校过程与学生自身特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不过,在学校对少年犯罪的促进作用和个人与家庭中早年产生的先兆因素对少年犯罪的促进作用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仍然不得而知。学校影响少年犯罪的心理机制仍不清楚。哈格里夫斯(D. H. Hargreaves)的分析表明,少年犯罪是由学生对在学校中没有获得成人地位的挫折所进行的反抗造成的,少年犯罪得到了一种反学校文化的支持。其他研究者认为,学校失败会降低自尊,而从越轨同辈群体中获得的赞同可以恢复自尊(见第八章)。许多校内破坏行为也可能是为了寻求刺激而进行的。当一些学生对学习要求产生厌烦情绪时,就会产生寻求刺激的动机。

二、同辈群体⁷

人们认为,不管厌恶学校的性质如何,同伴支持都是少年犯罪后果的一种重要决定因素。大量的研究发现,预测青少年中少年犯罪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就是亲密朋友的少年犯罪;少年犯罪行为通常都是群体性的。例如,在美国马里兰州对法庭审判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奥尔特曼(M. G. Aultman, 1980)发现,大约2/3的犯罪是与别人一起实施的,主要是由2-3人的小群体实施的。不过,群体犯罪在非暴力性犯罪中更为明显(65%)。在暴力性犯罪中不太明显(43%);大多数成人犯罪属于单人犯罪。在剑桥研究中,与别人(包括兄弟)一起实施的犯罪,在年幼少年犯罪人中更常见;共同犯罪人往往相互住得很近,可能就住在犯罪地。人们认为,少年犯罪与群体过程之间的这种联系,反映了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时父母影响逐渐让位于同伴影响的更加普遍的转变。不过,就像少年犯罪与家庭和学校的相关性那样,同辈群体是否具有原因效果尚不确定。人们对少年犯罪群体的形成还不清楚,而且对这种群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行为倾向有多大影响,也不清楚。

亚文化理论认为,少年犯罪同辈群体直接引起少年犯罪。少年犯罪交往的形成,被看成是接触邻里中存在的少年犯罪亚文化群的结果,这种亚文化群对许多青少年的交往具有重大的影响。哈格里夫斯(D. H. Hargreaves, 1980)对学校影响的分析,是这种观点的

7. 同辈群体(peer group)又译为“同伴群体”、“同龄群体”等,是指由地位相同的人组成的群体,例如,同年级学生、同年龄儿童,学业成绩处于同一水平的学生、退休老人群体等。——译注

一种表现。尽管有证据证实少年犯罪性亚文化 (delinquent-prone subculture) 是反学校的, 但是, 这种亚文化的意义是不明确的。哈格里夫斯也针对紧张理论提出, “地位剥夺”会引起反学校倾向的动机, 也会促使人们关注群体形成, 但是, 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同的过程。例如, 戈尔德 (M. Gold, 1978) 提出, 学校志向与学校成就之间的差距, 与学校排斥和自尊降低有联系。反社会行为是传递越轨信息的自我表现, 这种表现受到具有类似问题的同伴的奖赏。

不过, 帕特森 (G. R. Patterson, 1986) 认为, 同伴对攻击性青少年和缺乏社会技能青少年的排斥, 会促使这些受到排斥的人结交具有类似情况的同伴。人们已经发现, 结交越轨同伴与社会技能缺陷有密切的关系, 也与青少年早期的同伴排斥和学业失败有关系。研究表明, 在学校中受到同伴排斥的儿童, 更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 受到排斥的儿童和攻击性儿童在以后更有可能产生适应问题, 包括卷入犯罪。

但是, 如果攻击性儿童表现出社会疏远倾向和缺乏社会技能, 那么, 他们的同辈群体关系就会很薄弱, 这似乎与人们假定的同辈群体在少年犯罪中的作用不一致。乔达诺 (P. C. Giordano)、杰克维奇 (S. A. Gernkovich) 和皮尤 (G. M. Pugh) 对交友与少年犯罪进行了一项自我报告式研究 (1986), 他们的研究对少年犯罪人缺乏交往技能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他们发现, 大多数少年犯罪人都不是社会隔绝者 (social isolate), 他们能够建立和维持友谊; 而比较守法的青少年却表现得不太善于交往。凯恩斯 (B. D. Cairns) 等人的研究发现 (1988), 尽管攻击性儿童不太受同伴的欢迎, 但是, 他们并不是社会隔绝者, 他们会结交其他的攻击性儿童。霍金斯 (S. Hodgins) 和麦科伊 (J. F. McCoy) 的观察发现 (1989), 受到排斥但是并非攻击性的儿童在社会互动中的缺陷, 要比受到排斥但具有攻击性的儿童更加明显。因此, 需要进一步澄清排斥、攻击行为、互动技能与少年犯罪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习理论并不承认少年犯罪亚文化群, 但是, 这种理论提出, 同辈群体通过同伴赞许的塑造、强化机制促进少年犯罪行为的获得、开始和维持。因此, 少年犯罪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越轨同伴对青少年强化来源的控制, 而不依赖于父母和遵从性同伴 (conforming peer)。一些研究结果中包含了这样的差别性控制: 少年犯罪人结交少年犯罪朋友, 与少年犯罪朋友一起度过很多时间, 进行更多的同伴性闲暇活动, 例如, 约会, 在街头游逛、骑车。一些研究也发现, 少年犯罪人观察自己喜欢的同伴的越轨行为, 这些同伴为这样的行为提供了社会支持。研究发现, 少年犯罪人所报告的少年犯罪行为的类型, 与少年犯罪朋友所报告的类似行为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 少年犯罪人直接模仿他们的朋友。

亚文化理论认为, 青少年被动地加入少年犯罪群体, 在少年犯罪群体的影响下进行少年犯罪;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 青少年根据个人特征主动选择类似的朋友。因此, 那些选择未社会化朋友的青少年, 很有可能也是未社会化的。这种观点与这样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 即人际吸引取决于所认识到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相似性。坎德尔 (D. B. Kandel, 1978) 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青少年选择少年犯罪群体, 而少年犯罪群体教会青少年进行少年犯罪行为。坎德尔考察了青少年朋友之间在吸食大麻、政治倾向、教育志向和少年犯罪方面的相似性, 发现这些方面的相似性是人际吸引的一种决定因素, 那些后来解散的朋友之间的相似性小于那些长期维持友谊的朋友之间的相似性。随着时间的流逝, 维持友谊的朋友之间的相似性会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存在一种更深入的相互影响过程。

不过,一些调查者认为,同辈群体对少年犯罪倾向(delinquency-proneness)几乎没有影响。少年犯罪倾向是在群体形成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格卢克(S. Glueck)和格卢克(E. Glueck)发现(1950)指出,少年犯罪同辈群体是“同类相聚”式交往的产物。赫希在最初论述他的控制理论时也提出(1969),越轨同伴对少年犯罪而言是不太重要的。少年犯罪的关键因素是对家庭、学校和同伴的依恋和责任感减弱,这种状况会使青少年“随意进行越轨行为”,他们可能单独进行越轨行为,也可能与别人一起进行越轨行为。不过,赫希发现,结交少年犯罪同伴会加重少年犯罪的程度,即使在那些与家庭联系牢固的人中也是如此。他承认,控制理论低估了同辈朋友的影响。

控制理论否认同辈朋友的影响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没有必要解释少年犯罪的动机,因为与传统秩序的联系强度是越轨行为的主要预测因素。林登(E. Linden)和哈克勒(J. C. Hackler)证实(1973),传统联系(conventional band)和与越轨同伴的联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程度。那些对父母和传统同伴的依恋微弱的人,其少年犯罪行为的程度最严重;而那些对越轨同伴有强烈依恋的人,那些对父母和传统同伴有强烈依恋但是对越轨同伴缺乏依恋的人,其报告的少年犯罪程度最轻。这些结果与社会学习理论的分析是一致的,社会学习理论提出,少年犯罪的动机并不是固有的,也不是不变的,而是依赖于群体所提供的社会强化。

埃里奥特(D. S. Elliott)等人在整合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时认为(1985),对越轨同伴的牢固联系的发展,是少年犯罪行为及其保持的最直接、最接近的原因。与传统他人(conventional other)缺乏联系会促进与越轨同伴的密切联系,而引起紧张的条件、不适当的社会化和社会解组又会反过来影响削弱与传统他人的联系。他们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进行的纵向研究支持这种模式,认为紧张和控制因素的效果是间接的,是以他们对越轨同伴依恋的影响为中介的。因此,他们的研究结果与以前关于越轨同伴影响少年犯罪行为的证据相一致,但是一些青少年更容易因为不适当的社会化、在家庭和学校中经受的挫折而加入少年犯罪群体。

不过,尽管这项研究阐述了同辈群体在少年犯罪中的作用,但是,有两个问题仍然没有回答。第一,同辈群体究竟在促使青少年犯罪中起多大作用。如前所述,只有很少一些少年犯罪人是单独实施犯罪的。埃里奥特等人发现(1985),他们的模式对严重越轨行为和严重吸毒行为的解释力有限,而对一般少年犯罪和吸食大麻的解释力较强。因此,尽管同辈群体引起的少年犯罪最多,但是,它不可能是所有犯罪或者所有犯罪人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如果那些参加少年犯罪群体的人早就产生了少年犯罪倾向,那么,同辈群体在少年犯罪的学习方面究竟起多大作用?仅仅是促使少年犯罪行为的实施吗?正如戈德弗雷德森(M. Gottfredson)和赫希指出的(1990),同辈群体可能会促使犯罪的实施,但是,犯罪倾向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形成。

第四节 就业与婚姻

中学阶段之后犯罪率的下降,与青少年期向成年期的过渡有关。通常认为,这是青少年向成熟“转变”的时期,交往的变化会促进这种转变。因此,进入劳动力行列和结婚不仅会降低早年的同辈群体的影响,而且也会增加对传统秩序的奉献。反过来讲,就业失败可

能会使犯因性影响长期存在,而失业则会引起促成犯罪行为发生的经济压力。

在通常情况下,少年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例如,生活在城市贫民区的人群,其失业率也是最高的,但是,人们在失业对犯罪行为的原因性效果方面上仍有争议。失业的心理效果包括压抑、焦虑、冷漠,这些心理效果可能是由于自尊的降低或者无法有意识地控制后果造成的,但是,这些心理效果由于年龄和在劳动力中的地位不同而有区别。例如,杰克逊(P. R. Jackson)和沃尔(P. B. Warr)发现(1984),失业者在一般健康问卷(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上的得分高于在业者(the employed)⁸,这种问卷是测量心理功能障碍的一种量表。不过,失业的心理效果对于刚刚离开学校的人来说比较轻微,而对于全力奉献到工作上的人来说比较严重。经济压力也是一种重要的、但是并不有力的中介因素。

这些心理效果是否会引起失业者的犯罪行为,还不清楚。但是,传统的犯罪学理论都预测就业与犯罪之间具有一定联系。紧张理论预测,缺乏工作机会产生挫折,增加犯罪行业的吸引力。控制理论认为,正常就业是增强社会联系的必要条件,因为正常就业可以增加遵从的“奖赏”。就对犯罪人个人的犯罪倾向的影响而言,劳动力市场条件可能会通过影响社区控制而对犯罪率产生间接效果。通过这种方式,高失业率不仅会增加在业者的犯罪活动,而且也会增加失业者的犯罪活动。使用理性选择模式的经济学分析也认为,缺乏传统的就业机会,是一种会增加犯罪的“市场”因素,因为人们会把犯罪当做获得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手段。

不过,总体而言,有关失业与犯罪率之间的联系的证据缺乏说服力。阿伦(E. A. Allan)和斯蒂芬斯迈尔(D. J. Steffensmeier)指出(1989),除了就业水平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不会对各个年龄人群产生同样的影响,也不会对所有犯罪类型产生同样的影响。他们分析了《统一犯罪报告》中4种财产犯罪的逮捕率与有关少年和年轻成人(young adult)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几种指标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高逮捕率仅仅与少年中的工作可得性(job availability,失业水平)有联系。对于年轻成人来说,影响逮捕率的重要因素是就业质量(quality of employment,报酬低、缺少全日工作)。对于那些离开学校的人来说,缺乏工作本身就会增加犯罪行业的吸引力,但是对于年轻成人来说,报酬低、前景差的工作会降低遵从的奖赏。

有关失业对个人犯罪行为有直接效果的证据尚不充分。埃里奥特(D. S. Elliott)和沃斯(H. L. Voss)发现(1974),在已经就业和结婚的退学学生中,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有轻微的下降。在剑桥研究中,15~18岁的少年在没有就业期间实施的犯罪(主要是财产犯罪),要多于就业之后进行的犯罪。也有证据表明,向释放犯人支付的失业津贴减少了累犯。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失业经历会增加犯罪动机,削弱控制,但是,失业与否和个人的选择、个人特征有关。例如,缺乏技能的少年犯罪人不仅会离开学校,也可能会追求享乐但对稳定的职业缺乏兴趣。事实上,在剑桥少年犯罪研究中涉及的少年犯罪人,到18岁时更有可能具有工作不稳定的历史。他们到32岁时,那些曾经被定罪判刑的人往往从事低报酬的工作,有长期失业的历史,大多数持续性犯罪人具有十分令人不满意的就业记录。索恩伯里(T. Thornberry)和法恩沃思(M. Farnworth)也发现(1982),在年轻成人中,官

8. 在业者(the employed)就是有职业的人,与“失业者”(the unemployed)相对而言,失业者就是没有职业的人。——译注

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都与工作不稳定有关,但是与职业等级或收入没有关系。失业可能影响犯罪的实施,但是失业本身是受犯罪倾向的影响的。

剑桥研究的数据也表明,婚姻不可能对犯罪行为产生单向影响。奈特(B. J. Knight)、奥斯本(S. G. Osborn)和韦斯特(D. J. West)发现(1977),在剑桥研究的研究对象达到21岁时,已经结婚的人和仍然单身的人在官方少年犯罪或者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方面,都没有差别。不过,少年犯罪人的婚姻更有可能被怀孕的情况所促成;有少年犯罪历史的大多数是同居者,而不是已婚者。在剑桥研究的研究对象达到24岁时进行的访谈发现,婚姻的效果被少年犯罪人与犯罪少女结婚的趋势所抵消,那些没有与犯罪少女结婚的人更有可能继续被定罪判刑。在剑桥研究的研究对象达到32岁时,那些具有犯罪记录的人中,很多人已经离婚或者分居,或者具有与配偶、同居者发生冲突的历史。因此,稳定的婚姻对犯罪行为有一定的效果,它可以减少与少年犯罪伙伴的接触,减少与犯罪机会的接触,可以增加遵从行为。不过,婚姻的稳定性似乎受双方的犯罪性的影响。

第五节 保护性因素

人们认为,与少年犯罪有关的条件是危险的因素,接触这些条件似乎会增加进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由于许多面临贫穷、家庭不和谐、少年犯罪多发学校的人没有变成少年犯罪人,因此,人们希望找到可以区分两类人的因素:一类是那些面临不利条件时适应性强(resilient)的人,另一类人是那些面临不利条件时容易受其影响而屈服的人。保护个人免受危险的因素可能来自个人倾向、关系、社会支持系统或者事件,这些因素与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会降低少年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女性很容易受到这种意义上的保护,而稳定的职业也会保护那些具有少年犯罪倾向的年轻成人停止犯罪生涯。

到目前为止,只有几项研究试图找到可以抵制或者降低那些在有犯罪家庭成员的不和谐家庭、在少年犯罪多发邻里中长大的个人进行少年犯罪的危险性的因素。一些倾向因素可能具有保护性,例如,智能、强烈的成就动机、赞许性自尊(见第八章);气质因素也可能有关。在剑桥研究中,那些具有进行少年犯罪的危险、但是没有被定罪的人,在8岁时更有可能缺少朋友,以后也往往是孤僻无友。尽管保护性过程是不清楚的,但是,这种过程似乎包括了不经常接触少年犯罪同伴或者机会的因素,因为这些孤僻无友的人夜晚很少出门。

支持性关系也会减小危险因素的影响,因为这种关系限制了接触少年犯罪人的机会,强化了对遵从的奉献。例如,在不和谐家庭中,母爱降低了父亲攻击行为、纵容、管教不一致的犯因性效果。在剑桥研究中,父亲对10岁儿童的积极评价也有利于儿童获得更大的社会成功。在有犯罪儿童的家庭中,守法儿童与成人在一起、参加俱乐部和主日学校的可能性大于犯罪儿童⁹。罗斯(H. L. Ross)和格拉泽(E. M. Glaser)也探讨了重要成人的保护性影响(1973)。他们比较了两类人:一类是在贫民区生活、有稳定职业、不违反法律的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另一类是那些同样生活在这个区域但是在这些方面都不成功的黑人

9.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是指主要由教会、教堂等宗教结构设立的向青少年提供宗教教育、组织青少年进行宗教活动的一种业余学校。青少年免费参加这类学校的活动。一般认为,这类学校促进了对青少年的初级教育。——译注

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他们发现,这两类人在奉行的亚文化方面有巨大差异:一类人奉行的亚文化重视成功的价值、工作、主流社会;另一类人奉行一种赞同强硬、暴力和缺乏长远目标的街头文化。访谈资料显示,对前一类人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有能力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时候也可能是家庭之外的某个成年人。同样的关系因素也可以将那些虐待自己孩子的母亲与那些不虐待自己孩子的母亲区分开来。

拉特(M. Rutter, 1987)注意到,许多保护性过程涉及在人们生活中展现新机会的关键“转折点”,例如,搬家的效果。例如,布克休森(W. Buikhuisen)和霍克斯特拉(H. A. Hoekstra)发现(1973),从监狱中释放的少年犯罪人如果从原来居住的地区搬了家,那么,他们的累犯率就比较低。同样,在剑桥研究中,那些后来搬出了伦敦内城区的青少年的定罪率,要低于那些仍然居住在伦敦内城区的青少年;那些后来搬出了伦敦内城区的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也减少了。环境的变化可以使青少年摆脱少年犯罪同伴的影响,减少了进行犯罪行为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事件是否构成人生轨道中的重要转折点,可能取决于个人特征与支撑特定生活道路发展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双向影响在沃纳(E. E. Werner)对夏威夷群岛中考爱岛(Kauai)的儿童进行的纵向研究中得到证实(1982, 1989)。沃纳所研究的儿童尽管早年经历了很危险的家庭环境,但是以后都变成了有能力的成年人。通过将些儿童与18岁时变成少年犯罪人的人进行的比较,沃纳等人发现,那些适应性很强的儿童更有可能是长子,在婴儿时期更活泼、更愿意和人交往,到2岁时更加自信和独立。他们更有可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支持,但是,这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环境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他们也更有可能符合互补性角色模式(complementary role model),父亲是女孩模仿的榜样;适应性很强的儿童更有可能表现出性别特征不明显的角色采择现象。作为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成就动机,表现出内控制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更有可能从事需要熟练技术的职业。他们也发现,没有变为成年犯罪人的少年犯罪人在学校很少惹麻烦,这一点与剑桥研究中发现的结果是一致的;这样的少年犯罪人也更有可能生长在完整家庭中。

尽管对保护性因素的研究探讨了有助于良好适应的发展过程,但是,这样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理解犯罪性的发展问题;这样的研究也反映了对独立的“原因”的关注。拉特(M. Rutter, 1987)和沃纳(E. E. Werner, 1989)强调,重要的是保护性因素与危险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没有从更多的可能性中选择保护性因素或者相互作用过程。因此,麦科德(J. McCord, 1986)提出,与犯罪性有关的家庭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当缺乏其他一些因素时,一些危险因素的作用是很小的。例如,尽管母爱能够减弱不一致的惩戒活动的效果,但是,当母亲很自信并且在惩戒活动中前后一致时,缺乏母爱这种因素的效果就很小。由于那些被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因素与危险因素正好相反,因此,证实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无助于增强解释力。

“保护”(protection)、“危险”(risk)的概念是一种借用疾病进行的比喻说法,这两个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们意味着,不同的心理过程控制着社会谴责的结果和社会赞许的结果。例如,我们不探讨什么因素可以“保护”生涯成功可能遭受的“危险”。事实上,什么因素促使一些人摆脱明显具有犯因性的背景的影响而成为守法者的问题,仅仅是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道路这个更一般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正如班都拉(A. Bandura, 1982)所指出的,这些因素往往是难以提前预测的机会性因素。

第八章 犯罪人的个人特征

第一节 引言

犯罪行为的完成明显依赖于犯罪人的近期经历和行为发生的情境，但我们也必须根据行为人对影响该情境的个人特征来理解。本章论述犯罪人的个人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把犯罪性看成是进行这种犯罪行为的倾向或准备性。这些特征不但包括传统人格研究中所说的社会特征和气质特征，而且也包含能力、价值、信仰和从个人历史中显露出来的目标等个人因素，这些个人因素对新经验的效果有影响。

有关犯罪人人格的研究已经做了100多项心理测验。研究者使用标准化测量，对犯罪人和守法者进行比较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已经鉴别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然而，它们常常很难重复。所以，一些评论者仍然怀疑，所发现的这些差异是否能够解释个人的犯罪经历；这个研究领域中也存在很多概念上的和方法论的缺点。

首先，很多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制约，对测量工具的选择更多地受可得性的支配，而很少考虑与犯罪有关的人格因素的明晰的理论基础。例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在这个领域已被广泛地使用；尽管这一量表在区别犯罪人方面有一些经验性的功用，但它强调的是精神病理学特征而不是人格特质，用于犯罪人(criminal)人不合标准。其次，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对“犯罪人”这一概念的界定。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过分强调选择被监禁犯罪人(incarcerated criminal)作为研究对象，而这些人也许并不是犯罪人中的典型；或者过分强调通过犯罪类型选择研究对象，用这样的方式选出的研究对象也不一定有代表性，犯罪类型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指出进行犯罪行为的倾向。例如，某一极端暴力性犯罪并不必然表明存在一种持久的暴力倾向(参见第九章)。霍兰(T. R. Holland)、霍尔特(N. Holt)和贝克特(G. Beckett)指出(1982)，只有财产犯罪可以显示出能够识别犯罪倾向的“生涯”模式。再次，刑事司法部门中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也削弱了累犯作为持续性犯罪的一种指标的可靠性。

进一步的问题是，很多研究中包含了“犯罪人是同质的”假设。虽然研究者对犯罪人中的专门化有争论，并且对反社会人格的研究兴趣持久不衰。但是证据表明，犯罪人在人格方面是异质的(参见第三章)。所以，认为存在一种独特的犯罪人格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将未加选择的犯罪人和守法者进行比较可能是一种价值有限的策略。孤立存在的一些特殊的人格特质不可能是重要的中介因素。可是，对个人人格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调查结果仍然属于特殊情况，而不能上升为一般规律。

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一些对理论上很重要的个人特征的研究。我们将继续探讨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个人因素，这种探讨可能是不系统的，也可能是在更专门化的理论背景中进行的，还可能通过使用多种特质调查表，尤其是使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和加州人格

调查表 (CPI) 进行。本章对有关的研究进行选择性的介绍, 重点探讨那些影响相对持久的概念, 或者近期比较感兴趣的概念。

第二节 智力、成绩和认知活动

一、智力活动

自格达德 (H. H. Goddard, 1914) 的早期研究以来, 智能 (intellectual ability) 一直是犯罪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在认知发展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发展中, 智能被看作是一种关键的因素。智商测验不能测定全部的认知技能, 但是, 围绕教育选择中智商测验的使用而发生的政治性争论, 却表现出忽略智商测验效度的倾向。已有的证据表明, 智力测验能够测量解决问题技能的一些重要方面; 尽管这些技能也会发生变化, 但它们是相对稳定的。

本世纪初的研究发现, 根据测验标准, 1/3 或更多的犯罪人是低能的。有人假定, 低智力对学习和理解道德规范有影响, 从而直接对反社会行为起作用。这个数字随着测验标准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少。泽伦尼 (L. Zeleny, 1933) 用比奈在研究中确定的智商 70 为正常界限的标准估计¹, 低能犯罪人与低能守法者之间的比率是 1.8 : 1。

更近的估计继续表明, 智力落后犯罪人的代表人数超出上述比例, 当然具体的数字有明显的差别。例如, 科伊德 (J. Coid, 1984) 根据对已决犯的调查结果, 证明低能罪犯的数量从 2% ~ 45% 不等。然而必须谨慎对待从罪犯总体中获得的普遍估计, 因为这种估计不仅反映地方和国家把低能犯罪人转移到精神卫生系统的政策, 而且也反映了评价的标准和方法的变化。例如, 斯普鲁伊尔 (J. Spruill) 和梅 (J. May)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研究中发现 (1988), 在一个对入监罪犯进行的团体智力测验中, 智商不到 70 的罪犯仅占罪犯人数的 4%。随后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 (WAIS) 进行的个别测验表明, 只有 1% 的罪犯符合智力落后的标准。在罪犯入监时进行的团体测验, 因暂时的焦虑或合作失败, 产生了夸张的估计。

具有严重心理缺陷的犯罪人, 存在着矫正方面的严重问题。以智商 70 作为判断心理障碍的标准, 在评价智力对犯罪行为的作用中, 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关联。重要的是, 能力低于平均数的犯罪人占有很大比例。虽然犯罪学家认为抽样偏见或社会不利条件对智商分数有影响, 因而不考虑智商分数较低的少年犯罪人, 但是,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在智力水平和少年犯罪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小却有意义的负相关。例如, 卡普兰 (N. S. Caplan) 和齐伯特 (L. A. Siebert) (1964) 评论了 1929 ~ 1963 年间对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少年犯罪人的智商数据。他们发现, 随着较早的斯坦福—比奈量表被其它量表所替换 (值得注意的是韦克斯勒量表), 少年犯罪人的平均智商从 80 增至 92, 可是, 以后的数字相对稳定。作者估计, 他们所收集的数据中, 几乎有一半的少年犯罪人智商低于 90。剑桥研究中也发现了低智力犯罪人的不成比例的数字。在后来成为少年犯罪人中, 39% 的人 8 岁时智商不到

1. 自 1905 年比奈与西蒙制订第一个智力测验量表以后, 通常用智商 (IQ) 来描绘智力落后, 一般认为 IQ 70 以下为智力落后。——译注

90, 而守法少年中有22%的人8岁时智商不到90; 在累犯中, 57%的人智商低于平均水平。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在危险性较高的犯因性因素(例如, 有犯罪的父亲, 儿童品行障碍)中, 较高的智力是对抗犯罪性发展的一个保护性因素。

赫希(T. Hirschi)和欣德朗(M. J. Hindelang)(1977)在对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进行比较研究的综述中,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未加选择的少年犯罪人样本的平均智商大约是92, 在控制了社会阶级和种族时仍然如此。莫菲特(T. E. Moffitt, 1981)等人在丹麦对两种血统的人进行的比较研究, 也发现智力和犯罪的数量之间存在0.2~0.3的有意义的相关; 排除了社会阶级这一因素后还是这样。有研究者认为, 已被正式判决的少年犯罪人的较低智能仅仅反映在不能逃避侦查和逮捕上, 然而, 这种观点与研究者在对自我报告犯罪行为的少年犯罪人中发现的结果相矛盾。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研究结果表明, 不管智商高低, 都会被官方机构发觉。

虽然智商综合测量中的低分数通常用来区分少年犯罪人, 但是, 言语能力测量分数的区分力最大。使用韦氏量表以来已经普遍发现, 男性少年犯罪人在完成操作智商和言语智商的作业中有差异, 他们的操作智商得分更高。由于少年犯罪人操作智商的平均分只是略低于少年守法者, 所以, 研究者一般使用缺乏言语技能而不是具有优越的非言语能力的术语来解释上述现象。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修订版(WISC-R)所作的研究发现, 少年犯罪人平均言语智商通常低于总均数几乎一个标准差(10~20分); 这意味着大约2/3的少年犯罪人在言语能力方面有些缺陷。然而, 有少量的少年犯罪人也表现出言语智商大于操作智商。沃尔什(A. Walsh)、皮迪(T. A. Petee)和拜尔(J. A. Beyer)(1987)在其研究中发现, 在男性少年犯罪人中, 有37%的人操作智商比言语智商多9分或者更高, 有11%的人言语智商比操作智商多相同的分数。而在守法少年中, 操作智商大于言语智商人数的比例为26%, 言语智商大于操作智商人数比例为23%。在少年犯罪群体中, 言语智商大于操作智商的人不多, 这表明言语优势可以阻止犯罪行为。沃尔什(A. Walsh)等人发现, 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两者不平衡的少年犯罪人比两者平衡的少年犯罪人更多地参与犯罪活动。

一些研究表明, 操作智商大于言语智商的迹象在少年犯罪人口内可能有特别的区分力。例如, 海恩斯(J. P. Haynes)和本施(M. Bensch)(1981)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修订版对少年犯罪人中的累犯和非累犯进行了比较, 发现少年累犯中有70%的人显示了操作智商优势, 而非累犯中仅有42%的人有同样的优势。哈布尔(L. M. Hubble)和格罗夫(M. Groff)也发现(1982), 被奎伊(H. C. Quay)的分类体系确定为精神病态或神经症的少年犯罪人有较大的操作智商优势。然而, 操作智商大于言语智商在一般人群中也有相对高的基率(base rate), 因此, 它在个别案例中几乎没有诊断效用。莫菲特(T. E. Moffitt)和席尔瓦(P. A. Silva)(1987)对新西兰血统的人作了一个大型的纵向研究, 他们在该研究中也发现,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修订版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之间的差异, 在7~11岁儿童之间只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 并且与象征脑机能障碍的因素没有关系。另一方面, 巨大的操作优势一直是与不良的学业成绩相联系的。

究竟智力低到什么程度会导致犯罪, 这仍然是不清楚的。奎伊(H. C. Quay, 1987b)提出, 低言语能力可能通过限制高级认知活动的发展, 例如, 言语自我调节、社会问题解决等, 直接促成反社会行为。更为普遍的观点是, 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并且取决于学业成绩。智力或许也与其它的个人特征相互作用。例如, 海布伦(A. B. Heilbrun, 1982)的研究表

明,成年犯的暴力犯罪史受智力水平和精神病态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与高智力的精神病态者或者低智力的精神正常人相比,低智力的精神病态者更有可能具有冲动性暴力犯罪的历史,也更有可能有较低的移情等级。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只有很少一部分犯罪人的智力水平在平均数以上。卡普兰(N. S. Caplan) 齐伯特(L. A. Siebert) 估计(1964),在他们的研究中有9%的少年犯罪人智商在110以上。尽管在研究中很少关注“天才”犯罪人,但是证据表明,高智力的男性少年犯罪人和女性少年犯罪人都更有可能表现出心理异常。

二、学习无能和教育成绩

在北美,研究者们近10年中极为关注少年犯罪和学习无能(learning disabilities, LD)之间的关系。学习无能这一术语在英国不予承认,英国学者更喜欢用“学习困难”(learning difficulties)一词,并且学习困难这一概念已逐渐取代了智力落后(mental retardation)或心理缺陷(mental handicap)。学习无能(LD)是指根据既定能力对儿童的期望和实际的教育成绩之间的差异,包括认知和知觉—运动问题,例如诵读困难、失语症或注意缺陷。普遍认为,学习无能者有体质基础。

虽然人们估计少年犯罪人中的学习无能者的流行率从26%至73%不等,但是,还不能认为学习无能和少年犯罪之间有因果关系。默里(C. A. Murray, 1976)在对早期研究文献的评述中观察到:尽管学习问题在少年犯罪人中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少年犯罪人中存在的特殊的学习无能的流行率仍然是不清楚的。其原因是,学习无能的定义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对少年犯罪人的抽样也不恰当。齐默尔曼(J. Zimmerman, 1981)等人对学校男女学生和男女少年犯罪人在被测智力和一般成绩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学校男女学生中有18%的人符合学习无能的标准,男女少年犯罪人中有33%的人符合学习无能的标准;男性少年犯罪人中学习无能的比例比女性少年犯罪人更高。可是,在对自我报告犯罪的少年犯罪人进行的测量中,很难把学习无能者从正常人中区别开来,这表明学习无能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

最近的研究工作强调把学习无能归入一种异质障碍(heterogeneous disorder),这种异质障碍不可能用单一的病因学来解释。例如,鲁尔克(B. P. Rourke, 1988)的研究已发现学习无能有各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学习无能与学业成绩和社会失调的关系不一样。涉及非言语性缺陷的学习无能与社会适应问题之间有更清楚地关联,而涉及心理语言技能的学习无能则没有这种关系。梅尔策(L. J. Meltzer)、罗迪提(B. N. Roditi)和芬顿(T. Fenton)的研究也表明(1986),对学习无能的仔细分析能够鉴别出教育活动和认知活动的不同模式,少年犯罪人的这些模式是不同的。他们在对少年犯罪人、学习无能的青少年和正常学龄儿童进行的比较研究中,交叉考察了几种教育技能与学习方式和错误模式的关系,结果发现14%的少年犯罪人的剖面图类似于学习无能组,1/3少年犯罪人的剖面图与正常学龄儿童的剖面图相似。所以,学习无能的有些形式可能与某些少年犯罪人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有关。

在几项研究中都发现,教育成绩差与学生早年在学校中的反社会行为以及后来的犯罪行为都有关;一般假定,智力和学习无能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不良的学校表现起作用的。一般的看法是,学校失败的经历导致消极的自尊或对学校的敌对态度,进而与其他“问题”儿童发生联系,因此,有更多的犯罪机会。例如,控制理论认为,教育失败会引起对学校的消极态度,从而减弱对学校倡导的社会价值的依从。奥斯丁(R. Austin,

1978)的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一致。他发现,智力与自我报告的偷窃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对老师的消极态度。

然而,对智力和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的解释。例如,阶级、家庭、气质特征等因素的作用。赫希(T. Hirschi)和欣德朗(M. J. Hindelang)发现(1977),在控制了社会阶级和种族之后,智商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与此类似,麦加维(B. McGarvey, 1981)等人发现,虽然父母的社会阶级通过其教育活动对儿童的犯罪行为起间接作用,但智力仍有独立的作用。类似的研究也适用于家庭因素的作用。例如,奥福德(D. R. Offord, 1982)发现,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之间,其智商或学业方面没有差异;少年犯罪人在学校中的失败很可能来自于解组家庭。因此,他提出,反社会行为和不良的学校表现是家庭解组的结果。可是,其他研究者却发现少年犯罪人比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的智力更低。在剑桥研究中,智力对儿童后来犯罪的影响与家庭因素无关。

可是,在剑桥研究中却发现,当研究者注意8~10岁的“惹麻烦的”儿童时,智力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消失了;这意味着后来在学校中的失败和少年犯罪行为,可能主要是由异常的气质引起的。有几项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例如,斯塔廷(H. Stattin)和马格努森(D. Magnusson)发现,在排除了智力 and 经济地位的影响后,教师对10岁儿童攻击性的评定仍然与这些儿童的犯罪行为有显著相关。帕特森(G. R. Patterson, 1989)的研究也表明,存在着一种从反社会行为到学校失败、再到少年犯罪的发展方向。由特伦布莱(R. E. Tremblay, 1992)等人最近所做的纵向研究,不仅强调异常的个人特征的影响,而且也对学校表现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他们在研究中发现,7岁少年的破坏行为与他们10岁时较差的学业成绩和14岁时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有联系;可是,路径分析却指出,学业成绩不是后来的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它只是儿童7岁时的破坏行为和14岁时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人格特征之间的一个中介因素。

有人提出,智商对儿童后来的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气质因素发生作用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没有测量智商,却也得出与上述观点一致的结论。这一点已经得到休斯曼(L. R. Huesmann)、厄伦(L. D. Eron)和亚梅尔(P. W. Yarmel)(1987)长达22年追踪研究的支持。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于8岁儿童来说,智商与同伴对其攻击性的提名有关;但是,成人智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童年的攻击行为来预测,而童年期的智商却不能预测成年人的攻击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休斯曼(L. R. Huesmann)等人提出,低智能可能会阻碍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发展,从而对儿童的攻击性产生影响,可是,攻击性在后来继续对学业成绩有影响。这既不排除后来的教育成就对犯罪行为的持续性影响,也不排除学校对某些学生实行区别对待的作用。然而,智商和学校表现与犯罪行为的关系确实依赖于早期的发展因素。

第三节 自我控制和冲动性

在对发展和学习进行的所有分析中,都很关注延迟或抑制某种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在以冲动控制、自我控制、延迟满足或者挫折耐受力为题的研究中受到多方面地考察。由于犯罪行为常常涉及为了获得直接需要的满足而冒遭受长期消极后果的危险,所以,通常假定犯罪人在控制和延迟功能方面是有缺陷的。冲动性也是病态人格的临床概念的主要

成分。人们发现“反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例如,酗酒、抽烟、赌博、性早熟和药物滥用(参见第2章),与官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都有联系;“反社会生活方式”也可以用这些特征来解释。发生在少年犯罪之前的童年期破坏行为和攻击行为也能够用缺乏冲动控制来解释。

冲动控制(impulse control)既指心理过程,也指冲动性的一般形式或冲动性的特质,但是这个概念与可观察的行为只有松散的联系。由于这个概念含有冲动是可以控制的之意,所以,某个被认为是缺乏控制的行为,可能恰恰是一种强烈冲动的表现。可是,“冲动”只是对所推测的某些行为的内部原因的循环论证。正如斯金纳(B. F. Skinner, 1953)所观察到的那样,“自我控制”这一概念回避了“谁正在控制什么?”的问题。此外,我们每天把某种行动或某个人说成冲动性的,这种说法往往依赖于先前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例如,某些人的犯罪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冲动所致,就是因为他们先前具有“良好性格。”

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使用的冲动控制这个概念同样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论的假设。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中,延迟满足是一种自我控制功能,本能冲动通过幻想和制订计划受到抑制。不适当的控制可能在初级过程思维(primary process thinking)得到表现,也可能在未受抑制的紧张运动性释放中得到表现。不适当控制也可能表现为特殊的症状,如纵火狂、偷窃狂,或者是性格障碍中的一般化冲动性倾向。可是夏皮罗(D. Shapiro, 1965)拒绝本能模式,他把冲动性看作一种迅速而无计划的反应方式,认为冲动性与大脑皮层的加工过程有关,并通过认知、情感和外显行为表达出来。

然而,学习理论家却把自我调节看作一种有特殊联系的习得行为。斯金纳(B. F. Skinner, 1953)根据个人处理意外事件的行为来分析自我控制。控制性反应本身就处于环境事件的控制之下,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自我控制最终就是情境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于学习理论家来说,自我调节也处在注意过程、自我强化的标准和结果期待的控制之下。例如,坎费(F. H. Kanfer, 1980)把自我控制定义为在反应冲突条件下自我管理的事件。人们在参与一个行为时,后来行为的风险可能比先前的行为更大,此时当然的结果便是在进监狱或者延迟意图之间进行选择。认知—行为治疗人员对冲动控制作了进一步地探讨,他们采用了俄罗斯学者提出的通过“内部言语”对行为进行言语调节的概念。

这里的焦点集中在有关犯罪人冲动性倾向的证据上,可是,冲动性显而易见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研究者为了测量冲动性控制这种特质或行为方式,已经设计了大量的测验。在大量多特质人格测验中,研究者对心理运动速度和精确性、延缓强化、选择决定时间和以不同形式表现的冲动性进行了多种评价。在某些测量中,心理动力学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些测验强调对愤怒和攻击的唤醒与表达的控制。然而,在更多情况下,用特质维度评价的是个人对一些需要迅速决定或行动的事件的反应速度或者反应趋向。例如,调查中常有这样的问题“你常常不假思索就立即行动吗?”就象艾森克(S. B. G. Eysenck)和艾森克(H. J. Eysenck)(1978)注意到的那样,这仅仅描绘了一种狭小的特质;他们提出,一个较宽泛的冲动性概念应当包括冒险性、敏捷性(liveliness)等特质。不过,宽泛的冲动性概念并不必然地包括情绪的唤醒和表达。这些概念上的模糊性,使人们对冲动性的看法不能达成一致,有的认为冲动性是一个基本特质,有的认为冲动性是一种高层次维度。

一、自陈调查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中的Ma(轻性躁狂)分量表通常被看成是冲动性或潜意识显露性(acting out)的一种指标,在高夫(H. G. Gough)的加州人格调查表中,其自我控制(SC)分量表中的很多术语就出自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由布莱克本(R. B. Blackburn, 1971b)研制的冲动性量表(IM)也来自对上述量表的因素分析,其内容反映了缺乏道德遏制、容易唤醒愤怒和需要兴奋等。对犯罪人与守法者的比较研究通常显示出,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中唯一能辨别冲动性的是Pd分量表,即病态人格分量表。Pd分量表中与冲动控制有关的项目很少。可是,正如本书前面谈到的那样(参见第三章),量表4(Pd,病态人格分量表)和量表9(Ma,轻性躁狂分量表)的综合剖面图与原发性精神病态相联系;普遍发现,犯罪人样本在这两个量表和量表8(Sc,精神分裂症分量表)获得最高的平均分。两项大规模的预测研究表明,带有这种分数模式的青少年以后更有可能成为少年犯罪人,而带有其他分数模式的青少年以后不太可能成为少年犯罪人。上面谈到的三个量表也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有关,尤其是在对偷窃、使用软毒品和破坏财产等的测量中更为明显。尽管我们可以通过量表9(Ma)测量冲动性,但是,只有当量表9的结果与量表4(Pd)的得分结合起来时,才会出现增加犯罪可能性的现象。量表4可能与控制理论有联系。

虽然冲动性在艾森克的犯罪理论中有争论,但它已经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参见第五章)。吉兰(P. W. Gillan, 1965)发现,犯罪少女和对照组在早期的冲动性量表测量中没有差异;艾森克(S. B. G. Eysenck)和麦格克(B. J. McGurk)发现(1980),男少年犯罪人在最近发展的冲动性量表上比对照组得分更高。有研究发现,这个新研制的冲动性量表也与西班牙的男女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有关。

有人把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中的F因素(兴奋性)也看作是冲动性的一种量度。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凯利(F. Kelly)和维尔德曼(D. J. Veldman)(1964)对学校退学的学生或没有其他异常的少年犯罪人4年前在F因素上的得分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两组人的F分都较高。可是,卡特尔(R. B. Cattle, 1970)等人的研究中却没有发现这种差异。桑德斯(J. T. Saunders)、雷帕西(N. D. Repucci)和萨拉特(B. P. Sarata)也发现(1973),少年犯罪人和学校男生在巴勒特冲动性量表(Barratt's Impulsivity scale)或者在匹配熟悉图测验(Matching Familiar Figures Test,该测验用于测量冲动性反应的认知方式)中都没有差异。

冲动性可能会引起犯罪频率和类型的变化。有迹象表明,累犯更有可能是冲动的。例如,高夫(H. G. Gough)、温克(E. A. Wenk)、和罗辛克(V. V. Rozyenko)(1965)使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加州人格调查表和一个与先前的历史有关的基本预期表对违反假释规则的少年犯罪人和没有违反假释规则的少年犯罪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者具有最好的辨别力,但是Ma(轻性躁狂)分量表,加州人格调查表中的自我控制量表(Sc)和社会化量表(So)在两组之间也有辨别力。科莫(P. G. Como, 1977)使用布莱克本(self-impulsivity)量表进行的研究,也发现累犯比初犯得分更高,并且这个量表也与精神障碍犯罪人的重新犯罪有关,还与官方少年犯罪人资料中自我报告中的少年犯罪有关。与此不同,马克(J. L. Mark, 1969)发现,少年累犯和非累犯性少年犯罪人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的测试中没有差异。金德鲁(P. Gendreau, 1979)等人在研究中发现,So量表有助于累犯的预测, Ma量表在这方面没有作用。

研究已经证实,以犯罪类型划分的犯罪人类型之间的差异是难以理解的。潘顿(J. J. Pantou, 1958)在研究中发现,虽然6种犯罪类型的犯罪人都偏离了常模,但他们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的测试中都没有差异。劳弗(W. S. Laufer)、约翰逊(J. A. Johnson)和霍根(R. Hogan)发现(1981),用布洛克自我控制量表(Block's Ego Control scale,该量表用于测量心理动力学的延迟和冲动表达的概念)测试,发现毒品犯比杀人犯更冲动;其他的研究则发现,杀人犯在明尼苏达冲动性量表上是异质的。

二、延迟满足

有关自我控制研究的一个范例是自愿延迟奖赏(self-imposed delay of reward)。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宁愿选择在未来某一时间可以得到的奖赏,而不愿选择一个较小但却可以马上到手的奖赏。对儿童延迟满足的研究表明,影响儿童的注意力,使其对诱人的奖赏产生最低唤醒的能力是认知技能,9至10岁儿童的表现是最令人满意的。延迟满足也取决于相倚规则的形成,这些规则指定了适当的自我强化的条件,所以,在个人内部和情境之间存在可变性。然而,研究也表明了这些规则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米歇尔(W. Mischel, 1984)把延迟和冲动性看作是对比性的特质模式。更一致的延迟是与稳定的注意、较高的智力、认知发展和抗拒诱惑相联系的,在中产阶级和成就取向的群体中更有代表性。相反,现实取向、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成就需要低的人宁可选择即时奖赏。

米切尔提出对即时奖赏的偏爱会促成少年犯罪和精神病态,这一观点在米切尔对特立尼达岛(Trinidad)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虽然几乎一半的少年犯罪人选择延迟奖赏,但少年教养院中的男犯比中学男生更多地选择即时奖赏。罗伯茨(A. H. Roberts, 1974)等人在研究中注意到,少年犯罪人中对延迟奖赏方面是有差别的:他们发现,在释放前测验时,少年累犯比非累犯性少年犯罪人更有可能选择即时奖赏。

三、精神运动性冲动

冲动控制常常通过个人在完成任务或运动抑制期间的注意程度或准确性程度进行测量。例如,凯利(F. Kelly)和维尔德曼(D. J. Veldman)发现(1964),未来的少年犯罪人和退学学生在完成简单的运动生产任务中更快和更不准确。这方面已被广泛使用的测验是纸上迷津(Porteus Mazes)。这种纸笔测验需要解决一系列的视觉迷宫,最后计算出一个测验商数(Test Quotient, TQ)和一个定性错误分(Qualitative Error Score, Q)。测验商数与空间技能有中等程度的相关,用于测量预见和计划能力。定性错误分则反映测验时粗心大意和破坏规则的情况,因此,可把它看成是冲动性的一种测量度。

波蒂厄斯对定性错误分有极显著差异的一些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些研究分别对违纪工人与守纪工人、少年犯罪人与守法少年、成年犯罪人与成年守法者进行了比较。在这些研究中,测验商数没有什么区别。对犯罪人的研究结果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得到重复。可是,奥基夫(E. J. O'keefe, 1975)批评这种研究没有控制矫正机构环境。他发现矫正机构内的少年犯罪人和儿童之家的少年之间没有差异,并且定性错误分与工作人员对冲动性的评定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在几项研究中,定性错误分能区别少年犯罪人之间的差异。罗伯茨(A. H. Roberts)等人发现(1974),定性错误分能有效地预测少年犯罪人中的累犯行为,与延迟奖

赏的言语和行为的测量相关。沙林(D. Schalling)和罗森(A. S. Rosen)(1968)发现,按克莱克利标准确定的精神病态犯罪人,他们的定性错误分比心理正常者更高。不过,在一些研究中已经报道了一些否定性结果。有人发现,在少年犯教养院的男犯或者是在精神病态的犯罪人中,无论是违反监规行为,还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调查中的冲动性分数,都与定性错误分无关。萨特克(P. B. Sutker)、莫恩(C. E. Moan)和斯旺森(W. C. Swanson)的研究也发现(1972),按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模式鉴定的精神病态犯罪人比心理正常者的定性错误分更低。

吉布森(H. B. Gibson, 1964)对定性错误分的由来进行了批评,他设计了一个螺旋式迷宫(Spiral Maze, SM)来测量运动操作中的同质错误。分数来源于:(1)绕迷宫运行的总时间;(2)触到迷宫边或障碍物的错误。由于排除了时间分数,错误与定性错误分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吉布森把这种测验看作是对冒险性的一种量度。他在研究中发现,无论少年犯罪人,还是被教师评定为“不听话”的男生,在完成这种任务时都表现得更快和更粗心。戴维斯(H. M. Davis, 1974b)也发现,错误分数与不遵守监规的等级评定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可是,吉兰(P. W. Gillan, 1965)发现,犯罪少女与对照组被试之间没有差异。后面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发现螺旋式迷宫测量和自我报告式冲动性特质的测量之间有任何关系。

与上述测量类似的一个测验,是由多姆布罗斯(L. A. Dombrose)和斯洛宾(B. S. Slobin)(1958)设计了一个冲动—自我—超我(Impulse, Ego, Superego, IES)测验的箭点(Arrow-Dot, AD)子测验,这个测验试图测试心理动力结构的概念。箭点测验要求被试对着点画一条线,回避各种“障碍物”,作业象征着冲动力量、自我控制和超我抑制。兰金(R. J. Rankin)和威克夫(R. L. Wickoff)发现(1964),再次犯罪的盗窃汽车犯罪人(second offender motor thieves)的冲动分数比大学生高,但从这种比较中归纳出的普遍结论是有问题的,使用箭点(AD)测验的其他研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那些比较遵从矫正机构规定的少年犯罪人和不太遵从矫正机构规定的少年犯罪人之间,存在任何差异。

四、时间定向

由于有人假定延迟满足涉及到对未来结果考虑,所以,在很多研究中,时间经历已作为冲动控制的标志来考察。有人预期,冲动性的人更关心即时事件,而不太关心未来事件,因此,他们的未来时间观念是有限的。也有人假定,这些人有一个更快的“生物钟”,过高估计时间的流逝。

对犯罪人中时间估计的研究已经产生了比较一致的结果。西格曼(A. W. Siegman, 1966)发现,少年犯罪人的生物钟比陆军新兵更快;在实验中,他们对短的时间间隔估计过慢,对长的时间间隔估计过快。尽管这一结果与其早期的研究结果相矛盾,但是它与社会病态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通过完成故事任务或者估计重大事件(例如,结婚、成为祖父等)在时间上的接近性(closeness)而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少年犯罪人比守法少年有一个更短的未来时间观,这已成为少年累犯的特征。然而,兰多(S. F. Landau, 1976)提出,先前的研究没有控制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对时间定向的影响。他发现,机构化(被监禁、服兵役)对少年犯罪人和士兵缩短未来时间观念有影响,可是,未来时间定向随着释放的临近而增加。

虽然存在一些否定的结果,但在几项研究中已经发现,冲动性对少年犯罪倾向有促进

作用。可是,有两个问题继续影响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第一、犯罪人的异质性。冲动性作为一种气质特征,使人更愿意选择即时奖赏,在精神运动性活动中草率行事,未来的时间观念受到限制,这些特征在某些犯罪人团体中也许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表现出这些特征。这些被看作“精神病态”的特征可能在调查测量中得分较高,可是对犯罪人测量资料的剖面图分析清楚地证实,一些犯罪人在冲动性量表上的得分低。第二,冲动控制的不同量度之间的关系在一些研究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冲动性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领域。这是冲动控制概念的意义不明确的反映,有时需要对此进行现象学的解释。在研究中,有必要更多地注意把不同的冲动性量度置入理论背景之中,并且注意对冲动性这个总体概念从认知、情感和动机方面加以区别。

第四节 态度、价值和信念

社会认知方面正在发展的领域,代表了社会心理学家和那些调查高级认知活动的人们的共同兴趣,还反映了这样的假设:社会行为是个人的认知结构及认知过程与对他人的反应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对越轨人群的研究和干预,并且影响下文叙述的对社会认知的调查研究。下文中将主要论述犯罪人的有关社会认知的内容。下面首先考察社会认知过程和技能。

一、自我概念

尽管行为主义把自我(self)看成是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on),尽管自我被分成了“主体我”(I)和“客体我”(me),但是,这种主观体验的自我在几种理论中还是被看作是决定保护行为和目标搜寻行为的一种因素。自我被用于表示“整体人格”(the total personality)时,一个综合且不明确自我概念可能被批评为一个神秘的侏儒;可是,社会认知理论家已恢复了一种自我观,即把自我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信息加工结构,或者看作一种认知图式。例如,爱泼斯坦(S. Epstein, 1973)使用科学理论中的比喻,把自我概念描绘成一种自我理论,这种自我理论的基本原理在评价和获得相关信息中不断地得到证实。所以,自我概念是指关于自己的知识和信念,包括对感情关注或自尊(self-esteem)的态度。由于普遍认为自我概念来源于社会相互作用,并且也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中介,所以,异常的自我概念也可能是反社会行为的中介。

有人认为,自我态度影响行为的组织和方向,但对于所卷入的动机过程仍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其信念和他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所接收的信息之间寻求一致。例如,不诚实的行为在没有扰乱自我意象时更有可能发生;有证据表明,自尊心低的人更有可能利用机会进行欺诈。另一种观点是,人们常常有目的地维持或提高他们的自尊心。由于所预期的越轨参照群体的赞同会增强自尊,所以,人们可能通过越轨行为达到这种目的。然而,认知一致性的维持好象与自我概念的内容更加有关,与评价的方向或者自尊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豪厄尔斯(K. Howells, 1978)描述了一个投毒犯罪人的行为项目网研究(repertory grid study),此人的自我概念是那种著名的成功人士的自我概念。虽然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但它却表明,一个人也许有一种没有经历自我贬低的、偏离社会观点的自我概念。

然而,低自尊是与青少年中的不遵从行为相联系的。在几个研究中发现,低自尊已成为少年犯罪人的特征。早期的研究证实,少年犯罪人具有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情绪性;在法定犯罪人中“神经质”水平较高,但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关系还不清楚(参见第五章)。由于神经质维度与自尊密切相关,所以,这些结果意味着犯罪人具有更消极的自我意象。

更直接的对自我概念的测量大多证实上述观点。例如,伯盖特(M. Bhagat)和弗雷泽(W. I. Fraser)发现(1970),与守法少年相比,少年犯罪人对真实自我的评价较低;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进行的测量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少年犯罪人的自尊水平都较低。不过,犯罪人中的自我概念也有变化。例如,埃奥(I. D. Eyo, 1981)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少年犯罪人在自我概念的道德、身体、社会和家庭成分上得分更低。少年教养院中的少年犯罪人更强调身体方面的成分,而那些拘留所中的少年有更强烈的防卫性自我意象。

这些研究结果具有相关关系,但没有确立自我概念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在越轨行为中存在着三种有关自我概念的理论观点。第一,雷克利斯(W. C. Reckless, 1961)提出,个人通过内部遏制增进遵从性和自我控制,这是一种有利的自我概念、目标定向、挫折耐受力 and 信奉规范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中,一个“良好”的自我概念是抵御越轨性影响的**绝缘体**(insulator),被认为是对认知一致性的一种需要。雷克利斯(W. C. Reckless)和迪尼茨(S. Dinitz)的研究表明(1967),被教师提名为“好”或“坏”的男生在社会化和自我概念的自陈测量中有差异,并且在随后的少年犯罪结果中也不同。自我概念量表与教师的提名和社会化都有关。有人认为,处于不利的家庭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少年,当具有一个有利的自我概念时,不容易受犯罪行为的影响。可是,奥克特(J. Orcutt, 1970)批评这种研究在选择“好”和“坏”少年时有偏见,对自我概念的论述不适当,并认为雷克利斯的理论不能成立。虽然对遏制理论研究的兴趣已经衰落,但在汤普森(W. E. Thompson)和多德尔(R. A. Dodder)(1986)的一项因素分析研究中已得到部分支持。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与白人少年中的自我概念有联系,但在白人少女或黑人少年与黑人少女中没有发现这种联系。可是,这些有关少数种族人群的研究,尽管有些冒险,但是却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自我概念是保护青少年不受犯罪行为影响的一种因素。访谈资料表明,精神愉快的人有较高的自尊,而这却来源于个人成就。

第二,把消极的自我态度看作是标定的结果。根据标定理论,一个越轨的自我形象是伴随司法过程而被烙印化的结果,并且是随后继发越轨行为的中介。尽管这种观点再次假定需要一致性,焦点集中在低自尊上,把低自尊看成是对别人的消极反应的一种反应性评价(reflected appraisal)。从横断研究中收集的证据表明,官方少年犯罪与低自尊之间的相关能够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由艾吉顿(S. Ageton)和埃里奥特(D. Elliott)(1974)所做的纵向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设。在以前没有与警方接触过的少年中,那些后来经历这种接触的少年比那些予以拘留而未被逮捕的少年采用了更明显的少年犯罪自我定向。可是,其他的研究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例如,吉布斯(L. E. Gibbs, 1974)发现,尽管盗车犯罪人的少年犯罪自我意象比那些先被警察逮捕后由法庭审判的对照组更加明显,但是,盗车犯罪人的自我概念和自尊接近于受到法庭审判后的对照组。由于标定对随后的少年犯罪影响较弱,对反应性评价的动机性影响也相应减弱。人们的确也期望,标定效果依赖于先前的自我概念。

最具综合性的模式是将少年犯罪与自尊心的提高联系起来的模式。在卡普兰(H. B. Kaplan, 1980)的分析中指出,自尊心来源于获取成就的能力、信心以及在社会关系中的认

可。这些领域中的失败导致自我贬低,并激发其选择违反传统的行为。少年犯罪就是一种违反传统的行为,因为少年犯罪参照群体可以通过提供接受和赞成来提高其自尊。因此,自尊是学校和社会失败与少年犯罪之间关系的中介,而不是最终的原因或结果。这一模式预示,自尊和少年犯罪两者之间最初具有负相关,但由于少年犯罪恢复了自尊,所以随后出现了正相关。这种模式还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进行检验。

卡普兰(H. B. Kaplan, 1980)报道了几项在不同的时间点对自尊心与少年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与这个模式的发展特征是一致的,但它们没有考察连续的因果顺序。另外三个研究已经考察了自尊心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在转变中的青少年调查(Youth in Transition Survey)中的重复性高峰。头两个高峰时的自尊心和少年犯罪两者间的交叉滞后相关(cross lagged correlation)几乎间隔两年;罗森堡(F. Rosenberg)和罗森堡(M. Rosenberg)(1978)对此作出结论,认为尽管自尊水平对下层阶级青少年影响更大,但是自尊心的高低可以预告后来的少年犯罪。布里纳(J. Brynner)、奥马利(P. O'Malley)和巴马克曼(J. Bachman)(1981)批评了这种分析,扩展了这个研究,结果发现自尊对后来的少年犯罪几乎没有影响。但他们也发现了少年犯罪对其后来的自尊有一点积极影响,这与提高模式是一致的。相反,进一步地分析既没有证实减弱的自尊对少年犯罪有促进作用,也没有证实少年犯罪对随后的自尊有提高作用。

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研究在自我概念和少年犯罪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任何一致性的因果关系。在几个研究中观察到的自我概念与少年犯罪之间的负相关,是否代表这两个变量中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巧合作用,仍然有待于证实。这种研究遇到几种限制,而不仅仅是缺乏一种合适的自我概念理论。自我概念和自尊常常不能清楚地区分,通常笼统地加以测量,而不是与成就的专门领域或自我的成分有关。例如,格林沃德(A. G. Greenwald)和普拉特卡尼斯(A. R. Pratkanis)提出(1984),必须对自我概念的公众的、私人的和集体的方面加以区分。研究人员也很少注意“特征—状态”(trait-state)的区别。尽管纵向研究资料表明,自我概念在所有时间相对稳定,但自尊心的短暂变化与特定越轨行动更为相关也是可能的。纵向研究对自尊和少年犯罪行为两者之间的任何交互影响也许是不敏感的。

二、价值与信念

愿意遵守社会规则常常被看作是道德价值观(moral value)的作用,或者被看作是态度或信念的情感力量的作用。**道德知识**(moral knowledge)与一般的智力有关系,由于大多数人或许知道基本的“对”与“错”的规则,因此,道德知识不可能是越轨行为方面的差别的主要来源。然而,有几种理论提出,少年犯罪人干坏事应归因于他们具有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认可的越轨价值观。例如,亚文化理论家提出,少年犯罪人具有强硬、攻击、追求刺激、拒绝日常工作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马茨阿(D. Matza, 1964)则认为,这些价值观是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的秘密价值观,少年犯罪人也具有传统价值观。他们通过某一事件能解除道德抑制,从而“漂向”犯罪。

马茨阿的观点没有得到明确地支持。哈泽(N. Heather, 1979)报道了两项有关少年犯罪人与守法少年研究的结果。在研究中发现,传统价值观和秘密价值观在两个群体中都存在。可是,秘密因素可以解释少年犯罪人中更多的变异,所以他提出秘密因素是少年犯罪人价值观中占优势的组成部分。然而,科克隆(R. Cochrane, 1971)发现,成年罪犯和对照

组在价值优先性方面存在差异，男犯认可更加具有即时个人相关性的价值目标，女犯具有更加男子气的价值系统。因此，有一些证据表明，少年犯罪人是以越轨价值观为特征的。

人们普遍假定，少年犯罪与笃信宗教之间存在一种反比关系。尽管早期研究发现犯罪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之间有不明显的负相关，但已经有人报道了不一致的结果。埃里夫森(K. W. Elifson)、彼得森(D. M. Peterson)和哈达书(C. K. Hadaway)(1983)应用几个笃信宗教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指标进行研究，证实了它们之间的负相关。然而，最显著的相关是在没有被害人的犯罪中发现的，例如，使用大麻。笃信宗教没有独立于其他因素的预测力。有人提出，宗教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更有可能通过家庭类型和支配他的朋友发生作用。

价值观与需要或目标有关系。例如，追求刺激或强硬的价值观念意味着偏爱某种经历或结果。可是，人们仅仅对犯罪性中的动机因素进行了有限的探讨。这也许反映了控制理论的影响；虽然种族、亚文化和社会学习理论提出，少年犯罪人对其地位和同辈群体的赞同有很强烈的需求，但控制理论则假定，犯罪表达了人类共同的需要。一些研究发现少年犯罪人缺乏获取成就或事业成功的志向。但是，杰塞(R. Jessor)和杰塞(S. L. Jessor)(1977)却发现，相对于学业成就而言，青少年中的越轨行为更多地与其对独立的关注有关。不过，青少年越轨行为也与青少年对共同伴的感情联系的需要有关。

三、中和作用和归因过程

如果犯罪人确实具有传统价值观，那么，他们没能抑制越轨行为的一个理由也许是：越轨行为通过暂时的借口或合理化作用而被中和。赛克斯(G. Sykes)和马茨阿(D. Matza)(1957)提出了5种中和技术(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1)否认责任(一个人的行动是由于贫穷、破裂家庭或者醉酒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2)否认损害(造成的伤害很小)；(3)否认被害人(被害人应受此伤害)；(4)责备谴责者把注意力转向谴责这种行为的人，例如刑事司法人员)；(5)高度效忠群体(把其他人，如同伴的需求看得很重)。这些中和技术假定，态度和行为之间的认知是一致的。它也假定中和作用是通过特殊情境产生的暂时借口，而不是一直对越轨行为持消极态度(尽管阿格纽[R. Agnew]和彼得斯[A. A. R. Peters][1986]把“对中和作用的认可”看作是预先安排的因素)。这种中和作用可以用商店行窃者的信念加以证实。这些窃贼认为，他们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商人应该被偷”、“大家都这样做”、“这不是严重的犯罪”。

中和作用在犯罪前产生的假说显然难于直接测量，一些研究试图用回溯性方法鉴别中和作用的影响。迈纳(W. W. Minor, 1980)注意到，早期的研究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他没有发现伤害犯、抢劫犯或盗窃犯之间的差异；无论是他们选择的中和作用类型，还是在他们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借口方面都是如此。他认为这种结果对这一假说是不利的。可是，马茨阿(D. Matza, 1964)对个人中和作用假说进行了修改，他认为，言语辩解与被同伴所期待的、但是却被误解的中和态度相一致，而与个人认可的中和作用不一致。欣德朗(M. J. Hindelang, 1974b)没有支持这个假说，他发现做坏事的少年犯罪人认为，他们的朋友(对少年犯罪行为的态度)与自己一样，甚至更不赞成自己的少年犯罪行为。可是，鲍尔(R. A. Ball, 1983)得到的结果与马茨阿的假说一致。“归因性”(attributed)中和作用(例如其他人如何理解越轨行为)与六年级学生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关系更密切，而与个人的中和作

用关系不太密切,不过个人的中和作用在九年级学生中更重要。然而,这些相关的数据没有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中和作用是越轨行动之后的适应现象,还是越轨行为之前的现象。

中和作用的概念显然与摆脱自我抑制性影响(self-restraining influence)观念相似,这种观念由社会学习理论家提出的,用以说明情境对道德行为的影响。这个概念也可能被看作是归因理论的概念,归因理论考察在每天的思维中,如何通过对原因、责任、责备的归因来解释意料之外的或不受欢迎的事件。例如,马茨阿提出的“否认责任”,清楚地反映了对个人行为进行的外部归因,这些外部原因也许是稳定的(贫穷),也许是不稳定的(酗酒)。不管他们是不是犯罪行为的中介,犯罪人对其行为的解释都可能与刑事司法系统对他们的反应有关,也可能与他们应付刑罚制裁的方式有关。

索尔尼尔(K. Saulnier)和珀尔曼(D. Perlman)(1981)根据有关罪犯对其犯罪进行原因分析的归因理论,进一步证实了几个预测。例如,当犯罪与先前的记录一致时,罪犯更可能作出稳定的和内部的归因;当犯罪与“行动者—观察者”偏差一致时,工作人员倾向于把犯罪归于内部原因,罪犯则归因于外部因素。亨德森(M. Henderson)和修斯顿(M. Hewstone)(1984)在与暴力犯罪人进行的谈话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他们考察了原因归因(attribution of cause)和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责任归因根据是否使用辩解(excuse)来确定的,辩解包括否认责任、归因于外部因素。辩解与辩护(justification)不同,辩护是承认责任,但是用正当的理由进行证明。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解释不仅外部归因占优势,而且也更有可能进行辩护(而不是辩解)。可是,当被害人死去时他们更有可能使用辩护,而较少使用辩解。有关责任归因研究的这些结果,可以根据一般归因过程的研究进行预测,而不仅仅意味着犯罪人有越轨思维。不过,将原因或责任归于他人的倾向性偏差,可能会促成犯罪行为,攻击性个人中就有这样的归因偏差,这些归因偏差将在第九章讨论。

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的另一个因素是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它也与因果关系归因有间接联系。内部—外部控制点(I-E)的维度反映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即结果是由个人自己的行为控制的,而不是受外部因素,例如机会、强有力的他人等控制的。由于少年犯罪人常常在获取合法成就时遇到外部障碍,所以,有人提出他们更有可能显露这种期望,即事件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一些研究发现,犯罪人在罗特的内外向量表(I-E scale)上确有更加外部的定向,但其他的研究没有证实这一点。一种观点认为,少数种族群体的犯罪人尤其可能有外部控制点,但在其他研究中没有发现一致的结果。在几项研究中已经证明,罗特的内外向量表的预测力是较弱的,这个维度与对犯罪行为解释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清楚的。不过,内在性(internality)已被看成是有可能进行犯罪行为的人中存在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性因素。

四、约奇逊和萨米诺的“犯罪人格”

约奇逊(S. Yochelson)和萨米诺(S. Samenow)(1976)在其《犯罪人格》(the criminal personality)一书中进行的分析中,强调认知。这本书中的分析是他们根据对240个男性犯罪人的广泛访谈完成的。他们的样本包括在社区门诊部就医的年轻犯罪人,但主要是被关押在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作精神病鉴定或因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的“顽固”犯罪人(hard core offender)。约奇逊和萨米诺提出,他们不再沉溺于精神分析、心理学和社会学

对犯罪的解释,而打算采用“现象学”的观点对犯罪进行分析。他们主要对犯罪人的思维进行分析。虽然犯罪人试图否认自己的责任,但他们的生活仍处于其思维的控制之中。作者坚决主张,把一个人变成为犯罪人的是早年的一系列选择。可是,他们在承认个人发展过程中父母与子女相互影响的同时,并没有解释个人进行选择的原因。

普遍认为,“犯罪性”(criminality)是一个包括一系列思维过程和犯罪行动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非犯罪一端被定义为“负责任的思维和行动”;这些负责任的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履行应尽的义务,依法办事。在另一端是犯罪人,他们具有一种错误思维模式系统。他们提出了40多种“思维错误”(thinking error),并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与其他学者所说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s)部分重合的犯罪思维模式。例如,以弥漫性恐惧为特征的思想,尤其是个人感到无价值的“零点状态(zero state)”,其中心模式是与权力和控制需要有关的“权力强加”(the power thrust)。其他的模式包括分裂(思维中的不一致)、多愁善感、完美主义、不加选择地追求对性刺激的需要、说谎。第二类是自动思维错误(automatic error of thinking),包括“关闭的通道”、不坦率的交流方式、被害人姿态、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不承担义务、缺乏信任、较差的决策能力。第三类是更直接地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的错误。这类错误包括广泛的反社会行为幻想、内部威慑因素和外部威慑因素的“侵蚀”(corrosion)、把自己看成好人的想法、过分地乐观主义。他们声称,犯罪人并不是冲动性的,因为不管犯罪的实施是否利用了机会,犯罪前都典型地存在幻想和预谋。这些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试图评价或改变期间得到表现,并且可能采取目的在于击败检查者或治疗人员的策略形式。

约奇逊和萨米诺关于犯罪思维过程的研究强调,思维过程是越轨行为的决定因素,这显然与“理性犯罪人”(rational criminal)的观点相一致,并且也与人们对越轨行为中认知功能障碍作用的持续关注是一致的。他们的观察也与犯罪人将抑制越轨行为的因素加以中和的观点相一致。可是,他们的解释受到了几方面的严肃批评。第一,他们对犯罪性的定义有价值偏向和主观性,而且没有试图证明在负责任的市民中不存在“犯罪性思维错误”。第二,他们从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中作出一般性推论,其他的临床观察没有提供支持性证据,所以,这一公式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系列假说,而不是对一种理论的验证。第三,他们的“思维错误”与任何系统的认知功能理论没有联系,只是一个有关需要和不合理信念的随意清单。乌拉克(J. Wulach, 1988)发现,尽管研究者拒绝精神分析理论,但他们提出的很多思维错误(例如,权力强加、分裂、被害人姿态)都与最近心理动力学学者提出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一致的,这些心理防御机制是通过对自恋者和临界障碍(borderline disorder)的归因分析提出来的。他认为,约奇逊和萨米诺描述的犯罪人格特征与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本(DSM-III-R)中对反社会型、自恋型、表演型以及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描述是一致的,也与克莱克利的病态人格概念是一致的,并没有确定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

第五节 社会认知和人际技能

一、角色采择、移情和罪恶感

角色采择(role-taking)是认知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²。皮亚杰提出,通过人际交往,青春前期儿童逐渐从对世界的自我中心知觉转移到理解他人的观点。源于符号相互作用论的角色理论同样认为,社会依赖于采纳“一般他人”(generalized other)角色的能力。高夫(H. G. Gough, 1948)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角色采择能力的缺陷是精神病态者社会化不足的原因。对柯尔伯格来说,角色采择能力的发展是道德推理发展的先决条件。塞尔曼(R. Selman, 1984)已经提出了与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相似的角色采择阶段理论。由于角色采择必需理解他人的情感、原因和意图,所以,角色采择将道德与认知联系起来。在获得角色采择技能的过程中,发展的延迟是与不尊重他人的权利相联系的。所以,持久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社会越轨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

格卢克瑞(C. Gurucharri)等人发现(1984),表现出行为问题的青春前期儿童在塞尔曼人际关系阶段上的发展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的儿童,不过他们在青春后期可能会赶上正常儿童。钱德勒(M. Chandler, 1973)发现,在已经是少年惯犯的11至13岁的儿童和同龄守法少年之间,自我中心主义方面的差异特别引人注目。卡普兰(P. J. Kaplan)和阿巴思诺特(J. Arbutnot)(1985)在对大龄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这一点,李(M. Lee)和普伦蒂斯(N. M. Prentice)(1988)在其他的角色采择任务中发现,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之间有重要差异。肖特(R. J. Short)和西蒙森(R. J. Simonsson)也发现(1986),在钱德勒(M. Chandler)的测量中,被共同伴判断为具有攻击性的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比没有攻击性的少年犯罪人具有更加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另一方面,希基(J. E. Hickey, 1972)观察到,某些青春后期的少年犯罪人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社会角色采择水平,并显著地超过其道德成熟水平。这一发现强调,尽管角色采择技能没有得到发展也许会妨碍其社会化,但是,他们获得的角色采择技能并不能保证他们进行社会化的行为。例如,角色采择可能涉及操纵行为以及合作行为。

与之相关的概念是移情(empathy)。移情不仅涉及理解他人的观点,而且也涉及对他人情感做出反应的能力。由于对另一个人烦恼的想象能力会抑制有害的行为,移情对少年犯罪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在对病态人格特点的描述中,缺乏移情是突出的特点。由于文化中的刻板观念表明,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移情,所以,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少年犯罪行为中的性别差异。

可是,在如何定义和测量移情,如何区分移情与角色采择、同情(sympathy)方面,长期存在不同的意见。一般把移情看作是一种感情反应;有人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对另一个人的情绪体验产生的同感体验;有人则强调,移情是对别人情感的认识,而不一定包括相应的情绪体验。尽管已经发现存在性别差异,但是,移情的性别差异依赖于评价的方法;假定

2. 角色采择(role-taking)又译为“角色承担”,是指个人对自己期望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理解、采纳和承担。——校注

的女性移情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感的言语报告量度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对观点采择的认知定向的测量中不太明显。

霍根(R. Hogan, 1969)发展了一种自我报告式移情特征测验,用以评价“对另一个人的状况或心理状态的想象性理解”。这种测量强调认知方面,而不强调感情方面;同时强调,移情与空间能力和社会敏感性(social acuity)都有关。在霍根的道德性格理论中,道德成熟被看作是由社会化、移情和自主性的发展引起的。这些术语中的移情是一种倾向性的技能,这种技能允许一个人采取“道德的观点”,并且补偿在抑制反社会行为方面存在的社会化缺陷。

与这种观点一致的是,霍根(R. Hogan, 1969)发现,监狱罪犯和年幼少年犯罪人在高夫的社会化量表上得分低、在移情测量中得分最低。社会化量表分数与少年犯罪人一致的大学生,可以通过较高的移情分数与少年犯罪人加以区分,这一结果支持补偿假说。埃利斯(P. L. Ellis, 1982)也发现,移情测量能有效地把少年犯罪人与守法少年区分开来,并且也能把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和非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区别开来。神经症性少年犯罪人比精神病态性少年犯罪人得分更低,也比亚文化性少年犯罪人和对照组得分更低。可是,肯德尔(P. C. Kendall)、迪尔多夫(P. Deardorff)和芬奇(A. Finch)发现(1977),可以通过社会化量表分数区别初犯、累犯和守法者,而他们在移情测量中没有什么不同。李(M. Lee)和普伦蒂斯(N. M. Prentice)(1988)使用其他移情量表,也不能辨别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之间的差异;他们也不能用奎伊的维度确定少年犯罪人小群体之间的差异。不过,他们的移情测量与社会认知发展的测量无关,他们也怀疑移情自陈量表的效度。

其他研究产生了随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而变化的不一致的结果。罗滕伯格(M. Rotenberg, 1974)区分了认知性角色采择与情感性角色采择,分别把它们称为移情和同情,并且通过对实验任务的反应来定义它们。少年犯罪人比学校男生表现出更低的情感角色采择能力,但在认知角色采择方面没有差异。卡普兰(P. J. Kaplan)和阿巴马思诺特(J. Arbuthnot)(1985)在少年犯罪人也只得到缺乏移情期待的有限的支持。认知性角色采择通过皮亚杰式任务(Piagetian task)来确定³,情感性移情却通过特质测量和涉及自我描述的特定的无结构任务来确定。少年犯罪人在所有测量中都与守法少年差别不大,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仅仅表现在完成无结构任务上。

移情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移情可能不是一种单维的能力。最系统的模式是霍夫曼(M. L. Hoffman, 1982)提出来的;他把移情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烦恼的一种普遍性情感反应,认为移情会随着儿童在社会认知阶段方面的进步而改变。他把罪恶感(guilt)作为一个移情性烦恼的特殊事件,这种移情性烦恼是通过自我对他人的困境承担责任的原因归因而唤醒的;罪恶感是后天习得的,发展相对较晚。所以,罪恶感是一种人际“热认知”(hot cognition),而不是条件性焦虑或者对父母惩罚的象征性恐惧,它是父母的归纳性惩戒(inductive discipline)的结果。社会越轨行为与观点采择中的发展延迟相联系,并且也可能伴随着罪恶感和移情的缺陷。使用莫舍罪恶感量表(Mosher Guilt Scale)的研究表明,

3. 皮亚杰式任务(Piagetian task)是指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为了测量儿童的方位守恒而设立的“三座山”任务,所谓的“三座山”包括颜色和大小都不同的3个模型。

—校注

尽管少年犯罪人在预期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罪恶感方面与守法少年没有什么不同,可是,道德推理处于习俗水平的少年犯罪人比处于较低阶段的犯罪人更可能报告有罪恶感的倾向。所以,一些少年犯罪人在观点采择技能方面是有缺陷的,而情感性的人际交往依赖于这些技能。可是,究竟这些少年犯罪人是更难管束的犯罪人,还是持续犯罪人,尚待测定。

二、人际问题解决

人际问题解决(interpersonal problem solving)方面的缺陷也许与社会无效行为或适应不良行为有因果关系。德泽瑞勒(T. D'Zurilla)和格德菲尔德(M. Goldfried)(1971)提出的问题解决概念,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工作。他们把问题解决的概念看作一个认知—行为过程,这一过程包括:(1)为处理问题情境而选择有效的反应,例如,人际关系冲突或强化刺激的丧失等;(2)增加从这些可选反应中选择最有效反应的可能性。焦点集中在“发现”解决办法上。这种发现是通过认识问题、规划目标、产生可选的解决办法、决定最优策略和测出结果等一系列活动实现的。人际问题解决依赖于智商,但它更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

海恩斯(A. A. Hains)和瑞安(E. B. Ryan)(1983)在几个涉及社会认知过程的任务中,对两个年龄段的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少年犯罪与道德判断没有关系,也与有关社会问题解决策略的知识缺陷没有关系。可是,在一个社会问题解决任务中,少年犯罪人在考虑问题的某个维度方面(例如,问题情境的前提)时,考虑不很详尽,这意味着他们具有一种根据不完整或不精确的推论进行社交行为的倾向。

其他研究仅仅考察了少年犯罪人之间的差异。一种常用于人际问题解决的测量是MEPS,即手段—目的问题解决测验(Means-Ends Problem Solving test);这种测验是呈现假设问题情境的开头和结束,要求被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普拉特(J. J. Platt)、斯卡拉(W. Scura)和汉农(J. R. Hannon)(1973)利用手段—目的问题解决测验,对吸毒成瘾性少年教养犯和未吸毒成瘾性少年教养犯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吸毒成瘾性少年教养犯对问题情境中达到目标的概念化手段显示出明显的能力缺陷。在一个由普拉特(J. J. Platt)和普劳特(M. F. Prout)(1987)引用的未发表的研究中也发现,年轻犯罪人的假释失败者在手段—目的思维和选择性思维中是有缺陷的。希金斯(J. P. Higgins)和蒂斯(A. P. Thiess)(1981)使用同一种工具比较了三种矫正机构内的少年犯罪人:一种是对矫正机构适应良好的少年犯罪人;另一种是有纪律问题的少年犯罪人;第三种是被工作人员和其他少年犯罪人评定为不适应环境者的少年犯罪人。结果发现,不适应环境的人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手段中表现出更明显的缺陷,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比其他两组少年犯罪人少,而有纪律问题的少年犯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比适应良好的少年犯罪人少。近期的几项研究也指出,问题解决缺陷在攻击性的儿童中尤为突出。

三、社会技能

萨拉森(I. G. Sarason, 1968)是最早指出少年犯罪人在社会认可行为和适应行为方面有缺陷的人之一;社会技能训练在对犯罪人的治疗中已成为一种普及的技术(参见第十三章)。然而,假定犯罪人有社会技能缺陷的相关证据不多。一个问题是缺乏普遍认同的“社会技能”(social skill)的定义和有效的量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明显的社会技能缺陷与认知机能失调或问题解决技能区分开,也是不清楚的。

弗里德曼(B. J. Freedman, 1978)等人设计了青少年问题调查表(Adolescent Problems Inventory, API)。该调查表要求被试指出他可能(或应当)如何对大量言语描述的问题情境做出反应。他们发现,少年犯罪人的反应与“好市民”或“领导人”的反应相比,有效的策略更少。虽然青少年问题调查表与智商显著相关,但在智商相当的小群体中,青少年问题调查表仍存在差异。青少年问题调查表也能区分更有破坏性的少年犯罪人。维尼加诺(C. Veneziano)和维尼加诺(L. Veneziano)(1988)发现,很多少年犯罪人样本在青少年问题调查表测验中的平均得分比弗里德曼等人研究的少年犯罪人和守法少年平均得分更低。迪希恩(T. J. Dishion, 1984)等人虽然在其评论中提出,社会无能没有显示出必然引起少年犯罪,但他们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青少年问题调查表与官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都有关系。豪厄尔斯(K. Howells, 1986)也强调,社会技能缺陷与犯罪行为两者之间的任何相关都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尽管青少年问题调查表不能根据犯罪的数量或类型来区别少年犯罪人,但维尼加诺(C. Veneziano)和维尼加诺(L. Veneziano)(1988)证实了这个量表的会聚效度和判别效度。他们根据青少年问题调查表的得分,把矫正机构内的少年犯罪人分成三个组:缺乏社会能力组、中等社会能力组和有社会能力组。研究发现,缺乏社会能力组在很多因素上有差别,他们不仅智力低下,而且也表现出更多的纪律问题和家庭紊乱;他们把自己描绘得更冲动,更具有攻击性,并且具有外部控制点。与没犯罪的少女相比,犯罪少女也在专为少女设计的类似调查中表现出更差的社会能力。这个量表也与官方少年犯罪和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都有关系。

可是,青少年问题调查表测量仅仅局限在社会表现方面。对非言语行为的观察,获得了不太清楚的结果。斯彭斯(S. H. Spence, 1981)根据与矫正机构内犯罪少年和学校男生的简短访谈,考察了社会互动的组成成分和整体。少年犯罪人在社会互动的一些组成成分方面有差别,表现为更加烦躁不安,更缺乏目光接触、头部运动,更少说话;他们也被评定为更缺乏社会技能或就业技能,焦虑更严重,但是并不缺少朋友。科林伍德(T. R. Collingwood)和金瑟(R. W. Genther)在研究中也发现(1980),少年犯罪人在基本互动技能方面也有缺陷,例如,在注意和倾听等方面都有问题;他们还发现,在完成一种技能训练程序的青少年犯罪人中,累犯比非累犯的技能水平更低,在训练前后都是如此。与此不同,伦威克(S. Renwick)和埃姆勒(N. Emler)报告(1991),少年犯罪人在社会技能评定和自我报告的社交困难方面的平均得分与在其他研究中守法少年的平均得分相差不大。这些测验都与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不相关。可是,与处理特殊情境如同伴压力、矛盾或与权威人物发生冲突的特殊技能相比,一般社会技能与反社会行为的关联性可能更小。

少年犯罪人在社会能力方面有可能是异质的。有关对社会线索反应(response to social cues)的研究也强调这个方面。已有人提出,少年犯罪人对社会线索的反应是迟钝的,这是由于破裂家庭没有提供适当的辨别训练。言语条件反射实验好像支持这一点,因为少年犯罪人对社会“强化”表现出较少的行为改变。然而,斯图尔特(D. J. Stewart, 1972)证实,少年犯罪人不仅在这一方面是异质的,而且他们对社会线索也是不敏感的;在言语条件反射实验期间,神经质的少年犯罪人增加了他们的言语反应,这表明了社会强化的影响。与此相对照,精神病态者显著地减少了他们与基线操作水平(baseline operant level)有关的反应。所以,他们对于由实验人员提供的社会线索是敏感的,可是他们似乎对社会线索

表示厌恶。

这些后来的研究也把注意集中在意义不明确的内在因素,尝试从观察者的立场来识别社会“技能”。特罗尔(P. Trower, 1984)认为,不能在行动者的意图和由行为转达的社会意义背景之外来定义或理解社会技能。由里姆(B. Rimé)(1978)等人对矫正机构内少年的一项研究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在短暂的访谈期间,对精神病态青少年和心理正常青少年进行了观察,发现精神病态者明显地表现出更多的目光接触,较少的微笑,手势更多和更向前靠近。尽管作者把这个模式解释为因对人际线索不敏感而引起的侵入行为(intrusive behavior),但他们也发现,与精神病态者交往时,访谈者很少说话。此外,与心理正常者的交往相比,在与精神病态者交往期间,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非言语行为有更大的对应性。另一种解释认为,精神病态少年倾向于威胁和控制访谈者。根据这样的解释,精神病态者不仅对社会线索敏感,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达到目的。这与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理论家的提议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犯罪人采用一种强硬意象(tough image)的人际模式。这种模式只能被看作“不熟练的”人际模式,因为在个人的技能中缺乏应付这种情境的选择性行为。

到目前为止,有关社会认知活动的研究已经与早期的人格和认知因素的研究并驾齐驱。有关社会认知的研究不仅一直把焦点对准较年轻的人和矫正机构内的人,而且也一直证实犯罪人中存在异质性。正如罗斯(R. R. Ross)和法比亚诺(E. A. Fabiano)(1985)所强调的那样,社会认知缺陷仅仅在一些犯罪人中是明显的。在把社会认知技能缺陷与越轨行为联系起来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不过,可用的资料充分表明,很多犯罪人之所以参与反社会行为,是因为其认知发展处于自我中心水平、考虑其行动的社会后果的缺陷和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情境技能的缺陷。尽管还需要更多成年犯罪人的研究资料,但在对犯罪人矫正方面,这条研究路线已经明显地影响了近期的发展。

第九章 攻击行为和暴力犯罪

第一节 引言

对明显“盲目的”野蛮行为（mindless brutality）的报道，不仅刺激了道德败坏行为，而且扰乱了对环境的可预见性。所以，暴力行为引起了公众对“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的不安。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了这样一个普遍的信念，即由法院处理的犯罪中50%是暴力犯罪。可是，1988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被法庭审判的人中，不到9%的男子和不到4%的妇女被判决犯有人身犯罪。被害调查表明，公众对暴力行为的恐惧与实际的危险是不相称的。不过，就暴力行为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直接有害影响和长期的社会与心理后果而言，暴力行为的确是一个与公众健康有关的问题。

暴力犯罪只是人类攻击现象中的一小部分，尽管人类暴力现象有消极的含意，但是，暴力现象既不属于统计学上的异常现象，大部分也不是非法现象。本章在攻击行为的范围内，着重讨论作为日常行为的个人暴力行为。

第二节 暴力和攻击的定义

暴力（violence）是指造成身体伤害的强力打击。犯罪性暴力（criminal violence）是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包括刑事杀人、伤害、抢劫、强奸和其他的性侵害。杀人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自我防卫中的杀人行为在法律上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但这里关注的是刑事杀人，包括谋杀（故意非法的杀人行为）和过失杀人（受到挑衅时的非法杀人，没有意图，或因玩忽大意而非法杀人）。伤害（assault）是引起身体受伤的行为，但普通伤害或简单伤害只是威胁或试图伤害，而没有造成损伤。抢劫（robbery）指的是涉及威胁或使用暴力的盗窃。尽管强奸被看作一种基本的暴力犯罪，但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与性犯罪一起讨论。诸如放火罪、刑事损坏（criminal damage）和违反工业安全法规之类的犯罪可能也会引起严重的身体伤害，但这些一般不包括在暴力犯罪的范围之内。

攻击（aggression）是指故意施加的伤害性打击，包括心理不适和心理伤害。不过，在竞争性情境中，攻击的涵义有时大致与活力（vigour）相同。可是，把什么行为看作伤害要依赖于价值观念和社会背景，合法的惩罚或自我防卫不大可能被看作攻击。所以，攻击是指观察者认为**没有正当理由**的伤害行动（harm-doing），而且这个概念不可能摆脱它的道德意义。因此，只有在其他动物的行为中才可能发现与人类的攻击类似的行为。

由于对攻击或暴力的鉴定依赖观察者的价值观念和归因，因此，缺乏一个公认的定义是毫不奇怪的。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定义并不总是包括同一范畴的所有事件。一些人着重于**伤害的结果**，一些人则着重于行为的**形式**，诸如威胁或者企图伤害。有些人忽视行为的意

图和社会意义,以致把目的完全不同的行为归入相同的类别。例如,行为主义者常常把攻击“客观地”定义为“把有害刺激传送给另一个有机体的反应”,这应当包括牙科医生、治安法官和粗心大意的司机。然而,虽然行为主义者不赞同未经测量而推论出的术语,但是,在行话和研究中还是隐含着“意图”(intent)之意。例如,“打击”(hit)描述了一个故意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指一个能够观察到的运动。

现在,很多心理学家明确地把意图包括在攻击的定义中,认为攻击就是试图伤害或损害想避免这种伤害或损害的人的行为。这包括了合法的行为,也包括了非法的行为,但是,这一定义也区分含有恶意的伤害和仁慈的伤害如外科手术,区分恶意的伤害和性虐待狂被害人主动寻求的痛苦。因此,当一个不愿受害的被害人受到故意伤害时,攻击是与犯罪性暴力的概念相一致的。在这个定义内,攻击行为可以采取身体伤害,言语损害或消极阻挡(passive obstruction)的形式,攻击的结果可能包括从丧失生命到伤害自尊等形式。

把攻击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归入一个单一的类别意味着,攻击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的功能。可是,愤怒驱动性攻击(angry-motivated aggression)或愤怒驱动性攻击(annoyance-motivated aggression)通常有别于工具性攻击或诱因驱动性攻击(incentive-motivated aggression);在前一类攻击中,对被害人的伤害减弱了不愉快的情绪状态,而在后一种攻击中,伤害促进了非攻击性目标的实现。这是因为,这种区别意味着,由心理的、认知的和表达性的多种成分组成的愤怒情绪状态,不是攻击行为的必然伴随物。犯罪学家同样把暴力区分为工具性暴力和敌意性暴力或表达性暴力。因此,抢劫是工具性攻击,而没有计划的或冲动性的攻击或许是由愤怒引起的。

一个与攻击相关的术语是敌意(hostility)。巴斯(A. H. Buss, 1961)认为敌意包括消极的评价或不满、不信任和憎恨的态度。有些作者交替地使用敌意或攻击。齐尔曼(D. Zillmann, 1979)认为,因敌意而施加伤害的攻击与不造成人身伤害的攻击是一样的。可是,需要把对他人持消极信念的倾向与在生气时攻击他人的倾向区别开来,巴斯就是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特德希(J. T. Tedeschi, 1983)认为,所有的攻击的定义都是有价值偏向的和不适用的,并提出强制力(coercive power)这样一个替代性概念,强制力是一种使用威胁或惩罚获得依从的社会影响形式。这个概念意味着,被认为是攻击的那些现象,受权利和控制的强化,但是,贝科威茨(L. Berkowitz)和唐纳斯坦(E. Donnerstein)坚持认为(1982),伤害是愤怒性攻击的首要强化物。可是,伤害和控制的获得在实践中不易辨别。特德斯奇的概念有一个优点,即强调攻击行为的人际关系背景,它也澄清了攻击、支配(dominance)和自信(assertion)之间的区别。这些概念通常是很难分清的。除了需要改变敌意的各种程度外,所有的攻击都含有通过使用力量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在利里(T. Leary)的人际关系圈里得到反映,这里的强制(coercion)代表支配和敌意的结合。

伯迪森(S. H. Bertelson, 1983)从个案研究、调查、访谈、人格测量、直接的行为观察、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方面概括了有关攻击的最重要的一些操作定义。这些研究包括自我报告的攻击、对轻微报复的观察以及与法律直接有关的暴力。可是,由于实验室研究没有把操作定义和概念化定义连接起来,所以,有的研究者已经对实验研究中的人为性、对社会意义的忽略和值得怀疑的外部效度提出了批评。例如,实验中广泛使用的巴斯的“攻击机”,在实验中,被试按一下开关,提供一个有害刺激给“学习者”。对这种实验的批评

是, 被试可能实际上是进行利他行动, 而不是进行含有恶意行为目的的。

为了答复这些批评, 贝科威茨 (L. Berrowitz) 和唐纳斯坦 (E. Donnerstein) 指出 (1982)、实验环境和被试不必具有典型的外部效度, 实验的人为性正是测验因果性假说的长处。他们引证了实验程序外部相关的范例, 例如“攻击机”。他们还认为, 泛化能力 (generalizability) 依赖于被试对其情境的意义的归因, 攻击实验引起故意伤害行为。不过, 很多有关攻击的实验没有确定由被试认可的意义, 而是往往考察从环境来看是合法的攻击。在这方面, 他们可能对法官和陪审团的行为解释得更清楚, 而对受审的罪犯的行为却很难解释清楚。

第三节 暴力的模式

一、犯罪性暴力

警察对杀人案件的破案率很高。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杀人的分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特征方面的研究资料。很多杀人案发生在大城市, 但各国的杀人率有很大的差异, 并且与社会中普遍发生的暴力有关。表 9.1 表明了几个国家的比较比率, 这些数据必须谨慎对待, 因为各个国家收集整理的程序不同。最高的杀人率出现在中美洲, 而英国是其中最低的。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杀人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 在美国南部和东北部各州之间杀人率变化很大。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 至少是在美国, 暴力犯罪率在一定程度上异常地低。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以来, 所有国家已经记录在案的杀人案件实际上都在增加。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每年由警方记录的杀人平均数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有大约 300 件增加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 600 多件。不过, 杀人仍然是一种罕见的犯罪。

沃尔夫冈 (M. E. Wolfgang, 1958) 对 1948 年至 1952 年在费城发生的 588 起杀人案件进行了分析。他发现, 2 / 3 的犯罪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八点到星期日之间, 犯罪人和被害人

表 9.1 全国每十万人的杀人率 1984

国家	杀人率	国家	杀人率
哥伦比亚	37.4	波兰	1.6
墨西哥	17.9	奥地利	1.4
巴西	13.4	以色列	1.4
委内瑞拉	12.9	法国	1.3
美国	8.5	苏格兰	1.3
厄瓜多尔	7.1	新西兰	1.2
阿根廷	3.8	FDR	1.2
匈牙利	2.7	西班牙	1.0
加拿大	2.3	希腊	0.9
意大利	2.1	英格兰和威尔士	0.7
澳大利亚	1.9	埃及	0.5

资料来源: 联合国 (1988)。《人口统计年鉴》。纽约: 联合国出版社

最有可能是黑人、男人和30岁以下的人。在59%的男性谋杀案件和84%的女性死者中，被害人和犯罪人是熟人或者是有关系的人。男性的杀人和被杀更多地是在户外；女性通常大多在家里被人杀害，并且41%的人是被其配偶所害。相反，男性被害人中只有11%被其妻子杀害。行刺(stabbing)是最常见的杀人方法，1/3的犯罪是枪杀。所记载的杀人原因包括一般地争吵、家庭内部吵架、嫉妒或关于金钱的争论。不到3%的犯罪人被宣告有精神病，而4%的人杀人后自杀。

尽管布洛克(R. Block, 1977)在研究中发现，枪杀案和谋杀陌生人案件的增加与抢劫中的杀人增加有关，但在休斯顿和芝加哥的后续研究中还是产生了与上述情况类似的结果。在其他国家也报道了类似的模式，但有一些变化。在英国，种族的因素已经不太明显，涉及枪杀和抢劫杀人的杀人案件很少，被害人中占很大比例的是熟悉的男子或妇女。犯罪人中30%左右的人经常被判决为精神障碍。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英国杀人犯中有30%的人自杀；这个数字最近已经下降到8%左右。

大多数杀人是与熟人之间相互作用有关的“激情犯罪”。与家庭杀人不同，多个被害人的杀人(大屠杀)是罕见的，通常涉及陌生人。在大量杀人(mass murder)中，一次会杀害几个被害人；而在系列杀人(serial murder)中，杀人在一段时间内重复进行。由于这类案件极为罕见，所以，除了新闻记者，其他人很少系统地详细观察这类案件。可是，霍姆斯(R. M. Holmes)和德伯格(J. De Burgher)估计(1988)，在美国可能大约有350个系列杀人犯，与3500个未解决的杀人案件有关。詹金斯(P. Jenkins, 1988)提出，更有可能的数字是35个杀人犯杀死了大约400个被害人。他认为1940年到1985年间英国只有12个系列杀人犯。

重伤害(serious assault)在人口统计上和所占篇幅上与杀人类似。皮特曼(D. Pittman)和汉迪(W. Handy)发现(1964)，重伤害在周末更频繁，在种族内部更普遍；而且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数量比私人场所更多，与杀人案件相比，重伤害案件更多地涉及刀具。由波考尼(A. D. Pokorny, 1965)和布洛克(R. Block, 1977)得到的资料表明，大多数杀人都是进一步地故意伤害，其结果依赖于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武器的使用。

抢劫更经常地直接与“大街上”的男性陌生人有关。抢劫也是一种大城市犯罪，犯罪人主要是青少年和年轻成年男性，尽管武器可能用于恐吓被害人屈从，但大多数抢劫没有伤害被害人。例如，布洛克(R. Block, 1977)发现，芝加哥的抢劫杀人占谋杀案中的20%，但在全部抢劫案中仅占1%。伦敦和费城有关抢劫的研究表明，75%的抢劫属于下列两种类别中的一种：第一类是抢劫以管钱为职业的那些人，例如，出租车司机或商店营业员等，这类抢劫明显是有预谋的。第二类包括没有预谋和机遇性的行动，例如，在公共场合抢夺手提包或出其不意地抢夺；犯罪人可能是年轻人，其受害者是不大可能反抗的人。

二、家庭暴力

家庭成员间的暴力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虐待儿童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才成为一个公认的社会问题，虐待妻子也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才被普遍承认是一种社会问题。家庭暴力在传统上已被默认为“正常的”，并且在法律中仍然把惩罚的权利奉为神圣的，法律授予的这种责罚权(right of chastisement)是丈夫位于妻子之上、父母位于孩

子之上的不平等的权利。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具有要求对忽略儿童、虐待儿童或残忍对待儿童进行报道的法规;家庭成员中的伤害行为应受到刑事司法部门的干预,这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可是,在社会内部,人们仍然对家庭暴力十分宽容。例如,美国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父母在惩戒儿童期间的某个时候,对其孩子施加身体痛苦。

由于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含糊不清,“虐待”(abuse)的定义与“攻击”的定义一样也是成问题的。研究者已经证明,脱离社会规范的客观定义是难以理解的。这个术语常常是一个大杂烩(catch-all),包容了人身攻击、疏忽儿童的物质需要、性剥削和感情虐待;一些人把虐待区分为导致伤害的作为行为(commission)和因疏忽导致消极后果的不作为行为(omission),下面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在这些类别中,定义集中于不同的内容,例如,行凶者的意图、虐待行为的形式和频率、行为的严重性或者对被害人造成的后果。所以,可能在使用同样的术语描述不同的行为模式。例如,推人的行动可能属于故意的身体虐待,但可能没有伤害后果。

特别是因为被害人常常不愿控告或不能控告,可靠的流行率资料难以得到。在美国,官方对虐待儿童和疏忽儿童的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上升到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或许是一种明显低估的数字,可是,一些更明显的结果表明,家庭暴力是犯罪性暴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例如,美国全部杀人案件中的1/5和英国1/3以上的杀人案件都是家庭中的谋杀案。象沃尔夫冈(M. E. Wolfgang, 1958)发现的一样,妇女更可能在家中被害,也更可能成为其丈夫和男友的被害人。另外,1986年美国有1200名儿童死于身体虐待或疏忽。

1975年在美国进行的全国家庭暴力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Violence)中,获得了自我报告的数据。1985年又再次获得了这类数据。更近期的调查使用电话对3232对有一个17岁以下孩子的夫妇进行了访谈,询问了家庭暴力的发生率。这些调查中的家庭暴力是指故意伤害另一个人的行动。总的说来,这些夫妇中16.1%的人经历过一次暴力行为,包括打耳光或推搡;6.3%的夫妇在前一年中经历了严重的暴力行为。严重暴力行为的内容包括踢、咬、拳打、用物体打、毒打、掐死、用刀或枪恐吓和使用刀或枪。由丈夫引起的严重暴力行为中,3.4%的是指向妻子的;而由妻子引起暴力行为中,4.8%的则是指向丈夫的。全国性的估计数分别是一百八十万和二百万人。几乎所有3岁以下的儿童和大约1/3的14岁以上的儿童都被其父母打过,而全部儿童中的11%都经历过一次严重暴力行为。53%的儿童对其同胞兄弟姐妹也实施严重暴力行为,9%的儿童以严重暴力行为对抗父母。

这些数字表明,家庭内部的攻击经常发生,但因为下列几个理由,这些数字必须谨慎对待。第一,研究人员提出,因为存在社会默认现象,所以这些数字可能是过低的估计。另一方面,根据行为意图而不是结果定义的暴力,在很多事件中也许不是严重的。第二,这些数字不能推广到其他国家,例如,殴打妻子的暴力事件与新西兰的比较资料相比高出3倍以上。第三,由于妻子对抗丈夫的暴力的研究资料与配偶暴力(主要是由丈夫攻击妻子)的观点相矛盾,所以,这样资料引起了争论。斯特劳斯(M. A. Straus)和盖利斯(R. J. Gelles)注意到(1988),男性的暴力通常引起更多伤害结果,而由妻子进行的暴力可能更普遍地是自我防卫。可是,后者在已婚夫妇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研究资料表明妇女发动的攻击有较高的比率。

在官方的资料中,儿童疏忽比普遍的身体虐待高5倍,可是,有关其他形式的虐待的证据更少。一项对求爱期发生的暴力的研究发现,约会学生的32%经历了由其同伴所进行的

暴力,而25%是虐待者。老年人的虐待也被认为是普遍的,虽然很多都被归入配偶虐待范围内。配偶间虐待与其他虐待形式的重叠程度是不太清楚的,可是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这个程度可能是相当大的。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受虐妇女报告虐待者中80%的人也对其他目标使用暴力,包括孩子和父母。

第四节 攻击的理论

关于攻击性质的理论依靠不同的假设,因此,各种理论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有的强调学习或非学习的成分,有的强调内部或外部的决定因素,还有的强调情感的或认知的过程。这些理论在如何处理各种关键性问题方面有差异,这些关键性问题涉及,攻击倾向是怎样获得、维持和控制的,攻击行为是如何触发或引起的。这里将对论述这些问题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概括。为了方便起见,这些理论被分成生物学的观点、心理动力学观点、社会学习观点和社会心理学观点。

一、生物学观点

人类学习用不同方式达到同样伤害的能力,显然大于其他动物。可是,象任何需要协调的活动一样,攻击行为依赖于脑和肌肉的先天结构性特征。生物学观点假设,这种协调是处于先天的和特殊的神经化学系统控制之下的,并且强调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劳伦兹(K. Lorenz, 1966)对低等脊椎动物的习性学研究,导致他提出攻击是一种普遍本能的观点,这种本能确保人口控制,由最强壮的动物对繁殖的选择,护幼行为和社会组织。这种本能与神经系统中自发产生的能量来源有关,这种能量来源通过固定的行动模式释放出来,以便对特定释放刺激(specific releasing stimuli)做出反应。所以,劳伦兹假定,这种释放攻击能量的恒定需要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且把人类军国主义的表现或竞争性运动与其他动物中的攻击行为同等看待。可是,没有生理学的证据支持这个水力学模式(hydraulic model),甚至在低等动物中也是如此。尽管人们进行了推测,但普遍的释放体(releaser)在人类中也没有得到证实。所以,劳伦兹的研究已受到批评,认为他的研究是一种拟人化的推断,并且忽视了学习的作用。

一个更复杂的概念来自社会生物学家,例如威尔逊(E. O. Wilson, 1978)。威尔逊采用进化论的术语分析社会行为。他假定,情绪、自我理解和外显行为都受遗传素质的控制,并且随着物种的繁殖、个体的生存和利他主义的提高而进化。攻击表达一种普遍的情绪素质(emotional predisposition),但它易受文化适应和个体学习的影响。所有的人都有情绪,但攻击行为是对生存威胁的适应性反应,而不是自发性能量的爆发。

行为种系发生的连续性受到莫耶(K. Moyer, 1981)的重视,他引用了器质性病理学中有关对动物和病人大脑进行电击和外科手术损害的研究资料。他把攻击分成8类:掠夺性攻击,雄性间攻击、恐惧诱发性攻击、应激性攻击、地域性攻击、母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除了不需要特殊的生理基础的工具性攻击以外,其他攻击行为是受有组织的神经回路控制的,这些有组织结构的神经回路对激素和血液成分很敏感。尽管人类学习能影响目标的选择和行为的抑制,但在相关的目标刺激下,这些系统产生互相协调的攻击行为。马克(V.

H. Mark)、欧文(F. R. Ervin)(1970)和门罗(R. Monroe, 1978)也主张在人脑中存在一个明确的系统, 这个系统控制着攻击行为的方向。他们集中探讨了暴力行为人显示的“控制失调综合征”(dyscontrol syndrome), 这种人的边缘系统机制受到损害, 而在正常情况下, 它可以抑制攻击行为(参见第六章)。

因此, 这些理论家假定, 人类攻击有进化的根源。一些人认为, 攻击与个体的学习有关; 所有的研究者都把外部攻击行为归因于内在的生理机制, 而这种生理机制可以使人类无法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现在, 这些观点已经被很多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拒绝, 并且受到三方面的批评。第一, 这些理论家通常使用一个宽泛的攻击概念, 这种概念包括了地位冲突、“仪式化的”领地保护、对作为等价物的危险的反应, 并且依靠人类与动物行为之间在表面上的相似性。可是, 很多动物的攻击与人类的行为几乎没有关联性。赖斯(D. J. Reis, 1974)注意到, 莫耶把动物的攻击分为两类: 情感性攻击(affective aggression)和掠夺性攻击(predatory aggression)。而涉及对威胁的自动唤醒或“愤怒”反应的情感性或自卫性攻击, 在脊椎动物中也是普遍的, 这种攻击似乎与人类愤怒攻击相等。与此不同, 掠夺性攻击涉及特殊的觅食行为。

相反, 由于工具性攻击不需要特殊的生理系统, 它的起源必须建立在文化进化和个体发展的基础上, 所以, 这种攻击只限于人类。与此相似, 延迟报仇的能力也只限于人类。虽然社会生物学家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仍然认为, 由于遗传的有利条件, 人类的攻击有自己本身的进化过程, 并且强调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攻击是普遍存在的。可是,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 史前时代的人类是完全和平的, 有组织的群体之间的攻击仅仅在最后一万年中才出现的。对遗传进化来说, 这样的时间好像是不够的。

第二, 对是否存在攻击特有的生理系统有怀疑。脑刺激和脑切除研究没有发现低等动物中有这样的系统的明确证据, 在人类中证据更少。有些研究已经发现, 刺激动物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可以发现攻击行为的成分; 就特定的生理系统而论, 对这样的研究结果的解释是模棱两可的。例如, 行为的结果可能由一般兴奋性水平的改变引起, 这种兴奋性水平会妨碍知觉功能。神经病学对病人的研究也表明, 先前的攻击性决定器质性障碍和暴力之间的关系。

对愤怒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更是似是而非。人们已经清楚地证实, 交感—肾上腺神经系统在调动“斗争—逃避”反应中起作用, 通过下丘脑—边缘系统神经回路对情绪唤醒和表达进行中枢整合。虽然同样的系统引起不同的唤醒状态, 但愤怒似乎是与相关的去甲肾上腺素增加的特定生理模式相联系的, 这种生理模式能够通过简单地想象挑衅而引起。因此, 很多发展理论家假定, 愤怒和攻击之间存在原始性先天联结, 这种先天的联结通过经验而改变。可是, 艾夫里尔(J. Averill, 1982)认为, 情绪表达的生物成分不是决定性要素, 愤怒是一种社会建构性情绪。

第三, 对人类攻击的不可避免性提出批评。卡利(P. Karli, 1981)指出, 攻击的进化发展影响对付不同事件的适应性策略, 而不影响特定的行为后果, 生物学的理论家过分强调了后者。在某种条件下, 遗传程序可能已经产生了对攻击的准备状态, 如愤怒的唤醒, 但是, 这种准备状态是否表现为直接的行动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个体发生而不是种系发生。

攻击的社会可变性和文化可变性也是解释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s)的一个关键问题。性别角色差异明显地取决于对文化刻板观念的学习, 但在所有物种的雄性中都明显存

在更大的攻击性,这种现象常被作为攻击的种系发生起源的证据。有关动物的、人类学的、跨文化的和儿童发展的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也存在例外,甚至在其他动物中也有例外出现。艾夫里尔(J. Averill, 1982)在研究中发现,愤怒的表达和体验中很少有性别差异;在人类社会化的研究中也发现,攻击的性别差异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先天的准备性只能说明部分差异,两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可能与文化中的性别角色传统(sex-role prescription)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特殊行为的不同强化进行的。

研究者尝试根据遗传因素和激素因素来解释攻击中的性别差异和男性的犯罪性暴力,但这种研究没有产生一致的结果(参见第六章)。尽管孪生子研究支持遗传在个体攻击性差异中起促进作用,但是,对于遗传因素究竟是参与特定机制的传递,例如,睾酮的产生,还是参与非特定因素(例如,活动水平,它促进对攻击的学习)的传递,仍然是不清楚的。

二、心理动力学观点

虽然没有一种单一的攻击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可研究者普遍假定有攻击本能或攻击内驱力。这些理论集中于这样几个问题: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攻击内驱力如何得到传递和受到控制;攻击本能怎样受自我和超我的内在机制的调节和制约。

弗洛伊德最初把攻击看作对挫折和痛苦的一种反应。后来,他引进了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 Thanatos)的概念,死亡本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种倾向通过自我保存的力比多本能(libidinal instinct, 性本能)转向外部世界中威胁生命利益(vital interest)的对象。很多精神分析学家拒绝这个观点,但承认攻击是一种本能的观点。本能的表現形式不但包括破坏性行为,而且也包括幻想性攻击、群体间的敌意和自杀;攻击内驱力经历了与力比多一样的发展变化。因此,攻击本能表现在咬(口唇施虐狂)或大便滞留(肛门施虐狂)方面,这些反应可能通过固着成为永久的攻击性格特征。攻击可能通过外在事件而引起,例如,与同胞兄弟竞争。攻击冲动会不断地产生,并且可能在缺乏超我控制的人当中以非理性暴力的形式而突然发生。攻击能量也可能被其他目标取代。在攻击的本能模式中一个关键的假设是“宣泄”(catharsis)概念,即用直接的或替代性表达方式“清除”攻击性紧张。这构成了那种认为压抑愤怒是不健康的流行观点的基础,也构成了那种认为强烈的竞争能消除攻击情感的流行观点的基础。

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详尽阐述了“为自我服务的攻击性”的发展。除了通过替代作用变更方向、通过升华作用改变破坏性目的之外,攻击能量也可能被中和,使自我能够实现自我肯定目标和建设性目标。超我的发展准许攻击能量通过罪恶感而内化,可是,本能性能量仍在产生,需要通过连续不断的升华和中和作用克服力比多与超我或现实要求之间的冲突。在健康的个体中,自我控制减轻了攻击内驱力,阻止了暴力行为的发生。在人格障碍者中,自我的削弱导致了对攻击的压抑,使攻击内驱力在幻想和象征性行动中表达出来,或在冲动性暴力中以“潜意识显露”的方式表达出来。

心理动力学的本能模式与劳伦兹的模式相似。人们已经注意到,本能的水力学概念是有缺点的,而通过宣泄驱散攻击的假设几乎没有得到经验性研究的支持。而且,那种认为非攻击性行为,例如建设性的自我肯定(constructive self-assertion)是经过改造的破坏性能量的表现形式的见解,实质上是把任何活动都理解为攻击性的。

非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批评这个本能概念,认为攻击性有其社会文化起源。弗

罗姆 (E. Fromm, 1973) 区分了两类攻击: 防卫性攻击或善意攻击 (benign aggression); 破坏性攻击或恶意攻击 (malignant aggression)。前者是对威胁作出程序化反应的生物学现象, 后者是在社会经济条件阻止实现人际联系或个人效能的生存需要时产生的特殊的人类现象。恶意攻击并不来源于善意攻击, 并且与工具性攻击也不同, 它被看成是残酷和痛苦, 需要控制他人的虐待性格 (sadistic characters) 可作为恶意攻击的典型。弗罗姆的概念影响了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 DSM-III-R) 中的虐待型人格障碍的内容。然而, 恶意攻击是否能从善意 (愤怒) 攻击或工具性攻击中分离出来,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作为人际控制手段的虐待狂显然包含在强制力的概念中。

三、学习和社会认知观点

学习理论使用操作性模式和模仿模式探讨攻击行为, 把人类的攻击行为看作是根据个人直接的和替代的强化和惩罚的经历而习得和维持的。大多数学习理论家抛弃了本能概念, 保留了内驱力或唤醒这样的力量概念, 但是, 他们对唤醒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

现在, 通过实验研究和观察研究, 学习理论家已经很好地建立起这样的假说, 即攻击行为更有可能发生在成功的攻击经历或对攻击模式的观察之后。帕特森 (G. R. Patterson, 1982) 证明了家庭中的强制行为是如何通过解除讨厌的待遇或得到注意而被增强和维持的。可是, 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攻击行为的强化物, 仍然是不清楚的。根据定义, 工具性攻击是通过获得奖励, 例如, 物质商品、地位或赞扬而受到正强化。另一方面, 愤怒性攻击被认为是通过减轻愤怒或消除讨厌的待遇而受到负强化。然而, 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 愤怒性攻击行为也可能通过伤害受到正强化, 伤害症状 (signs of damage) 是先天固有的强化物。这种假设没有得到明确的实验性支持, 痛苦或伤害的症状更有可能抑制攻击行为。不过, 攻击行为 (如抢劫) 究竟得到了强化物 (钱), 还是消除了讨厌的东西 (贫穷), 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观点。由于惩罚可能被看作反攻击行为 (counteraggression), 所以, 惩罚对攻击行为的效果如何, 仍然是不清楚的。

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是攻击行为的前因以及它与攻击结果之间的中介因素。多拉德 (J. Dollard) 等人 (1939) 引用早期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 建立了挫折—攻击假说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该假说断言, 目标性活动受阻时产生的挫折, 是攻击的关键性前因。挫折刺激个人试图损害挫折来源, 但是如果预期会受到惩罚的话, 就会抑制这种反应, 除非替换成另一个目标。

虽然挫折—攻击假说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影响, 但它还没有得到广泛地承认, 因为挫折激起的反应并不仅仅是攻击, 攻击行为同样可以由侮辱或袭击、对自尊的威胁或痛苦挑起。可是, 贝科威茨 (L. Berkowitz) 长期为这个理论辩护, 认为存在着一些挫折的前因, 他把挑动 (instigation) 看作愤怒的一种反应性驱力状态, 这种愤怒的反应性驱力状态使个人对目标进行伤害, 但习得的线索 (如武器) 对释放攻击反应是必需的。因此, 该理论适用于愤怒性攻击, 而不适用于工具性攻击。尽管惩罚可能抑制工具性攻击, 但它本身就构成挫折, 会增加愤怒性攻击。贝科威茨 (L. Berkowitz, 1989) 在其近期的认知—新联想主义的 (cognitive-neoassociationist) 论述中, 他认为挫折—攻击关系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它代表了厌恶刺激和攻击倾向之间的更普遍的关系。攻击不只是通过身体不适和消极心境而增加, 也不只是通过挫折或侮辱而加强, 他认为消极的感情是愤怒性攻击的基本来源。因

此,令人不快的事件会引起的消极感情,这种消极感情是与记忆、与逃避和攻击有关的表达性运动反应的联想网络(associative networks)相联结的。被这种联结激起的与愤怒有关的思想,会导致攻击行为;这种攻击行为取决于行为者对情境的认知评价。可是,认知评价起次要的作用,而不是起主要的作用。

其他学者对认知中介(cognitive mediation)更为重视,并且用一个非特异唤醒的概念取代了特异性攻击驱力的概念。实验研究证实,愤怒会增加伤害的企图,艾夫里尔(J. Averill, 1982)同样发现,每天的愤怒唤醒会增加伤害目标的想法。他也发现,挫折是愤怒的一种常见的前因。可是,一些研究对伤害的特异性驱力的概念提出异议,这些研究表明,因挫折而产生的紧张既可能通过消除厌恶刺激的非攻击行为而减弱,也可能通过直接的攻击行为而减弱。研究也表明,挫折和惩罚的效果取决于接受者是否把它们理解为正当的。很明显,这种观点包括了关于受挫者意图的正常判断和认知评价。

有关攻击的最具综合性的认知理论,是由班都拉(A. Bandura, 1983)提出来的。强化相依(reinforcing contingencies)提供有关行为结果的信息,可这样的信息最容易通过观察学习获得;通过观察学习,人们发展了在满足其目的的过程中,对有关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的预测。可是,这些结果包括了对自我的结果;人们通过自我奖赏和自我惩罚这样的自我调节过程,使其行为符合个人和社会标准,不过,这些标准可能通过认知歪曲而被推翻或抵销,例如,责备受害人、使被害人非人化。

班都拉抛弃了特异性攻击驱力(specific aggressive drive)的概念,并且把愤怒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的区别看作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所有的攻击都是为了获得所渴望目标的工具性攻击。他提出,厌恶的经验和正面的鼓励都会普遍增加情绪唤醒。而增加的情绪唤醒会加强行为系统中都是最强烈的相关情绪反应。在应付讨厌的经历中,攻击行为仅仅是几种可能的策略之一,这些策略中究竟包含逃避性问题解决方法,还是包含建设性问题解决方法,这取决于个体的技能。在这些术语中,持续性攻击可能不仅由对这种行为的强化而引起,而且也可能由没有学会处理厌恶事件或得到想要的报酬的非攻击方式而引起。

虽然班都拉没有特别论述愤怒,但愤怒是近来社会认知理论家感兴趣的焦点之一。体验频繁而强烈的愤怒的倾向,是一种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损害社会功能和身体健康。尽管全面论述具有攻击驱力的愤怒是有问题的,但是研究已经表明,愤怒有一个独特的心理模式,愤怒唤醒激起个人伤害刺激来源的企图。可是,施加伤害只是减轻愤怒的一种手段,愤怒更基本的功能可能是调节关系。正如艾夫里尔(J. Averill, 1982)所说的那样,“人们是通过使其愤怒的事情而了解自己的。”从每天对愤怒的监测报告中,他发现愤怒是人们经常体验到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主要是在亲密关系中产生的。尽管愤怒常常使人不愉快,但它的交流和表达通常具有建设性的结果。就暴力犯罪仅限于愤怒性攻击而言,攻击性犯罪人可能在愤怒的体验和表达方面都有问题。

对唤醒愤怒的条件仍然是有争议的。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情绪体验的性质取决于对非特异性唤醒状态贴上的认知标签(cognitive label)。与这种观点一致,齐尔曼(D. Zillmann, 1979)发现,当挑动被试产生愤怒时,外部刺激来源(例如,训练、高温或色情文学)导致的进一步唤醒得到错误的归因,并且加强攻击行为。可是,这些结果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获得的,情绪唤醒的来源是模糊不清的,这些刺激源在自然环境中可能是很少发生的。一个与此相反的观点来自拉扎勒斯(R. S. Lazarus, 1991),他一直认为,从认知

方面来看, 情绪唤醒的性质是由评价过程本身决定的, 评价过程是在图式和意识两种水平上进行的。贝克 (A. T. Beck, 1976) 吸收了这一理论, 把特殊的情绪看作是特殊的认知评价的结果。因此, 焦虑是由对危险的评价导致的, 而愤怒则是在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私人领域 (domain) 受到任意侵犯时出现的, 某人的私人领域包括自我概念、价值观念以及个人关系和财产。诺瓦克 (R. W. Novaco) 的观点也与贝克相像, 他把愤怒看作是对人身攻击、言语威胁或侮辱、预期强化物的减少和不公正评价的结果, 像贝克一样, 他详细指明了认知图式的操作和内容中偏见的根源, 这些认知图式中的偏见会引起功能失调性愤怒。

在更一般化的水平上, 归因理论家提出愤怒是由特殊的原因性归因导致的。例如, 弗格森 (T. J. Ferguson) 和鲁尔 (B. H. Rull) 提出 (1983), 愤怒不仅仅简单地通过察觉他人所给的厌恶待遇 (aversive treatment) 的程度而被唤醒, 而且也通过对厌恶事件的评价被唤醒, 这种评价包括厌恶待遇是否是故意的、含有恶意的、可预见到的和无法开脱的几个方面。这样的推论源于个人应当解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因此, 它反映了根据个人的价值观念、权利和自尊心来判断是重要的东西。从这些解释来看, 愤怒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道德维度。

现在, 对愤怒唤醒中认知归因的中介作用几乎不存在什么疑问, 但对认知归因是否起主要原因性作用仍然是有争论的。贝科威茨 (L. Berkowitz, 1990) 提出, 引起情绪唤醒的初级评价 (primary appraisal) 受到对不愉快 (unpleasantness) 的知觉的限制。原因性归因只有在愤怒被联想网络刺激之后才会影响行为。因此, 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即情绪是对事件的个人意义进行评价的结果。可是, 情绪唤醒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互的。先前的情绪状态可能明显地影响愤怒唤醒的阈限, 齐尔曼 (D. Zillmann) 的研究表明, 人们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对其情绪唤醒的来源进行错误归因。

四、社会心理学观点

近期的社会认知观点重视攻击的社会影响, 但把个人因素放在首位。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 攻击只能通过参照社会背景和攻击行为的意义来理解。例如, 费尔森 (R. B. Felson, 1978) 提出, 攻击是印象管理的一种手段, 它恢复个人受到威胁的同一性。其他人强调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广泛影响。下面将用实例概括这方面的三种观点。

特德希 (J. T. Tedeschi, 1983) 强调使用强制力 (coercive power) 的社会原因。他引用交换理论, 强调在社会影响的其他策略不成功时, 强制常常是最后采用的一种手段。强制力在威胁性交流中得到反映, 这种威胁将会在对不遵从行为的惩罚或进行惩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在与奖赏相冲突的情境中, 在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受到威胁时, 或者当个体受到伤害威胁或体验到伤害时, 强制力会变得很突出; 强制力可能受规范标准或个人特征的支配。犯罪活动中使用的强制力通常是受到禁止的, 也是违反规范的, 但强制在通常情况下是防卫性的或报复性的, 并且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相互性规范 (norms of reciprocity) 要求对一个伤害者所进行的伤害行为相应地予以还击。在社会中, 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并且助长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暴力。公平性规范 (norms of equity) 引起相对剥夺和不公平的知觉, 这种知觉可能激起不合法地接近引起不公平感的事物 (参见失范理论)。决定是否使用强制力, 依赖于获得成功与付出代价的价值和可能性, 并且会被保护自我意象或维持权威的需要所增强, 也可能被恐惧所增强。在个体缺乏自尊并感到没有力量影响事件

时,或当人们由于歪曲的时间观念、自我中心或醉酒而错估了代价时,强制也更有可能会发生。这几种使用强制的原因与社会认知理论是一致的,特德希(J. T. Tedeschi)的探讨的差别主要在于,把人际顺从(interpersonal compliance)看作是人际伤害(interpersonal harm)的目的或强化物。

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理论传统中,沃尔夫冈(M. E. Wolfgang)和费拉卡蒂(F. Ferracutti)(1967)提出了暴力亚文化(subculture of violence)理论,这一理论规定了暴力行为的规范。这是男子气态度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态度模式赞同追求刺激、地位、荣誉和男子气,对这些因素的威胁会引起斗争反应。由于在年轻人、男性、有色人种以及较低阶层群体中发生的杀人率最高,所以,有研究者提出,这些群体支持暴力亚文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相冲突的。这种推论带有公认的循环推理的性质。可是,对这种观点进行检验的尝试,没有产生有利的结果。鲍尔—罗克齐(S. Ball-Rokeach, 1973)没有证明暴力男性(不管教育和收入水平)中存在“男子气”价值偏爱模式。厄朗根(H. Erlanger, 1974)在研究中发现,贫穷、年轻的黑人男性更可能打架,但研究结果也没有支持打架的男性应当感到更能被其群体认可的预言。他提出了“男子气亚文化”(subculture of masculinity)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暴力只是很多发泄方法中的一种。虽然这种观点仍然流行,但是暴力亚文化假说仍然没有得到支持。有些人认为它就是支持暴力规范的主流文化本身。

马什(P. Marsh, 1985)采用了更加具有现象学色彩的观点探讨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他调查了社会规则如何控制英国足球迷的攻击行为。马什的调查引用了哈勒(R. Harre)的人种基因社会心理学(ethogenic social psychology),目的在于揭示人们对其行为归因的规则,这些行为是通过行为人对其行动的意图和情绪的描述进行分析获得的。虽然英国足球迷已经因采用暴力形式打击对手的支持者而臭名昭著,但马什的观点表明,极端的暴力是例外,大多数足球“流氓行为”(hooliganism)是以辱骂和身体姿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仪式性暴力。这种足球流氓行为是受相互理解的规则调节的,这种规则规定了敌对姿势和暴力性言语(rhetoric of violence),但群体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双方的身体接触。足球场四周的露天阶梯看台对于城市的工人阶级男性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一种归属感和价值感,而且还为这些人提供了寻求刺激的机会,这种刺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缺乏的。因此,这种仪式化的比赛起到了一种建设性的作用,并且遏制了攻击行为。马什注意到低等脊椎动物中也有类似的行为,因此,这种研究接近于社会生物学。可是,有关仪式化(ritualization)的概念承认群体间竞争中攻击行为的作用;在群体间竞争中,攻击行为的作用也许不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不过,马什的研究指明了暴力的发生可能受共同的概念化图式的控制,这种共同的概念化图式是在恰当的时候加以明确的。

这些理论假定攻击是合理的,在其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来看是正常的,但不能区分工具性攻击和愤怒性攻击。某些研究者认为,这些理论与愤怒性攻击或个人的犯罪性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贝科威茨(L. Berkowitz, 1986)从对暴力犯罪人的访谈中作出如下结论:暴力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大多是具有愤怒性攻击性质的冲动行为;这种行为既不是受社会规范控制的,也不是由投射特殊自我表象的需要激起的。齐尔曼(D. Zillmann, 1979)也提出,攻击行为的认知控制是通过心理唤醒的水平决定的。在或高或低的水平上,认知的中介作用被减到最少,攻击行为可能是冲动性的并且处于直接刺激的控制之下。可

是，尽管带有个人癖性的个人规则影响人的行为，但偏离社会标准的暴力行为（社会标准隐含在“冲动性”的标签内）可能不过是受规则控制的行为。

第五节 攻击行为的前因

由于某种攻击行为倾向的前因（antecedent）可能是远期的，例如，早期童年的经历，所以，倾向和行动的区别对于理解暴力行为是特别重要的。另一方面，某种攻击行为的前因也包括近期因素（proximal factor），例如，近期的生活事件或伤害之前的情境因素。作为一种倾向的攻击的性质将在下一节详细探讨，本节主要探讨攻击行为的社会和其他环境前因，不管参加者是否愿意以那种方式行动。

一、暴力行为的情境前因

已经有一些人尝试确定导致暴力犯罪的事件顺序的规律性。沃尔夫冈（M. E. Wolfgang, 1957）提出，很多杀人是被害人推动（victim-precipitated）的，被害人是杀人过程中首先采用暴力的人。费城1/4的杀人案件属于这种类型；在这样的案件中，被害人在几个方面更像无被害人推动的杀人案件中的犯罪人。沃尔夫冈的被害人推动概念已经扩展至包括其他挑衅性事件。艾米尔（M. Amir, 1971）估计，他调查的强奸案件中的19%是被害人推动的。可是，科蒂斯（E. W. Curtis, 1974）在其调查中发现，强奸案中只有4%是被害人推动的，虽然他在调查中发现了杀人案件中的22%、严重伤害案件中的14%和抢劫案件中的11%有被害人推动的迹象。

一些研究者把被害人推动的概念看作是“责备被害人”，这种观点与把暴力冲突看作是情境性相互作用“（situated transactions）的象征性互动观点相一致；在暴力冲突中参与者进行了“性格竞争”（character contests）。在杀人和伤害案件的报道中对事件后果的分析表明，事件参与者之间的相互报复是一个重要因素。报复可能是试图挽回面子，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报复事件通常是以对手认为受到侮辱而进行的攻击开始的，随后试图影响他人，但是没有对他人产生影响，接着就威胁他人，逐步由言语冲突上升到身体攻击。因此，一种暴力结果更多是由逐步升级的冲突事件导致的，参与者的个人特征和最初目标并不重要。

贝科威茨（L. Berkowitz, 1986）在苏格兰监狱与伤害犯进行访谈后认为，尽管挽回面子可能会激起攻击行为，但攻击行为的增强主要是伤害被害人的冲动性尝试的结果。可是，暴力活动中相互作用的加剧可能会因为暴力行为发生的环境、人际交往的方式和参与者对该情境的处理技能的不同而有差别。

二、新闻媒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由于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人们通常认为，电影和电视中描述的暴力可能增加观众的攻击性。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性证据，但近十年来研究者已经对电视中高频率的暴力事件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美国特别多。

当前一致的意见是，电影中描绘的暴力对观众以后的攻击行为有小而重要的影响。虽

然被描写为有正当理由的暴力对观众有较大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受到同样的影响。厄伦(L. D. Eron)和休斯曼(L. R. Huesmann)提出(1986),8至12岁的儿童特别容易受媒体中描述的暴力行为的影响,但与早期的研究结果相反,女孩所受的影响如果不多于少年,那么也与少年所受的影响是一样的。像低教育成就和不受欢迎等个人特征,也与较强的影响有关;虽然结果不一致,但有一些证据表明,电视暴力对攻击性儿童施加的影响比非攻击性儿童更强。这种影响也依赖于儿童观看电视节目的范围、把电视中的内容看作逼真描述的程度以及儿童与电视中攻击人物认同的程度。

很多研究集中探讨了较轻微的攻击行为在短期内增加的现象,但一些研究已考察了媒体中的暴力对犯罪性暴力的影响。例如,亨尼根(K. M. Hennigan)等人(1982)对美国在1949年至1952年之间的有电视城市和无电视城市的犯罪率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电视的引进并没有增加杀人、严重伤害、盗窃或盗车案件的比率;尽管盗窃案件增加,但他们把这归因于穷人中相对剥夺意识的增加。另一方面,菲利普斯(D. P. Phillips, 1983)声称:“大众媒体的暴力确实激起了现实世界中的攻击行为”,他的根据是,美国拳击冠军争夺赛之后每天杀人率的增加。比赛后的第三天杀人率达到高峰,增至12.5%。由于被害人的种族与拳击赛中输者的种族相反,因此,菲利普斯认为存在着一种示范效果。可是,被害人的变化与第三天发案高峰并不一致,这本身就需要解释,从这些聚集的资料做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似乎是不成熟的。

有一些证据表明,观看电视中的暴力对反社会性攻击有长期的和直接的影响。厄伦(L. D. Eron, 1987)报告,儿童时代观看暴力节目与后来22年中的攻击行为包括犯罪性暴力有显著关系。他提出,电视暴力可能会增强攻击倾向。可是,一项由哈斯(L. Heath)、克卢茨科尼特(C. Kruttschnitt)和沃德(D. Ward)(1986)进行的对暴力犯罪人的回溯研究发现,儿童大量观看电视中暴力节目只有在与父母虐待的经历结合时,才与后来的暴力行为有关。

一些评论者对这种因果关系提出了质疑。弗里德曼(J. L. Freedman, 1984)对这一领域的实验室研究的外部效度提出了疑问,并且认为现场实验没有产生与因果性影响一致的结果。有研究者发现,观看电视中暴力节目的数量与攻击性测量之间的相关大约是0.2,弗里德曼在接受了这种一致证据的同时,仍然认为,这个结果反映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或反映了易于攻击的观众对暴力节目的选择。可是,弗里德里希-科弗(L. Friedrich-Cofer)和休斯顿(A. C. Huston)(1986)指出,当智商、成就、阶级、家族因素和先前的攻击性水平恒定不变时,这种相关是相对不变的;这种从不同渠道取得的证据的幅合度,证明这种原因假设是正确的。不过,这种影响现在被看作是双向的。因此,具有攻击倾向的这些人更可能偏爱和选择观看电视中的暴力节目,然后,(这些暴力节目)又进一步影响其攻击性的水平。

通过观看电视中暴力节目影响攻击性的过程显然是复杂的。一般假定,这种影响依赖于对电视节目中攻击性的解决冲突方法的模仿,但是这种模仿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个人会模仿特定的暴力行为。短期的影响可能涉及唤醒水平的增强,当攻击性唤醒水平占优势时,就会激起攻击性反应。电视中重复播放暴力节目也可能产生脱敏作用,减弱个人对攻击的抑制作用。可是,电视中的暴力节目是在社会环境中制作出来的,与社会中占优势的现实和规范的塑造者的产品是一样的,因此,不能将观看电视中暴力节目

对攻击的影响从其他社会因素对攻击的影响中分离出来。

三、酒精、毒品和暴力

关于酒精和毒品使用的神秘观点已经助长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酒精和毒品是犯罪行为,尤其是暴力犯罪行为的突出原因。可是,研究表明,少年犯罪和毒品使用是引起越轨生活方式的种因素中的一部分,任何联系都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不过,戈尔茨坦(P. J. Goldstein, 1989)从原因角度出发,识别出了暴力行为中可能涉及的3种毒品使用和滥用方式。(1)在**精神药理性暴力**(psychopharmacological violence)中,毒品本身的作用就促进暴力行为。(2)在**经济强迫性暴力**(economically compulsive violence)中,维持毒品使用的需要激起工具性犯罪,例如,抢劫。(3)在**系统性暴力**(systemic violence)中,毒品分配和销售系统产生了需要用暴力解决的冲突,例如,这种冲突在美国禁酒时期很明显,更近的例子是迈阿密的可卡因分配。

精神药理性暴力与酒精密切相关。沃尔夫冈(M. F. Wolfgang, 1958)在对杀人案件的分析中发现,55%的犯罪人和53%的被害人曾经饮酒,很多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酒精也影响其他暴力犯罪。舒普(L. M. Shupe, 1954)分析了882名犯罪后被逮捕的犯罪人尿中的酒精浓度。结果发现,醉酒的犯罪人中,伤害(cutting)犯占88%,谋杀犯占67%,强奸犯占45%。在1988年英国犯罪调查中报告的暴力事件中,犯罪人60%以上与工作无关的犯罪是酒后进行的。在工作事故中,男性伤害犯83%是酒后进行的,女性伤害犯只有16%是在酒后犯罪的。

这种研究结果没有确定一种因果关系。有关没有犯罪的对照组喝酒水平的资料未见报道,大多数研究引用警方的报道或对犯罪人的回忆性解释,因而很难确定其可靠性。由于犯罪人声称醉酒是一种“免于承担责任的越轨行为”(deviance disavowal)的普通形式,所以犯罪人的报告可能是有偏见的。一些研究也指出,很多非暴力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也一直在喝酒,表明喝酒与一般的犯罪行为有关系,或者与逃避侦察的失败有关。而且,攻击不是酒精的最普通的后果。珀纳内(K. Pernanen, 1991)通过与加拿大社区样本进行访谈和在酒吧进行的观察提出,把喝酒的积极影响和“无害的蠢事”混杂一起,是饮酒行为最经常的伴随现象,而危险的行为是罕见的。可是,对证据的比较证实,在酒精和攻击性犯罪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酒精对攻击行为的促进作用也已经在实验室研究中得到证实。

不过,酒精摄取和攻击行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关系,小剂量的乙醇可能增加自动唤醒,而大剂量的乙醇则会使脑皮层无法唤醒,但神经细胞的作用是不稳定的。饮酒对精神运动技能、反应时间和复杂的认知加工等方面的破坏是公认的。可是,对心理的影响不仅因酒的类型和数量而有变化,而且也会随着体格、新陈代谢作用以及习得的酒精耐受力的个别差异而变化。此外,酒精对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人们对酒精和攻击行为之间的联系已经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

格雷厄姆(K. Graham, 1980)确定出四种理论类型,这些理论对酒精本身的作用有不同的描述。第一,酒精是攻击行为的**直接原因**(direct cause)。这种理论认为酒精是攻击行为的直接原因,在“抑制解除”理论中,酒精的作用是明确的;抑制解除理论假定,酒精对大脑抑制攻击行为的机制起作用。这个概念源于酗酒的道德观点,已经得到攻击的本能理

论的支持。可是, 由于缺乏攻击行为的脑神经中枢的证据和酒精对攻击行为的反复不定的效果, 这种观点被逐渐削弱。此外, 如果注意到酒精在很多场合仅仅引起非攻击性的后果, 那么抑制解除假设显然过分简单化的。第二, **间接原因** (indirect cause) 理论。这种理论假定, 酒精对攻击行为的作用是以唤醒和认知方面的变化为中介的。泰勒 (I. Taylor) 和伦纳德 (K. E. Leonard) 提出 (1983), 酒精削弱了注意多种线索和转移注意的能力, 结果醉酒的人产生刺激固着 (stimulus-bound), 难以受到抑制性因素或者预期的未来后果的引导, 从而会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珀纳内 (K. Pernanen, 1991) 也提出, 酒精影响认知, 使知觉范围更窄, 并且使人的行为更多地受情境的影响。第三, 强调**饮酒动机** (motive for drinking) 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 饮酒的动机可能是减轻焦虑或获得力量感, 然后, 这些动机与酒精的其他效果相互作用。例如, 减少情境线索中的含糊不清, 可能会提高控制感, 这种控制感使那些与力量有关的因素更有效, 从而导致高估力量的行动。

第四种理论是把酒精一攻击相关看作是**倾向因素或情境因素**的反映。人格因素可能导致人饮酒和进行攻击行为。例如, 布克休森 (W. Buikhuisen)、范德普拉斯—昆豪夫 (C. Van Der Plas-Korenhoff) 和邦特科 (E. H. M. Bontekoe) (1988) 发现, 那些报告饮酒后变得攻击性强的学生与没有攻击行为的饮酒者的区别在于, 前一类人有更多的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敌意、支配性、冲动性、不一致的养育以及饮酒后皮肤传导力恢复时间增加。关于酒精作用的期待, 由于社会规则体谅饮酒者, 从文化方面准许他们“间歇” (time out), 也可能鼓励醉酒后的越轨行为。最后, 一些饮酒情境本身会更多地诱发攻击行为。例如, 格雷厄姆 (K. Graham) 等人发现 (1980), 在温哥华, 最容易发生攻击行为的酒吧, 是那些缺乏环境吸引力、不友好、使人精疲力尽、气氛紧张以及对可接受行为不加限制的酒吧。

这些理论是相互重叠而不是相互对抗的, 可是, 对有关酒精和攻击的实验研究的一项超级分析表明, 这些理论不完全是同样似是而非的。布什曼 (B. J. Bushman) 和库珀 (H. M. Cooper) (1990) 在将酒精与安慰剂和控制条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酒精对于攻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这说明酒精本身就有促进作用。可是, 安慰剂 (期待酒精但没有得到它) 和抗安慰剂 (不期待酒精但得到了它) 条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表明药理学和心理学因素都不能单独成为攻击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 酒精摄取是否导致攻击行为似乎取决于饮酒者的个人特征、酒精的心理效果、情境中的挑衅和抑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犯罪时急性醉酒的人并不一定是慢性饮酒者, 可与饮酒有关的问题通常出现在罪犯中, 这是众所周知的。流行率估计随酒精依赖的标准、酒精滥用或问题性饮酒的不同而变化, 但几项研究指出, 1/3 以上的罪犯有严重的**饮酒问题**。埃德华兹 (G. Edwards)、亨斯曼 (C. Hensman) 和皮托 (J. Peto) (1971) 在研究中发现, 在他们的样本中, 34% 的长刑犯表现出严重的酒精依赖, 55% 的短刑犯和 86% 被宣判为酗酒的人也显示出中度至重度的酒精依赖。一些近期研究使用了可以与常模资料比较的定量标准。在苏格兰的一个研究报告, 暴力罪犯和非暴力罪犯平均每周消耗 70 单位 (unit, 一单位等于 28 克烈性酒), 而 47% 的罪犯每周喝酒 80 多个单位。麦克默伦 (M. McMurran) 和霍林 (C. R. Hollin) (1989) 在年轻的英国犯人中发现, 这些罪犯每周平均喝酒 58 单位, 其中 43% 达到 50 单位以上。在一项苏格兰社区调查中报告, 18 至 24 岁的男性平均每周喝酒 26 单位, 其中 8% 的人消耗 50 单位以上。

长时间地使血液酒精水平居高不下、会损害信息加工和判断能力,使攻击性互动更有可能发生。在被释放的罪犯中,大量的酒精消费也会阻碍罪犯改造,并且可能助长经济强迫性犯罪。可是,或许只有少数嗜酒者才成为犯罪人,这些人不全是暴力犯罪人。例如,埃德华兹、亨斯曼和皮托发现(1971),轻微犯罪人中的酒精依赖比严重犯罪人更普遍。科伊德(J. Coid, 1982)提出,酗酒或许与暴力行为没有关系,但嗜酒者中的人格障碍使这些人容易饮酒和进行暴力行为。

在非法使用毒品和暴力行为的关系问题上,可以得到的研究资料很少,部分原因是犯罪活动中毒品的作用常常没有揭露出来,部分原因是研究者假定只有少量的犯罪应归咎于毒品使用。证据表明,大麻、鸦片制剂和镇静剂并没有促进攻击行为,实际上有可能抑制了攻击行为。苯丙胺和巴比妥类药物很有可能引起暴力行为,但象使用酒精一样,结果似乎依赖于个人素质和情境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有毒物质产生的妄想状态,会增加冲动性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而得到增强的易激惹(irritability)可能伴随着鸦片制剂和大麻的戒断过程。可是,毒品犯罪仍然属于未被记载的犯罪“暗数”的组成部分。纳克(D. N. Nurco)等人报告(1985),很多麻醉剂成瘾者参与犯罪,但被逮捕的不到1%。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窃贼和以贩养吸者,而不是进行暴力行为的人。有人认为,鸦片成瘾者通常易于从事暴力行为。可是,戈尔茨坦(P. J. Goldstein, 1989)引用近期美国的研究进行分析,他在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中发现,因暴力犯罪被逮捕的1/3至2/3的犯罪人尿液中发现了非法毒品,尤其是可卡因;他估计美国现在杀人案件中有10%可能是使用毒品的结果。这里面有多少是病理学的暴力而不是经济强迫性暴力或系统性暴力,仍然不清楚。

四、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影响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功能的环境变化,可能会被体验为令人不快的或挫折性的变化。因此,环境变化对攻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当与几种理论相一致,已经积累的大量资料表明了人类攻击行为和环境因素(例如,噪音和气候)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已经对月亮影响越轨行为的民间传说进行了测验。利伯(A. Lieber)和谢林(C. Sherin)推测(1972),月亮的引力因素可能影响情绪活动,他们获得了美国两个县杀人率周期性的资料,高峰与满月同时发生,随后是半月。可是,福布斯(G. B. Forbes)和莱伯(G. R. Lebo)(1977)不能确定月亮对因暴力犯罪被逮捕的犯罪人比率的影响。

气温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已有明确的证据。安德森(C. A. Anderson, 1989)对现场研究和实验室研究进行了评述,他发现尽管实验室研究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现场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较热的地区,较热的年度、季节、月份和日子与谋杀、强奸、伤害、骚乱和殴打妻子的比率的上升是一致的。以臭氧水平作为指标,空气污染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也已经发现类似的结果。天气变化的影响可能部分以社会交往和攻击的机会为中介。安德森(1989)提出,这方面的证据与个体水平的影响(例如,消极感情的增加,对情绪唤醒的错误归因)是一致的。米勒(C. W. Mueller, 1983)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自然环境(噪音、高温、空气污染)的变化和人际环境(领域的侵占、个人空间被打扰、过高的人口密度)的变化都构成紧张性刺激,这些变化通过促进优势反应、削弱信息加工或察觉失控,使攻击行为更有可能发生。可是,这样的紧张性刺激没有一致性的影响,这些刺激本身不足以引起攻击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感兴趣的-一种因素是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的维护(空间关系行为)。奥尼尔(E. O'Neal)等人的研究表明(1979),愤怒唤醒增加了偏爱的人际距离。有证据表明,偏爱的人际距离可能是暴力犯罪人的特征。金泽尔(A. F. Kinzel,1970)发现,暴力犯比非暴力犯表现出更大的个人空间,并且宣称这个问题要从养育过种中探讨。他还认为,这反映了同性恋焦虑(homosexual anxiety),这一结果没有得到证实。但几项研究证实了暴力犯罪人更喜欢较大的人际距离。也有研究发现,在守法者中偏爱的人际距离与喜欢争吵、冷漠的人际交往方式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异,包括用某一种犯罪表明暴力倾向的做法,可以解释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的原因。可是,尽管个人空间常常与其他动物中的领域性相等,但它的作用的重要性仍然不清楚。由于金泽尔发现个人空间随重复测量而下降,所以,偏爱的个人空间可能不是暴力犯罪人的一个稳定的特征。因此,它与攻击性倾向的联系可能代表一种对人际威胁的过分敏感,这种人际威胁在陌生人面前变得更明显。

与群体暴力特别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匿名性程度。津巴多(P. G. Zimbardo, 1970)提出,某种条件(例如,匿名性、卷入群体活动)会引起群体成员间的责任扩散,并且伴随着情绪唤醒的变化,产生一种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的状态。这种去个性化状态由多种成分组成,这些成分包括一个人没有作为一个个体的感觉、自我认识削弱、不太关注消极后果,这些都会促进冲动性伤害行为。支持这种现象的试验是很少的,但是,普伦蒂斯-邓恩(S. Prentice-Dunn)和罗杰斯(R. W. Rogers)(1983)发现了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他们发现去个体化的关键特征是个人性自我认识的减弱;由于削弱了个人性自我认识,所以导致个体减少对内在标准的依赖、削弱了认知控制,从而使个人更容易对攻击性线索发生反应。关键的前因是对群体活动中的完全投入(immersion)和其他导致外部注意点的条件。可是,去个体化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概念。例如,班都拉(A. Bandura, 1986)指出,责任扩散可能是通过认知重建和中和性信念而解除抑制的,而不是通过失去控制解除抑制的。

第六节 人格和攻击

攻击行为有时可能是由没有攻击习惯的人进行的。攻击行为和攻击倾向之间的区别被一些研究忽视了,这些研究仅仅参照司法机关最近的定罪来识别“暴力犯罪人”。由于情境因素和个人的暂时状态明显有助于暴力事件,所以参与某个单一的暴力行动并不是个人暴力倾向的可靠指标。可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参与攻击行为,所以这一部分探讨个人的哪些特征有助于攻击倾向。

一、攻击的一致性

一些纵向研究已经证实了攻击特质的时间稳定性。奥尔伍斯(D. Olweus, 1979)对男性攻击行为的稳定性的证据进行了评论,这些证据是通过观察者评定、同伴提名(peer nomination)和直接观察的方式获得的;他确定了12项调查研究,这些研究至少是在两个时间进行评定的,时间间隔的范围是从6个月到21年不等。两个时段评定的平均校正相关是0.79。因此,他认为个人的攻击行为具有牢固的稳定性,不能把它归因于情境的恒常性。在随后的评论中,他发现女性中攻击行为的稳定性水平比男性稍低一些。

随后的研究与奥尔伍斯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休斯曼(L. R. Huesmann, 1984)等人

发现, 8岁时被同伴评定为攻击性的人, 与成年后自己或配偶报告的攻击行为显著相关, 也与22年后的犯罪记录有关。所提出的结构模式估计, 男性攻击性的稳定性系数是0.50, 女性攻击性的稳定性系数为0.35。在剑桥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8至10岁儿童攻击性的评定与青少年和成年期自我报告的攻击行为显著相关。由于这些研究采用不同方法和在不同环境中对攻击行为进行重新评价, 所以它们表明了不同情境之间的一致性和时间一致性。费施巴克(S. Feshbach)和普赖斯(J. Price)(1984)更直接证实了不同情境之间的一致性, 他们对学校学生两年间在家里和在学校的攻击行为进行评定, 获得的相关系数是从0.39到0.59不等。攻击倾向构成了人们早年生活之间差别的相对持久的特征。

犯罪性暴力似乎是这种攻击倾向的一种功能。法林顿(D. P. Farrington, 1989)发现, 在12岁到14岁被老师评定为攻击性严重的学生中, 22.4%的人随后因暴力行为而被定罪; 在被老师评定为攻击性弱的学生中, 只有7.2%的人犯罪。前一种情况可以解释暴力犯罪人中的60%。斯塔廷(H. Stattin)和马格努森(D. Magnusson)(1989), 罗宾斯(L. Robins, 1978)也得到了类似的数据; 他们发现儿童期的打架斗殴可以一致地预测成年期的暴力行为。这些研究都证明, 早年的攻击性与后来的越轨行为普遍有联系。这证明反社会行为“综合征”的概念是正确的, 攻击性是反社会行为“综合征”的一个重要特征。

可是, 这些研究全都有一个很高的虚假肯定率(false positive rate), 虽然成年期表现出暴力行为的大多数人已确定童年期是攻击性的孩子, 但这些攻击性的孩子中只有少数人继续进行严重的攻击行为。其余的大多数人可能继续以不明显的方式进行攻击。这里必须强调, 在这种背景中, 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因此, 作为一种个人特征, 早年的攻击性表现使后来的暴力行为更有可能发生, 但是否因而产生犯罪性暴力要取决于其他的个人和环境因素。

二、攻击行为一致性的来源

攻击行为可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由拉什顿(J. F. Rushton)等人(1986)所做的孪生子研究发现, 自我报告的攻击性有明显的遗传性特征。这与学习理论的分析是一致的, 但它表明儿童可能是攻击学习的积极促成者。例如, 巴斯(A. H. Buss, 1961)提出, 冲动性气质特征、活动水平、情绪反应强度和独立性都会有助于攻击行为的学习, 部分原因是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使与看护人或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不愉快交流得以进行。

当前的观点假定, 持久的攻击性最初起源于家庭中的模仿和强化。纵向研究表明, 攻击性儿童和少年犯罪人的家庭历史的特征是, 父母越轨行为的高发生率、夫妻冲突、父母冷漠和缺乏监督; 暴力性成人经常报告童年期曾有一个目睹暴力行为和经历身体虐待的历史(参见第七章)。横断研究产生了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布希(K. G. Busch)等人发现(1990), 在71个少年杀人犯中, 58%的人有一个犯罪性暴力的家庭成员; 与之相比,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相似的非暴力性少年犯罪人中, 只有20%有这样的情况。这些研究结果与学习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学习理论认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学习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 暴力行为被模仿、重复和强化。这样的家庭更有可能是经济上受剥夺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也有可能处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解组环境中。暴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已经受到质疑, 布朗菲尔德(D. Brownfield, 1986)发现, 自我报告的暴力少年犯罪和官方暴力少年犯罪与下层阶级这个量度有关, 下层阶级是以家庭失业人数和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确定的, 不过, 这

两类少年犯罪与更传统的阶级量度(如父母的职业)之间的联系很微弱。

不过,家庭因素只能解释后来暴力行为中的一小部分变化,费根(J. Fagan)和韦克斯勒(S. Wexler)(1987)在一项未加控制的暴力性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中发现,暴力性少年犯罪人自我报告的暴力行为与家庭中的犯罪和暴力行为有一定关系,但暴力行为与少年犯罪人的同伴友谊相关更显著。布莱斯克(D. M. Blasko)(1989)等人也发现,与性犯罪人和非暴力犯罪人相比,在没有父亲的少年中,暴力性少年犯罪人与其母亲的关系更严格死板和更不受约束,与越轨同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布希(K. G. Busch)等人(1990)在对少年杀人犯的研究中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他们发现,少年杀人犯中有41%的人参加了团伙,而在非暴力性少年犯罪人中只有14%加入团伙组织。后面的研究与埃里奥特(D. S. Elliot)等人(1985)提出的整合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提出,暴力犯罪是有缺陷的家庭联系和在家庭中进行攻击学习的结果,并且与越轨同伴的牢固联系有关。

可是,这种条件的影响并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生活过程中攻击性相互作用方式会永久存在。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提供了近期尝试解释一致性的基础。卡斯皮(A. Caspi)、贝姆(D. J. Bem)和埃尔德(G. H. Elder)(1989)确定了增进一致性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累积连续性(cumulative continuity)。当个人的倾向导致个人选择支持这种倾向的环境的时,就产生了累积连续性。例如,由于不能控制脾气而退学,就可能限制职业选择,这种受挫的职业角色进一步唤起坏脾气行为模式。第二种是相互作用连续性(interactional continuity)。在相互作用连续性中,直接和反复出现的强制性交换短路(coercive exchange short-circuit),阻碍了学习更多的控制性相互作用形式。卡斯皮等人发现,童年时期爱发脾气的儿童,在20年后被评定为更加缺乏控制和更容易发脾气,这表明,教育、职业和婚姻失败的生活过程模式与反复出现的适应不良强制方式是一致的。

相互作用连续性可以用期待证实过程(expectancy confirmation process)来理解。期待是关于未来刺激和反应结果的规则。一旦确定为比较普遍适用的规则,期待就可能不顾情境中的客观偶然事件,成为自我实现预言。例如,一个敌意的人期待其他人也是有敌意的,并且以诱发被期待反应的方式行动。一个相关的概念是脚本(script),脚本是认知图式,这种图式由一系列被预期的事件组成;象其他图式一样,脚本使个人能够快速认同有意义的事件,但以日常相互作用中的歪曲为代价。休斯曼(L. R. Huesmann)和厄伦(L. D. Eron)提出(1984),脚本控制攻击策略,但它们的坚持性和稳定性取决于对最初行为的编码,认知复述(cognitive rehearsal),并且通过与编码相联系的线索而得到恢复。他们提出,当儿童没有预见到不恰当的攻击后果或没有预演可供选择的策略时,编码得到加强。这也许能说明儿童期的攻击与低智力的关系。与此相像,攻击策略也会通过想象预演(fantasy rehearsal)得到加强。与这个结论一致,攻击儿童报告更多的想象攻击,更多的观看暴力电视节目,并且更多的认同电视中的人物。因此,攻击脚本可能通过不断地重复、期待证实和环境选择得到扩展,并且保持在成人的生活中。他们提供了与此等价的对多种情境的选择性评价和不友好利评价的基础,也提供了按照强制行为序列自动产生反应的基础。

不过,通常把不能辨别现在和过去的事件的现象,看作是功能失调性现象,因此,在攻击行为方面表现出的较大一致性,更有可能是适应不良者的特点。例如,劳施(H. L. Raush, 1965)发现,在不友好的前因之后作出不友好的反应方面,攻击性强的少年和正常少年反应是想象的;但攻击性强的儿童更可能在友好的前因下作出不友好的反应。他们不能区别两

种事件,对友好事件的反应就好像对不友好事件的反应一样,认为这些事件具有不利的意义。与此类似,当要求被试描述对挫折情境或挑衅情境的反应时,精神障碍犯罪人比大学生显示出更大的一致性,并且对情境的区分能力要比大学生差。赖特(J. C. Wright)和米歇尔(W. Mischel)(1987)近期的研究也表明,攻击行为中的一致性是适应不良或技能缺陷的一种功能。在问题少年中,在不同情境中对攻击行为的评定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尽管在这些少年具有情境所要求的技能时,这种一致性是中等的,但是,当情境对能力的要求超过少年拥有的能力时,这种一致性就很明显。作者把这些结果解释为“建构能力”(construction competencies)的缺乏,建构能力是用来对付压力情境的,建构能力缺乏会导致不加区别的反应。

三、个别差异和攻击

尽管攻击性(aggressiveness)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倾向,但它的一致性和表达取决于个人的特征,这些个人特征决定什么是令人讨厌的或唤起愤怒的;攻击性的一致性和表达也取决于个人的哪些应付策略在冲突情境中是可用的。一个传统的假设是,暴力行为人缺乏内在控制。因此,心理动力学家和学习理论家认为,在获得限制有害行为的情绪抑制方面,例如,焦虑、内疚、移情性理解、挫折耐受力,存在着个别差异。可是,传统理论讨论的重点在于感情方面,而当前的理论强调认知评价和推论的作用,近期的研究更注意促进攻击行为的因素,如愤怒唤醒,并且更加注意以促进或抑制为中介的认知过程。

卡尼(F. L. Carney, 1978)对暴力犯罪人进行了描述。他认为,暴力犯罪人由于角色扮演缺陷而不能产生信任,由于在抵御痛苦方面的潜意识表露而不能感觉,由于冲动性的表现和缺乏移情而不能想象,由于无法从经验中进行概括而不能学习。这代表了心理动力学的观点,也代表了病态人格的传统概念。攻击行为与病态人格的关系得到黑尔(R. D. Hare)和麦克弗森(L. M. Mcpherson)(1984)的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发现,大多数符合克莱克利标准的罪犯都有严重暴力犯罪的历史,这些人在狱中更有可能是攻击性的。瑟林(R. C. Serin, 1991)也同样发现,在黑尔的精神病态清单上得高分的罪犯,更经常地与暴力犯罪相联系,也与自我报告的攻击性和冲动性相联系。相关研究也表明,攻击性与未社会化的攻击行为或精神病态这种广泛的人格维度相联系,这种维度也包括冲动性和外罚性敌意(extrapunitive hostility)。

进行犯罪性暴力行为的倾向也与体验到愤怒的倾向有关。塞尔比(M. J. Selby, 1984)发现,暴力犯比非暴力犯罪人在愤怒和敌意量表上得分更高;布莱克本(R. Blackburn)和李一埃文斯(J. M. Lee-Evans)(1985)也同样发现,精神病态性犯罪人在挫折和挑衅情境中会有更严重的愤怒和攻击行为。与此相关的也许是自尊(self-esteem)水平。托奇(H. Toch, 1969)对警察和少年犯罪人之间暴力性冲突进行了观察,他在观察中发现,对男性自我意象的威胁、自我意象增进或防卫,都与托奇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的暴力行为有密切的联系。阿姆斯特朗(J. S. Armstrong, 1980)也发现,可以通过低自尊和刻板的男性角色的结合分析,预测男性少年犯罪人的愤怒。可是,有人在研究中发现,与愤怒唤醒有最显著相关的,似乎是不稳定的、动摇不定的自尊,而不是低自尊本身。

特德希(J. T. Tedeschi, 1983)指出,低自尊使一个人易受威胁的影响;但低自尊者由于缺乏得到权利和地位的非强制性技能,所以低自尊的人可能采用强制手段。有一些证据

表明,攻击行为是与社会技能(social skill)缺陷相联系的。例如,柯克纳(E. Kirchner)、肯尼迪(R. Kennedy)和德莱冈(J. Draguns)(1979)在观察研究中发现,在对冲突情境的角色扮演反应中,犯罪人比缺乏非攻击性自我证实技能的守法者更具有攻击性。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攻击性犯罪人都有社会技能缺陷。

智能缺陷(intellectual deficits)也影响暴力行为。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大脑左半球单侧化不明显,可能是具有精神病态特征和暴力行为史的少年犯罪人的显著特征;这可能表明个人缺乏通过内部言语进行控制的能力(参见第六章)。一些研究也指出,在攻击行为与低智力之间有显著联系。例如,休斯曼(L. R. Huesmann)等人发现(1987),攻击行为与智商和过去22年学业成绩之间有一致性的负相关,但他们认为,智力对儿童期的攻击行为产生的影响特别大。可是,研究结果表明,智能与犯罪类型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低智力的精神病态者有冲动性暴力的历史,而智能性精神病态者的犯罪更有可能是施虐性的。

虽然智力可能影响早期的**社会认知发展**(social cognitive development),但是,当前的理论表明,在愤怒唤醒方面的个别差异与期待和判断过程有广泛的联系,这种期待和判断过程往往影响对人际事件的评价。一些近期的研究已经考察了儿童的这些方面,被考察的儿童是在学校表现出攻击性强并遭同学排斥的学生。由于这样的儿童很可能成为少年犯罪人(参见第七章),这种研究对那些可能成为后来的反社会攻击行为的中介的因素进行了一些解释。

有关社会认知过程(process)的研究沿两个方向进行。首先,攻击性少年已经显示出在明确的情境中不能准确地解释同伴意图的倾向,并且在有消极结果的含糊不清的人际情境中,对敌对意图的认识方面有偏向。这反映在对微弱信息的快速反应和对社会线索的选择性注意上,表明对恶意意图认识有偏见性的预期。虽然在几项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现象,但这些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研究者的注意主要集中在与所观察的攻击性的相关方面,而不是注意愤怒的唤醒。可是,道奇(K. A. Dodge)和索姆伯格(D. R. Somberg)(1987)证实,归因偏向在轻微的威胁条件下更明显,这种不严重的威胁可能会引起敌意性期待。其次,研究者关注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已经发现,受排斥—攻击型少年对人际问题情境的解决办法更少,他们也会采取更有攻击性但缺乏效果的解决办法。道奇(1986)用一个系列模型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了综合。他提出,有效的问题解决通过编码、解释、反应搜寻、反应选择和反应发生五个阶段连续进行。攻击性儿童在前四个阶段暴露出缺陷。

研究者对社会认知的**内容**(content)很少注意,但一些近期的研究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考察了信念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佩里(D. G. Perry)、佩里(L. C. Perry)和拉斯马森(P. Rasmussen)发现(1986),青春前期攻击性儿童相对于很少攻击的同伴来说,对其做出攻击反应的能力有更强的自我功效信念(self efficacy belief),并会预测出攻击结果,他们对攻击行为结果的预期方面,强调得到实际的奖赏,减少讨厌的待遇,但得不到同伴的赞扬。斯拉比(R. G. Slaby)和格拉(N. G. Gerra)(1988)重复了这些研究和道奇的研究,并把这类研究扩展至暴力性少年犯罪人。他们对被监禁的少年暴力犯、被学校评定为攻击型或非攻击型的青少年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的内容是解决问题技能和关于攻击的信念。少年暴力犯和攻击型少年表现出问题解决缺陷,例如,解决办法更少,选择更少的信息;他赞同关于攻击结果的更积极的和中立的信念,例如,自尊心提高,使被害人遭受尽可能少的痛苦。男性比女性一致地显示更多的缺陷和攻击信念,他们对人际效果的考虑更有限。

四、人格类型和暴力

研究者强调,单一的暴力行为的发生本身并不能表明攻击倾向,关于暴力犯罪人格相关的因素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可能反映了暴力犯罪人的异质性。因此,一些研究已经尝试区分暴力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类型。

托奇(H. Toch,1969)从与暴力犯罪人的访谈中,识别出两种概括性的人际定向(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这两种人际定向与10种动机类型有关。所有这些类型都有一种倾向是,认为人际关系都受力量运用的控制。**第一种类型**的人易受操作的影响,把暴力作为一种自我保存的策略。在这种类型中,托奇确定了6种定向,包括保护名誉、执行规范、自我意象防卫、自我意象增进、自我防卫和由于缺乏社会技能而用暴力消除压力。**第二种类型**把其他人看作满足其需要的客体,并且有控制地使用暴力。根据暴力行为是否采取欺侮、剥削、自我放纵性强制(self-indulgent coercion)或宣泄性释放的形式,把暴力区分为4类。托奇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类型学的信度,但好像并没有与其他样本进行交叉效度分析。

对攻击行为的一般性抑制是**控制过度性**伤害犯罪人(overcontrolled assaultive offender)概念的核心。梅加吉(E. I. Megargee, 1966)提出,控制不足性犯罪人(undercontrolled offender,这些人可能被鉴定为具有病态人格)的抑制力较弱,他们规律性地作出攻击性反应,只有在刺激(愤怒唤醒)足够强大以至于超过抑制时,才会出现攻击行为。因此,这些人攻击他人的行为应该是很少见的。但是,如果刺激过强的话,他们也会攻击别人,因此,在极端性的伤害或杀人案件中,这样的人很常见。梅加吉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说,他发现,有极端伤害记录的少年被评定为更有控制力和更少攻击性,在人格测验中表现出更大的控制力和更明确的恪守常规性(conventionality),而中等程度的攻击性少年犯罪人和非暴力性少年犯罪人则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况。这一观点在对精神障碍犯罪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严重的伤害比一般伤害显然受到更多的控制、抑制和防卫,这样的犯罪人更不可能有先前的犯罪记录,也不可能被诊断为病态人格。在对56个谋杀犯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中,几乎一半的人显露出这种特征。另外的支持来自兰(R. A. Lang)等人的研究(1987),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谋杀犯与伤害犯不同,谋杀犯以前有犯罪史的人较少,并且在敌意测量和艾森克人格调查表精神质分量表(EPQ, P)测量中的得分较低。与这个理论一致,他们的防卫性也更强,正如艾森克人格调查表的效度量表(EPQ, L)指明的那样,但作者按情境掩饰(situational dissimulation)勉强地解释这一现象。由于效度量表的高分是与遵从行为相联系的(见第五章),所以用倾向进行解释是有根据的。

梅加吉设计了一个控制过度性敌意量表(scale of overcontrolled hostility, OH);莱恩(P. J. Lane)和克林(J. Kling)的研究发现(1979),控制过度性敌意量表可以鉴定具有次数少而强度大的暴力行为历史的男性被告人。他们认为,控制过度性敌意量表的高分反映了僵化、控制过度、对冲突的压抑和不愿承认精神病症状。沃尔特斯(G. D. Walters)和格林(R. L. Greene)也发现(1982),在控制过度性敌意量表上得分高的精神科门诊病人,更有可能被其治疗师描述为有长期而严格的压制、愤怒和敌意。研究已经发现,在控制过度性敌意量表上得分高的谋杀犯,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即角色扮演中缺乏自信,对挑衅性刺激的反应中很少表达出愤怒。可是,一些研究没有支持控制过度性敌意量表的效度。

控制过度假设阐明了为什么暴力犯罪人中经常会发现无攻击性个人(unaggressive individual)的原因,但是这种假设依赖于能量模式。在能量模式中,愤怒唤醒因重复发生的挑衅而积聚起来。当前的理论分析预言,愤怒更有可能通过对不满的认知复述而保持,并使个人更容易对以后的挑衅做出反应。可是,这个模型并没有阐明控制过度的人是否在愤怒唤醒、愤怒表达或缺乏攻击习惯方面有问题。证据表明,存在两种控制过度类型。第一种类型否认愤怒或敌意倾向,并且把它们描述为合群的、无焦虑的和适应的。这种类型接近于梅加吉的最初概念。第二种类型有较强愤怒体验,社会回避和差的自尊等特征,并且更可能表现出社会技能缺陷。两类人好像都已经获得了对付冲突情境的非攻击性的、逃避的方式,但第一类人的问题与在认知水平上的否认和逃避有关。对第二类人来说,好像是愤怒的表达有问题。

可是,两种控制不足的模式也是显而易见的。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71a)根据对从56个精神障碍性谋杀犯中获得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检查表数据的聚类分析,发现了四种不同的人格模式,后来的分析表明,这些也是精神病态性暴力犯罪人中很普遍的主要人格模式。虽然在一个对受审前谋杀犯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检查表研究中产生了稍微不同的类型,但同样的类型在“心理正常”的谋杀犯和男性暴力犯罪人中已经得到确认。这四种类型已被描述为:原发性精神病态者、继发性精神病态者、受控者或顺从者(the controlled or conforming)、受抑制者(the inhibited)(参见第三章)。前面两种类型同样表现出较强的冲动和攻击倾向,并且分别与托奇的操作类型组和自我保存类型组相似。后两种类型代表了上述控制过度的两种形式。已经发现,与控制过度假设相一致,52%的原发性精神病态者,有重复性暴力行为的历史,但在受抑制者组中只有8%的人有重复性暴力行为的历史。

这四种类型代表了精神病态(psychopathy, PY)和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 SW)两个维度上极端性表现的结合。社会退缩似乎使攻击倾向与观察到的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这可能是因为社会退缩与抑制倾向和缺乏自信有关。由于人际交往存在障碍时敌意会得到保持,所以社会退缩也可能有助于敌意。因此,社会退缩性精神病态者的暴力行为是不可预料的,并且更具有冲动性;海布伦(A. B. Heilbrun)和海布伦(M. R. Heilbrun)发现(1985),精神病态、低智力和高度的社会退缩与狱内暴力行为的最高水平有关。

可是,在对未加选择的罪犯进行的生物分类学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些类型。受抑制者类型仅仅在很极端的暴力犯罪人中才是突出的。这些研究中确认的一组特征并不是暴力行为所独有的,但它们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人格异常的模式,这些异常的人格模式普遍有助于社会越轨行为。必须重复的是,人格变量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敌意态度或低自尊可能使人们更容易对觉察到恶毒意图产生偏见;而攻击倾向和有限的认知以及社会技能,会使人们更可能试图通过强制性手段解决冲突。可是,尽管某种人格倾向会增加犯罪性暴力的可能性,但是,这些特点不会必然地导致暴力行为。虽然攻击性人格者很容易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但是,大多数攻击人格并不会表现为明目张胆的反社会行为。

第七节 暴力循环

肯普(C. H. Kempe, 1962)等人引入“受虐儿童”(battered child)的概念,将受虐儿童

描述为“承受严重身体虐待的年幼儿童的一种临床状况，这种身体虐待一般来自父母或者养父母。”这种集中于故意伤害的研究也伴随着后来“受虐妻子”(battered wife)的概念。可是，研究者的注意后来转向虐待的肉体方面和虐待者的特征，转向对被害人的心理后果。由于作为受害人的儿童和妇女本人可能会成为虐待者，所以现在的探讨考察儿童虐待和妻子虐待的原因和结果。性虐待在第十一章进行考察。

一、儿童虐待

虽然对儿童的极端暴力行为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但是，许多儿童身体虐待事件仅仅造成较小的伤害，并且是发生在不成功的惩戒期间的冲动性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是不愉快的亲子交流逐渐发展的结果。例如，对儿童不一致的惩罚将会导致儿童更加抵抗对越轨行为的压制，削弱父母通过积极强化控制行为的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惩戒行为会包含强度不断增加的惩罚手段，并且会使暴力行为逐步增强的可能性变得增大。因此，虐待中可能的原因因素包括父母和儿童的特征，亲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使不愉快的相互作用加剧的不良家庭环境，支持惩罚性惩戒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儿童的特征可能会增加迫使父母进行虐待的危险，或者通过引起父母嫌弃而增加虐待的危险；无经验母亲可能被其孩子“训练”得使用不愉快惩戒方法。由弗里德里克(W. Friedrich)和鲍里斯金(J. Boriskin)(1976)所做的研究指出，早熟、智力落后、身体残疾和气质障碍在受虐儿童中有较高的发生率；虐待儿童的父母往往把他们的孩子看成是不同的人。因此，亲子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促进了虐待；不过，这些因素中的一些因素，例如智力落后，既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

尽管很多身体虐待或许是由男性进行的，女性进行的虐待被疏忽，但是，研究者的注意还是特别集中在进行虐待的母亲身上。智力低下的父母容易虐待儿童，但更可能出现在疏忽照顾儿童的案例中。人们一致发现的结果是，只有5%~10%的虐待儿童的父母表现出严重的心理障碍。可是，在早期的研究中，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turbance)被认为是大多数虐待者的特征，斯平奈特(J. Spinetta)和里格勒(D. Rigler)证实(1972)，临床医师普遍把虐待归因于攻击性冲动控制方面的缺陷。这是虐待者儿童期情绪剥夺的结果，儿童期的情绪剥夺产生受挫性依赖需要(frustrated dependency need)、没有移情能力和对儿童养育要求的误解。在产生紧张时，这些母亲期待儿童满足其情绪的需要，当儿童不能满足其情绪需要时，这些母亲就把攻击投射到儿童身上。因此，虐待父母(abusing parents)显示出异常的态度、期待和不恰当的儿童养育技术。

尽管越来越多地用技能缺陷来看待异常的父母倾向(deviant parent disposition)，但是，一些后续研究支持异常父母倾向的概念。虐待儿童的父母更有可能自己经历过虐待，并且在自我控制和恰当表达愤怒方面有缺陷。例如，罗尔贝克(C. A. Rohrbeck)和特温迪曼(C. T. Twentyman)发现(1986)，虐待母亲比疏忽儿童和没有虐待儿童的母亲在认知和运动测验中表现得更冲动。虐待父母也可能是抑郁的，显示出歪曲的期待，把儿童的不良行为看成是故意干扰。而且，研究已经得到的一致的证据表明，虐待儿童的父母缺少养育儿童的技能、采用无效果的惩戒形式、亲子间消极的相互作用多于积极的相互作用。这些缺陷是与对来自儿童的线索和信号不敏感、差的监督、不良的家庭外社会关系相联系的，这些缺陷表现出更加一般化的社会无能，这些社会无能是以强制性的人际方式表现出来的。

伯吉斯(R. L. Burgess)和扬布雷德(L. M. Youngblade)提出(1988),这种方式是从父母早年生活中对攻击行为的模仿和强化中产生的,虐待行为的世代相传起着关键的作用。可是,一些虐待行为可能是紧张产生的唤醒的结果,而不是学习本身的结果。

虽然近期研究的证据继续涉及虐待行为中父母的特征,但是还没有一个有特色的人格特征描述。虐待者不是同质的,而且,儿童虐待有多种决定因素。自我报告式研究支持虐待与贫穷和失业相关的观点;虐待家庭常常缺乏外部社会支持,很少与当地社区有联系。吉利斯(R. Gelles,1973)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应激源(stressor),这些应激源与父母的特征、婚姻紧张、儿童引起的紧张相互作用,从而导致虐待。文化的因素也是有关的。帕克(R. D. Parke,1977)注意到,家庭暴力的水平与社会中的暴力水平普遍有关。他提出,经常受到惩罚性惩戒,就会把这样的行为看成是正常的行为,父母在文化、社区和家庭的交互影响下对儿童进行虐待。

心理学对儿童虐待的研究,吸收了心理动力学和社会学习理论的模式;这些探讨也试图考察虐待对被害人的影响。马丁(H. Martin)和罗德海弗(M. Rodeheffer)注意到(1976),消极的心理影响可能是由身体虐待(如脑损伤)和亲子关系中继续存在的障碍引起的。他们提出,更重要的影响是人际矛盾情绪,对他人行为的过分敏感,混乱的自我概念和超我发展,在言语、语言和运动发展方面的延迟。这些是共同的研究结果,还没有确定一种单一的心理问题模型。已经发现,受虐儿童在智力测验中的表现较差,在移情关注和社会认知发展方面有缺陷,抑郁,在与同伴和家庭的相互作用中有困难。可是,虐待对被害人的影响因虐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以及发生的年龄而变化。而且,不是所有受虐儿童都遭受持久的有害影响。一个减轻影响的因素好像是儿童的归因分析:他们是把虐待归因于父母亲的恶意行为,还是归因于应激。消极的影响也可能通过与另一成人的支持性关系得到改善。

研究一致发现,受虐儿童用攻击性手段对待同伴。由于虐待父母经常报告曾经受到虐待的历史,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种“暴力循环”(cycle of violence)。在暴力循环中,受虐儿童以后将对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实施攻击行为。可是,很多虐待者没有受虐待的历史,只有大约30%的受虐儿童本人可能成为虐待者。韦德姆(C. S. Widom,1989a)细察儿童虐待与后来的犯罪性暴力行为的关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大多数受虐儿童没有继续成为暴力犯罪人。她自己的前瞻性研究(prospective study)发现,受虐待的男性中有19%后来犯暴力犯罪,与之比较的对照组有14%后来犯暴力犯罪。她在女性案例中没有发现有意义的结果,在性虐待案例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结果。因此,对“暴力循环”假说只存在中等程度的支持,很多中介因素决定受虐儿童是否成为虐待者或暴力性少年犯罪人(参见第七章)

虐待行为的世代相传现象与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其心理中介因素仍然不清楚。儿童虐待既有“内化”的结果,例如,抑郁症、低自尊,也有采用攻击行为的形式“外化”的影响;用依恋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更适当。另一种可能性是受虐儿童的攻击行为,可能通过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hronic post-disorder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而被增强。最有可能对受虐儿童心理造成心理伤害的环境成分仍是不确定的。假定大多数影响是由看护人(caretaker)的虐待造成的,看护人是儿童依赖和看作榜样的人;其他损害儿童发展的重要来源包括亲眼目睹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以及把家庭看成是虐待家庭的社会结果。

二、妻子虐待

由丈夫或同居者对妇女的身体虐待常常与儿童虐待同时发生,大多数受虐妇女也遭受婚内强奸(marital rape)。对受虐妇女的访谈表明,这种虐待通常发生在婚姻或同居关系中的强制不断增加的背景上,虐待行为会在几分钟内加剧,从言语争辩发展到身体攻击。争辩主要集中在占有欲、忌妒、家务劳动、金钱等方面,大多数妻子虐待行为发生在周末晚上10点和凌晨两点之间。这些行为绝大多数在家里发生,常常当着孩子或亲戚的面进行,最经常发生的攻击行为是打得鼻青脸肿,拳打脚踢,并且有可能重复进行。最初,暴力行为之后可能感到后悔并进行和解,但随着暴力行为的反复进行,这种现象就会减少。

尽管妻子虐待的性质是令人讨厌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错综复杂的,或许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的、道德的和跨学科的问题。男女平等主义者很注意妻子虐待问题,一些人对“责备被害人”这种个体水平的解释提出了挑战,而强调有关两性间的性别角色和不平等权力的文化传统。一些社会学家采取了相似的态度。例如,普泰希克(J. Placek, 1988)认为,由于妻子虐待意味着“暴力行为是在可选择的范围之外”,所以应当在虐待者的心理变态方面寻找“引起烦恼的”原因。多巴士(R. E. Dobash)和多巴上(R. P. Dobash)(1984)也同样反对被害人促成暴力行为的观点,并且认为,妻子虐待“深深地嵌入男性攻击者一直存在的意图中”,并通过家长式统治的文化背景而成形。不管这种理性选择观点上的优点是什么,这种争论用道德谴责性归因代替解释。文化因素没有解释个体之间虐待行为的差别(variation),像儿童虐待一样,有必要在社会和个体水平上考虑多种决定因素。

到目前为止,有关妻子虐待的心理学研究是有限的,很多可得资料来自受虐妇女本身。不过,一致的证据表明,虐待者在很多方面是不正常的。临床调查和控制性研究都表明,大多数虐待者在童年期都体验过或亲眼目睹过父母的暴力行为,并且也可能有酗酒问题。例如,菲奇(F. S. Fitch)和帕潘托尼罗(A. Papantonio)发现(1983),他们研究的样本中,71%的人目睹过父母的暴力行为,59%的人曾经酗酒。可是,尽管他们发现在其样本中的失业率高干平均水平,但是没有普遍发现虐待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很多虐待者来自高收入群体。虐待者也更有可能有犯罪记录,更普遍地表现出暴力行为。这些观察结果与“暴力循环”假说是一致的,并且与虐待是通过社会学习传递的角色示范行为的观点一致。他们也指出了强制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和外化的问题解决方式。例如,乌尔布里奇(P. Ulbrich)和休伯(J. Huber)发现(1981),在美国成年人的全国样本中,曾经目睹父母暴力行为的男人,更多地承认把打妻子作为一种解决家庭内部冲突的方式。可是,目睹父母暴力行为好像既产生“内化”的问题,又产生外化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虐待者都表现这样的暴力行为。因此,配偶虐待表明,人们学习了攻击性的冲突解决方式。配偶虐待也似乎反映了对更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关系的不正确期待。

一些观察者指出,虐待者对女性角色有牢固的刻板印象,这可能是由其父母传递的。罗森鲍姆(A. Rosenbaum)和奥利里(K. D. O'Leary)发现(1981),虐待者对妇女的态度比没有虐待妻子的丈夫更传统,并且比他们的妻子更保守。与此不同,约翰斯通(M. E. Johnston, 1988)发现,虐待者和非虐待者对妇女的态度没有差异。其他可能的认知歪曲包括,认为女性会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不现实的亲密期待。达顿(D. G. Dutton)和布朗宁(J. J. Browning)提出(1988),虐待者有一种夸大的权力需要,这种需要与对亲密的恐惧相结合,

因此,他们关系中亲密程度的变化被看作是对其控制的威胁,这种威胁就会诱发愤怒。在观看描写男女发生冲突、最后女性抛弃男性的录像带时,有身体虐待行为的男性的反应比对照组强烈,这一发现支持上述观点。

更进一步的假设是,施虐男性的自尊低,他们的暴力行为是对能力不足感的补偿,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男子气。这种观点得到约翰斯通(1988)的支持,他发现,虐待者的低自尊与儿童时期受虐待的经历显著相关。可是,马戈林(G. Margolin, 1988)发现,在志愿者样本中,被试的、与妻子虐待有关的自我概念没有变化,因此,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虐待者不正常的心理特点对婚内暴力有明显的作用,但虐待的中介机制仍然不清楚。虐待者似乎不可能是同质的。

受虐妇女本身可能对虐待关系的发展有影响。这已经通过观察研究得到证实,尽管女性被害人常常在童年期受到虐待,但是,当童年期虐待是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时,重复被害(revictimisation)似乎更有可能发生。成年期的重复被害也许是以被害期待和被被害人的从属关系为中介的;被害人对暴力行为的无助、顺从的反应,会强化虐待者的攻击行为。或者,如果被害人拒绝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也会激起一些男人的愤怒。可是,证据大部分是仅凭印象得来的。例如,汉克斯(S. E. Hanks)和罗森鲍姆(C. D. Rosenbaum)(1977)在施虐男性的配偶中,区别了三种类型的家庭背景,其中两种类型与暴力行为特别有关。他们提出,如果受虐妇女追求与其母亲相似的关系,就会引发暴力行为;但是,他们没有检验这种假设。

尽管有关妻子虐待对被害人的心理影响的描述不如儿童虐待的相关描述好,但这样的描述还是很多的。沃克(L. E. Walker, 1988)指出,受虐妇女由于童年期的被害,经常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他们表现出认知和情感失调,其特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类似。她也发现,这些妇女很容易受到攻击行为和犯罪行为的侵害。受虐妇女在与虐待妻子者生活在一起时,可能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被监禁的妇女中50%到80%的人报告被其配偶虐待过。她们的犯罪行为不但包括财产犯罪和毒品犯罪,而且包括儿童虐待和杀人,这些犯罪最有可能在暴力配偶的胁迫下发生。

第十章 犯罪与精神障碍

第一节 引言

对精神障碍 (mental disorder) 和犯罪关系方面的兴趣, 就像科学研究关心的事情一样, 反映了刑事司法系统和精神卫生系统之间变化着的相互作用。由于同样的社会过程影响对这些术语的“解释”, 所以, 这种关系确实不只是两组独特的变量之间的客观关系。社会学家把精神病学和法律看作是控制社会性越轨者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系统, 而一些精神病学家则坚持认为犯罪是一种疾病。尽管当前很少有人抱这种态度, 但孟席斯(R. J. Menzies)和韦伯斯特(C. D. Webster)(1989)注意到,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 DSM-III)扩展了精神障碍的定义, 精神障碍包括了更多的反社会性越轨行为 (antisocial deviance), 在儿童的障碍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病例中更为突出。可是, 对犯罪的“精神病学化”(psychiatrisation)的考虑已经与对精神障碍的“犯罪化”(criminalisation)的考虑一起发生, 这反映在这样的主张上: 让精神病人非住院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已经导致刑事司法系统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提起诉讼。因此, 这个领域中的科学问题不能脱离社会政策和专业人员的权力。

“精神疾病”或“心理健康”的概念仍然不能准确地定义, 很多犯罪人显然存在精神病性障碍(psychiatric disorder)范围之外的个人问题和心理能力丧失。可是, 本章的重点是那些被精神病学学术语定义为精神障碍的心理异常 (psychological abnormality)。应当注意, 精神障碍是目前精神病学中喜欢使用的通用术语(美国精神病学会, 1987), 精神疾病 (mental illness) 倾向于表示更严重的障碍 (disorder), 但这些术语在下面的讨论中将会交替使用。

第二节 精神障碍和医学模型

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中越轨行为理论的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起, 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型”(medical model)就受到来自精神病学内部和外部各方的挑战; 现在, 尽管其他的观点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内得到反映, 但是, 这些观点不能对主要的精神病性障碍产生足够的影响, 无法取代“疾病”这个概念。因此, “疾病”的概念仍然是主要的范式, 很多关键性问题还没有解决。保留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这两个单独的术语, 表现了人们对这样的主张仍然有怀疑, 即“精神疾病是像任何疾病一样的-一种疾病”, 这是医学模型的核心。这些问题对精神障碍和法律这一领域特别有影响, 因此, 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考察。

一、对医学模型的评论

精神疾病的“症状”是行为和情绪体验的变态(abnormality)¹，但没有单独的标准来定义变态，这个单独的标准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如果一个行为在统计学上是罕见的或异常的，在社会方面不适当或不受欢迎，主观上感到痛苦，偏离最佳的社会或心理功能，或没有满足某些“健康”的理想，那么，这种行为可能被标定为变态的。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都是有问题的，几个标准共同使用将会包括很多普遍认定为精神障碍的现象，没有一种联合体能包含所有的形式。这在DSM-III(1987)中得到确认，DSM-III表明，常态(normality)与变态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可以按照烦恼或无能的标准，把精神障碍的概念定义为行为综合征或心理综合征。不过，“症状”和“综合征”的概念明显保留了疾病的医学含意。

普赖斯(R. H. Price, 1978)科学地区分了“模型”(model)和“隐喻”(metaphor)。模型是一种指导研究的类比(analogy)，研究者尝试通过把不熟悉的事物比作似乎有一些熟悉的事件或者过程来理解它们。因此，医学模型就是把变态行为理解为与身体疾病(physical illness or disease)相类似的一种尝试。不过，尽管某种模型是暂时性的，但是，普赖斯提出，有关心理变态的不同观点接近于隐喻，这些观点可能从类比开始，逐渐按照所使用的文字转变最初的概念，使其变成大家公认的概念。

尽管人们经常批评医学模型，但是人们对什么是医学模型还没有一致的意见；评论文章经常将科学解释与有关专业人员权力的争论混在一起。克雷佩林对精神障碍的分类，包括了一定数量的疾病种类(disease entity)，每种疾病都具有独特的原因、心理形式、结果和大脑病变。正是这个模型，被萨斯(T. S. Szasz, 1960)和其他人攻击为“虚构的理论”。问题是复杂的，批评家本身的意见也不是一致的。例如，萨斯反对根据某种实证主义观点提出疾病概念的决定论，其他人支持另外的决定论模型的主张。不过，一种基本的反对理由是“心理”怎么可能“生病”的问题。如果疾病是一个躯体过程，那么，只能通过类比来理解“心理”可能生病的问题；当没有证实存在医学模型所说的脑部疾病时，精神“疾病”就只能是一种虚构。医学模型也把患病者(sufferer)看作一个产生了问题的病人(patient)，而不把他们看作一个有目的的行为者(purposeful agent)。此外，医学模型个人“内部”查找障碍的原因。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批评者并没有注意区分传统医学模型的“内部”因素，而是相当注意躯体原因而不是心理的原因。

然后，这类评论假定，医学模型依赖疾病种类的概念。可是，把疾病看成是身体异常的观点，似乎产生了几方面的问题，这种观点在医学中缺乏一种公认的意义。由于自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疾病是器官损害”(disease as lesion)的观点，所以，这种观点假定疾病总是与机体的结构损害或病变有关，并且与健康有质的区别。因此，一种疾病就是身体部位的特殊改变，这种改变引起了独特的症状模式。所以，就把不知道身体原因的一些现象排除在疾病范围之外，这就是把不的病因而现象描述为“障碍”的原因。由于认识到很多疾病没有单一的病因，所以，器官损害的概念已经逐渐削弱。

因此，研究者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他们试图重新阐述疾病概念，在疾病概念中不仅包括已知的躯体障碍，而且也包括精神障碍。例如，奥苏伯尔(D. P. Ausubel, 1961)提出，

1. Abnormality一词又译为“异常”。——校注

疾病是明显偏离了结构完善和功能完善的正常标准的异常,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和行为的异常。可是,这是一个规范性定义,这个定义扩大了疾病的范围,超过了目前不确定的界线。恩格尔(G. L. Engel, 1977)提出了一个更保守的概念,认为疾病包含生理心理社会方面的功能活动;生物化学的缺陷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不是充分的条件。尽管这些争论扩大了疾病概念,但是,肯德尔(R. E. Kendell, 1975)提出,将疾病概念局限于统计学的异常,统计学的异常根据死亡率的增加、生育力的减弱来确定“生物学缺陷”(biological disadvantage)。按照这些标准,可以把精神病、某些性变态、药物依赖当做疾病,也可以把一些神经症和人格障碍也当做疾病。可是,这把一些常见情况(例如牙齿腐蚀)排除在疾病之外,也把一些具有免疫效果的障碍排除在疾病之外。

布尔斯(C. Boorse, 1975, 1976)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疾病是通过功能异常而不是结构异常来定义的,对精神疾病的类比是合乎逻辑的。他区分了两种疾病:disease和illness²:把疾病(disease)看成是自然功能的一种紊乱(interference),这种紊乱既可以出现在身体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心理过程中;而把疾病(illness)看成是使人失去行为能力的疾病(disease)的一种严重形式。在这种功能性定义的探讨中,什么是不健康必须由经验来决定,并且与引起个体追求目标的事物有关,个体追求目标是其自然生物学安排的一部分(如生存和繁殖)。在接受唯物主义心理观,认为精神疾病最终是一种身体状态的同时,布尔斯认为,精神疾病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大脑的生理疾病。精神疾病定义的特征是:从原因方面来看,心理事件(信念、情感、经验)损害了自然的心理功能。所以,精神疾病不是身体疾病的必然结果。

这种功能性概念对精神疾病类比进行辩护,这种辩护避免了还原论。它也貌似有理地反击了像比恩(P. Bean, 1983)这样的批评家的主张,比恩提出,精神病学(包括临床心理学)只是受社会价值观念控制的规范性学科,而不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可是,韦克菲尔德(J. C. Wakefield, 1992)认为,由于流行的文化标准,疾病被局限在对人有损害的条件范围内,所以,疾病或障碍必须包括价值观念。例如,他注意到,白化病、心脏位置逆转和熔化的脚趾没有被考虑为障碍,尽管它们是自然功能衰竭的结果。他提出,精神障碍是有害的机能障碍(harmful dysfunction),即使个人丧失某些社会上看重的利益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某些心理机制不能发挥其自然功能引起的。

精神病学中仍然坚持疾病的器官损害模型,正如早先通过生物医学对精神障碍的性质和治疗的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而显示出来的结果一样。很多精神病学家认为,人格障碍在其研究范围之外,这种观点也依靠某些精神障碍是躯体疾病的信念。

前面的讨论集中在疾病类比的功用方面,把疾病类比看成是对心理异常进行的原因性解释。其他的评论集中于疾病涉及的医学分界线。在这里,人们有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即把异常行为作为“一个医学的摹本”(facsimile of medicine)来对待,并对医学能否作为精神障碍干预方面的主宰者的适合性提出了挑战。因此,它与专业人员的权力和监护机构的控制问题有关。一个方面是心理卫生行业内部的竞争,尤其是在美国,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健康保健市场中的竞争。医学模型提出的问题显然比蓬勃向上和已经建立的职业

2. 在中文翻译中,把disease和illness都翻译为“疾病”,一般不区分它们之间在含义上的细微差别。——校注

之间的争论更广泛,不过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争论的影响,因为任何对精神疾病概念地位的让步都涉及这个行业的既得利益。

因此,有关医学模型的争论继续激化,悬而未决,部分原因是这个模型已经做了一些删除,部分原因是实践中它仍然保持一些效用,还有一些原因是没有人证明单一的干预模型在精神障碍的所有范围内能独立生存。现在,拥护者已经认识到,非医学干预适合某些形式的精神障碍,大部分反对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即躯体治疗可能对精神病是必需的,情绪障碍也要采用躯体治疗。正如戈伦斯坦(E. E. Gorenstein, 1984)指出的那样,继续争论的来源不在于抽象的“心理疾病”的地位方面,在这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同认识;争论的来源主要来自批准医生照管被判断为精神有障碍的人的道德、法律和专业的后果。

二、犯罪行为和医学模型

犯罪人是“有病的”这个流行的观点暗示了一种疾病类比;通常认为,医学模型已经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是普遍的。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所有的或者大多数犯罪人是有精神疾病的,而且在把医学模型用于犯罪时,对医学模型的批评已经有点扩散和扰乱了目标。

由于犯罪行为暗含着一些症状,这些症状潜伏在需要治疗来治愈的精神病理学里面,所以,心理学家使自己远离医学模型是正常的。具有这种背景的医生是“心理动力学”的代表,可是,矫正少年犯罪人的异常态度或认知缺陷似乎与同样意味着这样的观点,即异常行为是“潜在的”问题的症状。而且,对反社会行为的大多数心理学干预无疑与对传染病的医学治疗相类似,因为人们期望暂时使用“治疗”会导致永久性的“治愈”。

对于社会学的批评家来说,主要的目标是个人主义。他们反对那种认为犯因性因素可能存在于个人内部,从而对社会标定引起越轨行为的现象视而不见的理论。麦克纳马拉(E. J. MacNamara, 1977)走得更远,认为医学模型是与主张自由道义的作用和个人责任的古典学说相对抗的。因此,这种反对意见针对的是大多数心理学的学说,而不只是精神病学的概念。

在干预的水平上,目标是个别化治疗,这种个别化治疗来自这样的假设,即犯罪是应当予以矫正的个人缺陷的产物。这种假设是对矫正(rehabilitation)的广泛攻击的一部分;由于矫正包括心理的、教育的、职业的、福利方面的干预,也包括精神病的治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模型”的概念又像一个杂烩。艾伦(F. A. Allen, 1959)指出,后来的很多争论都将表明,矫正是一种已经被贬低的人类理想。矫正机构不但变成了压制性的、不能提供这种理想所希望的治疗的机构,而且矫正已经被用作一种更严厉法律惩罚的借口,尤其是在做出不定期刑判决的情况下,矫正仅仅起剥夺能力的作用,而不能起矫正的作用。此外,矫正的目标不但赋予司法系统和假释委员会以自由裁量权,而且也给予精神病学家和缓刑官员以自由裁量权,这些人经常滥用自由裁量权剥夺他人的自由。因此,专家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能力水平,已经离开了专业领域进入法律和道德评判的领域。在最近一些年,这种观点已经很普遍,不但社会科学家和律师持这样的观点,而且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本身也持这样的观点。这些问题引起很多精神病学和法律关系方面的持续不断的争论。

韦斯特(D. J. West, 1980)已经对医学模型这个宽泛的概念进行辩护,辩护的方法是重新把医学模型描述为**临床犯罪学**(clinical criminology)。他认为,很多犯罪人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未必是他们犯罪的原因,这些心理问题也超出了精神疾病的界线。因此,有

必要由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对失调或异常的心理状态进行个别化治疗,这应当是矫正的一部分。可是,金德鲁(P. Gendreau, 1985)把临床犯罪学看作对矫正理想的一种无力的再次确认,因为它以牺牲影响治疗计划的结果的系统因素为代价,过分强调个人障碍。

第三节 法律与精神障碍

在个人的生活中,国家干预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有理的,其根据是警察权力原则和“政府监护”(parens patriae)原则³,前一原则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后一原则是对不能照管自己的人提供照料和保护(参见第一章)。“政府监护”原则构成对精神障碍者的民事拘押(civil commitment)进行立法的基础,心理健康法律也要处理被指控犯罪的精神障碍者的刑事拘押(criminal commitment),这种人可能被移交给特别的精神卫生机构。可是,公平原则在心理健康立法中是不大可能清楚地区分的,不论最初的人道主义的意图是什么,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庇护所(asylum)已成为强调公共保护而不是医疗护理的监禁机构。

这种将公共保护和个人护理的权力模糊不清的现象,在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管理中特别明显。在那里,对其他人的保护成为关押的主要标准,精神科医生被迫损害传统的助人者和病人代理人的医务人员角色,而变成了警察和对手。由于精神病治疗中的改变和传统精神病院的关闭,因此,法庭对精神障碍犯罪人做出的处理和这些机构,是过去30年间律师和心理健康专家一直关心的问题。

一、精神障碍犯罪人

法庭一直在设法区分精神健全(sane)与精神错乱(insane),但应当注意的是,精神错乱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没有正式的精神病学的意义。确定精神障碍的法律标准随着社会和法律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例如,不同的测验被用在与立遗嘱或签合同、确定对犯罪的责任、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有关的事务中。按刑事司法系统的观点,有关精神障碍的证据对法律行为的影响表现在五个关键方面。第一,很多国家规定,警察和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特那些可能有精神障碍的扰乱治安者或犯罪嫌疑人送到医院,而不进行起诉。第二,在审判时,可能发现被告无行为能力或“无能力辩护”(unfit to plead),没有判决记录就被扣押在精神病院。第三,精神错乱可能是一种辩护的理由;如果辩护成功,就会导致“因精神错乱而无罪”的“特别裁决”。第四,如果发现被告可能有罪,但精神上有障碍的证据时,可以减轻判决的严厉程度,使法院准予安排“治疗”而不是进行“惩罚”。第五,已被判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出现精神障碍时,可以被移送至精神卫生系统。与这些规定有关的法律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有所不同。

因此,这些被正式称为**精神障碍犯罪人**(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的人,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这些精神有障碍的人完全丧失了辩护能力,在处遇上应当与其他犯罪人确有不同。很多其他的犯罪人可能有心理问题,但是划分的界线有点任意性;精神障碍犯罪人只由一小部分人组成,这些人一方面可能是接受精神病治疗的犯罪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被宣判有罪的罪犯。可是,由于这些人提出了犯罪和惩罚的性质的问题,所以,

3. 政府监护指政府对没有行为能力而需要保护的人所进行的监护。又译为“国家之父原则”。——译注

他们受到更多的注意。由于大多数罪犯都是“精神健全的”，因此，他们应负责任和可受惩罚是正确的。

精神障碍犯罪人主要在监狱系统外的保安机构(secure facility)中被发现，但这种犯罪人也出现在监狱、普通的精神病院以及缓刑部门和精神卫生机构联合监督的社区中。在美国1978年和1982年的调查中，透露了一系列主要由国家精神卫生部门管理的机构，包括监狱中的精神病学单元。这些机构包括从州立医院中的“司法”单元到500人或500人以上的大精神病院。斯特德曼(H. J. Steadman)等人估计，这些机构每年允许20000左右病人入院，每天住院的总人数大约14000人；其中大约5%的人是女性，少年犯的比例也与此类似。总的说来，这些机构收容的人占矫正机构内犯罪人的3.2%，占机构内精神障碍者的7.3%。

其他西方国家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但由于不同的精神卫生法规，各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英国，因精神错乱的理由被认为无行为能力或无罪的人只有很小的比例；在根据《精神卫生法》(the Mental Health Act)把犯罪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方面，英国法院的自由决定权大于美国法院。在英国，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犯罪人被扣押在“特殊医院”，包括英格兰的布洛德穆尔(Broadmoor)精神病院、兰普顿(Rampton)精神病院和阿什沃斯(Ashworth)精神病院和苏格兰的国立精神病院。这些医院最大限度能够收容2000左右病人，大约1/5是女病人。可是，这只代表了由法院处理的少数精神障碍犯罪人。很多人是被国家卫生部(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当作病人来处理的，他们被送进开放式精神病院，或者根据缓刑令(probation orders)被当作门诊病人。在过去的10年间，这些机构已经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地区保安单位(Regional Secure Units, RSUs)中，这些地区保安单位是小型的精神病医疗机构，提供中等程度的安全限制(secure confinement)。

尽管规定把精神障碍罪犯转移到特别医院和精神卫生系统的其他部门，但是，很多地方还是继续把这些人留在监狱。1962年，在牛津附近的格伦顿-安德伍德(Grendon Underwood)建立了一个治疗监狱(treatment prison)，少数精神障碍罪犯也从监狱中接受医学和心理学治疗，或从外聘心理治疗医师(visiting psychotherapist)那里接受治疗。不过，近期的估计表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犯人总数大约在50000以上，其中2%的成年犯人表现出严重的精神障碍，这些人更适合放在精神卫生系统中处理。

当前规定的基础是1959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精神卫生法》，后来在1983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已经分开，不过在立法上两地有很多地方相似)。1959法普遍放宽了对精神障碍者的强制拘留和治疗的政策，对精神障碍犯罪人尤其如此。该法把精神障碍定义为“心理疾病，心理发展受阻或心理发展未完成，精神病态障碍和任何其他的心理障碍或无能”。在1983年修订的《精神卫生法》中，没有**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定义，但一般包括最严重的精神障碍，诸如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病；在特别医院和地区安全单位(RSUs)中的大多数病人都属于这种类型。**精神损害**(mental impairment)指“心理发展受阻或心理发展未完成的一种状态(严重的精神障碍不计在内)，包括智力和社会功能的明显损伤，并且与变态的攻击行为或严重的不负责任行为有关。”**严重精神损害**(severe mental impairment)以相似的术语定义，区别仅在于迫害是“严重的”而不是“明显的”。**精神病态障碍**(psychopathic disorder)是“一种持久的障碍或心理无能，不管是否包括明显的智力损害，结果都会导致变态的攻击行为或严重的不负责任行为”。必须强调的是，这

些解释属于法律的范畴,而不是临床诊断的术语。问题的产生特别与精神病态障碍类型有关(参见第三章),由于对很多精神病学家认为“精神病态者”是能治疗的观点表示怀疑,精神病态障碍这种类型总是引导起争议的。在实践中,这种类型包括了较严重的暴力犯罪人,也包含了显示人格障碍的性犯罪人。这些人在特别医院中大约占病人的1/4。

精神卫生法为强制性民事拘押和强制性刑事拘押提供了广泛的依据。它授予法院将被告送去医院进行鉴定和治疗的权力;当精神障碍犯罪人已被认定犯有要进监狱受惩罚的犯罪时,除了必须执行死刑的谋杀犯之外,法院可以通过社会机构委托监护人进行看管,或者精神障碍的性质和程度使个人适合于在医院中收容时,将他们收容在医院中。这种医院可能做好任何接纳这种病人的准备,但对公众构成直接危险的犯罪人可能被送进特别医院。除了住院令外,法院可以下达限制令(restriction order),这种规定可以是在时间上无限制,当“有必要保护公众免受伤害”时,释放取决于内政大臣或心理健康复审法庭(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的决定。这些权力是对法院在判处监禁、处以罚金或作出缓刑决定方面的权力的补充。

二、法律规定的历史背景

一些古罗马的作者把疯狂(madness)看作神的惩罚。他们指出,由于疯狂者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所以疯狂者应当免除惩罚,直到13世纪疯狂作为合法的借口才被广泛地接受。征服英国之前,各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典受到“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理论的支配,做坏事的人必须给受伤害的当事人以补偿,没有国家的干预,也不考虑减轻情节。相反,英国教堂的教会法根据道德过错或罪过来区别犯罪行为,并以行为人没有能力形成犯罪意图为借口,认为婴儿和精神病患者是不应该受惩罚的。

这个原则通过布雷克顿(Bracton)得到普及,布雷克顿是13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和传教士;但是,直到16世纪,“暴怒性疯狂(furious madness)”才被作为一个无罪释教的理由。尽管精神错乱辩护的成功是罕见的,但沃克(N. Walker, 1985)注意到,在18世纪后半期,向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Old Bailey)提交的100多件案例中,大约一半辩护获得成功。这些经辩护而被宣告无罪的犯罪人被准许释放,停止受到刑罚的制裁。可是,如果必要的话,根据1744年的《流浪法》(Vagrancy Act),他们可能被当作危险精神病人而被民事拘押。对他们的拘押没有制定特别的法规,他们可能被关在看守所、矫正所,或者私立的疯人院,与其他精神病人一道根据“贫民救济法”(Poor Laws)而被拘禁。

1800年对詹姆斯·哈德菲尔德(James Hadfield)的审判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哈德菲尔德先前是一个头部已受伤的士兵,他开枪打死了乔治三世,他的辩护律师成功地为他进行了辩护,哈德菲尔德的犯罪是由类偏狂妄想(paranoid delusion)所致。这导致了无罪裁定,“他的犯罪是在精神错乱的影响下实施的”。哈德菲尔德被送回监狱关押,但由于考虑到刑法对他没有直接的权力,所以政府通过了1800法令,即安全监禁被指控犯罪的精神病人法(Act for the Safe Custody of Insane Persons Charged with Offences)。该法令授权法院拘留精神错乱的可疑释放者,直到被赦免(His Majesty's Pleasure be known),1800法令同样确定了法院下令拘押被指控犯罪的人的权力,这些被告人在传讯中被发现精神错乱。该法令也为所有后来有关的立法奠定了基础,后续有关的立法准许对精神障碍犯罪人执行预防性拘留和不定期拘留。

新法令没有规定拘留的地点,但1816年在伦敦的贝斯雷姆(Bethlem)医院(精神病院)中建立了这样的拘留机构。英国第一个收容犯罪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于1852年在都柏林附近的当德如姆(Dundrum)建立,1863年伦敦附近的布洛德穆尔(Broadmoor)精神病院开始使用。第二个国立犯罪人精神病院于1912年在诺丁汉附近的兰普顿(Rampton)开放。可是,在1913年通过的精神缺陷法(the Mental Deficiency Act)建立起处理精神缺陷者的行政组织后,兰普顿(Rampton)精神病院在1921年与利物浦附近的穆斯赛德(Moss Side)精神病院(institution)一道,成为危险精神缺陷者的国立精神病院。1948年,三个机构都受卫生部的领导;根据1959年的精神卫生法,这些医院成为“特别医院”,为“由于危险、暴力或犯罪倾向而要求在特殊条件下予以治疗”的病人提供服务。第四个特别医院1984年在利物浦附近的兰公园(Park Lane)建成,但后来与穆斯赛德(Moss Side)合并形成阿什沃斯(Ashworth)医院。

尽管由入院令(hospital orders)提供的权力优于在美国可以得到的权力,但美国更强调根据缓刑令进行安置和在监狱的精神病部门予以安置。直到1950年,美国与精神障碍犯罪人有关的法律才倾向于追随与英国类似的模式。因此,考虑对“精神缺陷少年犯罪人”(defective delinquent)或“性精神病态者”的立法实行转向,即把犯罪人转移到犯罪精神病医院或国立医院中的特别单位。例如,从1938年开始,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性精神病态者”法规,要求在精神病院对性犯罪人实行不定期拘留。这些法规很明显是对发生率很高的性犯罪的一种惊恐反应,这些没有考虑“性精神病态者”定义、确认或治疗问题的法规被一致通过。现在很多法规已经废止。

1959年出台的英国《精神卫生法》代表了治疗哲学对法律条文主义的胜利。尽管法律条文主义要求通过对不合法专家的司法约束,保护个人的自由,但是该法令给予精神病学家相当大的自由决定权。正如已经注意到的一样,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治疗哲学一直是攻击的目标。斯通(A. A. Stone, 1984)对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间美国法律条文的改变进行了回溯性研究,揭露了社会公共机构中根据精神缺陷少年犯罪人和性精神病态者法规产生的虐待和惩罚的实际情况。也存在因法规的任意性而导致对无受审判能力的人的不定期拘留。对“准犯罪人”收容机构(quasi-criminal institution)的揭露导致有关立法的产生,这些立法不仅涉及监禁权,也涉及治疗权,还涉及拒绝强制治疗权和在最少限制的环境中拘留的权利。这种突然转向法律条文主义的规定扩大到一般的精神病学领域,成为彻底修订民事拘押法(laws of civil commitment)的标志,并且促成了让精神障碍者走出精神病院的行动。可是,这些规定的效果将集中在需要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危险性上面,因而精神病院的病人总数就很像早期的准犯罪人社会公共机构的情况那样。

在英国,尽管人们已经不再对《精神卫生法》确立的自由裁决权进行争执,但是,对这一法律确立的自由裁决权的法律方面仍有争议。一些精神病学家也感到,人们对收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医院的能力期望太高。同时,精神病院的“开门”政策,导致为需要中等程度安全约束的破坏性病人而设立的机构数量的减少;很多医院不愿意接受犯罪人,结果导致了特别医院的过分拥挤;监狱也积聚了精神障碍犯罪人。与不确定限制令(indefinite restriction order)有关的内政大臣的权力,也受到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挑战。

对精神障碍犯罪人增加监督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了巴特勒委员会(Butler Committee),

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法律规定。委员会的报告暴露了法律中的很多问题, 尽管只有一些建议已被执行, 但它对探讨精神障碍犯罪人仍有重要影响。一项有关的发展是1983年对《精神卫生法》的修订。修订的法令引进了准许治疗的规定, 也引进了在精神病态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范围内对入院病人的可治疗性标准, 一个精神卫生法委员会监督被扣留病人的利益, 增加“精神卫生复查法庭”(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s)对受到限制的病人安排释放的权力。因此, 修订后的法令是有关法律条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三、精神错乱辩护

哈德菲尔德案件是决定对精神障碍犯罪人合法拘留的一个里程碑, 但以妄想形式进行“部分精神错乱”(partial insanity)的辩护没有确立起明确的法律先例。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1843年在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对丹尼尔·麦纳顿(Daniel McNaughtan)的审判。麦纳顿试图暗杀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 但却误杀了皮尔首相的私人秘书爱德华·德拉蒙德(Edward Drummond)。一致认为, 麦纳顿患有与保守党党员(Tories)有关的迫害妄想, 尽管莫兰(R. Moran, 1985)怀疑他的信念完全没有被发现, “部分精神错乱”辩护再次使用。法官“以精神错乱为理由”作出了无罪裁定, 但由于公众(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愤怒, 要求普通法法官(the Common Law judges)对上议院阐明精神错乱辩护。他们的意见(即现在著名的麦纳顿规则, the McNaughtan rules)认为, 成功辩护的必要条件是、必须证明“在犯罪时, 被告人受心理疾病导致的缺陷限制而进行犯罪活动, 以致于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的性质, 或者如果他知道行为的性质, 但他不知道他所做的行为是错误的”。麦纳顿是随后被转送至布洛德穆尔(Broadmoor)精神病院的第一个病人, 于1865年死在医院。

麦纳顿规则在英美法中继续存在, 但英美的法律提供了非常严格的标准, 麦纳顿规则本身没有满足这些严格的条件, 因此, 这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来源。这些争论集中在对“心理疾病”(disease of the mind)的认知结果的假设上, 心理疾病的法律概念假定缺陷由“内部”疾病产生, 不是来自于外部因素, 诸如自愿喝酒或吸毒; 也必须确认“推理缺陷”(defect of reason)是“疾病”的结果。“行为的性质和特征”(nature and quality of the act)是精行为的生理性质(例如, 用力挤压某人的咽喉, 而不是挤压柠檬), 但是, (这种表述)没有指明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的错误的, 在道德上是没有错误的。早期的批评是, 没有人缺乏辨别对错的能力, 对精神错乱的认知测验排除了精神障碍的人, 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但不能控制它, 如“盗窃狂”。1887年, 美国亚拉巴马州采纳了以“不可抗拒冲动”(irresistible impulse)为标准的意志控制测验, 随后在美国其他一些州也采用了这一测验。尽管有争议, 但这个标准也被英国一些法院接受, 现在可以成为减轻责任辩护的一部分(参见下文)。可是, “不可抗拒冲动”概念的问题在于: 辨别不能抵抗“冲动”和简单的不愿意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导致把不可理解的犯罪(incomprehensible crime)引证为精神错乱的证据。

进一步的测验于1870年由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被引进, 但广泛地采用是在1954年德拉姆诉合众国(Durham v US)案件之后。在这一案件中, 法院拒绝了认知和意志方面, 要求把行为看成是“精神疾病的产物”。这反映了医学模型的影响, 承认精神病学证言。可是, 这导致了建立犯罪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结的问题, 也导致了在法庭上使用医学术语的问题。

题。结果是专家作证宣判有关法律责任这个非医学的“最后问题”(ultimate issues)、这受到贝兹伦(D. L. Bazelon, 1978)法官的批评,他构想出德拉姆规则(the Durham rule)。这个原则在1972年的合众国诉布劳纳案件(US v Brawner)中被抛弃。

从技术上讲,“因精神错乱而无罪”(NGRI)的特别裁决,就是宣判无罪,但它导致在保安精神病机构中的拘留。可是,从1883年到1964年,英国的裁定中改为“有罪但精神错乱”(guilty but insane)。美国的一些州最近已引进了“有罪但精神失常(guilty but mentally ill)”的裁定,这种裁定批准监狱或精神病院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治疗,试图减少使用因精神错乱而无罪的裁定。在实践中,不允许减轻精神障碍者责任的裁定已经受到批评。在美国,一个被广泛采纳的测验是由“美国法学会”(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提出的;到1980年,该检验已被用于联邦法院和全国一半以上的司法管辖区。该检验规定“如果一个人在犯罪时,因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而缺乏辨别其行为的犯罪性的实际能力,或者缺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的能力,那么,就不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因此,该检验包含了认知检验和意志检验,用“辨别”(appreciate)代替了“知道”(know),使知识中包含了情感反应。美国法学会的检验形成了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辩护的基础,辛克利于1982年刺杀里根总统,尽管精神病学的证据之间不一致,但还是采纳了因精神错乱而无罪的裁定。正如早期对哈德菲尔德和麦纳顿的判例一样,这个裁定激起了公众要求修订法律的呼吁,这种修订直接指向精神错乱辩护,但也是抨击了精神病学家参与重要审判的现象。因此,美国有一些修订精神错乱辩护的深层次的探讨。

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规则是邦尼规则(Bonnie rule)。该规则提出,“如果一个人在犯罪时,因精神疾病或缺陷而不能辨别其行动是错误的”,那么,被告应当被判定为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该规则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3年)报告的形式被推荐。人们认为,从科学上讲,该规则确定,有关认知缺陷的判断比对意志缺陷的判断更可靠,因而精神病学家们可以更好地使用这一规则。该规则还规定,辩护中承认的“精神疾病”应当限制在属于重性精神病的“严重”精神障碍,因此,人格障碍应当排除在外。美国心理学会批评该规则试图急速的改变精神错乱的辩护,认为该规则没有任何对法律辩护有用的经验性证据,罗杰斯(S. Rogers, 1987)提供了证据,指出司法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意志控制的判断的可靠性,是与认知辨别的可靠性一样高的。不过,邦尼规则1984年被美国联邦法院采用。

四、对精神错乱辩护的实证研究

关于精神错乱辩护改革的要求反映了这样一些假设,即精神错乱辩护的滥用和犯罪的“精神病学化”(psychiatrisation),但可用的经验资料表明,这些假设是以公众的错误想法为基础的。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辩护的使用率和成功率似乎确实被估计得过高了。例如,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项研究中,立法者认为,在所有重罪指控中有8%的案例使用了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辩护,但这个州实际使用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辩护的数字是0.46%。斯特德曼(H. J. Steadman, 1985)估计,1978年美国全国有5180件采用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辩护,合计达所有重罪逮捕者中的0.2%。在这些案件中,大约有1/3辩护成功;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被拘押者合计达所有送精神病院治疗病人中的2%左右。在英国,这种辩护几乎废弃,但麦凯(R. D. Mackay, 1990)确认,在1975年到1988年之间,有49例成功的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辩

护,表明这比想像的要少得多。

因精神错乱而无罪是一种富人辩护的观点,与研究结果相矛盾。研究发现,很多无罪释放的人是受教育程度低和没有职业技能的人。他们也大多是没结婚的人;与监狱在押犯总人数比较,妇女人数超过比例。麦凯在对英国的研究中发现,49个无罪释放者中有11人是妇女。有人在研究中发现,辩护成功或不成功辩护的主要因素似乎是频繁的住院历史,但无罪释放者不是清一色的精神病患者。在纽约州的50个因精神错乱而无罪释放者的样本中,佩斯瓦克(R. A. Pasewark)、潘特尔(M. L. Pantle)、斯特德曼(H. J. Steadman)发现(1982),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有26人,可是诊断为人格障碍者有14人。与此类似,麦凯(1990)发现,在他的研究中,49个无罪释放者中有25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4人被诊断为抑郁症,4人是癫痫病患者,3人是人格障碍者。此外,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尽管因精神错乱而无罪释放者更可能被指控为暴力犯罪,但比较轻微的犯罪如欺骗或盗窃也是普遍的。这与此类辩护主要用于谋杀犯逃避法律惩罚的观点是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公众认为,对因精神错乱而无罪释放者的拘留相对较短,而法学家则认为拘留时间需要延长,这两种意见都得到一些支持。佩斯瓦克、潘特尔和斯特德曼(1982)比较了因精神错乱而无罪的被拘留者和被指控犯有类似犯罪的罪犯,他们发现,因精神错乱而无罪的拘留者从矫正部门转移到精神卫生系统照管后,他们被拘留的时间比已定罪的罪犯更短。麦凯(1990)也发现,他的研究样本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试被拘留在地区安全单位(RSU)而不是特别医院,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不到一年就被释放。可是,尽管已发现在特别机构呆的时间长短有变化,但拘押的时间还是往往与犯罪的严重性有关,表明决定拘留时间长短的因素是刑罚的惩罚而不是精神障碍的减轻。

虽然重新逮捕的比率是变化的,从13%到50%以上不等,但追踪研究表明,无罪释放者的重新逮捕率相对较高;佩斯瓦克(R. A. Pasewark, 1982)等人发现,因精神错乱而无罪释放者和与之对照的重罪犯有相似的重新逮捕率,分别为15%和18%,主要是轻微犯罪。斯特德曼(H. J. Steadman, 1985)注意到,来自纽约州的数据表明,因精神错乱而无罪释放者通常比早先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有较高的重新逮捕率,虽然比无行为能力的人的比率低,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还有待确定。

五、无受审能力

对受审能力(competent to stand trial)的决定以确保受惩罚的人是有罪的为前提。在英格兰,“无能力辩护”(unfit to plead)是普通的表达方式,尽管1964年的《刑事诉讼(精神错乱)法》(the Criminal Procedures [Insanity] Act)规定“这种无能力状态可以成为申请停止受审的一种理由”。在苏格兰,相等的表述是“请求停止审判的精神错乱”(insane in bar of trial),而在美国,则普遍表述为“无能力受审”(unfit to stand trial)。

在英国,能力的标准通常是,被告是否能够理解审判程序,以便作出合适的辩护、对陪审官提出挑战和理解证据的基本内容。美国的司法界强调能理解控告和法庭诉讼程序,并且能与辩护律师合作。这些受到巴特勒委员会(the Butler Committee)的肯定。普遍假定,无能(disability)产生严重的精神障碍(聋哑症也可能被接受,但遗忘症不能接受),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法院允许精神病专家或心理学专家陈述关于能力的结论,通常是根据精神错乱作出结论。可是,这种标准与特殊的认知和交流技能有关,并且要求比传统的临床解释

更多的内容。

对受审能力的辩护比精神错乱辩护使用得更多。哈勒克(S. L. Halleck, 1987)注意到, 1978年美国估计有25000人作受审能力评估, 虽然法院发现只有少数人无受审能力。克尔(C. A. Kerr)和罗思(J. H. Roth)发现(1986), 发现对美国精神障碍犯罪人收容机构的调查中, 11%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已被裁定为没有能力受审, 另外6%的人正在接受进一步的能力评估。在英国, 近年来精神障碍犯罪人中不到2%的人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处理; 格卢宾(D. H. Grubin, 1991)注意到, 1976年到1988年之间无能力辩护的年平均数是22.7。在苏格兰使用得更多。奇斯维克(D. Chiswick, 1978)发现, 在国立精神病院(the State Hospital)的无能力病人比对照组的人年龄更大, 更可能被指控为犯杀人罪, 更多的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很少的人被诊断为有人格障碍或无能, 他们被拘留的时间明显地更长。

虽然已经发现这些病人没有犯罪, 但他们通常在保安精神病院受到不定期的拘留。因此, 英国和美国已经建议进行法律程序上的改变, 这种改变导致审判延期6个月, 允许其尽可能地恢复受审能力, 以便正常地接受审判。在“不能恢复受审能力”的案例中, 有人提出对这一事实的特殊审判, 考虑合适的“无罪”裁决; 这种裁决不可能获得时, 法官可斟酌处理。可是, “不能恢复受审能力”的数量可能不多, 在美国已经证明, 用于通过临床治疗和与法庭有关技能的训练恢复受审能力的方案有很高的成功率。

六、减轻责任

1960年以来英国的精神错乱辩护逐渐衰落, 部分原因是由于引进了《精神卫生法》中有关人院令的规定, 尤其是由于1957年颁布的《杀人犯罪法》(the Homicide Act)的结果, 后来在1965年废除了死刑。《杀人犯罪法》继苏格兰的做法之后引进**减轻责任**(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的辩护。如果这种辩护被认可, 那么就判为过失杀人罪。这并不赞同对被认定犯有谋杀罪的人判处强制性终生监禁, 后来, 法院可以对谋杀犯判处终生监禁以外的刑罚, 不过, 终生监禁也没有排除在外。

杀人犯罪法第二款规定, 因“患病”减轻责任的被告, 必须表现出“这样的心理异常(这样的心理异常可能是由心理发展受阻和延迟的条件引起的, 也可能是由任何先天性原因引起的, 还有可能是因疾病或者伤害诱发的状况引起的)明显削弱了对其行为或不作为的心理责任(mental responsibility)”。这样的描述超过了麦纳顿规则中的“推理缺陷”(defect of reason), “明显削弱”(substantial impairment)意味着心理责任的全面下降。格里夫(E. Griew, 1986)认为, 第二款规定的描述“晦涩得几乎近于废话”, 该款规定并没有通过司法解释得到改进。在1960年的R诉伯恩(R v Byrne)案件中, 帕克勋爵(Lord Byrne Parker)规定: “心理异常”(abnormality of mind)的意思是“一种与普通人极为不同的心理状态, 有理智的人把这种心理状态视为是异常的”。他也认为“心理责任”涉及“被告的心理应对其身体行动负责的范围”。格里夫(1986)则认为这个解释“比原来的规定更差”。巴特勒委员会(Butler Committee)指出, “心理的”责任指的是“一个法律概念或是一个道德概念, 它不是与被告有关的客观事实”。更确切地说, 它是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问题, 是一个由于“明显的损害”而减轻法律责任范围的问题。

“被减轻”的是“责任”的心理能力, 这种含糊的意思再次引起精神病学家断言的“最后问题”(ultimate issues)。在彼得·萨克利夫(Peter Sutcliffe)案件中, 公众对精神病学家

在谋杀案审判中的反感公开显现出来,所谓的“约克郡的杀人碎尸者”(Yorkshire Ripper),彼得·萨克利夫杀死了13名妇女。虽然辩护和起诉的精神病专家一致同意萨克利夫患有类偏执狂型精神分裂症,但像辛克利案件一样,审判成为主要集中于精神病学证据的“传媒事件”。可是,在这个案件中,陪审团拒绝减轻责任的请求,判决萨克利夫犯有谋杀罪。不过,萨克利夫的精神障碍在狱中变得很明显,后来他被转送至特别医院。

减轻责任在一系列疾病案件中已被认可,包括反应性抑郁症、经前紧张症、病态人格以及精神病。可是,它并不必然地导致宽大处理,最近一些年里,在裁决为符合杀人犯罪法第2款规定的过失杀人罪的男犯中,只有大约1/3的人已经接受入院令,这或许反映了对精神病专家观点的增加趋势,精神病专家认为精神变态者是不可治疗的。不过,陪审团的裁决已取代了无能力辩护(unfit to plead)和特别裁决。1900年至1949年之间,无能力辩护和特别裁决分别占14%和26%,在谋杀审判定罪中,不包括杀婴者。杀人犯罪法颁布以来,这些类型只能解释不到3%的案件,而过失杀人罪裁定解释了37%的案件。

巴特勒委员会提议,特别裁决改变为“因心理障碍的证据无罪”,对心理障碍的这种解释比《精神卫生法》中的规定更有说服力。无限期的送精神病院治疗不是自动的,法官有酌处权。这种特别裁决比减轻责任的裁定更有吸引力,请委员会提议废除减轻责任和因谋杀而判处强制执行的死刑。尽管这些提议未被采纳,但它们影响了法律委员会近期的建议。

七、精神障碍和刑事责任

围绕精神错乱辩护继续争论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对下面这一问题的注意,即为什么精神障碍会影响刑事责任,这里将会触及法律哲学中近期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代表了鉴别共同的道德“直觉”(intuition)的基础的尝试,这种共同的道德直觉是应当免除对精神障碍者的谴责和惩罚的理由。

证明某种行动无罪的传统标准是无知(错误)、强迫和不受意志控制(involuntariness)。后者严格地与运动(movement)有关而不是与动作(action)有关(例如,自动症),因此,前两个标准是理由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精神错乱检验的认知和意志成分方面,它们分别有相似之处。精神错乱辩护的一种解释是,由于它反映了犯罪意图的缺乏,所以,这种辩护否定了罪过的存在。可是,芬格利特(H. Fingarette)和哈斯(A. F. Hasse)(1979)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罪过要素(诸如恶意或意图)在精神错乱犯罪人中是经常存在的,问题不在于缺乏证明犯罪人无罪的犯罪意图,而是缺乏精神能力丧失(mental disability)中这种意图的起因。

另一种观点是证明犯罪人无罪的“精神疾病”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会指责得了身体疾病的人(即他们是病人而不是行动者[agents])。可是,雷登(J. Radden, 1985)认为,我们并不谴责某种疾病所引起的行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行为人存在无知或者受到强迫的缘故。由于同情和怜悯,疾病可能会减轻指责,但疾病本身不是行动的理由。事实上,对精神疾病这个概念存在强烈的抵制,在精神疾病分类学中确认的任何形式的精神障碍,都足以证明犯罪人无罪,这在人格障碍犯罪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意见中是值得注意的(美国精神病学会,1983年)。德拉姆规则(Durham Rule)几乎承认精神障碍本身就是辩护的基础;巴特勒委员会似乎承认这样的观点,即精神错乱的法律概念应当向精神病学的概念靠近。可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因为这个问题限制了他们对严重的精神疾病或低常

(subnormality) 提出“因精神障碍而无罪”的裁定建议。

巴特勒委员会也接纳了这种观点,即麦纳顿规则的弱点在于“现在已过时的信念在控制社会行为的推理中起突出作用”,并且继续断言:“当代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强调的是,人们的社会行为更多地由他已经学会的行为方式决定,而很少由他所知道和理解的东西决定。”迄今为止,这个观点似乎意味着,行为科学接纳了经验主义者的行为观而不是理性主义者的行为观,现在它将难于经受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考验。几位法律哲学家也认为,我们为精神错乱者开脱罪责的直觉很少建立在传统的理由基础上,更多地建立在从事受推理(reason)控制的行为能力被削弱的基础上。例如,芬格利特(H. Fingarette)和哈斯(A. F. Hasse)提出(1979),心理的非理性条件构成各种精神错乱测验的基础,虽然其理性的概念超出了包括对“犯罪”意义的情绪反应性的认知。被描述为精神病态者的犯罪人在这方面也许被看作是失去理性的。可是,雷登(J. Radden, 1985)认为,这个无理性的概念太分散。她提出了一种**免罪责性理智失常**(exculpating unreason)的概念,把它作为一种普遍性无能(pervasive inability),认为可以成为免除精神错乱者罪责的充足理由,从而避免用不一致的信念和欲望开脱精神错乱者的罪责。她认为精神错乱者的理智失常与皮亚杰提出的前运算思维的特征有相似之处,前运算思维是幼儿的特征:不能进行逻辑推理,没有反省思维的能力且不能自愿地行动。

雷登指出,理性是个人能动作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对赞扬或责备进行归因分析的必要条件。穆尔(M. Moore, 1984)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假设。他指出:“如果理性可以解释人们过失或故意行为的动因,如果理性不能证明人们由于其行动引起的负有道义(或法律)责任的事件是正当的或是没有理由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分别地使人们负法律上的责任或受道德的谴责。”他指出,责任的每种条件都预先假定,人们是**实践理性者**(practical reasoner),自主性和理性是让人们承担责任所绝对必要的。由于动物、婴儿、法人和精神病人可以免除责任,因为他(它)们缺乏这些特征所决定的人的身份。因此,正是这种理性行动的普遍性无能,构成了免除精神错乱者罪责的基础。

人们认为,让人类承担责任的基础,就是人类的推理能力,这种观点重新证实了古典主义,并且与理性选择理论有密切关系。可是,诺里(A. Norrie, 1986)批评了穆尔的实践推理观点,因为象理性动因(rational agent)的法律概念一样,这种观点依靠推理能力的抽象概念。他认为,穆尔声称采纳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的能动作用产生于“**情境推理**”(situated reasoning),在情境推理中,个人的行为不只依赖于推理的能力或形式,而且还依赖于提供推理前提的个人和社会的环境。他提出,把强迫行为作为借口的基础不是作为抽象能力的推理受到损害,而是个人的选择因恐惧而受到限制。在原则上,这与因令人讨厌的社会条件或个人特征受到限制的选择没有区别,所以,它与穆尔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它是把保持抽象推理中干扰的“法律保障中的漏洞”建立在拒绝责任的基础上。

道德哲学家关心案件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人们对责任怎样归因的问题是经验心理学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争议是不予考虑的。例如,很可能正是这种案件并不存在单一理由的普遍原则,这种单一理由的普遍原则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得到应用。不过,根据这些不同意见,改革精神错乱辩护的尝试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引起争论。把受到损害的推理能力看作免除责任的合理条件的这些观点,有利于维持辩护,并且根据这种低能的标准划出一条责

任能力的界限。例如,穆尔认为,法律上的精神错乱应当根据无理性(irrationality)来解释,而不应当根据一个人是否患了精神病学中的精神疾病来定义。诺里声称,选择总是受到制约的,他向任何建立刑事责任标准的尝试挑战;几位作者反对在刑事审判中考虑精神障碍。萨斯(T. S. Szasz, 1979)接受了公平模式,认为惩罚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但他认为精神病学不应当在决定谁应负责任和应受惩罚中起作用。尽管责任与应受惩罚性相互等同,但是,伍顿(B. Wootton, 1959, 1980)认为,废除责任将会把需求移至尝试人为地区分“有病的”犯罪人和“健康的”犯罪人。她提出,在审判中,可以通过扩展严格责任来免除对罪过(mens rea)的要求。精神障碍的问题只是在判决阶段产生,必需实际地考虑犯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刑罚系统和卫生系统之间的差异将会因此而消失。英国心理学会支持这种主张。

可是,哈特(H. L. A. Hart, 1968)已经指出,对道德责任的思考与公平模式无关,而与预防犯罪的法律干预有关(参见第一章)。不考虑个人的能力和机会就使用任何形式的惩罚,会违背对个人的基本公平原则。他提出,罪过应当作为责任的一种必要条件加以保留,但精神障碍只应当在判决阶段提出。这需要排除精神错乱的责任或者进行减轻责任的辩护,并且也需要扩展使用精神卫生法。可是,芬格利特(H. Fingarette)和哈斯(A. F. Hasse)提出(1979),如果罪过被保留,那么必须考虑精神障碍,因为精神障碍与信念和意图是有关的。他们赞同根据无理性的标准进行“心理能力丧失”辩护。

巴特勒委员会对于“因精神障碍而无罪”裁决的建议,或许最接近后一种观点。可是,刑事责任的界线是以精神病学中的严重低常(severe subnormality)和严重精神疾病来划分的,严重精神疾病(severe mental illness)根据5个标准来界定:(1)持久的智力功能损害;(2)由妄想性评价导致的持久的心境改变;(3)妄想信念;(4)与妄想性误解相联系的变态知觉;(5)思维相当混乱以致妨碍了病人对情境的理性评价。这些意见先后受到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法律委员会的一致考虑,但他们的基本理由仍然是不清楚的。可是,不管他们是把精神障碍本身还是把混乱思维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都是任意地以精神病的标准来划分界线的。这些标准特别由于理论上的发展而被曲解,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强调认知功能失调在神经症和人格障碍中的决定作用。例如,与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犯罪人因其妄想而应承担的责任相比,人格障碍犯罪人不会因其不合理的信念系统比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既然如此,为什么人格障碍者要因其行为受到更多的惩处呢?

第四节 精神障碍和犯罪

本节将考察精神障碍和一般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下一节将考察暴力行为的问题。人们已注意到,精神障碍和犯罪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个领域中的所有研究都遇到明显的方法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只能得出一些暂时性的结论。尤其是鉴定心理障碍的诊断参照标准仍然受到研究者实验定向的影响,研究者常常使用没有确定信度和效度的个人喜欢的方案。此外,研究通常依靠缺乏代表性的样本。正如孟席斯(R. J. Menzies)和韦伯斯特(C. D. Webster)指出的那样(1989),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属于“不能克服的”,它们都仍然存在。

莫纳汉(J. Monahan)和斯特德曼(H. J. Steadman, 1983)强调代表性的问题,他们对

“真实的”流行率和“被治疗的”流行率进行了流行学的区分。这些通过卫生护理机构的发票被确定为病人的被试，只提供了精神障碍的“被治疗”比率，而社区中精神障碍的“真实的”流行率被大大地低估。被定罪犯罪人类似于刑事犯罪者中“被治疗的”少数人。原则上，两者真正的流行率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通过访谈或自我报告从随机抽取的社区样本中决定，但这种资料只是在近期才成为可用的。

特普林(L. A. Teplin, 1984, 1985)描述了一项对1382桩警察—市民冲突的观察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通过一个简短的症状检查表评估严重的精神疾病。在506名有犯罪嫌疑的人中，30人显露出精神疾病的征兆，与其他的嫌疑犯相比，这些有精神疾病的嫌疑犯更多地被逮捕(47%与28%)。可是，警察和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联系不是主要受犯罪嫌疑所决定，虽然精神疾病患者更有可能受到怀疑，但他们也常常是更受关注或帮助的对象。他们被怀疑犯罪的模式也没有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嫌疑犯。因此，这个结果表明一种逮捕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无礼的”行为，或者是由于受到限制的选择性倾向。可是，他们并没有指明精神疾病患者更易于发生犯罪行为。

与其他很多研究相比，这个研究提供了在“未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中查明分真实犯罪流行率的更加近似的值。所考察的其他研究主要关心受到治疗的精神障碍犯罪人样本中的逮捕率，或者关心受治疗(即合法地受到检查治疗)的犯罪人中精神障碍的真正的比率。

一、精神病人中的犯罪行为

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考察了被精神病院释放的病人随后的逮捕率，并且把它们与总人口率进行了比较。这样的研究显然依赖于有关当前精神病学地位、病人与总人口的人口统计学可比性、在逮捕倾向中不存在偏向的几种假设。根据特普林(L. A. Teplin)的研究结果，在逮捕倾向中不存在偏向是有问题的。

在一项对美国研究的评述中，拉布金(J. G. Rabkin, 1979)发现，1965年以前的研究一致显示，先前的病人从精神病院释放后比总人口中的成员更少可能被逮捕。随后报告的研究指出，病人更有可能被逮捕，并且是因为更严重的犯罪而被逮捕。可是，后来逮捕的最好预测因素是以前的逮捕；对早期和后来的研究之间的比较表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先前逮捕史的病人入院人数增加的数量，这些病人增加的数量能解释大多数释放后的犯罪。由于这些对社会有较大破坏性或危险性的病人进精神病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因此，后来的研究资料被归因于精神卫生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变化。

斯特德曼(H. J. Steadman)、科克扎(J. J. Cocozza)和梅利克(M. E. Melick)(1978)对1868年和1975年从纽约州精神病院释放的病人，进行了19个月的追踪研究，这是后来研究中的典型代表。在两个样本中，6.9%和9.4%的人后来被捕，尽管逮捕没有局限于任何特殊的犯罪类型，但是他们的逮捕率是总人口率的3倍左右。随后的逮捕与先前的逮捕、年龄以及人格障碍或酗酒的诊断有关，虽然这些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年龄。没有先前逮捕史的病人，后来的逮捕率实际上比总人口的逮捕率更低；与早先研究的比较表明，主要的差异在于具有先前逮捕史病人比例的增加，在30年间从15%增加到40%。这与林奎斯特(P. Lindqvist)和阿利贝克(P. Allebeck)(1990)从1971年起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的15年追踪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对1971年从精神病院释放的全部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了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严重的精神障碍并没有增加犯罪的危险性。男性

的犯罪率比总人口率只是稍微高一点。可是，女性犯罪是预期比率的2倍。

与此不同的是，索桑斯基（L. Sosowsky, 1980）报告，从加利福尼亚州立精神病院释放的病人（这些人没有先前的逮捕史）释放后的逮捕率，比当地县城的逮捕率高5倍以上。可是，莫纳汉（J. Monahan）和斯特德曼（H. J. Steadman）（1983）指出了这种比较的恰当性问题，他们指出，像斯特德曼等人1978年的研究一样，索桑斯基发现先前的逮捕和年龄是后来逮捕的更重要的预测因素，而指神病诊断则没有多大的预测力；与拉布金（J. G. Rabkin, 1979）的观点一致，他们的结论是，精神病人中的犯罪与人口统计中预测犯罪的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因素是一样的，这些因素比精神病状况本身与精神病人犯罪的联系更多。

这种含义好像意味着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依赖于犯罪倾向而不是精神障碍。可是，必须指出，这些研究与从精神病院释放的病人有关，这些人目前的指神病状况是不清楚的。尽管精神病人急性发作时犯罪的范围似乎并不清楚，但是托奇（H. Toch）和亚当斯（R. Adams）发现（1989），指神障碍罪犯先前的犯罪往往是在较严重的精神障碍发作期间发生的。近期在瑞典对一个未加选择的社区样本的纵向研究也发现，那些有严重精神障碍或智力低下的人，比没有鉴定为精神障碍和智力低下的人更有可能犯罪。

二、犯罪人中的精神障碍

由于各研究之间以及研究的整个过程缺乏一致的诊断标准，也由于在刑事司法处理过程中早期阶段鉴定出很多指神障碍犯罪人，所以，对已定罪的犯罪人中精神障碍的流行率的研究是很难进行的。布罗德斯基（S. L. Brodsky, 1972）对1918年至1970年进行的有关美国法院或监狱样本的9项研究进行了总结，表明精神病性障碍（psychiatric disorder）的比率从16%~95%不等，较高的数字是从更近的研究中得到的。精神病的比率是从1%~4%不等，而最高的比率是人格障碍或“行为障碍”的比率。后面这些障碍的模糊标准可以说明总体比率中的很多变化。对法院样本的研究一直是罕见的，在犯罪人中，法院的样本可能比被监禁的犯罪人更有代表性。科伊德（J. Coid, 1984）只确定了两个这样的研究，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做的，另一个是战后不久做的，尽管人格障碍的比例从早期研究中的6.9%增加到后来研究中的24.9%，但它们反映了标准的变化。

更近的研究局限于被监禁的样本。研究者一直很关心诊断的可靠性，似乎没有一项研究使用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标准进行随机抽样。古兹（S. B. Guze, 1976）在密苏里州对早先被监狱释放的223名男性重罪犯和66名女性重罪犯进行了访谈，使用了研究诊断标准。所有女犯和90%的男犯接受了精神疾病诊断。精神病和智力落后的比率不高，但78%的男犯和65%的女犯接受了社会病态的诊断。可是，对后者必须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分类通过先前的社会越轨来定义，诸如找警方麻烦或学校少年犯罪，在女性的案例中包括卖淫。像DSM-III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确定的较详细的标准一样，他们没有对被试的特征作什么解释，只是再次确认了犯罪学对监禁和过去社会越轨之间联系的老生常谈。

英国罪犯样本调查报告的数字稍微低一些。冈恩（J. Gunn, 1977）指出，估计的比率在27%到46%之间。冈恩等人发现（1978），在英国东南部随机选择的罪犯中，31%的人达到精神病病例标准，大多数人接受了人格障碍或酒精中毒的诊断。冈恩（J. Gunn）、

马登 (A. Maden) 和斯文顿 (M. Swinton) (1991) 做了一项研究, 他们对从英国 16 个监狱随机抽取的 1365 名成年男性和 404 名年轻男性样本进行评价, 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档案资料进行了国际疾病分类 (ICD) 诊断。总的说来, 37% 的罪犯接受了基本的诊断。主要的诊断结果是药物滥用 (23%)、人格障碍 (10%), 神经症 (6%), 精神病 (2%) 和器质性障碍 (0.8%)。

在不同的样本中发现的精神障碍模式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当然, 这可能反映了真实的差异, 似乎 1/3 以上的罪犯表现出某些形式的精神障碍, 但这主要反映了酒精和药物滥用以及人格障碍的高比率。这些障碍作为精神疾病的地位在精神病学内是引起争议的。罪犯中精神障碍的比率是否显著地不同于总人口的比率, 仍然是不清楚的。莫纳汉 (J. Monahan) 和斯特德曼 (H. J. Steadman) (1983) 引用了美国社区调查的估计, 这项调查估计, 总人口的精神障碍总流行率从 16% 到 25% 不等。中数流行率 (median prevalence) 为: 精神病 1.7%, 神经症 15.1%, 人格障碍 7.0%;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比率高, 来自于这种群体的罪犯更可能形成精神障碍。罗宾斯 (L. Robins, 1984) 等人也发现, 美国样本中药物滥用的终生流行率从 15% 到 18% 不等。如果考虑社会阶级, 对大多数罪犯的调查就会产生明显与这些比率相同的精神障碍的比率, 这表明精神障碍一般不会增加犯罪危险。这可能仅仅是暂时性的结论。科伊德 (J. Coid, 1984) 指出, 应激症状经常出现在罪犯中, 但很多可能在神经症的正式诊断中识别不出来。

这些结果的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 不过它们仍为犯罪人矫正机构的政策提供了依据。它们也与“犯罪化”的假设有关。在欧洲国家, 发现精神病床位数量与监狱总人口之间存在一种反比的关系。彭罗斯 (L. S. Penrose, 1939) 提出, 某个矫正系统中人口的变化, 会迫使另一种人口产生相反的变化。韦勒 (M. P. I. Weller) 和韦勒 (B. G. A. Weller) 发现 (1988), 1950 年以来英国精神病院中下降的人数和监狱中增加的人数之间的相关是 0.94, 明显与彭罗斯的“水力学”的假设一致, 表明先前犯罪的病人很有可能被送进监狱。可是, 卢里基奥 (A. J. Lurigio) 和刘易斯 (D. A. Lewis) 在一项对美国被释放病人的研究中 (1987), 发现了很少的证据, 冈恩 (J. Gunn) 等人得到的数字也表明 (1978, 1991), 在上一个 10 年期间, 英国有严重精神障碍罪犯的比例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三、精神障碍和特殊犯罪

犯罪和精神障碍可能独立地变化, 不过它们的分布将是互相重叠的。由于犯罪的终生累积流行率 (cumulative lifetime prevalence) 在男性中是 40% 以上, 女性中是 14%, 所以, 这些人中的 10% 都将接受精神病治疗, 甚至在缺乏因果关系的情况下, 犯罪和精神障碍也经常同时出现。可是, 总体水平关系的明显缺乏, 并没有排除个体水平上有意义的关系; 鉴于精神障碍者和犯罪人的异质性, 某些形式的精神障碍和某些形式的犯罪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

很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暴力犯罪, 这个问题将在下面加以考察。其他犯罪类型的证据是零碎的, 但其中的一些有启发性的发现。例如, 商店行窃与精神障碍明显地没有联系, 但在精神有障碍的少数人中, 抑郁的人却很多。冈恩 (J. Gunn, 1977) 指出, 按照英国法院接收精神病病人的规定, 被判决犯有人身暴力、性犯罪和犯罪性伤害的犯罪人, 有可能被鉴定为有精神障碍。这可能反映了在法律处理中存在的偏向。可是, 泰勒 (I. Taylor) 和冈

恩 (J. Gunn) (1984) 的研究资料支持精神障碍与财产破坏之间的联系, 他们发现 60% 以上被指控或犯有纵火罪或犯罪性伤害的未决犯人显露出精神障碍的征兆, 其中一半的精神障碍是精神病。

第五节 精神障碍和暴力

公众认为, 精神病人是危险的, 福柯 (M. Foucault, 1978) 也坚持这样的观点。早在 19 世纪, 精神病学家们就持这样的观点, 他们引进了“杀人狂” (homicidal monomania) 这样一种解释性虚构症状, 这是一种仅仅在犯罪中表现的精神疾病, 用来解释没有明显原因的严重犯罪。虽然这个概念取代了“悖德狂” (moral insanity) 和“性倒错” (sexual perversion) 的概念, 但很多犯罪是精神障碍的症状的观点, 通过提出其他“单狂”而得以扩展 (参见第三章)。对严重犯罪人中精神疾病的案例研究也助长了精神病学家的一种信念, 即在精神疾病患者中有发生暴力的很大危险; 在年轻成人中突然出现暴力行为是否可能意味着早期的精神病, 这继续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现在的研究对精神障碍和暴力之间存在固有联系的假设提出了异议, 但有时严重的犯罪明显是由精神有障碍的人实施的。精神障碍真实的流行率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令人困惑的, 从几个来源获得的证据表明, 某些精神障碍可能会增加暴力的危险。

一、杀人和精神障碍

暴力一般并不必然地代表有精神障碍, 警方对杀人 (homicide) 的高破案率容许提出一般规律。可是, 国家在杀人记录和精神障碍的法律认定中的差别, 在某些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暴力对诊断的影响效果方面的差别, 使这些资料混淆不清。

最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由哈夫纳 (H. Hafner) 和博克 (W. Boker) 进行的 (1982)。他们对 1955 年至 1964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的 533 件谋杀、谋杀未遂以及过失杀人案件进行分析, 这些案件的犯罪人由于严重的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病、脑器质性障碍、智力落后) 而被免除法律责任。虽然无法取得具有严格可比性的官方犯罪资料, 但作者估计, 精神障碍能解释被判定为严重暴力罪的 2.9% 的案件, 谋杀被害人罪的 5.6% 的案件。精神病学家对 1964 年至 1973 年之间在圣路易斯 (St. Louis) 因谋杀而逮捕的 2000 人的评价产生了一致的结果: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占案件的 0.98%, 情感障碍占 0.4%, 脑器质性障碍占 0.5%。

可是,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 英国杀人犯罪中有 30% ~ 40% 已经被确认为有精神障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 大约有 1/5 判犯有杀人罪的人受到减轻责任的对待。此外, 记录在案的杀人犯中的 7% 左右的人被怀疑犯罪后自杀。被怀疑杀人后自杀的杀人犯的数字在较早的 10 年中减少了大约 1/4。泰勒 (I. Taylor) 和冈恩 (J. Gunn) (1984) 发现, 在伦敦被指控或定为杀人罪的 107 名还押的罪犯中, 1/3 以上的人显示精神障碍的症状 (精神分裂症 9.3%, 情感性精神病 1.9%, 混合型的障碍 26%)。泰勒 (I. Taylor, 1986) 也发现, 在伦敦的死刑犯中, 大多数是谋杀犯, 这些人中的 9% 已被报告显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13% 是抑郁症, 33% 是人格障碍, 这些数字与英国杀人者中发现的变态比率是一致的, 它们表明比通常发现的精神病比率更高。

可是, 由于全国杀人率的变化, 精神障碍者的比例可能使人产生误解。在一项对精神障碍谋杀犯和犯罪后自杀的人进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 科伊德 (J. Coid, 1983) 发现, 全国杀人率和精神障碍杀人比例呈负相关。在各个国家和所有时间, 精神障碍杀人比率似乎是相对稳定的, 每 10 万人中大约 1%。因此, 杀人率的波动可能反映了社会因素对“非病理性”谋杀的影响。这种结果也能解释, 为什么在英国随着总谋杀率的上升, 变态杀人的比例反而下降。因此, 一个更为相关的问题是: 是否特定类型的精神障碍会增加杀人和其他形式暴力的危险。

二、暴力和精神障碍的特定类型

哈夫纳 (H. Hafner) 和博克 (W. Boker) 发现 (1982), 与守法的病人相比, 在暴力性精神障碍群体中, 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多, 情感性精神病人很少, 不过, 这与性别差异也有关系。可是, 他们估计,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严重暴力危险的为 0. 05% (即每 1 万精神分裂症病人中有 5 人可能成为暴力犯), 而情感障碍和智力落后的危险率是 0. 006%。尽管在这些精神障碍中暴力发生率非常低, 但是这表明, 精神分裂症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精神障碍。林奎斯特 (P. Lindqvist) 和阿利贝克 (P. Allebeck) (1990) 在对出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追踪研究中也发现, 暴力犯罪比预期的多 4 倍, 虽然这只局限在 7% 的样本当中。可是, 精神分裂症病人更极端的暴力通常直接指向家庭成员或熟人, 而且异乎寻常的自我残伤 (诸如摘除眼球) 比多人性谋杀 (multilatory murder) 更可能发生。当然也有例外, 如彼得·萨克利夫 (Peter Sutcliffe) 的系列谋杀案。

尽管在这些资料中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但是, 对精神病院中暴力的研究与这样的环境是相关的。英国和加拿大的证据表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精神病院中的暴力已经增加, 这显然是改变入院政策的结果; 尽管这好像与集中增加较年轻的、慢性的和“难管理的”病人有关, 而与具有暴力犯罪史的病人无关。可是, 精神病院中的暴力事件是经常性的, 这些暴力事件通常很少导致严重的伤害。这些事件也是由少数人所做的, 例如, 哈里斯 (G. T. Harris) 和瓦内 (G. W. Varney) 的研究表明 (1986), 在最高警戒度精神病院中, 不到 5% 的常住病人对 74% 的暴力事件负有责任。可是, 精神分裂症病人是否更应该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还不清楚。一些调查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但在哈里斯 (G. T. Harris) 和瓦内 (G. W. Varney) (1986)、詹姆斯 (D. V. James) 等人 (1990) 的研究中, 没有发现这种证据。由于一些研究报告轻微的暴力事件更多由女性所为, 所以, 可能暴力犯罪和在精神病院观察到的轻微暴力事件之间存在质的差异。昆塞 (V. L. Quinsey) 和马圭尔 (A. Maguire) 也发现 (1986), 在最高警戒度精神病院中的伤害行为不能预测随后在社区中的暴力犯罪, 这表明了暴力行为是病人病变的产物, 同样也是精神病院环境的产物。这种观点得到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 这些研究发现, 社会环境中的因素有助于精神病院中的暴力。

可是, 精神分裂症病人不是同质的, 暴力行为似乎更可能在特殊的症状中存在。正如科拉克维斯基 (M. Krakowsky)、沃拉夫科 (J. Volavka) 和布里泽 (D. Brizer) (1986) 指出的那样, 有计划的、成功的暴力与一定程度的心理功能完整相联系, 而不是严重的损伤或紊乱的产物; 精神分裂症病人所进行的暴力行为, 更有可能发生在精神障碍急性发作和活跃期间。妄想的存在似乎是精神病人暴力中最常见的相关因素。普拉南斯基 (K.

Planasky) 和约翰逊 (R. Johnson) 发现 (1977), 在 59 名实施威胁和伤害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9 人声称有杀人的强烈欲望, 7 人声称受到幻觉的指示, 6 名紧张症病人突然进行攻击和处于一种狂怒中, 可是有 39% 的事件与妄想性误解 (delusional misperception) 有关。莫瓦特 (R. R. Mowat, 1966) 发现, 在被送进布洛德穆尔 (Broadmoor) 精神病院的人中, 有 12% 的男性谋杀犯和 3% 的女性谋杀犯有很突出的不贞妄想 (病态妒忌)。可是, 在 1/3 的病例中, 这些病态表现是与精神分裂症有联系的, 它们也与抑郁症和酗酒相联系, 在某些病例中是唯一的症状。

不过, 用精神病症状解释暴力的范围仍然是有问题的。科拉克维斯基 (M. Krakowsky) 等人主张 (1986), “精神病人中的暴力与构成其基础的精神病理学是密切相关的”, 但并非病人所有的暴力行为都能够归因于他们的精神障碍。例如, 精神病院中的暴力事件更经常与有关个人空间或食物的挑衅性事件或争吵有关, 而与精神病症状没有多大关系。可是, 泰勒 (I. Taylor, 1985) 估计, 精神分裂症罪犯 20% 的犯罪行为是由妄想症状和幻觉症状激起的; 进一步的估计认为, 精神分裂症罪犯 26% 的犯罪行为也是如此。尽管变态的信念或知觉对于解释这种案例中的暴力可能是必需的, 不过, 即使理由是充足的, 这样的解释也是罕见的, 因为具有这样经历的病人很少根据变态的信念或知觉行动。即使精神病性信念仍然需要解释, 解释这些信念背景中的暴力行为仍需要参考一般的攻击行为的模式, 也需要参考与一般人口中暴力行为有关的个人、社会 and 情境因素。在这种背景中, 人格很少受到注意, 但布莱克本 (R. Blackburn, 1968c) 发现, 类偏执狂型和非类偏执狂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差异与人格特征有关。豪厄尔斯 (K. Howells, 1982) 也指出, 与妄想性病人的暴力行为有关的归因过程, 就是与更普遍的攻击行为有关的归因过程。康维特 (A. Convit) 等人 (1988) 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预测年轻男性精神病人中伤害行为的因素就是那些在其他人口中预测暴力的因素, 例如, 异常的家庭背景或先前的暴力史。

较早的研究指出, **情感性精神病** (affective psychosis) 的暴力危险可能比精神分裂症小, 但证据与这种看法并不一致。抑郁一直与严重的暴力相联系, 尤其是与杀人相联系, 但这主要发生在女性中, 在“扩大性自杀” (extended suicide) 的情况中, 往往将杀同伴与杀自己联系起来。这在伴随自杀的谋杀案中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哈夫纳 (H. Hafner) 和博克 (W. Boker) 指出 (1982), 在男性中, 抑郁可能实际上减少了暴力行为的危险。可是, 耶萨维格 (J. M. T. Yesavage, 1983), 宾德 (R. L. Binder) 和麦克尼尔 (D. E. McNeil) 发现 (1988), 具有躁狂而不是抑郁的精神障碍的男性病人在住院病人的环境中, 更有可能是狂暴的。另一方面, 柯林斯 (J. J. Collins) 和贝莱 (S. L. Bailey) 发现 (1990b), 在近期增加的男犯中, 控制了人口学因素和难以管理的酗酒因素之后, 心境障碍与表达性暴力 (杀人、强奸、伤害) 没有一致地联系, 但抑郁症状与成人打架斗殴的历史有联系。从可得到的资料中不可能得出清楚的结论。

暴力行为的危险似乎与**智力落后** (mental retardation) 有关, 但这只是在一小部分案件中得到证实。在哈夫纳 (H. Hafner) 和博克 (W. Boker) 的样本中, 智力落后犯罪人在人口统计学因素方面与“正常”的暴力群体很相似, 他们比没有犯罪的病人更有可能具有一个家庭紊乱和反社会行为的历史, 这表明智力落后本身不是暴力行为的原因。虽然智力落后在监狱犯人中并不总是很多 (参见第八章), 但被强制拘押的智力落后犯罪人在住院前和出院后实施性犯罪的比率很高。由于智力落后的诊断依靠社会笨拙以及智力低下, 性

犯罪的高比率或许反映这个群体中缺乏人际交往技能而不是智力缺陷本身。

一些近期的研究涉及暴力行为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虽然攻击行为不包括在 DSM-III-R 关于 PTSD 的标准中,但它指出易激惹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伴随症状,这种精神障碍有时与“无法预测的攻击行为爆发”有关系(美国精神病协会,1987)。索罗什(L. P. Solursh, 1989)描述了越战老兵中的“战斗瘾”(combat addiction)模式,这些具有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战老兵过去曾经多次经历过战斗。这个模式一个主要的特征是记忆中的往事突然重现,或者重新出现体验兴奋或“危急”的恶梦,抑郁情绪周期性波动。在100名越战老兵的 PTSD 样本中有94%存在这个模式,这些人中有97%的人也表现出暴躁和易怒,87%的人有社会回避反应,72%的人是药物滥用者。据报告81%的老兵也有与战斗有关的习惯,诸如持有装满子弹的枪和打猎,究竟有多少殴打人的历史是不清楚的。可是,柯林斯(J. J. Collins)和贝莱(S. L. Bailey)报告(1990a),暴力犯罪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与监狱中1140名男犯样本中的战斗经历没有关系。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因素、难以对付的酗酒和反社会人格障碍之后,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标准的样本的2.3%的人更有可能因表达性暴力被逮捕或监禁。一个相似的模型赞同包括一种或更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这些症状在大多数案例中出现在犯罪行为之前。

在临床知识中,与暴力最有关系的类型是**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可是,允许对这种关系进行概括的证据非常少。一个问题是倾向于把社会越轨行为鉴定为人格障碍,这否定了评估人格异常本身的作用大小的任何可能性。相关的问题是倾向于把人格障碍诊断为一个笼统的类型,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对于在 DSM-III 中定义的不同类型人格障碍之间的犯罪性暴力,似乎没有任何比较。例如,依赖型人格障碍、回避型人格障碍与暴力行为相联系的程度,好像不可能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与暴力行为的联系程度一样。

一些研究已经考察了精神障碍犯罪人中的重新犯罪。由于这些样本已被确认为暴力性的,所以,这项研究只是间接地与对特殊精神障碍暴力行为的不同易感性问题有关;因为这种易感性一直是危险性临床预测中主要关注的对象,所以,这个问题将在第十二章进一步讨论。可是,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人格障碍比精神病带来更大的暴力危险,例如,昆塞(V. L. Quinsey)等人发现(1975),被诊断有人格障碍的最高警戒度病人在释放后重新犯罪的比率,高于被诊断患精神病的最高警戒度病人在释放后重新犯罪的比率,但是,在前一类人中,先前暴力的程度可以预测后来的暴力。与此不同的是,在后来对同一个收容机构病人的研究中发现,诊断不能预测随后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法定的精神病态障碍范畴内,与鉴定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相比,被送进特别医院的病人释放后也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暴力行为,但这种差异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例如,布莱克(D. A. Black)和斯平克斯(P. Spinks)发现(1985),在考虑先前的犯罪行为时,精神病态障碍不能预测暴力性重新犯罪。这些研究结果也含糊地说明此种类型的异质性,以及在分类学上先前犯罪行为的影响。不过,一些根据精神病态的严格标准进行的研究支持精神病态与暴力行为的联系,无论是对罪犯还是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研究中都是如此(参见第九章),黑尔(R. D. Hare)、麦克弗森(L. M. Mcpherson)和福思(A. E. Forth)报告(1988),精神病态罪犯在很多犯罪(包括暴力犯罪)中的重犯率都高于精神正常罪犯。他们支持精神病态者随年龄的增加而“消

失”(burn out)的观点,也支持精神病态者的犯罪活动40岁以后减少的观点

总而言之,除了某些类型的人格障碍以外,在精神病学中确认的主要(精神障碍)类型好像都与暴力倾向没有联系。尽管在精神分裂症中似乎存在较大的暴力行为的危险,尤其是在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中,但必须重复的是,这个类型中只有少数病人是暴力性的,这种障碍本身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发生的情况。研究人员集中于精神障碍特殊的症状或状态比集中于总的诊断类型可能更有利于研究,而且,查明这些因素是怎样与个人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对研究也是有利的。还需要对精神有障碍的未加选择的社区样本进行长期预期研究,这些社区中的精神障碍者没有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注意。

第六节 监禁和心理健康

研究者对罪犯中精神障碍的兴趣,部分地受精神障碍与犯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论问题的影响,部分地受与犯罪人心理健康服务有关的观念的影响,进一步的问题是,长期监禁如何影响罪犯的心理健康。可是,关于监禁影响的研究因刑罚机构和罪犯的异质性而复杂化,因此,任何概括都必须考虑犯罪人类型和管理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监禁的痛苦

刑罚机构是不为人所喜爱的环境,对此几乎不存在异议。在这里,不但物质环境差,而且社会环境也令人不快,通常使人厌烦、感到丢脸、受人剥削,并且常常发生来自其他罪犯、有时是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牛顿(A. Newton, 1980)引用了几项美国的研究,证明监禁是不人道的,对罪犯的健康和安宁有“令人震惊的”(devastating)影响。例如,1973年对州和联邦成年犯监狱的一项调查发现,监狱中杀人发生率大约为1/3,这个比率意味着每10万人中发生74.4起杀人案件,而美国人口中杀人案件的发生率为每10万人中只有9.4起。同性强奸(homosexual rape)也是常见的,虽然沃克(N. Walker, 1983)指出,这种情况在英国监狱很少发生。

在监狱中,暴力危险性最大的人,是那些曾经骚扰或虐待儿童的罪犯,是告密者(向警方告密的人),他们被判决犯有诈骗罪或者不能偿还在监狱中借的债。这说明存在着具有自己“准则”(code)的犯人文化(inmate culture)。社会学家一直特别关心这种“监狱化”(prisonisation)过程,克莱默(D. Clemmer, 1958)把监狱化定义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习俗、社会道德、社会风俗和一般监狱文化的吸收”。这种非正式的亚文化通常被看作是反对监狱的正式组织和监狱目标的,其特征是有强硬的规范、罪犯团结以及对管教人员进行操纵。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种制度是为了应付或中和“监禁的痛苦”而产生的,“监禁的痛苦”是自由、财物和服务、异性关系、自主性和个人安全受到剥夺的结果。在过去的20年间,伤害、集体骚乱和拘押人质事件增加的报道表明,罪犯的个人安全已经明显下降。

监狱化通常是根据拒绝工作人员规范的程度来定义的,但研究没有产生一致的结果。克莱默(D. Clemmer, 1958)认为,监狱化自始至终在增加,但惠勒(S. Wheeler, 1961)在对一个州立少年犯教养院的横断研究中发现,服从工作人员规范的情况随着在监狱服刑时间的长度而变化。在服刑早期和晚期的犯人比服刑中期的犯人更有可能服从工作人员规范。可是,加拉贝迪安(P. G. Garabedian, 1963)得到这种“U型模式”(U-pattern)

的一些证据后发现,这种模式随着采取不同的罪犯角色而变化,就像监狱黑话所确认的一样。例如,“右派帮”(right guys)公开地对抗监狱工作人员,显示出一种U型服从的模式;而“亡命徒”(outlaws)却从监狱工作人员和罪犯中孤立出来,显示出一种线性的监狱化模式。因此,监狱文化对罪犯产生不同的影响。

监狱文化的起源有另外的模式。剥夺模式(deprivation model)把监狱文化看作对监狱组织消极影响的反应,而输入模式(importation model)则认为是对入狱前社会化经历的反应。例如,一些美国监狱已经历过基于以对立的种族分类为基础的帮派冲突(gang conflict),这些冲突是从监狱接收其罪犯的城市地区直接引进的。可是,托马斯(C. W. Thomas, 1977)发现,监狱内经历和入狱前经历影响监狱化,监狱内经历可以解释更多的变化。

可是,监狱化的概念已经受到批评。赞布尔(E. Zamble)和波珀林(F. J. Porporino)(1988)认为,把监狱化看作一种态度因素可能更有用,这种态度因素是和决定对监狱适应的其他因素相结合的。监狱化也忽略了监禁反应中的个别差异。例如,有人假定,监狱化削弱了释放后的适应和社会化,但古德斯坦(L. Goodstein, 1979)指出,“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代表一种与遵从监狱正式文化有关的选择性适应,同样可能导致与释放有关的问题。她发现,机构化最严重的罪犯在释放后的前两个月问题最多,正如假释官员报告的那样,监狱化最严重者(the most prisonized)最容易适应。到第3个月时,这些差异消失了,这表明了直接环境的影响。

监禁中的一些剥夺是监禁中必然发生的结果,但它们可能明显地因监禁制度的性质而得以消除或加强。管理方式好像影响罪犯的行为。例如,戴维斯(W. Davies)和伯吉斯(P. W. Burgess)发现(1988),一个英国监狱报告的违纪率随管理者的特征发生明显的改变。库克(D. Cooke, 1991)提出的证据表明,罪犯暴力随着管理体制因素而变化,如监狱工作人员与罪犯的交流、监狱工作人员的训练、接触探监者、刺激的水平。这些因素可以解释苏格兰监狱的巴林尼(Barlinnie)特别单位中顽固犯(recalcitrant prisoner)暴力行为的减少。这个特点单位是按照治疗社区的模式运行的。

在欧洲和美国,由于监狱人数增加和某些犯罪的刑期长度的增加,监狱人口在过去的30年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个数字与新建监狱的增加不相称,因此,过度拥挤(over crowding)受到特别的关注,它是应激和越轨行为的一种根源。考克斯(V. C. Cox)、保罗斯(P. B. Paulus)和迈凯恩(G. Mc Cain)(1984)对几个美国监狱进行的研究做了总结,表明人口变化与疾病、死亡、违反纪律、自我伤残和自杀企图的比率之间有联系。他们提出,这种影响是由于增加了社会相互作用的需求,是以恐惧、挫折和认知超负荷为中介的,社会密度(人数)比空间密度(每个人的空间)更重要。可是,盖斯(G. G. Gaes, 1985)对这种依赖于总体水平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监狱拥挤研究中获得的结果只有一些是一致的。这些主要与住宿条件对心理功能的影响、疾病诉说和对人身的侵犯有关。邦塔(J. L. Bonta, 1986)也指出,影响因素也可能是过度拥挤的伴随物,例如,更多的陌生人、噪音或较高的气温,这些因素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监狱环境的特征是否非常明显地影响罪犯的行为,仍然是不清楚的。已有人尝试用社会气候(social climate)概念研究组织特性。最流行的测量方法是“矫正机构环境量表”(th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 Scale, CIES)。这个量表评价监狱工作人员

和罪犯对三种假定存在的维度,即关系、个人发展和系统维持(system maintenance)的知觉,每一种维度都由3个因素组成。可是,由于CIES反映个人的变化多于组织的特性,所以已经受到批评。赖特(K. N. Wright, 1985)指出,这种研究的证据缺乏效度。他提出,监狱的社会气候反映在8个方面,即隐私、安全、结构、支持、情绪反馈、社会刺激、活动、自由、罪犯普遍察觉和经历这些方面。他构想了一个调查表,其结构支持这些因素的有效性,并且只受个人变化的中等程度的影响。可是,有人认为,环境对罪犯有不变的和单向性的影响,桑顿(D. Thornton, 1987b)对此假设提出质疑。他主张评估管理体制中罪犯一管理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描述了监禁适应问卷(the Custodial Adjustment Questionnaire)的有效性。这个问卷测量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对罪犯的态度、机构内越轨行为和情绪烦恼,这些因素与个人和管理体制的特征有关系。

研究者认为有问题的监狱环境中的一些方面,在罪犯看来并不一定是很突出的。在一项对英国的长刑犯和短刑犯的研究中,里查兹(B. Richards, 1978)发现,在20个潜在问题中,属于严重问题的是:“想念某人”,“感到正在浪费生命”,“想念社会生活”。这些方面比“感到厌烦”,“愿你有更多的隐私”更重要。赞布尔(E. Zamble)和波珀林(F. J. Porporino)也发现(1988),“想念家庭和朋友”是加拿大罪犯最频繁提到的问题。因此,外部联系的丧失似乎是监狱生活中最严重的剥夺。一些证据表明,在监禁期间保持家庭联系可以减少重新犯罪;尽管人们通常假定,监禁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很多罪犯的家庭要承担经济上的困难和情绪上的磨难,但这似乎主要发生在长刑犯身上。

二、监禁对罪犯心理活动的影响

对监禁的心理影响的研究结果只允许作有限的概括。除了方法论问题和缺乏有控制的纵向研究以外,大多数研究是非理论性的,没有详细指明监禁的哪些方面可能对哪一种人有特殊的影响。例如,除了监禁本身的剥夺外,在认识上对环境控制力的减弱、被打上罪犯的烙印、不定期刑的不确定性等,都会促使罪犯进行思考。这些因素的影响将依赖于个人的状况而定,监禁不会对所有的人都产生同样的影响。

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哪些因素影响易受侵害性(vulnerability),但监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似乎更有可能反映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轶事性报道一直就很注意罪犯中急性精神病反应(“监狱精神病”),哈泽(N. Heather, 1977)发现,苏格兰的终生监禁犯样本中,有1/5的人在妄想—症状—状态调查表(the Delusion-Symptoms-States Inventory)中显示出精神病症状,59%的人描述了临床上有意义的症状。泰勒(I. Taylor, 1986)也发现,在伦敦的终生监禁犯记录中,报告了很高的精神病性障碍(包括精神病)的发生率。可是,拉希(W. Rasch, 1981)在柏林一个类似的样本中没有发现精神病症状,虽然他指出样本中一半的人在心理测验中是“有障碍的”。情境因素对精神障碍的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是不清楚的,但阿伯莱德—弗洛里茨(J. Arboleda-Flórez, 1980)描述了具有与犯罪有关症状的杀人犯的4种情况,例如,对被害人的幻觉,在事突然闪现和抑郁。他指出这些症状是心因性精神病的表现,当然现在可以被确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对罪犯的横断研究没有普遍发现精神病障碍的高流行率;相关的一致性结果是,有较高程度的焦虑和抑郁。可是,这通常在服刑的早期阶段较高。例如,哈泽(N. Heather, 1977)发现,精神病症状和监禁时间的长度呈负相关,这反映了监禁初期的影响。麦肯齐(D. L.

Mackenzie)和古德斯坦(L. Goodstein)(1985)也发现长刑犯在服刑的初期比后期自尊更低,更加焦虑和抑郁,不过有关自尊的研究结果与其他人的研究不一致。在对加拿大罪犯的16个月的纵向研究中,赞布尔(E. Zamble)和波珀林(F. J. Porporino)(1988)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心理正常的罪犯和精神病人最初自我报告焦虑、抑郁和绝望的水平在监禁的整个时间显著地下降。虽然有时假定这些看法反映长期监禁的影响,但它们同样反映了对监禁本身的反应。例如,桑顿(D. Thornton, 1987b)观察到,在小的拘留中心受培训者前两周比后来的抑郁情绪水平更高。由于焦虑水平也随着释放的接近而增加,因此,存在与监狱化研究中的U形模式平行的模式。

自杀的危险在监禁的早期阶段也增加。已经有人报告,美国罪犯比普通人口中的自杀率高50%。在英国,罪犯的自杀率比普通人高4倍。1979年,一项对美国看守所的全国性调查发现,罪犯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高16倍。这些研究结果必须小心对待,因为罪犯不是在人口统计意义上与整个人口比较。不过,杜利(E. Dooley, 1990)指出,在1972年到1987年之间,监狱的自杀率几乎增加了两倍。最高的自杀率存在于未决犯、杀人者和终生监禁罪犯中;大多数自杀发生在服刑的第一年内。海斯(L. M. Hayes, 1983)发现,监狱罪犯在监禁后的第一天(24小时)特别脆弱,有很大自杀危险的人是因在公共场所酗酒而被捕的年轻单身男性。监狱或看守所90%以上成功的自杀是采用上吊这种方式。有时自残可能代表自杀未遂,但这种行为在监狱犯人中好像是流行的。牛顿(A. Newton, 1980)引用了对一所加拿大犯罪少女教养所的研究,这个研究发现,86%的罪犯已经进行了“切割行为”(carving),这显然是认同犯人文化的一种手段。可是,自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例如,紧张解除或寻求刺激,它也存在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标准中。

发生在监禁初期的明显失调可能也与个人的重新评价有关系,因为转变和自我改善的动机在新入监的长刑犯中是最强烈的。可是,这种观点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赞布尔(E. Zamble)和波珀林(F. J. Porporino)(1988)也发现一些证据,表明转变动机的降低是与重新犯罪的较大可能性相联系的。他们指出,矫正计划应当利用最初的动机进行,而不是等到罪犯已经适应了监禁管理制度才矫正。

对处于不同服刑阶段长刑犯的横断研究,很少发现心理衰退(psychological deterioration)的证据。贝尼斯特(P. A. Banister)等人发现(1973),一些人知觉运动速度下降,这不是年龄的作用;但智力测验作业没有受到影响。后者已经为拉希(W. Rasch, 1981)的研究所证实。可是,已经有人报告罪犯的一些人格的改变,自我指向性敌意(self-directed hostility)显著地增加,内倾性也增加。萨普斯福德(R. Sapsford, 1983)指出,改变很可能在动机和态度中发现。他发现罪犯对外而世界的兴趣仍然没有减少,但卷入减少了。一些罪犯变得更适应监禁环境,情感淡漠没有普遍增加。可是,未来时间观念减弱,虽然兰多(S. F. Landau, 1976)在一个短期的机构化研究中发现,罪犯的未来时间观念随着释放的接近而改变。

证据表明,监禁最初对情绪健康有削弱作用,但这是短暂的。很多长刑犯似乎采用使他们能重新认识或重新塑造其环境的应付策略,任何对动机和社会行为机能障碍的影响好像都受到监狱情境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是,有害的影响可能被局限于极端的环境剥夺或脆弱的个人,目前还缺乏罪犯与环境相互作用资料。此外,没有研究发现罪犯的积极转变。赞布尔(E. Zamble)和波珀林(F. J. Porporino)(1988)发现,很

多罪犯报告的历史表明，他们在监禁前应付技能的不足，低水平的应付资源是与松散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犯罪性相联系的。监狱中的应付是这些方面的继续，虽然对应付的功效在监禁期间评价较高，但这反映了更具有结构性的环境而不是变化的环境。对很多罪犯来说，他们的应付模式在释放之前仅仅“被冻结了”。

第十一章 性变态与性犯罪

第一节 引言

性活动随着时间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改变,但是,作为社会单位,家庭的作用规定了已婚夫妇之间的异性性行为的规范,有组织的宗教和法律设法使这种规范生效。因此,“性犯罪”(sexual offense)的完整类型不仅包括对非自愿被害人的强迫和剥削,而且也包括无被害人犯罪,在一些国家还包括自愿结婚的夫妻之间的某些行为。不过,这一章主要论述有被害人的性行为,例如强奸和儿童性骚扰(child molestation)。

直到20世纪60年代,犯罪学只是断断续续地注意到性犯罪。加格诺(J. H. Gagnon, 1974)注意到,与少年犯罪对亚文化理论或越轨社会学提供的资料相比,性犯罪为自己提供资料不容易,社会学家集中于越轨行为的集体形式,如同性恋社区或卖淫。涉及被害人的犯罪更多地受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由于男女平等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强奸是文化的产物,是暴力行为而不是性犯罪,因此,研究者对性犯罪的兴趣急剧上升。可是,关于有被害人的性行为的心理学研究也在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于干预方法感兴趣的结果。在考察性犯罪以前,有必要对性变态和性犯罪加以区分。

第二节 性变态

对性犯罪和性变态的确认依赖于变化着的社会标准。20世纪60年代期间,一些人使同性恋行为合法化,继之而来的精神病学中的“非病态化”(depathologising)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依赖;正如克里斯蒂—布朗(J. R. W. Christie—brown, 1983)指出的那样,关于“恋态的”性行为界线的波动,表明了定义性变态的社会基础而不是医学基础。不过,一些性兴趣被认为是心理性功能障碍以及社会性功能障碍。

一、性倒错

性变态传统上一直是根据性满足的对象、方式、频率或者环境来描述的;变态被认为违反了成熟的、异性伴侣之间性交的标准。在19世纪,精神病学重新把“违背自然的”性行为描述为“倒错”(perversion),可是,在美国精神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DSM—III—R, 1987)中,“性倒错”(paraphilia)这一术语偏重于强调这种变态(倒错, para)在于它对个人的吸引(癖好, philia)。性倒错不同于性功能障碍(sexual dysfunction),它被看成是反复出现的性冲动,是对非人的对象的幻想唤起,使自己、自己的配偶、儿童或其他不同意的人遭受痛苦或蒙受耻辱。在这种冲动或幻想至少已经体验6个

月时才诊断为性倒错,并且这个人已经采取了行动,或者因为这些异常的冲动和幻想而感到抑郁。表11.1中概括了性倒错的主要形式,但另外还有色情电话癖(telephone scatologia, 淫荡)、恋尸癖(necrophilia, 尸体)、恋兽癖(zoophilia, 动物)、嗜粪癖(coprophilia, 粪便)和灌肠癖(klismaphilia, 灌肠剂)。强奸没有被认定为性倒错,但性施虐狂包括了性倒错性强奸(paraphilic rape, 强奸癖或偏爱癖)和色情杀人(lust murder)。艾贝尔(G. G. Abel)和鲁利尤(J. L. Rouleau)也认为(1990),更广泛的性倒错应当包括强奸,因为强奸犯经常报告周期性强迫冲动和他们进行的强奸幻想。

表 11.1 性倒错(材料来自 DSM-III-R)

类型	特征
露阴癖	对陌生人显露自己的生殖器,有时伴有手淫;没有进一步的性行为。
恋物癖	使用没有生命的物体,诸如女性的内衣或靴子,在拿着、磨擦或者闻着这些物体时经常进行手淫,或者有时通过穿戴配偶的衣物满足变态的需求。
摩擦癖	触摸和摩擦不同意的人,通常是在拥挤的地方,由接触而产生性兴奋。
恋童癖	由16岁或16岁以上的人对青春期前的儿童进行的性活动,年龄至少比儿童大5岁;性活动可能局限于触摸或抚弄,但也可能涉及吮吸阴茎,舔阴和进入阴道或肛门。
性受虐狂	接受由性伴侣进行的使其受辱、被打、捆绑,或者以其他方式受苦的行为,或自我施加的痛苦引起性兴奋。
性施虐狂	被害人心理上或肉体的痛苦引起性兴奋的行为,包括控制或酷刑。
恋异性物癖	穿女性服装,常常完全像一个妇女,不过,基本偏好是异性的;与易性癖(transsexualism)不同,这种人想获得异性的特征,并且不是由穿异性服装产生性兴奋。
窥淫癖	观看未料想到的赤身露体的、正在脱衣服的或进行性活动的人。

正如DSM-III-R中所指出的那样,性倒错性色情作品和用品有很大商业市场,这表明某些性倒错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也许是双方同意的夫妻之间“性游戏”的一部分。由女性和男性志愿者样本报告的性幻想也表明,性幻想在性活动期间被广泛地使用,其中包括很多可以称为性倒错的事情。它们与一般的幻想能力和积极的性态度之间的联系意味着,“越轨的”幻想本身不是一种精神病理学的症状。功能障碍大多在于在被害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性行为所产生的情绪和社会后果,也常常在于对倒错者本人产生的情绪和社会后果。因此,是否大多数人都接受莫尼(J. Money, 1990)提出的这种不妥协的还原论,是值得怀疑的,莫尼主张所有的性倒错都是“大脑疾病”。

DSM-III-R分类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术语表,但它源于一个有关不相关联的综合征的错误概念。调查表明,多重性倒错(multiple paraphilias)可能是屡见不鲜的,艾贝尔(G. G. Abel)和鲁利尤(J. L. Rouleau)指出(1990),性倒错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越轨性行为控制缺陷,而不是特异性的功能障碍。

二、性唤起的评定

性唤起是一个综合性的心理学概念,它表示作为性行为准备的主观的和心理上的变化。

在第十三章讨论对性犯罪人的临床评定,但由于在越轨性行为的行为研究中,性唤起的评定是主要的,所以在这里进行描述。为了评定性变态,已经发展了几个自我报告式的量度,但很多临床医师认为应当谨慎对待犯罪人对其变态行为的解释,因为犯罪人为了否认、不愿泄露与刑事定罪或继续监禁有关的事件,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能力区别控制这种变态行为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解释可能是歪曲的。为此,已经发展了有关变态性唤起(deviant sexual arousal)的更为客观的评价。

对体验过的性兴奋的自我评定提供了一个唤起的指标,最广泛地使用的量度是**阴茎体积描记器**(penile plethysmography, PPG),它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获得的对有关性刺激的性器官充血肿胀的记录。这种评定的基本原理是:(1)性唤起是导致性行为链条中一个关键的组成成分;(2)阴茎的勃起是男性性唤起中最可靠和独特的指标;(3)对某种特别类型的人或与其他人有关活动较强烈的唤起,表明了对那种类型的**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阴茎体积描记器早期的大多数发展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他利用一个海绵橡胶密封的玻璃圆柱体,阴茎被插入这个圆柱体内,勃起反应引起的圆柱体空气容量的变化被记录下来。这种仪器可能是最精确的,但更普通的方法是通过一种拉紧的测量仪器对阴茎表面变化的测量,这种测量仪器可能是一种象卡尺一样的金属仪器,也可能是一个充满水银的环绕阴茎的橡胶管。这种仪器记录了阴茎从软弱无力扩展到充分勃起时抵抗微弱电流过程中的变化,扩大了的输出量是一种连续的多种波动描记器的记录。

性刺激可以是幻灯片。例如在恋童癖的评定中,可以播放在年龄和性别方面不同的裸体者的幻灯片;或者在评定性攻击时,放映有关彼此同意的性交、强奸以及非性的暴力行为的短幻灯片。尽管影视材料可以引起最强烈的反应,但是由于在得到有关色情描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色情作品的利用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已经使很多临床医师依靠录音磁带的描述,这种磁带容易制作,并且可根据个别患者的情况进行改编。虽然一些研究者主张记录其他的变化,但通常记录的反应是充分勃起的百分比。评价中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男性在实验条件下不能获得充血肿大,阴茎勃起反应部分地受个人意愿的控制。因此,一些患者试图通过注意移动或想象转移(imaginal manoeuvres)抑制对越轨刺激的反应。可是,临床医生常常利用这一点,通过指示患者设法抑制勃起,然后对患者的自我控制进行评价。

尽管阴茎体积描记器与已知的越轨兴趣有很高的相关,但是它仅仅评定性唤起的一种成分,而没有评定性行为本身;在鉴定和监测被充分激起的患者性唤起变化的目标中,阴茎体积描记器可能是最有用的。还没有批准可以把阴茎体积描记器用作一个“性测谎仪”(sexual lie detector),或者用来预测危险性,因为它的预测功用还没有明确地得到证实,最近有一些关于其功用限制的争论。虽然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在恋童癖兴趣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的测量,但是,其辨别强奸犯能力的证据现在还是有问题的。霍尔(G. C. N. Hall)、普罗克特(W. C. Proctor)和尼尔森(G. M. Nelson)发现(1988),阴茎体积描记器对恋童癖刺激的反应没有把伤害成年人与侵犯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人区别开;昆塞(V. L. Quinsey)和劳斯(D. R. Laws)认为(1990),这是一个特异反应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反映了刺激材料的问题。不过,由西蒙(W. T. Simon)和斯考滕(P. G. W. Schouten)(1991)所做的评论强调,在明确证实阴茎体积描记器的效度和临床功用之前,仍然存在很多理论和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性犯罪和性犯罪人

性犯罪 (sexual offence) 主要通过力量的使用、年龄的悬殊、对亲密关系的侵犯和对公共秩序的侵害来定义。性犯罪与性变态 (sexual deviation) 的临床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不是所有的性倒错行为都是非法的, 也不是所有的性犯罪都是性倒错。例如, 用儿童性骚扰或性虐待这些概念描述的反社会行为, 并不必然是恋童癖的标志, 而“性侵害” (sexual assault) 被广泛地用于包括涉及非自愿被害人的行为, 性侵害不是一种特殊的变态。此外, 一些性犯罪可能不会出现在官方统计资料的标题下 (表 11.2)。例如, 打“淫秽”电话 (色情电话癖) 可能受到电信法令的指责, 或作为盗窃 (电) 的行为。猥亵性暴露 (裸露癖) 可能受到流浪法 (the Vagrancy Act) 的处理, 或者受到违反公共行为准则的地方法规的处理; 而“偷看的汤姆”的活动 (窥淫癖) 可能作为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受到指控。尽管涉及被害人的更严重的行为在特定条件下是性犯罪, 但是没有性接触的性犯罪的影响, 并不总是轻微的。例如, 打淫秽电话可引起收听者严重的抑郁, 因为这种电话可能使人屏息静听 (“沉重的呼吸”) 或受到言语的滥用和威胁。

法律上的性犯罪定义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有差别, 在 19 世纪期间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 强奸一般被定义为“强迫地、违背其意愿地与妇女发生两性关系”, 可某些国家却包括了阴道性交以外的性行为; 而在美国和加拿大, 在一个单一的法律标题下包括了所有的性侵害形式。查佩尔 (D. Chappell, 1989) 指出, 传统的强奸概念常常通过强调缺乏同意而不是使用力量加以解释, 要求起诉方证实被害人抵抗。这已经是男女平等主义

表 11.2 英格兰和威尔士 1979 年和 1988 年由警方记录在案的应报告性犯罪

犯罪类型	犯罪 (1979 年)	犯罪 (1988 年)	百分率变化
鸡奸罪	632	951	+50.5
对男性的猥亵侵害行为	2385	2512	+5.3
男性之间的猥亵行为	1333	1306	-2.0
强奸	1170	2855	+144.0
对女性猥亵侵害行为	11834	14112	+19.0
与 13 岁以下女孩非法性交	248	283	+14.1
与 16 岁以下女孩非法性交	3558	2552	-28.3
乱伦罪	334	516	+54.5
介绍卖淫	107	201	+87.9
诱拐罪	91	277	+204.4
重婚罪	151	93	-38.4
严重猥亵儿童罪	(没有得到资料)	871	-
合计	21843	26529	+21.5

资料来源: 这些信息是根据 1988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统计中出现的资料收集来的 (英国内政部, 1989),

并且得到伦敦皇家文书局控制者的准许加以改编。

者批评的一个靶子。在英国，婚内强奸也只是最近才被法律上认定为犯罪。

一、发生率和流行率

性犯罪只是官方记录的犯罪中的一小部分。1988年，性犯罪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应报告罪的0.7%，被判刑的犯罪人不到2%。过去的30年间，虽然所有国家的性犯罪都已经上升，但增加的比率还是不如总体犯罪的上升率，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强奸。在20世纪60年代，英格兰的性犯罪上升，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又下降，所以1983年的性犯罪总数确实低于1963年的犯罪数。表11.2表明，1988年的性犯罪总数比前10年的犯罪数大约高22%，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有的犯罪总数增加了43%。可是，除了记录在案的诱拐增加1倍（这种犯罪仍然不多）以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强奸犯罪的增加，强奸案从1963年的422起增加了几乎6倍。

可是，由于性犯罪中的被害人可能很少报告性犯罪，所以官方统计的性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犯罪低估了真实的流行率。在一些案件中，这可能反映了这种犯罪的轻微性质，可是，因为被害人太年轻、受到犯罪人的恐吓、犯罪人是亲属，或者因为向刑事司法人员报告这种犯罪行为可能引起“指责被害人”的压力，所以，严重的性侵害可能没有得到举报。1985年，英格兰强奸统计数字的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警方处理强奸被害人程序的变化，这种变化鼓励更多的被害人站出来揭露犯罪人的暴行。即使如此，1988年英国的犯罪调查估计，被警方记录在案的强奸和猥亵侵害行为不到1/5；在警方已知的性犯罪中，只有10%左右的案件最终被定罪。

被害调查也可能估计不足，因为这种调查排除了年幼的儿童；由于样本、调查方法和性犯罪定义方面的差别，导致了性犯罪流行率的广泛差别。英国成年妇女报告强奸或强奸未遂经历的比例是从9%到44%，而美国女学生全国样本中有28%报告了这样的经历。儿童性虐待经历的数字同样是多变的。芬克霍（D. Finkelher, 1986）指出，在北美，估计女童性虐待在6%到62%之间，男童性虐待从3%至31%。其他性犯罪很少受到注意，但皮尔斯（K. Pease, 1985）从英国犯罪调查资料估计，10%拥有私人电话的妇女曾经接到过淫秽电话。

自我报告的资料表明的被害率比官方资料更高。在科斯（M. P. Koss）等人（1987）的学生样本中，8%的男子承认强奸或强奸未遂；而在一个匿名的调查中，被监禁的强奸犯和儿童性骚扰者承认，他们的性犯罪比其曾经被逮捕的犯罪多2到5倍。艾贝尔（G. G. Abel）和鲁利尤（J. L. Rouleau）发现（1990），一个包括561名性变态者的志愿门诊样本承认，他们的性倒错行为总共是291737件，涉及的被害人是195407人。这些性变态者绝大部分是裸露癖、摩擦癖或窥淫癖，126名强奸犯报告的强奸案总共是907起。

大量的被害并没有受到官方注意。因此，大多数研究所依据的被定罪样本的代表性是未知的：关于性犯罪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概括也是推测性的。艾米尔（M. Amir, 1971）发现，1958年和1960年费城逮捕的大多数强奸犯是年轻人、黑人、未婚者，并且来自内城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可是，艾贝尔（G. G. Abel）和鲁利尤（J. L. Rouleau）（1990）对性变态志愿者的考察却发现，性变态者与一般人口在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教育方面是相似的。艾德勒（C. Adler, 1985）也发现，在一个社区样本中（这些人不可能是随机样本），自我报告的性攻击与家庭阶级、教育成就或职业声望是无关的。

官方的资料强调,性犯罪人主要是男性,女性被定罪的不到2%。女性犯罪中涉及的被害人很多是儿童,在很多性犯罪案件中,妇女因与男子共同作案而受到指控。与财产犯罪人相比较,更大比例的性犯罪人是21岁以上的人。可是,性犯罪人的犯罪生涯一半以上可能始于青少年期,青少年可能要对1/3以上的儿童性虐待负责。因此,对这个年龄组的犯罪人应给予更多的注意。

二、累犯和犯罪性

早期的研究表明,已判刑的性犯罪人继续实施性犯罪的比率相对较低。苏斯尔(K. L. Soothill)和吉本斯(T. C. N. Gibbens)(1978)对此提出质疑,他们指出,追踪3~5年时间太短。他们在英国对性犯罪人所做的一个长时间追踪研究中发现,很多人在几年以后重新犯罪,几乎1/4的人到第22年结束时又重新犯罪。在挪威,对性犯罪人的9至13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大约1/5的人又有进一步的性犯罪。强奸犯的累犯率最高(22%),儿童性骚扰者的累犯率最低(10%)。可是,最近的评述发现,关于性犯罪人重新犯罪的报告中差别很大。虽然有些证据表明,同性恋童癖者比乱伦犯罪人更有可能重新犯罪,但目前的概括还没有普遍得到证实。

根据已经获得的有关多重性倒错的证据,可以认为性犯罪人是实施多种性犯罪的“多面手”(generalists)。可是,证据似乎支持专门化的观点。在一项对成年人和青少年犯罪人的临床研究中,格罗思(A. N. Groth, 1977)发现了被害人和犯罪类型的连续性;格伦菲尔德(B. Grunfeld)和诺雷克(K. Noreik)(1986)观察到进一步的性犯罪与最初的性犯罪之间存在相似的倾向。霍尔(G. C. N. Hall)和普罗克特(W. C. Proctor)(1989)也发现专门化的证据。从国立精神病院释放的“性精神病态者”中,先前因对成人进行性犯罪而被逮捕的事实,可以预测后来类似的犯罪,而由于对儿童犯罪被逮捕的事实,可以预测后来的儿童犯罪。

不过,性犯罪可能与更普遍的犯罪倾向有关。苏斯尔(K. L. Soothill)、韦(C. Way)和吉本斯(T. C. N. Gibbens)(1980)在其研究中,对1961年英国因强奸罪被宣判有罪和被宣判无罪的犯罪人的生涯进行了比较,这两组人非常相似。一半以上的人先前和后来都犯有刑事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突出的。格伦菲尔德(B. Grunfeld)和诺雷克(K. Noreck)(1986)同样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一半的强奸犯以前曾被定罪。霍尔(G. C. N. Hall)和普罗克特(W. C. Proctor)也发现(1989),在被监禁的样本中先前对成人进行性犯罪的事实可以预测后来的非性犯罪,包括暴力犯罪,但是,先前对儿童的犯罪不是这样。强奸犯的犯罪似乎常常与一般的犯罪性有关。

第四节 性越轨的理论

对越轨性行为的解释不仅要对其起源和持久性加以说明,而且还应当对这些越轨兴趣起作用的条件进行解释。由于性越轨表现为几种形式,因此没有单一的理论可以解释其所有方面,不过,有四种观点可以构成当前概念的基础。

一、生物学观点

一个流行的信念是性越轨行为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性驱力”。可是，尽管某些性唤起和性高潮的成分受到激素和生理反射的控制，但是作为一种生物力量的性“驱力”或“力比多”是一种错误的虚构。循环型激素(circulating hormones)对于雄性动物性行为的产生是必要的，但对于性行为的保持是不必要的。人们普遍同意，人类的性唤起、性行为(sexual performance)和性别认同极大地依赖于学习和情境的因素。不过，由于生殖主要依赖于进化的作用，所以遗传对学习的制约作用是不清楚的。昆塞(V. L. Quinsey, 1984, 1986)指出，一些性刺激和性反应类型因其进化的意义为学习作好了准备。例如，年轻的外表是与可进行生育的女性相联系的，成年男性对女性特征的性反应伴随着一个年龄递增度(age gradient)，他们对青春期前的女孩表现出一定的性反应。因此，在某种条件下，由于儿童处于有准备的学习状态，他们可能成为性兴趣的一个焦点。

昆塞(V. L. Quinsey, 1984)也指出，动物研究表明了攻击行为和性活动神经中枢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性暴力也许由于在进化的历史中使用暴力交配的遗传优势而更容易获得。另一方面，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1990 a)利用同样的证据表明，男性有一种本能的性攻击倾向，年轻男性必须学会抑制。可是，这种观点忽视了愤怒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之间的区别，工具性攻击不需要特殊的神经机制。此外，愤怒的自动反应模式和性唤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勃起和性高潮受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可能与愤怒的紧张状态不一致。

二、心理动力学观点

弗洛伊德最初把性变态看作儿童期性欲的继续，但后来他强调性变态在避免阉割焦虑中的防卫功能。因此心理动力学理论用未解决的伊底帕斯冲突和向早期的固着点倒退来解释性变态。由于母亲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男孩可能不认同父亲，而认同母亲。可是，乱伦欲望并不必然地会被放弃的，持久的阉割焦虑可能限制正常的异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性恋童癖代表反向的自恋，寻求不成熟的性伴侣的犯罪人把不成熟的性伴侣看作象自己一样的人，对待他们就像希望母亲曾经对待自己一样。将敌意转向妇女的强奸犯拥有一种对其母亲的矛盾情绪，显示出在压力的控制下肛门期—施虐型倒退(anal-sadistic regression)。而且，在性施虐狂中，妇女的堕落意味着反抗乱伦欲望的反应形成，肛门期固着(anal fixation)可以说明鸡奸罪与施虐性侵害(sadistic assault)之间的联系。

更近的解释集中于自我功能和人际目标。例如，变态的幻想被看作防卫性认知结构，这种防卫性认知结构代表变态者试图通过重演(re-enactment)¹或与攻击者自居来控制儿童期的创伤，也可能涉及象征性报复。格罗思(A. N. Groth)和伯吉斯(A. W. Burgess)(1977 a)强调越轨性行为中的非性欲动机，例如，把强奸看作一种愤怒的表达或者看作对权力和控制的需要。

1. 重演(re-enactment)是指对早年生活中经历过的情感、行为等的重新体验。——校注

三、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家也强调幻想和避免异性恋焦虑 (heterosexual anxiety) 的作用, 但他们更重视性唤起对不恰当刺激的依恋, 也更重视没有获得异性社交技能和异性恋技能。加格诺 (J. H. Gagnon, 1974) 概括了社会认知学习观点, 他指出, 对实现传统异性恋目标的方法的学习,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 这种偶然性包含着模糊性和错误的机会。他还强调, 两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依赖于很多非两性的社会规则, 并根据包含一些非两性因素的性脚本 (sexual script) 解释不良性行为。尽管这种观点强调认知的作用, 但是, 很多学习理论借助“刺激—反应”中介作用进行解释, 而不是借助认知结构进行解释。

麦圭尔 (R. J. McGuire), 卡里希尔 (J. M. Carlisle) 和杨 (B. G. Young) (1965) 提出一个性变态的经典条件反射模式。他们指出, 最初的唤起经历后来会引起手淫幻想, 而特殊的线索通过将性唤起和性高潮相结合产生性诱发力。可是, 这个模式解释不了为什么只有某些刺激引起性倒错的现象。劳斯 (D. R. Laws) 和马歇尔 (W. M. Marshall) (1990) 对这个理论进行详尽阐述, 他们提出, 某种刺激通过其进化相关性 (evolutionary relevance) 成为条件刺激, 为性唤起作好充分准备, 幻想的行为通过不同的强化和惩罚过程进化为越轨行为, 幻想的行为也通过观察到的越轨模式和象征性越轨模式进化为越轨行为。

有证据表明, 性唤起可能形成条件反射。可是, 尽管条件反射机制似乎能够解释越轨兴趣的加强, 但是它们不能解释这些越轨兴趣的起源。这一模式暗含着任何预备性刺激 (prepared stimulus) 的最初经历和用它进行手淫幻想都是偶然的, 人们同样可能获得变态的条件性唤起。可是, 这个观点没有解释对变态幻想的选择。例如, 社会学习理论预测, 这些行为可能会因为受到自我惩罚而被阻止。此外, 这个模式没有恰当地说明把幻想变为外显行为的情况。

非两性关系方面的兴趣已经集中在异性社交技能 (heterosocial skills)。由于这些技能对于接近同龄伴侣以及建立关系是必需的, 缺乏这些技能可能导致对越轨吸引的负强化, 这种负强化可能很少激起焦虑; 如果没有受到惩罚, 也会引起正强化。豪厄尔斯 (K. Howells, 1981) 也指出, 社会认知与越轨兴趣是相关的, 但将变态性兴趣与广泛的社会认知模式联系起来的尝试, 只是近期才进行的。可是, 脱离在童年早期建立的发展性社会期待和自我调节技能来理解在青春期迅速获得性兴趣、性技能和信念的现象, 似乎是不可能的。马歇尔发展了这种观点, 他认为, 由于排斥性父母互动或者暴力性父母互动而造成的技能缺陷, 性犯罪人更容易受越轨性反应 (deviant sexual reaction) 的伤害。他强调, 没有发展起依恋联系和亲昵行为技能, 可能使一些男性用不恰当的两性相互作用方式寻求亲昵关系, 这也许可以根据赫希 (T. Hirschi) 的控制理论来解释, 在使其他人受害的越轨兴趣的因素范围内, 可能缺乏广泛的社会联系的约束。

四、社会文化理论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 在暴力性行为 and 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性行为的流行率方面, 存在着广泛的文化间差异, 这表明文化因素在促进这样的行为中起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 20 年间, 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发展了这种观点。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强奸方面, 男

女平等主义者极力鼓吹这样的观点,认为强奸是男女之间在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一种表达。正如布朗米勒(S. Brownmiller, 1975)很有说服力的陈述一样,强奸是“一种所有男人通过有意识恐吓使所有妇女保持在一种恐惧状态的过程”。根据这种观点,强奸是一种暴力犯罪,是由那种与权力、统治和优越感相联系的传统男子气引起的;尽管人们没有公开将这种传统合法化,但是却默认这种传统,把它作为使妇女处于一种从属角色的手段。

由于家庭暴力常常伴随着“过于伤感和情绪性感染力”,这种观点已经导致激烈的政治争论,引起这样一些观点,家庭暴力是“……所有男人使所有妇女处于恐惧状态中”或者“正常的男性社会化足以引起”性攻击。必须认为,这些观点是夸张性的。不过,有一些实证材料支持强奸因文化支持的态度受到鼓励的观点,下面对此加以考察。

第五节 露阴癖

在不恰当的社会环境中暴露男性生殖器是最常见的性犯罪之一,但对这种犯罪的理解仍然较差。虽然某些男性只在儿童面前暴露性器官,但露阴癖²通常是男性在各种年龄的妇女面前的一种行为。暴露者在显露生殖器时可能有勃起和手淫,但这是可以改变的,性满足可能来源于暴露行为后的幻想。究竟其直接意图是使人惊愕还是引起注意,目前都不清楚。但是它通常是一种非接触性行为,不可能是伤害的前奏。

不过,一些临床医师已经指出,暴露者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伤害性性犯罪(assault sexual crime)。鲁思(G. Rooth, 1973)对至少有两年暴露史的露阴癖者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但其他人报告说,1/4的露阴者可能曾参与强奸。弗洛伊德也报告露阴癖与很多其他变态行为一同出现,几乎1/3的露阴癖者承认自己也有窥淫癖或摩擦癖。鲁思(G. Rooth, 1973)也发现类似的结果,他提出露阴癖与恋童癖有特殊的联系。迈尔斯(R. G. Myers)和贝拉赫(E. F. Berah, 1983)通过对露阴癖者和恋童癖者进行比较来考察这种可能性。露阴癖者明显地不同于恋童癖者,他们有更好的父母关系,更稳定和成功的教育和工作史,在其犯罪活动期间很少喝酒。作者认为这两种人是有区别的。与此不同的是,弗洛—亨利(P. Flor-Henry)等人报告(1991),露阴癖者和恋童癖者都显示出相似的脑电图异常,他们优势半球的脑电波不稳定,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关系有调节障碍。他们指出,这种异常可能是性变态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性变态可能和那种与性高潮反应有联系的变态思维过程有关。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的一项评述中,布莱尔(C. D. Blair)和兰扬(R. I. Lanyon)发现(1981),露阴癖者与没有变态的对照组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推测性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露阴癖者的袭击与成年早期的紧张有联系;露阴癖者几乎没有教育上的缺陷;大多数成年露阴癖者结了婚,不过,他们很少有满意的性关系。与其他的性犯罪人比较,例如性侵害者、强奸犯或恋童癖者,露阴癖者很少出现心理或社会问题。可是,布莱尔(C. D. Blair)和兰扬(R. I. Lanyon)发现(1981),露阴癖者胆怯、缺乏社会技能,也发现他们可能会因为那些与性无关的犯罪而被定罪。

对露阴癖的病因还没有满意的理论。心理动力学的学者把它看作一种对阉割焦虑的否

2. 露阴癖(exhibitionism)又译为“裸露癖”、“暴露癖”等。——译注

认,看作一种“神秘的”姿势,这种姿势的动机是抑制那些指向母亲的禁止性冲动(forbidden urge)。一些行为主义者指出,这种行为可能起源于童年期父母对儿童生殖器暴露的强化,异性恋焦虑的发展和回避的发展会促进这种行为,因此,要对这种变态行为进行负强化。尽管研究资料不足以支持任何理论,但布莱尔(C. D. Blair)和兰扬(R. I. Lanyon)(1981)指出,幻想在保持这种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幻想必须是治疗的一个目标。

第六节 性攻击

大多数性侵害(sexual assault)都是试图触摸或干扰被害人,但性攻击(sexual aggression)意味着使用威胁或暴力在性行为中得到依从,或者意味着在性唤起情况下进行攻击行为。强奸会随着社会背景和暴力卷入的程度而变化。在一半左右的强奸案中,被害人都是陌生人,但也有很多涉及熟人强奸或者“约会”强奸。有人发现,对“闪电式”强奸和“欺诈性”强奸进行深入地辨别有一些效用,“闪电式”强奸(blitz rape)通常是对陌生人采取突然的袭击,“欺诈性”强奸(confidence rape)是利用骗人的话接近被害人。

大量的强奸都是由成对或成群的人所干的。例如,艾米尔(M. Amir, 1971)对费城强奸的研究中发现,43%的强奸都涉及两个或更多的犯罪人。赖特(R. Wright)和韦斯特(D. J. West)(1981)对1972年至1976年英国6个郡报告的所有强奸和强奸未遂案进行考察,发现13%的强奸涉及两个或更多的犯罪人。单独作案和合伙作案的犯罪人先前都有犯罪记录;在单独和群体作案的案件中,1/3的犯罪人在犯罪前都曾经酗酒。不过,群体犯罪人更可能是21岁以下的年青人(21岁以下的人占65%,21岁以上的人占27%),这些人先前很少因性犯罪或精神病史被定罪。群体强奸(group rape)的被害人很少是陌生人,他们大多是21岁以下的人,曾经喝了酒,受到一些伤害(21岁以下的人占50%,21岁以上的人占32%)。群体伤害(group assault)似乎更是团伙少年犯罪动力学的一种功能,而不是个人病态的一种功能。其他国家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可是,1985年对英国强奸罪的一项研究发现,单人强奸比1972年的比例更大。更近的数字表明,21岁以下的犯罪人和被害人都成比例地减少,更多的犯罪人具有长期的犯罪记录,大多数犯罪人与被害人认识。

一些强奸使用了威胁,使被害人被动地屈从,但很多强奸使用了暴力,迫使被害人服从。强奸—谋杀相对而言是较少的,这种犯罪更有可能是由试图使受害人安静或掩盖犯罪的行为引起的,施虐性伤害不是太多,骇人听闻的“色情杀人”(lust murder)更是罕见。赖特(R. Wright)和韦斯特(D. J. West)发现(1981),6%的强奸被害人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66%的人没有遭受这种伤害。可是,被害人心理上立即产生的有害后果和长期的有害后果更加重要。例如,基尔帕特里克(D. G. Kilpatrick)等人发现(1985),19%的强奸被害人报告自杀未遂,与之比较的没有受害的妇女只有2%的人报告自杀未遂。

关于强奸的研究已经围绕两个理论上的问题发展。第一个问题是,强奸是否是一种性变态。一些人把强奸看成是一种对暴力性行为(forced sex)的偏好(preference),因此认为强奸是一种性倒错;而其他的人则认为,强奸主要是由追求权力和控制的需要激起的。后一种观点已经受到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拥护,男女平等主义者把强奸看作一种暴力而不是性犯罪。可是,赫尔曼(J. L. Herman, 1990)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把强奸看作一种性嗜好(sexual addiction)。第二个问题是,强奸犯是否有心理变态。心理动力学的研究者把强奸

看作一种精神病理学的症状,而行为治疗家则强调强奸犯人际关系的缺陷。可是,男女平等主义者拒绝这些观点,认为强奸是正常的男性社会化的表现。在这个范围内意味着所有的男性都有强奸的能力(capacity),这个观点没有为解释强奸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它就如同用“所有的人都有杀人能力”来解释杀人一样。不过,这种观点直接把注意指向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些社会因素能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男子运用这种能力。

一、强奸犯类型学

强奸犯不是同质的群体,约会强奸、团伙强奸以及陌生人强奸在社会动力学方面的差异可能与犯罪人之间心理上的差异相似。识别同质亚群体的尝试集中于动机的变化。格罗思(A. N. Groth)等人(1977)把性侵害看作是满足非性需求(nonsexual need)的性行为,并且强调权力动机和愤怒动机。强奸是一种涉及两种动机的“虚假性行为”(pseudosexual act),但它们中的某一种动机存在相对的优势。在“**权力型强奸**”(power rape)中,犯罪人寻求权力或控制,他们或者表达男子气和支配性(权力—过分自信),或者消除关于男子气的怀疑(权力—信心恢复)。“**愤怒型强奸**”(anger rape)表达对妇女的狂怒、轻视和憎恨,并且对被害人使用极度的暴力。这种强奸可能由于对所察觉到的侵犯行为进行报复而激起(愤怒—报复),或者由于追求使被害人遭受痛苦的施虐性兴奋而激起(愤怒—兴奋)。在这种类型的强奸中,性动机处于次要地位,格罗思(A. N. Groth)和伯吉斯(A. W. Burgess)(1977a)引证观察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被监禁的样本中75%的人描述了强奸期间的性失败或性功能障碍。他们估计权力型强奸是突出的,占强奸案的2/3,只有6%的强奸属于施虐狂类型。

可是,科恩(M. Cohen)、西格霍恩(T. Seghorn)和卡尔马斯(W. Calmas)认为(1969),强奸中的性动机和攻击动机是联在一起的,并把强奸们分成4种类型。在**替代攻击型强奸**(displaced aggression rape)中,强奸犯对妇女是有敌意的,强奸是妇女的挑衅引起的敌意行为,性兴奋是很小的。在**补偿型强奸**(compensatory rape)中,攻击中很少的,由于性无能感而寻求性满足。在**性—攻击结合型强奸**(sex-aggression diffusion rape)中,攻击具有色情意义,导致性施虐狂。最后,**冲动型强奸**(impulsive rape)犯罪人有很少的攻击或性意图,强奸是一种机会性行为,常常发生在进行一些其他的掠夺性犯罪的过程中。普伦特基(R. A. Prentky)、科恩(M. L. Cohen)和西格霍恩(T. K. Seghorn)(1985)以及奈特(R. A. Knight)、普伦特基(R. A. Prentky)(1990)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试图进一步发展科恩(M. Cohen)等人的图式。最近确认了4种高等级类型(superordinate type,即机会主义型、弥漫愤怒型、性欲型、复仇型),性欲型可分为施虐型和非施虐型2种亚型。在社会能力水平上对这些类型进行再分类,就产生了9种亚型。

社会学家已经认识到强奸犯之间的差别,可是,他们没有根据个人病理学来认识强奸。斯卡利(D. Scully)和马罗拉(J. Marolla)(1985)对114名被定罪的强奸犯进行访谈,据此对犯罪人从强奸行为中获得奖赏的观点进行评价。愤怒、权力和机会再次作为有意义的主要奖赏有别于报仇和惩罚,成为探索性犯罪的“额外奖赏”,通过强奸接近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的妇女,通过非人的性行为得到权力,参加团伙强奸进行娱乐。

强奸犯的类型学实质上是一种假设,这些假设只是近期才得到实验的检验,强奸犯在其犯罪生涯中是否保持不变仍然是不清楚的。不过,他们提出强奸是多维度的,必须考虑非性欲目标和性目标。

二、文化因素

男女平等主义者认为,强奸受到权力关系的通行规范的鼓励。根据这种观点可以预测,强奸是与有关妇女和两性之间关系的态度、信念相联系的;这种观点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首先,与那种认为强奸代表一种生物学的男性攻击倾向的观点相反,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强奸不是所有社会的突出特征,它发生的频率依赖于文化组织。例如,奥特拜因(K. F. Otterbein, 1979)发现,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采用攻击保卫其成员的男性权力群体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强奸发生频率,但它是与抑制其效果的惩罚相互作用的。在一项对156个部落群体的研究中,桑迪(P. R. Sanday, 1981)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容易发生强奸的部落是以更大的性隔离和女性的低权力、低地位为特征的,并且得到会促成人际暴力行为和男性强硬的思想意识的支持。

其次,态度调查表明了对强奸神话的广泛认可(例如,“很多妇女有一种被强奸的无意识愿望”;“在免费搭车旅行期间被强奸的妇女得到了她们应得的东西”)。伯特(M. R. Burt, 1980)发现,这些说法经常得到随机抽取的美国男性和女性样本的支持,并且与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有关,也与支持亲密关系中人际暴力行为的对抗性信念和性态度有关。科斯特(F. Costin)和施瓦茨(N. Schwartz)也发现(1987),在对4个国家的学生样本和社区样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接受强奸神话和限制妇女的社会作用以及权力的信念之间有相关关系。在一系列的研究中,马拉姆斯(N. M. Malamuth, 1984)发现,在一个测量强奸可能性的5点式量表(5-point scale)上,如果能够侥幸实施强奸的话,1/3的学生得分在2分或2分以上(1分等于一点也不可能,5分表示非常可能),20%的学生得分在3分或3分以上。强奸行为的可能性是与强奸神话中对强奸的更麻木不仁的态度相联系的。

一些对强奸犯的研究也支持男女平等主义者的观点。艾米尔(M. Amir, 1971)发现,71%的强奸是有预谋的,这似乎与精神病学的强奸概念相矛盾,精神病学把强奸看作一种个人缺乏控制的冲动性犯罪。大多数犯罪人也来自具有高犯罪率的贫穷内城区,这与“暴力行为亚文化”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这个概念的效度引起了争论(参见第九章)。菲尔德(H. S. Feild, 1978)对被定罪的强奸犯和强奸咨询人员(rape counsellor)、警察以及市民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些人在对强奸神话的认可、对强奸妇女的责任归因等几个态度维度方面,是有区别的。可是,尽管亲男女平等主义者(pro-feminist)对妇女的态度与反强奸态度(anti-rape attitude)有关,但是,在强奸犯样本内不是这样。一些近期的研究也没有证实,可以根据是否接受强奸神话对被监禁的强奸犯加以区分,或者可以根据是否对妇女的消极态度加以区分。

男女平等主义的研究者认为,被定罪的强奸犯不是性攻击男性中的典型代表,对守法者的自我报告研究也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科斯(M. P. Koss)和伦纳德(K. E. Leonard)报告(1984),自我报告的性攻击者更加认可强奸神话,并且更有可能把责任归于妇女,他们在对妇女消极态度的量表上的得分也更低。其他的研究没有发现自我报告的性攻击与性别角色信念之间有直接关系,而发现在自我报告的性攻击与对人际暴力和对抗性信念的认可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也发现了自我报告的性攻击与将妇女的性受害合法化的信念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可是,马拉姆斯(N. M. Malamuth, 1986)发现,对人际暴力行为的认可和对妇女的敌意都与自我报告的性攻击行为有关系。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部分地反映了这些研究中使用度的态度量表的差别；从整体来看，有一些研究支持男女平等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即对强奸的容忍力至少是与对妇女的消极态度的某些方面相联系的。可是，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对性攻击的自我报告式研究，这些研究可能反映了约会强奸或熟人强奸的情况，而没有反映陌生人强奸的情况。此外，这些资料是相关的，并且相关一般是中等程度的。

三、环境和情境因素

回溯性临床研究表明，强奸犯与攻击性少年犯罪人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们都曾经常被父亲或者母亲残酷地虐待过。例如，范内斯(S. Van Ness, 1984)发现，在法庭调查的结果中，41% 青少年强奸犯有家庭暴力或疏忽的历史，而非性犯罪人只有15%的人有这样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德(R. T. Rada, 1978)发现，强奸犯中不到1/4的人有家庭暴力的历史，但缺乏这方面的纵向研究。研究者一直认为，童年期的性虐待是很重要的，卡特(D. L. Carter, 1987)报告，在被监禁的儿童骚扰者中，57%的人有这样的历史，而强奸犯只有23%的人有这样的历史。可是，由于性攻击与对人际暴力行为的认可有联系，所以，可以预见会发生家庭中的配偶虐待。

对强奸行为更近的影响包括影响犯罪人的性唤起和性攻击的情境因素。艾米尔(M. Amir, 1971)发现，费城1/5的强奸是“被害人促成的”，但这一结果没有得到证实(参见第九章)，男女平等主义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这个观点责备了被害人。酒精是一个常常被引用的因素，但犯罪人的报告是可疑的，因为声称醉酒是一种“越轨行为抵赖”(deviance disavowal)的形式，这样可以使犯罪人不承认他有任何问题，只承认他曾醉酒。不过，独立的报告指出了强奸前相对高的醉酒比率。拉德(R. T. Rada, 1978)指出，在他所考察的强奸犯中，50%的人在犯罪时喝了酒，其中1/3的人是问题饮酒者(problem drinker)。艾米尔(M. Amir, 1971)也发现，在60%以上的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都喝了酒。不过，赖特(R. Wright)和韦斯特(D. J. West)(1981)在其英国的样本中发现双方喝了酒的比率较低。实验研究表明，酒精期待(安慰剂)(但不是酒精本身)增加了对色情电影的性唤起，也增加对色情暴力的兴趣。可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一些研究发现，酗酒与强奸中的很多暴力有关系，可这没有得到由兰格文(R. Langevin)、佩迪克(D. Paitich)和拉森(A. E. Russon)进行的研究的证实(1985)。酒精摄取本身在强奸中比在其他暴力行为中有更直接的作用，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促进强奸的任何效果都可能是以其他的情境和个人因素为中介的，例如，对社会线索的错误知觉，权力感的增强，有关越轨行为是许可的期待。

那种认为强奸常常是一种愤怒的表达方式的观点，已经受到人们的注意；愤怒唤醒是另一种常被报告的前因。例如，范内斯(S. Van Ness, 1984)发现，在一个青少年强奸犯样本中，86%的人报告犯罪前2至6小时内与人争吵；实验室研究也表明愤怒可能对性唤起有影响。耶茨(E. Yates)、巴巴利(H. E. Barbaree)和马什尔(W. L. Marshall)(1984)考察了正常被试中对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和强奸描述的阴茎体积描记器记录的结果，其中的一些人曾经被实验人员的女同谋者激怒。更重要的测验显示了被试对强奸的性唤起更少，而对同意的性行为的描述性唤起更多，但是，对于被激怒的被试来说，这种差异后来消失了，愤怒既减弱了同意的性行为的唤起，又提高对强奸的性唤起。后面这个模式与对被监禁的强奸犯的一些研究中发现的结果相似(参见下文)。耶茨(E. Yates, 1984)等人提出，愤怒可以扰乱

移情,也可以选择性地改变注意的方向。可是,强烈的愤怒涉及提高自动唤起,在正常的条件下可能干扰性唤起。这可能与很多强奸伴随着性功能障碍的观察是有关系的。

四、色情作品的影响

性刺激本身增加了性攻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引起对色情作品的争论。男女平等主义者认为,通过使妇女非人化而鼓励强奸,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推论,色情材料没有促成性犯罪行为。1986年美国的一个调查获得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已经因以偏概全而受到批评。一种批评是**色情作品**(pornography)的含义。一些人认为,涉及彼此愉悦和权力平等的性相互影响的色情描写,不同于把妇女当作易于受统治、强迫、有时是施虐狂的性对象的描写。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区别这里使用的非攻击性色情作品(nonaggressive pornography)和攻击性色情作品(aggressive pornography)的术语。

在丹麦,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随着放宽对色情作品的法律限制,性犯罪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轻微犯罪实际减少了。考特(J. H. Court, 1984)认为,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西方国家中能够得到的攻击性色情作品的增加现象,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过,有关这种增加现象的证据,是值得怀疑的。考特提出,“色情性暴力”(porno-violence)对妇女的态度和性行为只有“微弱的影响”,他证实了几个国家影响色情作品可得性法律中的变化与官方对强奸统计中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些总体水平的资料没有显示有一种直接的原因性影响,但它却与那种认为色情作品对性攻击有影响作用的观点是一致的。

实验研究也支持这种结果。马拉姆斯(N. M. Malamuth, 1984)对几项有关攻击性性描写的认知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强奸描述增加了男性中攻击性性幻想的内容;而在另一项研究中,让被试听强奸描述,当听到描述中有“积极”结局(妇女非自愿性唤起)时,被试随后对强奸被害人评定是:被害人遭受了较少的痛苦;当听到强奸具有“消极”结局(妇女显示愤慨)或发生彼此同意的性行为时,被试随后对强奸被害人评定是:被害人遭受了较多的痛苦。马拉姆斯也描述了一个现场研究,观看描写性攻击行为积极后果电影的被试,后来比对照组更多地认可对妇女的人际暴力行为,并且也更加认可强奸神话。

在实验室研究中也考察了色情作品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实验证实,接触非攻击性的色情作品本身并没有提高对妇女的攻击,但对已经被激怒男性来说,确实提高了其攻击性。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当目标是男性时,这种影响更强烈,表明了一种普遍的唤起或者消除抑制作用,而不是特殊的性唤起作用。可是,在一个实验中,描绘对妇女“积极”结局的攻击性色情作品,后来增加了没有被唤起的男性对妇女的攻击性,但描述“消极”结局的却没有增加他们的攻击性。对于被激怒的男性来说,两种描述都提高了攻击性。唐纳斯坦(E. Donnerstein, 1984)指出,积极结局证明攻击行为是正当的并且减少了抑制,而消极结局产生了替代性痛苦线索(vicarious pain cues),强化了被激怒男性后来的攻击行为。在唐纳斯坦的另一项研究中,让研究人员的男性合作者或女性合作者激怒男性被试,并且在提供攻击机会之前,让男性被试观看4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中性的电影;非攻击性的色情电影;攻击性电影;攻击性的色情电影。结果发现,当攻击目标是男性时,只有非攻击性的色情电影增加攻击性;当攻击目标是女性时,攻击行为并没有通过非攻击性的色情作品得到提高,

但却通过攻击性的色情电影大大地增加了,通过攻击电影增加得不多。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对妇女的非性攻击描述,增加了对强奸神话的认可和与态度有关的强奸。因此,促进对妇女的攻击的,似乎更多是攻击性想象和攻击性色情作品中对被害妇女的描述,性唤起的作用不是很大的。

虽然这些研究表明,色情作品可能会产生对妇女的消极行为和态度,这取决于观察者的情绪状态和妇女反应所传递的“信息”,但它们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攻击性色情作品具有原因性作用,而仅仅肯定这类色情作品只是性攻击的许多可能的影响中的一种。这些研究中对“攻击性”所下的实验室定义,其外部效度是有限的,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的效果或可能是短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进行过对性行为效果的前瞻性纵向研究。人们已经知道,性犯罪人是色情作品的大量使用者,但卡特(D. L. Carter)等人发现(1987),儿童骚扰者在犯罪前和犯罪期间比强奸犯更有可能使用色情作品。可是,有人也已经发现,性犯罪人在青少年时期比非犯罪人接触的色情作品更少。因此,色情作品对越轨性行为发展的作用是不清楚的。马拉姆斯(N. M. Malamuth, 1984)提出,任何影响都可能是双向的,因为传播媒介暴力(media violence)是非常普遍的,对那些已经有性攻击倾向的人来说,攻击性色情作品可能会增强对妇女的消极反应。

五、性攻击者的特点

一些研究已经试图通过特殊的个人倾向、性倾向或者社会倾向来区分强奸犯。强奸与精神病的联系是罕见的,有控制的研究没有发现可以通过智力特点区分强奸犯。心理健康的强奸犯可能被鉴定为有人格障碍,但在人格测验中,强奸犯与其他犯罪人的比较没有发现一致的区别,这表明强奸犯可能是以犯罪性为特征的,而不是以更特殊的人格因素为特征的。研究表明,自我报告的性攻击与MMPI的病态人格分量表(Pd)有中等程度的相关;研究也发现,自我报告的性攻击与高夫的社会化量表和责任量表、艾森克人格检查表(EPQ)中的精神质量表(P)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些研究结果增强了反社会倾向的作用。马拉姆斯(N. M. Malamuth)和切克(J. V. P. Check)发现(1983),自我报告的对强奸描述的性唤起,是与报告强奸的可能相联系的,也与艾森克人格检查表中的精神质分量表(EPQ, P)以及性权力动机相联系的。他们认为,强奸倾向(rape proclivity)更普遍地与攻击倾向有关。可是,在巴斯—德尔基敌意量表(the 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上,无论是被定罪的强奸犯还是自我报告的性攻击者,得分都不高。

另一方面,使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对被监禁强奸犯进行的研究表明,与其他性犯罪人相比,这些强奸犯普遍地与暴力犯罪人的结果更接近,他们往往在精神分裂症分量表(Sc)和病态人格分量表(Pd)上得高分。有些研究者用敌意、兴奋性、冲动性、回避亲密的卷入、差的社会判断以及与权威的冲突这些术语来解释这个模式。因此,最一致的结果是强奸犯的社会化程度较差,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的资料表明,强奸犯属于比较严重的个人越轨犯罪人,他们很有可能是继发性精神病患者。

研究已经表明,区分强奸犯的另一个因素是睾酮的水平。这种假设是,睾酮的水平将影响性唤起和性攻击性的程度。拉德(R. T. Rada)、劳斯(D. R. Laws)和凯尔纳(R. Kellner)发现(1976),高的睾酮水平并没有成为强奸犯群体的特征,但它能辨别出少量的高攻击性强奸犯亚群体。可是,兰格文(R. Langevin)等人发现(1985),强奸犯和非暴力性性

犯罪人之间的睾酮水平没有差异,施虐性强奸犯和非施虐性强奸犯之间的睾酮水平也没有差异。

行为主义的观点假定,强奸犯对暴力性性行为有一种异常的偏爱。阴茎体积描记器记录强奸犯对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和性攻击行为描述的不同反应时,这种偏爱就很明显。艾贝尔(G. G. Abel)等人(1977)向13名强奸犯和7名非暴力性异常者播放描述彼此同意的性交和强奸的录音。非强奸犯对彼此同意的性行为产生更小的阴茎体积描记器的反应,要比强奸犯小;而强奸犯对两者的反应相似。“强奸指数”(rape index,即阴茎体积描记器对强奸与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反应的比率)直接与强奸犯罪的频率和引起伤害的程度有关。对强奸的反应也与对妇女的非性暴力的反应相关,不过后者处于较低水平。研究没有指出被试对彼此同意的性行为中暴力的偏爱,结果表明,强奸可能因对不同同意线索的变态吸引或使用暴力而被激起。巴巴利(H. E. Barbaree)、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兰塞尔(R. D. Lanthier)(1979)在一项对强奸犯和守法者的比较研究中,重复了这些结果,但他们的研究表明,强奸犯不是必然因使用暴力或被害人的线索而被唤起的;而是没有抑制勃起,或许是因为几乎没有移情的原因。可是,昆塞(V. L. Quinsey)、查普林(T. C. Chaplin)和厄普福德(D. Upfold)发现(1984),强奸犯对彼此同意的性行为描述的反应不如对照组,对强奸描述的反应却比对照组更强。强奸犯对女性的非性欲暴力(nonsexual violence)反应更强,虽然对男性没有这样强烈的反应,这表明了异性环境的重要性。作者把强奸犯因被害人的痛苦而受到抑制的失败看作一个关键的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越轨性偏好的假说。与此不同的是,其他研究发现,强奸犯对强奸的反应比对彼此同意的性行为的反应小。

有两个可能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巴巴利(H. E. Barbaree, 1990)认为,性攻击的描写既包含唤起因素,又包含抑制刺激的因素,因此,不一致的结果可能反映了不同的调查者使用不同的刺激模式,也可能反映了被试的差异。布莱德(J. C. Blader)和马歇尔(W. L. Marshall)注意到(1989),昆塞(V. L. Quinsey)等人(1984)研究的强奸犯,是最危险的和施虐性的强奸犯,强奸指数只是施虐性强奸犯的可靠鉴别因素。他们进一步认为,实验室研究中评价的性唤起不是性侵害的前因,性唤起通常是作为试图获得彼此同意的性行为的前奏。这种研究资料意味着,除了性施虐狂者外,强奸犯并没有变态的暴力性性行为的兴趣。强奸犯可能无法对性唤起产生强制性反应(coercive responding)。

可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使用强制,这个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有关强奸犯的独特特征的有限证据,有时被看成是这样一种迹象(indication),即很多强奸犯是社会化不足的人,他们“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性行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则通过暴力来进行性行为;但是,强奸犯也有可能是在强制性性行为动机的驱使下进行犯罪的。例如,马奎斯(J. K. Marques, 1981)在研究中改变了强奸描述的结局,发现强奸犯对被害人恳求同情的描述显示出勃起提高;可是在遭到断然拒绝、或建立起一种关系、或缺乏抵抗时,则没有勃起提高。这些情况表明,强奸与权力动机是相关的。此外,强奸指数在预测自我报告的性攻击方面确实有一些效度,尤其是在把统治作为一种性行为动机、对妇女的敌意以及认可人际暴力这些因素相结合时,强奸指数确实有一些效度。

进一步的兴趣已经集中在强奸犯的异性社交和自信技能方面。已有的证据表明,强奸犯在这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犯罪人。例如,斯特梅克(L. E. Stermac)和昆塞(V. L. Quinsey)(1986)采用谈话、角色扮演以及对社会相互作用和社交技能的自我报告测量等方法,对强奸

犯与非性欲犯罪人(nonsex offender)、社区对照组进行了比较研究。两组犯罪人都被评定为社会技能较差,强奸犯仅仅在评定自己自信不足方面有区别。西格尔(Z. V. Segal)和马歇尔(W. L. Marshall)(1985)在研究中没有发现强奸犯自信不足的证据,不过,他们证实了强奸犯与非性欲犯罪人在其他方面的相似之处。儿童骚扰者显示出更明显的技能缺陷,奥弗霍尔泽(J. C. Dverholser)和贝克(S. Beck)(1986)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可是,利普顿(D. N. Lipton)、麦克唐奈(E. C. McDonel)和麦克福尔(R. M. McFall)发现(1987),强奸犯在认识首次约会中描绘的女性情感线索方面,不如其他犯罪人准确,这表明强奸犯在这些情境中存在解释信息方面的缺陷。

由于很多强奸犯已结婚或者有规律性的性发泄途径,所以,他们在基本的异性社交技能中的缺陷可能被高估了,他们在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方面的缺陷可能是更重要的。如果认为对妇女的信念在强奸的发生中起作用的话,那么,似乎就有必要更多地关注在强奸犯与其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中起中介作用的那些期待。

有关强奸犯的社会特征和个人特征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不一致的结果,这使得一些研究者提出,除了社会化较差以外,强奸犯与一般犯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可是,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1990a)吸收了更多研究的结果后,提出一种整合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了生物发育、童年期的社会化以及文化和情境因素的影响。他们指出,由于性和攻击的神经和激素底物(neural and hormonal substrates)有密切联系,青春发育期的男孩肯定能学会抑制性攻击的先天能力(inherent capacity)。由于有害的童年经验,例如,无经验的父母养育和暴力行为,一些男孩没有获得恰当的移情和社交技能,这些技能会有助于他们学习这种抑制,并且发展令人满意的异性交往和社会互动。这样的男孩更容易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强奸神话的影响;更容易通过昙花一现的因素消除抑制,例如醉酒或愤怒。一旦这样的青年已经发展起暴力性性行为,进一步的伤害就更容易出现,在遭受惩罚时尤其如此。可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种认为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抑制性攻击的自然倾向的假设,是有问题的。

六、性施虐狂

之所以产生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强奸犯有不同的动机。不过,人们已经尝试区分施虐性强奸犯(sadistic rapist)的特征。布里顿(R. P. Brittain, 1970)根据他作为一个司法精神病学家和病理学家的经历,提出了一种有关施虐性谋杀犯(sadistic murderer)的典型描述。虽然这个施虐狂者是自恋和自我中心的,但把他描述为一个精神病态者是不确切的。施虐狂者是内省的、孤独的、胆怯的、过分拘谨的,常常笃信宗教,感到自卑,特别是在性关系方面更加感到自卑,他们很难与妇女建立关系。渴望控制他人,是施虐狂者的一种基本的特征,使用暴力维护权力比施加痛苦更重要。他们有一种丰富的幻想生活,老想着残忍和庸俗不堪的事物,寻找能满足其权力欲望的工作。他们的兴趣包括性施虐文学作品和收集武器。他们也有一些系列的性倒错,例如,窥淫癖和异装癖,但通常没有犯罪记录。犯罪可能发生在自尊心丧失或对其男子气的否认之后,有预谋的犯罪会使他们体验到优越感。当其性冲动和对权力的欲望占主导地位时,这种谋杀就会使用过度的暴力,被害人的恐惧和遭受的痛苦会使谋杀犯产生兴奋。不过,性交和性高潮都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他们可能对整个身体进行手淫或使用一个替代阴茎。这种犯罪会减少紧张,犯

罪之后他们行为正常。

虽然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但可得到的证据支持上面描述中的几个特征。麦卡洛克(J. W. McCulloch)等人提出(1983),施虐性幻想和对犯罪的预演(rehearsal)是关键的特征,在一个特别医院中,16个病人中有13个曾犯施虐性谋杀或不致命的施虐性侵害罪,并有涉及控制和性暴力预演的施虐性手淫幻想。这种犯罪是幻想序列的顶点,首先以悄悄地靠近被害人的形式预演,这种预演似乎维持作为唤起来源的幻想。所有的病人都有社会关系和接近妇女困难的历史。麦卡洛克等人的研究表明,权力幻想是一种起作用的因素,失败的经历会削弱这种因素的作用,而性唤起会通过经典条件反射与权力幻想产生联系。普伦特基(R. A. Prentky)等人提出(1989),施虐性幻想的发展可能在系列性谋杀中特别重要,他们对25件系列性杀人和17件单次偶然性杀人(single-occasion sexual homicide)进行比较。在系列性谋杀犯中,86%的人有过以进行了强奸幻想和谋杀幻想的纪录;而单次性谋杀犯中,只有23%的案件有这样的记录。也有证据表明,系列杀人犯罪中的第一次犯罪,其预先策划比单次性谋杀犯罪要多。

兰格文(R. Langevin)等人在其对于性攻击的研究中(1985),对施虐性攻击者和非施虐性攻击者与财产犯罪人对照组作了比较。由于样本的规模使人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有一些结果(如施虐狂者较低的强奸指数)与期待是相反的,也发现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差异。例如,施虐狂者有更多的女性性别认同或矛盾的性别认同,他们更有可能感到性关系不适当,发现与妇女谈话困难,妇女会使他们愤怒,有更守旧的性角色态度,显露出更多的性倒错,他们不可能酗酒或滥用毒品。在MMPI的精神分裂症分量表(Sc)上他们也得分最高,表现出更混乱或更扭曲的思维。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56%的施虐狂者、0%的非施虐狂者和12%的对照组在CT扫描检查中,显示出正常的短暂勃起的阴茎膨胀状态,由赫克(S. J. Hucker)等人(1988)在一个扩大了样本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些差异。这个研究的原因意义是不清楚的,但研究文献中报告的一些案件历史已经表明,颞叶异常与性倒错有关系。莫尼(J. Money, 1990)认为,在性施虐狂中,大脑被异常地激活,传递同时产生的攻击和性唤起信息,这是一种类似于癫痫发作的短暂机能失调。可是,有关在施虐性谋杀中存在预谋和计划的证据表明,施虐性侵害以认知为中介,并处于意志控制之下。因此,病理性的脑放电对于解释这种行为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

伯吉斯(A. W. Burgess)等人(1986)提供了一个对施虐型性侵害(sadistic sexual assault)的综合性分析。他们提出了一个动机模式,在这个动机模式中,施虐性幻想和认知结构在引起谋杀行为中起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假设5个相互影响的发展时期:(1)早年生活中削弱依恋联系的无效社会环境;(2)形成性创伤事件(formative traumatic event),例如,越轨角色模式和虐待的经历,这些创伤事件使个人把控制幻想和攻击幻想作为应付手段(coping devices);(3)模式化反应,例如,社会隔离、手淫、反抗,这些反应限制了正确的人际经验,也限制了那些会促进自我辩护、引起反社会观念的认知结构的发展;(4)针对他人的行动,例如,残忍对待儿童和动物,通过这些行动,使暴力行为受到强化,移情发展受到延迟;(5)支持异常思维模式的反馈过滤,这个模式类似于攻击性少年犯罪的社会认知模式。

早期性虐待的作用得到雷斯勒(R. K. Ressler)等人的支持(1986)。他们发现,与没有受虐待的谋杀犯相比较,具有这样历史的性谋杀犯在童年期更可能曾经暴露出残忍行为,显示出更多的性冲突和性倒错,在较早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性幻想。他们也可能在杀人以后肢

解被害人。可是，正如芬克霍（D. Finkelhor, 1986）指出的那样，把男性的性犯罪归因于童年期虐待经历的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女性没有成为性虐待者的问题，女性大多数是虐待的受害者。在非性关系中的残忍行为和施加的痛苦也是以施虐型人格障碍为特征的，根据DSM-III-R，施虐型人格障碍与性施虐狂的联系很少，可是布里顿（R. P. Brittain, 1970）和伯吉斯（A. W. Burgess）等人（1986）的临床观察表明，施虐型人格特质可能在施虐型谋杀犯中是常见的。施虐型性幻想在一般人口中也是普遍的，由于它在施虐型“性游戏”中的潜意识显露，所以在这个水平上的施虐狂似乎是与对人际控制的更普遍需要相联系的。因此，施虐型性侵害可能是一个连续体的极端。

第七节 对儿童的性犯罪

侵害儿童的性犯罪更普遍的是抚弄生殖器，而不是阴道或肛门的进入，在少量的案件中涉及使用极度的暴力。在描述这些犯罪中，**恋童癖**（paedophilia）、**儿童性骚扰**（child molestation）和**儿童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术语常常被交替使用。可是，在这个方面，恋童癖的含意比DSM-III-R中性倒错的概念更多，因为一些犯罪人好像主要保留对成年人的性兴趣。对儿童的性偏好更可能出现在只对男孩犯罪的男性身上（同性恋童癖者），他们占已知犯罪人的1/4左右，少量的人既选择男性被害人也选择女性被害人。有人已经提出，在乱伦犯罪人中，几乎不可能有性倒错。可是，一些研究指出，乱伦犯罪人中有1/3或更多的人对家庭外面的儿童进行性骚扰。因此，对儿童进行性犯罪的这些人是一个异质的群体，这个群体根据选择的被害人的年龄和性成熟期、与被害人的关系、性接触的程度以及犯罪中使用暴力的情况而变化。

一、儿童性虐待

由于很多性虐待仍然没有报告，这些知识主要来自被害调查和临床研究。变化的流行率不但反映了不同的调查方法，而且也反映了缺乏儿童性虐待的精确定义。儿童性虐待被普遍地理解为成人在童年期内的一种有害的性经验，一些调查包括没有性接触的经验，例如，猥亵性暴露或者猥亵性言语，并且把童年期扩展至18岁。可是，使用严格标准的调查表明，女性中10%~15%的人经历了童年期的性虐待。在大约一半的人中，这种虐待是一种单次经历（single experience）；不过对一些人来讲，性虐待经历持续较长时间。报告虐待的女性与男性的比率大约是2.5:1。对于女性来说，虐待者更可能是家庭成员或熟人，而男性更有可能被陌生人虐待。

芬克霍（D. Finkelhor, 1986）对女孩遭受虐待的危险因素的证据进行了评述。对于10至12岁的女孩来说，易受侵害性是较高的，成为被害人的女孩更可能没有与亲生父亲生活，而是和继父一起生活的，母亲在外工作；这些女孩生病或低能，曾目击过父母的冲突，与父母中的一方有不良的关系。黑人女性或来自较低社会阶级的女性没有报告较高的比率。芬克霍指出，就儿童来说这些因素可能与不良的父母监管、情绪的易受伤害性或者无抵抗能力有关系。可是，他强调，性虐待的先决条件是具有虐待动机的犯罪人，他们必须克服内在的抑制、外部的障碍和儿童的抵抗。

大多数恋童癖者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异常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儿童普遍地不能表

示知情后同意 (informed consent), 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性行为利用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被害人心理上的伤害性后果也已经得到文献的证实, 无论是在虐待经历的直接后果方面, 还是长期后果方面, 都是如此。在一半以上的被害人中, 最初的后果包括恐惧、内疚、敌意的情绪反应, 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类似的侵入性思维 (intrusive thinking)、学校困难 (school difficulty)、饮食障碍、离家出走、卖淫等行为问题, 少数人中还有少年犯罪。长期的后果包括焦虑、抑郁、低自尊, 自我毁灭行为, 重复被害, 缺乏人际信任以及性适应损害。

不过, 长期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大约 1/5 的被害人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功能障碍。因此, 直接的原因性影响很难证实, 性虐待或许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 例如, 家庭解组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一些临床医师指出, 当儿童认识到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 当他们受到虐待, 当这种行为无所不在并且伴有暴力, 当虐待者是近亲属, 当在家庭中得不到支持的时候, 这种后果是最大的。虽然资料很少, 但还是有一些支持性的证据。

二、儿童性骚扰者的类型

已经有人尝试用与强奸犯类型学相似的分类来对儿童性骚扰者 (child molester) 进行分类。格罗思 (A. N. Groth) 和伯吉斯 (A. W. Burgess) (1977b) 再一次强调非性动机的作用, 并根据犯罪中使用暴力的程度把儿童性骚扰者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性压力型犯罪** (the sex-pressure offence), 这类犯罪的特征相对而言缺乏身体的暴力。犯罪人与儿童在一起时感到更安全, 并渴望把儿童当作一个爱的对象。可是, 这种类型的犯罪人可以再分为两小类: 一小类是**怂恿型** (enticement) 或说服型; 另一小类是**引诱型** (entrapment), 这类犯罪人以诱饵引诱儿童陷入圈套。第二类是**性暴力型犯罪** (the sex-force offence)。这类犯罪人使用强迫或身体暴力。他们可以再分为两小类: 一小类是**利用型** (exploitive), 即为了性宣泄 (sexual relief) 而使用儿童, 没有任何进一步关系, 并且作为一种运用权力的手段; 另一小类是**施虐型** (sadistic), 其快感源于对儿童的伤害和羞辱。这种分类是一种根据临床观察提出的假说, 还没有得到证实。

另外一种尝试是把犯罪人分成**固着型** (fixated)、**倒退型** (regressed) 以及**攻击型** (aggressive) 3 类。固着型的犯罪人更喜爱儿童并感到与儿童在一起时更舒适, 他们寻求那些自己认识的儿童。倒退型犯罪人有一些的成年人异性恋兴趣, 但存在不恰当的感情, 他们在男子气受到威胁之后对儿童进行性行为。攻击型犯罪人进行施虐性行为, 通常是对男孩进行这种行为。豪厄尔斯 (K. Howells, 1981) 作了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区分, 把儿童性骚扰者分为**偏好型** (preference) 和**情境型** (situational), 这种分类是与固着一倒退差异类似的。昆塞 (V. L. Quinsey, 1986) 把儿童性骚扰者区分为二类: 一类是对儿童有性偏好的性骚扰者, 另一类是当成年性伴侣不可得时把儿童作为替代者的性骚扰者。这也适用于辨别乱伦性和非乱伦性的儿童虐待者。

奈特 (R. A. Knight) 和普伦特基 (R. A. Prentky) (1990) 描述了对科恩 (M. Cohen) 等人 (1969) 的有实证基础的类型学研究, 他们使用了沿着两条轴线的层次决策树 (hierarchical decision tree)。第一条轴线根据固着程度对犯罪人进行分类, 然后根据社会能力大小将犯罪人分为 4 类。第二条轴线根据犯罪人与儿童接触的量来划分, 接触多的犯罪人被分成人际型和自恋型两种类型, 接触少的犯罪人被分成严重身体伤害型和轻微身体伤

害型。后面两种类型还可进一步分成施虐型和非施虐型。尽管这个体系是以5个因素为基础的,但是使用二分法可以产生24种类型。不过,作者指出,大多数儿童性骚扰者属于其中11种类型的一种。这种探讨似乎是有希望的,但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是以简单的二分法为基础的,或者把儿童性骚扰者作为一个同质的群体来对待。

三、儿童性骚扰者的特点

豪厄尔斯(K. Howells, 1981)、芬克霍(D. Finkelhor, 1986)、昆塞(V. L. Quinsey)和兰扬(R. I. Lanyon, 1986a)已经对有关儿童性骚扰者的研究进行了评论,威廉斯(L. M. Williams)和芬克霍(D. Finkelhor)(1990)对乱伦父亲的研究进行了评论。芬克霍(1986)提出,大多数研究已经受到单因素理论的指导,但它们都集中探讨了4个相互补充的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是:(1)与儿童在性关系方面的情绪和谐;(2)由儿童导致的性唤起;(3)发展社会赞同的关系的障碍;(4)与儿童性关系中的去抑制现象。这些问题对于概括近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框架。

情绪和谐(emotional congruence)问题涉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与儿童的性关系能够使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或者与个人的需要相一致。心理动力学理论家已经提出了几个动机性的来源。很多儿童性骚扰者的固着尤其意味着发展的未成熟和不适当感。因此,与儿童的性关系比与成人的性关系更少受到威胁,使他们感到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对这种观点的扩展是,有人提出恋童癖者对儿童的吸引是自恋性的,反映了对与他自己相似的儿童的卷入。后一种观点没有得到检验,但是,对于恋童癖者发现儿童较少威胁性的主张有一些支持。豪厄尔斯(K. Howells, 1979)对异性恋的恋童癖者和非性犯罪人的行为项目网(repertory grids)进行比较,发现恋童癖者更强烈地按照支配—顺从来理解成年人的关系。认为成人更有可能对他们有影响,而儿童则是非支配性的,这表明恋童癖者缺乏控制其环境的技能。

也有一些提示性的证据表明,儿童性骚扰者是“不成熟的”,他们缺乏自尊或适当感。对社会技能的研究表明,很多儿童性骚扰者缺乏自信(参见下文),人格测验的资料指明了这个方向。威尔逊(G. D. Wilson)和考克斯(D. N. Cox)(1983)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艾森克人格调查表(EPQ),他们对英国恋童癖者俱乐部的成员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人暴露出内向、害羞、敏感、孤独、抑郁以及缺乏幽默感。潘顿(J. J. Panton, 1979a)对被监禁的儿童性骚扰者和乱伦犯罪人在MMPI测试中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两组被试在表明自我意识障碍、焦虑、不适应和不安全感以及对攻击抑制的量表上得分都很高。乱伦犯罪人只是在社交更内向方面不同。另一方面,霍尔(G. C. N. Hall)等人(1986)在对大样本的被监禁的儿童性骚扰者的MMPI测量中,没有发现特别的模式,并且也无法与乱伦、强奸或使用暴力相区别。他们由此推论,儿童性骚扰者在人格方面是异质的。可是,他们的样本中仅有7%的人有一个完全在正常限制内的剖面图,在病态人格分量表(Pd)上有2/3的人分数过高;在精神分裂症分量表(Sc)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分数过高,表明这些人共同具有不良的社会化、自我意识障碍和混乱思维。

进一步的心理动力学假设是,儿童被害是控制个人童年期虐待创伤的一种尝试,在对性施虐狂的解释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芬克霍(D. Finkelhor, 1986)指出,根据“虐待循环”(cycle of abuse)假设预测,女性受虐待者应当占绝大多数。可是,卡特(D. L.

Carter) 等人强调 (1987), 儿童性骚扰者的 57% 报告了童年期的性虐待, 而强奸犯报告童年期性虐待的是 23%。另一方面, 乱伦的父亲没有报告童年期性虐待的高频率, 而身体虐待和父母的拒绝是更普遍的。

为什么一些男性对儿童产生性唤起? 这个问题已经普遍地根据手淫幻想形成的条件作用来回答, 但关于性唤起学习的直接证据是不足的。在童年期, 恋童癖者对色情作品几乎没有兴趣, 这种证据表明色情作品不是学习的重要来源。可是, 除了童年期性虐待创伤性经历的可能影响外, 性犯罪人倾向于比一般青少年男性在较早的年龄与成人有最初的彼此同意的性行为经验, 这方面有一些证据。可以相信, 通过强化和模仿, 这会导致与同辈朋友较早的性实验 (sexual experimentation), 虽然存在这样的可能, 但是, 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儿童比成人导致更多的性唤起。

一些研究已经集中探讨了引起儿童性骚扰者性唤起的那些刺激的特征。已有的一个假设是, 乱伦犯罪人表现出的对儿童的偏爱很少。艾贝尔 (G. G. Abel) 等人 (1981) 录制了描述不同情境中行为的录音磁带, 内容涉及在与儿童的性互动中不同程度的彼此同意的性行为、身体强制的性行为、对儿童的身体攻击和与成年妇女的彼此同意的性行为。以这些作为实验材料, 对小样本的乱伦犯罪人、异性恋童癖者和混合型的性变态者的阴茎体积描记器反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恋童癖指数” (paedophile index) 方面, 乱伦犯罪人比恋童癖者得分更高, 恋童癖者比对照组得分要高。可是, 恋童癖者在“攻击性指数” (aggression index) 上得分也较高。艾弗里—克拉克 (C. A. Avery-Clark) 和劳斯 (D. R. Laws) 也发现 (1984), 更危险的儿童性骚扰者和几乎没有危险的儿童性骚扰者之间在攻击性指数上差异相似。可是, 巴巴利 (H. E. Barbaree, 1990) 描述了对乱伦的儿童性骚扰者、非家庭性儿童性骚扰者 (nonfamilial child molester) 和非犯罪人对照组的阴茎体积描记器的评价, 这种评价是通过向这些人显示裸露女性的幻灯的方式进行的, 这些女性从 3 岁至 24 岁不等。他们确认为五种剖面图模式 (儿童、儿童—成人, 没有区别性的、青少年—成人、成人), 这些模式在三个组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乱伦组中没有人对儿童、幻灯片上的大多数成人或没有区别性的模式产生反应。儿童性骚扰者更有可能对儿童产生反应, 但 1/3 的人也对已成熟成人 (produced adult) 或青少年—成人 (teen-adult) 模式产生反应。这些研究结果依据的样本比艾贝尔 (G. G. Abel, 1981) 的样本大, 因此, 这些研究结果支持这种观点, 即某些儿童性骚扰者, 尤其是乱伦犯罪人, 没有对儿童的性偏好。

对性偏好的学习可能受生物学因素, 例如激素的水平的影响。但是, 拉德 (R. T. Rada)、劳斯 (D. R. Laws) 和凯尔纳 (R. Kellner) 发现 (1976), 儿童性骚扰者在血浆睾酮水平上与强奸犯或者对照组没有区别。可是, 发现了一些恋童癖者有大脑皮层机能失调的证据。赫克 (S. J. Hucker) 等人发现 (1986), 在 CT 扫描检查和神经心理测验中, 异性恋童癖者和同性恋童癖者在大脑皮层左颞区比非性犯罪人有更多的异常。这个结果与弗洛—亨利 (P. Flor-Henry) 等人 (1991) 发现的恋童癖者和裸露癖者优势半球的脑电图异常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明性变态者学习性偏好的心理机制受到了损害。可是, 这并没有解释恋童癖者兴趣的特殊性。

障碍 (blockage) 因素涉及到这样一种假设, 即儿童性骚扰者在形成成人异性恋关系中受到阻碍或者抑制, 因此寻求较少受挫的相互作用。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中, 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一种阉割焦虑, 在学习理论中则被假设为性犯罪人缺乏异性社交技能。这种观点特别

适用于乱伦，这些人面临婚姻的压力或不满足时就选择替代的性伴侣。与情绪和谐因素(emotional congruence factor)不同，这种假说假定，儿童性骚扰者是被“推”(pushed)向与儿童的性接触的，而不是由显然可见的吸引力“拉”向与儿童的性接触的。

在临床研究和投射测验中，已经发现了儿童性骚扰者有异性恋焦虑的证据；从有控制的观察中已经得到经验性支持，这些研究对儿童性骚扰者、强奸犯、非性犯罪人和守法者的异性社交表现进行了比较。例如，奥弗霍尔泽(J. C. Overholser)和贝克(S. Beck)发现(1986)，强奸犯和儿童性骚扰者的社会技能有相似的缺陷，儿童性骚扰者报告说，他们对消极评价的恐惧更严重，他们也把自己描述得更不自信。也有研究者发现，乱伦的父亲有社会技能缺陷，并且有很弱的男子气认同。可是，在这种犯罪人中，家庭疏远(family isolation)和家庭解组似乎比婚姻的不满意更重要。

第四个因素是去抑制(disinhibition)，这个因素与那种反对与儿童有性行为的传统抑制的缺乏或丧失有关。已经有人提出了素质因素和情境因素。那种认为儿童性骚扰者不是由年老引起的，就是由智力低下引起的刻板模式，并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获得他们与严重的精神障碍有关系的证据。被监禁的犯罪人样本在MMPI病态人格分量表(Pd)上的一致高分表明，有缺陷的社会化可能是很重要的，不过一般的犯罪人也有这样的特征。可是，对乱伦父亲的研究表明，在这种关系中更特殊的因素，例如，与儿童不利的联系或移情，可能起作用。与继父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受到性骚扰的危险更大，这种情况也表明，在这种关系中父亲本身起一定作用。

在儿童性骚扰中，酒精有时也被作为一个可能的因素，但是，酒精对儿童性骚扰者的影响是否比对其他犯罪人的影响更特殊，这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酒精特别可能被儿童性骚扰者用作一种借口，并且很可能被歪曲为正当的理由。艾贝尔(G. G. Abel)等人从临床观察研究中(1984)，识别出儿童性骚扰者的几种认知歪曲，例如，儿童缺乏抵抗意味着愿意的看法；认为儿童没有把生殖器抚弄看作一种伤害，这种经验教导儿童关于性的知识；社会将会认可成人—儿童的性关系。有人对儿童性骚扰者和强奸犯、几个非犯罪人对照组关于成人—儿童性接触描述的评估和对问卷的反应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上述观察研究的结果。儿童性骚扰者对儿童的好处更大，认为儿童在最初的性接触中有更多的共犯关系(complicity)；他们很少把责任归因于成年人。他们也赞同关于成人—儿童接触的更宽容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否因此而合理化，或是否用来抵销对儿童吸引的因素的抑制，是不确定的。

因此，关于儿童性骚扰原因的证据仍然是不完整的。但是，正如这种简短的概述所指出的那样，在这4种因素中，每一种因素的潜在作用都有支持性证据。随着犯罪行为的更加普遍化，骚扰儿童的决定对个人发展和目前情境的多重影响，可能会达到顶点。

第十二章 司法心理学和犯罪人

第一节 引言

实验心理学对于知觉和记忆的研究，促进了对证人证言的早期兴趣，在20世纪初，欧洲的许多心理学家发表了他们在刑事和民事审判中的研究成果。在美国，闵斯特贝格（H. Munsterberg, 1908）认为，犯罪侦查和法庭诉讼程序可以从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好处，但是，律师以及他的许多同行却认为，他的主张是不现实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司法界才开始在个别审判或政策制定中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尽管心理法律研究（psycholegal research）在近期得到发展，但这种使用仍然是不规则和选择性的。不过，在个别案件中对心理学证据的使用近期已有所增加，本章将集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节 司法心理学

司法心理学（forensic psychology）这个术语有时并不严谨地等同于心理学在一般法律领域的应用。例如，康诺利（K. Connolly）和麦克勒（P. McKellar）（1963）把司法心理学定义为：心理学在**法庭诉讼程序、警察调查和有关事务中的应用**，因此强调在法律领域中对行为的研究。巴特尔（C. R. Bartol）和巴特尔（A. M. Bartol）（1987）也把司法心理学看作对与诉讼程序有关的行为的研究，包括犯罪行为和**法律系统内的专业实践**（professional practice）。可是，与法律有关的研究通常是为了检验心理学的理论，或者是因为法律环境中的行为符合心理学的兴趣，这样的研究通过其应用环境来加以区别，而不是通过其理论或方法论来加以区别。同样，刑事司法系统中很多**专业实践**，例如，对犯罪人的临床服务，并不要求独特的技术。

可是，“司法的”（forensic）意味着与**司法场所**（forum）有关，即**司法机关或法院**。美国心理学—法律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第41分会对此作了一个联合的表述，司法心理学被定义为：

心理学专家根据已有的知识，对在对法庭、诉讼当事人、矫正部门、司法精神卫生机构以及具有司法职能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和立法机构遇到的心理法律问题，明确地提供直接帮助的各种专业心理学处理（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onduct）形式。

尽管这包括从研究以及个人评估中提供研究结果，但重点是提供关于特殊案件的证据，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对于罪犯，只关注收集有关上诉、假释或法庭审理的证据。在这个方面，司法心理学家从事一种**专门的工作**，这种专门的工作在三个方面偏离了研究者或临床医师的职责。第一，从事研究或临床实践的人员不具备收集和交换证据所需要的技能。

第二, 这些信息专门由法律决策者使用, 而不是用于科学界或心理健康部门。第三, 心理学家是需要这种证据的司法官员的代理人, 而不是被告的代理人。因此, 当被告是顾客时, 道德约束限制了证据在这方面的应用。

司法心理学家可能是实验心理学家, 也可能是应用心理学家, 但大多数是根据个人评估提供证据的临床医师。他们的作用没有局限在刑事案件中, 很多人越来越多地卷人民事案件, 这些民事案件涉及儿童监护和由人身伤害或创伤产生的赔偿要求。可是, 这里强调的是刑事案件中的心理学证据。

第三节 心理学家和警方调查

在英国, 心理学对警方的直接服务相对而言是有限制的, 但是, 在美国, 心理学在警方工作中的应用却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包括选拔和培训, 对警察官员的临床服务, 在危机干预中的训练和各种咨询服务。帮助警察识别和讯问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成为研究的目标。可是, 这些工作中的大多数都在上述司法心理学定义的范围之外; 在特殊事件的调查中, 主要提供咨询服务。心理学家已经作出贡献的两个特殊领域是犯罪人的特征描述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

一、犯罪人的特征描述

心理学“特征描述”(profiling)或“犯罪现场分析”(crime scene analysis)的目的是帮助警方发现犯罪人, 这种帮助是通过从犯罪中可得的信息推断出犯罪人的个人特征实现的。它的萌芽可能出现在虚构的侦探的演绎推理和心理动力学对政客的“描绘”(portraits)中, 目前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 那时警察部门先是邀请精神病学家、然后是心理学家给出未知犯罪人行为的临床解释。随后, 由联邦调查局研究院的行为科学组(the Behavioral Sciences Unit of the FBI Academy)发展了特征描述的方法, 这种方法已经导致了更多有关犯罪和犯罪人特征之间联系的实证探讨。

对犯罪人的特征描述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对此目前显然没有一致意见, 但特征描述的过程利用了物质信息和非物质信息。这包括从被害人的角度和重要物品是否缺少, 对犯罪现场的布局进行的分析; 关于被害人受害情况和事件顺序的证据; 作案者在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行为。根据这些资料, 可以推断出特定行为可能具有的意义和动机。例如, 捆绑被害人表明有控制的需要, 而在性交前刺伤被害人可能意味着需要从痛苦和血液中唤起性欲。被害人特征、犯罪场所、交通工具的使用和与先前犯罪的关系, 也可能表明犯罪人的社会特征和人口统计学特征, 诸如年龄、种族或职业。

特科(R. N. Turco, 1990)认为, 特征描述类似于罗夏墨迹测验的临床使用, 这种比较会招致很多心理学家的指责! 可是, 迪茨(P. Dietz, 1985)则认为, 特征描述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而产生假设。从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组的观察中, 他了解到吸收犯罪资料的各个阶段的进展, 对作为一种行为事件的犯罪的重建, 动机假设的系统阐述, 关于犯罪人的类型学假设, 以及对犯罪人特殊特征的分析。

这种目标将使调查研究的范围缩小; 基本的假设是, 犯罪人在犯罪现场的行为, 反映了人格特征与犯罪方法的一致性。因此, 研究的焦点一直是在系列犯罪和性侵害方面, 90%

的特征描述尝试都涉及谋杀或强奸。霍姆斯(R.M.Holmes, 1989)指出,当犯罪现场反映了精神病理学症状,例如施虐型伤害、强奸或恐怖杀人(satanic killing)和邪教杀人(cult killings)时,特征描述最有用。不过,在纵火、打淫秽电话和银行抢劫案中也有采用特征描述的事例。对病理学的重视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临床专家鉴定可以阐明异乎寻常的犯罪或明显无动机的犯罪中“谋杀犯的心理”,对病理学的重视说明了心理动力学的探讨在早期的特征描述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为临床目的而发展的、试图证明犯罪与性犯罪人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可以看到(参见第十一章)。可是,可靠的特征描述要求有经过实践证实的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经得起犯罪现场分析者可以得到的资料的检验。在这个方面,临床类型学对调查者的价值是有限的。

有一些人试图发展与特征描述直接相关的类型学。例如,联邦调查局的特征描述者利用二分法,将犯罪现场和谋杀犯分成**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organised v. disorganised)。有组织的犯罪显示出有计划和控制的证据,而无组织的犯罪现场表现出偶然的行爲。由此提出犯罪人的不同类型。关于这种区分的效度证据,已由雷斯勒(R. K. Ressler)等人获得(1986),他们利用了联邦调查局关于36名性谋杀犯的档案资料,其中24人被描述为有组织的,12人被描述为无组织的。在犯罪期间,有组织的杀人犯更可能使用约束措施,在被害人死亡之前与其有性关系,表现对被害人的控制,并使用工具。根据个人的特征,无组织的谋杀犯智力低下或没有什么职业技能,性抑制更严重。他们也更有可能认识被害人,单独生活,在住宅周围犯罪,在行凶期间受到威胁和扰乱。可是,这些犯罪人在很多因素上相互重叠。另一种类型学是根据动机把系列谋杀犯分成幻觉型、使命型、享乐型和权力控制型。可是,这些类型并不相互排斥,并且只是轶事性的事后描述。

坎特(D. Canter, 1989)提出,犯罪期间所进行的行为,直描反映了犯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杀害先前没有交往的被害人的谋杀犯,可能更普遍地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同样,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场所和空间模式,可能与犯罪人生活方式的更一般特征有关系。坎特认为,犯罪行为模式在建立犯罪现场资料与犯罪人特征的关系中是必需的第一步。坎特(D. Canter)和赫里迪奇(R. Heritage)(1990)描述了一项对犯罪因素的探索性研究,研究中确定的犯罪因素来自66个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的陈述。通过使用非计量性多维度评定形式(nonmetric form of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他们在这种资料中确定了一个两维的、放射形的结构(radex structure)。在这个空间的中心是最频繁的活动,例如,阴道性交,对被害人缺少反应,使用非人格化的语言,进行出人意料的攻击;这些情况表明,把妇女当作一个性对象是大多数性侵害的核心。可是,把围绕两维空间进行的因素分类,为一些理论提供了支持,这些理论用不同的方式将性侵害与试图亲近、性满足、攻击、非人性相互作用和犯罪性联系起来。有人提出,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犯罪人中将会有不同的组合。

研究者常常认为,特征描述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关于其效度的证据是有限的。霍姆斯(R. M. Holmes, 1989)报告,联邦调查局1981年的资料表明,在使用特征描述的192个案件中,88人被逮捕,但这些人中只有17%是通过特征描述被逮捕的。坎特(D. Canter)和赫里迪奇(R. Heritage)(1990)引证了最近的联邦调查局资料,声称准确率达80%,不过这已经引起争论。正如坎特(D. Canter, 1989)指出的那样,如果在帮助警方工作中,心理学的特征描述要获得比占星术或唯灵论更确实的基础,那么,心理学

家不但需要建立特征描述过程的预测效度,而且还需要说明轮廓描述发挥作用的原因。

二、警察讯问

对嫌疑犯进行讯问目的在于使其招供,美国警察专门接受为了有效实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技术训练。可是,由于在一些众所周知的案件中有可能存在强迫和引诱假供的现象,所以,这些方法一直受到关注。欧文(B. L. Irving)和希尔金多弗(E. L. Hilgendorf)(1980)把讯问描述为一种操纵犯罪嫌疑人做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影响供认的代价和好处来实现的。例如,讯问人员可以强调诚实对于后来法庭处理的结果、讯问人员的赞许或者自尊心的结果。这些手段的效果通过监禁环境和犯罪嫌疑人的相对无权力状态而得到加强。

很多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极端焦虑,一些人可能处于醉酒、精神疾病或心理缺陷的状态。因此,一些人由于素质因素或暂时状态因素,很容易受说服技术的影响而供述,心理缺陷的嫌疑犯特别容易受影响。古汀逊(G. H. Gudjonsson, 1984, 1988)发展了一种暗示感受性量表(Suggestibility Scale),这个量表用来测量在正式讯问期间通过信息交流受到影响的个人反应的程度。他提出,该量表可以评价嫌疑人处理不确定讯问情境的应付策略。该量表与智商和自信心呈负相关,与状态焦虑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呈正相关,并且可以把虚假供认者和坚持否认犯罪的嫌疑犯区别开来。不是所有在法庭上翻供的人都是易受影响的,古汀逊(G. H. Gudjonsson, 1984)已经使用这个量表识别那些供认“不可靠的”犯罪嫌疑人。

尽管很多嫌疑人在讯问时进行供认,但是警察手册关注对欺骗的识别。例如,有人假定,说谎与外显行为线索有关系,诸如眼动的变化,声音的高低变化或手势,不过,实验证据对这些线索的可靠性提供的支持很少。美国警察部门特别依赖多道记录仪(polygraph)¹,它对嫌疑人就识别欺骗提问期间的自动反应进行记录。多道记录仪作为一个心理生理学研究工具的效度是不可怀疑的,但“多道记录仪测验”作为一种测谎仪(lie detector)的功用则引起了争论(参见第六章)。

多道记录仪测验1917年由哈佛大学一位心理学家引进,但在1923年弗赖诉合众国案件(Frye v. United States)的里程碑式判决中,多道记录仪测试的结果被拒绝作为法庭的证据。不过,后来美国的一些警察部门继续研制,现在已经用于几个国家的刑事调查中(英国心理学会,1986年)。现在,多道记录仪也进入美国很多州的法院,但在加拿大、英国、很多欧洲国家仍然不许使用。可是,多道记录仪在商业组织和政府部门筛选“诚实”雇员中的使用超过了司法工作中的应用,有人估计,在美国,每年实施200万次多道记录仪的测验。英国政府提议为了安全检查引进这种测验,结果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也受到心理学家的批评(英国心理学会,1986年)。

由于没有说谎的独特心理反应模式,所以,这种多道记录仪不能发现“说谎”,而是测出讯问期间唤醒的变化。系统所记录的通常是皮肤电阻、呼吸、心率和血压,一些测谎员使用数字评分系统,大多数依靠对记录痕迹的总体检查。最初的测试方法是把对“相关”问题的反应(你犯过罪吗?)和对无关问题的反应(今天是星期二吗?)进行比较。这种方法仍

1. 多道记录仪(polygraph)是一种可以记录多种生理指标变化的仪器,在生理心理学研究中广泛使用,后来被用于司法等领域,作为测谎仪使用。因此,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时,将英文polygraph译为“多道记录仪”;在引申意义上使用时,与lie detector(测谎仪)的意义相同,也被译为“测谎仪”。——校注

然在使用,但普遍认为这种方法太幼稚,因为被试可能因除了有罪以外的理由,例如,愤怒或局促不安而对相关问题反应强烈。在雇用筛选中更普通的形式是“相关—相关”提问技术,在相关问题中覆盖了几个问题。这种技术一直没有得到研究,甚至多道记录仪测试的支持者也对它的效度表示怀疑。可是,一些人为这种测验辩护,因为它常常引出对欺骗的供认,并且可以威慑不诚实的雇员。

很多人在调查特殊事件中频繁使用的是控制问题测验(Control Question Test, CQT),测验中把受测试者对相关问题的反应与涉及过去行为的其他反应相比较(例如,你曾经伤害过某人吗?)。评论家已对此提出质疑,其基本原理是:有罪的人更多地与相关问题有关系,无辜的被试则与控制的问题有关系,因为只有后者才有可能被看成是说谎。另一种技术是犯罪情景测试(Guilty Knowledge Test, GKT),由莱肯(D. T. Lykken)引进,他强调这是一种再认测量而不是测谎仪。测验中要求被试回答有关犯罪的多种选择问题,被试对特殊选择性问题的回答只有犯罪者才可能知道(例如,使用的武器,服装的颜色)。由于对几个这样的问题偶然反应的可能性小,所以,犯罪情境测试(GKT)被认为是可以保护无辜者的。

虽然一些美国心理学家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多道记录仪测验,但是,大多数测谎员不是心理生理学家,很多人是经过短期培训的警察。一些心理学家,例如莱肯(D. T. Lykken, 1988),严厉批评了多道记录仪的使用,认为其准确性缺乏科学的基础。其他人如拉斯金(D. C. Raskin, 1988)指出,多道记录仪对于受过恰当训练的人员来说是一种有用的调查工具。在确立控制问题测验(CQT)的效度方面,还没有产生一致的结果。实验室研究允许控制真实和欺骗,但缺乏外部效度,因为被试在这种结果中没有情绪的卷入。可是,亚克诺(W. G. Iacono)和帕特里克(C. J. Patriok)(1987)报告了一种涉及到对现实情况进行操纵的实验,在这种实验中,控制问题测试(CQT)正确地鉴定了87%的欺骗被试,但真实的被试只有56%。他们指出,一种常见的研究结果是,发现把很多无辜的被试认作惯于说谎的人。

由于缺乏有关欺骗的独立标准,对欺骗的判断依赖于供述或专门法律小组的判断,对实际案件的现场研究是很有限的。可是,对于恰当准确的测试应该包括什么内容的问题,人们存在不同意见。例如,拉斯金(D. C. Raskin, 1988)坚持认为,由受过训练的调查者所做的全部测查必须得到证实。与此相反,批评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多道记录仪测得结果“盲目”解释,是否把任何其他东西加在讯问条件上,因为测谎员可能根据被试的行为而不是生理反应作出决定。因此,争论的另一方依靠的是不同的研究。拉斯金(D. C. Raskin, 1988)指出,由于在刑事调查中小心使用,控制问题测试(CQT)的准确性对于有罪的被试可能达到95%,对于无辜者则达到85%,这使我们有可能确信从通过测试的人中甄别出无辜。另一方面,莱肯(D. T. Lykken, 1988)推断出,控制问题测试在1/3以上的案件中有误,并且强调这种测验可能受到反测验措施的冲击,例如,在回答控制问题期间咬舌头。他认为,犯罪情景测试避免了这些问题。可是,犯罪情景测试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拉斯金认为犯罪情景测试对很多调查不适用。

测谎方法所产生的问题,超过了科学的效度问题,因为它们的使用涉及欺骗,强调诱导,侵犯了隐私,这些可能违犯了心理学家的职业道德规范(英国心理学会,1986)。因此,通过未来的实证研究解决有关测谎的争论是不可能的。不过,测谎研究中报告的错误率少于危险性临床预测中发生的错误,所以,它还是有价值的。

第四节 心理学家和刑事法庭

刑事案件中关键的心理学问题是被告的心理状态,法院传统上请精神病学家提供有关精神疾病的证言。可是,心理学方法的独立贡献在1962年詹金斯诉合众国案(Jenkins v. United States)中得到确认,那时哥伦比亚地区上诉法院准许使用临床心理学家作为诊断精神障碍的专家。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精神病人住院法律(commitment law)的改革,司法心理学“突然走红”,建立了“美国司法心理学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Psychology),就法庭事务提供专家鉴定。在过去的10年间,至少出版了十几本司法心理学的教科书,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很多临床心理学家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一些人被司法机构雇用,一些人附属于法院门诊部,而很多人在私立部门提供服务。尽管不能精确肯定所涉及的数字,但是格里索(T. Grisso, 1987)指出,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足以代表心理学对司法系统的大多数影响来源。

英国法院在承认心理学家参与刑事案件方面,一直有较多的限制,但律师已经观察到心理学家对刑事案件的贡献会越来越大。英国心理学会1985年做的一个调查确认,在先前的5年间,有185位心理学家曾经给法院或精神健康审查法庭(这属于准法庭)提供证据。在这些人中,71%是临床心理学家,22%是教育心理学家,大约一半的人曾经在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可是,只有少数人定期出庭;在提出的每10个报告中,心理学家可能给予只有一次或两次的口头证言。在北美也一样应用心理学家的证言,为法律使用提供的证据比心理学家出庭作证人更为广泛。

一、作为专家证人的心理学家

英美法院采用抗辩制(adversarial system),与欧洲国家纠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形成对比,他们关注的不是查明事实,而是发现起诉的案件是否能够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在这个系统内,辩护和起诉双方提出最好的例证,向他们的对手提出挑战,专家证言可能被用来加强某一例证,或暗中破坏它。举证顺序以主询问(examination-in-chief)开始,律师要求证人设法支持他或她的当事人的案件。然后该证人受到对方律师交叉询问,检验专家证言的质量,并且可能对其证据的可信性提出质问。在再直接询问(re-direct examination)中,雇佣专家的律师设法消除交叉询问的影响,虽然可能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

证据的性质受司法规则的制约。例如,传闻证据禁用规则(hearsay rule)以间接获得证据的人不能被交叉询问为理由,排除不是由证人直接获得的证据,从而使被告免受不公正或不安全证据的侵害。所以,心理学家不应当提供助手的研究结果,精神病学家的报告也不应当包含心理学家的测验结果。传闻证据禁用规则不经常应用,但它以被试没有提出证明为理由,引起排除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

规则也影响专家证据(expert evidence)的定义和作用,尽管法官根据专家证言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判决。普通证人陈述犯罪时所观察到的情况,“事实”由**事实法官**(triers of fact)决定,即由法官和陪审团决定。专家证据不提供“事实”,而是由从事过相关研究和具有相关经验、被认为合格的人,就某一特殊知识领域得出结论,形成了具有合理可能性的意见。专家证言可采性的标准随司法管辖区和证据的种类而变化,格林(E. Greene)、

斯库勒 (J. W. Schooler) 和洛夫特斯 (E. F. Loftus) (1985) 确定了 4 个传统的条件: (1) 面临的问题必须超过一般陪审员的普通理解水平; (2) 专家必须是完全合格的, 以便他或她的意见能够帮助陪审团; (3) 专家证明的证据必须在科学上是可靠的, 并且在科学界内得到广泛认可; (4) 证据的证明价值必须超过其不利影响。上述的每一个标准都已经引起了争论。

首先, 普遍认为医学疾病超出了陪审员的理解能力, 而临床心理学家的参与资格常常因缺乏医学资格而受到限制。例如, 希尔 (A. M. Hill) 和格里菲思 (R. C. Griffiths) 注意到 (1982), 1981 年在 R 诉麦肯尼案 (R. v. McKinney) 中, 英国上诉法院规定, 心理学家 (实际上是社会心理学家) 不是证明证据可靠性的合适专家, 因为这是医学的证据。因此, 他们提出, 司法心理学的未来更多的在于调查研究, 而不是在于提供直接的证言。可是, 医学资格对于一个医学证据来说并不是必备条件, 实际上, 法庭已经普遍采纳关于精神障碍的心理学证据, 尤其是在智力落后、脑损伤、性变态、人格障碍的案件中, 至少在心理健康复查法庭的案件中是如此。在美国以及在英国, 临床心理学家已经越来越多的以精神病学家的名义进入刑事案件法庭。

可是, 在“正常”案件中, 法庭对心理学家的证言仍然是有限制的。例如, 他们普遍接受有关应激影响、或心理疾病、智力落后等特殊情况的证据, 但不接受某些人没有精神障碍的证据。法律上的规定是: “在正常范围内的人性和人类行为问题, 并没有超出法官和陪审团的经验和知识。”由于这个理由, 关于目击证人证言实验研究结果的证据在英国是不采纳的; 不过, 当对被告的鉴定有争议时, 美国一直允许采纳这样的研究结果。心理学家虽然对把他们的研究课题降低为“常识”感到愤愤不平, 但他们的同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 麦科斯克 (M. McClosky) 和埃格斯 (H. E. Egeth) (1983) 对关于证据可靠性的专家证言的解释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这样的观点, 即陪审员不是过分相信目击证人, 就是在提出专家证言时作出较好的对待。这种观点已经受到洛夫特斯 (E. F. Loftus, 1985, 1988) 和其同事有力的辩驳。可是, 帕切拉 (R. G. Pachella, 1988) 走得更远, 他赞同从所有刑事诉讼程序中排除心理学专家证言, 理由是专家的心理证言没有超出普通经验的范围。他指出, 虽然心理学的知识在更清晰的表达和解释问题方面不同于门外汉的知识, 但心理学的知识并不必然是更全面的。

关于专家证人资格的标准似乎很少引起争议。可是, 律师普遍没有意识到不同的心理学分支间训练的差别, 有时要求没有适当资格的心理学家对特殊问题提供服务。职业道德会迫使他们拒绝作证。

第三个标准要求心理学的方法应当具有普遍的科学上的可接受性, 但这一点对于缺乏普遍认可的理论学科来说是有问题的。在美国, 这个原则受 1923 年的弗赖裁决 (Frye Decision) 指导, 该判决排除了测谎仪测验的结果, 并且明确说明科学的证据一定是在特殊的领域内普遍认可的。一种含义是, 心理学证据必须利用符合“惯例与常规”的测验和方法, 产生该领域其他专家能获得的意见。英国坚持这种观点, 这反映在英国司法部门强调根据传统的智力测验和神经心理学测验, 给出关于认知功能的证据。可是, 心理学专家证言的批评者已经注意到, 缺乏经双方同意而产生的协议。福斯特 (D. Faust) 和齐斯金 (J. Ziskin) 也认为 (1988), 就犯罪人的诊断问题或未来行为提供证言的临床医师, 歪曲了临床判断的可靠性, 并且超出了科学上所能接受的范围。

最后,心理学证言是否比偏见更能提供证明也一直受到怀疑。例如,可以相信,陪审员可能受目击证人证言的影响,这种证据已达到对可靠的证据表示怀疑的程度,可是,虽然存在这些争论,但大多数心理学的证据似乎都被法院乐意地接受了。

二、心理学证据的准备

心理学家对法庭诉讼的贡献不仅限于提供了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mental state)的证言,他们也可以寻找有关证人或者被害人行为的证据。辩护律师是最频繁地提出诊断建议的来源,已提出的问题种类,部分依赖于他们对心理学的熟悉程度,也依赖于心理学家在把法庭的问题转变成心理学问题中的创造性。曾在英国司法心理学发展中起过突出作用的霍厄德(L. R. C. Haward, 1981)叙述了心理学家的多种贡献,例如,再现被指控为商店行窃者的人,在一定剂量的巴比妥类药物(催眠、镇静用的)和酒精的混合作用下的心理状态;确定智力缺陷青年使用道路(road-using)的技能;指出进行犯罪和抑制犯罪的性动机;证实知觉定势或者情境条件对警察证据的影响。

霍厄德(L. R. C. Haward, 1981)指出,在产生相关的证据方面,司法心理学家采用下列四种功能中的一种。作为一个**实验员**(experimenter),心理学家可以总结在实验或调查中得到的研究结果,或者进行实验室研究或现场研究,以证实某些影响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临床医师**(clinician),心理学家使用临床评估的方法,常常确立心理能力、能量(capacity)或可治疗性的某些方面。作为一个**统计员**(actuary),心理学家利用已出版的资料确立一些事件的概率,例如,证人声称已经观察到一个事件的照明条件。最后,作为一个**顾问**,心理学家可以帮助提供咨询,例如,通过对证人的心理特征作出观察,使其不作为证人出现。在美国,一些心理学家在陪审团更换选择(jury deselection)或预先审查(voire dire)程序中充当顾问。

最常见的发挥作用的功能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医师,但他们的临床知识和评价技能是不充足的,因为评价的条件和目的不同于标准的临床实践。例如,建立一种治疗关系或保证恰当的治疗通常不是心理学家作为一个司法专家作用的任务。另外,心理学家的意见被法律官员用来回答法律环境中的法律问题,这种为其他心理健康专家作准备或为案例讨论提供准备的报告,不可能帮助法庭。

准备证据的第一步是要查明确切的提交评估的问题以及对心理学评估适合性。虽然一些心理学家依靠行为评估或访谈,但证据普遍依靠测验资料,英国的证据普遍来源于智力测验和神经心理学测验。特殊测验的选择可能需要提出理由。可是,专家证言的标准之间存在着矛盾,例如,弗赖标准(Frye standard)规定了对公认的测量工具的保守选择,并且需要心理学家使用与司法问题有关的新程序。这方面的一些测量已经得到发展,如古汀逊(G. H. Gudjonsson, 1984)的暗示感受性量表。在北美,其他主要的可用量表是罗杰斯(R. Rogers, 1987)的“罗杰斯刑事责任评估量表”(Roger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ssessment Scales),该量表测量与精神错乱辩护的美国法学会(ALI)标准有关的心理因素;还有评估能力用的“多学科适合性访谈”(the Interdisciplinary Fitness Interview),这种访谈由律师和心理学家联合完成,不管诉讼怎样,心理学家都必须对他们使用测验的背景非常熟悉。马特拉佐(J. D. Matarazzo, 1990)注意到,一些律师在获得心理测验指导方面已经产生误解,他们可能盘问证人这样的问题,例如测验的可靠性、测量的标准误

差或分测验相互间关系的意义。

由于心理学的证言通常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如果心理学家亲自出庭的话,交叉讯问将以书面报告为基础进行,因此书面报告是证据的关键特征。皮特莱罗(R. C. Petrella)和波伊思雷斯(N. G. Poythress)发现(1983),律师评定临床心理学家报告的质量比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报告更高,但在这种场合,所有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都从训练工作人员的司法中心内产生,对所有报告的标准都作有利的判断。更常见的是,司法心理学的报告受到既不是法庭的、也不是心理学的批评。韦纳(I. B. Weiner, 1987)提出了关于法院报告结构的指导原则,他指出,报告的关键特征是清晰、关联性和信息的价值。它们首先应当包含的是对资格的陈述,包括相关的经历,这些相关经历比学位更能给律师以深刻印象。它们也应当详细说明已查阅的文献和其他来源,以及被讯问者是如何被评估的。测验结果的叙述应当避免专业术语,专业术语对于解释技术术语的意思是合适的,例如,标准分数或已被测量的心理功能的性质。专业术语也适合总结相关 的研究。最后,作出的结论应当被表述为一种鉴定意见,并且予以登录。

三、法庭中的心理学证言

在英美法系中,心理学证据的作用在刑事审判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是一般在三个阶段提出。在**审判前阶段**,主要的问题是辩护适合性(fitness to plead)或受审能力,需要评估被告目前的能力。正如第十章所指出的那样,在英国,这种问题很少,并且依靠精神病学的证据;但是在北美,受审能力的评估是司法心理学家的一项普通的任务。彭德尔顿(L. Pendleton, 1980)描述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医院中这种作用的临床范围:与精神病治疗共同使用的技能训练,使最初被发现不适合出庭的90%以上的人恢复了受审能力。

在**审判阶段**,可能提出与犯罪行为(actus reus)或罪过要件(mens rea requirement)有关的证据。在犯罪行为成分的关注所涉及的是,所说的犯罪是否发生,被告是否参与。在很多有关证据的可靠性、证人的知觉歪曲和追溯性供述(retracted confession)的案件中,心理学家已经提供了实验资料。在确定被告的精神状态以驳斥罪过或支持减轻责任或减轻惩罚(mitigation)方面,人们关注的是在犯罪时的功能状况,心理学家的证据一贯是精神病学家的补充物。精神错乱辩护在北美是更可用的,而英国的心理学家已经提供了关于“心理变态”(abnormality of mind)的证据,通常集中在智力功能方面。

心理学家传统上作为辩护方出庭。古汀逊(G. H. Gudjonsson, 1985)发现,在心理学家出庭的案件中,有1/5的案件对方律师也请心理学家出庭。这是抗辩式诉讼制度中必然发生的结果,很多人发现这是令人不愉快的。另一个结果是,作为专家证人的心理学家肯定要接受充满敌意的交叉讯问,对方不但试图证实评估程序是不可信的,而且也怀疑心理学家的专业能力,甚至怀疑这门学科在科学上的可信程度。确实,在美国,一些心理学家已经训练律师用破坏性询问方法询问证人。卡森(D. Carson, 1984)指出,律师会发展询问技能,以便暗中破坏专家的证言。例如,律师可能打断用“不是,但是……”措辞提出的证言,产生不用合格的信息就谴责这种证言的现象。因此,专家证人有必要学习反抗这些技术的技能。

定罪之后,在**量刑阶段**考虑如何处置。能否通过入院令进行治疗,依赖于精神病医师的建议,可是,法院也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通过精神病学缓刑令(psychiatric probation

order) 在社区中治疗的心理学建议, 或者延期或者中止判决。例如, 在非暴力的性犯罪人或心理紊乱的商店行窃者案件中就是如此。在这种案件中, 通常由辩护律师或缓刑官员要求制定治疗计划。病人被关押在何处由《精神卫生法》规定, 现在, 心理学家也参与为精神健康复审法庭提供证据。尽管只有精神病学的报告才是必须提供的, 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寻求关于智力功能、人格障碍、性变态或暴力的心理学证据, 尤其与精神病态障碍和精神损害病人的继续羁押和可治疗性有关系的心理学证据。

四、作为专家证人的心理学家的问題

专家证人的角色对心理学家提出许多专业和伦理学的问题。首先, 大多数只是偶尔在法庭上出现的心理学家, 通常缺乏提供书面司法证据和口头司法证据的必要技能。布罗德斯基 (S. L. Brodsky) 和罗比 (A. Robey) (1972) 对“法庭定向型”和“不熟悉法庭型”两个极端的心理学家进行了对比。不熟悉法庭型证人没有提前与律师交换意见, 准备报告就好像是为案件讨论会而不是为外行的听众, 他们不理解辩护制度或专家证言的性质, 站在证人席上感到害怕, 过分强调技术方面和显得杂乱无章。这样一个心理学家怎么能够随后为心理学和法律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提供证言! 现在北美的很多心理学家已经进入法庭定向型之列, 一些研究生课程提供法庭训练; 在英国, 心理学家不熟悉法庭仍然是一个问题, 法庭的要求现在还没有充分固定, 无法激发获得相关技能的积极性。

对于司法心理学的实践来说, 一个有关的问题是不适当的科学基础。这个学科的很多出版物都不是实证的, 可是, 格里索 (T. Grisso, 1987) 认为, 研究的基础主要是标准的建立。他确定需要新的概念模型以指导司法评估过程, 需要把司法评估更紧密地与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 并且需要新的评价工具。尽管注意到一些有关的进展, 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即因为在司法场所这个“市场”中对妥协的怀疑, 被这个领域吸引的研究者太少, 而且明白研究价值的开业律师太少。他提出, 心理学应当承法律领域市场动力学的道理, 应当为研究者提供奖励, 确立专业的质量控制制度, 对法律消费者进行教育。

可是, 心理学家对他们参与刑事法庭的道德问题是有分歧的。由于抗辩制明显有偏向, 因此, 抗辩制与作为科学和助人专业的心理学传统格格不入, 它所关注之事常常是心理学的更消极的方面。例如, 法庭中误用测验资料, 经常显露测验记分和解释的隐蔽细节, 这与保护这些材料的专业义务是相反的。费施 (E. A. Fersch, 1980) 已建议, 在参加法庭诉讼程序中, 心理学家可能不能够严格遵守他们同意的道德标准。例如, 治疗受到强制的犯罪人或者预测危险性的心理学家, 可能不恰当地使用了其专业能力。在提供专家证言中, 他们面临着与忠诚的冲突, 这种忠诚使他们成为被告的对手而不是被告的保护人, 因为客户是要求服务的法庭官员。因此, 他们不能保护那些他们所评估的人们的利益。费施赞同萨斯 (T. S. Szasz) 的主张, 认为心理学家不应当评估或治疗非自愿的客户。这种见解或许是少数人的观点, 不过, 它与对心理学家作为专家证人的角色的其他批评有联系。可是, 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的增加, 已在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中得到反映, 这份出版物是由司法心理学家道德指导原则委员会 (Committee on Ethical Guidelines for Forensic Psychologist, 1991) 为执行法庭角色的心理学家而写的指导原则, 不管心理学家是固定地、还是偶然地执行这种角色, 他们都应当遵循这些原则。

第五节 犯罪学中的预测

人们常常要求司法心理学家预报或预测个人未来犯罪的可能性。对危险性的临床预测是特别有争议的，这个问题在下一节考察。可是，犯罪学家一直试图发现预测犯罪行为的经验性预测因素。现在首先探讨犯罪学预测中更普遍的问题。

预测研究已经普遍进行，这种研究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根据后来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早期前因，识别出高危群体，目的在于提供预防服务。第二，要创建原因学理论，因为在科学实证论者的观点中，与后来行为相关的前因可能被确定为“原因”（参见第一章）。对少年犯罪人生涯的纵向研究，较早地详述了与这两个目的的关系。可是，这里关注的是第三个目的，即得到在刑事司法决定中使用的预测资料，例如，处置或释放决定。

一种特殊的目的是得到统计学的或保险统计的预测指标（predictive indices），这种预测指数客观地指示最适合的决定。这种预测指标通常与临床预测形成对比，涉及到对危险的主观评价。这使判决任务过分简单化，因为判决任务不但取决于使用临床方法或统计方法综合资料的程度，而且也取决于这些被综合的资料的性质。例如，临床判断可能用数量表示，形成统计学预测因素的一部分，而后者可能是做临床判决中的一个元素。可是，下面的讨论集中于对“客观”资料的统计学综合上面，例如，关于一个人生平的细节或心理学测验的分数。

一、决定预测功用的因素

预测决定需要用**预测因素**（predictor）呈现的资料，这与重要的标准，例如未来违犯假释的情况有联系。预测研究努力识别可以增大预测准确性、较少预测失误的那些危险因素，但预测的准确或效度依赖于预测因素和标准的可靠性。刑事司法预测因素常常是案件历史资料，它的可靠性受到记录质量的制约。把逮捕或重新定罪作为预测标准的可靠性，也会因决定官方记录的任意因素而减弱。此外，单一的行动，例如某种进一步的犯罪，也不可能可靠地表明“成功”或者“失败”。单一的行动取决于情境和机会因素，以及个人的倾向（参见第一章），但是，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那样，预测研究已经疏忽了什么标准是可靠的预测标准的问题。

预测因素和标准之间的关系能够在一个 2×2 表格中看见，在这个表格中，这预测因素和标准被分成两部分（图 12.1a）。假定预测因素是这样**一个因素**，它的存在（+）与暴力累犯的标准（+）相关，它的缺乏（-）与非累犯相关，或者它的缺乏与标准的缺乏（-）相关。那么，就可以做出拘留表现出这种预测因素的人、释放没有表现出这种预测因素的人的决定。当预测因素正确地预测这种结果时（图 12.1（a）中的 a），所做出的预测就是**真实肯定性预测**（true positive prediction）；尽管预测因素存在，但犯罪人没有再犯时（在图 12.1 中（a）的 b），所做出的预测就是**虚假肯定性预测**（false positive prediction）。同样，当不存在预测因素，也没有发生累犯时，所做出的就是**真实否定性预测**（true negative prediction），而**虚假否定性预测**（false negative prediction）就是指错误地把累犯预测为非累犯。预测因素的总准确率可以通过 $a+d/n$ 得到，一个可取的预测因素就是将正确的预测（a 和 d）最大化、将错误或“失误”（b 和 c）最小化的预测因素。可是，在科学中，虚

(a)		(b) 基率=50%	
		标准	
		+	-
		真实肯定	虚假肯定
		a	b
预测因素	+		
	-	c	d
	虚假否定	真实否定	
		40	10
		(50中的80%)	(50中的20%)
		a	b
		10	40
		(50中的20%)	(50中的80%)
		c	d
		50	50
			N=100

(c) 基率=90%		(d) 基率=10%	
		标准	
		+	-
		72	2
		(90中的80%)	(10中的20%)
		a	b
预测因素	+		
	-	c	d
	18	8	
	(90中的20%)	(10中的80%)	
	90	10	
			N=100

(d) 基率=10%		(e) 基率=90%	
		标准	
		+	-
		8	18
		(10中的80%)	(90中的20%)
		a	b
预测因素	+		
	-	c	d
	2	72	
	(10中的20%)	(90中的80%)	
	10	90	
			N=100

图 12.1 基率和预测效率

假肯定性预测和虚假否定性预测都是同样不可取的，它们都没有相等的社会结果。从社会的观点来说，很高的虚假否定预测率 ($c/c+d$) 是不可取的，因为预测因素的使用导致很多不安全的人被释放。与此相反，从公民自由的观点来看，很高的虚假肯定预测率 ($b/a+b$) 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预测因素导致继续关押很多“安全”的人。因此，过分强调两种错误中的任何一种错误，都反映了究竟优先保护谁的利益的社会价值判断。

预测因素的效力 (efficiency) 就是预测因素预测超出机会 (beyond chance) 的范围。这不但取决于它与标准的相关，而且也取决于基率 (base rate)，基率是所关注人口中标准的出现频率。假定调查者确定在 50 名累犯中有 40 名存在预测因素，而在 50 名非累犯中有 10 名缺少预测因素 (图 12.1(b))。那么，这个样本中累犯的基率就是 50%，预测因素的总准确率 (overall accuracy) 就是 80% ($40+40/100$)。虚假肯定预测率是 20% ($10/40+10$)，而虚假否定预测率也是 20%。因此，具有预测因素的累犯概率是 0.8，缺乏预测因素的非累犯的概率同样是 0.8。这种预测因素相对而言是有效的，因为它仅仅依靠机会，即 50% 的基率进行的预测多识别出 30% 以上的人数。可是，这种预测因素不能运用于具有不同基率的样本。在一个新样本中，如果基率是 90% (图 12.1(c))，那么，虚假肯定预测率就会被降低至 2.7% ($2/72+2$)，但虚假否定预测率就是 69% ($18/18+8$)。因此，预测因素的存在导致过于自信的决定，但它的缺乏会产生更多不正确的决定，而不会产生正确的决定。此外，虽

然总准确率仍然是 80%，但这确实比单独依靠 90% 基率所作的预测产生更多的错误，这个样本的所有成员都将被预测为累犯。

当基率仅为 10% 的时候，就会发现相似的问题（图 12.1(d)）。在这种情况下，虚假否定预测率仅为 2.7%，可虚假肯定预测率则是 69%。事实上，被预测再犯的这些人中 2/3 以上不会再犯。同样，80% 的总准确率再一次少于通过从所有样本都不是累犯的基率的综合预测获得的比率。只要基率低，这些问题都会产生，因为它通常是适合暴力性重新犯罪的。正如科蒂斯（E. W. Curtis, 1971）证实的那样，“要求”（beating）一种低基率要求与标准相联系的预测因素，这种预测因素比通常在临床或实际预测中获得的情况更好。因此，预测效率可能依赖于对基率接近 50% 的小群体的预测。

关于预测效率（predictive efficiency）的一个进一步的限制是选择率（the selection ratio），选择率是根据预测因素认为会出现肯定结果的比率。最佳效率需要一个等于基率的选择率，可是，人们可能通过改变选择率来改变虚假肯定预测率或虚假否定预测率。例如，如果预测因素是一个连续分数，那么，就可以提高切割点以产生更少的肯定性预测，不过，尽管这可以使虚假肯定预测的数目下降，但是它也会降低真实的肯定预测率。

三、刑事司法决策中的精算预测²

预测表（prediction table）最初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由美国犯罪学家编制的。由于它们集中于犯罪人背景和人口学的因素，所以这些预测表有时被称为经验预期表（experience expectancy table）或基础预期表（base expectancy table）。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社会学家—保险统计师被伊利诺斯州监狱雇来帮助决定刑满以前罪犯的假释，不然，预测表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不过，在英国和北美，对于国家的假释委员会来说，预测表也是可用的，近期有一些使用预测表来指导做出保释、起诉和判决决定的例子，也用来分派罪犯到不同警戒等级的矫正机构服刑。进一步的使用是在刑罚干预结果研究中作为统计对照物。例如，无法对不同矫正计划进行随机分派时，所预测的累犯率就可以用来比较矫正计划对不同危险群体的效果，也可以用来比较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

预测表利用群体（而非个人）所具有的多种特征来预测未来犯罪行为的概率。尽管在研究中可能考察了很多因素，但是，由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少数情况之外，预测不能得到改善；在通常情况下，是将少数几个因素加以结合而得出一个预测分数。这种结合可能是不考虑每个预测因素的权重而将其简单相加（伯吉斯方法[Burgess method]）。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线性的加权总数，权重是由多元回归得到的，不过更复杂的模型已经在几项研究中得到使用。分数可能随着风险水平的改变被分成不同的等级，或者可以得到重新犯罪的概率。例如，英国假释委员会使用的重新定罪预测分数（the Reconviction Prediction Score），是建立在曼海姆（H. Mannheim）和威尔金斯（L. T. Wilkins）（1955）早期研究的基础上的，它是 16 种因素加权分数的总和，这些因素如最初定罪的年龄、被监禁者的犯罪类型、最后工作的时间等，总分被转化为进一步定罪的百分数概率（percentile probability）。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一个决策树（decision tree）。这样的一个例子是由美国密歇根州矫正部门制订的“伤害危险筛选表”（the Assaultive Risk Screening Sheet）。其做

2. 精算预测的原文是 actuarial prediction。——校注

法是,对6种因素(例如,犯罪描述符合抢劫罪、性侵害或谋杀、15岁生日前第一次被捕)进行“是—否”选择,产生一个因暴力犯罪而被进一步逮捕的危险的5级分类。

最普遍使用的预测因素是个人历史资料。普里查德(D. A. Prichard, 1979)对与累犯传记资料有关的71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概括,发现其中最稳定的区别项目是:犯罪类型、18岁以前初次逮捕、先前的定罪、稳定的职业、生活安排(living arrangements)、当前的收入、使用鸦片制剂和酒精滥用的历史。这种资料被用在很多的累犯精算研究中,也被用于试图预测矫正机构的不良行为。可是,任何预测因素—标准关系的效率都取决于样本和环境特征,并且可能随时间而改变。因此,预测表不能超越当地条件进行概括。例如,重新定罪预测分数被限定适用于在监狱服刑两年以上的男性,预测他们两年内重新定罪的危险。为了预测而对被监禁近10年的人使用这个预测表是不恰当的。

尽管最通常使用的标准是进一步的犯罪,但是有人已经尝试预测进一步的暴力犯罪。特别是由于低基率的问题,这些预测已经取得有限的成功,温克(E. A. Wenk)、罗比森(J. O. Robison)和史密斯(G. B. Smith)(1972)叙述了加利福尼亚青年管理局(the California Youth Authority)试图预测假释犯中暴力行为的3项尝试,3项尝试都产生很高的虚假肯定性预测。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列举了100种背景因素,包括先前的暴力行为史、精神病诊断和对4000多个罪犯的心理测验分数。在15个月追踪期间,暴力重新犯罪的基率是2.5%,最好的统计学预测因素本来应当确定暴力假释犯的50%,可虚假肯定预测率几乎达90%。作者认为,由于标准的不可靠性,所以试图预测被报告的暴力是无效的。霍兰(T. R. Holland)、霍尔特(N. Holt)和贝克特(G. E. Beckett)(1982)在其研究结果之后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认为暴力累犯是无法通过先前的暴力记录可以预测的。

试图预测社区中精神病人未来的暴力行为的尝试,同样遇到很高的虚假肯定性预测的问题,甚至具有25%的基率。因此,近期的研究已经集中在短期内伤害行为的预测和医院环境内伤害行为的预测方面。康维特(A. Convit)等人编制了一个预测分数(1988),这个预测分数是从因暴力犯罪而被定罪,暴力性自杀未遂,神经变态以及越轨性家庭环境中得到的。这个预测因素把伤害性病人和非伤害性病人区分开来,最佳分割点产生的虚假肯定性预测和虚假否定性预测大约分别为60%和20%。作者对产生可比较结果的有关研究进行了概括。帕姆斯蒂纳(T. Palmstierna)和威斯瑞特(B. Wisredt)(1990)发现,通常作为暴力预测因素的背景因素,在预测住院病人的伤害中是很少成功的,无论是在病人入院后的最初8天,还是入院后的28天期间都是如此。可是,这些研究的缺点是,在试图通过药物治疗和社会控制最大限度的减少暴力行为的环境中预测伤害。

依靠静态的传记资料作为预测因素的做法已经受到批评,因为这些资料忽视了监护或治疗对进一步的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忽视了犯罪人将会返回的环境的影响。可是,邦塔(J. Bonta)和莫休克(L. L. Motiuk)(1985)描述了一个标准化访谈方案——监督水平调查表(the Level of Supervision Inventory, LSI),该调查表把传记资料和非静态因素,例如当前的职业、家庭问题和对犯罪的态度等结合起来。监督水平调查表预测缓刑犯中的累犯,并且在过渡性矫正所(half-way house)也取得了成功。在一些研究中也考察了人格因素(参见第八章)。有关精神病态的诊断可以预测累犯,心理运动测验可能有一些功用。可是,使用问卷调查的研究(例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或加州人格调查表)还没有产生一致的结果,表明这些研究对预测未来的犯罪行为充其量也不过有中等的贡献。高

夫 (H. G. Gough)、温克 (E. A. Wenk) 和罗辛克 (V. V. Rozyenko) 发现 (1965), 违反假释的最好预测因素是基础预期表和加州人格调查表 (CPI) 的联合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加州人格调查表中的社会化量表, 但是基础预期表是最好的单独预测因素。加州人格调查表中的社会化量表的功用已经得到普遍证实, 但是, 已经发现标准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临床量表预测累犯的效果差。可是, 还缺乏一种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临床量表与重新犯罪联合起来的理论说明。

人们已经考察了人格因素在预测矫正机构内或者释放后的暴力行为方面的能力。梅加吉 (E. I. Megargee, 1970) 评述了结构性的人格调查和投射测验对攻击行为测量的有效研究。尽管有人报道了肯定的联系, 可是, 这些联系普遍是低等级的, 大多数研究是“回溯性的” (postdictive) 而不是预测性的 (predictive)。可是, 在一些后来的研究中已经发现, 人格测量对预测有中等程度的贡献。结构性评定量表能够预测矫正机构的不良行为, 潘顿 (J. J. Panton, 1979b) 已经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项目中编制了量表, 用来预测监狱行为的几个方面。监狱适应量表 (adjustment to prison scale, AP) 在鉴定 3 年期内严重违反监规的罪犯中, 总的准确性达 74%, 虚假肯定性预测和虚假否定性预测都是 25%。在这种情况下, 基率是 50%。可是, 对逃跑倾向的测量 (escape proneness, Ec) 有一个较高的虚假肯定率, 由于这种行为的低基率, 因此它不可能有更大的预测力。

特殊量表与其他因素结合时可能有更多的功用。例如, 海布伦 (A. B. Heilbrun) 和海布伦 (M. R. Heilbrun) 发现 (1985), 精神病态 (Pd 减去 So)、低智商和社会退缩的结合可以预测监狱的危险性, 如果再加上当前的暴力犯罪时, 这种结合也可以预测假释期间的伤害行为。在对一个英国特别医院释放的精神障碍犯罪人 5 年的追踪研究中, 布莱克 (D. A. Black) 和斯平克斯 (P. Spinks) 也发现 (1985), 特殊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量表 (标准的 F 量表和 pd 量表, 以及外向性和冲动性量表) 普遍与后来的暴力行为和累犯有关; 在预测释放后行为中, 特殊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量表加上犯罪史是很重要的。霍尔 (G. C. N. Hall, 1988) 进一步报告, 一些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量表有助于性犯罪人累犯的预测。

刑事司法决策者较少使用预测方法, 这部分反映了对统计学预测的不信任, 虽然存在它比临床预测好的一致证据。可是, 它也反映了在预测未来犯罪方面计算指数的预测力相对而言是低的, 并且与标准测量的相关极少超过 0.4。克拉克 (R. V. G. Clarke, 1985) 指出, 预测研究假定存在着一种没有证实的犯罪的倾向起源。可是, 过去犯罪行为是未来犯罪的最好预测因素, 这种一致的研究结果足以证明, 犯罪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素质。西蒙 (F. H. Simon, 1971) 指出, 正如根据犯罪性的倾向概念所预期的那样, 在分数分布的极端状况下, 预测手段是相对有效的, 可是, 对于大多数处于中间范围的分数的来说, 从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预测未来行为还存在限制。在标准不可靠时, 尤其会发生这种情况。

然而, 由于预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机遇预测或传统临床预测的改进, 可以认为使用预测方法是正当的, 格拉泽 (D. Glaser, 1987) 认为这类预测可能会增加。改进可能来自对预测因素和标准的更好测量。例如, 预测因素的选择必须受理论的指导, 而不能受“随意的经验主义” (shotgun empiricism) 的指导, 而对“成功”的多种量度可能比简单的二分法更具有可预测性, 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仅仅把犯罪人分为会重新被逮捕、会重新定罪和不会重新被逮捕、不会重新定罪。

第六节 危险性的临床预测

一个人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能够导致刑事司法系统或心理卫生系统中的预防性拘禁 (preventive confinement)。在考虑保释、判决、假释、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或释放, 精神障碍犯罪人的释放, 甚至包括死刑的执行时, 都要涉及未来危险性。司法决策者常常依靠心理健康专家的判断, 可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积累的证据表明, 这些资料对危险性的预测是很不准确的。尽管很多领域中专家的预测可能也是很不精确的, 但是, 预测暴力行为中的不精确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也有很大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例如, 人们关心的是, 从保护社会来看, 究竟有多大的危险性时可以正当地进行拘留, 或者究竟可以容忍多大的虚假肯定预测率。因此, 预测不精确的证据导致公民自由论者 (civil libertarian) 提出这样的要求, 即临床医师参与预防性拘留 (preventive detention) 的法律决策的做法应当停止, 这种观点受到很多临床医师的赞同。

自相矛盾的是, 法律学家关注对自己或他人有急迫危险的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的限制性标准, 而这种关注又导致了对临床医师在识别危险者方面的依赖性的增加; 在美国, 这已经更广泛地扩展至临床实践。例如, 1976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 心理学家的一位顾客杀害了塔蒂亚纳·塔拉索福 (Tatiana Tarasoff), 因为这位顾客患有病态依恋, 在治疗专家向警方报告他处于杀人危险后两个月左右发生了这件事, 在塔拉索福诉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的案件中, 最高法院后来裁定, 临床医师有法律责任警告第三方当事人, 他们的顾客是一个危险分子。这个裁定对心理健康实践有重要的影响, 迫使临床医师扣押病人以避免对任何后来的暴力负责任。很多人提出反对, 其理由是这种警察功能损害了专业助人者的作用, 莫纳汉 (J. Monahan, 1981, 1984) 认为, 平衡顾客和社区的利益是很多人类服务行业无法回避的组成部分。

因此, 人们继续需要危险性预测, 但临床医师的预测能力仍然是引起争议的。主要的问题是: 究竟应该预测什么? “危险” (danger) 意味着有伤害后果的危险 (risk of harmful consequences); “危险性” (dangerousness) 可能是行为、情境或者人的特性。在法律领域中, 通常考虑的是人的危险性, 但“什么是有害的”则取决于价值观念。在描述一个人是“危险的”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没有详细说明这个人想要做的危险行为的性质, 或者这个人从事这些行为的条件, 形容词只是一个模糊的判断。一些作者通过集中于“危险行为” (dangerous behavior) 特别是暴力行为, 避开这个问题。可是, 暴力、危险行为和危险性是有区别的概念。暴力行为通常被看成是危险的, 但不是所有的危险行为都是暴力, 例如酒醉后驾驶。然而, 对危险性的讨论都集中在暴力方面。

马尔维 (E. P. Mulvey) 和利兹 (C. W. Lidz) (1984) 指出, 危险性预测是一个双重判断, 无论是这种行为, 还是某人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都要进行评估。可是, 在实践中, 这种案例常常一点也不清楚。“危险性”像其他倾向性概念一样, 意味着一种“如果……然后”的可能性, “如果”是这种倾向将会发生危险行为的条件。这些将要发生的可能性与该人有这样一种倾向是不一样的。例如, 把一种物质确定为“可溶于水”是一回事, 而预测这种物质变湿的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假定, 临床医师正在预报一种结果, 他们实际上可能只是正在判断个人倾向的可能性或力量。对这个问题的含义在下

而考虑。

一、危险性预测的结果研究

“第一代”关于危险性临床预测的研究来自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自然主义的研究,这些精神障碍犯罪人是通过法院裁决从矫正机构释放的;法院裁决和认为他们是危险的精神病学判断相反。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约翰尼·巴克斯特朗(Johnny Baxstrom)因犯罪性精神错乱被非法地拘押在监狱医院,这一认定导致969名病人迁移到普通精神病院(civil mental hospital)。对“巴克斯特朗病人”(Baxstrom patients)中1/4的病人进行的4年追踪研究发现,一半的人仍然还在普通精神病院,27%的人已经回到社区,14%的人死亡,2.2%已经被送回最高警戒度机构,0.8%的人送回监狱。17%的人在某个时间已被逮捕,只有9个人已被定罪,主要是因为非暴力犯罪。按照被预测的危险性,对80%以上的人进行了虚假肯定性预测。类似的裁决造成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少数犯罪性精神错乱病人被释放,这种释放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即只有少数人后来因严重犯罪而被定罪。

其他研究对接受治疗后释放的犯罪人病人(offender patient)与被确认为危险的病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这些被确定为危险的病人仍然被法院释放了。科泽尔(H. Kozol)、鲍彻(R. Boucher)和加罗法洛(R. Garofalo)(1972)报告了对性犯罪人进行的一项为期5年的追踪研究,386人治疗后作为没有危险的人被释放,49人因反对劝告(against advice)被释放。前者中的8%和后者中的35%犯了更严重的罪,表明治疗在减少犯罪性方面有一些效果。然而,对这些判断为危险的人做出了65%的虚假肯定预测率,这表明临床预测的不准确性。更有争议的是来自马里兰州帕图森特矫正所(Patuxent)的研究结果,直到1977年,帕图森特矫正所都是一个为“精神缺陷少年犯罪人”开设的监狱医院。霍奇斯(E. G. Hodges, 1971)报告,在三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这些完成治疗的人的重新定罪率是37%,那些部分治疗和因反抗劝告而被释放的人重新定罪率是71%。可是,前一个的数字中排除了那些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定罪记录但是却被撤消假释的人。斯特德曼(H. J. Steadman, 1977)后来的研究表明,31%受治疗病人和33%部分治疗且假释的病人后来因暴力犯罪被逮捕,而“精神缺陷少年犯罪人”中没有接受治疗的数字是41%。这些数据没有为临床预测的效度提供有力的支持。

对审判前裁决(pre-trial adjudication)的研究也是相关的。科克扎(J. J. Coccozza)和斯特德曼(H. J. Steadman)(1978)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对纽约州257名没有能力受审的病人追踪研究了3年,其中有154人被精神病学家宣布为是危险的,103人宣布为是没有危险的。尽管这两组人后来的治疗不同,但他们在相同的时期被收容入院。在追踪研究时,前者中14%的人和后者中16%的人已经因暴力犯罪被逮捕。在由塞佩加克(D. S. Sepejak)、韦伯斯特(C. D. Webster)和孟席斯(R. J. Menzies)(1984)对加拿大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预测的准确性低。被预测危险的人审判前评定与接下来两年期间危险行为评定的平均相关,精神病学家是0.20,心理学家是0.17,矫正官员是0.12,所有的评定都是有意义的,而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得到的相关分别是0.08和0.03,这些相关是不显著的。可是,个人相关范围从-0.48到+0.47不等,这表明了不同的个人之间、不同的学科之间,预测的准确性有相当大的差别。

莫纳汉(J. Monahan, 1981)指出,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危险性的预测都一致地过

高,他因此认为,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预测并不比三种预测中的任何一种更准确。可是,这些研究因几个理由不能被看作是结论性的。首先,样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是被扣押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代表。例如,巴克斯特朗病人(Baxstrom patients)平均年龄47岁,而重新犯罪的人明显是年轻人。必须研究的是,病人虽然被判断为是危险的,但是却被法院释放这种现象是否具有典型性,因为法院通常接受精神病学家的鉴定,正像科克扎(J. J. Cocozza)和斯特德曼(H. J. Steadman)(1978)观察到的一样。其次,预测因素的可靠性是不清楚的。在巴克斯特朗型(Baxstrom type)研究中,没有肯定所有病人都被预测在释放时是危险的。例如,保安医院(security hospitals)中很多病人在工作人员宣布他们是“安全的”以后被拘留,原因是发现他们在交替性适应(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中存在问题,这是平常的。

第三个问题是标准的可靠性。依靠官方逮捕或重新定罪资料可能会低估实际的暴力,很多虚假肯定性预测不可能被真实肯定性预测所查觉。例如,霍尔(H. V. Hall,1987)指出,暴力犯罪的逮捕率只反映了5种实际偶发事件中的1种;在一项自我报告式研究中,他发现在由一群士兵进行的94件可逮捕暴力事件中,只有2件被警方知道。此外,进一步的暴力犯罪的发生,是否是对危险性临床预测的一种有效检验,也是有问题的。正如戈登(R. A. Gordon, 1977)指出的那样,几项研究假定,临床医师没有对“无辜的”(innocent)人和真正危险的人加以区分。可是,如果临床医师只是鉴定危险的倾向,而不是预测特殊的结果,虚假肯定性预测就可能被正确地鉴定为是危险的。这种倾向没有归结为暴力行为的事实,可能反映了机会的因素。莫纳汉(J. Monahan, 1981)对“这使预测的准确性不可能测验”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是,这种观点反映了实证主义者的假定:所有的事件都是可预测的。从批判现实主义观点来看,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准许个人倾向实现的条件,是不能够可靠地被预测的。如果临床医师正在预测一种倾向的强度,那么恰当的检验是一个总的多元行动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暴力行为。尽管那样,预期效度高于0.3到0.5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进行危险性预测的其他环境。这些研究中所测到的,显然是从一种环境到未来社区环境的预测,可这种预测涉及很大的时间和情境的差距。莫纳汉(J. Monahan,1981,1984)提出,预测可能在短时间或紧急情境中更准确。这种“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观点更加小心地认为,我们对于危险性预测知道得很少,危险性预测需要得到改进。因此更近期的研究集中于特殊环境内的预测和较短时期中的预测。

沃纳(P. D. Werner)、罗斯(T. L. Rose)和耶萨维格(J. A. Yesavage)(1983)向15位精神病学家和15位心理学家提供了工作人员采用简易精神病评定量表(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对40名病人进行评定的结果,也提供了入院前暴力行为的资料,(请他们)考察这些因素与进入急性精神病单元后7天内的预期暴力和实际暴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预测仅有中等程度的可靠性,不过他们预测的总体可靠性为0.88。然而,个别预测因素和混合预测因素的预测准确性都很低,预测暴力和实际暴力之间的平均相关效度是0.12,只有两个法官的预测高于机遇相关(chance correlation)。库珀(R. P. Cooper)和沃纳(P. D. Werner)(1990)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当根据入监前的犯罪资料 and 人口统计学资料预测6个月内的监狱暴力时,在21位心理学家

和个案管理员中,只有1人的预测高于上述机遇水平。对紧急民事拘押(emergency civil commitment)的短期研究也表明,预测的准确率低,并且产生高的虚假肯定预测率。与此不同,麦克尼尔(D. E. Mcneil)和宾德(R. L. Binder)(1987)对短期拘押中的危险性的临床判断提出了预测效度。他们发现,在被拘押的72小时内,72%因对他人有危险而被强制拘押的人,只表现出1次伤害行为(包括身体伤害、隔离、使用约束措施、言语威胁或虐待),而30%的被强制拘押的人是因为别的原因而被拘押的。可是,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言语攻击。而且,在这种研究中,环境对病人的抑制作用使人更难确定预测的准确性。

恰当的结论似乎是,预测的准确性仍然有待证实,甚至在短期研究中也是如此;由于方法论的缺点,可以得到的研究不能被看作是决定性的。莫纳汉(J. Monahan, 1988)认为,研究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对效力很差的预测因素的依赖、微弱的标准、不太可靠的样本和不同步的研究活动。道德的限制可能阻止人们进行决定性的研究,因为这些被预测会进行暴力行为的人通常会受到干预,这种干预阻止人们进行预测以外的检验。因此,在某些条件下预测仍然可能是有效的。

二、临床预测过程

在判断犯罪人危险性的过程中,临床医师必须考虑大量与个人、情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的因素,并且根据类似案件的先前经历、临床知识和文献寻找信息。这显然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尽管结果研究涉及了预测效度的问题,但是,其他研究已经考察了可能减弱效度的预测过程中的因素,例如,低可靠性或者对不恰当线索的注意。

昆塞(V. L. Quinsey)和艾布特曼(R. Abtman)(1979)在其研究中获得了可靠性的证据,他们向4位司法精神病学家和9位学校教师提供了犯罪人简介,得到了根据几个预测量表进行的评定。在伤害性犯罪的可能性方面,两组评定者之间的一致性评定普遍较低,不过教师的评定(0.24至0.57)比精神病学家高(0.19至0.48)。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两组都用相似的方式组合数据,这表明精神病学家的判断没有差异。莫坦顿(C. Motandon)和哈丁(T. Harding)(1984)同样发现,在评定危险性的过程中,精神病学家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专家或平民百姓更高的一致性。

几项研究试图确定,在预测危险性方面究竟应该考虑哪些信息;一些因素似乎一贯地受到注意。例如,孟席斯(R. J. Menzies)、韦伯斯特(C. D. Webster)和巴特勒(B. T. Butler)发现(1981),司法精神病学家认为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当前的犯罪、访谈期间的线索、犯罪记录、童年期异常和社会及家庭环境。有关危险性决策的研究普遍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与行为、尤其是先前的暴力行为有关的犯罪在危险性预测中应该充分予以考虑。可是,先前的暴力行为并不总是未来暴力犯罪的预测因素。

对远期因素(例如童年期异常)的注意也是值得怀疑的。童年期遗尿、纵火和对动物残忍的历史已经受到很多注意,因为赫尔曼(D. S. Hellman)和布莱克曼(N. Blackman)发现(1966),在因暴力行为而定罪的少年犯罪人中,74%的人显露出这种“三联症”(triad),而非暴力少年犯罪人中只有28%的人有这种情况。可是,一些后来的研究还没有发现可以根据完整的三联症辨别出暴力犯罪人,不过,童年期对动物残忍可能本身具有某些预测意义。对人构成危险的暴力似乎是一种不可靠的线索。麦克唐纳(J. MacDonald, 1967)在一个对77名曾经恐吓杀人的病人6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只有3人曾经杀人,不过另外4人

已经自杀。沃纳 (P. D. Werner) 等人也发现 (1983), 虽然大多数狂暴的急性病人也作出威胁性的陈述, 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没有暴力行为。

一些研究已经使用了布伦斯威克 (Brunswik) 的线索利用或透镜模型 (cue-utilization or lens model), 比较了人们在预测中使用线索的方式, 也比较了这些方式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普遍的结果是, 临床医师重视根据经验来看与实际暴力行为无关的线索。例如昆塞 (V. L. Quinsey) 和马圭尔 (A. Maguire) 发现 (1986), 由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做的危险性评定受到机构内伤害性 (institutional assaultiveness) 的很大影响, 可这与被释放病人中严重的重新犯罪无关。临床医师也强调先前的杀人, 但是先前的杀人与无危险的结果相关。布莱克 (D. A. Black) 和斯平克斯 (P. Spinks) (1985) 也发现了这一点。

预测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是如何决定因素的权重, 而是哪种因素包括在考虑范围内的问题。一些证据表明, 临床医师在选择线索中存在的偏向, 可能来自一些个人特征, 例如, 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也可能来自训练和教育。判断危险性的准确性也可能由于人类决策中固有的认知偏见而降低, 例如, 精减那些忽略了基本的概率原则的启发性证据。许多偏见现象现在已经得到确认, 包括忽略基率、依靠错误相关、寻找确实的证据而忽略不确实的证据。霍尔 (H. V. Hall, 1987) 指出了危险性预测中司法精神健康专业人员所犯的几种共同的错误:

1. 没有认识到, 应该特别注意调查危险性预测的相关性;
2. 缺乏恰当的法庭数据基础;
3. 没有说明被预测者产生的回溯性歪曲和当前的歪曲;
4. 在缺乏先前的危险性资料的情况下预测危险性;
5. 深受虚幻相关之害;
6. 根据临床诊断进行预测;
7. 没有考虑引起行为的激发性刺激 (triggering stimuli);
8. 没有考虑机会因素;
9. 没有考虑年龄或教育之类的抑制因素;
10. 忽略了相关的基率;
11. 使用有缺陷的结果量度;
12. 没有提供限定性的结论。

霍尔 (H. V. Hall, 1987) 提供了一个决策树, 以保证注意这些因素。

三、危险性预测能够得到改进吗?

尽管对临床决策的理解仍然有限, 但是我们所知的情况足以表明, 临床决策是很不可靠的, 但是是能够改进的。例如, 可以通过算出法官的平均数来增加可靠性。这与通过增加项目的数量来提高测验信度是相同的, 并且赞同合作性决策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基率的问题可以通过关注同质群体、用一些具有较高基率的危险行为类型界定同质群体而加以克服; 也可通过使用比官方的犯罪记录更宽的标准来加以克服。认知偏见也可能通过训练得以减少。

福斯特 (D. Faust, 1986) 指出, 心理学家必须学习避免仅仅依靠直觉判断的做法。精

算预测优于临床预测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一致地证实,并且在累犯研究中继续得到证实。可是,使用透镜模型范式的研究表明,经验性预测者可能做得比临床医师好;到目前为止,对暴力性重新犯罪的精算预测还没有产生令人影响深刻的结果。临床医师已经抵制统计学预测因素的概念;由于某些原因,转而使用精算预测方法是不可能的:在很多环境中,这种精算预测方法是无法得到的。可是,使用决策助手(decision aids)使决策过程变得更加明晰清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步骤,正如索耶(J. Sawyer,1966)证实的那样,精算方法和临床方法最有效的联合不是将统计学的资料合并成临床判断,而是用统计学方法对临床判断进行客观报告。

这些建议会改进临床预测的可靠性,但是,它们是否造成预测效度的中等以上的增加还是值得讨论的。莫纳汉(J. Monahan,1981)指出,临床医师的错误之一是集中于倾向因素,对情境因素的注意会改进预测。可是,对于暴力行为的解释来说,情境是必要的,它们不是提前可预测的。这不是说一般的环境特征,如同辈群体的影响或紧张性刺激与暴力行为无关,但是,引起暴力事件的条件的一起来到,达到随机的程度可能是偶然的。

预测危险性的问题,可能很少在于危险性概念的难以理解方面,而在于实证主义的不现实信念方面,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有能力预测开放社会中的特殊事件。波洛克(N. Pollock)、麦克贝恩(I. McBain)和韦伯斯特(C. D. Webster)指出(1989),不应继续寻找暴力行为的经验性预测因素,比较恰当的做法应当是,研究具有理论基础的决策程序,这样的程序有助于做出关于危险性的可靠的临床决策。这与马尔维(E. P. Mulvey)和利兹(C. W. Lidz)(1984)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最有帮助作用的是一种有资料根据的判断。

第十三章 对犯罪人的心理学干预

第一节 引言

普遍认为,犯罪是对社会有危害的,社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和预防犯罪,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如何取得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成功却依赖于有关犯罪原因的假定。很多犯罪学家认为,只有社会结构的改变才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因为犯罪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和控制规定什么是犯罪的那些人的过大权力。根据这些观点,对个人或家庭的干预只是一种笨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要责备被害人。可是,正如前面章节中已经表明的那样,不存在单一的犯罪原因,犯罪人不是同质的。很多人显现出个人问题或缺陷,心理学帮助对他们是有效果的。不过犯罪的远因常常在于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克服这些问题可能是使个人恢复身心健康和预防未来犯罪的最好策略。

然而,预防被逮捕的犯罪人重新犯罪,并不能预防初次犯罪人或没有被逮捕者的犯罪;心理学对个别犯罪人的关注,可能因目光偏狭和疏忽犯罪控制中的更广泛问题而受到批评。可是,犯罪预防问题已经与指导社区精神卫生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的概念并列。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通过设立防止疾病发展的积极屏障防止疾病的开始,而二级预防(secondary prevention)是在早期阶段进行干预,试图防止疾病发展成为严重的或慢性的疾病。三级预防(tertiary prevention)涉及改善功能衰退并防止其复发。三级预防代表了传统上治疗和矫正的重点。在犯罪案件中,这种类比存在一些限制,心理学的干预已经指向这些水平中的每一级。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将在第十五章中讨论,本章考察个别干预的三级预防水平,大多数心理学的努力已经指向这个方面。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刑罚系统中的矫正(rehabilitation)一直受到批评,其理由是,在预防犯罪中“没有效果”(nothing work)。这种争论将在第十五章中考察。可是,也有人根据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建议,认为矫正不可能影响犯罪率,因为它没有指向未被逮捕的犯罪人,市场劳动力(market forces)将替代那些退出犯罪(领域)的人。这种观点缺乏经验性基础,因为少数犯罪人造成了大多数犯罪,所以,那种认为矫正一部分高危险犯罪人可能对总的犯罪率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同样是似是而非的。可是,在矫正个别犯罪人时,并不能简单地依靠解决犯罪问题的做法。不管把矫正犯罪人理解为个别拯救(individual salvation),还是理解为“原教旨主义的犯罪学”(fundamentalist criminology),人们矫正犯罪人的合法理由,既包含人道主义的成分,也包含功利主义的成分。在这一方面,矫正犯罪人的目标是,让个人能够通过增加其个人效能(personal effectiveness)而避免犯罪。范登哈格(E. Van den Haag, 1982)拒绝考虑这种与他们说的量刑目标无关的矫正的道德目标,他认为量刑的主要目标是正义和威慑。可是,他并不认为,“公平惩罚”(just deserts)在道德上优于“挽救灵魂”(saving souls)。

一、矫正和心理学干预

心理“治疗”(psychological treatment)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因为心理疗法(psychological therapy)试图通过培养个人的成长技能或应付技能、而不是简单地消除症状来超越医学意义上的治疗,矫正甚至是一个更含糊不清的概念,有关犯罪人矫正的功用的争论、因缺乏一致的定义而无法达成共识。在临床中,矫正意味着恢复、补偿或修复那些可以促使能力丧失者(disabled person)实现社会重新整合(social reintegration)的功能。很多心理健康专家可能用类似的观点看待犯罪人矫正,认为唯一的差别是重新整合包含了避免进一步犯罪(的成分)。因此,矫正服务直接指向个人的需要,矫正服务提供者既是犯罪人的代理者(agent),也是社会的代理者。

一种较为狭窄的解释认为,矫正的主要目标是要预防重新犯罪。例如,帕尔默(T. Palmer, 1983)指出,“最终的”目标是保护社会,作为目标中心的犯罪人矫正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特别威慑(special deterrence)的目标也是预防重新犯罪。正如哈勒克(S. L. Halleck, 1987)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也能够通过精神外科手术、使用药物、电子“标签”或者切断犯罪人的双手得以实现。帕尔默对“积极的”和“严厉的”矫正方法进行了区分,他承认这种区分是武断的。矫正技术研究小组(The Panel on Research in Rehabilitative Techniques)也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把矫正定义为“任何有计划干预的结果,这种有计划干预减少犯罪人的进一步犯罪,这种减少是以人格、行为、能力、态度、价值观念或其他因素为中介的。”因为“有计划的干预”(planned intervention)比个别服务更宽泛,所以,很难明确地将特别威慑排除出去。

威尔逊(J. Q. Wilson, 1980)认为,区分矫正和特别威慑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应当放弃这种区分。这种区分假定存在一种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科学,而对犯罪人所做的工作却要受到什么是人道的道德标准的影响。事实上,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矫正“理想”不是根据什么是“好的”确立的,也不是简单地根据社会功用确立的,而是根据行为对个人的福利确立的。一些干预可能服务于两种目的,在试图满足犯罪人的需要和社会需要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所以,区分能够为矫正提供条件的干预和仅仅用于限制的干预的做法,似乎仍然值得保留。例如,可以把抑制失业者、社会隔绝者、酗酒的有前科者(ex-offender)未来犯罪的活动描述为威慑。但是很难说这些人受到了矫正。这种区分意味着,累犯对于矫正程序的有效性来说是一个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标准。它也意味着,很多刑事司法干预,例如警告或者缓刑的结果,与矫正服务措施是否“产生效果”(works)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并不是要表明行为科学的兴趣仅仅局限于矫正干预,因为具有威慑目的的干预也产生心理学的假设,虽然这些假设常常是因为政治动机而激起的。英国的一个例子是1979年引进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拘留中心强调纪律、训练和队列,其意图是对年轻的犯罪人进行一种“短期的、剧烈的震荡”。在美国,少年认识矫正计划(juvenile awareness program)已有类似的目的。这种矫正计划通过参观监狱、与犯人一起开讨论会,简要地向少年犯罪人暴露监禁的消极方面,这种假设认为少年犯罪人是“受到恐吓的规矩人”(scared straight)。这类矫正计划的理论基础较弱,因为它们强调刑罚的严厉性而不是强调惩罚的肯定性,并且也很少对它们进行评价。这种短期的、剧烈的震荡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被犯人

体验为是痛苦的,对重新犯罪也没有产生影响,而刘易斯(R. V. Lewis, 1983)发现,高危险少年犯罪人在参加一次“受到恐吓的规矩人”矫正计划后,趋向于变得更差。

其他一些非心理学性的干预,也产生了心理学的假设。例如,北美流行的接触外界矫正计划或荒野矫正计划(outward bound or wilderness program),把少年犯罪人暴露在艰苦的户外条件中达3个月。这些可能被看作是威慑,但它们也可能改善对外部环境的控制感(sense of mastery)。另一种例子是通过被害人赔偿计划(victim recompense scheme)进行赔偿,或者通过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s)进行象征性赔偿(symbolic restitution)。1972年以来英国一直采用后一种干预方式,但没有广泛地使用。在行为矫正中,赔偿是“过度矫正”(overcorrection)的组成部分,但在刑事司法术语中,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以及报应和威慑的观点,赔偿被认为是正当的。也可以从改造方面来看待赔偿。尽管这种预防方法的结果具有心理学的价值,但是本章集中在目的在于预防重新犯罪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使用了一些心理学转化程序。

第二节 对犯罪人的心理学服务

心理学家对刑事司法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其中的一些工作涉及给法院和执法机关提供咨询(参见第十二章),但主要的作用是帮助刑罚系统管理已决犯罪人(convicted offender)。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诊断和接收中心雇佣心理学家,现在,矫正心理学是一种拥有自己职业标准的特殊行业(美国矫正心理学家协会,1980年)。1946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但不包括苏格兰或北爱尔兰)也已经拥有自己的监狱心理学服务。可是,只有少数犯罪人被监禁;由心理学家给犯罪人提供的这种服务,也会因心理学家接待来访者的工作环境和法律程序而有差别。一些缓刑犯罪人可能在社区接受临床心理学服务,这种服务对于转移到健康监护系统(health care system)的精神障碍犯罪人也是可使用的。在社会服务机构中的少年犯罪人也可能被交给教育心理学家或儿童临床心理学家处理。

实际上,在法庭受审的那些人所能得到的心理学服务总是有限的;尽管刑事司法系统处理大量的案件,但是,对哪些人给予注意的选择过程,也经常依赖于机会因素。服务趋向于集中在例如监狱、年轻犯罪人矫正机构以及精神病保安医院这样的机构中。服务的作用和功能随使用机构的变化而改变,但传统的重点一直集中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在美国,通常要求对犯罪人进行治疗的心理学家,必须取得临床心理学家的开业执照。可是,并不是所有对犯罪人工作的心理学家都是临床医师。1991年,英国大约有200名心理学家定期地对犯罪人进行工作,他们中大约一半的人是临床心理学家,受雇在最高警戒度医院或地区司法精神病学服务机构工作,其余的人受雇在英国监狱心理学服务机构中工作。尽管受雇在监狱心理学服务机构工作的心理学家对犯罪人的矫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数量相对于监狱总人数来说是很少的,而且他们的基本功能像临床心理学家一样,往往是有组织性的。

在刑罚系统中,心理学家的传统功能是评估、治疗、矫正和研究。这些与临床心理学家的功能是类似的,保安医院中的心理学家有类似的功能。监狱心理学家的一般任务是为评估、预防和治疗犯人问题而提供服务,并且帮助建立一种安全和人道的环境。可是,这种环境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比精神病学中的能力丧失(disability)更为宽泛,包括认知缺陷、人

际缺陷和应付技能缺陷,这些缺陷不但与犯罪行为有关,而且与犯人对监禁的适应有关。

一、评估

评估(assessment)是收集资料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做出关于治疗对象的明智决定是必要的,并且涉及对假设的检验,这种假设导致形成有关治疗对象问题的模式。心理学评估通常依靠收集资料的客观方法加以区分,也以测验、评定或结构性观察的形式进行的假设检验加以区分。在刑罚领域中,评估最初是为了分类和治疗计划的目的而进行的,或者为假释而进行评价,现在有一系列与犯罪人特别有关联的程序(参见第三章)。在这种背景中,评估的更有区别性的特征集中在特殊的问题上,例如反社会信念、性变态或危险程度,但总体上看,对犯罪人的评估吸收了用于心理健康领域中的许多程序。

监狱心理学家早期的作用是通过常规的心理测量评估,促进对新犯人的分类和安置,这种心理测量评估采用智力、学业成绩、人格和精神病理学方面的标准化测验。现在,这种作用已经被抛弃,理由是这样的评估对罪犯安置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可是,评估的有限功用通常反映了对测验的不加鉴别的使用,对测验的选择是根据其可用性进行的,而不是根据测验与罪犯问题的关联性进行的;评估的有限功用也反映了把评估本身作为一种目的加以对待和报告,而不是作为一种理解或功能分析的手段加以对待和报告的倾向。心理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原则仍然是应用心理学的基础,在缺乏过硬的评估技能以及识别问题和评价干预结果的程序时,心理学家要冒失去其专业独特性所要求的权利的风险。

能力评估(competent assessment)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两个目的,人们继续需要评估,第一个目的是识别需要服务的罪犯。美国矫正心理学家协会(1980)建议,对所有判处一年以上监禁的罪犯进行短期的甄别,包括先前的历史、情绪和智力的异常。当显示必须进行治疗时,应当对这些异常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评估,使评估发挥一种有用的治疗或处置方面的功能。

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在通过匹配治疗(matching treatment)或因人施治进行矫正的情况下进行与矫正有关的分类(参见第十五章)。现行的分类受到希克莱斯特(L. Sechrest, 1987)的批评,他的理由是还没有确定治疗决定的功用。可是,其他人接受更有利的观点。安德鲁斯(D. A. Andrews, 1983)提出,作为恰当的中间目标,对态度、价值观以及支持犯罪的信念的测量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需要在评估结果中受到检验。他也认为,治疗计划需要对那些可能影响对治疗的反应的个人特征,例如人际成熟水平(参见第三章)、认知技能、精神病态和转变动机,进行评估。

二、对犯罪人的矫治

虽然因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导致监狱中的干预一直是很少的,但是,治疗是矫正心理学家的一项长期的功能。治疗服务对于减轻犯罪人的心理烦恼是有利的,不管犯罪人的心理烦恼是否由与其犯罪有关的原因所引起,但是,这种服务大多由于矫正的目的而得到发展。因此,区别容易引起犯罪的临床目标和调节犯罪行为的因素,是重要的。这里强调的是后者。干预随着心理学家的取向而改变,心理学家的取向可能是行为主义的、心理动力学的或者是认知的。不过,认知—行为观点在近期的发展中已占优势,这些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讨论。

与医学治疗相比,对犯罪人的心理治疗更类似于补救教育(remedial education),最现实的目标是使犯罪人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去犯罪。因此,干预的恰当目标是那些提供“犯罪纽带”(ties to crime)的价值观念,是那些在功能上与犯罪行为有关的情绪问题、技能缺陷以及不恰当的社会行为。虽然北美对特殊类型的犯罪人——例如醉酒的司机、轻微的性犯罪人或者商店行窃者——的心理门诊很普遍,但是,犯罪行为只是心理治疗的间接目标。这样的行为频率低,常常不是直接可观察到的,所要改变的目标是重复进行犯罪行为的倾向(disposition)。例如,对谋杀犯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可能支持未来暴力的个人和社会因素上,而较少集中在先前的杀人行动上。需要加以识别和作为目标的正是这些中介因素。

对犯罪人心理治疗的历史与更普遍的心理治疗的历史是并行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早期心理动力学观点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被多样化的方法取代。至少有400种治疗技术已经得到确认,其中的大多数建立在有关疾病的实用理论的基础上,缺乏一致的科学观点方面的基础(这导致帕洛夫[M. B. Parloff, 1984]把加利福尼亚州描述为既是技术创新“硅谷”,又是发展心理治疗方法的“硅谷”!),这个问题使犯罪人矫正复杂化。在犯罪人矫正领域中,治疗方法通常不同于一般的心理保健活动,因为这类心理保健活动很少考虑与犯罪人问题、犯罪人与犯罪行为的关系问题有关的理论。

三、发展中的作用

无论矫正是不是心理学服务(psychological services)的主要目的,它都不是心理学服务唯一的目的。作为社会组织的监狱把不平常的要求强加于居住和工作在那里的人,很多监狱心理学家把他们的贡献更多看作应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来改善生活环境,而不仅仅是对罪犯提供直接的服务。受到限制的工作人员的应付办法也不可避免地在个人水平上限制了干预的效果,米兰(M. A. Milan)和埃文斯(J. H. Evans)提出(1987),管理人员和心理学家过分强调心理健康的作用。由于利用了社区心理健康模式,他们赞同较多地强调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这使预防集中于咨询、训练、矫正计划设计和评估方面。这些作用使心理学家能够成为监狱组织、监狱工作人员以及犯人可以广泛利用的资源。

麦克默伦(M. McMurren)和沙普兰德(P. Shapland)(1989)叙述了英国监狱系统中这些作用的发展。咨询服务管理者提供有关监狱人口特征资料的信息,也提供有关罪犯的一般问题的咨询,还提供有关处理特殊问题群体的策略方面的咨询,例如,自杀危险、被共同伴拒绝的人。这些服务也包括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指导,例如扣押人质情境中的谈判。工作人员训练计划的范围包括基本的相互作用过程指导、提供药物和酒精问题咨询的技能,或提供行为技能训练的方法。例如,通过应激管理小组(stress management group),向工作人员提供支持。矫正计划的设计和发展,不但包括新颖的心理学干预,而且也包括监狱机构中广泛的娱乐、职业和教育活动。最后,矫正计划评价强调研究的作用,这种评价可以指向矫正机构内的个人和群体矫正计划,也可以指向与政策含义有关的长期结果研究。

第三节 心理动力学干预和人本主义的干预

一、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

心理动力学理论根据神经症性冲突(neurotic conflict)或超我发展的失败来解释反社会行为(参见第五章),但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古典精神分析,则集中在神经症性冲突方面,关键的因素是由治疗人员对治疗对象过去的调查、移情和治疗人员的解释,并通过治疗人员对冲突的工作,获得顿悟或自我认识。在刑罚环境中,古典精神分析的应用是罕见的,但具有心理动力学取向的方法已经被用于对犯罪人的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中,常常出现在“咨询”(counselling)这个不明确的标题下面。这可能表示在较少受到训练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对个人问题的较肤浅的讨论。由缓刑官或社会工作者进行的个案工作常常类似于心理动力学治疗的一种温和的形式,这种治疗涉及反映性讨论(reflective discussion)和情绪支持。可是,咨询心理学已经发展为一种单独的特殊行业,常常受到人本主义而不是心理动力学原则的指导,并且相对集中在解决正常人的问题,尤其是学业和工作问题方面。假使存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含义,就会仍然存在这样一种事实,即文献中通常的报告没有详细说明“集体治疗”的目标和内容,在对犯罪人使用心理动力学治疗时由于“咨询”失败而把犯罪人打发走,这似乎是一种过早的结束。

然而,支持心理治疗对犯罪人有功效的证据是很少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充满了案例研究和如何处理治疗对象阻抗或反移情反应的轶事性药方,可是,对结果的评价几乎没有。在一项对为期25年以上的集体心理治疗和咨询的研究报告的评述中,斯赖克(K. Slaikeu, 1973)发现,其中试图进行评价的只有23项研究,这23项中只有2项研究报告了收容后适应(post-institutional adjustment),几乎没有1项研究符合可以得出确定性结论的方法论的充足标准。经常被引证为对犯罪人咨询失败的证据是卡斯鲍姆(G. G. Kassebaum)、沃德(D. Ward)和威尔纳(D. Wilner)所做的研究(1971),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的罪犯随机分派到自愿集体咨询组、强制集体咨询组,或对照组,追踪了3年。在假释结果中没有发现重要的差异。可是,奎伊(H. C. Quay, 1977c)认为,除了设计的适当性和结果之外,还必须考虑矫正计划**完整性**(integrity)。他指出,由卡斯鲍姆等人描述的矫正计划建立在一个不明确的咨询概念基础之上,并且由未受过训练和不感兴趣的人不恰当地实施。

已经有人报道了一些成功的结果。珀森斯(R. W. Persons, 1967)对少年犯教养院的少年进行了人口统计学和犯罪史因素的匹配,随机地把每对成员分配到特别集体矫正计划和个别治疗计划(一共80小时、持续20多周),或者分配到不予治疗的对照组。集体治疗是“兼收并蓄的”,其重点是发展与治疗人员的热情而牢固的关系、解释、角色扮演、对恰当行为的正强化以及诱导对反社会行为的焦虑。在41对成员中,30对接受治疗的人和12对对照组的成员在心理测验中显示减少了异常现象;在追踪一年时,13名接受了治疗的少年和25名对照组少年已经被重新收容入院。接受治疗的少年违反假释的很少,更多的人找到了职业。朱厄(C. C. Jew)、克兰诺(T. L. Clanon)和马托科斯(A. L. Mattocks)(1972)也报告说,他们用更为独特的心理分析性集体治疗获得了一些成功。他们对监狱医

院中的病人与根据基础预期表 (base expectancy table)、种族和犯罪特征选择的未治疗的对照群体进行匹配 (监狱医院中的病人至少已经治疗一年, 集中在深入了解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方面), 追踪了4年。治疗组中的很多人在第一年后假释, 但是差异在以后减少。这是长期追踪研究中的一个普通的发现。可是, 进行这种评价的一个问题是, 对照组好像已经被认为不需要治疗。

有关犯罪人个案工作效果的证据不是普遍有利的, 可两个英国监狱中的研究表明, 它可能影响重新犯罪。接近释放的罪犯被随机分派到定期 (每月一次) 与监狱福利官员讨论组, 或被分派到很少接触的对照组。追踪到2年时发现, 对照组中的人更多地被重新定罪 (69%对48%)。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影响通过与福利官员更多的个人关系为中介的, 不过性格内向的罪犯得益更多。

社区中的咨询或个案工作似乎对少年犯罪人没有更长期的影响。已经特别对这些工作与预防犯罪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 包括剑桥—萨默维尔研究, 这将在第十五章中进行讨论。可是, 肖尔 (M. F. Shore) 和马西姆 (J. L. Massimo) (1979) 叙述了一项成功的社区干预。具有反社会行为历史的20个男孩被随机地分派到治疗组或非治疗组, 这些男孩已经退学或被暂令停止上学。治疗被描述为一种综合的心理治疗方法, 这种综合的心理治疗方法将围绕工作安排进行的补救教育和特别个别治疗 (intensive individual therapy) 结合起来, 为期十个多月。治疗组成员的学业成就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心理测验中发现, 自我意象和对攻击行为的控制得到改善, 后来的工作历史更稳定; 在第15年追踪研究时, 他们中只有3人曾被逮捕, 而对照组中有9人曾被逮捕。人们还不清楚的是, 这些成功究竟反映了“深度” (in depth) 心理治疗, 还是反映了技能的改善。

一些心理治疗人员认为, 集体治疗是为精神障碍犯罪人选择的治疗, 它通常是治疗社区的组成部分。这些将在下一章讨论。

二、人本主义方法

虽然常常不易区分“咨询”计划是否贯彻了人本主义原则, 但一些对犯罪人的“咨询”计划利用了人本主义的原则。这些咨询计划也通过治疗关系集中在自我认识上面, 但治疗的重点是现在, 是通过对选择的训练和个人责任而促进个人成长。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是人本主义治疗的典型, 相似的方法被用于一些“较新的”疗法, 例如现实疗法和相互作用分析, 它们在美国的矫正环境中已经得到普及。

现实疗法 (reality therapy) 试图在热情的、指导性的治疗人员的指导下, 发展满足个人需要的现实主义的和负责任的方式, 治疗人员鼓励行为转变计划的实施。格拉泽 (W. Glasser, 1975) 描述了这种疗法在犯罪少女中的使用, 这种方法也已经被用于实现就业计划和安置离开监狱的犯罪人。可是, 这些报告都没有叙述这种方法的长期效果。

在一些美国监狱中使用的具有更多的人际取向的方法是相互作用分析 (transactional analysis)。这种分析通常依靠集体背景, 在这种背景中, 研究者带有促使更健康相互作用的目的, 采纳“我行——你也行”的态度对异常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他们假定, 少年犯罪人在不成熟的发展水平上活动, 通过依靠社会“游戏”回避真实的问题, 他们期望对这些人进行的集体暴露 (group exposure), 可以促进个人的成长和独立性。对相互作用分析的效果进行评价的研究很少, 杰斯内斯 (C. F. Jesness, 1975) 做了一些工作, 他把相互作用

分析对青少年犯罪人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青少年犯罪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克劳斯(Close)和霍尔顿(Holton)两个矫正机构中。克劳斯矫正所提供的相互作用分析,其治疗活动由定期的集体会议和与社会赞许目标有关的个别化契约组成;而霍尔顿矫正所的治疗集中于代币强化法(token economy),其中的要点是根据适宜行为(convenience behavior,即符合机构要求的行为)、学业成绩以及重要行为缺陷的改正而获得报酬。克劳斯矫正所试图在态度和影响方面产生更大的转变,霍尔顿矫正所侧重于外显行为的转化。对青少年追踪一年后发现,这两种程序有相似的违反假释率(33%)。这些人违反假释的比率比两种传统机构的人低10%左右。咨询者对罪犯积极的关注,可以部分地解释两种矫正计划中结果的差异。

在卡克赫夫的人力资源发展模式(Carkhuff'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RD] model),治疗人员的特征是很重要的。假定治疗结果中的一些变化通过如移情、积极的关注和真诚这样的特征来加以说明,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将更有效地教给少年犯罪人可能缺少的那些生活、学习和工作技能。人力资源发展模式涉及选择高效率的咨询人员,这些咨询人员掌握了人际关系、问题解决、计划发展、生涯发展和教学方面的技能。这些技能为通过模仿、强化和实践而训练犯罪人的系统化矫正计划提供了基础。这个模式已被用于美国一些州立矫正和联邦矫正机构,也用于一些转向计划(diversion schemes)。霍尔德(T. Holmler, 1978)对追踪研究进行了总结,与一个释放50%犯罪人的两年基础比率相比较,表明平均重犯率是10%。强调技能训练的这种方法是与对犯罪人的行为和认知干预相联系的。

第四节 应用行为分析

尽管经典条件反射或二过程模式(two process model)在犯罪性理论中是突出的,但是,它们已经更多地用于不合群行为,而用于反社会行为的不多;在性犯罪人治疗中它们也有重要的作用,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讨论。直到10年前,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才成为探讨犯罪人行为的主要方法。虽然由于吸收了模仿和认知“事件”,应用行为分析常常被称为“社会学习”,但这种方法假定,行为受其环境前因(environmental antecedent)和结果的控制,这不当与班都拉的社会认知理论相混淆,班都拉强调相互决定论(参见第4章)。一些方法集中在重新安排与特殊反应或反应等级相关的环境相倚事件。以负强化、惩罚、间歇(time out)和反应代价形式出现的厌恶性后果,常常被发展为有计划的干预,但是很少孤立地使用厌恶性后果。它们更普遍地是正强化物的附属物,例如赞扬、金钱、向往的活动或者是提供接近这种活动的代币强化物。模仿、角色扮演和反馈的技能训练也已经广泛使用。重点在于增加社会赞许行为(socially desirable behavior)的出现频率,例如,学业成绩,与工作有关的技能,恰当的社会互动;人们假定这些行为与反社会行为是不相容的。实际上,干预可能常常直接指向个别犯罪人,可很多研究报告涉及某个班级、工作单位或生活单位中所有个人行为的结果,例如,在代币强化法中就是如此。干预也涉及通过少年犯罪人与双亲、缓刑犯与缓刑官之间的相倚合同产生的相互影响。

一、矫正机构计划

在矫正机构中实行的相倚管理方法 (contingency management method) 普遍采用代币强化法的形式。人们发现, 这种代币强化法对目标行为、通常的自我照管、矫正机构维护任务、规则遵从、教育和与工作有关的行为, 具有直接的、短期的影响。例如, 在一个对年幼少年犯罪人的研究中, 霍布斯 (T. R. Hobbs) 和霍尔特 (M. M. Holt) (1976) 记录了在3个矫正机构宿舍 (cottage) 中实行代币强化法的效果, 1/4 作为对照组。代币的数量依规则遵从, 完成家务性劳动、社会相互作用和列队行为 (line behaviour) 的情况而定, 替代强化物是不含酒精的软性饮料、糖果、香烟、娱乐、回家, 最后是释放。一项多基线设计研究 (multiple base-line design) 证明, 在每个矫正机构宿舍实行代币强化法后, 必然会增加目标行为的平均百分率。另外的研究显示, 代币强化在控制成年犯行为和司法精神病病人行为中是有功效的。可是, 罗斯 (R. R. Ross) 和麦凯 (H. B. Mackay) (1976) 报告说, 犯罪少女的行为在引入了代币强化法后却发生退步。尽管可以把建立矫正机构代币强化法中遇到的问题看成是缺乏管理人员支持的结果, 或者看成是矫正计划主管人员在适当控制所配备的人员和其他资源方面遭到失败的结果, 但是, 这种报告是罕见的。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矫正机构建立了许多代币强化法, 不过在英国对犯罪人使用代币强化法已经受到限制。里德 (I. D. Reid, 1982) 叙述了格林索恩青年矫治中心 (Glenthorne Youth Treatment Centre) 的发展, 这个矫治中心是为青年人建立的保安机构, 进入这一机构的青年是那些扰乱治安或有危险因而不适于社区安置的人。在进入机构时, 对男青年实行点数强化法 (point economy), 但是, 随着他们从较高安全等级转到较低安全等级和与外面世界的接触, 越来越多地强调个别化的矫治目标、社会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的发展。霍格非 (M. Houghugh, 1979) 叙述了一项针对扰乱治安性少年犯罪人的相似的矫正计划。

可是, 只有一些矫正计划评价了释放后积极改变的保持和泛化。表明代币强化法对累犯有长期效果的证据是微弱的, 很多评论者持否定性的看法。可是, 证据表明, 经过这种程序治疗的犯罪人不会较快地重新犯罪。对完成 Case II (即“特殊教育的相倚适用”, Contingencies Applicable to Special Education) 的少年与普通矫正机构计划的少年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 前者在释放后 2 年时的重新犯罪较少, 但在释放后 3 年时的情况不是这样。杰斯内斯 (C. F. Jesness, 1975) 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他对英国一家私立医院中对有犯罪史的行为障碍年轻男性和女性采用代币强化法的情况进行了评价, 结果也表明, 这种方法获得了部分成功。与一组只提供地方但不对他们实行矫正计划的人相比较, 在这种矫正计划中至少渡过 6 个月的病人 1 年后与警方的接触较少, 但 2 年后不是这样。可是, 这些评价中只有一个涉及随机分派, 矫正计划的内容与结果的关系还不明确。在一个最高警戒度医院中进行的对代币强化法的长期追踪研究, 没有发现执行矫正计划与后来的犯罪行为有任何关系。

尽管代币强化法能够影响对监禁罪犯的管理, 可是把它们作为一种矫正手段的正当理由似乎是微弱的。在一些问题上, 它们也已受到严肃的批评。第一, (代币强化法) 与矫正机构通常要矫正的那些犯罪行为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埃默里 (R. E. Emery) 和马霍林 (D. Marholin) (1977) 认为, 矫正中的相倚管理既不是在对犯罪行为的总体水平的功能分析基础上进行的, 也不是在对个别犯罪行为进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 规

则遵从和适宜行为的共同目标服务于矫正机构管理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罪犯的目标。奥普顿(E. M. Opton, 1975)提出,这种矫正计划不但保持了有利于管理者的权力不平衡,而且常常是惩罚性的。例如,联邦监狱对难管理犯人的START(即“特殊治疗矫正训练计划”, Special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rogram)代币强化法,主要依靠负强化来形成遵从,没有强调给予新的技能,1974年因认为违反公民权利而导致它的结束。同样,对使用改善生活舒适度作为替代强化物的做法,也一直存在伦理学的和法律上的异议,这类生活舒适是犯人的权利,应当经常能够得到。最后,罗斯(R. R. Ross)和普赖斯(M. J. Price)(1976)对这个操作模式在理论上的适合性提出了质疑,这个操作模式依赖于外在的动机而不是内在动机,他们认为,应当让犯罪人感到对其治疗负有责任,而不应感到是被强加的。米兰(M. A. Milan, 1987)赞同在矫正机构内实行代币强化法,其理由是代币强化法使监狱环境更人道,有可能提供生存技能(survival skill),他注意到,1980年以来,人们对代币强化法的兴趣有明显下降。

二、社区干预

当训练和生活环境相似时,新技能更有可能推广,所以,以社区为基础的行为矫正被认为是更有希望的。社区干预能够利用非越轨模式(nondeviant model)的影响,并且也可以利用那些能够控制犯罪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偶然事件的转化力量。可是,(社区干预的)执行通常需要其他部门的合作,还提出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奥斯塔皮克(E. Ostapiuk, 1982)通过描述在英国伯明翰一个名叫沙珀(Shape)的社区矫正机构的发展解释了这些问题,沙珀是一家旅馆,它对犯过罪的人进行社区“生存”技能培训。除了对工作人员的训练以外,矫正计划组织者还面临这样一些任务:基金增值,寻找房屋,建立联系,如警方与地方大学部门方面的联系,并且要努力得到当地社区的认可。

在一个对犯罪人进行相倚管理的早期例子中,施维茨格布(R. L. Schwitzgebel, 1967)直接与自然的“街角”环境中的少年犯罪人接触,并且邀请他们参加磁带录音访谈,访谈期间,他们的亲社会陈述受到不同的强化。可是,对于年轻犯罪人的很多工作是由福利机构或刑事司法机构来做的,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学业和人际交往技能,学业和人际交往技能被认为有可能阻碍少年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反社会行为,例如在家里或学校中的纪律问题,也常常是工作的目标。试图直接矫正非法行为的研究一直很少。干预通常是通过其他人进行的,如父母或缓刑官,干预主要的应用是在居住环境中,包括少年犯的家庭、学校以及缓刑部门。

美国群体之家(group home)¹为十几个青年提供有监督的食宿,这些人可以进入普通学校上学或参加社会工作,周末可以回家。这些是**教学家庭模式**(teaching family model)的环境,20世纪60年代末起源于堪萨斯州的成就地(Achievement Place)。这个模式安排了一个有组织的家庭式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受过训练的管理者通常是一对已婚夫妇,他们有区别地教会和支持那些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所需的亲社会技能。这个矫正计划从代币强化法着手,其中特别待遇依点数工资(points earnings)而定,从“荣誉”(merit)制度

1. 一种家庭式少年犯社区矫正机构。少年犯生活在这种家庭式环境中,工作人员满足少年犯的基本需要,对他们进行守法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方面的教育和训练。这种机构主要在美国流行。——校注

向“限制回家”(homeward bound)阶段进步。使用被试内应用行为分析设计(within-subject applied behavior analytic design)方法在成就地进行的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对各种各样目标行为的相倚控制,例如,打扫房间,恰当的进餐行为,非攻击性言语,群体决策,协商技能,处理与警察的冲突以及与成年人相互作用。有人也尝试用远期结果来影响学校和家庭行为,特别注意训练工作人员教给少年犯罪人社会相互作用技能。

到20世纪80年代初,教学家庭模式在20个州大约200所少年犯教养院得到使用,对英国也产生一些影响。例如,布朗(B. J. Brown, 1985b)描述了伦敦奥克德·洛奇(Orchard Lodge)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包含上述一些特征。可是,后来的评价已经证明是令人失望的。柯里金(K. A. Kirigin, 1982)等人对最初的成就地(Achievement Place)和12个相似的教养院与9个传统少年犯社区教养所(community home)进行了比较研究。教学家庭计划(teaching family program)在居住的整个期间显著减少了与警察和法院的接触,但从这个计划退出后就不是这样。随后使用自我报告资料进行的一项评价,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布朗克曼(C. J. Braukmann)和沃尔夫(M. M. Wolf)指出(1987),过渡性矫正计划是必须的,它可以使接受治疗的青年将支持性亲社会技能带回到环境中。

更直接的家庭治疗(family treatment)是以研究结果为根据的。研究发现,父母和少年犯罪人的兄弟姊妹的模式,强化和塑造了越轨行为;研究也发现,家庭的相互作用经常是失调的。因此,调整家庭关系既可达到矫正的目的,也可达到预防的目的。在家庭行为干预中使用的一般策略是训练问题解决技能。例如,基弗(R. E. Kifer, 1974)等人为了解决3对亲子间的矛盾,通过行为重复(behavior rehearsal)和社会强化教给他们协商技能。可以发展合适的技能,并且推广到解决家庭中的矛盾。塞纳(L. A. Serna)等人的研究也发现(1986),如果教给父母相互交流的技能(例如,给予和接受积极或消极的反馈),那么,执行缓刑的青年人更可能保持训练后的交往技术。当父母参与训练时,被评定的相互作用也提高,不过,没有考察长期的效果。

一种普遍使用的技术是相倚合同(contingency contracting),这种相倚合同安排了2个或更多的当事人之间强化物的交换,并且制定了相互终结(reciprocity explicit)的标准。斯图尔特(R. B. Stuart)、杰亚拉纳(S. Jayaratne)和特里普蒂(T. Tripodi)发现(1976),父母—子女和教师—儿童之间的合同对虞犯儿童(predelinquent children)的学校行为和母子关系只有不太大的影响,并且强调,合同作为多成分矫正计划(multicomponent program)的一部分是很有用的。例如,斯达姆豪泽(J. S. Stumphauzer, 1976)通过订立合同,在合同中强调父母应当注意没有偷窃的行为和自我控制技术(自我监控、自我强化和自我评价),成功地消除了一个12岁女孩的偷窃行为。可是,合同的功效依赖于治疗人员的技术和家庭失调的内容。例如,韦瑟斯(L. Weathers)和利伯曼(R. P. Liberman)(1975)尝试用订合同和交流技术,训练28个少年犯罪人家家庭,可是,有22个家庭退出,训练对这些行为的保留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表明合同对于那些已经无法控制对青少年起作用的强化物的家庭,是无效的。

主要的策略是父母管理训练(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和系统家庭行为疗法(system behavioral family therapy)。现在已有大量有关父母管理训练的文献,这种父母管理训练的目的在于改进儿童养育实践,但影响最大的是帕特森(G. R. Patterson)的探讨。在证实了强制性相互作用会使行为问题儿童产生反社会行为之后(参见第七章),帕

特森 (G. R. Patterson, 1974, 1982) 集中训练父母辨别越轨行为, 并且训练父母根据社会学习原则有区别地奖励正常的行为; 训练父母通过模仿和角色扮演成为行为矫正者, 并且训练他们使用间歇 (time out) 和协商订立合同。越轨行为的发生率已经被降低到正常范围, 并在一年的追踪期内得到保持。人们也发现, 这种矫正计划对同胞兄妹行为和母亲的精神病态现象有积极的影响。伯纳尔 (M. E. Bernal)、克林纳特 (M. D. Klinnert) 和舒尔茨 (L. A. Schultz) (1980) 没有证实父母行为训练的优势胜过来访者中心疗法, 可是, 卡兹丁 (A. E. Kazdin, 1987) 认为, 现在可以肯定, 这种旨在改善儿童行为的方法是有效的。不过, 这些方法对后来少年犯罪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帕特森矫正方法的目的在于减少强制性行为, 对其他反社会活动的效果可能较小。例如, 穆尔 (D. R. Moore)、钱伯林 (P. Chamberlain) 和姆凯 (L. H. Mukai) 发现 (1979), 参与帕特森矫正计划的儿童中, 大多数小偷后来犯了罪, 但攻击者与正常的青少年没有什么不同。近来,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犯罪青少年, 减少了治疗期间的少年犯罪行为, 但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这样的效果, 它可能对较年幼儿童的效果最佳。

亚历山大 (J. F. Alexander) 的系统家庭行为疗法 (behavioral systems family therapy) 或**功能家庭疗法**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建立在家庭系统理论基础之上。在这种理论中, 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被看作是家庭交流功能失调的结果, 而不是家庭交流功能失调的原因。焦点集中在家庭相互作用的方式上面, 目标是通过让少年犯罪人家庭的交流模式接近于正常家庭的交流模式, 使少年犯罪人的家庭成为更有效的问题解决者。治疗人员通过模仿、激励和强化清楚而和谐的交流, 改变防御性的和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可以通过合同而建立; 现在这种方法吸收了有关“重新构想” (reframing) 或“重新标定” (relabelling) 问题的认知技术。在一项早期的评价中, 亚历山大 (J. F. Alexander) 和帕森斯 (B. V. Parsons) (1973) 对功能家庭疗法和来访者中心疗法、折衷动力学疗法、没有治疗的情况, 进行了比较研究。在 6~18 月追踪期间, 接受行为治疗的少年犯罪人的 26% 成为累犯 (指进一步的身份犯罪), 与之相比, 在其他治疗条件中的累犯是 47% 到 73% 不等; 不过, 刑事犯罪的累犯率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矫正计划也对同胞兄弟的少年犯罪有显著的影响。在一个教养学校 (training school) 中, 巴顿 (C. Barton) 等人 (1985) 研究更为严重的少年犯罪人时发现, 在跟踪的 15 个月期间, 60% 治疗过的少年犯罪人被指控犯了新罪, 与之相比, 用其他方法治疗的那些人中有 93% 的人受到指控。戈登 (D. A. Gordon) 等人 (1988) 也描述了一个独立的重复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了更深入的家庭治疗。在跟踪 2 年到 2 年半期间, 采用功能家庭疗法的 27 个家庭中只有 11% 的少年犯罪人受到新的判决, 而只接受缓刑考察的少年犯罪人中有 67% 的人受到新的判决。

教学家庭模式和家庭疗法是通过其他力量发挥作用的社区干预中的一种普通策略, 受过恰当训练的准专业人员可能与专业人员一样有效。这种策略反映了“三人组合模式” (triadic model) 的影响, 在这个模式中, 心理学家起一名顾问的作用, 他们训练中间人 (mediator), 而中间人又去操纵那些控制受治疗人员行为的相倚事件。例如, 福 (Fo) 和奥唐奈 (C. R. O'Donnell) (1975) 招收成人志愿者作为“搭档” (buddies), 并且训练他们增强亲社会行为。少年犯罪人被随机地分派给一个搭档 (N=264), 或者随机分派到非参与对照组 (N=178)。在这个课题实施的一年期间, 对逮捕记录进行了评价, 其结果依赖先前的记录。在具有重大犯罪历史的少年犯罪人中, 实验组的被试因重大犯罪被逮捕的人

数比对照组少(38%对64%),而在具有轻微犯罪史的这些人中,实验组的被试犯重大犯罪的显著增多(16%对7%)。研究表明,这种矫正计划使那些具有轻微犯罪史的人更容易受到其他少年犯罪人的影响。

三人组合模式被认为与**缓刑**(probation)特别有关。尼茨尔(M. T. Nietzel)和希米伦(M. J. Himlele)提出(1987),传统缓刑的功效仍然是含糊的,它的合理性更多地依靠经济方面的理由,而不是矫正方面的理由;帮助和监管两方面的要求都会强调令人讨厌的控制。因此,采用强调目标设置和对特定行为目标进行正强化的方法训练缓刑官,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

虽然对缓刑官的行为训练有一些报道,但是,这种做法还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雷明顿(B. Remington)和雷明顿(M. Remington)(1987)根据其评论认为,研究结果是“暗示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一些研究表明,缓刑官愿意接受行为主义的方法,他们在行为分析和相倚管理方面的技能,能够通过短期训练课程得到有效地增强。不过,训练实际上经常没有得到实施。近期的发展包括指导缓刑官掌握功能家庭治疗和认识一行为技术,现有的评价主要局限于对少年缓刑犯使用相倚合同的情况。

一项重要的研究是杰斯内斯(C. F. Jesness)等人所做的(1975),他们使用行为分析和相倚合同训练90名缓刑官的管理者。然后,这些缓刑官将对412名年轻的缓刑犯开展工作。合同的使用是断断续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高级管理人员的强化,只有1/3的缓刑官写了恰当的合同。在合同所定的目标中,59%的人减少了自己的问题,而与之比较的对照组中,对类似的问题减少只有43%;不过对非犯罪目标,例如逃学和学校不良行为,则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发现对非法活动、攻击行为、醉酒或者与少年犯罪人交往产生明显的效果。在6个月追踪期间,协助商定合同的缓刑犯和对照组之间在重新定罪方面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14%对20%)。可是,当签订的合同恰当时,会获得更积极的结果;恰当的合同加上缓刑官对缓刑犯的“尊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累犯。因此,这个研究证实了一些积极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更普遍地取决于对服务的支持和适应,并且依赖于最初训练者的继续监管。这些问题已经由于在矫正计划中使用准专业人员提供服务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

学业技能和职业技能一直是对少年犯罪人实施的行为矫正计划的重要目标,矫正机构内干预和社区干预都是如此。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通常处理“虞犯少年”(predelinquent),即因为学业失败和社会问题(如学校不良行为或警察接触)而具有向严重少年犯罪发展危险的青少年;由于这些矫正计划像三级干预一样是以预防为目的的,因此,这些问题将在第十五章中予以讨论。

工作访谈技术(job interview skills)常常被包括在行为矫正计划中,人们已经报道了一些为严重的少年犯罪人实施的就业计划(employment program)。特温迪曼(C. T. Twentyman)、詹森(G. F. Jensen)和克劳斯(J. D. Kloss)发现(1978),具有精神病转诊(psychiatric referral)史和长期失业历史的缓刑犯的访谈作业(interview performance)被评定为是缺乏技能的,这种缺乏技能是与职业顾问和缓刑犯本人对失业控制缺乏技能有关系的。一个小组被安排接受寻找和申请工作以及访谈作业方面的训练,包括通过讨论、看电影、角色扮演和录像片反馈等方式处理“棘手的”(tough)问题,训练改善了所评定的访谈行为,例如,眼睛接触、专注和综合技能,完成工作申请的准确性与没

有治疗的对照组有关；在2周的追踪研究期间，实验组的5个被试中有4人已经获得工作，而对照组的6个人没有一个获得工作。米尔斯（C. M. Mills）和沃尔特（T. L. Walter）（1979）在对53名缓刑青年工作训练的研究中考察了长期的普遍规律，这个研究也涉及到雇用者。在一年的追踪研究期间，实验组的全部被试随后都找到了工作，而对照组23名被试中只有39%的人找到工作，实验组的很多人仍然继续就业（34%对0%）。而且，实验组成员中的91%的人避免了被再次逮捕，而对照组只有30%的人没有被再次逮捕。

虽然治疗者在理论上赞同环境决定论，但社区行为矫正已倾向于强调改变个别少年犯罪人；除了功能家庭治疗，几乎没有方法试图改变这个宽泛的系统。然而，正如戈尔茨坦（A. P. Glodstei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1989），社区干预需要比在社区中进行干预更多的东西，不但需要改变一些人的行为——这些人控制着少年犯罪人所在的环境中直接发生的相倚事件，而且还需要改变控制一般资源的人们的行为。斯达姆豪泽（J. S. Stumphauzer）、维勒茨（E. V. Veloz）和艾肯（T. W. Aiken）（1981）概括了功能分析如何应用于社区单位，例如，少年犯罪邻里，可是，似乎还没有人报道这种方式的影响。

三、行为干预应用概述

已经证实，行为干预可以短期改善各种环境中年轻犯罪人的亲社会行为。可是，人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改善可以泛化到治疗环境之外，只有一些矫正计划已经显示出对累犯有较长时期的影响。此外，尽管可以在操纵环境相倚事件中存在较大灵活性，但是，社区干预并没有比矫正机构内干预取得更显著的成功。因此，对犯罪人行为矫正的预期仍然是一种预期。

戈特沙尔（R. Gottschalk）等人描述了一项超级分析（1987），这项超级分析的对象是1967年至1983年间报告的有关年轻犯罪人治疗的30项行为研究。关于定性评定，大多数研究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但是，就效果大小（effect size）的标准而言，有关没有效果的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是不可能被拒绝的。作者认为，对于各种结果（包括累犯）来说，没有大量的证据证实行为技术在改变反社会行为方面有功效。一个理由可能是结果研究的质量。戈特沙尔等人在1987年所做的研究中发现，效果大小与治疗强度（持续期间）和研究设计恰当性之间有某些联系。布莱斯塔（Blasta）和戴维森（Davidson）（1988）指出，缺乏可以作出明确结论的恰当的方法论。卡兹丁（A. E. Kazdin, 1987）对于反社会儿童的治疗作出了相似的结论。对于犯罪人的行为干预在强度方面常常是微弱的，在短期内应用一套有限的技术对行为进行干预，而与犯罪有关的行为却没有受到考察。此外，一些研究报告指出，结果不仅依赖于干预技术，而且也依赖于目标行为、情境、治疗人员与治疗对象的特征，可是，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些决定最佳效果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例如，家庭干预的效果似乎取决于训练者的技能和家庭功能失调的程度，家庭干预可能对年幼的孩子很有效，但对于来自完整家庭的被判刑的少年犯罪人没有什么效果。

研究者关注的中心是干预的保持和泛化（generalization）方面的明显失败。正如戈特沙尔（R. Gottschalk）等人指出的那样（1987），人们并没有严格地要求把泛化作为应用行为分析成功与否的标准，因为环境控制的假说意味着，只有存在共同的刺激成分时，行为在不同环境之间的迁移才有可能。不过，行为矫正的可靠性依赖于对累犯是否有一定影响的证明。在一种水平上，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泛化能够通过恰当的矫正计划而获得。可

是,所取得的这种结果是**刺激**(stimulus)的泛化,而不是对另一个人的某种反应的泛化。假定少年犯罪人行为中的变化将改变对其社会环境的反应,那么他们参与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是,因为“行为即行为”(behaviour is behaviour)的信条,研究者很少注意犯罪学理论,行为矫正计划的目标通常是学业技能或社会技能,这些技能与少年犯罪之间的功能关系还没有确立。

也有人假定,一旦最近训练的技能通过恰当的干预建立起来,这些技能将通过自然的相倚事件而得到维持。可是,这无疑符合一种急性障碍模式(acute disorder model),在这个模式中,“治愈”(cure)通过“治疗”(treatment)获得永久的效果。由于反社会行为是一种长期的情况,它需要连续的干预。

第五节 认知—行为矫正

认知—行为矫正(cognitive-behavior modification)包括多种多样的方式,这些方式普遍遵循认知影响行为的观点,并且都使用行为和语言程序改变认知过程。可是,它们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反映了对互不相干的哲学观念的不稳定结合。已经有人辨别出三种中介模式(mediational model),即内隐性条件反射模式、信息加工模式和认知学习模式。在**内隐性条件反射**(covert conditioning)模式中,认知被看作是外显现象的内隐形式,它容易受到已建立的“学习律”(laws of learning)的影响。在早期新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中,我们能找到把认知作为“行为”的比喻说法,在斯金纳对隐私事件(private event)的激进行为主义的分析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隐喻,这种模式对于像自我控制和内隐致敏这样的程序提供了解释。斯金纳把隐私事件看作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种微弱的联系,关于这种模式的功效,行为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一些人认为,这种模式对内隐言语行为有显著的控制作用。

在**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ing)模式中,认知更为明确地成了行为的重要媒介,认知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构造,人们获取、储存和回忆这些来自环境中的信息。这种观点采取了一种相互决定论,认为人类是信息的积极寻求者和创造者,并对外部世界的中介做出反应。虽然治疗方法不是直接出自这种观点,但它对社会能力和治疗转化的理论解释是有影响的。

认知学习(cognitive learning)模式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反映。认知学习模式试图整合学习理论和信息加工模式,主要集中在如何形成经验方面,而不太关注强化程式(reinforcement schedule)。这个模式构成班都拉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在艾利斯的合理情绪疗法(Ellis's Rational Emotive Therapy)、贝克的认知疗法(Beck's Cognitive Therapy)、问题解决以及应付方式中都有表现。可是,最近的表述批评信息加工概念,认为它出自计算机类比,并且强调知识是一种主动的建构,不是简单地对过去经验的储存性复制(preserved replica)。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与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互不排斥。

当前,很多认知—行为程序在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正当理由都是脆弱的。实证主义的评论家认为,这类方法只是直接指向“某一小类行为”(a subclass of behaviors)的行为疗法。可是,由于缺乏一致的观点,这种评论文章攻击一种假想的人(straw man)。已有人

认为, 认知—行为疗法的和传统的行为方法之间, 在结果方面没有差异, 这种比较可能仅仅适合于一些临床问题, 并没有证实认知是额外的治疗负担 (baggage)。它们同样认为, 一切成功的疗法都是通过认知改变发挥作用的。

在过去的 10 年中, 人们使用认知—行为方法解决犯罪人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 不过到目前为止, 有关认知—行为方法的长期效果的证据还是有限的。对认知学习观点的最综合性的发展来自罗斯 (R. R. Ross) 和法比亚诺 (E. A. Fabiano) (1985), 他们评述了很多认为少年犯罪人在社会认知方面有缺陷的证据, 这些社会认知缺陷与认知发展的自我中心水平有关 (参见第八章)。他们从对犯罪人矫正计划的分析中推论出, 最有效的方法是那些明确地吸收了认知成分的方法 (虽然这种方法包括了行为程序, 例如模仿和角色扮演, 但是, 某些应用行为分析者认为不需要认知解释)。这种观点受到后来进行的一项超级分析的支持, 这项超级分析表明, 行为方法的效果大小与是否包括认知成分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因此, 罗斯 (R. R. Ross) 和法比亚诺 (E. A. Fabiano) 提出 (1985), 思维能力和思维内容应当是矫正计划的主要目标, 随后的目标是特别有关的, 它们是: 社会技能, 人际问题解决、认知方式、社会观点采择、批判性推理、价值观念、超级认知 (metacognition) 和自我控制²。一种范围广泛的技术可能影响这些目标, 但是, 这里只是概括用于犯罪人的主要策略。

一、社会技能训练

很多行为矫正计划试图改善犯罪人的社会互动能力, **社会技能训练** (social skills training, SST) 在矫正机构和社区环境中已经普遍流行。社会技能训练有很多变体, 如结构化学习训练 (Structured Learning Training) 是人力资源发展模式 (th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el) 的组成部分, 共同的成分是联合使用下列技术: 模仿、指导 (instruction)、角色扮演和重复、反馈、社会强化以及训练人际相互作用技能的家庭作业。虽然社会技能训练明确地建立在行为主义方法的基础之上, 并且常常不包括特定的认知技能训练, 但是, 人们仍然一直共同地使用信息加工的术语来看待社会技能训练。

社会技能既没有统一的定义, 也没有需要训练的必要成分。有的矫正计划集中于特殊的技能, 例如, 与特殊类型的人交流的技能; 而有的矫正计划则进行综合性的训练, 内容包括非言语性微型技能 (micro-skills), 例如目光接触和姿势, 也包括一些比较宏观的技能, 例如, 发起和维持会谈的技能, 特殊的自信技能, 协商或者异性社交技能。社会技能训练对犯罪人的确切目标常常是不清楚的, 通常的假设是, 提高基本技能或特殊技能会帮助犯罪人避免进一步犯罪。

大多数报告集中在训练提高特殊技能的功效方面。戈尔茨坦 (A. P. Goldstein, 1986) 从对少年犯罪人或攻击性青少年的 30 项研究的评述中推断出, 已有证据表明, 在训练程序终止时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技能。例如, 在对矫正机构内年轻犯罪人的有控制的研究中, 奥勒迪克 (Ollendick)、赫森 (M. Hersen) (1979) 和斯彭斯 (S. H. Spence)、马赛里亚 (J.

2. 在心理学界, 很多人把 metacognition 翻译为 “元认知”, 这是不恰当的, 是没有正确使用中文 “元” 字的结果。“元” 包含有最小的、不能再分的含义; 而 metacognition 是指 “对认知的认知”, 因此, 翻译为 “超级认知” 是比较符合原意的。——校注

S. Marzillier) 发现 (1981), 社会技能训练之后, 虽然少年犯罪人某些技能 (例如注意反馈) 没有多大改变, 但是, 在微型技能方面, 例如目光接触、头部运动和言语内容, 则有了改进。戈尔登 (K. Golden) 等人 (1980) 也成功地教缓刑犯罪人掌握了证明行动是正当的技能、向权威人物 (缓刑官) 提出请求的技能; 而塞纳 (L. A. Serna) 等人证实 (1986), 对缓刑犯进行社会技能训练之后, 7 种特别的交流技能都得到改善。可是, 人们很少一致地指出训练后技能的保持情况。斯彭斯 (S. H. Spence) 和马赛里亚 (J. S. Marzillier) 发现 (1981), 基本的技能在追踪 3 个月期间继续保持着, 但是 6 个月时没有保持下来。对泛化的研究结果也是不相同的。戈尔茨坦 (A. P. Goldstein) 等人提出 (1989), 通常情况下, 个人在技能训练程序中只有 15 ~ 20% 的人把这种技能迁移到训练之外。在结构化学习训练中, 通过获得一般学习原理、对新技能的过度学习、改变训练刺激以及按计划进行自然强化, 他们的技能能够增加到 50%。

受培训者在训练结束时通常报告很少的社会问题, 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更普遍的人格改变, 例如, 控制点更多地向内部转移、自尊得到提高。可是, 霍林 (C. R. Hollin) 等人不能重复先前的控制点变化的研究结果 (1986); 在斯彭斯 (S. H. Spence) 的矫正计划中, 自尊心提高也由注意—安慰剂对照组显示出来。在追踪 6 个月时, 这种变化没有维持下来。

一些矫正机构的研究发现, 在由工作人员评定时, 社会技能训练导致较多的遵从, 但另外的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变化。霍林 (C. R. Hollin) 等人发现 (1986), 矫正机构的纪律报告得到了改善, 可是, 注意—安慰剂组和社会技能训练组也有类似现象。

社会技能训练对犯罪人的长期效果同样被混淆不清, 而且只是在几项研究中考察了这种影响。斯彭斯 (S. H. Spence) 和马赛里亚 (J. S. Marzillier) 发现 (1981), 在 6 个月的追踪期间, 社会技能训练对官方少年犯罪没有显著的影响, 接受社会技能训练培训者记录了较多的自我报告的犯罪。另外一些研究报告了积极但不确定的影响。在一项社交技能训练的早期研究中, 同时涉及对少年犯罪行为的讨论和选择性的角色扮演, 奥斯特罗姆 (T. M. Ostrom) 等人在这个研究中发现 (1971), 参加训练的缓刑犯在追踪的最初 5 个月期间很少再次被逮捕, 但是, 在接下去的 5 个月期间可能再次被逮捕。可是, 萨拉森 (I. G. Sarason, 1978) 描述了一个追踪 5 年的比较简单的矫正机构计划, 这个矫正计划中使用模仿和角色扮演方法, 角色扮演的内容是犯罪人释放后通常会遇到的问题情境, 例如, 抵抗来自同伴的压力, 处理与缓刑官有关的问题。在追踪期间, 虽然社会技能训练并不比对同样问题的讨论更成功, 但接受社会技能培训者与没有治疗的对照组相比, 累犯减少了一半 (15% 对 31%)。尽管这个结果表明了一种“关注” (attention) 或者说没有特别的效果, 但是这种环境中的讨论被看作是一种象征性模仿。可是, 霍林 (C. R. Hollin, 1984, 1990) 对使用累犯作为社会技能训练的结果标准提出了批评, 他的理由是, 这种做法将那种既不可能由行为主义理论、也不可能由犯罪学理论证明是合理的反应泛化。他提出, 除了社会技能缺陷是否与犯罪有关系的问题外, 一些矫正计划没有确定接受培训者是否在被选择来进行培训的技能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

对犯罪人社会技能培训的作用, 似乎可与在临床病人中发现的效果相比较。虽然社会行为的短期改变能够实现, 但是, 其结果的持久性和泛化受到限制。一些有限的研究结果可能反映刑罚环境在支持这种改变方面的失致, 可是, 人们可能一直对社会技能训练在对犯罪人产生多大影响方面, 抱有不现实的期望, 这或许因为社会技能与公开演讲中的最佳

适应相似, 社会技能训练会强化训练者。可是, 可得证据没有证实社会技能训练在矫正环境中得到普遍使用。一般而言, 还存在与社会技能训练有关的未解决的理论问题, 尤其是在理论上还没有阐明社会技能训练与认知和动机因素的关系、社会技能缺陷与犯罪行为的关系 (参见第八章)。也存在与训练上课时间的次数和持续时间有关的程序上的问题, 模式和训练者的特征的问题, 以及训练的有效组成部分的问题。尽管可以把社会技能训练作为一种帮助社交困难的犯罪人的临床程序, 但是, 需要小心地把它作为其他措施的辅助工具。

二、自我控制

训练治疗对象管理自己行为的程序源于几种理论观点。在行为主义的自我控制中, 治疗对象操纵反应的前因 (antecedent) 和后果 (consequence), 这种反应受到自我监控、改变控制性刺激以及对强化和惩罚的自我管理的制约。前因和后果包括内隐事件, 认知也可能是需要加以控制的目标反应。虽然经常使用这些方法控制令人不快的活动, 如贪吃或吸烟, 但是, 对于反社会行为的应用情况, 却局限于一些个案报道。例如, 正如早期所描述的那样, 斯达姆豪泽 (J. S. Stumphauer, 1976) 将自我控制方法与一份签订消除 12 岁女孩的偷窃行为的合同联合起来。思考停止 (thought stopping) 方法也就是用自我指示“停止” (stop) 来中断认知—行为序列,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构成一种自我控制技术, 来减少学校男生的暴力爆发。不过, 这两个案例都没有涉及已决犯罪人。

作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自我指导性训练 (Self-instructional Training, SIT) 与认知学习模式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这种方式与内隐性条件作用的联系则不如前者, 不过自我指导性训练的某些内容可以用内隐性条件作用的术语来解释。自我指导性训练源出于俄罗斯发展心理学家关于内部言语或“自我谈话” (self-talk) 在控制外部行为的作用方面的研究。治疗人员示范如何通过言语指示来指导行为, 让治疗对象进行复述, 先是用外显的方式复述, 然后逐渐发展为内隐的自我陈述。有人认为, 自我指导性训练是增加冲动性控制的一种有希望的方法, 可是, 大多数自我指导性训练是对在课堂上表现出问题行为的青春前期儿童使用的。肯德尔 (P. C. Kendall, 1984) 对这个群体的几项研究进行了概括, 在研究中, 研究者使用模仿、反应代价以及社会强化和自我强化, 教会青春前期儿童如何应用自我指示应付和解决问题。结果发现, 可以通过“匹配熟悉图测验” (the Matching Familiar Figures Test, MFFT) 测量对冲动性的效果, 在一些情况下对教师评定的自我控制也有效果。不过有关这种训练能否泛化应用于其他课堂行为和长期保持的研究结果, 则是含混不清的。贝尔 (C. R. Bell)、芒迪 (P. Mundy) 和奎伊 (H. C. Quay) (1982) 将类似的自我指导性训练程序应用于一项类似的研究, 考察了研正机构内的行为障碍少年。采用纸上迷津 (Porteus Maze) Q 分数, 而不是“匹配熟悉图测验”进行的测量发现, 对大量认知任务的问题解决方面的训练, 使实验组比对照组减少了冲动性反应。肯德尔的程序最近已扩展至日间医院 (day hospital) 中品行障碍儿童。在一项交叉设计中, 分派儿童参加标准的个别心理动力学治疗或者认知矫正计划, 认知矫正计划由应付方式和人际问题解决方面的自我指导性训练组成, 包括观点采择。在教师对儿童自我控制和亲社会行为的评定中, 也在儿童自我报告的学习能力和社会接纳中, 都发现了支持认知—行为矫正计划的显著改善, 但是, 在破坏性行为 (外显行为) 或者匹配熟悉图测验中没有发现可以识别出的效果。

斯奈德 (J. Snyder) 和怀特 (J. J. White) (1979) 考察了自我指导性训练对 15 个少

年犯罪人和行为障碍青少年的行为的影响,这些人对矫正机构内的代币强化法没有反应;他们被随机地分派参加6次自我指导性训练组、相倚觉察(contingency awareness)讨论组的训练,或者参加没有治疗的小组。在两周的追踪期间,自我指导性训练组在一些方面显示出较大的改善,如到校上课率、冲动(反社会)行为、完成所要求的社会任务和自我照管的任務。这些方面的改善在追踪的两个月期间得到保持。鲍曼(P. C. Bowman)和奥尔巴克(S. M. Auerbach)(1982)对10名情况相似的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使用了多方式矫正计划(multimodal program),这些人被分派到治疗组和注意—安慰剂组。治疗由10次放松训练、问题解决训练、自我陈述矫正以及行为重复(behavior rehearsal)组成。根据各种因变量度(dependent measures),有利于受治疗青年的差异表现为,在两周追踪期间匹配熟悉图测验中出现的错误减少,在两个月以后接到的违规传票也减少。在工作人员或同伴对冲动性的评定中,或者在抽象推理、问题解决、控制点的测量中,都没有发现什么效果。后来,有一些新的暗示性证据表明,自我指导性训练能够提高反社会者自我控制的一般策略。

作为控制情感反应手段的自我陈述矫正,也是紧张移置训练(stress inoculation training)的关键,这种自我陈述矫正利用了对消极思想的自我监控、对积极陈述的复述以及对发展应付技能的应付活动的自我强化。这种方法已经在对愤怒的管理中得到应用,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讨论。

三、认知重建

自我指导性训练具有合理情绪疗法(RET)和贝克的认知疗法(CT)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假定,适应不良的情感和行为常常是功能失调的思维模式的结果,并且试图通过指导、争论和指定作业,用更具有适应性的思维来取代它们。可是,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理论上和程序上的差异。合理情绪疗法是最具有说教性的。研究者假定,某种核心的不合理信念产生不现实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未满足时,就产生消极的情绪状态。认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首先通过质疑、挑战和争论找出这些不合理信念,然后,通过对质和指定家庭作业,根据需要确定所缺少的成分,重新确定是否过度类化(overgeneralization)、从而对这些不合理信念提出质疑,最后获得成功。

合理情绪疗法已经用于表现出冲动控制问题的犯罪人。冲动控制问题是不合理信念的结果,而不合理信念则将缺乏(wants)与需要(needs)等同起来,将挫败看作是无法容忍的。因此,治疗活动试图用更有区别性的、合理的认知来取代那些不合理信念。沃特金(J. T. Watkins, 1977)描述了将合理情绪疗法应用于一组有冲动控制问题的个人的情况,这些人包括冲动性购买者(impulsive buyer)、恋童癖者、盗车犯、打淫移电话者以及窥淫癖者,可是没有报告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索罗曼(G. S. Solomon)和雷(J. B. Ray)(1984)用同样的术语描述了商店行窃,表明与商店行窃有关的特定的不合理信念在94名商店行窃者中是共同的(例如,“大家都这样做”;“商人该偷”)。这些信念在合理情绪疗法小组中受到挑战,在一年追踪期间,这个样本中只有一人重新犯罪。

由于没有注意积极技能的发展,也因为缺乏清楚的结果资料,合理情绪疗法已经受到批评。贝克的认知疗法在一些方面与合理情绪疗法不同,这种疗法更加个别化,并且强调对功能障碍思维的个人发现(personal discovery)。它依靠较少对抗性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涉及假设检验、远离中心(decentring, 减少个性化)、拉开距离(distancing, 客观性思维),

重新归因以及使用作为“个人实验”(personal experiments)的行为任务。尽管贝克(A. T. Beck, 1976)详尽阐述了其方法对愤怒的应用,但是,大多数人的注意集中在抑郁和焦虑的应用上。到目前为止,用于犯罪人的唯一报告似乎对性犯罪人的认知歪曲提出挑战。可是,贝克(A. T. Beck)和弗里曼(A. Freeman)(1990)已经把认知疗法程序扩展至人格障碍(参见第十四章)。

另外一个有关的方法是约奇逊(S. Yochelson)和萨米诺(S. Samenow)(1976)所创立的方法,他们创立了改变“犯罪人格”(the criminal personality)的思维过程的程序。他们的方法是深入细致的,涉及监禁期间日常的个别治疗和随后的小组上课讨论,并且在释放后至少要坚持一年。犯罪人在每天的日记中监控他的思维,这是治疗期间进行对质的基础,在此期间,考察他们思维中的歪曲和错误,并且指出选择性模式。其目的不但要发展自我理解,而且也要发展自我厌恶(self-disgust),罗斯(R. R. Ross)和法比亚诺(E. A. Fabiano)认为(1985),这种目标对一种教育过程而言是不恰当的。约奇逊(S. Yochelson)和萨米诺(S. Samenow)报告,用这种方法治疗的30个犯罪人中有13人在完成治疗后,变得负责任了,但是,目前仅有有限的资料支持这一点。不过,一些对年轻犯罪人的矫正计划似乎已经采纳了这种方法。

四、人际问题解决训练

问题解决训练(problem-solving training)已经被吸收进一些针对非个人性问题的自我调节训练方法中,但是,期望将这些方法纳入人际问题,还没有坚实的基础。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interpersonal cognitive problem-solving training, ICPS)利用了技能训练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指导、模仿、讨论以及对教导解决社会问题的认知成分的反馈,其目的是发展可以概括的技能。已有人报告了这种训练的几种变式,可是,最好的方法是由斯皮瓦克(G. Spivack, 1976)及其同事设计的程序。这些程序首先训练必备技能(prerequisite skills),例如模仿、小组讨论以及“有声思维”(thinking aloud)。问题解决训练适当集中于下列问题:(1)问题识别(problem recognition);(2)选择性思维;(3)手段-目的思维;(4)观点采择;(5)因果性思维;(6)考虑结果。

已经有人报告了一些对成年精神病人使用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方法的成功例子,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应用限于儿童。斯皮瓦克(G. Spivack)等人的研究表明(1976),他们的认知训练能够预防学前儿童的控制不良行为,可是,一些重复研究没有发现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会影响后来的适应。不过,卡兹丁(A. E. Kazdin)等人的治疗研究认为(1987),这种方法是有效效的。他们考察了对严重反社会的住院治疗儿童进行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的效果,并与非指导性关系疗法(nondirective relationship therapy)和治疗接触控制(treatment contact control)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在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之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儿童的攻击行为和外显行为大量减少,并且增强了社会适应;可是,在非指导性关系治疗组或控制条件组,却没有这样的变化。这些差异在追踪一年期间仍然保持。在使用评定量表测验的结果中,大多数已改进的儿童仍然保留正常限制以外的行为,这表明需要提高治疗力度。

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对犯罪人的使用情况报道得不多。海恩斯(A. A. Hains)和海恩斯(A. H. Hains)(1987)训练了5个矫正机构内的少年犯罪人,这5个人都被诊断

为品行障碍少年犯罪人,用指导、模仿以及重复方法,训练他们在解决假设的社会困境方面的认知策略。所有人在训练任务中都有提高,其中有3个青少年把这种方式泛化到未训练的困境中去,并且在追踪的3周期间保持了下来。这些人也改善了个人问题解决技能,训练已经发生泛化。训练对于另外2个青少年几乎没有效果,不过,无控制的观察表明,所有青少年对矫正机构的行为矫正计划都有更积极的反应。没有人考察这种训练的长期效果。普拉特(J. J. Platt)和普劳特(M. E. Prout)已经证明(1987),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也有助于矫正机构内的海洛因成瘾者学会和保持问题解决技能。尽管他们报告,受训者减少了随后的犯罪行为,但是,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综合性矫正计划中的组成部分。

问题解决训练似乎是一种有前途的干预措施,因为这些技能与认知成熟有联系,并且也与其他和反社会行为相联系的因素有关,如儿童养育实践。不过,它们在预防或减少少年犯罪方面的功效还有待证实。除了一些与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的使用有关的理论和程序问题以外,犯罪人中人际问题解决技能缺陷的程度仍然是未知的(参见第八章)。不过,人际认知问题解决训练可能特别与对攻击性犯罪人的干预有关(参见第十四章)。

五、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

正如第八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认知发展的自我中心水平与移情、道德推理中的缺陷有关系,有一些启发性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是很多少年犯罪人的特征。由于概念化和测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移情技能(empathic skills)训练受到的关注有限,但是,已有研究者尝试改善少年犯罪人中的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和道德发展。

钱德勒(M. Chandler, 1973)在其研究中已经证明,慢性年幼少年犯罪人(chronic young delinquent)有更严重的自我中心倾向,之后,他让少年犯罪人参加电视片的制作,所有的参加者都扮演剧中的角色,以此来训练少年犯罪人的角色采择。角色采择组的少年犯罪人随后表现出的自我中心倾向明显降低;而安慰对照组(只是制作电视片)和无训练的对照组则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18个月追踪期间,实验组的犯罪率与先前的犯罪记录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而两个对照组的犯罪率几乎没有变化。显然在行为训练计划中角色扮演方法普遍使用,但是在这个方面的使用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报道。

人们认为,角色采择技能(role-taking skills)是道德推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角色采择技能源自通过对新资料的适应作用和同化作用体验到的认知不协调。前习俗水平被认为是大多数少年犯罪人的特征,因此,从前习俗水平的加速发展,就要求少年犯罪人进行道德辩论,进行习俗水平的推理。詹宁斯(W. S. Jennings)、基尔肯尼(R. Kilkenny)和柯尔伯格(L. Kohlberg)发现(1983),认知发展的最佳条件是道德讨论(moral discussion),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公平的,角色采择的机会、阶段邻近推理(stage-adjacent reasoning)以及相互决策等问题。

这样的条件很可能在有适当组织性的环境中遇到,这是某些监狱以及教育环境采用的“公平社区模式”(Just Community model)的基础。这个模式规定一种民主的生活环境,这种民主生活环境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刺激社会公平观念的道德反应气氛,这与治疗社区有某些相似之处。工作人员—罪犯之间的不平等被降到最低水平,他们共同做决定;社会环境的道德方面,可以在定期举行的小组会议期间进行考察。虽然结果资料有限,可是,沙弗(P. Scharf)和希基(J. Hickey)(1976)对一个女子监狱中公平社区计划的效果进行了

评价。在“柯尔伯格道德判断谈话”中,犯人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平均进步了1/3阶段,这些犯人不同于没有参与矫正计划的犯人,也不同于仅仅进行道德讨论的男性犯人。最初2年追踪资料也表明累犯率为15%,而监狱中其他人的累犯率是35%。

由于公平社区计划依赖前习俗和习俗阶段罪犯的适当混合,也由于这种计划的民主哲学与监狱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相冲突,因此,这种公平社区计划已经失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监狱内,由维多利亚大学创立了一种不太激进的矫正计划,在这种矫正计划中,道德推理的发展贯穿在教育课程中。这个多方面的矫正计划集中在通过苏格拉底式争论、道德发展和问题解决,实现认知重建,并且与人文学科方面的学位课程结合起来。不过,结果资料是含混的。早期的评价表明,自愿加入这个矫正计划的慢性犯罪人在3年中的累犯率是15%,可随后的研究表明这个矫正计划没有优点。不过,实施矫正计划的条件在所考察的监狱之间有区别。

更常见的方式是依靠对假设道德困境的指导性集体讨论(guided group discussion)。戈登(D. A. Gordon)和阿巴思诺特(J. Arbutnot)的研究表明(1987),一周一次、每次45分钟、总共10~20次的集体讨论,通常会使1/4~1/2的参加者向上移动1/4~1/2阶段。矫正机构中的道德讨论组可能受到占优势出气氛的限制,这种气氛可能反映前习俗水平的思维,这种矫正计划已经产生了不确定的效果。例如,希基(J. E. Hickey, 1972)的研究发现,某个监狱中实施的包括36次集体讨论的矫正计划,使大约一半的参加者的道德推理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科普兰(T. F. Copeland)和帕里什(T. S. Parish)(1979)在一个军队监狱中进行的研究发现,没有对道德推理产生影响。不过,吉布斯(J. C. Gibbs)等人(1984)描述了对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的一次成功干预。在总共8次、每次40分钟的困境讨论集会之后,处于道德推理第二阶段的少年犯罪人的88%移至第三阶段,而没有治疗的对照组只有14%产生这种变化。道德讨论小组是否显著地影响累犯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证实,但是,阿巴思诺特(J. Arbutnot)和戈登(D. A. Gordon)发现(1986),与没有治疗的对照组相比,实验者通过16到20次、每周一次集中在观点采择、问题解决和聆听技能的道德讨论集会,明显改进了高危险青少年的行为。虽然在老师评定或旷课方面没有差异,但是,小组参加者的道德成熟增加了几乎1/2阶段,显示出纪律处分(disciplinary referrals)和训练拖延(disciplinary tardiness)方面的下降,提高了学校成绩,减少了与警察和法院的接触。这些改善在一年后继续保持。

阿巴思诺特(J. Arbutnot)和戈登(D. A. Gordon)(1986)提出,需要关注注意—安慰对照组,需要进一步调查非道德认知技能训练及其结果在强化道德发展训练方面的可靠性,因为道德发展训练是提高反犯罪决策(anticriminal decision making)的一种潜在手段。他们也已经证实,如果提供一定的条件,例如,训练人员的参与、继续监督、组织性支持,准专业人员也可以进行道德训练计划。不过,不是所有的少年犯罪人在道德发展方面都是有缺陷的,某些人可能缺乏对训练作出反应的必备条件,例如,角色采择技能和某种程度的形式运算思维。因此,道德推理训练作为包括其他认知和社会技能训练的多方式矫正计划的组成部分,可能是十分有效的。

六、认知行为干预概述

认知—行为方法在实践者中的普及,部分地依赖其理论上和哲学上的吸引力。认知行

为方法一直扎根于实证行为科学之中,它们不但表明摆脱了行为主义的单向决定论和被动的身体约束(passive organism stricture),而且也表示与心理学中非实证主义的智力传统重建了友好关系。可是,研究结果也为犯罪人矫正中应用这些程序提供了实证的正当理由。因此,对犯罪人的认知—行为干预显然应当保持。

然而,认知—行为方法的使用,提出了在早期的行为干预中出现过的类似问题。例如,这种技术与治疗对象的特征、情境以及转化力量(change agent)的相互作用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认知缺陷与犯罪行为的功能关系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特定目标的选择依靠含糊的假设,例如,人际问题解决、道德推理以及矫正将会有一种泛化的反犯罪效果(anticriminal effect)。特定技术的作用也仍然是有问题的。认知—行为干预通常结合了各种技术,例如模仿、角色扮演、重述以及言语指导。尽管人们假定,行为程序是改变认知过程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尝试决定哪一些行为程序是必要的和充分的程序。例如,肯德尔(P. C. Kendall, 1984)报告,在自我控制训练中,联合的认知行为方法优于单独的行为训练。可是,霍林(C. R. Hollin)等人发现(1986),在社会技能训练中加入自我指导性训练(SIT)并没有使结果产生明显的差异,另外,萨拉森(I. G. Sarason, 1978)发现,对社会问题情境的模仿和角色扮演在减少累犯方面的效果,类似于对同样的社会问题情境仅仅使用讨论的效果。

由于这些特定目标和技术之间的关联不确定,以及犯罪性与多种功能障碍有关系,因此,一种解决方法是使用多种治疗方式直接对多种目标进行干预。戈尔茨坦(A. P. Goldstein)等人提出(1989),干预应当集中于社区适应所必需的人际技能、认知技能以及感情技能。其**攻击替代训练**(aggression replacement training, ATP)包括3方面的内容(1)结构性学习训练,其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技能;(2)愤怒控制训练;(3)道德推理训练。训练包括高达30次的小组训练活动,具体内容有模仿、角色扮演、反馈以及讨论。在对矫正机构内少年犯罪人进行的初步的控制性结果研究中,攻击替代训练在矫正计划实施过程中增加了技能,减少了冲动性;在4个月的追踪期间,产生了较好的社区适应。后来在纽约的社区中进行的一项应用研究,比较了攻击替代训练与被释放的青年,也比較了青年与其家庭和一个未加治疗的对照组。在实施这项计划6个月时,进行攻击替代训练的两组人的逮捕率都是15%,而对照组的逮捕率是43%。不过,当在分析中排除了受到监督的青年时,结果就达不到显著的程度。作者提出,要通过攻击替代训练全面提高基本能力,就必须使攻击替代训练包括其他技能,如应激管理和移情训练。

在加拿大,罗斯(R. R. Ross)、法比亚诺(E. A. Fabiano)和埃伍尔斯(C. D. Ewles)根据他们对矫正计划中思维训练的重要性的早期证明,提出了多方式推理和矫正计划(The multimodal Reasoning and Rehabilitation Project, 1988)。该计划结合了一些社会认知技能训练技术,以便训练犯罪人在行动之前停下来思考,考虑其行为的后果,尤其是对其他人的影响,认识对人际关系问题做出反应的选择性方式。训练缓刑官掌握一些有关的技术(结构性学习治疗,侧向思维³,批判性思维,价值观教育,自信心确立训练,协商技能训练,人际关系问题解决,社会观点训练,角色扮演以及模仿),在一项长达80小时并要求进行练习的深入的矫正计划中,缓刑官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由4~6个成年缓刑犯组成的小组

3. 侧向思维是指从多角度、多侧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校注

中。在实施这个矫正计划9个月以后,被随机分派到正常期缓刑对照组,注意控制生活技能培训组和认知程序组的高危险缓刑犯,其重新定罪率分别是70%、48%和18%,研究结果证明这个认知程序有显著的效果。

另外一个多方式矫正计划是家庭-生态学系统方法(family-ecological systems approach),这种方法考虑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人认知和个人功能障碍对少年犯罪的多维的、双向的影响。治疗利用社会学习和家庭治疗技术,并使治疗适应个人需要。在“孟非斯-大都市男青年转向计划”(the Memphis-Metro Youth Diversion Project)中利用这种方法矫正慢性少年犯罪人,对这项计划的评价已经证明,与普通的个别咨询相比较,这种方法不但减少了儿童的行为问题,改善了同伴和家庭关系,而且降低了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和逮捕率(17%对40%)。

或许,多方面的治疗是临床实践的一种理想,因为犯罪人是异质的。可是,卡兹丁(A. E. Kazdin, 1987)警告,有广泛基础的治疗通常是一些因其直觉吸引力和表面效度而被偶然选择和结合起来的,多方式矫正计划比单一成分的干预产生更强有力影响的程度还有待证实。除非识别出转化所必需的成分,否则,这些方法就有可能被指责为是笼统的经验主义(shotgun empiricism)。

第十四章 危险犯罪人的治疗

第一节 引言

实施了严重人身犯罪的犯罪人，有可能表现出多种心理功能障碍。本章集中论述性变态、暴力行为和人格障碍这3个相互重叠的领域中的心理学干预。尽管只有少数被认为危险的犯罪人在特别单元进行治疗，一些犯罪人可能在刑罚系统接受精神卫生服务，但是，对危险犯罪人的心理学治疗大多数是在司法精神病学机构内进行的。因此，首先探讨对精神障碍犯罪人提供服务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第二节 司法精神病人口的治疗问题

精神障碍犯罪人是一个异质的群体，他们的构成取决于法律规定，而不仅仅取决于精神病学诊断（见第十章）。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州，精神障碍犯罪人包括“性精神病态者”（sexual psychopath），但是在英国，人们并不认为性犯罪本身就是精神卫生法所说的精神障碍。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精神卫生法，精神病态障碍（psychopathic disorder）属于精神障碍，但是在苏格兰，却没有相似的法律规定。这些差别反映了人们对哪些犯罪人应当受到精神病学关注的问题的长期争论，并非所有的危险犯罪人都是精神障碍者。反过来，并非所有的精神障碍犯罪人都是危险的，许多精神障碍犯罪人在社区中接受治疗。例如，库克（D. Cooke, 1991b）描述了对少数有抑郁、焦虑、酗酒问题的犯罪人的门诊治疗，这些犯罪人是根据苏格兰法庭的转向计划而转来就诊的。不过，主要的问题是对那些收容在司法精神病学医院（forensic psychiatric hospital）的犯罪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产生的。

将精神障碍犯罪人从刑罚系统转移出去的正当理由是存在着精神障碍，临床医师在道德上有义务治疗烦恼（distress）或无能（disability），而不管这种烦恼或无能是否是由犯罪引起的。对这部分犯罪人的临床服务与对精神卫生系统中普通病人的临床服务是相互重叠的。尽管药物治疗往往是治疗急性精神障碍（acute psychotic disorder）的最佳方法，但是，对于像抑郁或者焦虑这样的情绪问题来讲，心理学干预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方案，心理学干预在康复中是很重要的。例如，精神疾病犯罪人（mentally ill offender）或心理缺陷犯罪人（mentally handicapped offender）表现出在长期住院病人（long-stay patient）中常见的动机缺陷和社会缺陷，他们经常表现出社会不接受的行为，这种表现阻止他们回到较少受限制的环境中。因此，康复目标是提供必需的应付技能和人际技能，使他们能够在最适合自己的环境中得以生存，而不管这种环境是开放式医院（open hospital）、旅馆，还是他们自己的家。

然而，保安精神病学机构（secure psychiatric institution）中服务的质量，已经受到

人们的多次批评。正如昆塞 (V. L. Quinsey, 1988) 注意到的, 长期存在的显著问题是缺乏治疗计划、治疗计划得不到很好地执行、不鉴定执行治疗计划的状况、缺乏精细的概念、描述不完整。人们已经对被释放的精神障碍犯罪人进行了几项追踪研究, 这些研究显示, 大约一半的人重新犯罪, 而大约 20% 的人实施了更加严重的暴力犯罪。不过, 这些研究主要论述了预测危险性的问题, 几乎没有关注治疗计划与结果的关系问题。

治疗效果对于预测精神障碍者的危险性来说是很关键的, 确定是否具有可治疗性 (treatability) 是实践工作的核心。在英国, 对犯罪人发出入院令并不要求查明精神疾病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¹, 但是, 入院令是针对精神病态障碍和精神损害 (mental impairment) 的: 自 1983 年以来, 因这些类型的精神障碍而对犯罪人发出的入院令, 把可治疗性作为其正当理由。不过, 现有的证据显示, 对可治疗性的临床一致看法甚至少于对危险性的一致看法。有两个问题对可治疗性决定的准确性影响很大。第一, 治疗目标和结果标准的不确定性。尽管一些临床医师强调烦恼或者疾病的缓解, 但是, 刑事司法系统在释放决定方面的卷入, 反映了这样的期望, 即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治疗也可以降低未来犯罪的可能性。这两个目标并不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 对精神障碍 (psychotic disorder) 的神经阻断剂药物治疗在司法精神病领域中很盛行, 但是, 精神病犯罪人 (psychotic offender) 反社会行为的原因往往与没有精神病的犯罪人是相同的。海布伦 (K. S. Heilbrun) 等人提出 (1988), 需要分别讨论“心理改善” (psychological improvement) 的临床目标和犯罪目标 (criminal target)。罗伯逊 (G. Robertson, 1989) 则反对把累犯作为一种结果标准, 认为住院治疗仅仅对一小部分重新犯罪有效果, 不过, 这种观点过早地对结果效果的经验性问题做出了判断, 它似乎依赖于一种医学的治疗概念, 这种概念把症状消除作为结果标准, 而没有考虑心理学的干预概念, 心理学的干预概念以提供避免重新犯罪的技能为目标。

第二, 可治疗性决定与危险性评价相类似, 两者都模糊了评价 (assessment) 与预测 (prediction) 的区别。在评价可治疗性时, 需要区别对治疗结果的预测和对适合治疗性 (amenability to treatment) 的评价, 适合治疗性是一系列个人和情境特征的综合体现。对治疗结果的预测需要有关治疗效果的经验性数据, 而对适合治疗性的评价则需要一种可靠的量度, 这种量度应当考虑 4 个方面: (1) 治疗目标和治疗对象缺陷之间的一定适合性; (2) 治疗对象过去对治疗做出反应的历史; (3) 动机; (4) 禁忌症 (contraindication)。必须考虑治疗和环境资源的可得性。海布伦 (K. S. Heilbrun) 等人 (1988) 描述了建立这样一种量度的初步尝试, 不过, 这种量度的基础是可以获得的信息的质量。

对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心理学干预, 原则上不同于对一般犯罪人的心理学干预。降低累犯是一种必须的、但不是充分的结果标准, 最重要的是识别反社会行为的中介因素, 把反社会行为的中介因素作为治疗目标, 并且采取可以影响这些中介因素的治疗措施。不过, 治疗往往受到组织方面的和官僚机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例如, 在最高警戒度保安医院中, 充满了治疗和监管之间的冲突, 以致使一些人提出, 这样的医院从根本上讲具有抗治疗性。

1. 入院令 (hospital order) 是指由法庭发布的将犯罪人收容于特定医院的指令。——译注

第三节 对性犯罪人的治疗

许多性犯罪人不是否认他们的犯罪，就是把他们的性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性问题，不愿意接受治疗。因此，对他们的治疗存在许多实践问题和伦理问题。格罗思（A. N. Groth, 1983）指出，在矫正机构环境中，把各种优惠权利作为诱因是很有必要的。相反，劳斯（D. R. Laws）和奥斯本（S. G. Osborn）（1983）、珀金斯（D. E. Perkins, 1987）相信，知情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必要的。然而，珀金斯注意到，随着某种矫正计划的发展，治疗人员和犯罪人会受到来自法庭和其他机构的压力。不过，一位调查人员报告说，在门诊治疗中，法庭安排的治疗对象和自愿就诊的治疗对象在结果量度和顺从量度上都没有差别。但是，严重的摩擦是很常见的，即使在自愿就诊者中间也是如此，1/3 或者更多的治疗对象在治疗结束之前就失去联系了。进一步的问题是，封闭性的、全部为男性的矫正机构并不是发展异性间社会技能（heterosocial skills）和无性别歧视态度（nonsexist attitudes）的最佳环境；以矫正机构为基础的矫正计划，必须能够接触社区机构，以便提供后续支持和作为替代性基地（alternative base）。

尽管性精神病态者法不复存在，但是在北美，现在还有 300 多项性犯罪人矫正计划，英国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监狱心理学家也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个领域。由于性犯罪具有多维度性质（参见第十一章），治疗目标也很广泛，因此，许多矫正计划将一种以上的矫正方法加以结合。在通常情况下，治疗是指导性的，要求犯罪人承担对犯罪行为的责任，担负起转变的责任。同时，由于矫正计划具有多学科性、多机构性²，通常难以保证绝对的机密性。由于一些心理学家是为被害人和家庭工作的，这里的焦点就对准了犯罪人。

一、评价

一般而言，性犯罪人既有性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对性犯罪人进行社会、认知、感情、生理方面功能的综合评价。最初的谈话需要分析犯罪之前、犯罪期间、犯罪之后的事件，例如，心境的作用，是否进行了筹划，是否饮用酒精，攻击行为的性质，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感情，犯罪人对自己行为的感情。谈话也应当涉及性发育和社会发展，包括早年的家庭关系，越轨性活动和非越轨性活动的频率，性幻想的频率，犯罪人与性伴侣的性行为情况。也应当调查对越轨行为起作用的生活方式因素，例如，人际关系模式，娱乐活动，麻醉品使用等。大多数临床医生赞同谨慎地认可犯罪人对其越轨行为的解释，也主张谨慎地对待从其他方面得来的信息，例如，家庭成员、被害人、法庭纪录。应当进行更加客观地进行评价，以便提供适当的功能分析，识别有关的治疗目标。

行为治疗者认为，有必要对性唤醒模式（sexual arousal pattern）进行评价。尽管并非所有的性犯罪人都有性越轨偏好，但是，阴茎体积描记器（penile plethymography, PPG）仍然是鉴别这些性偏好的最可靠的手段。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建议（1990b），阴茎体积描记器对引起 20% 以上充分勃起的越轨刺激有反应，这表明存在着一种唤醒降低的需要；而对不到 30% 的适宜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则把唤醒增强

2. 多机构性（mutiagency）是指矫正计划由多个机构实施的情况。 -译注

作为一种矫正目标。现在,人们已经发展了几项自我报告式性越轨测量工具,例如,克拉克性历史问卷(the Clarke Sex History Questionnaire)。这个问卷可以评价很多种性异常的频率。索尔特(A. C. Salter)和马利茨基(B. M. Maletzky)详细论述了其他口头测量方法(1991),例如,分卡测验(card sorts)。豪厄尔斯(K. Howells, 1979, 1981)赞同对越轨兴趣的主观意义进行评价,并使用行为项目网(the Repertory Grid)技术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人们已经证实,像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这样的人格测验在区分不同类型的性越轨者、区分性犯罪人和其他犯罪人方面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正如霍尔(G. C. N. Hall, 1990)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些人格测验并不是为此目的编制的。这些人格测验的目的是识别像社会化、敌意、移情、自尊、社会焦虑这样的倾向因素,这些因素与受害行为有关系。

社会能力缺陷很有可能既涉及外部社会技能(overt social skill)方面的缺陷,也涉及社会问题解决、愤怒控制、人际关系技能和生活管理技能(life management skill)方面的缺陷。尽管在谈话时能够获得一些信息,但是,这些缺陷更有可能通过自我评定和标准化的自我报告式测验识别出来,也可以通过在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期间的自我监控和角色扮演识别出来。由于在性犯罪中歪曲的信念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评价这些信念。人们已经发展了几种量表,用来评价对强奸神话(rape myths)的认可程度或者有关儿童与成人性行为的认知歪曲(cognitive distortion)。人们越来越重视把认知过程作为转变的目标,这也需要对性犯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评定、归因、自我功效(self-efficacy)信念进行评价。

二、躯体治疗

躯体治疗(organic treatment)包括神经外科手术(neurosurgery)、外科阉割(surgical castration)和抗雄激素药物治疗(antiandrogen medication)。这些治疗方法的使用,是以这样的还原论见解为基础的,即性越轨行为是性“驱力”的一种功能。弗洛伊德(K. Freud, 1980)认为,性越轨行为是性行为的内部动机或者性激素引起的意象的一种功能。因此,治疗的兴趣集中在降低循环型睾酮(circulating testosterone)的水平方面。不过,尽管睾酮影响性唤醒性(sexual arousability)和性活动,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这种睾酮与越轨性唤醒有关。

一些研究中报告,人们已经试图使用外科手术破坏下丘脑核(hypothalamic nuclei)来控制性驱力。但是,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实这种方法在临床上使用是正当的。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对经过选择的一些性犯罪人使用合法的阉割;海姆(N. Heim)和赫什(C. J. Hirsch)评价了4项大规模的追踪研究,表明累犯率在1%~7%之间。不过,他们认为,这些追踪研究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们的抽样是有偏见的,也缺乏适当的控制。他们也注意到,阉割对性犯罪行为的效果是不同的,从而认为阉割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思想观念为基础的刑罚,这种方法缺乏科学基础。弗洛伊德(K. Freud, 1980)和布雷德福(J. M. V. Bradford, 1985)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观点,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现行的道德反对把阉割当作“治疗”。

睾酮水平的可逆变化可以通过控制合成抗雄激素——醋酸氯羟甲烯孕酮(cyproterone

acetate, CPA, 即醋酸色普龙[Androcur])和激素——醋酸甲羟孕酮(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MPA, 即安宫黄体酮[Provera])来实现。醋酸色普龙(CPA)已经在欧洲和加拿大使用,安宫黄体酮(MPA)已经在美国使用。这些药物有不同的作用模式,但是人们报告说,这种药物都有降低勃起反应、减少性幻想和性行为频率的作用。不过,有关这些药物对性犯罪的效果的研究,主要限于个案研究,缺乏对照组和追踪研究。只要治疗对象服用安宫黄体酮,它就可以减弱性行为。但是,布雷德福(1985)指出,醋酸色普龙(CPA)有较长期的药效,可能影响越轨唤醒。其他人不太相信这些药物的效果,但是,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当把这些药物与发展亲社会性行为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时,这些药物往往是有作用的。

三、心理治疗

经典的个别精神分析方法很少使用于被逮捕的性犯罪人,目前的心理动力学方法更有可能在小组环境中关注“有沉重历史的现在”(history-laden present)。考克斯(M. Cox, 1980)在一家特别医院中发现,性犯罪人的这种问题以对信任关系的原始性防卫(primitive defence)的形式表现出来,治疗的目标是通过暴露早年的创伤性关系引起的焦虑,增强自尊,减弱防卫。群体动力学可以促进这种暴露。不过,目标应当是增强自知力,帮助治疗对象忍耐早年创伤的“未了事务”(unfinished business)。考克斯承认,这种方法不可能阻止治疗对象的犯罪行为。

格罗思(A. N. Groth, 1983)描述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所最高警戒度监狱中实施的一项更广泛的集体矫正计划。其基本前提仍然是:性犯罪人是个人经历了早年虐待(early maltreatment)的结果,自尊、信任和攻击控制方面的缺陷是关键问题。这项矫正计划的目标是,让犯罪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承担起对自己行为的责任,重新评价自己对性和攻击的态度,认识到性犯罪行为是一种自己必须加以控制的强迫行为(compulsive act)。治疗小组既是一种相互帮助的组织形式,也是一种自我帮助的组织形式,这项计划处理下列3个领域中的9个问题:(1)再教育(re-education)。通过再教育进行性教育,理解性犯罪行为及其对被害人的效果。(2)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将再社会化的目标集中于人际关系、攻击控制和父母技能方面。(3)咨询。咨询小组让治疗对象了解犯罪的警告性征兆(warning signs)、对被害人的个人体验、与性犯罪作斗争的方式。

格罗思对该计划实施的第一个4年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评价。在那些参与该计划并且后来被释放的人员中,19%的人又实施了新的犯罪,其中8%的人实施的新罪是性犯罪;而没有参加这个计划的性犯罪人的这两个百分比分别是36%和16%。尽管这两组犯罪人之间的可比性并不清楚,不过,数据似乎证明了这个计划的成本效率(cost effectiveness)。

四、认知行为治疗

尽管心理动力学观点把性犯罪看成是内部精神问题(intrapsychic problem)的一种症状,但是,早期对性越轨行为的行为治疗却把重点放在改变性偏好和增强异性社会技能方面。虽然一些人继续赞同这样的治疗目标,不过,现在的许多行为矫正计划却把认知方法和目标结合进来,这些矫正计划与心理治疗人员的矫正计划是重叠的。一般目的就是促进自我控制,把性行为、社会能力和认知歪曲作为治疗目标。

在许多矫正计划中,仍然把改变越轨性偏好(deviant sexual preference)作为一种重

要的目标。所使用的**减弱越轨唤醒** (reducing deviant arousal) 技术, 主要是厌恶程序。早期的厌恶疗法使用短暂电击刺激肢体或者使用诱发恶心药物 (nausea-inducing chemicals), 这类厌恶疗法采取经典条件反射模式, 厌恶性刺激 (无条件刺激) 并不同时伴随引起越轨唤醒 (条件刺激) 的越轨幻想或视觉刺激 (条件刺激)。在其他情况下, 当伴随着越轨反应 (勃起) 而呈现厌恶性刺激时, 就会采取操作性 (惩罚) 范式。电厌恶刺激 (electric aversion) 在抑制对恋童癖刺激和强制性性刺激的越轨唤醒方面, 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是, 现在产生了伦理问题。反对的理由似乎是美学方面的, 因为不舒适或苦恼的体验是许多心理治疗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 近年来, 电厌恶刺激的使用已经减少。更流行的是内隐致敏法 (covert sensitization)。在使用这种方法时, 治疗对象想象越轨行为的后果, 这些越轨行为最终会导致身体痛苦或者心理痛苦。这就是内隐惩罚程序的原理。也可以让治疗对象想象控制越轨欲望会带来的奖赏性后果, 这就是内隐强化法 (covert reinforcement)。想象的材料可以通过录音磁带呈现, 也可以由治疗对象自己控制。海斯 (S. C. Hayes)、布朗乃尔 (K. D. Brownell) 和巴洛 (D. H. Barlow) 描述了对一个有露阴癖和虐待狂幻想的犯罪人成功应用自我控制的例子。在“辅助性” (assisted) 内隐致敏法中, 将越轨意象唤醒 (可以通过阴茎体积描记器进行监控) 与想象的厌恶事件和某种厌恶气味, 例如, 戊酸气体 (valeric acid gas) 或腐烂组织联系起来。马利茨基 (B. M. Maletzky, 1980) 对 38 名同性恋童癖者和 62 名露阴癖者使用了这种程序, 让这些人每星期参加一次治疗活动, 在活动期间想象 3 种越轨情景, 治疗活动长达 24 星期; 然后, 在长达 3 年的时间中, 定期举办治疗活动。结果, 越轨幻想显著减少, 只有 8 名治疗对象有重犯行为。尽管内隐致敏法对许多性倒错都很有效, 对露阴癖尤其有效, 但是, 这种方法缺乏有力的理论根据, 并且依赖治疗对象进行生动想象的能力。劳斯 (D. R. Laws)、迈耶 (C. W. Meyer) 和霍尔门 (M. L. Holmen) 报告说 (1978), 他们利用更简单的程序对性施虐狂者进行了成功的治疗, 他们的治疗仅仅是将幻灯与嗅觉厌恶刺激联系起来。

在“羞耻” (shame) 厌恶疗法中, 治疗对象在观众面前进行越轨行为, 例如, 暴露自己, 同时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 用录像带纪录这种情境, 以便在后来观看。瑟伯 (M. Serber, 1971) 发现, 进行了这种治疗的 8 名性倒错者中, 有 5 人在 6 个月的追踪期间内没有发生越轨行为, 但是, 使用这种方法的报道较少。更普遍使用的方法是饱和法 (satiation)。在使用饱和法时, 治疗对象通过手淫达到高潮, 同时进行不越轨的幻想, 然后以便继续手淫同时讲述越轨幻想, 这种情境也可以记录下来。研究发现, 仅仅使用口头饱和法 (verbal satiation) 也是有效的。现在, 许多矫正计划在“厌烦的磁带” (boredom tapes) 标题下, 包括了饱和法。

增加非越轨唤醒 (increasing nondeviant arousal) 的最流行的方法, 是手淫或性高潮重建条件反射 (masturbatory or orgasmic reconditioning, ORC)。这种方法属于最早的行为疗法之一, 让治疗对象为了他偏爱的性幻想而进行手淫, 但是在即将达到性高潮时, 让他转而进行不越轨的幻想。以后, 逐渐将进行非越轨幻想的时间向手淫开始的时间前移。手淫或性高潮重建条件反射方法是以经典条件反射原理为基础的, 但是如果使用倒行条件反射 (backward conditioning) 的话, 则是无效的。康拉德 (S. R. Conrad) 和温策 (J. P. Wincze) 对 4 个自己诊断为同性恋者的人进行了阴茎体积描记器或行为测量, 未发现手淫

或性高潮重建条件反射方法会引起转变,不过,治疗对象报告说幻想和兴趣发生了变化。然而,人们已经报告说,如果每个星期将手淫时的幻想交替地从越轨幻想转向非越轨幻想的话,可以成功地减少恋童癖者的唤醒。研究也发现,仅仅与非越轨幻想有联系的手淫,足以使恋童癖者在观看成年女性幻灯片时产生的唤醒增加,与此同时会减少越轨唤醒。研究指出,这种变化的机制是认知性的,即由于认识到了唤醒来源方面的变化,治疗对象重新确定了他的性别认同(sex identity)。

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了两种进一步的方法——塑造(shaping)和消退(fading)。塑造使用操作条件反射原理,通过强化对幻灯片的勃起反应,逐步建立适宜唤醒。消退试图通过呈现非越轨刺激改变对越轨视觉刺激的唤醒;伴随着勃起的维持,使非越轨刺激“渐强”,使越轨刺激“渐弱”。人们似乎没有调查这些技术对性犯罪人的效果,不过,对勃起反应的生物反馈技术在使用中已经产生了中等程度的成功。

已经证实,这些消除或引起唤醒的实验室技术对多种异常都是有效的,但是,还没有充足的经验性研究可以使人们在这些技术之间进行选择。关于这些技术的使用,还有一些没有回答的问题。例如,人们假设,抑制越轨唤醒和增强非越轨唤醒在功能上是不同的,并不是两种简单的相反过程,但是,克雷姆斯道夫(R. B. Kremsdorf)、霍尔门(M. L. Holmen)和劳斯(D. R. Laws)发现(1980),仅仅增强非越轨唤醒就可以抑制越轨兴趣。认为越轨偏好可以预测重新犯罪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假设。不过,人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需要关注性行为的其他方面。人们已经使用系统脱敏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处理对异性交往的焦虑,有关性规范和性关系的教育可以破除性神秘和减少假装正经(prudishness)。尽管一些工作人员反对关注基本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克劳福特(D. A. Crawford)和豪厄尔斯(K. Howells)发现(1982),在一家特别医院中对年轻犯罪人提供的性教育短期课程,成功地降低了对性交的焦虑。

增强**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的尝试依赖于使用模仿、指导、角色扮演、反馈和重复这样一些技能训练方法。早期的矫正计划假定在谈话、约会和维护自信技能(assertive skills)方面存在缺陷,将重点放在姿势、眼睛接触、言语流畅这些微观技能方面。尽管这些技能是性犯罪人矫正计划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忽略了相互作用的认知成分,忽略了更微妙的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技能。非性功能失调(nonsexual dysfunction)也是性侵害行为的常见先兆,因此,许多矫正计划现在不仅关注异性间社会技能(heterosocial skills),而且关注社会问题解决、愤怒管理、被害人移情、闲暇技能和自尊。这些技能一般通过小组形式进行训练,强调通过模仿和重复进行经验学习。

因此,社会能力训练关注社会认知过程,许多矫正计划都把认知歪曲(cognitive distortion)作为治疗目标。认知歪曲包括有关性别角色、强奸神话(rape myth)、认为儿童—成人之间的性行为可以接受、极力缩小性侵害的危害结果方面的信念。针对这些信念的认知疗法,已经在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中得到应用。例如,墨非(W. D. Murphy, 1990)描述了矫正认知歪曲的一些认知重建程序,其做法是提供有关虐待后果的信息,包括被害人对质(victim confrontation)、对歪曲信念中包含的一些假设提出挑战、让犯罪人反驳这些信念的角色换位(role reversal)、检查“厌烦的磁带”中包含的口头幻想材料。

大多数行为主义取向的性犯罪人矫正计划,都将这些技术结合进去。弗里曼—朗格(R. E. Freeman-Longo)和沃尔(R. V. Wall)在美国俄勒冈州实施的一项住院矫正计划,这

项计划不仅包括了上述的大多数技术,而且包括了毒品和酒精教育、集体心理疗法和躯体治疗(organic treatment)。不过,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尝试“探讨”这些复杂的矫正计划,以便确定究竟哪些程序更为有效。

由于矫正计划不仅在内容方面有差别,而且在矫正对象的危险性程度、矫正计划实施的场所(矫正机构或者社区)、持续时间(从几个月到5年甚至更多时间)方面存在差别,人们也很难比较不同矫正计划的结果。由于随机分配到非治疗组的做法通常难以做到或者在伦理方面不合乎需要,因此,在识别适当的对照组方面也存在一些特别的问题。弗贝(L. Furby)、温罗特(M. R. Weinrott)和布莱克肖(L. Blackshaw)指出(1989),我们对目前的矫正计划在降低性犯罪人累犯行为方面的效果,知之甚少。不过,其他人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例如,马利茨基(B. M. Maletzky, 1991)报告了对5000名性犯罪人进行1~17年追踪研究的数据,这些性犯罪人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家性虐待诊所接受了门诊行为治疗。追踪研究发现,根据严格的临床标准和犯罪结果标准,有91%的总成功率。治疗异性恋童癖者和露阴癖者的失败率最低,分别是5%和7%;但是,治疗同性恋童癖者和强奸犯的失败率较高,分别为14%和25%。尽管未能获得未治疗组的数据,但是,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描述了他们进行的门诊矫正计划的结果数据(1990b),他们的数据表明,在接受治疗的犯罪人中,异性恋童癖者的累犯率为18%、同性恋童癖者的累犯率为13%、露阴癖者的累犯率为48%;而在未接受治疗的犯罪人中,异性恋童癖者的累犯率为43%、同性恋童癖者的累犯率为43%、露阴癖者的累犯率为67%。因此,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这些矫正计划对儿童性骚扰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对露阴癖者的治疗效果很不相同,对强奸犯的治疗效果似乎也不好,但是,缺乏对照组的比较。然而,正如珀金斯(D. E. Perkins, 1987)注意到的那样,对于刑事司法系统、潜在被害人和犯罪人自己而言,即使只有中等程度的预防累犯效果,也可能是很有益处的。

五、复发预防

许多人认为,越轨性行为与成瘾行为类似,并且采用了预防药瘾复发的方法来预防重新进行的性犯罪。这种观点认为,最初的转变和转变的维持受不同过程的制约。轻微过错(lapse,即与某种以前的习惯的再次出现有关的简单事件)是否导致复发(relapse,即回到以前的状态),取决于几种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根据马拉特(Marlatt)的认知行为模式,某种使个人缺乏应付反应(coping response)的高危险情境,会引起自我功效信念(self-efficacy belief)的减弱、轻微过错和违反禁欲效应(abstinence violation effect),违反禁欲效应是一种涉及有关自我控制的知觉发生变化的认知现象,这种现象会增加复发的可能性。因此,治疗计划应当致力于发展能够使个人避免复发或者预防他们向复发方向发展的自我管理技能。

皮瑟斯(W. D. Pithers, 1990)描述了一项对强奸犯和儿童性骚扰者使用的复发预防计划。像越轨幻想再次出现这样的轻微过错,有可能在接触高危险情境之后发生,这样的高危险情境包括强奸犯在愤怒时驾车乱逛,恋童癖者应邀照看小孩。违反禁欲效应可能会使人们把轻微过错归因于治疗失败,并且会预期复发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假如轻微过错是可以预期的,那么,可以把它看作是改善自我管理技能的一种机会。因此,这项计划的最初措施是消除那种认为会产生不可逆“治愈效果”的不现实期望,鼓励积极的问题解决活动。

在发展起被害人移情 (victim empathy) 之后, 就可以将复发预防引入治疗之中。治疗人员和治疗对象识别性越轨行为的先兆因素和促成因素、高危险情境、关于在这些情境中如何应付的自我功效信念。治疗活动首先集中于如何避免轻微过错。指导治疗对象通过自我监控认识复发先兆, 避免引起越轨行为的情境因素, 例如, 酒精、色情作品、特殊关系。教给治疗对象在面临高危险情境时如何发展应付技能或逃避技能的问题解决方法, 教给他们通过关注消极后果抵御越轨冲动的问题解决方法。然后, 发展如何避免把未曾预见的轻微过错变成复发的技术。通过认知重建, 可以把轻微过错解释为一种习得的失误或错误, 而不是把它解释为不可逆的自我控制丧失, 并且通过“提示卡” (reminder card) 促进这种解释。也可以通过签订合同详细说明轻微过错的范围和后果。这些程序构成内部自我管理。不过, 由于从居住式矫正计划释放的犯罪人并不总是报告轻微过错, 因此, 人们已经将外部监督机制结合进去; 按照这种机制, 治疗人员、缓刑官和治疗对象社会关系中的其他重要人员结合起来, 监控特殊的危险和轻微过错先兆。尽管复发预防程序处在早期发展阶段, 但是, 皮瑟斯 (W. D. Pithers, 1990) 报告说, 对 167 名犯罪人 (大部分是恋童癖者) 进行 5 年追踪的复发率是 5%。

第四节 对危险犯罪人的干预

临床医生对攻击性犯罪人的关注程度不如对性犯罪人的关注程度。尽管在“慢性”或“严重”少年犯罪人的档案中可能记录着攻击事件, 但是, 专门进行暴力行为的犯罪人是很少的, 很少有心理学家选择专门研究攻击性犯罪。除非识别出攻击性犯罪人有精神障碍或者其攻击行为干扰了矫正机构的生活, 人们不大可能认为攻击性犯罪人需要治疗, 因为男性攻击行为受到文化规范的支持。不过, 最近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和家庭中暴力行为的关注, 已经促使人们发展起专门的矫正计划。在这些矫正计划中, 心理学干预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 迄今为止缺乏对其功效的评价。

像性犯罪人一样, 攻击者很少有自愿接受治疗的, 攻击者表现同样的否认、谴责被害人、不承担责任之类的问题。不过, 首要的临床任务并不是处理过去的暴力行为, 而是处理犯罪人在未来发生类似行为的可能性。不管人们把习惯性攻击行为 (habitual aggression) 看成是一种反应倾向, 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人格特质, 习惯性攻击行为都是一种受其他个人特征制约的倾向 (disposition), 人们已经把习惯性攻击行为看成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因此, 仅仅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 很难维持长期的变化。

暴力性犯罪人也是异质的 (参见第九章), 因此, 应当有不同的治疗目标。例如, 那些把攻击行为作为工具的人所具有的问题, 与那些主要由于愤怒而进行攻击行为的人的问题, 就极不相同。对于前一种人而言, 治疗措施可以是为了操纵环境相依事件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或者从社会学习的观点来看, 是为了改变那些支持使用攻击行为的信念或结果期待 (outcome expectancy)。对于后一种人而言, 情绪控制 and 自我调整则是更适宜的目标。应当重申, 对于那些偶然实施了极端暴力行为的控制过度者的治疗目标, 不同于对那些在醉酒后经常打架的控制不足型犯罪人 (undercontrolled offender) 的治疗目标。到目前为止, 在治疗文献中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 这些概念差别强调需要进行个别化的评价, 就像对性犯罪人进行个别化的评价那样。

一、精神药理学治疗

尽管支持那种认为人类攻击行为有特殊生理基础的观点的证据不足,但是,影响心境、情绪唤醒或大脑中信息传递的药物,可能影响暴力行为的实施。然而,对于非医疗用途的药物的管制,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图平(J. P. Tupin, 1986)强调,对于医生来说,药物干预只有在暴力行为具有某种医学—精神病学根源时,才是正当的。因此,为了抑制暴力行为而使用药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精神病学领域中。不过,为了抑制暴力行为而对监狱犯人使用药物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在精神病院中,紧急情况下经常使用强安定剂和弱安定剂³,使用“必要时药物”(Pro re nata medication)是控制暴力事件的一种常用方法。其理由是为了让治疗对象平静下来。不过,只有在其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这种做法才是合理的。使用“药物性约束保护”会引起伦理问题,因为这类药物可能会为了惩罚性目的而使用,忽略了环境中的暴力原因,有时候会引起有害的副作用。在一些案例中,神经阻断剂(neuroleptics)和弱安定剂也会加剧而不是抑制暴力行为。

进行更长时间药物管制的原理是,药物可以改善或者控制作为暴力行为中介的疾病。图平(J. P. Tupin, 1986)注意到,在进行暴力行为的人中,往往会发现偏执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躁狂症、器质性脑综合征、精神病性抑郁症和爆发型人格障碍;这说明使用精神药物是合理的。尽管这种观点意味着治疗目标应当是精神病症状而不是攻击行为本身,但是,已经对没有表现出严重精神障碍的攻击者使用了这类药物。人们发现,像利太灵(methylphenidate)、右旋安非他明(dextramphetamine)这样的兴奋剂,可以减少多动症儿童、少年犯罪人以及反社会人格者的攻击行为;提倡对“控制不良”综合征使用抗抑郁药。人们也发现,最初用于治疗躁狂症的锂,可以减少攻击性罪犯的严重违反监规行为。不过,奥卡拉汉(M. A. J. O'Callaghan, 1988)注意到,证明药物可以控制暴力行为的证据的质量是较差的;尽管对精神病人的控制性研究支持使用强安定剂,但是,兴奋剂、抗抑郁药、 β -受体阻滞药(beta blocker)和锂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使用药物控制暴力行为的案例大部分是有实效的,这些药物往往使行为紊乱的治疗对象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理论和经验方面的正当理由仍然是薄弱的。诊断难以解释暴力行为;尽管继续使用生理心理模式和生物化学模式(参见第六章),但是,药物对攻击行为的效果似乎是非特异性的。而且,药物的不愉快副作用,使得人们难以自愿接受对精神药物的治疗。例如,希尔德(M. H. Sheard)等人发现(1976),40%以上服用锂的犯人在2个月内退出了审判,主要原因是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包括震颤、口干、多尿和恶心。最后,尽管已经证实药物对于控制暴力行为是有效的,但是,药效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也不能使个人掌握非攻击性的应付技能。不过,奥卡拉汉(M. A. J. O'Callaghan, 1988)指出,可以将药物治疗方法与行为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因为药物的效果依赖于环境;当症状得到遏止时,就可以促进其他技能的学习。已有证据证实,有关攻击行为的认知指导可以降低唤醒水平,这也说明将药物治疗方法与行为治疗方法结合起来是可行的。

3. 强安定剂(major tranquilizer)又译为“抗精神病药”;弱安定剂(minor tranquilizer)又译为“抗焦虑药” 译注

二、精神动力学干预

精神动力学治疗人员用人格发展解释暴力问题，并且经常把攻击性犯罪人看成是精神病态者。因此，治疗问题与下文中将要论述的对精神病态者的治疗有重叠。就像对性犯罪人的治疗那样，对攻击性犯罪人的治疗可以是个别进行的，也可以是集体进行的，治疗的目标是通过治疗关系促进自我认识、移情、自我控制和社会责任。

尽管在那些对攻击性犯罪人开展治疗的心理治疗人员中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他们有类似的目标、策略和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建立信任，这既是开展治疗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转变那些可能把人际关系看成是危险关系的治疗对象的一个目标。这要求治疗人员对治疗对象表现出接受的态度（当然不接受其行为），同时，进行限制和外部控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使治疗对象对自己的处境和转化负起责任。在治疗中，要通过克服对亲密关系和低自尊的恐惧性防卫，认识自己的感情；这种目标可以通过鼓励用言语表达破坏性幻想，容忍不愉快感情的表达和反映这些幻想与感情来实现。治疗人员不像在传统心理治疗中那样冷淡，他们不仅利用其权威进行限制，而且也提供指导。他们也提供如何应付正常恐惧和憎恨的角色模式。

在讨论心理动力学干预疗法时，再次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治疗对象的动机和转变能力问题。暴力犯罪人通常是在家庭或者法庭的压力下接受治疗的，甚至在强制拘留者中也是如此。参加治疗活动不稳定，中途退出率很高。由于认为集体疗法的威胁性较小，所以，它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方法。只要治疗对象在一些时候参加治疗活动，他们参加治疗活动的不稳定性是可以容忍的。不过，攻击性犯罪人可能会消极抵抗治疗活动，或者用表面上的自我认识（self awareness）姿态“欺骗”治疗人员；不能表达强烈情绪的治疗对象，其预后不良。莱昂（J. R. Lion, 1978）相信，如果没有表现出某种抑郁反应和罪恶感，是不可能发生转变的。然而，转变的程度受治疗对象的自我力量（self strength）的限制，“解决症状”（symptom oriented solution）可能是最现实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是对治疗人员的需要。治疗活动要定期进行，可能会长达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有必要得到治疗人员的持续支持。尽管信任关系的发展要求治疗人员真正接受（治疗对象），但是，对治疗对象的暴力行为的关注，可能会产生反移情⁴，往往表现为对治疗对象产生恐惧。因此，治疗人员需要探讨和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好与其他治疗人员一起进行这种活动。

正如对犯罪人进行的更加一般性的心理治疗一样，人们也很少对攻击性犯罪人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但是，卡尼（F. L. Carney, 1977）描述了对在一家门诊诊所进行的集体治疗的非控制性追踪研究结果。犯罪人参加治疗是执行缓刑的一项条件，在对这些犯罪人进行了平均时间为13个月的治疗之后，又进行了平均为9个月的追踪研究。对社区适应情况的评定表明，犯罪人有了显著的改善，累犯率为28%。不过，心理测验中没有发现产生了转变。卡尼指出，尽管治疗没有改变人格，但是，治疗控制了暴力行为。

4. 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是指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人员对治疗对象产生移情，这会影响治疗人员对治疗对象的客观态度，并且会妨碍治疗活动的进行，从而可能导致治疗的失败。——译注

三、行为和认知治疗

尽管减少破坏行为是代币强化法的一种常见目标,但是,人们很少调查行为疗法对攻击性犯罪的效果。大多数报告关注年幼儿童的攻击行为,或者关注在精神病学机构中对暴力性治疗对象的管理。尽管这些报告都产生了广泛使用的技术,然而,有关治疗效果持久性的证据的质量,仍然是很差的。

伯恩斯坦(P. H. Bornstein)等人评价了行为疗法在成人攻击行为中的应用(1981)。在早期的报告中,操作技术(operant technique)是很突出的。这些技术将消退、间歇、对非攻击行为的不同强化、对不相容行为的过度矫正或恢复(restitution)结合起来。结果表明,尽管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使攻击行为处于环境控制之下,但是,大多数操作研究关注语言能力差的人,例如,矫正机构内的心理缺陷者,慢性能力丧失的精神病人,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外部控制。而且,伯恩斯坦等人发现,只有一份报告考察了维持效果。

早期的文献也包含了一些使用系统脱敏法的报告,但是,这些报告主要是一些受到较差评价的个案研究,其效果现在并不清楚。不过,一些近期的研究支持使用放松疗法(relaxation)。例如,德芬贝奇(J. L. Deffenbacher)、戴姆(P. M. Demm)和布兰登(A. D. Brandon)发现(1986),与放松和应付技能训练有关的焦虑控制,无论是对愤怒的学生的愤怒状态和愤怒特征,还是对愤怒的学生自我报告的挫折反应,都有明显的长期效果;社会技能训练也被应用来处理少年犯罪人和攻击性青少年中的攻击行为问题。研究发现,攻击性犯罪人可能缺乏非攻击性自信技能(nonaggressive assertive skills),这是有道理的。不过,证据表明,攻击性犯人并非都有社会技能缺陷,因此,需要进行个别化的评价。

认知行为技术在近来的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如前所述,人们一直使用自我指导(self instruction)和问题解决方面的训练,教育儿童进行自我控制;一些干预措施特别指向攻击性儿童。坎普(B. W. Camp)等人使用静止疗法提高攻击性过强的年幼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⁵,结果发现,与没有加以治疗的对照组相比,接受治疗的儿童的几种认知功能得到了改善,变得与非攻击性儿童很相似。他们在课堂中的亲社会行为也得到改善,但是没有减少攻击行为。在另一项对青春前期少年的研究中,洛克曼(J. E. Lochman)等人比较了3组人的情况(1984):通过目标设置(goal setting)来处理愤怒的问题解决训练组;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的问题解决训练组;没有给予治疗组。结果发现,两个接受问题解决训练组的攻击行为和破坏性的等级有所下降,自尊有所增强。也有证据证实,学校行为会向家庭行为迁移,但是人们发现,这种迁移仅仅对教师或同伴有关少年行为的观念产生了有限的效果。

在一项有关已决少年犯(adjudicated delinquent)的研究中,格拉(N. G. Guerra)和斯拉比(R. G. Slaby)介绍了在一所最高警戒度矫正所实行的认知中介训练计划(cognitive mediational training program)中,对暴力犯罪人进行问题解决训练的情况。这项训练包括每周一次、一共12次的训练课程,训练的内容是将社会问题解决训练与态度

5. 此处的静止疗法在原文中使用了一个缩写SIT,作者没有在上文中给出SIT的完整原文,因此推测SIT应当是Silent Treatment(静止疗法)。——译注

转变程序结合起来,这些态度转变程序是为了改变那些将攻击行为合理化的信念而设计的;在研究中,将接受这些训练的暴力犯罪人与受到某种关注的暴力犯罪人、没有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暴力犯罪人进行了比较。认知训练对社会问题解决技能、有关攻击行为的信念、矫正机构内的攻击行为等级、冲动性、固执行为(inflexible behaviour)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不过,尽管一年和两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受到认知训练的犯罪人的累犯率较低,但是,差异并不显著。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愤怒是反社会性攻击行为的重要中介因素,是认知行为干预的一个目标。针对愤怒最广泛使用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法,是诺瓦克(R. W. Novaco, 1978)的愤怒控制计划(anger management programme)。这项计划包括认知重建和应付技能训练,是对米切鲍姆(D. Meichenbaum, 1977)的紧张移置程序(stress inoculation package)的一种改编。这项计划包括3个阶段:

1. 认知准备(cognitive preparation)

向治疗对象介绍愤怒的性质和功能,并且开始写有关愤怒体验的日记,以便促进对愤怒与自我陈述(self statement)、愤怒与监控进步(monitor progress)之间关系的认识。评论引起愤怒的条件,进行辨别合理的愤怒与不合理的愤怒方面的训练。

2. 技能获得(skill acquisition)

教育治疗对象如何重新评价引起愤怒的事件,如何通过使用自我指导来引导自己进行应付愤怒的尝试,如何通过使用自我指导来进行自我强化;通过放松训练进一步发展自我控制技能和交往技能,教育治疗对象通过模仿和角色扮演活动来维护自信。

3. 应用实践(application practice)

将学会的技能加以应用,并且在具有不同强度刺激的愤怒情境中进行检验。这套程序既可以个别应用,也可以集体使用。

诺瓦克(1978)评价了将这套程序应用于成人志愿者的情况,发现整套程序在减少愤怒反应的频率和强度方面,比单独使用认知训练或者放松训练更加有效。他也成功地向警察和缓刑官教授了这些做法。人们使用经过修订的诺瓦克程序有效地减少了存在冲突的夫妻之间的愤怒反应,也减少了虐待儿童的父母的愤怒反应。使用这套做法也使矫正机构内患有癫痫的女性犯罪人的暴力行为得以减少,而且这种效果维持很长时间。

不过,有关对犯罪人使用这套程序的报道很少。施利克特(K. J. Schlichter)和霍兰(J. J. Horan)比较了将类似的紧张移置程序加以不同应用的3种情况(1981):(1)应用这套程序训练矫正机构内的少年犯罪人;(2)部分应用这套程序进行训练,即治疗人员有接触但是仅仅进行放松训练;(3)不使用这套程序进行训练。结果发现,两种训练对自我报告的愤怒和攻击行为产生了显著效果,紧张移置程序也增强了在角色扮演中应付挑衅的能力,但是在追踪两个星期后发现,这套程序对矫正机构内行为的评定没有产生效果。菲恩德勒(Fiendler)、马里奥特(S. A. Marriott)和艾瓦达(M. Iwata)使用了类似的愤怒控制程序(anger control package)(1984),他们的愤怒控制程序包括自我监控、自我指导性训练、自我评价、问题解决、唤醒降低(arousal reduction)。在学校中参加代币强化法训练的犯罪学龄儿童(delinquent schoolchildren),在问题解决和教师评定的自我控制方面得到改善;在5个星期的追踪期间,参加代币强化法的学龄儿童因为不良行为(包括攻击行为)而被处以罚金的情况减少。在英国一家青少年拘留中心(youth custody centre)

进行愤怒控制训练的情况表明,在3个多月的追踪期间,这种训练减少了一些参与训练者的违纪行为。

因此,一些研究指出,愤怒控制训练可以在短期内减少攻击行为,它在控制矫正机构内的破坏行为方面的效果似乎得到了肯定。不过,愤怒控制训练对暴力犯罪人的效果、对攻击性犯罪的长期效果,仍然有待调查。在比较不同矫正方法的效果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一项对愤怒学生的研究中,穆恩(J. R. Moon)和艾斯勒(R. M. Eisler)比较了诺瓦克的训练方法和社会技能训练在自信训练和问题解决训练中的应用情况(1983)。这两种方法都改善了愤怒控制,但是,社会技能训练和问题解决训练在增强自信方面有优势。应当考察与愤怒和攻击行为有关的其他认知重建方法的效果;从所察觉的不公平或违反道德行为对愤怒唤醒的作用来看,戈尔茨坦(A. P. Goldstein)等人(1989)所倡导的将愤怒控制训练和道德推理训练结合起来的做法,也值得仔细研究。

尽管缺乏证实心理治疗能够使攻击倾向发生持久改变的证据,但是很显然,人们已经证实,目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而许多方法有待继续进行探讨。近来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填补早期的行为干预中留下的一些理论空白,但是,像犯罪人的异质性、有效的治疗成分、治疗强度这些问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一些矫正计划所报告的普遍的行为变化,显然只在进行某些技能训练之后维持几个星期时间。然而在实践中,对习惯性攻击犯罪人的干预,可能需要强度更大的治疗。

心理学干预继续以人中心。当攻击行为受到亚文化规范的支持时,仅仅这样做可能是不够的;在矫正机构环境中以及少年犯罪高发邻里,也能存在亚文化规范支持攻击行为的现象。托奇(H. Toch, 1975)认为,在尝试处理监狱犯人和刑事司法人员的暴力行为时,例如,在处理过分热心的警察或监狱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时,必须关注同伴群体的规范。他描述了在一个警察部门进行的工作,在这个部门,一个警察审查小组通过咨询、必要时通过施加压力、对另外的同伴群体规范进行强化的方法,处理警察的暴力行为。艾吉(V. Agee, 1986)也提倡把积极的同伴文化作为转化矫正机构内攻击性少年犯罪人的一种重要方法。

第五节 对精神病态和人格障碍的治疗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不仅日渐增多,而且也是犯罪人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人格障碍往往与攻击行为、性犯罪、吸毒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疾病在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者中尤其常见,而且往往伴随着更加严重的精神疾病。例如,对英格兰一些特别医院中治疗对象的研究表明,尽管大部分治疗对象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但是,2/3以上的人也符合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的人格障碍的标准。这些人格障碍包括精神分裂样人格、回避型人格、被动攻击型人格,而不仅仅限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PD)。

不过在传统上,人们在临床中关注的核心是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而且对病态人格的可治疗性持悲观的态度。不过,这种态度更多的是以轶事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可靠的证据为基础的。治疗文献中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对“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这个术语的用法不一致。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有时候指一般的人格障碍者,即持久性社会越轨者(persistently socially deviant individual);有时候

在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用来指那些缺乏罪恶感和同情心、具有冲动性、不能忍受挫折的犯罪人类型(参见第三章)。因此,在临床文献中研究的精神病态者很少是同质的。例如,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75a)发现,只有1/4被诊断为“精神病态者”的人被送入特别医院,这些人表现出与原发性精神病态者类似的特征;在被送入亨德森特别医院(Henderson unit)的“精神病态者”中,也报告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哈里斯(G. T. Harris)、赖斯(M. E. Rice)和科米尔(C. A. Cormier)也注意到(1989),尽管对加拿大一家最高警戒度医院的治疗对象的诊断中,认为2/3的人有“反社会人格”,但是,不到1/4的人符合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DSM-III-R)中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标准。尽管临床讨论通常以“传统的”精神病态者(classical psychopath)为中心,但是,这样的精神病态者可能仅仅占治疗研究中发现的“精神病态者”或“性格障碍”(character disorder)者中的少数;对特定类型人格障碍者的关注,模糊了持久性反社会行为与人格障碍之间的联系。卡尼(F. L. Carney, 1978)认为,反社会者中的人格障碍不一定相互有差别,因为有足够的共同性可以使这些人接受同样的治疗。不过,“一致性神话”(uniformity myth)与一些研究中获得的结果是相冲突的,这些研究认为,人格特征可以预测对特定治疗方法的不同反应性。因此,对人格障碍的鉴别,不仅是确定适合个人的治疗方法所必需的,而且也是确定个人的治疗目标所必需的。

第二个问题是,治疗技术与治疗结果之间的理论联系通常含糊的。尽管减少社会越轨行为通常是进行干预的目标,但是,人格障碍的意义在于,这类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以那些固定不变的、适应不良的特质为中介的。要在这种意义上证实治疗的效果,不仅需要证实治疗减少了累犯行为,而且要证实这种变化是以人格因素为中介的。不过,只有很少的一些研究清楚地确定了反社会行为之外的目标。例如,心理动力学矫正计划往往确立含糊的目标,包括社会责任的增强、自我认识的增强、自我控制的改善,但是,没有提供可靠的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另一个极端,行为矫正计划往往关注具体的目标,例如,机构内服从行为、培养习惯或技能,这些目标与反社会行为或者人格障碍的关联性是不清楚的。在临床实践中,似乎普遍存在着不能确定治疗目标的问题。例如,德尔(S. Dell)和罗伯逊(G. Robertson)发现(1988),接纳“精神病态者”住进特别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中,有明确治疗目的或治疗方式的不到1/4。

人格障碍不是疾病,因为它们代表了习得的功能失调行为模式。因此,适宜的目标是个人变化(personal change),而不是“治愈”(cure),不过,提供特别的应付技能往往是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人们已经对不同类型人格障碍的治疗结果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样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产生之前,人们在临床上似乎对人格障碍缺乏兴趣,而仅仅对精神病态感兴趣。这里主要讨论与“反社会人格”有关的临床文献,但是,必需强调的是,关于“传统的”精神病态者的可治疗性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对诊断并不准确的治疗对象进行的、存在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一种常见的研究结果认为,对被监禁犯罪人中病态人格或人格障碍的诊断,通常是与严重的累犯危险性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与暴力性累犯行为的危险性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反映了已经发现的犯罪性对诊断的影响(参见第十章)。不过,缺乏有关治疗干预的效果的证据。莱文(W. R. Levine)和伯恩斯坦(P. H. Bornstein)根据对295件有关反社会人格的报告的调查(1972),发现只有10项研究接近方法论方面的要求(同质的研究对象、

非治疗对照组、追踪研究、具体的结果标准), 其中大多数涉及在刑罚机构中接受治疗的少年犯罪人。8项研究认为对反社会行为有显著效果。因此, 他们认为有限的证据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即反社会人格是不可能改变的。不过, 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对反社会行为采用了可重复的标准: 所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同质性, 也是有疑问的。例如, 有一项研究中几乎60%的“性格和行为障碍”最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神经症。

休菲尔德(P. Suefeld)和兰登(P. B. Landon)考察了1975年以前报告的对“精神病态者”使用个别疗法和集体疗法、环境疗法、身体治疗(somatic treatment)和行为矫正疗法的情况, 他们也强调这个问题。大多数报告涉及对少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的治疗, 由于这些报告大多数缺乏适当的精神病态标准, 所以只能得出这样的暂时性结论: 治疗活动的进行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和真正的支持性(non-gullible supportiveness); 药物能够使精神病态者与治疗人员亲密相处; 治疗社区可能是有帮助的; 精神病态者可能随年龄的增大而“变为正常人”。自这些评论发表之后, 接着发表的相关研究很少。

一、精神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所需要的条件, 例如, 癫痫或心境障碍, 往往与人格障碍同时存在。威蒂杰(T. A. Widiger)和弗朗西斯(A. Frances)指出(1985b), 由于生物因素影响人格, 因此, 存在着把药物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的可能性。不过, 除了控制攻击行为之外, 几乎没有对这些障碍进行药物治疗的正当理由; 在临床实践中也不广泛使用药物。例如, 德尔(S. Dell)和罗伯逊(G. Robertson)发现(1988), 在符合法律标准的精神病态者中, 只对14%的使用药物。

有关利用药物改善人格障碍中的顺从性的临床文献很零散, 而且普遍缺乏确定的结论。凯尔纳(R. Kellner, 1978)发现, 几乎找不到有关神经阻断剂(neuroleptics)或弱安定剂疗效的文献, 但是凯尔纳指出, 一些药物可能对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攻击行为、冲动性或心境不稳(mood lability)的社会病态者(sociopath)有疗效。他注意到, 锂可能具有这种疗效。

比较一致的证据证实, 兴奋剂(stimulant)可以降低多动症儿童的冲动性反社会行为, 因此, 人们长期以来关注兴奋剂是否具有促进顺从性和新的学习的效果。萨特菲尔德(J. H. Satterfield, 1978)指出, 可以通过增加大脑皮层唤醒来实现这种效果, 大脑皮层唤醒可以减弱运动不安(motor restlessness), 改善注意力集中状况。他提出, 成年精神病态者也是唤醒不足的, 利用药物增加唤醒可能是进行教育活动和其他治疗活动的一种必要辅助手段。不过, 唤醒假设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参见第六章), 而且仅仅在缺乏对照组的个案研究中, 报告了兴奋剂对反社会成年人有效的证据。希尔(D. Hill, 1947)对短暂接受苯丙胺治疗的8名治疗对象进行了追踪研究⁶, 发现这种药物对于不当型人格、被动型人格、癔症型人格、神经衰弱型人格(neurasthenic personality)几乎没有疗效, 但是对于能够维持热烈人际关系的攻击性性格(aggressive character), 却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不过, 这项研究没有描述“传统的”精神病态者。斯特林格(A. Y. Stringer)和约瑟夫(N. C. Josef)也报告了对两名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治疗对象使用利太灵(methylphenidate)的情况(1983), 这两名治疗对象在童年期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历史。当接受这种药物治疗时, 这两名治疗对象

6. 苯丙胺(amphetamine)又音译为“安非他明”, 一种具有明显兴奋作用的精神药物。——译注

都表现得更加合作,攻击性也得到减弱,但是,这种效果在停止治疗后就消失了。

二、个别心理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

心理动力学疗法明确指向人格结构,有关人格障碍治疗的案例报告经常出现在精神分析学文献中。不过,几项可以得到的结果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反社会者的治疗。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是无法治疗的,因为他们缺乏神经症性冲突(neurotic conflict);人们似乎一致地认为精神病态者抗拒治疗、进行操纵和使用原始防卫(primitive defence)、很难顺从治疗,而强烈的反移情反应又严重妨碍通过移情关系获得领悟或自我认识。不过,一些心理治疗人员并没有严格区分精神病态者和无意识显露的神经症患者(acting-out neurotic),相信精神病态者也有一些焦虑和抑郁症状。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病态者也是可以治疗的。

在对认知疗法的一项先驱性研究中,索恩(F. C. Thorne, 1959)把阿德勒(A. Adler)所说的“社会病态反应”(sociopathic reaction)看成是一种攻击—自卫性生活方式(offensive-defensive life style),个人通过自我中心态度和回避谴责(blame-avoidance)来保护这种生活方式。个别疗法强调限制环境(limit setting)、承担对消极后果的责任、对自我挑败行为的领悟、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也强调对“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的再次发现。尽管没有提供结果资料,但是索恩认为,这种方法对接受治疗的7名治疗对象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一些治疗对象的治疗长达12年。维列恩特(G. E. Vaillant, 1975)对治疗的前景也比较乐观。他对克莱克利(H. Cleckley)关于精神病态者缺乏焦虑和转变动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有关“治疗对象逃避治疗”的刻板观念。他指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代表了对依赖恐惧和亲密恐惧的不成熟防卫。他描述了4项个案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像住院控制(inpatient containment)、确认行为控制(firm behaviour control)、对抗(confrontation)而不是解释(interpretation)、同伴群体支持这些方法在人格改变中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不过,伍迪(G. E. Woody)等人更加悲观(1985)。在接受认知疗法或支持性表达心理疗法(supportive expressive psychotherapy)门诊治疗的吸毒者中,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吸毒者在精神病学症状和心理方面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既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又有抑郁症状的吸毒者则有一定变化。作者指出,难以和治疗者建立人际关系的情况,妨碍了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治疗的成功。不过,人们已经发现,对这类人的职业行为和非法行为可以进行一定的改善。

大多数心理治疗人员认为,个别治疗和门诊治疗不适合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认为在居住环境中进行的结构性集体疗法是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朱厄(C. C. Jew)、克兰诺(T. L. Clanon)和马托科斯(A. L. Mattocks)发现(1972),参与集体治疗的人格障碍犯罪人从监狱医院释放后第一年中的假释成功率,要好于未接受治疗的犯罪人(假释成功率分别为74%和67%),但是,这种差别后来就消失了。作者指出,(其原因是)缺少假释支持机构。卡尼(F. L. Carney, 1978)的研究结果明显支持这种观点,卡尼指出,在帕图森特接受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的“有缺陷少年犯罪人”(defective delinquent)⁷,在监督

7. 帕图森特(Patuxent)是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所为需要特别治疗,特别是精神病学治疗的男女犯罪人设立的特别矫正机构。 — 译注

性假释 (supervised parole) 的3年期间, 累犯率很低。对于那些完成了治疗的有缺陷少年犯罪人而言, 只有7%的累犯率; 而整个矫正机构的总体累犯率是37%。不过, 正如在第十二章中注意到的那样, 帕图森特矫正所的结果数据受到了挑战。

三、治疗社区

治疗社区 (therapeutic community, TC) 这个术语是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加州产生的,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指几种治疗组织的基因类的概念。与本书的内容关系最密切的是民主—分析性治疗社区 (democratic-analytic TC) 和概念性治疗社区 (concept-based TC)。民主—分析性治疗社区在英国比较常见, 通常是由具有神经症问题或人格障碍的青少年或者年轻成人组成的小社区, 其目标是解决内心冲突、培养负责任的社会行为, 具体办法包括分享民主体权力、宽容、集体生活 (communalism)、现实比较 (reality confrontation)。最著名的例子是亨德森医院 (Henderson Hospital), 它与马克斯韦尔·琼斯 (Maxwell Jones, 1963) 的工作有联系, 但是这些原则也在格林顿·安德伍德监狱 (Grendon Underwood prison) 和一所苏格兰监狱的巴林涅单元 (the Bariinnic unit) 中得到使用。

概念性治疗社区在美国比较常见, 它是根据自助哲学观念发展起来的等级组织性社区。这种治疗社区的主要目标是矫正酗酒者或吸毒者, 其基础是辛那诺模式 (Synanon model) 和非尼克斯之家模式 (Phoenix House model), 工作人员通常是戒瘾者 (ex-addict)。已经在几所监狱和少年矫正机构中建立了这种治疗社区。肯纳德 (D. Kennard, 1983) 指出, 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模式, 但是, 治疗社区有下列共同的基本特征: (1) 无拘束的气氛; (2) 定期举行社区会议; (3) 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工作; (4) 把居住者看成是辅助性治疗人员。基本的假设是, 让居住者生活在一个鼓励公开表达感情、探索相互关系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 这种环境会促进自我控制。

一些证据表明, 治疗社区通过降低焦虑和抑郁, 增加自尊、自觉遵从和独立性而在短期内对心理适应产生积极作用。治疗社区在促使犯罪人重新社会化方面的效果还不明确。克拉夫特 (M. Craft)、斯蒂芬森 (G. Stephenson) 和格兰杰 (C. Granger) 随机将年轻的精神病态者分配到治疗社区或者传统的专制型病房 (authoritarian ward)。一年后, 在一些心理测验中出现了一定差别, 但是, 在专制型病房居住的精神病态者的智商有了很大提高。在追踪14个月时, 他们的重犯行为也较少, 只有1/4的人需要继续治疗, 而治疗社区的精神病态者中有1/2的人需要继续治疗。科尼什 (D. B. Cornish) 和克拉克 (R. V. G. Clarke) 对英国一所教养学校 (approved school) 进行的有对照组的评价, 同样没有发现治疗社区有什么益处。“适合的”少年 (suitable boy) 被随机分配到治疗社区单元或者传统单元, 而“不适合的”少年 (unsuitable boy) 也被分配到传统单元。在两年的追踪期间, 3类单元少年的重新定罪率没有什么区别, 从68%到70%不等。对从格林顿·安德伍德监狱释放的犯人进行的10年追踪, 也没有发现治疗社区降低了累犯, 治疗社区的犯人有92%的人被重新定罪, 而对照组的犯人有85%的人被重新定罪。对亨德森医院的“精神病态者”的追踪研究, 也发现了很高的失败率。科珀斯 (J. B. Copas) 等人把3~5年内再次住院或者再次进行刑事犯罪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1984), 发现在住院的精神病态者中, 36%的人获得了成功; 而在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住院的精神病态者中, 只有19%的人获得了

成功；不过，成功率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科珀斯等人(1984)也发现，继发性精神病态者(secondary psychopath)从中获益最少、比较成功的治疗对象已经具备多种适当的人际技能，是原先最缺乏社会化的人。在加拿大报告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哈里斯(G. T. Harris)、赖斯(M. E. Rice)和科米尔(C. A. Cormier)进行了一项为期10年的追踪研究(1989)，研究对象是在一家最高警戒度医院的治疗社区中至少接受过2年治疗的犯罪人的暴力性累犯行为。他们发现，那些在黑尔精神病态清单中得分很高的人中，77%的人变为了暴力性累犯，而在精神病态清单中得分较低的人中，只有24%的人变成了暴力性累犯。奥格洛夫(J. R. P. Ogloff)、王(S. Wong)和格林伍德(A. Greenwood)也发现(1990)，在精神病态清单中得分很高的犯罪人在治疗社区中治疗的时间，要比那些在精神病态清单中得分中等或者得分较低的犯罪人在治疗社区中治疗的时间要短；在精神病态清单中得分很高的犯罪人的动机较弱，改善程度也较小。

不过，这些结果的一种含义是，一些人格障碍类型(对治疗社区)产生了有益的反应：几项研究表明，治疗社区对犯罪人有比较积极的效果。在一所印度监狱中，对习惯性暴力犯人进行亲社会同伴模仿(prosocial peer modeling)训练，那里的大部分犯人表现得顺从，并且“树立了好的榜样”。在18名平均服刑9个月的精神病态者中，据说13人获得了成功，但是，成功的标准不清楚。艾吉(V. Agee, 1986)也注意到，尽管缺少对照组的数据，但是，在治疗社区接受治疗的慢性暴力青少年中，33%的人累犯率很低。对一所苏格兰监狱的巴林涅单元(the Barlinnie unit)进行的初步评价，提供了启发性的证据，表明在进入这个单元后暴力行为减少了，追踪调查发现的累犯率也比预期的低，但是，这项研究涉及的犯罪人人数较少，而且缺乏对照组。麦科德(W. M. McCord, 1983)也报告说，在接受强调“遵守纪律之爱”(disciplined love)的环境疗法治疗的青春前期“精神病态者”中，累犯率有显著的下降。不过，这些接受过治疗的少年犯罪人在释放之后，似乎可以继续得到支持，但是，对照组成员在释放之后则不能得到这种继续支持。更权威性的研究是对在纽约州为吸毒者建立的概念性监狱治疗社区(concept-based prison TC)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在3年多的追踪研究期间，那些完成了矫正计划的男性犯罪人的重新逮捕率(rearrest rate)是27%，那些参加了结构性不强的环境矫正计划(less structured milieu programme)者的重新逮捕率是35%，那些自愿为治疗社区提供服务但是没有参加治疗社区矫正计划的犯罪人的重新逮捕率是35%。韦克斯勒(H. K. Wexler)等人相信(1990)，他们的等级制治疗社区(hierarchical TC)包含了现在被认为是成功的矫正所必需的成分，例如，社会学习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并不很明显)、高度的结构性、亲社会性模仿(prosocial modelling)。艾吉(V. Agee, 1986)也指出，一种有效的矫正机构内治疗社区应当重视积极的同伴文化、积极的员工文化、包含有效纪律的结构、对人际关系的关注、被害人意识、安全和适当的治疗时间。她的矫正计划也包括员工—犯人之间的匹配。不管在不太成功的治疗社区中是否缺乏这些成分，这些成分都值得重视。

尽管缺乏证明治疗社区成功的证据，但是，治疗社区继续得到人们的大力支持。这种人道的、民主的、治疗取向的矫正方法，与许多监禁机构中存在的那种专制的、惩罚性的、退化的特征，形成对比；在这种意义上，治疗社区认为自己是“一种监狱管理的范例”。然而，治疗社区的观念吸引力(ideological appeal)和美学吸引力(aesthetic appeal)可能

掩盖了它的矫正效果问题。例如,没有证据证实,在促进心理适应方面,治疗社区优于其他治疗方式;证据表明,大多数治疗社区并没有对犯罪性产生影响。罗伯逊(G. Robertson)和冈恩(J. Gunn)认为(1987),重新犯罪与释放之后的婚姻调适(marital 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就业问题关系更密切,而与接受治疗的情况并没有那样密切。不过,这些问题反映了技能缺陷和机会的缺乏,哈里斯(G. T. Harris)、赖斯(M. E. Rice)和科米尔(C. A. Cormier)注意到(1989),他们所调查的治疗社区并不重视技能训练,也不重视对反犯罪态度的学习。其他心理动力学疗法也同样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实现“领悟”或“责任感”目标所固有的特性(specificity)。肯纳德(D. Kennard, 1983)指出,由于治疗社区涉及了用行为疗法处理的那些更具体的缺陷,因此,治疗社区可能是有价值的。

四、认知行为疗法

行为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这样一些问题,例如,攻击行为、性变态、越轨者中可能具有的人际技能缺陷;许多越轨者也具有人格障碍,但是,只有很少的一些行为矫正计划识别出了治疗对象的病态人格或人格障碍。因此,行为矫正人员很可能大量处理人格障碍,但是却把它们称作别的东西。例如,最常识别为社会技能缺陷的东西中,就包括了社会回避(social avoidance)和焦虑、缺乏自信、不适当的愤怒表达,这些情况似乎都符合人格障碍的标准。例如,愤怒问题就包括在被动攻击性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标准之中。

尽管行为矫正人员厌恶“倾向”(disposition)这个概念,但是,一些行为矫正人员试图将人格障碍的临床概念结合到行为框架中,通常是将人格障碍的临床概念理解为技能缺陷。例如,马歇尔(W. L. Marshall)和巴巴利(H. E. Barbaree)将人格障碍看成是不熟练的社会行为技能,这种状况通常不能给他人带来积极的或无害的后果。人们已经报告说,一些针对整个人格障碍的行为矫正计划,已经成功地减少了社会功能失调。例如,琼斯(F. D. Jones)等人描述了对一些被诊断为人格障碍的军人短期采用代币强化法的情况(1977)。具体做法是,将个别化的相依合同(contingency contracting)与点数强化结合起来,促使行为表现、工作和教育方面的改善。结果发现,那些接受治疗的军人比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军人更加积极地履行行动义务。莫伊斯(T. Moyes)、坦南特(G. Tennent)和贝德福德(A. P. Bedford)也发现(1985),一项将代币强化法、个别化相依管理和社会技能训练相结合的矫正计划,减少了那些被认为具有行为障碍和性格障碍的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和破坏行为,也减少了他们的自残行为(self-mutilation)。这项矫正计划也延迟了后来与警察的接触。不过,卡维尔(H. E. Cavior)和施米特(A. A. Schmidt)描述了一项有雄心的代币强化法(1978),在这项矫正活动中,根据奎伊(H. C. Quay)的行为分类体系,对犯罪人进行因人施治,但是,没有使累犯行为产生任何明显的下降,对精神病态者也没有产生任何独特的效果。

认知行为疗法在人格障碍中的应用,已经受到一些关注,但是,目前有关治疗结果的数据仍然很少。坦普尔曼(T. L. Templeman)和沃勒西姆(J. P. Wollersheim)描述了对精神病态者实施的一项矫正计划,在这项矫正计划中,使用固定角色疗法(fixed role therapy)和通过自学进行的问题解决训练,以便指导犯人达到自己的目标:用社会接受的方式获得感觉和自我满足。但是,这项矫正计划也没有报告结果资料。弗雷德里克森(L.

W. Frederiksen) 和雷恩沃特 (N. Rainwater) 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1981), 他们把爆发型人格障碍 (explo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中的一种冲动控制障碍) 看成是消极的人际期待和有缺陷的自信。他们对自愿参加的人实施了一项时间较短但是却很深入的矫正计划, 内容包括社会技能训练、认知重建、对酗酒的自我控制。结果发现, 在追踪期间, 这些人减少了爆发性发作行为, 但是, 一些人仍然存在社会问题, 而且中途退出率也很高。目前仅仅报告了一项有对照组的、对人格障碍者进行愤怒控制训练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由斯特梅克 (L. E. Stermac) 等人报告的 (1986), 其中的人格障碍者大多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这项研究对自我报告的愤怒和应付策略有效果, 但是没有考察长期的行为效果。

认知行为疗法根据传统学习理论中边缘的、分子的观点重新把人格障碍解释为技能缺陷, 避开任何的人格概念。不过, 治疗文献显示, 人格障碍的存在会削弱那些仅仅进行技能训练的矫正计划的效果。贝克 (A. T. Beck) 和弗里曼 (A. Freeman) 赞同更加宏观的治疗方法 (1990), 认为人格特质是潜在的或深层的认知图式的外部表现, 这些认知图式支配着普遍的行为策略。每种类型的人格障碍都具有独特的认知剖面图 (cognitive profile), 它是信念、态度、感情和策略的综合体, 而这个综合体是围绕有关自我和他人的性质这个一般主题组织起来的。例如, 人们认为, 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是受与个人的行动自由相关的信念和他人的干预支配的, 这种人格障碍者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中, 核心信念与关注自己和破坏规则有关, 这些信念导致个人采取攻击或剥夺他人的策略。贝克和弗里曼不太重视“超我”的缺乏, 而更重视道德发展的自我中心水平, 因为自我中心会使自我服务信念 (self-serving belief) 最大限度地减小未来的后果。认知行为疗法的目标是通过利用自我服务动机 (self-serving motivation), 提高认知功能。临床治疗人员通过使用指导性讨论、结构性认知实践、行为实验等方式, 试图指导治疗对象抛弃与不合格的个人利益有关的策略, 转而采取与合格的个人利益有关的策略, 这种策略考虑别人的需要。

贝克和弗里曼 (1990) 报告了使用认知疗法治疗反社会门诊病人的经验, 但是, 唯一获得经验性数据的研究是由伍迪 (G. E. Woody) 等人进行的 (1985), 他们的研究结果获得了唯一合格的支持。贝克和弗里曼的方法将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 对人格障碍类型的描述直接转换为似乎能够作为其疗法基础的简明体系, 但是, 他们的疗法并不是以任何系统的人格理论或者经验性研究为基础的。一种受到一些经验性研究支持的 (参见第三、九章)、含义更广的观点把人格障碍看成是功能失调的人际模式 (dysfunctional interpersonal style), 这种模式受到一些有偏见的图式的支持, 这些图式作为对他人有影响的自我实现预言而发挥作用。因此, 在治疗中需要证明人际期望 (interpersonal expectation) 是不正确的。基斯勒 (D. J. Kiesler, 1983) 和萨夫兰 (J. D. Safran, 1990) 认为, 可以通过把治疗人员—治疗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转变机制来实现这个目标。对于矫正机构内的犯罪人而言, 所实施的矫正计划不仅提供可以证明人际期望是不正确的那种环境, 而且提供发展新的人际技能的机会。

已经从治疗文献中看到一些新的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结果可以补充休德菲尔德 (P. Suedfeld) 和兰登 (P. B. Landon) 的暂时性观察结果 (1978)。采用适当的方法论 (即区分人格障碍的具体类型) 的研究的数量仍然很少, 以致于我们只能得出两个结论。第一, 还

需要证实转化精神病态者的工作是否“没有效果”。第二,对一些有人格障碍的犯罪人进行心理治疗似乎产生了转变。尽管人们没有一致地发现究竟哪一种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但是,那些建立了治疗环境的矫正方法,例如,代币强化法、治疗社区法、折衷心理疗法、集体疗法、社会技能训练、认知重建,都可以作为有积极效果的(矫正方法的)例子。一般而言,一些针对犯罪人发展起来的认知行为疗法,例如,人际问题解决、道德推理训练,似乎对人格障碍更加有效,但是,这些效果仍然有待调查。

这些结论一般都与危险犯罪人有关,因为尽管只有少数几项矫正计划明确把人格障碍作为治疗目标,但是,更加成功的矫正方法似乎以各类功能失调性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和人际模式为治疗目标,这些信念和模式可以划入人格障碍的总概念中。尽管获得成效的矫正计划有不同的类型,但是,在促进转变方面,特定技术的作用似乎不如一些条件重要。比较成功的矫正计划的共同成分似乎是:住院控制(inpatient containment);热情但是起指导作用、确立了限制条件的治疗人员;对自我中心的、反社会的信念提出挑战的程序;通过亲社会模仿和技能训练发展新的认知和人际技能的矫正计划;特别治疗(intensive treatment);矫正计划结束之后的有计划的支持。尽管有关这些矫正方法对危险犯罪人的意义的证据还不是很多,但是,近来提出的一些评价(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表明,许多这样的条件一般是成功的犯罪人矫正所必需的。

第十五章 干预的效果与伦理学

第一节 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刑罚目标的矫正(rehabilitation)受到了抨击。对矫正结果研究进行的评价认为,矫正在减少累犯方面“没有效果”;认为重新犯罪与机会、同伴压力、缺乏家庭支持或城市环境剥夺的相关性,要比矫正计划所涉及的个人缺陷更密切。这种观点被看成是右翼政治哲学而对整个西方社会产生了影响,对矫正的否定助长了“强硬”政策。

不过,正如前面两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过去20年间,以降低重新犯罪为目标的心理转化方法的种类,得到了增加。尽管没有一种心理转化方法是万应灵药、激动人心的成功也很少,但是,从事罪犯矫正工作的许多心理学家仍然相信他们的方法是有效果的。人们不再迷信矫正工作,对矫正工作的迷信被看成是一种职业性近视现象。因此,本章探讨对心理干预的这种持久信念的合理性。不过,由于许多干预措施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矫正罪犯,因此,将首先探讨这些干预措施的心理特性。

第二节 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预防心理障碍的方法最初是从公共健康模式发展而来的。这种模式认为,从根本上讲,发病预防的效果要比二级干预或者三级干预的效果强得多¹。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相似性是有限的,在少年犯罪预防领域更是如此。例如,少年犯罪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缺乏明显的发病标准,往往很难区分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之间的界限。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的对象一般是“健康的”人,或者具有具有发生功能障碍的危险但是还没有发生这种障碍的人群;而二级预防(secondary prevention)的目的是增强对早期发现适应不良的人进行干预的效果。不过,很多人一致认为的少年犯罪的危险因素,例如,早年的行为障碍、家庭问题,本身就是需要预防的功能障碍的表现。当然,长远目标是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因此,这个领域内只有很少的几种预防计划可以被看成是一级预防。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对少年犯罪的原因过程的认识有限,这妨碍人们确定适当的预防目标。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预防目标是社会制度而不是有危险的个人,但是,法林顿(D. P. Farrington, 1985)认为,现有的证据不允许简单地在个人决定因素和社会决定因

1. 发病预防(prevention of onset)是指预防疾病的发生;二级干预(secondary prevention)是指早期发现疾病以便早期治疗,争取良好的疗效;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是指做好患病者的康复工作,减少疾病造成的消极后果。这3类措施又分别称之为“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译注

素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无论是社会学的预防观点,还是心理学的预防观点,最终都关注对个人功能状况的影响问题;心理学的观点日益吸收了相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或者生态学模式(ecological model),承认多种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一些人对能否把已有的知识转化为有效的预防有疑问,但是,近来的一些发展表明,已有的知识足以识别出有希望的目标。最重要的工作应当集中于通过早期干预预防少年犯罪的发展、通过法庭转向减少累犯、对犯罪行为进行情境预防。

一、预防少年犯罪的发展

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是可以识别的童年期经历中一种比较稳定的特征,这意味着,对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改变,可以预防朝着后来的少年犯罪方向发展的进程。由于这些经历往往被看成是技能缺陷,因此,心理学观点强调提高有危险的儿童或者父母的能力;提高能力通常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有时候也间接地通过改变社会环境的方式。提高能力计划的目标是发展或提高能力、个人资源和应付技能,把它们作为压力或功能障碍的缓冲器。正如尼茨尔(M. T. Nietzel)和希米伦(M. J. Himelein)所指出的,这样的干预需要针对那些与不同年龄的少年犯罪关系最密切的具体缺陷进行。因此,这些干预措施应当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区别,干预的核心目标可以是社区、学校或者家庭。

一项经典性的预防少年犯罪的尝试,是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剑桥—萨默维尔青少年研究(the Cambridge-Somerwille Youth Study)。研究和干预的对象是500名5~13岁的儿童,他们中有的人的社会行为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没有什么问题。研究人员将这些儿童随机地分到对照组和实验组。对于对照组,仅提供信息;对于实验组²,则由社会工作者提供个人和社会咨询,提供学习辅导和医疗帮助,社会工作者参与到青少年的计划中。这项计划平均持续了5年。麦科德(J. McCord, 1978)进行的一项为期3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当初的对照组和实验组成员在成年犯罪历史方面没有差别,实验组的很多成员至少实施了2次犯罪。而且,治疗组表现出了一些消极的副作用,例如,比较严重的饮酒问题、严重的精神疾病、从事低下的工作、早亡。这项计划中的矫治活动可能不太完善³,因为会见咨询人员的次数很少,而且缺乏计划性。不过,在一些类似的更小规模的计划中,对反社会学龄儿童进行了社会个案工作,这样的干预计划也没有影响少年犯罪行为的发展。

几项校内少年犯罪预防计划试图改善虞犯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亲社会行为⁴。例如,通过应答性教育进行准备计划(Preparation through Responsive Educational Programs, PREP)就是一项广为宣传的行为取向计划,这项计划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学校中实施。这项计划使用了相倚合同(contingent contract)、在班级中进行社会强

2. 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是心理学中的一对概念,现在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犯罪学研究之中。实验组是指接受实验处理的一组研究对象,有时候又称为“治疗组”或者“矫治组”(treated group);对照组又称为“控制组”,是指在实验中不接受实验处理的一组研究对象。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成员的不同变化,了解所进行的实验处理、干预措施等的效果。——译注

3. 矫治(treatment)的本来含义是医学中的“治疗”,但是,考虑到我国监狱系统中已经普遍使用了“矫治”一词,所以,也将treatment翻译为“矫治”。有时候,当treatment与心理学无关,而与犯人的待遇有关时,监狱学文献中也把treatment翻译成“处遇”。——译注

4. 虞犯青少年(predelinquent adolescent)是指有可能进行少年犯罪的青少年。——译注

化和实物强化 (tangible reinforcement)、社会技能训练、父母训练等方法,提高那些表现出社会问题和学习问题的青少年的学习技能和社会技能。伯查德 (J. D. Burchard) 和莱恩 (T. W. Lane) 概括了对这项计划的综合性评价,包括一项为期4年的追踪研究。他们认为 (1982),尽管这项计划对学业成绩有暂时性效果,但是,这项计划对与学习无关的领域,包括退学、少年犯罪等几乎没有效果。伯查德和莱恩认为,缺乏表明这类学校行为预防计划有效的证据,而且这类计划的花费也成问题。不过,布莱 (B. H. Bry, 1982) 获得了积极的结果。布莱描述了一项成功的针对那些经历学校失败的青少年采取的预防计划。在这项计划中,青少年被随机地分为两个组:一个是对照组;另一个是为期2年的实验组。对于实验组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提供系统的学业成绩方面的反馈,强化适宜的学习行为,训练控制困难情境的自我功效 (self-efficacy)。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实验组的成员进行的慢性犯罪行为大大少于对照组,这方面的百分比分别是9%和27%,但是在研究中发现,对实验组采取的措施对于药物滥用行为几乎没有效果。

提高能力也是对少年犯罪人的家庭进行干预的一项目标 (见第十三章)。除了三级干预有一定效果之外,在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中使用功能性家庭疗法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对原先的计划进行的一项为期3年的追踪研究中,克莱恩 (N. C. Klein)、亚历山大 (J. F. Alexander) 和帕森斯 (B. V. Parsons) 发现 (1977),在那些因被看成是少年犯罪人而受到矫治的同胞兄弟姐妹中,其犯罪率为20%;而在受到其他方法处理的家庭中,同胞兄弟姐妹的犯罪率从40%到63%不等。戈登 (D. A. Gordon) 和阿巴思诺特 (J. Arbuthnot) 也报告说 (1988),在他们的重复研究中,受到这种方法矫治的少年犯罪人不仅累犯行为少于那些仅仅处以缓刑的人 (分别为11%和67%),而且变为成年犯罪人的数量也少于那些仅仅处以缓刑的人 (分别为10%和45%)。

校内少年犯罪干预计划不太成功的一种理由可能是,这些干预计划在少年犯罪倾向已经变得很牢固时才进行干预。因此,在上学不久或者上学之前进行的一级干预可能是更有效的。通过训练年幼学龄儿童的社会认知技能来减少冲动性的尝试,代表了一种观点,但是缺乏这种训练长期有效的证据。霍金斯 (J. D. Hawkins) 等人描述了在美国西雅图对1~3年级学生实施的学校干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的核心是父母训练。霍金斯等人的社会发展模式将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结合起来,认为与家庭的联系和对家庭的依恋,是后来与学校、同辈群体之间联系的基础。这种联系取决于参与的机会和技能,也取决于在某个社会单位中受到强化和惩罚的情况,因此,他们的计划将目标对准父母在家庭管理和家庭交流方面的技能。从大规模的随机化研究中获得的初步资料表明,父母参与训练课程,可以大大改善父母的养育行为,也可以在训练后1年内减少儿童的攻击行为。

一些早期干预试图通过提供教育性刺激促进学龄前儿童入学前的认知发展,这样的早期干预在高危险性家庭中往往很缺乏。广为人知的一项早期干预计划是美国的幼儿早年教育计划 (Head Start)⁵。尽管这项计划由于不能产生持久性的认知操作技能而受到批评,但是对这项计划的长期追踪研究发现,这项计划增强了社会能力,包括改善了延迟满足和减少了攻击行为。不过,一些人探讨了这项计划对后来的少年犯罪的效果。一个例外是佩里

5. 幼儿早年教育计划 (Head Start) 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项学前教育计划,为低收入家庭中3至5岁的幼儿提供教育、医疗、营养和社会福利等,以便促进这些儿童入校之后能够顺利学习。——译注

学前计划 (Perry Preschool Project), 这是幼儿早年教育计划的早期形式,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在密歇根州实施。施文哈特 (L. Schweinhart, 1987) 报告了对这项计划进行的为期 15 年和 19 年追踪研究的数据。123 名智力较低、来自下层社会经济社区的 3 至 4 岁的黑人小孩, 被随机地分为两个组: 一个是非学前对照组 (no-preschool control group); 另一个是为期 2 年的学前计划组, 对这个组的儿童, 每天进行教学, 每周进行家访以便促进这个组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学习动机。尽管智商的提高是暂时的, 但是, 学前组后来的学业成绩、离校后教育与职业种类有了很大的提高, 被逮捕的人也较少 (31% 比 51%)。不过, 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的效果更具有选择性, 而且仅仅限于几个项目, 例如, 较少参与帮派暴力, 与警察的接触减少。可以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和控制理论分析这个计划的效果, 也可以用相互作用的发展概念分析这个计划的效果。因此, 最初的智力改善似乎促进了对学校的奉献, 而教师强化使这种奉献得以维持。尽管还不清楚儿童卷入有计划的班级活动、小班级规模、父母卷入是否有效果, 但是, 这项计划很好地证实了早期干预对影响少年犯罪发展的潜力。施文哈特 (1987) 也从降低特殊教育、犯罪和福利津贴的花费方面, 强调了这项计划的成本效率。

人们较少注意通过控制环境进行预防的问题。不过, 预防儿童虐待的活动, 包括了在医院和社区中进行的教育计划, 这类计划的目标是儿童养育, 即改善父母的应付技能和相互作用技能; 同时, 也包括了一些社区计划, 例如, 传播媒介大力参与 (media campaigns)、热线电话、预防虐待发生的社会支持网络。近来在家庭虐待和性虐待领域进行的工作, 也集中于向专业人员 (教师、开业医生、警察等) 提供信息和技能。至于近来预防反社会行为的活动, 人们已经证实这类活动有长期的预防效果。

尽管许多人现在认为, 早期干预计划在预防少年犯罪方面的潜力最大, 但是, 几乎没有经验性证据证实什么是最有效的干预阶段。例如, 对学龄儿童进行父母技能方面的训练, 可能具有像训练学前儿童的母亲一样的效果, 并且更容易进行。针对高危险性家庭的一级预防也可能发生与烙印 (stigma)、自我实现预言有关的伦理问题。霍金斯 (J. D. Hawkins, 1987) 等人努力使他们的预防计划变得更容易接受, 以便用来训练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不过, 他们遇到了选择新家庭方面的普遍问题, 他们吸引了 41% 的白人高危险性家庭, 但是所吸引的黑人高危险性家庭仅仅有 13%。这些问题在社区干预计划中是普遍存在的。

二、转向

作为二级预防的一种形式, 转向 (diversion) 的目标是通过减少法律干预阻止犯罪性的发展。人们认为, 通过避免官方过程的烙印可以预防重新犯罪, 警察可以通过行使警告、释放等自由裁决权做到这一点。不过, 少年犯罪人不再由法庭处理的转向措施,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变得十分流行, 这种转变反映了标定理论的影响, 标定理论认为, 官方行为通过引起犯罪认同 (criminal identity) 而导致继发越轨行为 (secondary deviance)。后来在美国发展了大规模的转向计划, 1969 年的《儿童和青少年法》(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 在英国创造了两种突出的方式。在英格兰, 少年法庭可以判处由社会与缓刑部门执行的监督令 (supervision order), 这种监督令涉及中间处理 (intermediate treatment, IT) 计划, 其目标是让儿童在社区中参加娱乐、教育或者社会活动, 中间处理计划介于监禁处理和个案工作之间。同样, 苏格兰的立法同样确立了儿童听证会制度, 把

它作为少年法庭的替代措施。这种听证会允许一个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小组决定在释放、社会工作监督或者居住安置中哪一种措施最符合儿童的利益。

标定理论预测,最小的官方干预可以减少累犯。但是,剑桥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有限的支持。麦科德(J. McCord, 1975)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对剑桥—萨默维尔计划进行的为期30年的追踪研究获得了相互矛盾的证据。在剑桥—萨默维尔计划中,青少年在第一次逮捕并受到警察警告之后,他们的犯罪生涯就脱离了法庭;而那些没有这样经历的青少年则会受到法庭的处置。与标定理论相反,未经法庭处置的青少年中,51%的人后来实施了至少一次的指数犯罪⁶;而那些被法庭定罪判刑的青少年中,只有23%的人后来实施了至少一次的指数犯罪。

最近的转向计划把一些个人服务或家庭服务作为法律惩罚的替代措施,在这方面,转向计划扩展了作为创建少年法庭基础的矫正哲学。不过,转向计划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在一些情况下,转向计划“扩展了”官方干预的网络,因为转向计划干预了以前未曾受过这种干预的儿童。美国的评价也发现,所提供的服务往往是缺乏计划性或者协调性的,并且资源不足、执行不当;这表明转向计划在减少累犯方面的成功尚未得到证实。对英格兰中间处遇计划的一项评论也发现,人们对这类计划的认识模糊,而且这类计划也缺乏一致的目标或程序。另一方面,苏格兰的儿童听证会制度大大减少了受到司法处理或者监禁的儿童的数量,这可能是因为替代性服务规定较少的缘故。

转向计划的失败可能反映了“无内容的结构”(structure without intent)现象,因为事实证明,一些提供了高质量服务和评价的转向计划对累犯有显著的效果。科林伍德(T. R. Collingwood)和金瑟(R. W. Genther)描述了美国达拉斯(Dallas)警察部门实施的一项转向计划。在这项计划中,对警察和民间咨询员(civilian counselor)进行卡赫夫人类资源发展技能(Carhuff'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Skill)培训。在逮捕少年之后,安排他们参加短期认识讲座,或者安排他们参加6个月的咨询计划;根据犯罪严重性的不同,对他们进行身体健康、人际技能、学习技能方面的咨询。接受咨询的青少年的技能有了很大改善,在实施这项计划的头17个月中,接受咨询的人中只有24%的人重新犯罪;而同样被安排参加这类计划,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计划活动的青少年中,47%的人重新犯罪。在另一项转向计划研究中(1977),奎伊(H. C. Quay)和洛夫(C. T. Love)随机将就诊的少年犯罪人分为两组:一组是实验组,这个组的少年犯罪人接受学习辅导、个人和职业咨询;另一组少年犯罪人是对照组,他们参加其他的转向计划。尽管对这两组少年犯罪人的追踪时间较短(分别是311天和450天),对照组少年犯罪人重新犯罪的机会也有限,但是发现,实验组少年犯罪人的累犯率低于对照组(分别是32%和45%)。

戴维森(W. S. Davidson)等人最近的一项报告证实(1987),使用受过良好训练的准专业人员是很有效的。他们将法庭移送的青少年犯罪人随机分为3个组:(1)由法庭移送来的黑人组成的对照组;(2)不予注意对照组(attention-placebo control),由法庭工作人员进行监督;(3)由受过训练的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监督并实行一种矫治的小组。对少年

6. 指数犯罪(index crime)是指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s)中根据其严重性和发生频率确定的8种犯罪,包括谋杀、强奸、伤害、抢劫、夜盗、纵火、盗窃和盗窃汽车。——译注

犯罪人进行为期18个星期的实验。矫治措施包括行为合同 (behavioral contracting) 和与儿童辩论 (advocacy with children)、与家庭成员辩论、罗杰关系疗法 (Rogerian relationship therapy)。在两年的追踪期间, 没有发现对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有什么效果, 但是各种接受矫治的青少年的官方累犯率很低, 个人行为条件和人际关系条件对降低官方累犯率的作用最大。由于不予注意对照组的累犯率稍低于对照组, 这说明没有什么特别的矫治措施可以增强转向计划的效果。

还没有见到有关中间处理对累犯的效果的报告。中间处理提供了在自然环境中对少年犯罪人开展工作的机会, 但是心理卷入很小。不过, 普雷斯顿 (M. A. Preston) 和卡内基 (J. Carnegie) 描述了在英国伯明翰进行的结构性心理学中间处理计划。这项计划实行了点数强化法 (points economy)、个人目标制定法 (individual goal-setting)、个人合同法 (individual contracting), 还实行了工作体验法 (work experience), 以便发展即将离校的少年犯罪人的工作技能。在一年的追踪研究中, 参与计划的许多少年犯罪人找到了工作, 重新犯罪的人很少, 这两种情况都好于以前参与缺乏结构性中间处遇计划的少年犯罪人。

尽管转向计划主要是针对少年的, 但是, 目前在英国也重视将精神障碍犯罪人转到社区机构内。这种转向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而不是根据任何犯罪学理论进行的。库克 (D. Cooke, 1991b) 描述了在苏格兰实行的一项针对有心理问题的成年人的转向计划。根据这一转向计划, 可以对有心理问题的犯罪人进行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治疗, 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起诉。库克发现, 那些被选择来实施这项转向计划的成年犯罪人, 是一些特殊的犯罪人, 他们没有通常的犯罪生涯, 他们更有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初次犯罪人, 往往是实施了轻微财产犯罪或性犯罪的人。这些犯罪人最常见的问题是焦虑、抑郁和酗酒; 在接受矫治之后, 他们的重新犯罪减少了。

当中间干预目标很清楚、能够由得到训练的人员实施干预时, 转向计划似乎可以对累犯产生效果。不过, 正如戴维森 (W. S. Davidson) 等人所指出的那样 (1987), 高质量的转向计划是示范性计划, 这样的计划并不能代表日常活动。

三、情境犯罪预防

尽管传统的预防活动目标是影响个人的倾向, 但是, 情境犯罪预防观点的目标是通过改变犯罪人、被害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减少实施犯罪的机会。情境犯罪预防观点来源于理性选择模式 (见第四章), 也受到近来有关犯罪被害人的研究的影响。预防活动涉及改变物理环境、改变潜在被害人的行为、通过社区加强对犯罪的控制。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并不是新的, 锁子的发明就是目标加固 (target hardening) 的一个早期例证, 许多情境犯罪预防措施仍然具有注重实效的风格。不过, 20世纪70年代理性选择模式的发展, 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理论观点。最常见的环境预防形式是目标加固, 即改变所认识到的收益与实施犯罪的代价之间的平衡。目标加固的例子包括加固公用电话亭中的硬币盒子、在财物上安上醒目的防夜盗警报器、在汽车上安装转向锁 (steering lock)、在机场安全检查使用金属探测仪、财物标刻⁷。有关的一种目标加固发展形式是在易受侵害的部位, 例如, 商店、地铁, 更多地使用电视摄像监视。最近, 人们也强调在设计建筑物和

7. 财物标刻 (property marking) 就是指给财物加上标记的行为和方法。——译注

住宅时, 要注意消除视觉死角和加强监视, 减少犯罪机会。尽管这些预防措施的效果仍然不得而知, 但是, 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现, 在使用这些措施的特定部位, 特定犯罪的发生频率已经下降。例如, 麦克尼斯 (M. P. McNees) 等人的实验证实 (1976), 在百货商店中张贴“商店行窃是犯罪”的标语, 对减少商店行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使用星号和标记牌显示经常被盗物品, 几乎可以使商店行窃完全消失。在几个国家中发现的一个并非有意产生防盗效果的例子是, 当法律规定摩托车手必须佩带防护头盔时, 摩托车盗窃案件有了下降, 这可能是反映了没有这种头盔的偷车贼被识破的危险性的增加。

不过, 人们对这种犯罪预防观点提出了一些批评。第一, 目标加固的成本往往很大, 但是, 针对刑事损害或恶意破坏这样一些犯罪所进行的活动, 在减轻与内城区犯罪的有关公共舆论方面的价值, 可能是有限的。第二, 这类预防犯罪活动的目标往往是模糊的, 并且依赖于有关犯罪决策的未经检验的假设。例如, 贝内特 (T. Bennett, 1986) 注意到, 财物标刻的目的不仅是预防盗窃, 而且也有助于财物被盗之后警察的行动。从盗窃犯的角度来看, 他也会发现, 被犯罪人注意的那些线索, 例如, 房屋有人居住的迹象, 并不总是在预防犯罪计划中事先得到关注的。第三, 一种更加一般化的批评是, 使犯罪变得更加困难的措施可能导致犯罪置换 (displacement), 即改变犯罪活动的时间、地点、方法、方式。例如, 当在 1971 年在伦敦要求安装转向锁之后, 盗窃新车的数量下降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 盗窃旧车的犯罪数量增加。不过, 梅休 (P. Mayhew) 等人指出 (1980), 犯罪置换现象在受到强烈动机驱使的“专门化”犯罪中, 例如, 银行抢劫, 最为明显; 但是, 在机会性犯罪中很少发生。同时, 根据对犯罪决策过程的理性选择分析, 犯罪置换的发生率是可以预测的。

情境预防的一些成分的目标, 是影响潜在被害人的行为。例如, 警察大力宣传财物标刻、加强房屋安全。近来在家庭虐待和性虐待方面发展起来的其他预防方法, 其目标是通过促进回避和应付技能的能力发展策略, 降低易受犯罪侵害性。在美国的学校中, 已经越来越多地实施通过电影、书籍、讲座等方式促进个人安全技能的教育计划, 以便减少性虐待的危险性。这些教育计划教育人们识别不适宜情境、抗拒诱惑、逃跑、如何通知别人等方面的知识。很少有人调查这些知识、方法、技能的效果, 但是, 沃特勒 (S. K. Wurtele) 等人比较了行为技能训练和教育电影放映这两类活动。他们发现 (1986), 行为技能训练在增加个人安全知识方面的效果更加明显, 但是在角色扮演测验中, 仅仅发现两类活动的效果差别不大。人们也在教育妇女降低易受强奸侵害性方面, 使用行为技能训练方法。

情境犯罪预防的第三种观点, 涉及在社区中组织有关活动, 减少犯罪机会, 增强非正式社会控制。在美国现在十分普遍并且在其他西方国家日益流行的一种方式, 就是邻里守望 (neighborhood watch)。这种方式包括一些得到警察鼓励、促进居民对自己的邻里进行监视的措施, 例如, 居民巡逻、相互陪伴, 相互帮助, 使居民形成一种压力群体, 协助警察减少发生犯罪的机会, 包括驱赶毒品贩子、妓女。凯林 (G. Kelling, 1986) 注意到, 这样的群体在美国至少已经存在了 30 年, 其根源是集体自助的社会传统和政治传统。他指出, 有证据证实了这类群体在减少犯罪、降低犯罪恐惧方面的效果; 但是, 没有发现这类群体具有提高人们的警惕性、降低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消除反警察态度的潜在效果。

第三节 有关“矫正无效”的争论

马丁森 (R. Martinson, 1974) 在其有影响的评论中, 检查了 1945 至 1967 年间发表的控制性结果研究 (controlled outcome study), 这些研究涉及从个别咨询到缓刑和假释等矫正干预措施。他得出的结论是: “除了极少的和孤立的例外情况, 迄今为止所报告的矫正活动没有对累犯产生明显的效果。”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除了马丁森的研究报告之外, 概述其研究结果的著作似乎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⁸。马丁森提出的“矫正无效” (nothing works) 的观点, 变成了一种媒体口号, 成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动乱和犯罪率上升之后时代思潮。因此, 不仅那些曾经迷信矫正的自由派人士接受了这种观点, 而且那些赞同报应和威慑的保守派人士也接受了这种观点。

马丁森的结论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帕尔默 (T. Palmer, 1975) 对这项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是否确实表示怀疑, 因为这项研究所评论的那些研究中, 48% 的研究显示出积极的或者“部分积极的”效果。他认为, 没有对犯罪人的特征与矫治人员、矫治环境的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充分的说明。哈勒克 (S. L. Halleck) 和威特 (A. D. Witte) 也认为 (1977), 马丁森的标准过于严苛, 因为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矫正服务通常是“马马虎虎的、缺乏资金、人员不足, 并且是在不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不过, 由矫正技术研究小组 (the Panel on Research in Rehabilitative Techniques) 进行的进一步的评价, 赞同马丁森的评论, 但是, 这个小组注意到, 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和经常缺乏完整的计划, 妨碍人们得出一种最终的结论。

然而, 对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报告的有关结果研究的评价, 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金德鲁 (P. Gendreau) 和罗斯 (R. R. Ross) 评价了 95 项对不同类型矫正人口进行干预的报告, 包括对酗酒者、吸毒者、性越轨者实施的矫正计划, 结果发现 (1979), 86% 的报告描述了成功的结果。布莱克本 (R. Blackburn, 1980b) 评价了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表的 40 项有关犯罪人的心理矫治计划, 结果也发现, 在那些进行了追踪研究的矫治计划中, 50% 的心理矫治计划显著减少了累犯。而且, 马丁森 (1979) 也放弃了他原来提出的很广泛的批评, 注意到一些矫正计划是明显有效的, “关键的事实似乎是实施矫正计划的条件”。帕尔默 (T. Palmer, 1983) 提出, 到 1980 年为止, 在怀疑论者和乐观论者之间仍然存在“一种有待继续讨论的气氛”。怀疑论者认为, 成功的矫正计划太少, 以至于无法优先考虑矫正。乐观论者认为, 一些犯罪人受到了某些干预措施的影响, 或者说一些矫正活动对一部分犯罪人是有效的。

由于威慑论的支持者试图填补矫正理想的明显失败而留下的空隙, 因此, 对矫正的这两种态度将持续存在。不过, 成功干预的例子继续涌现。金德鲁和罗斯 (1987) 扩展了他们早期的评论, 发现尽管对许多干预计划的评价仍然很差, 但是已经证实一些措施有显著

8. 这里所说的著作是指道格拉斯·利普顿 (Douglas Lipton)、罗伯特·马丁森 (Robert Martinson)、朱迪思·威尔克斯 (Judith Wilks) 合著的《矫正治疗的效果: 对矫治评价研究的一项调查》(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onal treatment: A survey of treatment evaluation studies, New York: Praeger, 1975) 一书。——译注

的效果。特别是像早期干预、行为家庭疗法 (behavioral family therapy)、认知计划的使用。巴斯塔 (J. M. Basta) 和戴维森 (W. S. Davidson) 对 20 世纪 80 年代报告的犯罪人干预计划的评论发现 (1988), 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矫正计划产生了积极结果, 这些证据驳斥了“矫正无效”的观点。不过, 他们警告说, 由于继续存在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例如, 研究对象数量太少、随机分组使用不够、缺乏适当的追踪研究、依赖粗糙的累犯标准等, 任何结论都是有保留的。

这些定性的、“对评价的评价”、使用传统的秘密投票法 (ballot box approach), 即根据人们报告的、符合成功统计标准的结果的数量, 判定干预的效果。它们必然会受到支持积极结果的杂志出版偏向的限制, 也会受到对某一类犯罪人采用的干预方法性质变化的限制, 还会受到经常发生的、随意划分干预类型的限制。近来的一些评价试图使用超级分析方法克服定性评论中存在的缺陷。尽管超级分析方法同样存在缺陷, 但是, 这种分析方法却使用公认的效果大小 (effect size, ES) 标准对结果进行比较。在对结果进行比较时, 可以使用不同的统计摘要评价效果大小, 但是, 一种基本的形式是标准差 (实验组矫治后的平均数减去对照组的平均数, 除以对照组的标准差)。在这里回忆史密斯 (M. L. Smith) 和格拉斯 (G. V. Glass) 对心理疗法结果的超级分析 (1977) 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的超级分析发现了 +0.68 的平均效果, 这表明, 受到治疗的普通患者的情况要比没有受到治疗的对照组中 75% 的人都要好。

加勒特 (C. J. Garrett, 1985) 描述了对 111 项干预研究进行的超级分析, 这 111 项干预研究涉及 13000 名少年犯罪人, 不过, 仅有 1/3 的干预研究报告了累犯数据。各个结果量度 (outcome measure) 的平均效果大小是 +0.37; 最大的效果是在学习改善方面, 为 +0.78, 然后依次是社会适应 (为 +0.63)、心理适应 (为 +0.52)。累犯的改善效果中等偏上 (为 +0.13)。行为方法的改善效果比心理动力学方法要好一些 (分别为 +0.63 和 +0.17), 但是, 当考虑设计的精确性时, 这两种方法对累犯都没有效果。另一方面, 相倚管理和认知计划一致地产生了积极效果。加勒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效果是鼓舞人心的, 尽管一些干预只有中等的效果, 但是, 这种方向绝对是积极的。不过, 后来由怀特黑德 (J. T. Whitehead) 和拉布 (S. P. Lab) 进行的一项超级分析 (1989), 研究了主要针对累犯的 50 项少年矫正计划,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矫正治疗对累犯几乎没有效果”。由于所研究的矫正计划中有 32% 的矫正计划符合产生了积极效果的标准, 因此, 这个结论令人感到迷惑。研究中也发现, 在矫正环境和矫正人口一定的情况下, 行为矫正计划的效果并不比其他矫正计划明显。令人怀疑的是, 将代币强化法与警察警告相比较是否有意义?

安德鲁斯 (D. A. Andrews) 等人认为, 一些干预在临床上忽视了患者需要的相关参数或者产生转化所需要的条件, 这样的干预实际上是不可能有效果的。他们对怀特黑德和拉布研究过的那些少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干预类型 (仅仅给予刑事制裁、提供不适当的服务、提供适当的服务、未特别指出的干预) 对这些犯罪人进行了分类。结果发现, 效果的大小 (ϕ 系数) 与矫治的类型密切相关, 提供适当服务的矫正计划的效果大于提供不适当的服务或者仅仅给予刑事制裁的矫正计划 (平均 ϕ 系数分别为 +0.30、-0.06 和 -0.07)。由于提供适当服务的矫正计划平均降低累犯达 50%, 因此, 这一结果与“矫正无效”的观点相冲突。在一项类似的超级分析中, 伊佐 (R. L. Izzo) 和罗斯 (R. R. Ross) 从矫正计划概念的适当性方面分析了矫正计划的效果, 结果发现, 以某

种有关犯罪行为的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行为矫正理论、示范理论、系统论、现实疗法、人际成熟水平理论、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矫正计划在降低累犯方面的效果,是缺乏理论基础的矫正计划的5倍。尽管这些理论模式之间没有差别,但是,包含了认知成分的矫正计划的效果,是那些没有包含认知成分的矫正计划的2倍,这与罗斯(R. R. Ross)和法比亚诺(E. A. Fabiano)的早期研究结果(1985)是一致的。

第四节 关于成功的干预

没有一项评论明确地证实“矫正无效”,甚至也没有明确地证实“矫正几乎无效”。尽管人们发现许多矫正计划效果很差或者没有效果,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对犯罪人的行为有效的干预计划,以至于不能再说这样的干预计划是“孤立的例外情况”。卡伦(F. T. Cullen)和金德鲁(P. Gendreau)指出(1989),对这类肯定性证据的反对,反映了思想意识偏见,但是,也可能反映了职业角色。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这类证据的解释显然会比大学里的犯罪学家更加乐观,其原因既有可能是对矫正活动的个人参与,也有可能是在刑罚系统对临床活动的约束因素的密切接触。就像政治活动中的认识一样,矫正也是一种可能性技术(art of the possible)。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一些矫正计划降低累犯50%的研究结果,可以看成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安德鲁斯(D. A. Andrews)、邦塔(J. Bonta)和霍格(R. D. Hoge)也指出(1990),提供适当服务的矫正计划对累犯是有效的,而传统的刑罚制裁则不提供这样的服务。尽管现在很少有人认为,矫正是监禁的首要目的,但是,无论从经验性基础来看,还是从道德方面来看,对犯罪人提供矫正都是正当的。

超级分析的结果表明,对那些与犯罪无关的目标的干预效果,例如,对社会适应或者学校适应的干预效果,与对更普遍的精神卫生问题的干预效果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矫治措施要比不矫治好得多;这种观点似乎也适合于矫正领域,就像这种观点适合于更普遍的精神卫生领域中一样。不过,这种观点是否适合于累犯,现在并不清楚,因为许多干预措施对累犯几乎没有效果,一些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增加了累犯。这种限制矫正成功的可能的理由包括方法论缺陷、不同矫治的效果、提供服务的条件。

一、方法论问题

评论者经常发现,矫正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妨碍人们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些方法论缺陷可以划分为2大类:执行问题和评价问题。执行问题包括干预的力度和完整性。力度(strength)是指某种矫治措施可能引起行为改变的潜力。力度取决于一些因素,例如,理论基础、矫治人员的素质、矫治的强度(“剂量”)、所设计的干预的清晰度。完整性(integrity)是指实际执行计划的程度。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人们很少评价或者报告这些因素。

评价问题产生于一些不符合传统的、有关研究设计的要求。其中比较突出的要求是抽样和设计问题、结果量度的心理测量特征问题。样本往往太小或者缺乏代表性,以至于无法进行统计处理和进行逻辑概括,而且往往对人口统计学特征、犯罪特征和个人特征缺乏适当描述。设计的缺陷包括缺少对照组、不能随机分组,还包括研究报告往往不讲清楚实验程序,以至于别人无法重复这种实验程序,也无法确保矫治的完整性。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使用了不知道其信度和效度的“成功”标准。需要选择能够反

映矫正计划目标的结果量度,同时应该让没有偏见的数据收集者进行评价。因此,结果量度应该既包括直接的计划内目标(within-program target),也应该包括长期效果。不过,当评价长期效果时,大部分研究人员仍然主要使用重新犯罪这种粗糙的全有或全无量度(all-or-none measure),这种量度的信度是成问题的。不仅用来作为重新犯罪量度的官方数据的信度是成问题的,还成问题的是,研究人员也使用不同的标准作为重新犯罪的量度,例如,逮捕,定罪,违反假释规则,因为这些不同的量度不可能产生同等的结果;研究人员使用自我报告的数据或者其他数据资源的很少。累犯”作为“成功”的一种量度,其效度也是成问题的。使用犯罪—不犯罪这种二分法,掩盖了在犯罪频率或犯罪严重性方面的差别,它可能意味着部分成功。人们早就认为,累犯不是矫正计划成功的充足标准。例如,重新犯罪可能反映了矫正计划没有涉及的因素,特别是社会环境中的未曾预料的变化。因此,对效果的评价不仅需要适当量表化的、多方面的有关未来犯罪行为的量度,而且要证实这些量度与矫正计划所针对的个人变化或者社会变化之间具有共变关系。

追求方法论的完美是科学进步所依赖的一种理想。不过,刑罚执行者不可能追求完美的方法论,刑事司法系统的特征很难允许人们进行理想的随机安排或者随机抽样。正如亚当斯(S. Adams, 1977)所指出的,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可以用较差的准实验设计方法加以处理,或者说,他们关心的是刑事司法系统,而不是结果问题。最迫切的问题可能不是评价的完美性,而是保证评价能够进行。

二、因人施治⁹

比较性结果研究显示,所有的心理疗法都有积极效果,但是,没有一种心理疗法是完美无缺的。尽管利用常见的“非特异性”因素、而不是特别技术获得积极效果的设想无法实现,但是,这种设想可以应用于犯罪人矫正,因为不可能确定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不过,犯罪人矫治计划在影响结果方面的全面失败可能掩盖了相互作用,对一些犯罪人的积极效果可能被对另一些犯罪人的有害结果所抵消。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应当对犯罪人配置他所需要的矫治方法和矫治人员。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试图改变观念和做法,从关注“哪一种方法效果更好”转向关注“哪一种技术在什么条件下对什么人最有效”的问题,对因人施治或者“根据情况实施计划”(prescriptive programing)仍然缺乏研究。人们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可能反映了大多数矫治人员都是恪守某一种理论模式;也缺乏公认的犯罪人、矫治方法或矫治人员的恰当分类。而且,综合性的分析需要研究大量的相互作用,因此,只有很少一些研究涉及了大量的因素,这一点并不奇怪。

一种不同的因人施治观点认为,犯罪人的特征是矫治反应的中介因素;对于一些犯罪人来说,用多种矫治方法进行矫治都会有效果。例如,辛克莱(I. A. Sinclair)、肖(M. J. Shaw)和特鲁普(J. Troop)在对监狱福利官员的个案工作进行的研究中偶然地发现(1974),内倾性格犯人累犯率降低的程度大于外倾性格犯人。亚当斯(S. Adams, 1970)

9. 因人施治(differential treatment)是指根据不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矫治,其原理十分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因人施教”。这个术语又译为“不同矫治”、“差别矫治”等,但是似乎都不能准确表达原文的含意,因此这里翻译为“因人施治”。——译注

发现,在预备性特别咨询组织(Pilot Intensive Counseling Organization, PICO)计划中,咨询员将犯罪人分为适合矫治组和不适合矫治组,然后将他们安排在矫治组和对照组。那些不适合矫治的犯罪人参加矫治后,情况变得比那些没有参加矫治的对照组的人更糟;但是,适合矫治的青少年犯罪人参加矫治后,所进行的累犯行为比他们的对照组更少。尽管无法清楚地界定“适合矫治”的含意,但是,亚当斯发现,适合矫治的青少年犯罪人智力较高、表达清楚、焦虑,有转变的愿望。对治疗社区的结果研究发现,那些对矫治产生积极反应的人,都有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具有情绪表达丰富、焦虑、自责、一定的社交能力、坚持矫治等特征。相反,矫治不成功的犯罪人个也可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例如,归罪外界、攻击性、自我损害、累犯。这种研究结果与这样的普遍观点相一致,即心理矫治的对象如果在开始时心理比较健康,那么,不管使用什么矫治方法,他们都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结果。尽管人们对什么犯罪人适合于矫治的问题一直缺乏研究,但是,通常认为病态人格是不适合于进行矫治的。

矫治人员因素可能是同样重要的。弗兰克(J. D. Frank, 1985)指出,矫治人员的人际关系技能对任何矫治都是很重要的;有关犯罪人干预(包括行为计划)的一些研究发现,矫治人员因素对矫治结果的影响同矫治方法一样大。格兰特(J. D. Grant)和格兰特(M. Q. Grant)报告说(1959),在埃里奥特矫正营计划(Camp Elliott project)中,发现犯罪人和矫治人员特征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关系,犯罪的海军军人要接受长达9个星期的特别集体治疗(intensive group therapy),与此同时在封闭性生活单元中受到监督。根据人际成熟水平进行的分类,比较成熟的犯罪人更有可能在6个月的追踪研究期间返回原岗位执勤。但是,在人际成熟水平与监督员(supervisor)的效率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比较成熟的犯罪人与比较有效率的监督员相处时情况会更好一些。有效的监督员是那些不太专制、但是有较高的人际技能的监督员。其他研究也发现,“严格而公正的”矫治人员会对犯罪人产生更有利的影响。

一些研究涉及了多样化的犯罪人特征、矫治方法和矫治环境。许多相关的研究使用了人际成熟水平分类,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青年管理局社区矫正计划中提出的人际成熟水平分类。在开始阶段,把对少数假释人员实行的特别社区监督和矫治与矫正机构监禁相比较,在下一个阶段考察社区监督之后的初步居住安置(initial residential placement),产生的结果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些结果也表明,对神经症型少年犯罪人(人际成熟水平4)进行社区监督的效果较好,把追求权力型青少年(人际成熟水平3)安置在矫正机构比较好。不过,社区矫正计划因为在咨询员报告重新犯罪时存在偏见而受到批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其他研究,探讨了人际成熟水平与不同矫正机构安置之间的关系。杰斯内斯(C. F. Jesness, 1971)报告了普雷斯顿研究(the Preston study)的情况。这项研究是一项实验性矫治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根据人际成熟水平分类的结果,把青少年犯罪人分配在具有不同矫治目标的单元中,结果发现,矫治活动对假释违规行为没有什么效果,而对安置在矫正机构内的青少年犯罪人比较有效。不过,奥斯丁(R. Austin, 1977)对数据的再次分析显示,被安置在精神病治疗单元的人际成熟水平3和人际成熟水平4的青少年,其累犯行为有所减少。这一结果支持因人施治的观点。杰斯内斯(1975)在对提供相互作用分析治疗和行为矫正治疗的矫正机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也发现矫治效果因人际成熟水平的不同而有区别。在两种矫正机构中,焦虑型犯罪人和潜意识显露—神经症型犯罪人(人际成

熟水平4)的失败率最低,但是,未社会化的被动型犯罪人(人际成熟水平2)对行为矫正治疗的反应较好,而操纵型犯罪人(人际成熟水平3)对相互作用分析治疗的反应较好。

些研究使用了奎伊(H. C. Quay)的行为分类,在一项研究中,将青少年犯罪人安置在两个机构中:一个是肯尼迪青少年中心(R. F. Kennedy Youth Center),在这个中心实行实验性矫正计划;另一个是一所传统的矫正机构。在肯尼迪青少年中心,实行代币强化法,所有的犯人都受到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对不同小组的犯人树立不同的矫治目标,使用不同的矫治方法。例如,对神经症型少年犯罪人提供咨询,对精神病态者进行行为矫正。然而,3年的追踪研究没有发现实验性矫正计划具有减少累犯的效果,也没有发现实验性矫正计划对哪一类犯罪人有效果。另一方面,奎伊的维度预测了在一项转向研究中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1977),奎伊和洛夫(C. T. Love)将少年犯罪人分为两组:一组是实验组,对其中的少年犯罪人提供职业和个人咨询;另一组是对照组。结果发现,不管进行哪一类干预,精神病态性青少年和神经症性青少年都更有可能因重新犯罪而被逮捕。

在概念水平上(见第三章)对患者和治疗者进行匹配,可以改善心理治疗的临床效果;将学生与教学活动进行匹配,同样会提高教育成绩。莱希德(A. W. Leschied)和托马斯(K. E. Thomas)获得的证据表明(1985),将少年犯罪人的概念水平与矫正计划的结构进行匹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有组织的居住式矫治(structured residential treatment)中,“难以适应的”青少年在完成矫治计划后的1年时间内,被指控的次数明显减少,重新监禁率也比实行传统安置的少年犯罪人低。

人们很少关注成年犯罪人和少年犯罪人的矫治匹配问题。但是,安尼斯(H. Annis)和钱(D. Chan)报告的一项研究中(1983),对年轻男性成年犯罪人进行了经验性分类。有吸毒和酗酒问题的犯罪人被随机地分配在两个小组中:一个是实验组,对其中的犯罪人进行深入的对抗性集体治疗(confrontational group therapy);另一个是对照组。在为期1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实验性矫正计划总体而言对累犯没有效果。不过,在矫治安排与根据自尊和人际量度进行的分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作用。自我意象较好、信用较差的犯罪人接受矫治后被判处重罪的数量少于那些情况类似、但是没有接受矫治的犯罪人;而那些自我意象较差、对别人冷漠的犯罪人接受矫治后,情况变得更坏。就像对预备性特别咨询组织(PICO)进行研究的结果那样,这些研究结果强调,需要区分适合于接受特定矫治的犯罪人与适合于进行其他安排的犯罪人。

由于对实施了不同类型矫治或者配备了不同类型矫治人员的犯罪人进行的交叉研究很少,因此,几乎无法区分究竟哪一类犯罪人适合哪一类干预措施,也无法区分究竟由哪一类矫治人员适合对哪一类犯罪人进行矫治活动。不过,因人施治的逻辑是恰当的。安德鲁斯(D. A. Andrews)、邦塔(J. Bonta)和霍格(R. D. Hoge)认为(1990),完全可以根据犯罪人对矫治方法的不同反应提出一些基本准则。例如,那些认知和人际成熟水平低的犯罪人、需要高度组织性的矫治计划;而那些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认知和人际技能的犯罪人,则适合非指导性的、无组织性的矫治方法。

三、成功的矫治计划的特点

有效的矫治活动不仅依赖于干预技术和犯罪人、矫治人员的特征,而且也依赖于开展矫治活动的条件。例如,资源缺乏和矫治人员没有受过适当训练,会使矫治活动无法恰当

地进行,而刑罚系统本身的特征也会构成有效开展矫治活动的障碍,例如,不能保证优先开展矫治活动、独裁式管理,缺乏多学科、多部门之间的交流。有3种因素是成功的矫治活动所必需的,即干预地点、干预目标、转化模式。

许多矫治计划是在矫正机构内进行的,但是,许多人认为矫正机构并不是转化犯罪人的最佳环境(optimal setting)。例如,罗斯(R. R. Ross)和普赖斯(M. J. Price)指出(1976),监狱的社会气氛和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妨碍行为矫治计划的成功实施。一种相关的观点认为,对反社会行为最有力的影响是目前的环境,因此,累犯行为与释放后环境的联系,要比在监禁期间对犯罪人所做的工作密切得多。不过,这种观点忽略了犯罪人对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在矫正机构内实施的一些矫治计划,在减少累犯方面获得了成功,而一些社区矫正计划却在这方面遭到了失败。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80b)发现,矫正机构内实施的矫治计划和社区矫正计划的失败,往往有类似的原因,例如,矫治人员对行政管理资源缺乏控制,主要转化人员(primary change agent)缺乏转化动机或者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无法控制其他影响来源(包括同辈群体、许多越轨活动本身的强化价值)。尽管最近的一些资料支持社区矫正计划,但是,如果犯罪人不会遇到或者能够避免有关同辈朋友、家庭或者工作方面的问题,那么,矫治机构内实施的、培养犯罪人应付技能的矫治计划,对许多犯罪人都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成功的矫治计划也依赖于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矫治目标。犯罪心理学的观点通常不承认疾病模式,但是,大多数矫治计划却围绕个人缺陷(personal inadequacy or deficit)进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有关个人缺陷的假设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犯罪人仅仅是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条件做出反应的人,而犯罪人在学业、人际关系和认知技能方面的缺陷显然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特征(见第八章)。但是,许多矫治计划涉及的是那些与犯罪行为关系不明确的因素。例如,监狱中通常进行的职业培训,往往与就业市场无关,监狱中的培训不涉及犯罪人可能遇到的就业安置问题。同样,当许多犯罪人都没有适合于进行心理动力学咨询的神经症问题时,不加区别地对许多犯罪人使用心理动力学咨询是不恰当的;而且,对于一些犯罪人而言,进行这样的咨询反而会产生有害的效果。再如,许多行为矫治计划矫治的那些行为,是与通常的犯罪行为无关的一些行为(见第十三章)。人们经常忽略的一个相关问题是,矫治人员的目标是否与接受矫治的犯罪人的目标相一致。

人们没有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干预基础的**转化模式**(model of change),这种模式基本上取决于某种犯罪行为理论。成功的标准通常是矫治之后所要终止的东西,以后发生的犯罪行为被看成是矫治计划的失败。不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种观点与治疗传染病的医学模式类似,根据这种医学模式,首先采取治疗措施,然后等待“痊愈”。对于一些犯罪人来说,重新犯罪的预防与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模式相似,例如,就糖尿病治疗模式而言,在初步治疗后还需要继续采取干预措施。这一原理完全适用于预防性犯罪人重新犯罪的方法。齐格勒(E. Zigler)和霍尔(N. W. Hall)也指出(1987),早期干预的成功取决于持续不断地增强效果,而不取决于“预防接种”。

尽管一些人对矫治计划持悲观的态度,但是,有关矫治结果的文献中包含了一些成功的犯罪人矫治计划所必需的程序和目标。安德鲁斯(D. A. Andrews)、邦塔(J. Bonta)和霍格(R. D. Hoge)指出(1990),成功的矫治计划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这样的矫治计划是由那些“严格但公正”地行使权威的矫治人员实施的,矫治人员塑造和强化反犯罪的

价值观, 这样的矫治计划针对那些促成犯罪行为特征而实施, 例如, 亲犯罪态度 (procriminal attitude)、病态人格特质、犯罪朋友, 这样的矫治计划会使用以认知和社会学习原理为基础的问题解决程序。同时, 矫治计划需要与犯罪人的特征相匹配。特别重要的是, 累犯危险性 (risk of recidivism) 程度应当决定所提供的服务的程度, 应当给高危犯罪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 由于犯因性需要 (criminogenic need) 影响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 应该由犯因性需要决定所提供的服务的目标。最后, 犯罪人的反应性 (responsivity) 应当指导矫治方法的选择。可以根据人际成熟水平或者概念水平这样的分类指导矫治方法的选择, 但是, 人们假设, 在选择矫治方法时尤其应该考虑这样一些因素, 例如, 认知性人际技能、焦虑、精神病态、寻求刺激、转化动机 (motivation for change)、社会支持。

第五节 刑事司法系统心理学家的角色冲突和伦理问题

在犯罪人的生活中进行干预的心理学家, 面临着一些角色冲突和道德困境。在任何组织中就业都意味着应该接受这个组织的目标, 但是, 刑事司法系统的惩罚、监禁和矫正目标往往是不相容的。例如, 报应可能需要监禁刑, 但是, 最好的矫治措施可能是将犯罪人安置在家庭或者在工作中进行矫治。尽管心理学家的目标通常是帮助犯罪人, 但是, 他们的职业责任却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接受他们服务的犯罪人的利益和福利看得高于一切”, 他们同时也是把社会控制作为首要目标的刑事司法系统的雇员。社会控制是监狱的一项明确的任务, 但同时也是收治精神障碍犯罪人的机构的一项潜在任务。因此, 道德困境围绕“谁是矫治对象”这样一个问题产生。在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也产生类似的问题, 不过, 当关系到个人的自由时, 这个问题变得特别尖锐。

应用于犯罪人的心理转化模式, 是从精神卫生和教育领域中引进的, 但是, 严厉的监禁环境极大地束缚了心理服务工作的进行。在刑事执行机构, 安全和控制的需要与心理学家的矫治优先性之间, 产生严重的冲突; 那些尝试引入新颖的矫治计划的努力, 往往遇到矫正机构的惯性、矫正人员的保守和敌视态度的阻挠, 一般都用折衷的方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不是优先考虑矫治活动, 他们经常持一种简单化的道德观念, 即犯罪人是不“值得”帮助的, 或者认为矫治活动是一种软弱的选择, 这种道德观念可能会妨碍心理学家的努力。例如, 科西尼 (D. B. Corsini) 和米勒 (G. A. Miller) 发现 (1954), 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不能保证犯人参加矫治活动, 这个问题目前在一些矫正机构内仍然存在。对破坏性犯罪人的矫治措施, 也可能符合监狱管理的目标。例如, 对企图自杀或者伤害的犯人的危机干预, 就是在转化犯人的同时, 转变矫正机构的条件, 使这些条件变得更加适宜。

一个常见的伦理问题是犯罪人向心理学家 (而不是向别人) 提供的信息的机密性 (confidentiality) 问题。临床医生有权保守这些信息的机密性, 但是, 是否有绝对的机密性, 则是有疑问的。例如, 在一种多学科的环境中, 心理学家的职业要求是与别人分享信息。而且, 尽管令人沮丧的是美国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欢迎塔拉索夫裁决 (tarasoff decision, 见第十二章), 但是, 警告有危险的第三方的义务却是与职业行为规范相一致的。例如, 英国心理学会 (1985) 要求心理学家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保守机密性, 但是也承认,

当患者或者其他人的安全或者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有例外。可以通过提前向患者声明机密性的限度来避免这个领域的困境。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任何需要心理学家向法庭提供有关犯罪人的报告的情境。

一个长期存在的道德困境是，对强制性扣押的人进行的干预，究竟是为了维护扣押机构的利益，还是为了维护社会或者犯罪人的利益？一个问题涉及到强制的潜力，一些心理学家不愿意接受法庭指定的矫治安排，因为这种矫治并不是以犯罪人的自愿为基础的。鲁滨逊（N. Robinson, 1974）认为，行为科学家没有理由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对非自愿的患者适用的心理治疗，应当仅限于那些有身体危害性的人，或者限于那些要求获得帮助的人。他认为，其他人享有“不能进行转化的权利”。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强制性疗法作为一种比较轻微的“恶”来使用，因为这种“恶”小于失去生命或者终生监禁这样的“恶”。不过，还不清楚的是，为什么那些有身体危害的人不享有这样的权利，即使他们可能丧失了自由权。

科学与社会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1981）倡议，只有在诊断出某种“公认的障碍”，并且也只有当有利于个人而不是有利于机构时，才能使用对个人的自主性有影响的强制性疗法。这是一种过分狭窄的医学观点，它忽略了个人自主性往往受到不属于疾病的心理压力或者心理功能障碍的限制的事实。例如，人格障碍是犯罪人中很常见的一类问题，但是，它们并不是一类具体的疾病。在正常情况下，心理治疗需要有事实根据的同意，需要有求治愿望的患者的参与，而对被判刑罪犯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矫治条件。问题在于，必须要从诉说中推测出个人具有转化动机，但是，无法搞清楚的是，犯罪人究竟是想避免重复其行为，还是想避免再次被定罪判刑。不过，自愿（voluntariness）并不是绝对的，这个问题原则上不同于人们为了解决威胁他们的工作或人际关系而寻求帮助时产生的问题。

不过，当人们把“问题”（problem）看成越轨行为本身时，对心理问题（psychological problem）的界定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干预的目标可能是某种特定的观念或价值体系。把矫正说成是一种慷慨的、帮助犯罪人获得自由的事业的花言巧语，掩盖了这样的矛盾，即矫正是一种旨在转化犯罪人、使其遵守占优势的的社会规范的措施。从事这种矫正工作的人认为，这些社会规范是得到社会公认的，但是，接受矫治的犯罪人可能并不赞同这些社会规范。为了预测危险性或者假释结果而进行的评价，也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进行的；对矫正机构内的犯人进行的干预，同样可能是为了实现矫正机构的目标而进行的。这样，问题就变成了“谁有问题？”识别社会谴责的行为，把这种行为作为矫治的目标，这是不加区别地把心理异常等同于社会越轨行为，这意味着所有犯罪，包括“政治性”犯罪和无被害人犯罪，都是对心理学家有利的事情。这很明显是一种思想观念，那些把社会控制当做自己的首要职责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不仅要冒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风险，而且可能会与不公平的法律和压制性政权沆瀣一气。

相反的立场认为，服从（compliance）决不是干预的目标，累犯或者矫治机构适应也不是心理矫治的恰当的结果目标。不过，布罗德斯基（S. L. Brodsky, 1980）注意到，这种观点本身是一种价值驱动观点（value-driven position），任何疗法能否避免给人们强加价值观是值得怀疑的。而且，限制向犯罪人提供旨在帮助他们度过监禁痛苦的帮助，那么，就会容忍“良性的监禁”（benign warehousing）。实际上，帮助犯罪人的尝试不可避免地要

考虑犯罪人未来的福利。尽管与社会的冲突本身并不是进行心理干预的一种恰当理由,但是,当心理障碍或者心理缺陷限制了个人的行为选择时,就可以提供心理矫治服务。在美国,一些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犯罪人既有接受心理矫治的权利,也有拒绝心理矫治的权利。正如费尔德曼(M. P. Feldman)和皮伊(J. Peay)指出的(1982),心理学家可以保留他们作为患者的代理人而不是国家的代理人的传统角色,关注犯罪人的问题,而不是关注犯罪人对他人造成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宣布放弃对刑事司法系统的责任,而是把犯罪人、矫正机构和社会都作为自己的患者(client),但是在时间优先性方面有所不同。

尽管在与原则发生冲突时会产生道德困境,而且也很少有绝对的意见一致或者解决方法,但是,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一些专业人员的赞同。费尔德曼和皮伊(1982)指出,在决定增加、维持或者取消行为矫治方法时,应当优先考虑患者,这一点只有通过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同意才能实现。只有当一位患者的利益对另一位患者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些利益并不一致时,这些指导原则才能发挥最大的益处和产生较小的害处,应当充分关注那些受问题行为的消极影响最深的人们的利益。最后,应当通过外部审查机构监督专业人员的活动。这些指导原则似乎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心理干预。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所属的心理学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作用专门小组,已经制定了一套更加一般性的伦理原则体系,这组原则体系涉及了评价、专业能力、服务评估、预测、矫治和训练等内容。

心理学家可以把自己的角色限定为很安全的治疗者、管理者或研究者的角色,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没有价值冲突的刑事司法环境中的角色,或者说心理学家是否可以既充当犯罪人的代理人,又充当社会的代理人这种模棱两可的角色,是值得怀疑的。布罗德斯基(S. L. Brodsky, 1972)提出,心理学家的角色在系统专业人员—系统挑战者这样一个连续统上变化,系统专业人员(system professional)把犯罪人的服从和自我控制作为干预的首要目标,不怀疑矫治工作是为社会服务,寻求通过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而对刑事司法系统产生影响,系统挑战者(system challenger)认为犯罪人的问题是在社会剥夺和社会歧视环境中产生的,认为不论是专业人员的目标还是专业机构的目标对犯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他们努力消除那些可能有害的因素。这些角色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许多心理学家努力在这些角色之间维护一种平衡。布罗德斯基注意到,无论是专职的对个别犯罪人开展工作的心理学家,还是那些激进的主张解散一些矫正机构的心学家,都不可能满足犯罪人的广泛的利益。相反,应该需要多种目标和义务,承认心理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心理学家而言,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认识刑事司法和行为问题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

后 记

在初步经历了北京的酷暑之后，本书终于翻译完毕。作为译者，应当对有关问题做一些介绍。

本书作者罗纳德·布莱克本(Ronald Blackburn)是英国资深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犯罪心理学家。1938年10月20日出生，先后在剑桥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方面的学士学位(1961)和硕士学位(1966)、伯明翰大学科学硕士学位(生理学和行为方面)、南安普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3)，博士论文的题日是《变态犯罪人中的冲动性研究》。先后在阿伯丁大学任临床心理学高级讲师、临床心理学硕士课程主任，利物浦帕克路医院(Park Lane Hospital)心理学主任，阿什沃思医院(Ashworth Hospital)研究部主任，利物浦大学临床和司法心理学研究教授，目前是该校荣誉退休教授。布莱克本教授是多家学术团体的成员，多家学术刊物编委会的委员，目前担任英国心理学会《法律与犯罪心理学》(*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杂志的主编。除了本书之外，布莱克本教授参加了20多本书的写作，其中包括《法律领域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Psychology in Legal Contexts*, 1995)、《严重犯罪危险的心理学探讨》(*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rious Criminal Risk*, 1999)等；还发表了10多篇有关司法心理学、精神病态、人格障碍等方面的论文。

本书可以说是在新中国翻译的第一本内容全面、论述深入的真正的犯罪心理学著作。从内容的全局性来看，本书涉及的内容既有犯罪心理学理论，又有犯罪心理学实践；既有作者自己的研究，更有大量其他学者的探讨，仅从所编制的《英汉人名索引》来看，涉及的人物就有2200多名。从论述深度来看，本书对犯罪心理学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对许多在以往的一些犯罪心理学书籍论述不多的内容，也做了比较深入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与犯罪学说，艾森克的犯罪心理学理论，晚近发展起来的整合理论等。之所以说本书是“第一本真正的犯罪心理学著作”是因为，我们曾经翻译过一本英文的犯罪心理学著作，即由周嘉桂翻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汉斯·托奇的《司法和犯罪心理学》¹。这本译著在我们了解西方犯罪心理学研究方面，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并不是一本专门的犯罪心理学书籍，其中的部分章节用来论述司法心理学的其他一些分支学科的内容；同时，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太早，资料比较陈旧；此外，这本书是一本多人编写的著作，全书风格不统一，一些章写得不太好。后来，托奇教授给吴宗宪寄来了这本书的新版本《犯罪和刑事司法心理学》²，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在国内翻译出

1. Hans Toch(1961), *Legal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2. Hans Toch(1986), *Psychology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版,现在,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总算使我们看到了第一本由一位作者独立撰写的、全书风格统一的犯罪心理学著作。

在本书的翻译中,根据中国读者的习惯,对体例做了适当编排。在原书中没有“章”、“节”、“目”这样的标题字样,我们在翻译时根据原文中不同层次的标题,在译文中列出了相应的标题。同时,在原文的一些章中,在相当于“节”的标题和下一级标题之间,往往有很长一段论述,但是,没有加上标题,对此,我们增加了“概说”这样的标题,使译文的编排更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

本书的翻译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这种艰巨性突出地表现在下列方面:第一,本书中涉及大量新颖的心理学方法、心理学理论、心理治疗、心理学概念,但是,这些方面的内容国内心理学界介绍不多,许多名词在有关的专著、教材和辞书中根本查不到。第二,本书虽然是一本犯罪心理学著作,但是,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哲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科学、医学等很多学科,为此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学科的书籍,但是,对于其中的许多新内容、新发展,国内同样缺乏介绍。第三,本书的行文有自己的特色,为了论述的完整、严谨,长句子、从句使用得特别多,这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第四,本书中出现大量犯罪心理学的新术语,过去从未翻译过,没有现成的译名可以参考,迫使我们不得不自己确立许多新的译名。一个新译名的确立,十分劳神费力,而且往往在长时间斟酌之后还无法确定下来。第五,现有译名的取舍也需费力思考。在我国,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对同样的英文术语有不同的译法,例如,对 *mental health* 一词,心理学界翻译为“心理健康”,而精神病学界可能翻译为“精神健康”或“精神卫生”等。这种现象既给不懂英文的读者造成了理解困难,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一定困难,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择善而从。例如,在翻译心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术语时,一般选择心理学界的译名;而在翻译与临床关系密切的精神治疗、精神药物等内容时,大多选择精神病学界的译名。

就一般犯罪心理学著作的翻译而言,一些术语的翻译也是很困难的。在本书的翻译中,我们注意了下列术语的翻译问题:

1. **treatment**. 这个词在医学和心理学、精神病学中的本意就是“治疗”。在我国,将对一般人的 *treatment* 翻译为“治疗”;而在监狱系统中,将那些针对犯罪人进行的心理治疗工作称之为“罪犯心理矫治”,其中的“矫治”实际上就是 *treatment*。由于本书的作者没有严格区分治疗对象,都使用这个词;在翻译过程中,很多时候难以辨别治疗对象究竟是犯罪人还是守法者;此外,从医学、心理学上的“治疗”而言,区分犯罪人或者守法者,意义并不很大。因此,我们一般都将这个词翻译为“治疗”。不过,在一些可以确定治疗对象是犯罪人的情况下,也翻译为“矫治”。
2. **patient 和 client**.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病人”、“患者”,用来指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人,其中既有普通人、也有犯罪人。为了统一和方便期间,一般都将它们翻译为“治疗对象”。
3. **rehabilitation**. 这个词在医学中的含义是“康复”;但是,目前在英文文献中广泛用于犯罪人,而且词义有一定变化。一般将这个词翻译为“矫正”,偶尔也翻译为“改造”。
4. **variable**. 这个词在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中通常译为“变量”。但是,在本书中,考虑到犯罪心理学领域读者的习惯,大多译为“因素”。
5. **criminality**. 这个词有两种意义:一是指“犯罪性”,即个人进行犯罪行为心理倾

向：二是指个人进行的犯罪行为。但是，人们往往在两种意义上交替使用这个词，本书也不例外。因此，在翻译中注意进行了辨别。

6. **subject**. 这个词在心理学（特别是实验心理学）中一般译为“被试”，即研究对象，但是，在犯罪心理学中使用“被试”这个术语，会使很多读者感到不习惯。因此，能够译为“研究对象”或者“犯罪人”、“罪犯”的，尽量不用“被试”这个译名。但是，根据文中的信息难以确定其法律身份的，仍然译为“被试”。

翻译是一件语言和信息转换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信息流失的现象。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原书的信息，译者考虑并做了下列工作：

第一，保留了许多术语、名词的英文原文，附在中文译名之后的括号中。这既是为懂英文的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便于他们通过英文原文理解中文译名是否恰当、是否正确；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促进未来的中外交流，使读者获得大量可以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的基本概念、术语。此外，这样做也有利于中文译名的统一，如果读者认为我们确立的译名可以接受，就在以后的翻译中使用，这样，就可以逐渐统一中文译名，促进学科的发展。

第二，保留了原文中提到姓的人物的姓名原文（名字缩写和姓），附在中文译名后面的括号中。这样，读者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观点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以往一些译著也注意了这个问题，但是其中仅仅保留了人物的姓，但是，英文中使用同样的姓的人物极多，如果不附上名字（或其缩写），除了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之外，很难确定究竟是指哪一个人。例如，在本书中，使用Miller（米勒）这个姓的人有8人之多，使用Wilson（威尔逊）、Williams（威廉斯）这两个姓的人都达9人之多，使用Smith（史密斯）这个姓的人有10人之多。如果译文中仅仅附上他们的姓，很难确定究竟是指哪一个人。

第三，保留了论著发表的年代。这个年代往往与论著的作者在一起，例如，肯纳德（D. Kennard, 1983），这意味着是指肯纳德1983年发表的论著；如果作者在同一年发表了多篇论著，也在年代之后注明，例如，布莱克本（R. Blackburn, 1975a），这意味着是指作者1975年发表的a这篇论著。根据原作者的姓名和论著年代，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在《参考文献》索引中查找到这篇文献，便于对有关问题作深入的研究。

第四，保留了《参考文献》索引的原文，这是翻译学术著作的正规做法，是给读者提供更多学术信息的必要途径。不附参考文献索引原文，会使原著的大量信息流失，当读者想进一步了解书中某个作者的有关研究时，不知道其论著的原名而无法查阅。同样，将参考文献索引全部译成中文而不保留原文，也是一种愚蠢的做法，面对这些翻译过来的中文名称，读者同样不知道其原著名称，无法进一步查阅和研究。

我们认为，在译著中保留必要的原文是合理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整本书中见不到一个外文名词（版权页上也不例外）的“译著”，如果是一本小说之类的文学名著，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是一本学术著作，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力图避免这样的缺陷。尽管保留一定原文可能会给一些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便，但是，与保留原文所产生的积极价值相比较而言，这种“不便”是微不足道的。

近年来，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应用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监狱系统中已经普遍对罪犯开展心理矫治，有一大批人员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罪犯改造和管理工作中的一个新的尝试，本书的出版无疑会为监狱系统的这些工作人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同时，在公安系统、检察和审判系统、司法精神病学系统、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犯罪预防系统以及普通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领域,对犯罪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应用逐渐增加,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为这些领域的人员提供新的信息和方法。

本书中文版序言、前言、第1~7章、第14~15章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吴宗宪研究员翻译,英汉人名索引也由吴宗宪编制;第8~13章由中国政法大學刘邦惠教授翻译。最后由吴宗宪校对了全文。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盛桂英、沈青、高文、周勇、张有成、张明虎、曹健、吴艳兰、杨生茂、刘辉、张之文、李红、吴宗香等协助做了部分工作,顺致谢意。

应吴宗宪之邀,布莱克本教授专门为本书中文版写来了《序言》,并且帮助解决了翻译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此向布莱克本教授致谢。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犯罪与矫正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罗大华教授是国内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热情为本译本写序,肯定了本书的价值。在此对罗大华教授表示谢意。

由于时间较紧、水平有限,译文中可能存在误译、错译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业内专家指正。

译 者

2000年6月30日于京西

人名索引

A

- Abbott, R. 艾博特
Abel, G. G. 艾贝尔
Abelson, R. P. 艾贝尔森
Abtman, R. 艾布特曼
Achenbach, T. M. 奥肯博克
Adam, N. A. 亚当
Adams, K. 亚当斯
Adams, R. 亚当斯
Adams, S. 亚当斯
Adler, A. 阿德勒
Adler, C. 阿德勒
Adler, F. 阿德勒
Agee, V. 艾吉
Ageton, S. 艾古顿
Ageton, S. S. 艾古顿
Agnew, R. 阿格纽
Agras, W. S. 阿格拉斯
Aiken, T. W. 艾肯
Ainsworth, M. D. S. 安斯沃斯
Ajzen, I. 阿齐
Akers, R. 艾克斯
Akers, R. L. 艾克斯
Akhtar, S. 艾克塔
Alderson, M. R. 奥尔德森
Aldrich, C. K. 奥尔德里奇
Alexander, J. F. 亚历山大
Alker, H. A. 阿尔克
Allan, E. A. 阿伦
Allebeck, P. 阿利贝克
Allen, F. A. 艾伦
Allen, J. V. 艾伦
Allison, T. S. 艾利森
Allsopp, J. F. 奥尔索普
Alston, J. F. 阿尔斯顿
Alston, W. P. 阿尔斯顿
Alterman, A. I. 奥尔特曼
Alvarez, M. 阿尔瓦雷茨
Ames, A. 艾姆斯
Amick, A. E. 阿米克
Amir, M. 艾米尔
Andenaes, J. 安德尼斯
Anderson, C. A. 安德森
Andrews, D. A. 安德鲁斯
Annis, H. 安尼斯
Annis, L. V. 安尼斯
Appelbaum, P. S. 阿佩尔鲍姆
Arbit, J. 阿贝特
Arbolada-Flórez, J. 阿伯莱德-弗洛里茨
Arbuthnot, J. 阿巴思诺特
Arias, I. 阿里亚斯
Armentrout, J. A. 阿门特劳特
Armstrong, J. S. 阿姆斯特朗
Arnikoff, D. B. 阿恩科夫
Arnold, K. D. 阿诺德
Aronfreed, J. 阿伦弗雷德
Asarnow, J. R. 阿萨诺夫
Asberg, M. 阿斯伯格
Ashurst, B. 阿舍斯特
Asu, M. E. 阿苏
Atkeson, B. M. 阿特克森
Atwater, J. D. 阿特沃特
Auerbach, S. M. 奥尔巴克
Aultman, M. G. 奥尔特曼
Austin, J. 奥斯丁
Austin, R. 奥斯丁
Ausubel, D. P. 奥苏伯尔
Averill, J. 艾夫里尔
Avery-Clark, C. A. 艾弗里-克拉克
Ayllon, T. 艾伦
Azmitia, M. 阿茨米舍
B
Bachman, J. 巴克曼
Bachman, J. G. 巴克曼
Bach-Y-Rita, G. 巴赫-亚-丽塔
Bacon, J. G. 培根
Bacon, M. K. 培根
Baer, D. M. 贝尔
Bailey, S. L. 贝莱
Bailey, W. C. 贝利
Bain, J. 贝恩
Baker, S. L. 贝克
Bakkestrom, E. 巴克斯特罗姆
Balay, J. 巴莱
Balch, R. W. 巴尔奇
Balck, D. J. 布莱克
Baldwin, J. D. 鲍德温
Ball, J. C. 鲍尔
Ball, R. A. 鲍尔
Balla, D. A. 巴拉
Ball-Rokeach, S. 鲍尔-罗克齐
Bandura, A. 班都拉
Banister, P. A. 贝尼斯特
Barbarce, H. E. 巴巴利
Barbour-McMullen, J. 巴伯-麦克马伦
Barclay, L. C. 巴克利
Hardwell, R. 巴德韦尔
Barling, J. 巴林
Barlow, D. H. 巴洛
Barnett, R. M. 巴尼特
Barry, L. II. 巴里
Bartfai, A. 巴特非
Bartko, J. 巴特克
Bartol, A. M. 巴特尔
Bartol, C. R. 巴特尔
Bartollas, C. 巴特拉斯
Barton, C. 巴顿
Basta, J. M. 巴斯塔
Basu, G. 巴苏
Bates, M. 贝茨
Bates, M. E. 贝茨
Batta, I. D. 巴塔
Baxter, D. J. 巴克斯特
Baxter, S. 巴克斯特
Bazelon, D. L. 贝兹伦
Bean, P. 比恩
Beck, A. T. 贝克
Beck, S. 贝克
Becker, H. 贝克尔
Becker, J. M. T. 贝克尔
Becker, J. V. 贝克尔
Becker, W. C. 贝克尔
Beckett, G. E. 贝克斯特
Bedford, A. P. 贝德福德
Beidel, D. C. 贝德尔
Bell, C. R. 贝尔
Bell, R. Q. 贝尔
Bellak, A. S. 贝拉克
Bem, D. J. 贝母
Ben-Aron, M. H. 本阿伦
Bennett, T. 贝内特
Bennett, W. S. 贝内特
Bennight, K. 比纳特
Benning, J. J. 本宁
Bensch, M. 本施
Bentler, P. M. 本特勒
Benton, D. 本顿
Berah, E. F. 贝拉赫
Berger, L. S. 伯杰
Berk, R. E. 伯克
Berkowitz, L. 贝科威茨
Berlyne, D. E. 伯林

- Berman, A. 伯曼
Berman, T. 伯曼
Bernal, M. E. 伯纳尔
Bernard, T. J. 伯纳德
Bertilson, H. S. 伯迪森
Beyer, J. A. 拜尔
Beyleveld, D. 贝莱维尔
 德
Bhagat, R. 伯盖特
Bhaskar, R. 巴斯卡
Bickel, W. K. 比克尔
Binder, A. 宾德
Binder, R. L. 宾德
Biron, L. 升伦
Bishop, D. M. 比晓普
Bishop, D. V. M. 比晓普
Bistline, L. L. 升斯特林
Black, D. A. 布莱克
Blackburn, R. 布莱克本
Blacker, C. D. 布莱克尔
Blackman, D. E. 布莱克
 曼
Blackman, N. 布莱克曼
Blackshaw, L. 布莱克肖
Blader, J. C. 布莱德
Blair, C. D. 布莱尔
Blakely, C. H. 布莱克利
Blanchard, E. B. 布兰查
 德
Blashfield, R. K. 布兰施
 费尔德
Blasi, A. 布莱奇
Blaske, D. M. 布莱斯克
Blau, P. 布劳
Blau, T. H. 布劳
Bliss, E. 布利斯
Block, C. R. 布洛克
Block, J. 布洛克
Block, R. L. 布洛克
Block, R. 布洛克
Blom, G. E. 布罗姆
Bluglas, R. 布卢格拉斯
Blumstein, A. 布卢姆斯
 坦
Bodner, E. 伯德纳
Bohman, M. 博曼
Bohm, M. J. 博恩
Boker, W. 博克
Bolles, R. C. 博尔斯
Bolton, N. 博尔顿
Bonn, I. 伯恩
Bonta, J. 邦塔
Bonta, J. L. 邦塔
Borckoe, E. H. M.
Booraem, D. 布尔里姆
Boorse, C. 布尔斯
Borduin, C. M. 伯里英
Boren, J. J. 博伦
Boriskin, J. 鲍里斯金
Bornstein, P. H. 伯恩
 斯
Borstein, P. L. 博斯坦
Bose, C. L. 鲍斯
Boltouley, A. K. 博顿利
Bottoms, A. 博特姆斯
Bouchard, T. J. 布查德
Boucher, R. 鲍彻
Boucher, R. J. 鲍彻
Bouvy, H. 布维
Bowden, P. 鲍登
Bowie, S. I. 鲍伊
Bowlby, J. 鲍尔比
Bowman, P. C. 鲍曼
Box, S. 博克斯
Bradford, J. M. V. 布
 雷德福
Bram, P. F. 布雷恩
Braithwaite, J. 布雷思
 韦特
Brandon, A. D. 布兰登
Braukmann, C. J. 布
 朗克曼
Brennan, T. 布伦南
Breslow, N. 布雷思洛
Brewin, C. R. 布鲁因
Brian, S. 布莱尔
Bridges, C. I. 布里奇
Bridges, G. S. 布里奇
Brittan, R. P. 布里顿
Bryer, D. 布里泽
Broder, P. K. 布罗德
Brodsky, S. L. 布罗德
 斯基
Brody, S. R. 布罗迪
Bronner, A. 布朗纳
Broughton, R. 布劳顿
Brown, B. J. 布朗
Brown, D. 布朗
Brown, E. D. 布朗
Brown, H. I. 布朗
Brown, K. 布朗
Brown, S. E. 布朗
Brownell, K. D. 布朗
 尼
Brownell, K. D. 布朗
 乃
Brownfield, D. 布朗
 菲尔
Browning, J. J. 布朗
 宁
Brownmiller, S. 布朗
 米勒
Brunault, M. 布鲁诺
 特
Bry, B. H. 布莱
Bryant, E. T. 布赖恩
 特
Brynnar, J. 布里纳
Buchbaum, M. S. 布
 施
 鲍姆
Buikhuisen, W. 布
 克
 休
 森
Bukstel, L. H. 布
 克斯
 特
Bull, R. 布尔
Burch, P. R. 伯奇
Burchard, J. D. 伯
 查德
Burgess, A. W. 伯
 吉斯
Burgess, P. K. 伯
 吉斯
Burgess, P. W. 伯
 吉斯
Burgess, R. L. 伯
 吉斯
Burke, J. D. 伯克
Burke, M. J. 伯克
Burkhart, B. R. 伯
 克哈特
Bursak, R. J. 伯
 斯特
Burt, C. 伯特
Burt, M. R. 伯特
Burton, R. V. 伯
 顿
Busch, K. G. 布希
Busnman, B. J. 布
 什曼
Buss, A. H. 巴斯
Bussell, R. E. 巴
 塞
 尔
Butler, B. T. 巴
 特勒

C
Caaspi, A. 卡斯
 皮
Cadoret, R. J. 卡
 多
 莱
 特
Cage, R. 凯奇
Cairns, B. D. 凯
 恩斯
Calder, B. J. 考
 尔
 德
Callan, J. W. 卡
 伦
Calmas, W. 卡尔
 马斯
Carnae, K. 卡
 麦
 克
Camp, B. W. 坎
 普
Campbell, A. 坎
 贝尔
Candee, D. 坎
 迪
Canter, D. 坎特
Canter, R. L. 坎
 特
Cantor, N. 坎
 托
Caplan, N. S. 卡
 普
 兰
Carbonell, F. L. 卡
 本尼
Carey, G. 凯里
Caritto, M. 凯里
 雷
 奥
Cardile, J. M. 卡
 里
 希
 尔
Carnegie, J. 卡
 内
 基
Carney, F. L. 卡
 尼
Carpenter, Mary 卡
 彭
 特
Carrigan, P. M. 卡
 里
 根
Carroll, D. 卡罗
 尔
Carroll, J. S. 卡
 罗
 尔
Carson, D. 卡森
Carson, R. C. 卡
 森
Carter, D. L. 卡特
Carter-Saltzman, L. 卡
 特
 -
 萨
 尔
 茨
 曼
Catalano, R. P. 卡
 塔
 拉
 诺
Cattell, R. B. 卡
 特
 尔
Cauthen, N. 考
 森
Cavior, H. E. 卡
 维
 尔
Cernkovich, S. A. 卡
 考
 维
 奇
Chaiken, J. M. 查
 肯
Chaiken, M. R. 查
 肯
Chamberlain, P. 钱
 伯
 林
Chambers, J. 钱
 伯
 斯
Chandhiss, W. 钱
 布
 利
 斯
Chan, D. 钱
Chandler, M. 钱
 德
 勒
Chaplin, T. C. 查
 普
 林
Chapman, A. J. 查
 普
 曼
Chappell, D. 查
 佩
 尔
Chess, S. 切
 斯
Child, J. 蔡
 尔
 德
Chilton, R. J. 奇
 尔
 顿
Chiswick, D. 奇
 斯
 维
 克
Christensen, L. R. 克
 里
 斯
 坦
 森
Christiansen, K. O. 克
 里
 斯
 琴
 森
Christie-brown, I. R. W. 克
 里
 斯
 蒂
 布
 朗
Christjohn, R. D. 克
 里
 斯
 特
 江
Cibin, S. 西
 贝
 里
Clanon, T. L. 克
 兰
 诺
Clark, J. P. 克
 拉
 克
Clark, J. A. 克
 拉
 克

- Clark, M. 克拉克
 Clarke, R. V. G. 克拉克
 Clarkson, F. 克拉克森
 Claster, D. S. 克拉斯特
 Clecklev, H. 克莱克利
 Clemente, A. 克莱门特
 Ciemmer, D. 克莱门特
 Climent, C. 克莱门特
 Clinard, M. B. 克林纳德
 Clingempeel, W. G. 克林格姆皮尔
 Cloninger, C. R. 克洛宁格
 Cloward, R. A. 克洛沃德
 Coates, T. 科茨
 Coccaro, E. 考克拉
 Cochran, R. 科克隆
 Cocozza, J. J. 科克扎
 Cohen, A. K. 科恩
 Cohen, H. L. 科恩
 Cohen, J. 科恩
 Cohen, L. E. 科恩
 Cohen, M. 科恩
 Cohen, M. L. 科恩
 Cohen, R. 科恩
 Cold, J. 科伊德
 Cold, J. 科伊德
 Colby, A. 科尔比
 Coleman, T. E. 科尔曼
 Collingwood, T. R. 科林伍德
 Collins, J. J. 柯林斯
 Collins, S. 柯林斯
 Colman, A. D. 科尔曼
 Colman, A. M. 科尔曼
 Colvin, M. 科尔文
 Como, P. G. 科莫
 Conaway, L. P. 科纳韦
 Conger, R. D. 康格
 Connolly, K. 康诺利
 Connor, R. 康纳
 Conrad, S. R. 康拉德
 Convit, A. 康维特
 Cook, P. J. 库克
 Cook, I. D. 库克
 Cooke, D. 库克
 Cooper, B. 库珀
 Cooper, H. M. 库珀
 Cooper, P. J. 库珀
 Cooper, R. P. 库珀
 Copas, J. B. 科珀斯
 Copeland, T. F. 科普兰
 Cormier, C. A. 科米尔
 Cornish, D. B. 科尼什
 Corsini, D. B. 科西尼
 Cortés, J. B. 科蒂斯
 Costa, P. T. 科斯塔
 Costin, F. 科斯坦
 Couch, A. S. 库奇
 Coulthard, R. 库尔特哈德
 Court, J. H. 考特
 Couture, M. 考彻
 Cowie, J. 考伊
 Cowie, V. 考伊
 Cowles, M. 考尔斯
 Cox, D. N. 考克斯
 Cox, M. 考克斯
 Craft, M. 克拉夫特
 Crandall, P. 克兰多尔
 Crawford, D. A. 克劳福特
 Crellin, M. C. 克雷林
 Crepault, C. 克雷波尔特
 Cressey, D. R. 克雷西
 Critchlow, B. 克雷奇洛
 Crombag, H. F. M. 克罗姆贝格
 Cropley, A. J. 克罗普利
 Crow, I. 克劳
 Crowe, R. R. 克劳
 Cullen, F. T. 卡伦
 Cummen, A. J. 坎宁
 Cunningham-Rathner, J. 坎宁安-拉思纳
 Curren, L. 柯里恩
 Curtis, E. W. 科蒂斯
 Curtis, L. A. 科蒂斯
 Cusson, A. 卡森
- D**
- D'Agostino, R. B. 达戈斯蒂诺
 d'Orban, P. T. 道本
 Dzurilla, T. 德泽瑞勒
 Dahlin, Y. 达林
 Daitzman, R. 戴兹曼
 Dale, M. W. 戴尔
 Dalgaard, O. S. 达尔加德
 Dalton, K. 多尔顿
 Daniels, D. 丹尼尔斯
 Dantrock, J. W. 丹特洛克
 克
 Daum, J. M. 多姆
 Davidson, R. A. 戴维森
 Davidson, W. S. 戴维森
 Davies, P. 戴维斯
 Davies, W. 戴维斯
 Davis, C. 戴维斯
 Davis, G. E. 戴维斯
 Davis, H. M. 戴维斯
 Davis, J. C. 戴维斯
 Davis, S. K. 戴维斯
 Davison, G. C. 戴维森
 Day, D. 戴
 Day, J. M. 戴
 Day, L. E. 戴
 De Burger, J. 德伯格
 Deardorff, P. 迪尔多夫
 DeBaryshe, B. D. 德巴塞
 Deffenbacher, J. L. 德芬贝奇
 DeFleur, M. C. 德夫洛
 DeRosario, M. L. 迪尔罗萨里
 DeJong, J. 德琼
 Dekker, J. 德克尔
 Delgado-Escueta, A. V. 德尔格得-艾斯库塔
 Dell, S. 德尔
 Deluty, R. H. 德卢提
 Denim, P. M. 戴姆
 Denburg, T. F. V. 邓伯格
 Desai, B. T. 德塞
 DeSoto, C. B. 德萨托
 DeVries, H. 德里斯
 Dickey, R. 迪基
 Diener, E. 迪尔纳
 Dietrich, S. G. 迪特里希
 Dietz, P. 迪茨
 Dillehay, R. C. 迪尔赫
 Dillon, M. 狄龙
 Dinitz, S. 迪尼茨
 Dishion, T. 迪希恩
 Dishion, T. J. 迪希恩
 Disson, J. E. 迪逊
 Divorski, S. 迪沃斯基
 Dixon, N. F. 迪克逊
 Dobash, R. E. 多巴士
 Dobash, R. P. 多巴士
 Dodd, J. 多德
 Dodder, R. A. 多德尔
 Dodge, K. A. 道奇
 Dollard, J. 多拉德
 Dombrose, L. A. 多姆布罗斯
 Donahoe, C. P. 多纳霍
 Donnerstein, E. 唐纳斯坦
 Donnerstein, E. I. 唐纳斯坦
 Donovan, D. M. 多诺万
 Doob, L. 杜布
 Dooley, E. 杜利
 Dorus, E. 多拉斯
 Douglas, J. 道格拉斯
 Douglas, J. E. 道格拉斯
 Douglas, J. W. 道格拉斯
 Dowds, E. A. 多兹
 Dowds, L. 多兹
 Drabman, R. S. 德拉布曼
 Draguns, J. 德莱因
 Draguns, J. G. 德莱因
 Dreher, R. H. 德莱赫
 Dreifuss, F. 德莱夫斯
 Drinkwater, J. 德林克沃特
 Duguid, S. 杜古德
 Dunford, F. W. 邓福德
 Durklak, J. A. 德科拉克
 Durlak, J. A. 德拉克
 Dutton, D. G. 达顿
- E**
- Earls, C. M. 伊斯
 Eastwood, L. 伊斯伍德
 Ebbsen, E. B. 埃布森
 Ebbsen, E. 埃布森
 Eber, H. W. 埃伯
 Edibel, S. E. 艾迪比尔
 Edelbrock, C. S. 埃德尔布洛克
 Edmondson, A. C. 埃德蒙森
 Edwards, G. 埃德华兹
 Edwards, J. A. 埃德华兹
 Egeland, B. 埃格兰德
 Egeth, H. E. 埃格斯
 Ehrenkranz, J. 埃伦克兰茨
 Ehrlich, I. 埃里希

- Eisen, M. 艾森
Eisenberg, N. 艾森伯格
Eisler, R. M. 艾斯勒
Elder, G. H. 埃尔德
Elderkin, R. 埃尔德金
Elifson, K. W. 埃里夫森
Elliot, D. 埃利奥特
Elliott, D. S. 埃里奥特
Elliott, F. A. 埃里奥特
Ellis, A. 埃利斯
Ellis, L. 埃利斯
Ellis, P. L. 埃利斯
Emery, R. E. 埃默里
Emler, N. 埃姆勒
Emshoff, J. G. 埃姆绍夫
Engel, G. L. 恩格尔
Ennis, B. J. 恩尼斯
Epps, J. 埃普斯
Epps, P. 埃普斯
Epstein, S. 爱泼斯坦
Erdelyi, M. 厄尔德伊
Erickson, M. L. 埃里克森
Erickson, P. G. 埃里克森
Erikson, R. V. 埃里克森
Erlanger, H. 厄朗根
Eron, L. D. 厄伦
Ervin, I. 欧文
Ervin, F. R. 欧文
Esveldt-Dawson, K. 厄斯
维尔特-道森
Evans, J. H. 埃文斯
Evans, R. G. 埃文斯
Everaerd, W. 艾夫里德
Everitt, B. 埃弗里特
Ewles, C. D. 埃伍尔斯
Eyo, I. D. 埃奥
Eysenck, H. J. 艾森克
Eysenck, S. B. G. 艾森克
- F
Fabiano, E. A. 法比亚诺
Fagan, J. 费根
Falkin, G. P. 福尔金
Farley, F. H. 法利
Farley, S. V. 法利
Farnworth, M. 法恩沃思
Farrington, D. P. 法林顿
Faust, D. 福斯特
Feldhusen, J. F. 费尔德
胡森
Feldman, D. 费尔德曼
- Feldman, M. P. 费尔德
曼
Felson, M. 费尔森
Felson, R. B. 费尔森
Felthous, A. R. 费尔特
豪斯
Fenton, G. 芬顿
Fenton, G. W. 芬顿
Fenton, T. 芬顿
Fenwick, P. 芬威克
Fenwick, P. B. C. 芬威克
Ferguson, D. M. 弗格森
Ferguson, W. 弗格森
Fersch, E. A. 费施
Feshbach, S. 费施巴克
Field, E. 费尔德
Fiendler, 非恩德勒
Figlio, R. 费格利奥
Figuera-McDonough, J. 费
格拉-麦多诺
Filipczak, J. 非利普蔡克
Finch, A. 芬奇
Finch, T. 芬奇
Fincham, F. D. 芬克哈姆
Fine, D. 法恩
Fineberg, N. A. 法恩伯格
Fingarette, H. 芬格利特
Finkelhor, D. 芬克霍
Finlayson, D. S. 芬利森
Finn, P. E. 芬恩
Fischer, D. 非谢尔
Fitzgerald, E. 非茨杰拉德
Fix, A. B. 非克斯
Fixsen, D. L. 非克森
Flanagan, B. 弗拉纳根
Fleeson, J. 弗利森
Fleeting, M. 弗里廷
Flor-Henry, P. 弗洛-
亨利
Flowers, V. 弗劳尔斯
Fo, W. S. O. 福
Fodor, E. 福多
Foggit, R. H. 福基特
Forbes, E. 福布斯
Forbes, G. B. 福布斯
Forgas, J. P. 福格斯
Forth, A. E. 福思
Fottrell, E. 福特里尔
Foucault, M. 福柯
Foulds, G. A. 福尔兹
Fowles, D. C. 福尔斯
- Frame, C. L. 弗雷姆
Frances, A. 弗朗西斯
Frank, J. D. 弗兰克
Fraser, W. I. 弗雷泽
Frederiksen, L. W. 弗雷
德里克森
Freedman, B. J. 弗里德曼
Freedman, J. L. 弗里德
曼
Freeman, A. 弗里曼
Freeman, N. L. 弗里曼
Freeman-Longo, R. E. 弗
里曼-朗格
Freidrich-Cofer, L. 弗里
德里希-科弗
French, N. H. 弗伦奇
French, R. 弗伦奇
Frenzel, R. R. 弗伦泽尔
Freud, S. 弗洛伊德
Freund, K. 弗洛恩德
Frey, J. 弗雷
Frick, P. J. 弗里克
Frieden, F. P. 弗里登
Friedman, R. M. 弗里德
曼
Friedrich, W. 弗里德里
克
Fromm, E. 弗洛姆
Fromm-Auch, D. 弗洛
姆-奥克
Frosch, J. P. 弗洛施
Fulker, D. W. 福尔克
Furby, L. 弗贝
- G
Gabrielli, W. 加布里埃利
Gabrielli, W. F. 加布里埃
利
Gaes, G. G. 盖斯
Gaffney, L. R. 盖夫尼
Gagnon, J. H. 加格诺
Gale, A. 盖尔
Gallagher, B. 加拉格尔
Ganzer, V. J. 甘泽
Ganzer, V. T. 甘泽
Garabedian, P. G. 加拉贝
迪安
Gari é py, J-L. 加里埃
佩
Garland, D. 加兰
Garofalo, R. 加罗法洛
- Garrett, C. J. 加勒特
Garrett, M. 加勒特
Gartner, R. 加特纳
Gath, D. 盖斯
Gatti, F. M. 加蒂
Gavaghan, M. P. 加瓦根
Gayford, J. J. 盖夫德
Gearing, M. L. 吉尔林
Gecas, V. 格卡斯
Geen, R. G. 古恩
Geis, G. 盖斯
Gelles, R. 盖利斯
Gelles, R. J. 盖利斯
Gendreau, P. 金德鲁
Gensheimer, L. K. 根舍
默
Genther, R. W. 金瑟
George, W. H. 乔治
Gernkovich, S. A. 杰克维
奇
Gerver, I. 杰弗
Gest, S. D. 格斯特
Getsinger, S. H. 格青杰
Gewirtz, J. L. 格维尔茨
Giampino, T. L. 加姆皮
诺
Gibbens, T. C. N. 吉本斯
Gibbons, D. C. 吉本斯
Gibbs, J. C. 吉布斯
Gibbs, J. J. 吉布斯
Gibbs, J. P. 吉布斯
Gibbs, L. E. 吉布斯
Gibson, E. 吉布森
Gibson, H. B. 吉布森
Gidycz, C. A. 吉迪茨
Gifford, R. 吉福德
Gillan, P. W. 吉兰
Giller, H. 吉勒
Gilligan, C. 吉利根
Gilmore, M. R. 吉尔摩
Gilmore, J. B. 吉尔摩
Giordano, P. C. 乔达诺
Given, J. B. 古文
Glaser, D. 格拉泽
Glaser, E. M. 格拉泽
Glaser, G. H. 格拉泽
Glaser, W. 格拉泽
Glass, C. 格拉斯
Glass, G. V. 格拉斯
Glick, B. 格利克
Glover, E. 格拉夫

- Glueck, E. 格卢克
Glueck, S. 格卢克
Goddard, H. H. 格达德
Gold, M. 戈尔德
Golden, C. J. 戈尔登
Golden, K. 戈尔登
Goldensohn, E. S. 戈登森
Goldfried, M. 格德菲尔德
Golding, S. L. 戈拉丁
Goldstein, A. 戈尔茨坦
Goldstein, A. P. 戈尔茨坦
Goldstein, H. 戈尔茨坦
Goldstein, P. J. 戈尔茨坦
Goldston, C. S. 戈德斯通
Goma, M. 戈默
Goodman, J. 古德曼
Goodenough, D. R. 古迪纳夫
Goodman, J. 古德曼
Goodstein, L. 古德斯坦
Gordon, D. A. 戈登
Gordon, R. A. 戈登
Gorenstein, E. E. 戈伦斯坦
Gorman, L. P. 戈尔曼
Gosselin, C. 戈塞林
Gostin, L. 戈斯廷
Gostin, L. 戈斯廷
Gottesman, I. I. 戈茨曼
Gottfredson, M. 戈德弗雷德森
Gottfredson, M. R. 戈德弗雷德森
Gottschalk, R. 戈特沙尔
Gough, H. G. 高夫
Graham, J. 格雷厄姆
Graham, K. 格雷厄姆
Granger, C. 格兰杰
Grannenmann, B. D. 格兰尼曼
Grant, B. A. 格兰特
Grant, J. D. 格兰特
Grant, M. Q. 格兰特
Grasmick, H. G. 格拉斯米克
Gray, J. A. 格雷
Grayson, D. 格雷森
Green, D. E. 格林
Green, D. R. 格林
Greene, E. 格林
Greene, R. L. 格林
Greenwald, A. G. 格林沃德
Greenwood, A. 格林伍德
Griew, E. 格里夫
Griffiths, R. C. 格里菲思
Grisso, T. 格里索
Groff, M. 格罗夫
Groth, A. N. 格罗思
Grubin, D. H. 格卢宾
Gruenberg, E. 格伦伯格
Grunfeld, B. 格伦菲尔德
Gudjonsson, G. H. 古汀逊
Guerra, N. G. 格拉
Guidano, V. E. 古德诺
Guidano, V. F. 古德诺
Guilford, J. P. 吉尔福德
Guild, D. 吉尔德
Guistra, E. 古斯特拉
Gunn, J. 冈恩
Gurucharri, C. 格卢克瑞
Guze, S. B. 古兹
- ## H
- Hackler, J. C. 哈克勒
Hadaway, C. K. 哈达韦
Haebele, W. F. 赫非尔
Hafner, H. 哈夫纳
Hagan, J. 哈根
Hains, A. A. 海恩斯
Hains, A. H. 海恩斯
Hakstian, A. R. 海克斯迪安
Halbach, K. 哈尔巴施
Hall, C. S. 霍尔
Hall, G. C. N. 霍尔
Hall, G. S. 霍尔
Hall, H. V. 霍尔
Hall, N. W. 霍尔
Halleck, S. L. 哈勒克
Haller, R. M. 哈勒
Halpern, A. L. 哈尔彭
Hamilton, S. B. 汉密尔顿
Hammond, W. A. 哈蒙德
Hans, J. 汉兹
Handy, L. 汉迪
Handy, W. 汉迪
Hancy, C. W. 黑尼
Hanks, S. E. 汉克斯
Haulon, T. E. 汉隆
Hanneke, C. R. 汉尼克
Hannon, J. R. 汉农
Hansell, S. 汉塞尔
Hansen, D. J. 汉森
Hanson, C. L. 汉森
Hanson, D. R. 汉森
Hanson, N. R. 汉森
Hauffman-Plotkin, D. 豪夫曼-普洛特金
Harbison, J. J. 哈比森
Harding, T. 哈丁
Hardt, R. G. 哈特
Hardt, R. H. 哈特
Hardyck, A. J. 哈迪克
Hare, R. D. 黑尔
Harer, M. D. 哈尔
Hargreaves, D. H. 哈格里夫斯
Hariton, E. B. 哈里顿
Harper, L. V. 哈珀
Harpur, T. J. 哈珀
Harré, R. 哈勒
Harris, G. T. 哈里斯
Harris, P. W. 哈里斯
Hart, H. L. A. 哈特
Hart, R. P. 哈特
Hart, S. D. 哈特
Hartdagen, S. E. 哈特达根
Hartjen, C. A. 哈特金
Hartl, E. M. 哈特尔
Hartman, C. 哈特曼
Hartman, C. R. 哈特曼
Hartmann, H. 哈特曼
Hartmen, C. R. 哈特门
Hartshorne, H. 哈特肖恩
Hartstone, E. 哈特斯顿
Harvey, O. J. 哈维
Hase, A. F. 哈斯
Hathaway, S. R. 哈萨韦
Hauer, A. L. 豪尔
Haward, L. 霍厄德
Haward, L. R. C. 霍厄德
Hawk, S. 霍克
Hawkins, J. D. 霍金斯
Hayes, P. 海斯
Hayes, L. M. 海斯
Hayes, S. C. 海斯
Hazel, J. S. 黑兹尔
Heal, K. 希尔
Hecaly, W. 希利
Hearnshaw, L. S. 赫恩肖
Heasman, G. 希斯曼
Heath, L. 哈斯
Heather, N. 哈泽
Hebb, D. O. 赫布
Hechtman, J. 赫克特曼
Hegedus, A. M. 赫格德斯
Heibrun, A. B. 海布伦
Heibrun, K. 海布伦
Heilbrun, M. R. 海布伦
Heilbrun, K. S. 海布伦
Heim, N. 海姆
Hellman, D. S. 赫尔曼
Helzer, J. E. 赫尔泽
Hempel, G. C. 亨普尔
Henderson, M. 亨德森
Henggeler, S. W. 亨格勒
Henker, B. 亨克尔
Henley, S. H. A. 亨利
Henn, F. A. 亨
Hennigan, K. M. 亨尼根
Hensman, C. 亨斯曼
Herbert, F. 赫伯特
Herbert, V. 赫伯特
Heritage, R. 赫里迪奇
Herjanic, B. L. 赫詹尼克
Herjanic, M. 赫詹尼克
Herman, J. L. 赫尔曼
Hermann, B. P. 赫尔曼
Herrnstein, R. S. 赫恩斯坦
Hersen, M. 赫森
Herzberg, J. L. 赫兹伯格
Herzberger, S. D. 赫兹伯格
Heskin, K. J. 赫斯金
Hess, A. K. 赫斯
Hetherington, E. M. 赫瑟林顿
Hewitt, L. 休伊特
Hewstone, M. 修斯顿
Hickey, J. 希基
Hickey, J. E. 希基
Hicks, A. 希克斯
Higgins, J. P. 希金斯
Higgins, S. T. 希金斯
Higson, P. J. 希格森
Hill, A. M. 希尔
Hill, D. 希尔
Hills, H. I. 希尔斯

- Himelein, M. J. 希米伦
Hindelang, M. J. 欣德朗
Hingendorf, E. L. 欣格道夫
Hinshaw, S. P. 欣肖
Hirschhorn, K. 赫希霍恩
Hirschi, T. 赫希
Hobbs, T. R. 霍布斯
Hodgens, J. B. 霍金斯
Hodges, E. F. 霍奇斯
Hodges, E. G. 霍奇斯
Hodgins, S. 霍金斯
Hoekstra, H. A. 霍克斯特拉
Hoffman, M. L. 霍夫曼
Hogan, R. 霍根
Hoge, R. D. 霍格
Hoghtugh, M. 霍格特
Hokanson, J. E. 霍坎森
Holcomb, W. R. 霍尔库姆
Holden, R. 霍尔登
Holder, T. 霍尔德
Holland, T. R. 霍兰
Hollander, H. E. 霍兰德
Hollin, C. R. 霍林
Holloway, V. 霍洛韦
Holmen, M. L. 霍尔姆
Holmes, R. M. 霍姆斯
Holstrom, L. L. 霍姆斯特朗
Holt, M. M. 霍尔特
Holt, N. 霍尔特
Hooper, F. A. 胡珀
Hope, K. 霍普
Hope, S. 霍普
Hoppe, C. M. 霍珀
Horan, J. J. 霍兰
Horton, R. W. 霍顿
Horwood, L. J. 霍伍德
Hotaling, G. T. 霍特林
Hough, J. M. 霍夫
Hough, M. 霍夫
Houghton, R. 霍夫顿
Howard, L. R. C. 霍华德
Howard, R. 霍华德
Howard, R. C. 霍华德
Howarth, E. 豪沃思
Howells, K. 豪厄尔斯
Howitt, R. 豪伊特
Howton, F. W. 霍顿
Hsu, L. K. G. 徐
Hubble, L. M. 哈布尔
Huber, J. 休伯
Hucker, S. J. 赫克
Hudgens, W. 赫金斯
Hudson, B. 赫德森
Huesmann, J. R. 休斯曼
Huff, G. J. 赫夫
Hughes, J. R. 休斯
Huizinga, D. 休津加
Hull, C. L. 赫尔
Hunt, D. E. 亨特
Hunt, J. McV. 亨特
Hunter, N. 亨特
Huntsinger, G. M. 亨特辛格
Hursch, C. J. 赫什
Huston, A. C. 休斯顿
Hutchings, B. 哈钦斯
Huusko, S. 胡斯克
Hynd, G. W. 海因德
Iacono, W. G. 亚克诺
Inden, E. 英登
Irving, B. L. 欧文
Irwin, M. J. 欧文
Itil, T. M. 伊提尔
Iwata, M. 艾瓦达
Izzo, R. L. 伊佐
J
Jackson, E. F. 杰克逊
Jackson, H. F. 杰克逊
Jackson, P. R. 杰克逊
Jacobvitz, D. 雅各布维茨
Jacoby, J. 雅各比
Jaeger, J. 耶格
Jaffe, P. 贾菲
James, D. V. 詹姆斯
Janzen, W. 詹曾
Jarvik, L. F. 贾维克
Jaspars, J. M. 贾斯帕
Jeeves, M. 吉夫斯
Jeffery, C. R. 杰弗利
Jenkins, P. 詹金斯
Jenkins, R. L. 詹金斯
Jennings, W. S. 詹宁斯
Jensen, G. F. 詹森
Jensen, M. 詹森
Jenssen, C. F. 杰斯内斯
Jessor, R. 杰塞
Jessor, S. L. 杰塞
Jew, C. C. 朱厄
Johnson, A. M. 约翰逊
Johnson, E. 约翰逊
Johnson, J. D. 约翰逊
Johnson, M. 约翰逊
Johnson, R. 约翰逊
Johnson, S. M. 约翰逊
Johnson, V. S. 约翰逊
Johnston, J. M. 约翰斯通
Johnston, M. E. 约翰斯通
Johnston, N. 约翰斯通
Jones, A. 琼斯
Jones, E. E. 琼斯
Jones, F. D. 琼斯
Jones, G. 琼斯
Jones, M. 琼斯
Jones, W. H. 琼斯
Josef, N. C. 约瑟夫
Joshua, S. 乔沙
Jurkovic, G. J. 杰科维克
Jussim, L. 贾希姆
Justice, B. 贾斯蒂斯
Justice, R. 贾斯蒂斯
K
Kahn, J. 卡恩
Kahneman, D. 坎尼曼
Kahch, S. M. 卡里克
Kamin, L. J. 卡明
Kandel, D. B. 坎德尔
Kandel, E. 坎德尔
Kanfer, F. H. 坎费
Kaplan, H. B. 卡普兰
Kaplan, P. J. 卡普兰
Karan, J. 卡兰
Karli, P. 卡里
Karoly, P. 卡罗利
Karpman, B. 卡普曼
Kassebaum, G. G. 卡斯鲍姆
Katz, R. C. 卡茨
Kaufman, J. 考夫曼
Kazdin, A. E. 卡兹丁
Keat, R. 基特
Kegan, R. G. 基根
Keilitz, I. 凯里茨
Keller, D. J. 凯勒
Kellert, S. R. 凯勒特
Kelley, C. K. 凯利
Kelling, G. 凯林
Kellner, R. 凯尔纳
Kelly, F. 凯利
Kempe, C. H. 肯普
Kempf, K. 肯普夫
Kendall, P. C. 肯德尔
Kendell, R. E. 肯德尔
Kennard, D. 肯纳德
Kennedy, R. 肯尼迪
Kenrick, D. T. 肯里克
Kernberg, O. 肯伯格
Kernis, M. H. 克尼斯
Kerr, C. A. 克尔
Kershaw, K. L. 克肖
Kershaw, P. W. 克肖
Keveles, G. 克维勒斯
Khantzian, E. J. 坎特赞
Kickona, T. 基克纳
Kierkegaard-Sorensen, L. 基克加德-索伦森
Kiesler, D. J. 基斯勒
Kifer, R. E. 基弗
Kilkenny, R. 基尔肯尼
Kilmann, P. R. 基尔曼
Kilmartin, C. T. 基尔马
Kilpatrick, D. G. 基尔帕特里克
King, L. 金
King, L. N. 金
Kinzel, A. F. 金泽尔
Kipnis, D. 基普尼斯
Kirchner, E. 柯克纳
Kirigin, K. A. 柯里金
Kirkpatrick, J. T. 科克帕特里克
Klassen, D. 克拉森
Kleinmuntz, B. 克莱曼茨
Klein, M. W. 克莱恩
Klein, N. C. 克莱恩
Klein, R. G. 克莱恩
Kline, P. 克林
Kling, J. 克林
Klinnert, M. D. 克林纳特
Klodin, V. 克劳丁
Kloss, J. D. 克罗斯
Klugel, J. R. 克卢格尔
Knight, B. J. 奈特

Knight, R. A. 奈特
Kuskern, D. P. 尼斯肯
Knop, J. 诺普
Kohlberg, L. 科尔伯格
Kohn, P. 科恩
Koles, Z. J. 科尔斯
Kolvin, I. 科尔文
Kolvin, P. A. 科尔文
Konecni, V. J. 科奈克尼
Konig, P. H. 考尼格
Kornhauser, R. R. 科恩豪泽
Koss, M. P. 科斯
Kozol, H. 科泽尔
Kraepelin, E. 克雷佩林
Kraft, J. 克拉夫特
Krakowski, M. 科拉克维斯基
Krauss, H. H. 克劳斯
Kremsdorf, R. B. 克雷姆斯道夫
Kruglen, E. 克林莱恩
Kris, E. 克里斯
Krisberg, B. 克里斯伯格
Krohn, M. D. 克罗恩
Kroll, J. 克罗尔
Kruppa, I. 克卢帕
Krus, D. J. 克卢斯
Krus, P. H. 克卢斯
Kruttschnitt, C. 克卢茨科尼特
Krynicky, Y. 克里尼克
Kuhlman, M. 库尔曼
Kulik, J. A. 库里克
Kumari, N. 库莫利
Kurtines, W. M. 柯蒂斯
Kulash, S. B. 库塔什

L

La Rocque, L. 拉洛克
Lab, S. P. 拉布
Lahey, B. B. 莱希
Lamb, C. T. 拉姆
Lambert, M. L. 兰伯特
Lambert, N. M. 兰伯特
Land, K. C. 兰德
Landau, S. F. 兰多
Landon, P. B. 兰登
Lane, D. A. 莱恩
Lane, P. J. 莱恩
Lane, R. 莱恩
Lane, R. A. 莱恩
Lane, T. W. 莱恩
Lang, R. A. 兰
Lange, J. S. 朗格
Langevin, R. 兰格文
Lanier, K. 拉尼尔
Lanthier, R. D. 兰塞尔
Lanyon, R. I. 兰杨
Lanza-Kaduce, L. 兰扎-卡杜斯
Larosa, J. F. 拉罗萨
Larrance, D. T. 拉兰斯
Latané, B. 拉塔尼
Latimer, P. R. 拉蒂默
Lauh, J. H. 劳布
Laufer, W. S. 劳弗
Laurus, J. P. 劳卢斯
Laws, D. R. 劳斯
Laycock, G. 莱科克
Lazarus, R. S. 拉扎勒斯
Le Blanc, M. 勒布朗
Leary, T. 利里
Lebo, G. R. 莱伯
LeBorgne, B. 莱博恩
LeBouvie, E. W. 莱布维
Ledingham, J. E. 莱丁汉姆
Lee, A. 李
Lee, M. 李
Lee-Evans, J. M. 李-埃文斯
Lefkowitz, M. M. 莱夫科维茨
Leflore, L. 莱夫劳
Leipciger, M. 莱普茨格
Leitenberg, H. 莱滕伯格
Lemerl, E. M. 利默特
Leonon, R. 伦农
Leon, J. 里昂
Leonard, K. E. 伦纳德
Leschied, A. W. 莱希德
Levander, S. F. 利万德
Leveine, R. V. 莱文尼
Levey, A. B. 利维
Levey, S. 利维
Levine, W. R. 莱文
Levinson, R. B. 莱文森
Levy, L. H. 利维
Lewis, D. A. 刘易斯

Lewis, D. O. 刘易斯
Lewis, G. 刘易斯
Lewis, M. A. 刘易斯
Lewis, R. V. 刘易斯
Lewontin, R. C. 赖文丁
Liazos, A. 里奥佐斯
Liberman, R. P. 利伯曼
Lichtenstein, E. 利希滕斯坦
Lidberg, L. 利德伯格
Lidberg, Y. 利德伯格
Lidz, C. W. 利兹
Lieber, A. 利伯
Lilly, J. R. 利利
Lin, S. P. 林
Linden, E. 林登
Lindqvist, P. 林奎斯特
Lindzey, G. 林赛
Link, B. G. 林克
Link, N. 林克
Linz, D. 林茨
Lion, J. 莱昂
Lion, J. R. 莱昂
Liootti, G. 里奥蒂
Lippincott, E. C. 利平科特
Lipton, D. N. 利普顿
Lipton, D. S. 利普顿
Liska, A. E. 利斯卡
Litwack, T. R. 利特维克
Livesley, W. J. 利夫斯里
Livingstone, B. L. 利文斯通
Lloyd, C. 劳埃德
Lobitz, G. K. 劳贝茨
Lochman, J. E. 洛克曼
Locke, E. A. 洛克
Loeber, R. 洛伯
Loftus, E. F. 洛夫特斯
Lombroso, C. 龙勃罗梭
London, H. 伦敦
Longo, R. E. 朗戈
Lopatto, D. 洛帕特
Lorenz, K. 洛伦茨
Lorr, M. 洛尔
Loughran, J. L. 洛克伦
Loughran, J. M. 洛克伦
Love, C. T. 洛夫
Lovell, C. 洛夫尔
Low, H. 洛
Lowe, C. F. 洛

Lowenstein, R. 洛温斯坦
Luborsky, L. 卢伯斯基
Luckenbill, D. 卢肯比尔
Lund, N. L. 伦德
Lundman, R. J. 伦德曼
Lundsteen, C. 伦德斯坦
Lurigio, A. J. 卢里基奥
Lykken, D. T. 莱肯

M

Maccoby, E. E. 麦科比
MacCulloch, M. J. 麦克洛克
MacDonald, J. 麦克唐纳
Machalek, R. 麦卡勒克
Mack, J. L. 马克
Mackay, H. B. 麦凯
Mackay, R. D. 麦凯
MacKenzie, D. L. 麦肯齐
MacNamara, E. J. 麦克纳马拉
Madden, D. J. 马登
Maden, A. 马登
Madsen, J. 马德森
Magnusson, D. 马格努森
Maguire, A. 马卡尔
Mahoney, M. J. 马奥尼
Mauro, R. D. 麦尤洛
Malamuth, N. M. 马拉姆
Maletzky, B. M. 马利茨基
Maliphant, R. 马利范特
Malmquist, C. P. 马姆奎斯特
Maltzman, I. 马尔茨曼
Manicas, P. T. 马尼克斯
Mann, B. J. 曼恩
Mannheim, H. 曼海姆
Mannuzza, A. 马努扎
Marceil, J. C. 马塞尔
Margolin, G. 马戈林
Marholin, D. 马霍林
Marini, J. L. 马瑞尼
Mark, V. H. 马克
Markle, G. E. 马克尔
Marlatt, G. A. 马拉特
Marolla, J. 马罗拉
Marques, J. K. 马奎斯
Marquis, J. 马奎斯
Marriott, S. A. 马里奥特

- Marsh, P. 马什
Marshall, R. J. 马歇尔
Marshall, W. L. 马歇尔
Martin, B. 马丁
Martin, H. 马丁
Martin, I. 马丁
Martin, J. A. 马丁
Martin, S. E. 马丁
Martinson, R. 马丁森
Marlorrell, C. 马特雷尔
Marzillier, J. S. 马赛里尔
Mas, C. H. 马斯
Mashall, W. L. 马什尔
Mashall, W. M. 马什尔
Mason, S. T. 梅森
Masse, B. 马斯
Massey, C. R. 马西
Massimo, J. L. 马西姆
Matarazzo, J. D. 马特拉佐
Mathews, R. 马修斯
Matousek, M. 马特塞克
Matsueda, R. L. 马茨尤德
Matsuyama, S. S. 马茨亚马
Matthews, V. M. 马修斯
Matlocks, A. L. 马托科斯
Mattson, A. 马蒂森
Mattson, R. H. 马蒂森
Matza, D. 马茨阿
Maughan, B. 莫姆
Mawby, R. I. 莫比
Mawson, A. R. 莫森
Mawson, C. D. 莫森
May, J. 梅
May, M. A. 梅
Maybury, C. 梅伯里
Mayer, J. 迈耶
Mayhew, P. 梅休
Mazur, A. 梅热
McAllister, H. 麦卡里斯特
McBain, I. 麦克贝恩
McBurnett, K. 麦克伯尼特
McCaghy, C. H. 麦卡菲
McCain, G. 迈凯恩
McCallum, C. 麦卡勒姆
McCandless, B. R. 麦坎德利斯
McCartney, K. 麦卡特尼
McClement, W. F. 麦克莱蒙特
McCoby, E. E. 麦科比
McCord, J. 麦科德
McCord, W. M. 麦科德
McCormack, A. 麦考马克
McCormick, P. M. 麦考密克
McCoskey, M. 麦科斯克
McCoy, J. F. 麦科伊
McCrac, R. R. 麦克雷
McCulloch, J. W. 麦卡洛克
McCullough, J. P. 麦卡洛
McDonel, E. C. 麦克唐奈
McDougall, C. 麦克杜格尔
McEwan, A. W. 麦科伊
McFadin, J. B. 麦克法丁
McFall, M. E. 麦克福尔
McFall, R. M. 麦克福尔
McGarry, A. L. 麦加里
McGarvey, B. 麦加维
McGee, R. 麦吉
McGinn, C. 麦金
McGuire, J. 麦圭尔
McGuire, R. J. 麦圭尔
McGurk, B. J. 麦格克
McGurk, R. E. 麦格克
McKay, H. D. 麦凯
McKellar, P. 麦克勒
McKenzie, T. B. 麦肯齐
McKnight, C. K. 麦克奈特
McLeer, S. 麦克利尔
McLellan, A. T. 麦克莱伦
McLintock, F. H. 麦克林托克
McNees, M. P. 麦克尼斯
McNiel, D. E. 麦克尼尔
McPherson, L. M. 麦克弗森
McSegal, N. J. 麦西格尔
McWilliams, W. 麦克威廉斯
Mednick, S. A. 梅德尼克
McElil, P. E. 米赫尔
Megargee, E. I. 梅加吉
Meichenbaum, D. 米切鲍姆
Meisner, M. 梅斯纳
Melick, M. E. 梅利克
Mellsop, G. 梅勒索普
Melton, G. 梅尔顿
Meltzer, L. J. 梅尔策
Menard, S. 梅纳德
Menzies, R. J. 孟席斯
Merton, R. K. 默顿
Metfessel, M. 梅特费塞尔
Meyer, C. W. 迈耶
Mezzich, J. 梅津克
Milan, M. A. 米兰
Miller, E. 米勒
Miller, F. J. W. 米勒
Miller, G. A. 米勒
Miller, K. 米勒
Miller, L. 米勒
Miller, N. 米勒
Miller, P. M. 米勒
Miller, W. B. 米勒
Millon, T. 米隆
Mills, C. M. 米尔斯
Mills, H. E. 米尔斯
Milroy, T. 米尔罗伊
Miner, R. A. 迈纳
Minkin, B. L. 明金
Minkin, N. 明金
Minor, W. W. 迈纳
Mirrels, H. L. 米雷尔斯
Mischel, H. 米施尔
Mischel, T. 米施尔
Mischel, W. 米施尔
Mitchell, C. M. 米切尔
Moan, C. E. 莫恩
Moffitt, T. E. 莫菲特
Moitra, S. 莫伊特拉
Monachesi, E. D. 莫纳切希
Monahan, J. 莫纳汉
Money, J. 莫尼
Monnelly, E. P. 莫尼里
Monroe, R. 门罗
Moon, J. R. 穆恩
Moore, D. R. 穆尔
Moore, M. 穆尔
Moos, R. H. 穆斯
Moran, R. 莫兰
Morash, M. 马拉什
Morely, L. 莫雷利
Morey, I. C. 莫里
Morgan, E. M. 摩根
Morris, A. 莫里斯
Morris, E. K. 莫里斯
Morris, N. 莫里斯
Morse, B. J. 莫尔斯
Mortimore, P. 莫蒂摩尔
Mosher, D. L. 莫舍
Moss, C. S. 莫斯
Motandon, C. 莫坦顿
Motiuk, L. L. 莫体克
Mowat, R. R. 莫瓦特
Mowrer, O. H. 莫勒
Moyer, K. 莫耶
Moyes, T. 莫伊斯
Mukai, L. H. 姆凯
Mullen, P. E. 马伦
Muller, C. W. 马勒
Müller, D. J. 马勒
Mulligan, D. G. 马林根
Mulvey, E. P. 马尔维
Mundy, P. 芒迪
Mungas, D. 芒格斯
Munsterberg, H. 闵斯特贝格
Murphy, J. W. 墨非
Murphy, W. D. 墨非
Murray, D. J. 默里
Murray, C. A. 默里
Myers, R. G. 迈尔斯

N
Nardi, P. M. 纳迪
Nass, M. L. 纳斯
Nassi, A. L. 纳赛
Nathan, S. 内森
Neale, M. C. 尼尔
Neckerman, H. J. 尼克尔曼
Nelson, B. N. 尼尔森
Nelson, G. M. 尼尔森
Nelson, J. R. 尼尔森
Nesdale, A. R. 内斯戴尔
Newman, D. J. 纽曼
Newman, J. P. 纽曼
Newman, O. 纽曼
Newton, A. 牛顿
Neziroglu, F. A. 尼泽罗格鲁

Nias, D. K. 尼亚斯
 Nicholson, R. C. 尼克尔森
 Nicol, A. R. 尼克尔
 Nietzel, M. T. 尼茨尔
 Noble, P. 诺布尔
 Nomellini, S. 诺米利尼
 Noreik, K. 诺雷克
 Normandcau, A. 诺曼杜
 Norrie, A. 诺里
 Norris, J. N. 诺里斯
 Norris, M. 诺里斯
 Novaco, R. W. 诺瓦克
 Nunner-Winkler, G. 农纳-温克勒
 Nurco, D. N. 纳克
 Nuuttila, A. 纳迪拉

O

O'Brien, C. P. 奥布莱恩
 O'Brien, E. J. 奥布莱恩
 O'Brien, M. 奥布莱恩
 O'Callaghan, M. A. J. 奥卡拉汉
 O'Connor, A. A. 奥康纳
 O'Connor, B. 奥康纳
 O'Connor, W. A. 奥康纳
 O'Donnell, C. R. 奥唐奈
 O'Keefer, E. J. 奥基夫
 O'Leary, D. 奥里里
 O'Leary, K. D. 奥里里
 O'Malley, P. M. 奥马利
 O'Neal, E. 奥尼尔
 Offord, D. R. 奥福德
 Offutt, R. A. 奥发尔特
 Ogloff, J. R. P. 奥格洛夫
 Ohlin, L. E. 奥林
 Olejnik, A. 奥莱尼克
 Olweus, D. 奥尔伍斯
 Opton, E. M. 奥普顿
 Orcutt, J. 奥克特
 Orleans, S. 奥林斯
 Orvaschel, H. 奥瓦希尔
 Osborn, S. G. 奥斯本
 Osgood, D. W. 奥斯特古德
 Ostapiuk, E. 奥斯塔皮克
 Ostrom, T. M. 奥斯特罗姆
 Otterbein, K. F. 奥特拜因
 Ounsted, C. 昂斯特德

Ouston, J. 乌斯顿
 Overholser, J. C. 奥弗霍尔泽
 Overton, W. F. 奥弗顿
 Owen, D. R. 欧文
 Owens, R. G. 欧文斯
 Ozer, D. J. 奥泽尔

P

Pachella, R. G. 帕切拉
 Padi, M. 帕迪
 Paiscy, T. 佩塞
 Patick, D. 佩迪克
 Palmer, J. 帕尔默
 Palmer, T. 帕尔默
 Palmstierna, T. 帕姆斯蒂纳
 Palys, T. S. 帕尔斯
 Pantle, M. L. 潘特尔
 Panton, J. J. 潘顿
 Parish, T. S. 帕里什
 Parke, R. D. 帕克
 Parker, D. A. 帕克
 Parker, E. 帕克
 Parker, G. V. C. 帕克
 Parker, H. 帕克
 Parker, J. G. 帕克
 Parker, L. L. 帕克
 Parloff, M. B. 帕洛夫
 Parnell, R. W. 帕内尔
 Parrott, C. A. 帕罗特
 Parsons, B. V. 帕森斯
 Parsons, O. A. 帕森斯
 Pasewark, R. A. 佩斯瓦克
 Pask-McCartney, C. 帕斯克-麦卡特尼
 Passingham, R. E. 帕辛厄姆
 Patterson, G. 帕特森
 Patterson, G. R. 帕特森
 Paulus, P. B. 保罗斯
 Pauly, J. 波利
 Payne, J. 佩恩
 Pease, K. 皮尔斯
 Peay, J. 皮伊
 Pendleton, L. 彭德尔顿
 Penrod, S. 彭罗德
 Penrose, L. S. 彭罗斯
 Perez, J. 佩雷斯
 Perkins, D. E. 珀金斯

Perkowitz, W. T. 珀科维茨
 Perlman, D. 珀尔曼
 Perlman, T. 珀尔曼
 Perlmuter, M. 珀尔马特
 Perlstein, W. 珀尔斯坦
 Pernanen, K. 珀纳内
 Perron, D. 佩龙
 Perry, D. G. 佩里
 Perry, L. C. 佩里
 Persky, H. 珀斯基
 Persons, R. W. 珀森斯
 Persons, W. S. 珀森斯
 Petec, T. A. 皮迪
 Peters, A. A. R. 彼得斯
 Petersen, D. M. 彼得森
 Peterson, K. G. I. 彼得森
 Peterson, R. 彼得森
 Peterson, R. A. 彼得森
 Peto, J. 皮托
 Petrella, R. C. 皮特莱罗
 Petrie, A. 皮特里
 Petrila, J. 皮特里拉
 Phelps, E. 费尔普斯
 Philip, A. E. 菲利普
 Philip, J. 菲利普
 Philips, D. P. 菲利普斯
 Philips, E. L. 菲利普斯
 Philipson, C. M. 菲利浦森
 Phillips, E. L. 非利浦斯
 Piaget, J. 皮亚杰
 Pichot, P. 皮克特
 Piliavin, I. 皮列文
 Pincus, A. L. 平卡斯
 Pincus, J. H. 平卡斯
 Pinsonneault, P. 平逊纽特
 Pithers, W. D. 皮瑟斯
 Pittman, D. 皮特曼
 Planasky, K. 普拉南斯基
 Platt, J. J. 普拉特
 Plummer, K. 普卢默
 Pnder, H. N. 彭德
 Pokorny, A. D. 波考尼
 Pollock, N. 波洛克
 Pollock, V. 波洛克
 Porporine, F. J. 波珀林
 Porter, R. J. 波特
 Porteus, S. D. 波蒂厄斯
 Portnow, S. L. 波特诺

Potts, D. A. 波茨
 Powell, G. E. 鲍威尔
 Power, M. 鲍尔
 Poythress, N. G. 波伊思雷斯
 Pratkanis, A. R. 普拉特卡尼斯
 Prentice, N. 普伦蒂斯
 Prentice, N. M. 普伦蒂斯
 Prentice-Dunn, S. 普伦蒂斯-邓恩
 Prentky, R. A. 普伦特基
 Preston, M. A. 普雷斯顿
 Price, J. 普赖斯
 Price, M. J. 普赖斯
 Price, R. H. 普赖斯
 Price, W. H. 普赖斯
 Prichard, D. A. 普里查德
 Priest, R. G. 普里斯特
 Priestley, P. 普里斯特利
 Prins, H. 普林斯
 Proctor, W. C. 普罗克特
 Prout, M. E. 普劳特
 Pruesse, M. 普卢伊斯
 Ptacek, J. 普泰希克
 Pugh, G. M. 皮尤
 Pugh, M. D. 皮尤
 Pulkinnen, L. 普金南
 Purins, J. E. 普林斯
 Pyle, G. F. 派尔
 Pythress, N. 佩斯赖斯

Q

Quanty, M. B. 匡迪
 Quay, H. C. 奎伊
 Quinn, M. 奎因
 Quinney, R. 昆尼
 Quinsey, V. L. 昆塞

R

Rabkin, J. G. 拉布金
 Rachlin, S. 拉克林
 Rachman, S. 拉克曼
 Rada, R. T. 拉德
 Radden, J. 雷登
 Rader, C. M. 雷德
 Radesovich, M. 雷德索维奇
 Radke-Yarrow, M. 拉德克-亚罗
 Raine, A. 雷恩

- Rainwater, N. 雷恩沃特
 Ramsey, E. 拉姆齐
 Rankin, J. H. 兰金
 Rankin, R. J. 兰金
 Rapaport, K. 拉帕波特
 Rasch, W. 拉希
 Raskin, D. C. 拉斯金
 Rasmussen, P. 拉斯马森
 Rathus, S. A. 拉瑟斯
 Rauma, D. 劳莫
 Raush, H. L. 劳施
 Rawson, H. E. 罗森
 Ray, J. B. 雷
 Reber, M. 雷伯
 Reckless, W. C. 雷克利斯
 Redner, R. 雷德纳
 Reed, F. S. 里德
 Reese, S. C. 里斯
 Regier, D. A. 雷杰
 Reich, T. 赖克
 Reicher, S. 赖克尔
 Reid, I. D. 里德
 Reid, J. B. 里德
 Reid, R. L. 里德
 Reid, W. H. 里德
 Reiff, H. J. 赖夫
 Reis, D. J. 赖斯
 Reiss, A. 赖斯
 Reitsma-Street, M. 赖茨
 马-斯特里特
 Remington, B. 雷明顿
 Remington, M. 雷明顿
 Renler, R. 雷纳
 Renwick, S. 伦威克
 Repucci, N. D. 雷帕西
 Rescorla, R. A. 赖斯考勒
 Ressler, R. K. 雷斯勒
 Rettig, S. 雷迪格
 Reynolds, D. 雷诺兹
 Rhodes, A. L. 罗兹
 Rice, M. E. 赖斯
 Rich, W. D. 里奇
 Richard, B. A. 里查德
 Richards, B. 里查兹
 Richey, E. T. 里奇
 Richman, C. 里奇曼
 Ridberg, E. H. 里德伯格
 Riddle, M. 里德尔
 Riess, A. J. 里斯
 Rigler, D. 里格勒
 Rimé, B. 里姆
- Robbins, D. 罗宾斯
 Robbins, D. C. 罗宾斯
 Roberts, A. 罗伯茨
 Roberts, A. H. 罗伯茨
 Roberts, J. 罗伯茨
 Roberts, R. J. 罗伯茨
 Robertson, G. 罗伯逊
 Robey, A. 罗比
 Robins, L. 罗宾斯
 Robinson, I. 鲁滨逊
 Robinson, N. 鲁滨逊
 Robinson, W. S. 鲁滨逊
 Robison, J. O. 罗比森
 Rock, P. 罗克
 Rodeheffer, M. 罗德海弗
 Rodgers, S. 罗杰斯
 Rodick, J. D. 罗迪克
 Rodin, E. A. 罗丁
 Roditi, B. N. 罗迪提
 Rodriguez, M. J. 罗德里
 格斯
 Roesch, R. 罗伊希
 Rogers, R. 罗杰斯
 Rogers, R. W. 罗杰斯
 Rohrbeck, C. A. 罗尔贝
 克
 Rojek, D. G. 罗杰克
 Rokous, F. 罗考斯
 Rollin, H. R. 罗林
 Ronan, K. R. 罗南
 Rooth, G. 鲁思
 Roper, V. 罗珀
 Rosch, E. 罗施
 Rose, S. 罗斯
 Rose, T. L. 罗斯
 Rosen, A. 罗森
 Rosen, A. S. 罗森
 Rosenbaum, A. 罗森鲍姆
 Rosenbaum, C. D. 罗森鲍
 姆
 Rosenberg, B. 罗森堡
 Rosenberg, F. 罗森堡
 Rosenberg, M. 罗森堡
 Rosenberg, M. S. 罗森堡
 Rosenberg, R. 罗森堡
 Rosenblood, L. K. 罗森布
 拉德
 Rosenthal, L. 罗森塔尔
 Ross, H. L. 罗斯
 Ross, J. M. 罗斯
 Ross, R. R. 罗斯
- Ross, T. J. 罗斯
 Rosser, E. 罗瑟
 Rossi, P. H. 罗西
 Rotenberg, M. 罗滕伯格
 Roth, J. H. 罗思
 Rotter, J. B. 罗特
 Rotton, J. 罗顿
 Rouleau, J. L. 鲁利尤
 Rouillon, F. 卢尤伦
 Rourke, B. P. 鲁尔克
 Rowe, D. 罗
 Rowe, D. C. 罗
 Rozyko, V. V. 罗辛克
 Rubama, I. 卢伯玛
 Rubin, D. B. 鲁宾
 Ruff, G. A. 拉夫
 Ruma, E. H. 鲁玛
 Rushton, J. F. 拉什顿
 Russell, D. E. H. 拉塞尔
 Russon, A. E. 拉森
 Rust, J. 拉斯特
 Rutter, M. 拉特
 Ryan, E. B. 瑞安
- S**
- Safran, J. D. 萨夫兰
 Sakloffe, D. H. 萨克洛夫
 斯
 Salary, H. M. 萨拉瑞
 Salovey, P. 萨洛维
 Saller, A. C. 索尔特
 Saltzstein, H. D. 萨尔茨
 坦
 Samenow, S. 萨米诺
 Sanday, P. R. 桑迪
 Sandhu, H. J. 桑德赫
 Sapp, A. D. 萨普
 Sappington, A. A. 萨平
 顿
 Sapsford, R. 萨普斯福德
 Sarason, I. G. 萨拉森
 Sarata, B. P. 萨拉特
 Sarbin, T. R. 萨宾
 Satterfield, D. A. 萨特菲
 尔德
 Satterfield, J. H. 萨特菲
 尔德
 Saunders, J. T. 桑德斯
 Saunders, W. M. 桑德斯
 Saulnier, K. 索尔尼尔
 Savitz, L. 萨维茨
- Sawyer, J. 索耶
 Scarr, S. 斯卡
 Schacter, S. 谢克特
 Schalling, D. 沙林
 Schalling, D. S. 沙林
 Scharf, P. 沙弗
 Schell, A. M. 谢尔
 Schiavi, R. C. 夏维
 Schichor, D. 希考
 Schlichter, K. J. 施利克
 特
 Schludt, D. G. 施拉恩特
 Schmauk, F. J. 施莫克
 Schmideberg, M. 施米德
 伯格
 Schmidt, A. A. 施米特
 Schneider, K. 施奈德
 Schnell, S. V. 施内尔
 Schoeder, M. L. 舍伊德
 Schoenthaler, S. J. 舍恩
 萨勒
 Schooler, I. W. 斯库勒
 Schouten, P. G. W. 斯考
 滕
 Schroeder, H. M. 施罗德
 Schubert, D. 舒伯特
 Schulsinger, F. 舒尔辛格
 Schultz, L. A. 舒尔茨
 Schumaker, J. B. 休梅克
 Schwartz, I. K. 施瓦茨
 Schwartz, N. 施瓦茨
 Schwartz, R. A. 施瓦茨
 Schwartz, R. D. 施瓦茨
 Schwartzman, A. E. 施瓦
 茨曼
 Schweinhart, L. 施文哈
 特
 Schwendinger, H. 施文
 丁格
 Schwendinger, J. 施文丁
 格
 Schwitzgebel, R. L. 施维
 茨格布
 Scott, G. D. 斯科特
 Scott, M. L. 斯科特
 Scott, W. A. 斯科特
 Scully, D. 斯卡利
 Scura, W. 斯卡拉
 Sechrest, L. 希克萊斯特
 Secord, P. E. 西科德
 Segal, Z. V. 西格尔

- Seghorn, T. 西格霍恩
 Selby, M. J. 塞尔比
 Selmi, T. 塞林
 Selman, R. 塞尔曼
 Sejcek, D. S. 塞佩加克
 Serber, M. 瑟伯
 Serin, R. C. 瑟林
 Serna, I. A. 塞纳
 Sewell, T. 休厄尔
 Shaffer, J. W. 谢弗
 Shah, A. J. 沙赫
 Shah, S. A. 沙赫
 Shannon, F. T. 香农
 Shanok, S. S. 沙诺克
 Shapiro, D. 夏皮罗
 Shaplan, J. 沙普兰
 Shaw, C. R. 肖
 Shaw, M. I. 肖
 Sheard, M. H. 希尔德
 Sheldon, J. B. 谢尔登
 Sheldon, W. H. 谢尔登
 Shepherd, M. 谢泼德
 Sherin, C. 谢林
 Sherman, J. L. 舍曼
 Shevlin, H. 谢夫林
 Shields, N. M. 希尔兹
 Shimohara, M. 希诺哈拉
 Shoda, Y. 肖德
 Shore, M. E. 肖尔
 Short, I. F. 肖特
 Short, R. J. 肖特
 Shover, N. 肖弗
 Shupe, L. M. 舒普
 Shure, M. 舒尔
 Siddle, D. A. T. 西德尔
 Siebert, L. A. 齐伯特
 Siegal, A. M. 西格尔
 Siegel, L. J. 西格尔
 Siegel, R. A. 西格尔
 Siegman, A. W. 西格曼
 Sigvardsson, S. 西格瓦德森
 Sikes-Nova, V. E. 赛克斯-诺瓦
 Silva, F. 席尔瓦
 Silva, P. A. 席尔瓦
 Silverman, D. C. 西尔弗曼
 Silverman, F. H. 西尔弗曼
 Silverman, I. 西尔弗曼
 Simeonsson, R. J. 西蒙森
 Simon, F. H. 西蒙
 Simon, H. A. 西蒙
 Simon, R. J. 西蒙
 Simon, W. F. 西蒙
 Sinclair, I. A. 辛克莱
 Singer, J. L. 辛格
 Singh, A. 辛格
 Skinner, B. F. 斯金纳
 Skinner, M. L. 斯金纳
 Skogan, W. G. 斯科甘
 Skoog, D. K. 斯库格
 Slaby, R. G. 斯拉比
 Slaiken, K. 斯赖克
 Slater, E. 斯莱特
 Slater, P. E. 斯莱特
 Sobin, B. S. 斯罗宾
 Slobogin, C. 斯罗伯金
 Smith, A. 史密斯
 Smith, B. D. 史密斯
 Smith, D. A. 史密斯
 Smith, D. E. 史密斯
 Smith, D. L. 史密斯
 Smith, E. E. 史密斯
 Smith, F. V. 史密斯
 Smith, G. B. 史密斯
 Smith, K. D. 史密斯
 Smith, M. L. 史密斯
 Smitherman, H. O. 史密斯曼
 Snarey, J. R. 斯纳雷
 Snowden, P. R. 斯诺登
 Snyder, J. 斯奈德
 Solano, C. 索拉诺
 Solomon, G. S. 索罗曼
 Solomon, R. L. 索罗曼
 Solomon, G. S. 索罗门
 Solursh, L. P. 索罗什
 Somborg, D. R. 索姆伯格
 Southill, K. L. 苏斯尔
 Sosowsky, L. 索桑斯基
 Spence, S. H. 斯彭斯
 Spiegel, H. 施皮格尔
 Spinetta, J. 斯平奈特
 Spinks, P. 斯平克斯
 Spitzer, R. L. 施皮策
 Spivack, G. 斯皮瓦克
 Spruill, J. 斯普鲁尔
 Sroufe, L. A. 斯鲁夫
 St Ledger, R. J. 圣莱杰
 Stattin, H. 斯塔廷
 Stayer, S. J. 斯特耶
 Steadman, H. J. 斯特德曼
 Steele, C. M. 斯蒂尔
 Steffen, J. J. 斯蒂芬
 Steffensmeier, D. J. 斯蒂芬斯迈尔
 Steinberg, L. 斯坦伯格
 Steinmetz, S. K. 斯坦梅茨
 Stephenson, G. 斯蒂芬森
 Sternae, L. E. 斯特梅克
 Stern, K. B. 斯特恩
 Sternberg, L. 斯特恩伯格
 Stevens, J. R. 史蒂文斯
 Stewart, D. J. 斯图尔特
 Stewart, R. A. 斯图尔特
 Stierlin, H. 施蒂尔林
 Stocking, M. M. 斯托金
 Stokes, T. F. 斯托克斯
 Stone, A. A. 斯通
 Stone, J. A. 斯通
 Stoolmiller, M. 斯图尔米勒
 Stout, D. 斯托特
 Stouthamer-Loeber, M. 斯托瑟莫-洛伯
 Stouwie, R. J. 斯托维
 Strachey, J. 斯特雷奇
 Straus, M. A. 斯特劳斯
 Streifer, C. 斯特莱夫
 Strickland, D. 斯特里克兰
 Stringer, A. Y. 斯特林格
 Strong, J. A. 斯特朗
 Strong, S. R. 斯特朗
 Stuart, R. B. 斯图尔特
 Stumphauzer, J. S. 斯达姆豪泽
 Sturman, A. 斯特曼
 Suedfeld, P. 休德菲尔德
 Sullivan, C. 沙利文
 Sutherland, E. H. 萨瑟兰
 Sutker, P. B. 萨特克
 Svensson, M. A. 斯万森
 Swanson, W. C. 斯旺森
 Sweet, A. A. 斯威特
 Swinton, M. 斯文顿
 Sykes, G. 赛克斯
 Sykes, R. E. 赛克斯
 Syndulko, K. 辛多克
 Szasz, T. S. 萨斯
 Tait, C. D. 泰特
 Tappan, P. 塔潘
 Tarling, R. 塔林
 Tarter, R. E. 塔特
 Tatsuoaka, M. M. 塔茨沃克
 Tausig, M. 陶西格
 Taylor, I. 泰勒
 Tedeschi, J. T. 特德希
 Tellegen, A. 特莱根
 Templeman, T. L. 坦普尔曼
 Tennent, G. 坦南特
 Tennent, T. G. 坦南特
 Teplin, L. A. 特普林
 Tharp, R. G. 萨普
 Thielgaard, A. 蒂尔加德
 Thirs, A. P. 蒂斯
 Thomas, A. 托马斯
 Thomas, C. W. 托马斯
 Thomas, K. E. 托马斯
 Thomas, L. 托马斯
 Thomas, M. H. 托马斯
 Thompson, W. E. 汤普森
 Thornberry, T. 索恩伯里
 Thorne, E. C. 索恩
 Thorne, G. L. 索恩
 Thornton, C. 桑顿
 Thornton, D. 桑顿
 Thurber, E. 瑟伯
 Thurston, J. R. 瑟斯顿
 Thurstone, L. L. 瑟斯顿
 Tisdelle, D. A. 蒂斯代尔
 Titch, F. S. 蒂奇
 Tittle, C. R. 蒂特尔
 Toch, H. 托奇
 Tong, J. E. 汤恩
 Tonry, M. 唐瑞
 Tori, C. D. 托里
 Torrubia, R. 托拉比亚
 Torry, M. 托里
 Tracy, P. 特雷西
 Trasler, G. B. 特拉斯拉
 Travis, L. F. 特拉维斯
 Trece, C. 特里斯
 Treiber, F. A. 特雷伯
 Trimblay, R. E. 特伦布萊

Troop, I. 特鲁普
Trower, P. 特罗尔
Truscott, D. 特拉斯克特
Tsugimoto, R. N. 楚基莫托
Tulloch, R. M. B. 塔洛克
Tulloch, G. 塔洛克
Tunstall, O. 滕斯托尔
Tupin, J. P. 图平
Turco, R. N. 特利
Turk, D. C. 特克
Turner, C. W. 特纳
Turner, F. D. 特纳
Turner, J. H. 特纳
Turner, S. M. 特纳
Tutt, N. 塔特
Tversky, A. 特夫斯基
Twain, D. C. 特温
Twentymann, C. T. 特温迪曼
Tyrer, P. 泰尔
Tyrer, T. R. 泰尔
Tyrce, A. 泰里

U

Ulbrich, P. 乌尔布里奇
Unis, A. S. 尤尼斯
Upfold, D. 厄普福德

V

Vadum, A. C. 韦德姆
Vaillant, G. E. 维列恩特
Vaillant, P. M. 维列恩特
Valenstein, E. S. 瓦伦斯坦
Vambery, R. 沃姆伯瑞
Van den Haag, E. 范登哈格
Van Der Plas-Korenhoff, C. 范德普拉斯-昆豪夫
Van Doornick, W. J. 范杜尼克
Van Eyken, A. 范艾肯
Van Hoorlus, P. 范胡赫斯
Van Ness, S. 范内斯
Vanderpearl, R. 范德皮尔
Vanderveer, P. L. 范德弗尔

Varghese, F. 瓦菲斯
Varney, G. W. 瓦内
Vaughn, M. S. 沃恩
Vedman, D. J. 维尔德曼
Veloz, E. V. 维勒茨
Venables, P. H. 威纳布来斯
Veneziano, C. 维尼加诺
Veneziano, L. 维尼加诺
Veronen, L. J. 维龙宁
Villemetz, W. J. 维勒迈兹
Villepontaux, L. A. 维勒庞图
Virkkunen, M. 沃克南
Visser, C. A. 维舍
Vitaliano, P. P. 维塔利诺
Volavka, J. 沃拉夫科
Von Hirsch, A. 冯赫希
von Knorring, A. 冯诺林
Voss, H. L. 沃斯

W

Wadsworth, M. E. J. 沃兹沃斯
Wagner, E. 瓦格纳
Waite, E. 韦特
Wakefield, J. C. 韦克福尔德
Walder, L. O. 沃尔得
Waldo, G. P. 沃尔多
Waldron, H. 沃尔德伦
Waldron, H. B. 沃尔德伦
Walker, J. L. 沃克
Walker, L. E. 沃克
Walker, L. J. 沃克
Walker, M. A. 沃克
Walker, N. 沃克
Wall, R. V. 沃尔
Walmsley, R. 沃姆斯利
Walsh, A. 沃尔什
Walter, T. L. 沃尔特
Walters, A. 沃尔特斯
Walters, G. D. 沃尔特斯
Walters, R. H. 沃尔特斯
Walton, P. 沃尔顿
Warburton, J. 沃伯顿
Ward, C. I. 沃德
Ward, D. 沃德

Warneford, A. 沃内福德
Warr, P. B. 沃尔
Warren, M. Q. 沃伦
Waston, D. 沃森
Waterman, A. S. 沃特曼
Watkins, J. T. 沃特金
Watson, S. A. 沃森
Watterson, D. 沃特森
Way, C. 韦
Weathers, L. 韦瑟斯
Weaver, F. M. 韦弗
Webb, J. 韦布
Webster, C. D. 韦伯斯特
Wedge, R. F. 韦奇
Weerts, T. C. 维尔茨
Weinberg, R. A. 温伯格
Weiner, B. 韦纳
Weiner, I. B. 韦纳
Weiner, N. A. 韦纳
Weinrott, M. R. 温罗特
Weintraub, K. J. 温特劳布
Weis, J. G. 韦斯
Weiss, G. 韦斯
Weissner, M. M. 韦斯纳
Welford, C. 韦尔弗德
Weller, B. G. A. 韦勒
Weller, M. P. I. 韦勒
Wells, L. E. 韦尔斯
Welsh, W. N. 韦尔什
Wenk, E. A. 温克
Werner, E. E. 沃纳
Werner, J. S. 沃纳
Werner, P. D. 沃纳
West, D. J. 韦斯特
West, P. A. 韦斯特
Wetherick, N. E. 韦瑟里克
Wettstein, R. M. 韦特斯
Wetzcl, R. J. 韦策尔
Wexler, H. K. 韦克斯勒
Wexler, S. 韦克斯勒
Wharton, J. D. 沃顿
Whatmore, P. B. 沃特莫尔
Whooler, S. 惠勒
White, A. J. 怀特
White, D. 怀特
White, H. R. 怀特
White, J. J. 怀特

White, J. L. 怀特
White, J. W. 怀特
White, S. O. 怀特
Whitehead, J. T. 怀特黑德
Whiteley, S. 怀特利
Whitman, S. 惠特曼
Wiatrowski, M. E. 瓦特罗斯基
Wichlacz, C. R. 威克拉茨
Widiger, T. A. 威蒂杰
Widom, C. S. 韦德姆
Wiggins, J. S. 威金斯
Wikoff, R. L. 威克夫
Wilkins, L. T. 威尔金斯
Williams, D. 威廉斯
Williams, G. 威廉斯
Williams, J. B. W. 威廉斯
Williams, J. L. 威廉斯
Williams, J. R. 威廉斯
Williams, L. M. 威廉斯
Williams, M. 威廉斯
Williams, S. 威廉斯
Williams, W. 威廉斯
Williamson, S. E. 威廉森
Willis, B. 威利斯
Wilmot, E. 威尔莫特
Wilner, D. 威尔纳
Wilson, D. L. 威尔逊
Wilson, E. O. 威尔逊
Wilson, G. 威尔逊
Wilson, G. D. 威尔逊
Wilson, G. T. 威尔逊
Wilson, H. 威尔逊
Wilson, J. Q. 威尔逊
Wilson, S. 威尔逊
Wilson, S. K. 威尔逊
Wincze, J. P. 温策
Winsten, S. T. 温斯滕
Winton, M. 温顿
Wisiewski, N. 温基斯基
Wisner, K. 威斯纳
Wisredt, B. 威斯瑞特
Witkin, H. A. 威特金
Witte, A. D. 威特
Woher, J. M. 沃伯
Wolde, G. J. S. 沃尔德
Wolf, M. M. 沃尔夫
Wolfe, D. A. 沃尔夫
Wolfgang, M. E. 沃尔夫

- 冈
 Wollersheim, J. P. 沃勒
 西姆
 Wong, S. E
 Wood, P. J. W. 伍德
 Woody, G. E. 伍迪
 Woolton, B. 伍顿
 Wormworth, J. A. 沃姆
 沃斯
 Wortzman, G. 沃策曼
 Wozniack, J. F. 沃兹尼克
 Wright, J. C. 赖特
 Wright, K. N. 赖特
 Wright, R. 赖特
 Wright, S. 赖特
 Wu, R. 吴
 Wulach, J. 乌拉克
 Wurtele, S. K. 沃特勒
 Wylie, R. C. 怀尔
- Y**
- Yamel, P. W. 亚梅尔
 Yaryura-Tobias, J. A. 亚
 与纳-托拜厄斯
 Yasavage, J. A. 业萨维
 格
 Yates, E. 耶茨
 Yesavage, J. M. T. 耶萨
 维格
 Yetman, R. 耶特曼
 Yeudall, L. T. 尤得尔
 Yochelson, S. 约奇逊
 Young, B. G. 扬
 Young, J. 扬
 Young, M. L. 扬
 Youngblade, L. M. 扬布
 雷德
 Yule, W. 尤尔
- Z**
- Zagar, R. 扎格
 Zager, L. D. 扎戈
 Zak, L. 扎克
 Zamble, E. 赞布尔
 Zeleny, L. 泽伦尼
 Zigler, E. 齐格勒
 Zillmann, D. 齐尔曼
 Zimbardo, P. G. 津巴多
 Zimmerman, J. 齐默尔曼
 Zimring, F. E. 齐姆林
 Zinger, I. 津格
 Ziskin, J. 齐斯金
 Ziskind, E. 齐斯金德
 Zuckerman, M. 朱克曼
 Zurrieff, G. E. 朱利弗

参考文献

- Abel, G. G., and Rouleau, J. L. (1990).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exual assault. In W. J.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Abel, G. G., Becker, J. V., and Cunningham-Rathner, J. (1984). Complications: consent and cognitions in sex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7, 89-103.
- Abel, G. G., Blanchard, E. B., and Becker, J. V. (1978). An integrated treatment program for rapists. In R. I. Rada (ed.), *Clinical Aspects of the Rapist*.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 Abel, G. G., Barlow, D. H., Blanchard, E. B., and Guild, D. (1977). The components of rapists' sexual arousal.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4, 895-903.
- Abel, G. G., Becker, J. V., Murphy, W. D., and Hanagan, B. (1981). Identifying dangerous child molesters. In R. B. Stuart (ed.), *Violent Behavior: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es to Prediction,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New York: Brunner/Mazel.
- Abelson, R. P. (1981).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script concep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715-729.
- Achenbach, J. M., and Edelbrock, C. S. (1978).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ld psychopathology: A review and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1275-1301.
- Adams, R. (1973).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nd learning principles revisited. *Social Problems*, 20, 458-470.
- Adams, S. (1970). The PKO project. In N. Johnston, L. Savitz and M. Wolfgang (eds), *The Sociology of Punishment and Correction*. New York: Wiley.
- Adams, S. (1977). Evaluating correctional treatments: toward a new perspectiv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323-339.
- Adler, F. (1975). *Sisters in Crime*. New York: McGraw-Hill.
- Agoston, S., and Elliott, D. (1974). The effects of legal processing on self concept. *Social Problems*, 22, 87-100.
- Agnew, V. (1986).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programs for the violent juvenile. In S. Apter and A. Goldstein (eds), *Youth Violence: Progra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ergamon.
- Agnew, R. (1984). Appearanc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2, 421-440.
- Agnew, R. (1985). Social control theory and delinquency: A longitudinal test. *Criminology*, 23, 47-60.
- Agnew, R., and Peters, A. A. R. (1986). The techniques of neutralisation: An analysis of predisposing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3, 81-97.
- Agnew, R., and Petersen, D. M. (1989). Leisure and delinquency. *Social Problems*, 36, 332-350.
- Ainsworth, M. D. S., and Bowlby, J. (1991). An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333-341.
- Ajzen, I. (1987). Attitudes, traits, and actions: dispositional prediction of behavior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2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Akers, R. (1977). *Deviant Behavior: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Second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Akers, R. (1990). Rational choice, deterrence,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ies in criminology: The path not take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81, 653-676.
- Akers, R., Krohn, M. D., Lanza-Kaduce, L., and Radosevich, M. (1979). Social learn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635-655.
- Akhtar, S., and Thomson, A. (1982). Overview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12-20.
- Alder, C. (1985). An exploration of self-reported sexually aggressive behavior. *Crime and Delinquency*, 31, 306-331.
- Aldrich, C. K. (1987). Acting out and acting up: the superego lacuna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402-406.
- Alexander, J. F., and Parsons, B. V. (1973). Short term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with delinquent families: Impact on family process and recidivism.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1, 219-225.
- Alexander, J. F., Waldron, H. B., Barton, C., and Mas, C. H. (1989). The minimising or blaming attributions in delinquent famil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19-24.
- Alker, H. A. (1972). Is personality situationally specific or intrapsychically consist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0, 1-16.
- Allan, F. A., and Steffenmeier, D. J. (1989). Youth, underemployment, and property crim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job availability and job quality on juvenile and young adult arrest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07-123.
- Allen, F. A. (1959). Criminal justice, legal values and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0, 226-232.
- Attkopp, J. F., and Feldman, M. P. (1976). Personality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schoolboy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 337-351.
- Atkinson, W. P. (1975). Traits, consistency, and conceptual alternatives for personality theor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5, 17-48.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rrectional Psychologists (1980). Standards for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adult prisons and jail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7, 81-127.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3).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681-688.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Revis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84). Text of position on insanity defense. *APA Monitor*, 15 (March), 11.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0). 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1167-1168.
- Amir, M. (1971). *Patterns in Femicide R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enaes, J. (1974).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nderson, C. A. (1989). Temperature and aggression: Ubiquitous effects of heat on occurrence of human viol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 74-96.
- Andrews, D. A. (1980). Som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rough 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 syst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448-462.
- Andrews, D. A. (1983). The assessment of outcome in correctional samples. In M. L. Lambert, E. R. Christensen, and S. S. DeJure (eds),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therapy Outcome*. New York: Wiley.
- Ainsworth, M. D. S., and Bowlby, J. (1991). An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333-341.
- Ajzen, I. (1987). Attitudes, traits, and actions: dispositional prediction of behavior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2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Akers, R. (1977). *Deviant Behavior: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Second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Akers, R. (1990). Rational choice, deterrence,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ies in criminology: The path not take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81, 653-676.
- Akers, R., Krohn, M. D., Lanza-Kaduce, L., and Radosevich, M. (1979). Social learn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635-655.
- Akhtar, S., and Thomson, A. (1982). Overview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12-20.
- Alder, C. (1985). An exploration of self-reported sexually aggressive behavior. *Crime and Delinquency*, 31, 306-331.
- Aldrich, C. K. (1987). Acting out and acting up: the superego lacuna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402-406.
- Alexander, J. F., and Parsons, B. V. (1973). Short term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with delinquent families: Impact on family process and recidivism.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1, 219-225.
- Alexander, J. F., Waldron, H. B., Barton, C., and Mas, C. H. (1989). The minimising or blaming attributions in delinquent famil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19-24.
- Alker, H. A. (1972). Is personality situationally specific or intrapsychically consist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0, 1-16.
- Allan, F. A., and Steffenmeier, D. J. (1989). Youth, underemployment, and property crim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job availability and job quality on juvenile and young adult arrest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07-123.
- Allen, F. A. (1959). Criminal justice, legal values and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0, 226-232.
- Attkopp, J. F., and Feldman, M. P. (1976). Personality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schoolboy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 337-351.
- Atkinson, W. P. (1975). Traits, consistency, and conceptual alternatives for personality theor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5, 17-48.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rrectional Psychologists (1980). Standards for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adult prisons and jail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7, 81-127.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3).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681-688.

- Balav, I., and Shevlin, H. (1988) The subliminal psychodynamic activation method. A critical review.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161-174.
- Baldwin, J. D. (1985) Thrill and adventure seeking and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crime. Comment on Hirschi and Gottfreds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1326-1330.
- Baldwin, J. W. (1975) The medical model of delinquency: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Criminology*, 21, 116-129.
- Ball, R. A. (1983) Development of basic norm violation. Neutralisation and self-concept within a male cohort. *Criminology*, 21, 75-94.
- Ball-Rokeach, S. (1973) Values and violence: A test of the subculture of violence 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736-749.
- Bandura, A. (1974) Behavior theory and the models of m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9, 859-869.
- Bandura, A. (1982) The psychology of chance encounters and life path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747-755.
- Bandura, A. (1983)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aggression. In R. G. Geen and F. J.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views*. Volume On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89) 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1175-1184.
- Bandura, A., and Walters, R. H. (1959) *Adolescent Aggress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 Bandura, A., and Walters, R. H. (1963) *Social Learning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anister, P. A., Smith, P. V., Hickin, K. J., and Bolton, N. (1973)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long-term imprisonment: I. Cognitive variabl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3, 312-323.
- Barbaree, H. E. (1990) Stimulus control of sexual arousal. Its role in sexual assault.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F.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Barbaree, H. E., Marshall, W. L., and Lanthier, R. D. (1979) Deviant sexual arousal in rapis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7, 215-222.
- Barbour-McMullen, J., Coid, J., and Howard, R. (1988) The psychometric identification of psychopathy in mentally abnormal offend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 817-823.
- Barlow, D. H., and Agyas, W. S. (1973) Fading to increase heterosexual responsiveness in homosexual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6, 355-367.
- Barlow, C. R., and Bartol, A. M. (1987) History of forensic psychology. In I. B. Weiner and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Bartollas, C. (1990) The prison. Disorder personified. In J. W. Murphy and J. E. Dixon (eds), *Are Prisons Any Better? Twenty Years of Correctional Reform*. Newbury Park, CA: Sage.
- Barton, C., and Alexander, J. F. (1981)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In A. S. Gurman and D. P. Kniskern (eds), *Handbook of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Brunner/Mazel.
- Barton, C., Alexander, J. F., Waldron, H., Turner, C. W., and Warburton, J. (1985) Generalisation of treatment effects of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Three re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3, 16-26.
- Basia, J. M., and Davidson, W. S. (1988) Treatment of juvenile offenders: Study outcomes since 1980.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6, 355-384.
- Baxter, D. J., Barbaree, H. E., and Marshall, W. L. (1986) Sexual responses to consenting and forced sex in a large sample of rapists and nonrapis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4, 513-520.
- Bayle, D. L. (1978) The role of the psychiatris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6, 139-146.
- Bean, P. (1981) *Punishment: A Philosophical and Criminological Inquiry*. Oxford: Robertson.
- Bean, P. (1983) The nature of psychiatric theory. In P. Bean (ed.), *Mental Illness: Changes and Trends*. Chichester: Wiley.
- Bean, P. (1985)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theory in secure accommodation. In L. Gostin (ed.), *Secure Provision: A Review of Special Services for the Mentally Ill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Tavistock.
- Beck, A. T. (1976)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Beck, A. T., and Freeman, A. (1990) *Cognitive Therap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Guilford.
- Becker, H. (1963) *Outsiders*. New York: Free Press.
- Becker, J. V., and Hunter, J. A. (1992) Evaluation of treatment outcome for adult child molester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9, 74-92.
- Becker, W. C. (1960) The matching of behavior rating and questionnaire personality facto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7, 201-212.
- Beidel, D. C., and Turner, S. M. (1986) A critique of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ies and therapie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6, 177-197.
- Bell, C. R., Mundy, P., and Quay, H. C. (1982) Modifying impulsive responding in conduct-disordered institutionalized boys. *Psychological Reports*, 52, 307-310.
- Bell, R. Q. (1968)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effects in studies of socialis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75, 81-95.
- Bellak, A. S. (1983) Recurrent problems in the behavioural assessment of social skil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1, 29-41.
- Bennett, T. (1986)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from the offenders' perspective. In K. Heal and G. Laycock (eds),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London: HMSO.
- Bennett, K. (1975) A model program for counseling and placement of offenders.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12, 168-173.
- Benton, D., Kuman, N., and Brain, P. F. (1982) Mild hypoglycemia and questionnaire measures of aggression. *Biological Psychology*, 14, 129-135.
- Berkowitz, L. (1986) Some varieties of human aggression. Criminal violence as coercion, rule-following,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impulsive behaviour. In A. Campbell and J. J. Cabes (eds), *Violent Transactions: The Limits of Pers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 Berkowitz, L. (1989)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 59-73.
- Berkowitz, L. (1990) On the 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anger and aggression: A cognitive-neoassociationist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494-503.
- Berkowitz, L., and Donnerstein, E. (1982) External validity is more than skin deep: Some answers to criticism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245-257.
- Berlyne, D. E. (1960) *Conflict, Arousal, and Curio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 Berman, A., and Siegal, A. M. (1976) Adaptive and learning skills in juvenile delinquents: A neuropsych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9, 583-590.
- Berman, T., and Paisley, T. (1984) Personality in assaultive and nonassaultive juvenile male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Reports*, 54, 527-530.
- Bernal, M. E., Klinnert, M. D., and Schultz, L. A. (1980) Outcome evaluations of 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 and client-centered parent counselling for children with conduct problem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13, 677-691.
- Bernard, T. J. (1984) Control criticisms of strain theories: An assessment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equa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1, 353-372.
- Berkowitz, M. S. (1983)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aggression. In R. G. Geen and E. I.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views*. Volume On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eyleveld, D. (1979) Identifying, 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deterren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205-224.
- Beyleveld, D. (1982) Ehrlich's analysis of deterren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2, 101-123.
- Blagaj, M., and Fraser, W. I. (1970) Young offenders: images of self and surroundings: A semantic enquir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7, 381-387.
- Bhaskar, R. (197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Binder, A. (1987)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H. C. Quay (ed.), *Handbook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Chichester: Wiley.
- Binder, A. (1988) Juvenile delinquenc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9, 253-282.
- Binder, R. L., and McNeil, D. E. (1988) Effects of diagnosis and context on dangerous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 728-732.
- Bishop, D. M. (1984) Legal and extralegal barriers to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2, 403-419.
- Bishop, D. V. M. (1977) The P scale and psycho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6, 127-134.
- Bissham, J. I., and Fredson, F. P. (1984) Anger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a stress inoculation treatment for a chronic aggressive patient.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8, 551-556.
- Black, D. A., and Spinks, P. (1985) Predicting outcomes of mentally disordered and dangerous offenders. In D. P. Farrington and R. Tarling (eds), *Prediction in Crimi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lack, D. A., Blackburn, R., Blackler, C. D., and Howard, I. R. C. (1973) Memorandum of evidence to the Butler Committee on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mentally abnormal offender.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6, 331-342.
- Black, D. J., and Reiss, A. (1970) Police control of juveni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63-77.
- Blackburn, R. (1968a) The scores of Eysenck's criterion groups on some MMPI scales related to emotionality and extravers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 3-12.
- Blackburn, R. (1968b) Personality in relation to extreme aggression in psychiatric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4, 821-828.
- Blackburn, R. (1968c) Emotionality, extraversion and aggression in paranoid and nonparanoid schizophrenic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4, 1301-1302.
- Blackburn, R. (1969) Sensation seeking, impulsivity, and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 571-574.
- Blackburn, R. (1971a) Personality types among abnormal homicid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14-31.
- Blackburn, R. (1971b) MMPI dimensions of sociability and impulse control.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7, 166.
- Blackburn, R. (1972) Dimensions of hostility and aggression in abnormal offend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8, 20-26.
- Blackburn, R. (1975a) An empirical classification of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7, 456-460.
- Blackburn, R. (1975b) Aggression and the EEG: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4, 358-365.
- Blackburn, R. (1978) Psychopathy, arousal, and the need for stimulation.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 Blackburn, R. (1979a) Psychopathy and Personality: The dimensionality of self-report and behaviour rating data in abnormal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8, 111-119.
- Blackburn, R. (1979b) Cortical and autonomic arousa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psychopaths. *Psychophysiology*, 16, 143-150.
- Blackburn, R. (1980a) Personality and the criminal psychopath. In Facoltà di Giurprudenza, Università di Messina *Lo Psicopatico Delinquente*. Milan: Giuffrè.
- Blackburn, R. (1980b) Still not working? A look at recent outcomes in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ottish Branch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s Conference on 'Devianc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 Blackburn, R. (1982) *The Special Hospitals: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is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ark Lane Hospital, Liverpool.
- Blackburn, R. (1984) The person and dangerousness. In D. J. Muller, D. E.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Blackburn, R. (1986) Patterns of personality deviation among violent offenders: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an empirical taxonom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6, 254-269.
- Blackburn, R. (1987) Two scal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antisocial popul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 81-93.
- Blackburn, R. (1988a) Psychopathy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E. Miller and P. J. Cooper (eds), *Adult Abnormal Psychology*. Edinburgh: Churchill Livingstone.
- Blackburn, R. (1988b) On moral judgement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The myth of the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revisited.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505-512.
- Blackburn, R. (1989) Psychopathy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relation to violence. In K. Howells and C. R. Hollin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Violence*. Chichester: Wiley.
- Blackburn, R., and Lee-Edwards, J. M. (1985) Reac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psychopaths to anger evoking situ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4, 93-100.
- Blackburn, R., and Maybury, C. (1985) Identifying the psychopath: the relation of Cleckley's criteria to the interpersonal domai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 375-386.
- Blackburn, R., Crollin, M. C., Morgan, E. M., and Fulloch, R. M. B. (1990) Prevalenc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a special hospit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1, 43-52.
- Blackburn, D. E. (1981) On mental elements and their place in psychology and law. In J. Shapland (ed.), *Lawyers and Psychologists—The Way Forward: Issues in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 No. 1.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Blackburn, D. E., Muller, D. J., and Chapman, A. J. (1984)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and law. In D. J. Muller, D. E.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Blader, J. C., and Marshall, W. L. (1989) Is assessment of sexual arousal in rapists worthwhile? A critique of current meth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ponse compatibility approach.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9, 569-587.
- Blair, C. D., and Lanyon, R. I. (1981) Exhibitionism. Etiology and trea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9, 439-463.
- Blakely, C. H., and Davidson, W. S. (1984)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delinquency. In J. Karoly and J. J. Steffen (eds), *Adolescent Behavior Disorders: Foundations and Contemporary Concern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Blashfield, R. K. (1980) Propositions regarding the use of cluster analysis in clin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8, 456-459.
- Blashfield, R. K., and Draguns, J. G. (1976) Toward a taxonomy of psychopathology: The purpose of psychiatric classif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9, 574-583.
- Blasi, A. (1980) Bridging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a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 1-45.
- Blaske, D. M., Borduin, C. M., Henggeler, S. W., and Mann, B. J. (1989) Individual, family, and peer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sex offenders and assaultive offend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 846-855.
- Blau, P. (1981) Behavioral sociology or behavior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16, 170-171.
- Blau, T. H. (1984) Psychological tests in the courtroom.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5, 176-186.
- Blau, T. H. (1985) The psychologist as expert in the courts. *The Clinical Psychologist*, 38, 76-78.

- Block, C. R., and Block, R. I. (1984). Crime definition, crime measurement, and victim survey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0, 137-139.
- Block, R. (1977). *Violent Crim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Blumstein, A. (1983). Selective incapacitation as a means of crime contro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7, 87-108.
- Blumstein, A., Cohen, J., and Farrington, D. P. (1988). Criminal career research: Its value for criminology. *Criminology*, 26, 1-35.
- Blumstein, A., Farrington, D. P., and Mostro, S. (1985). Delinquency careers: Innocents, desistors, and persisters. In M. Tonry and N. Morris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ume 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hman, M., Cloninger, C. R., Sigvardsson, S., and von Knorring, A. (1982). Predisposition to petty criminality in Swedish adoptees: I.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9, 1233-1241.
- Bolles, R. C. (1972). Reinforcement, expectancy, and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79, 394-409.
- Bonta, J. L. (1986). Prison crowding: Searching for the functional correlat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96-101.
- Bonta, J. L., and Motiuk, L. L. (1985). Utilization of an interview-based classification instrument: A study of correctional halfway house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2, 333-352.
- Bornstein, P. H., Hamilton, S. B., and McFall, M. E. (1981). Modification of adult aggress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M. Hersen, R. M. Fidler, and P. M. Miller (eds), *Progress in Behavior Modification*, Volume 1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ourne, D., Flowers, V., Bodner, F., and Satterfield, D. A. (1977). Personal space variations as a function of crimin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ports*, 41, 1115-1121.
- Boorse, C. (1975).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sease and illnes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5, 49-68.
- Boorse, C. (1976). What a theory of mental health should b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6, 61-84.
- Boren, J. J., and Colman, A. D. (1970). Some experiments on reinforcement principles within a psychiatric ward for delinquent soldier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3, 29-37.
- Borrows, A., and McWilliams, W. (1990). Evaluating intermediate treatment. In D. Robbins and A. Walters (eds), *Department of Health Yearbook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ondon: HMSO.
- Bottomley, A. K. (1979). *Criminology in Focus*. Oxford: Robertson.
- Bottomley, K., and Pease, K. (1986). *Crime and Punishment: Interpreting the Data*.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uchard, T. J., Lykken, D. T., McGue, M., Segal, N. L., and Tellegen, A. (1990). Source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 *Science*, 250, 223-228.
- Bowdieu, P. (1985). Psychiatry and dangerousness: A counter-revolution? In L. Gostin (ed.), *Secure Provisions: A Review of Special Services for the Mentally Ill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Tavistock.
- Bowlby, J. (1944). Forty-four juvenile thie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5, 1-57.
- Bowman, P. C., and Auerbach, S. M. (1982). Impulsive youthful offenders: A multimodal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program.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9, 432-454.
- Box, S. (1981). *Deviance, Reality and Society*. Second Edition.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ox, S. (1983). *Power Crime and Mystification*. London: Tavistock.
- Bradford, J. M. V. (1985). Organic treatments for the male sexual offender.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3, 355-375.
- Brain, P. F. (1968). Alcohol and aggression: the nature of the presumed relationship. In P. F. Brain (ed.), *Alcohol and Aggression*. London: Croom Helm.
- Braithwaite, J. (1981). The myth of social class and criminology reconsider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36-57.
- Braukmann, C. J., and Wolf, M. M. (1987). Behaviorally based group homes for juvenile offenders. In F.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Braukmann, C. J., Kirglin, K. A., and Wolf, M. M. (1980). Group home treatment research: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control perspectives. In T. Hirschi and M. Gottfredson (eds), *Understanding Crime: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rennan, T. (1987a). Classification: An overview of selecte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D. M. Gottfredson and M. Tonry (eds),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ennan, T. (1987b). Classification for control in jails and prisons. In D. M. Gottfredson and M. Tonry (eds),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eslow, N. (1987). Locus of control, desirability of control, and sadomasochists. *Psychological Reports*, 61, 995-1001.
- Brown, C. R. (1984). Cognitive change processes in psychotherapy.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79-394.
- Bridges, G. S., and Stone, J. A. (1986). Effect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on perceived threat of punishment: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specific deterr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3, 207-239.
-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1985). A code of conduct for psychologists.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8, 41-43.
-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1986).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use of the polygraph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personnel screening.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9, 81-94.
- Brittain, R. P. (1970). The sadistic murderer.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10, 198-207.
- Brodsky, S. L. (1972). Psychologis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arbondale, Ill.: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rrectional Psychologists.
- Brodsky, S. L. (1980). Ethical issues for psychologists in corrections. In J. Monahan (ed.), *Who is the Client? The Ethic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rodsky, S. L., and Robey, A. (1973). On becoming an expert witnes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3, 173-176.
- Brodsky, S. L., and Smitherman, H. O. (1983). *Handbook of Scales for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New York: Plenum.
- Brody, S. R. (1976). *The Effectiveness of Sentencing*.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35. London: HMSO.
- Brody, S. R., and Tarling, R. (1980). *Idling Offenders out of Circulation*.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54. London: HMSO.
- Brown, B. J. (1985a). The involvement of psychologists in sentencing.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8, 180-182.
- Brown, B. J. (1985b).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learning methods in a residential programme for young offende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 321-331.
- Brown, D., Fenwick, P., and Howard, R. (1989). The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in a go/no go avoidance task: Relationships with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7, 35-45.
- Brown, H. I. (1977). *Perception, Theory and Commit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wn, S. E. (1984). Social class, child maltreatment,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Criminology*, 22, 259-278.
- Brownell, K. D., Marlatt, G. A., Lichtenstein, E., and Wilson, G. T. (1986).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relaps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765-782.
- Brownfield, D. (1986). Social class and violent behavior. *Criminology*, 24, 421-438.
- Brownmiller, S. (1975).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Bantam.
- Bry B. H. (1982).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adolescent problems through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One- and five-year follow-up.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0, 265-276.
- Bryant, E. I., Scott, M. L., Golden, C. J., and Ton, C. D. (1984).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learning disability and violent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323-324.
- Brynn, J., O'Malley, P., and Bachman, J. (1981). Self-esteem and delinquency revisited.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0, 407-441.
- Buikhuisen, W., and Hoeksma, H. A. (1974). Factors related to recidivism.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4, 63-69.
- Buikhuisen, W., Van Der Plas-Korenhof, C., and Bonteke, F. H. M. (1988). Alcohol and violence.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Bukstel, J. H., and Kilmann, P. R. (1980).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imprisonment on confined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 469-491.
- Bull, K. (1982).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delinquency. *Current Psychological Reviews*, 2, 269-282.
- Bull, R. (1984). Psychology's contribution to policing. In D. J. Muller, D. E.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Burchard, J. D., and Lane, T. W. (1982). Crime and delinquency. In A. S. Bellak, M. Hersen, and A. E. Kazd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New York: Plenum.
- Burgess, A. W., Hartman, C. R., Ressler, R. K., Douglas, J. E., and McCormack, A. (1986). Sexual homicide: A motivational model.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 251-272.
- Burgess, P. K. (1972). Feyerherk's theory of criminality: A test of some objections to disconfirmatory evid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1, 248-256.
- Burgess, R. I., and Akers, R. L. (1966). A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reinforcement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ur. *Social Problems*, 13, 128-147.
- Burgess, R. L., and Youngblade, L. M. (1988). Social incompeten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busive parental practices. In C.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 Bursik, R. J. (1980). The dynamics of specialisation in juvenile offenders. *Social Forces*, 58, 851-864.
- Bursik, R. J., and Webb, J. (1982). Community change and patterns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24-42.
- Burt, C. (1925). *The Young Delinquent*.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 Burt, M. R. (1980). Cultural myths and support for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217-230.
- Burton, R. V. (1984). A paradox in theories and research in moral development. In W. M. Kurtines and J. L. Gewirtz (eds), *Morality, Moral Behaviour, and Moral Development*. Chichester: Wiley.
- Busch, K. G., Zagar, R., Hughes, J. K., Arbut, J., and Bussell, R. E. (1990). Adolescents who kill.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6, 472-485.
- Bushman, B. J., and Cooper, H. M. (1990). Effects of alcohol on human aggression: An integrative research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 341-354.
- Buss, A. H. (1961). *The Psychology of Aggression*. New York: Wiley.
- Cadoret, R. J. (1978). Psychopathology in adopted-away offspring of biologic parents with antisocial behavio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5, 176-184.
- Carnes, K. B., Carnes, B. D., Neckerman, H. J., Gess, S. D., and Ganley, J. L. (1988). Social network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peer support or peer rejec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 815-823.
- Camp, B. W., Blom, G. E., Herbert, F., and Van Doornick, W. J. (1977). "Think Aloud": A program for developing self-control in young aggressive boy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5, 157-169.
- Cantor, D. (1984). Offender profiling. *The Psychologist*, 2, 12-16.
- Cantor, D., and Heritage, R. (1990).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sexual offence behaviour: Developments in offender profiling.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1, 185-212.
- Cantor, R. J. (1982a). Sex differences in self-report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0, 373-393.
- Cantor, R. J. (1982b). Family correlates of male and female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0, 149-167.
- Cantor, N. (1990). From thought to behavior: "having" and "doing"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735-750.
- Cantor, N., Smith, K. E., French, R., and Merzich, J. (1980). Psychiatric diagnosis as prototype categoris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9, 181-193.
- Caplan, N. S., and Siebert, L. A. (1964). Distribu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t intelligence test scores over a thirty-four year period.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 242-247.
- Carbunell, J. L. (1983). Inmat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 cross-tabulation of two method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0, 285-292.
- Carmey, F. I. (1977). Outpatient treatment of the aggressive offen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31, 265-274.
- Carmey, F. I. (1978). Inpatient treatment programs. In W. H. Reid (ed.), *The Psychopat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ntisocial Disorders and Behavior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Carrigan, P. M. (1966). Extraversion-introversion as a dimension of personality: a reapprais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7, 329-360.
- Carroll, D. (1988). How accurate is polygraph lie detection? In A. Co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 Carroll, J. S. (1978). 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deterrence: The evaluation of crime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512-1520.
- Carroll, J. S. (1982). Committing a crime, the offender's decision. In V. J. Konecni and E. Ebbesen (ed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San Francisco: Freeman.
- Carroll, J. S., and Weaver, F. M. (1986). Shoplifters' perceptions of crime opportunities: A process-tracing study. In D. B. Cornish and R. V. G.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Carroll, J. S., Perkowitz, W. T., Lurigio, A. J., and Weaver, F. M. (1987). Sentencing goals, causal attributions, ideology,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07-118.
- Carson, D. (1984). Putting the expert in expert witness. In D. J. Muller, D. E.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Carson, R. C. (1979). Personality and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In R. J. Burgess and T. L. Huston (eds),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arter, D. L., Prentky, R. A., Knight, R. A., Vanderveer, P. L., and Boucher, R. J. (1987). Use of pornography in the criminal and developmental histories of sex offend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 195-211.
- Caspi, A., Bem, D. J., and Elder, C. H. (1989).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actional style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7, 375-406.
- Cattell, R. B. (1966).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attell, R. B., Eber, H. W., and Tatsuoka, M. M. (1970). *Handbook for the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Champaign, Ill: Institute for Personality and Ability Testing.
- Cavon, H. E., and Schmidt, A. A. (1978). Tes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trategy at the Robert F. Kennedy Centr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5, 131-139.
- Cernkovich, S. A., and Giordano, P. C. (1979).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le and female delinquenc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 131-145.
- Cernkovich, S. A., and Giordano, P. C. (1987).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5, 295-321.

- Chalken, M. R. and Chalken, J. M. (1984) Offender types and public policy. *Crime and Delinquency*, 30, 195-226.
- Chambliss, W. (1969) *Crime and the Legal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 Chappell, D. (1989) Sexual criminal violence. In N. A. Weiner and M. E. Wolfgang (eds), *Pathways to Criminal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Charlier, M. (1973) Egocentrism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The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of social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9, 326-332.
- Chess, S. and Thomas, A. (1984)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Behavior Disorder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Chilton, R. J. and Markle, G. E. (1972) Family disruption, delinquent conduct and the effect of sub-class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93-99.
- Cluskey, D. (1978) Insanity in bar of trial in Scotland: A state hospital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2, 598-601.
- Christiansen, K. O. (1977a) A review of studies of criminality among twins. In S. A. Mednick and K. O. Christiansen (eds), *Biological Ba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Christiansen, K. O. (1977b)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riminality among twins. In S. A. Mednick and K. O. Christiansen (eds), *Biological Ba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New York: Gardner Press.
- Christie-Crowne, J. R. W. (1983) Paraphilia: Sadomasochism, fetishism,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227-231.
- Clarke, R. V. G. (1977) Psychology and crime.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0, 280-283.
- Clarke, R. V. G. (1980)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 136-147.
- Clarke, R. V. G. (1985) Jack Tizard Memorial Lecture: Delinquency, environment and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6, 505-523.
- Clarke, R. V. G., and Cornish, D. B. (1985) Modelling offenders' decisions: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In M. Tonry and N. Morris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ume 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laster, D. S. (1967) Comparison of risk perception between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8, 80-86.
- Cleckley, H. (1976) *The Mask of Sanity*, Sixth Edition. St. Louis: Mosby.
- Clemmer, D. (1958) *The Prison Commun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loward, M. H., and Quinney, R. (1973) *Criminal Behavior Syste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Crimpeel, W. C., Mulvey, E., and Repucci, N. D. (1980) A national study of ethical dilemmas of psychologis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J. Monahan (ed.), *Who is the Client? The Limi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loninger, C. R., Christiansen, K. O., Reich, J., and Gottesman, I. I. (1978) Implicatio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of antisocial personality, alcoholism, and criminality for familial transmi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5, 941-951.
- Cloward, R. A., and Ohlin, I. F. (1961)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Glencoe: Free Press.
- Coccaro, E. (1989) Central serotonin and impulsive aggre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5, 52-56.
- Cochrane, R. (1971) The structure of value systems in male and female prison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73-79.
- Cochrane, R. (1974) Crime and person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7, 19-22.
- Coccaro, J. J., and Steadman, H. J. (1974) Some refine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of dangerous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 1012-1014.
- Coccaro, J. J., and Steadman, H. J. (1978) Prediction in psychiatry: An example of misplaced confidence in experts. *Social Problems*, 25, 265-276.
- Cohen, A. K. (1955) *Delinquent Boys*. Glencoe: Free Press.
- Cohen, H. I., and Filipezak, J. (1971) *A New Learning Environ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Cohen, L. E., and Felson, M.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588-608.
- Cohen, J. F., and Klugel, J. R. (1978) Determinants of juvenile court disposi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62-176.
- Cohen, L. E., and Land, K. C. (1987) Age structure and crime: Symmetry versus asymmetry and the projection of crime through the 199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70-183.
- Cohen, I. F., and Marchalek, R. (1989) A general theory of expropriative crime: An evolutionary ecological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465-501.
- Cohen, M., Seehorn, T., and Calmas, W. (1969) Sociometric study of the sex offende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4, 249-255.
- Coid, J. (1982) Alcoholism and violence.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9, 1-13.
- Coid, J. (1983) The epidemiology of abnormal homicide and murder followed by suicid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3, 855-860.
- Coid, J. (1984) How many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pris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 78-86.
- Colby, A., and Kohlberg, L. (1987) *The Measurement of Moral Jud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 Collingwood, F. R., and Genthner, R. W. (1980) Skills training as treatment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11, 591-598.
- Collins, J. J. (1989) Alcohol and interpersonal violence: Less than meets the eye. In N. A. Weiner and M. E. Wolfgang (eds), *Pathways to Criminal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Collins, J. J., and Bailey, S. L. (1990a)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violent behavio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3, 203-220.
- Collins, J. J., and Bailey, S. L. (1990b) Relationship of mood disorders to violenc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8, 44-47.
- Colman, A. D., and Baker, S. I. (1964) Utilization of an operant conditioning model for the treatment of character and behavior disorders in a military set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5, 101-109.
- Colman, A. M., and Gorman, L. P. (1982) Conservatism, dogmat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British police officers. *Sociology*, 16, 1-11.
- Colvin, M., and Pauly, J. (1983) A critique of criminology: Toward an integrated structural-Marxist theory of delinquency 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513-551.
- Committee on Ethical Guidelines for Forensic Psychologists (1991) Specialty guidelines for forensic psychologist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655-665.
- Como, P. G. (1977) The use of multiple personality variables to predict recidivism in prisoners.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 Conaway, L. P., and Hansen, D. J. (1989) Social behavior of physically abused and neglected children: A critical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9, 627-652.
- Conger, R. D. (1976)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learning models of delinquent behavior: A synthesis. *Criminology*, 14, 17-40.
- Connolly, K., and McKellar, P. (1963) Forensic psychology.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16, 16-24.
- Conrad, S. R., and Winzler, J. P. (1976) Orgasmic reconditioning: A controlled study of its effects upon the sexual arousal and behavior of adult male homosexuals. *Behavior Therapy*, 7, 135-166.
- Convit, A., Jager, I., Lin, S. P., Meisner, M., Brizer, D., and Volavka, I. (1988) Prediction of violence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Cook, P. J. (1980) Research in criminal deterrenc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econd decade. In M. Tonry and N. Morris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ume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oke, D. (1989) Containing violent prisoners: An analysis of the Barlingham Special Unit.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9, 129-143.
- Cooke, D. (1990) Being an 'expert' in court. *The Psychologist*, 3, 216-221.
- Cooke, D. (1991a) Violence in prisons: The influence of regime factors. *Howard Journal*, 30, 95-109.
- Cooke, D. (1991b) Treatment as an alternative to prosecution: Offenders diverted for treat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8, 785-793.
- Cooper, B., and Shepherd, M. (1973) Epidemiology and abnormal psychology. In H. J. Eysenck (ed.), *Handbook of Abnormal Psychology*. London: Pitman.
- Cooper, R. P., and Weiner, P. D. (1990) Predicting violence in newly admitted inmates: A lens model analysis of staff decision making.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7, 431-447.
- Copas, J. B., O'Brien, M., Roberts, J., and Whitely, S. (1984) Treatment outcome in personality disorder: The effect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ural measur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 565-573.
- Copeland, T. F., and Parish, I. S. (1979) Attempt to enhance moral judgments of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5, 831-834.
- Cornish, D. B., and Clarke, R. V. G. (1975) Residential treatment and its effects on delinquency. London: HMSO.
- Corman, D. B., and Clarke, R. V. G. (eds) (1986)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Corsaro, R. J., and Miller, G. A. (1954) Psychology in prisons, 1952. *American Psychologist*, 9, 184-185.
- Cortes, I. B., and Gatti, F. M. (1972) *Delinquency and Crime: A Biopsychosocial Approach*.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Coslin, I., and Schwartz, N. (1987) Beliefs about rape and women's social roles: A four-nation stud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 46-56.
-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1981) *Taming the Troublesome*. London: Calverly North Star Press.
- Court, J. H. (1984) Sex and violence: A ripple effect. In N. M. Malamut and E. Donnerstein (eds),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wie, J., Cowie, V., and Slater, L. (1968) *Delinquency in Girls*. London: Heinemann.
- Cox, M. (1980) Personal reflections upon 3,000 hours in therapeutic groups with sex offenders. In D. J. West (ed.), *Sex Offender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room Helm Conference Series No. 12. Cambridg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Cox, V. C., Paulus, P. B., and McKain, G. (1984) Prison crowding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1148-1160.
- Critt, M., Stephenson, G., and Cranger, C. (1994) A controlled trial of authoritarian and self-governing regimes with adolescent psychopath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4, 543-554.
- Crawford, D. A. (1979) Modification of deviant sexual behaviour: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52, 151-156.
- Crawford, D. A., and Allen, J. V. (1979) A social skills training program with sex offenders. In M. Cook and G. Wilson (eds), *Love and Attraction*. Oxford: Pergamon.
- Crawford, D. A., and Howells, K. (1982) The effect of sex education with disturbed adolescents. *Behavioural Psychotherapy*, 10, 339-345.
- Crimpaux, C., and Couture, M. (1980) Men's erotic fantasi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9, 565-581.
- Cressey, D. R. (1969) Role theory,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nd compulsive crimes. In D. R. Cressey and D. Ward (eds), *Delinquency, Crime, and Social Proc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Critchlow, B. (1986) The powers of John Barleycorn: Beliefs about the effects of alcohol on 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751-764.
- Crimm, H. F. M. (1984) Some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mens rea. In D. J. Muller, D. F.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Crow, I. (1987) Black peopl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UK. *Howard Journal*, 26, 303-314.
- Crowe, R. R. (1972) The adopted offspring of women criminal offenders: A critique of *General Psychiatry*, 27, 610-618.
- Cullen, F. T., and Gendreau, P. (1989)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onal rehabilitation: Reconsidering the 'nothing works' debate. In L. Goodstein and D. L. Mackenzie (eds), *The American Prison: Issues in Research Policy*. New York: Plenum.
- Cullen, F. T., Imk, B. G., Travis, L. F., and Wozniak, J. F. (1985) Consensus of crime seriousness: Empirical reality or methodological artifact? *Criminology*, 23, 99-118.
- Lunnen, A. J. (1985) Pathological gambling as an insanity defense. *Behavioral Science and the Law*, 3, 89-112.
- Curtis, L. W. (1971) Predictive value compared to predictive valid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908-914.
- Curtis, L. A. (1974) Victim precipitation and violent crime. *Social Problems*, 21, 594-605.
- Cusson, M., and Pinsonneault, P. (1986) The decision to give up crime. In D. B. Cornish and R. V. G.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Datzman, R., and Zuckerman, M. (1980) Disinhibitory sensation-seeking, personality and gonadal hormon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 103-110.
- Dale, M. W. (1976) Barriers to the rehabilitation of ex-offenders. *Crime and Delinquency*, 22, 322-337.
- Dalgaard, O. S., and Kningsen, E. (1976) A Norwegian twin study of crimin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 213-233.
- Daltin, K. (1961) Menstruation and crim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1732-1733.
- Daum, J. M., and Bielaskus, V. J. (1983) Fathers' absence and moral development of male delinquents. *Psychological Reports*, 53, 223-228.
- Davidson, W. S., Redner, B., Blakely, C. H., Mitchell, C. M., and Emshoff, J. C. (1987) Diversion of juvenile offenders: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68-75.
- Davies, W., and Burgess, P. W. (1988) The effects of management regime on disruptive behaviour: An analysis within the British prison system.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8, 243-247.
- Davis, C., Cowles, M., and Kohn, P. (1983) Strength of the nervous system and augmenting-reducing: Paradox lo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 491-498.
- Davis, G. L., and Lutenberg, H. (1987) Adolescent sex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 417-427.
- Davis, H. M. (1974a) What does the P scale measur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5, 161-167.
- Davis, H. M. (1974b) Psychometric prediction of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3, 239-246.
- Davis, J. C., and Crimley, A. J. (1976)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8, 68-77.
- Davison, G. C. (1980) And now for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little r. In M. J. Maroney (ed.), *Psychotherapy Proces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ew York: Plenum.
- Deffenbacher, J. I., Derrin, P. M., and Brandon, A. D. (1986) High general anger correlates and treatment.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4, 481-489.
- DeFleur, M. C., and Quinney, R. (1966) A reformulation of Sutherland's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and a strategy for empirical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 1-22.
- DeJong, I., and Everaerd, W. (1989)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sexual arousal: A review.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7, 353-364.
- Delgado-García, A. V., Mattson, R. H., King, J., Goldensmith, E. S., Spiegel, H., Madsen, J., Cranall, P., Drefuss, F., and Porter, R. J. (1981) The nature of aggression during epileptic seiz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5, 711-716.

- Dell, S., and Robertson, G. (1988). *Sentenced to Hospital: Offenders in Broadmoor*. Maudsley Monographs No. 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l, S., and Smith, A. (1983). Changes in the sentencing of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homicid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2, 20-34.
- Dwyer, E. (1977). Deindividuation: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5, 143-156.
- Dietrich, S. G., and Berger, L. S. (1978). The MMPI in criminology: Abuses of application.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Law*, 2, 453-480.
- Dietz, P. (1978). Social factors in rapist behavior. In R. T. Rada (ed), *Clinical Aspects of the Rapist*.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 Dietz, P. (1985). Sex offender profiling by the FBI: A preliminary conceptual model. In M. H. Ben-Aron, S. J. Hucker, and C. D. Webster (eds), *Clinical Criminology*. Toronto: Clark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 Dishion, T. J., Patterson, G. R., Stoolmiller, M., and Skinner, M. L. (1991). Family, school, and behavioral antecedents to early adolescent involvement with antisocial pe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172-180.
- Dishion, T. J., Loeber, R., Stouthamer-Loeber, M., and Patterson, G. R. (1984). Skills deficits and male adolescent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2, 37-53.
- Dixon, N. F., and Henley, S. H. A. (1980). Without awareness. In M. Jeeves (ed), *Psychology Survey*, No. 1.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Dobash, R. E., and Dobash, R. P. (1984). The nature and antecedents of violent act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4, 269-288.
- Dodge, K. A. (1986). A social-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In M. Perlmutter (ed.), *Minnesota Symposium on Child Psychology*. Hillsdale, NJ: Erlbaum.
- Dodge, K. A., and Somborg, D. R. (1987).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 among aggressive boys are exacerbated under conditions of threats to the self. *Child Development*, 58, 213-224.
- Dollard, J., Miller, N., Doob, L., Mowrer, O. H., and Sears, R. R. (1939).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mbrose, L. A., and Slobin, B. S. (1988). The IES test. *Perception and Motor Skills*, 8, 347-349.
- Donnerstein, E. (1983). Erotica and human aggression. In R. G. Geen and E. I.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onnerstein, E. (1984). Pornography: Its effect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N. M. Malamuth and E. Donnerstein (eds),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unne, D. M., and Marlatt, C. A. (1982). Personality subtypes among driving-while-intoxicated offenders: Relation to drinking behavior and driving risk.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0, 241-249.
- Dooley, F. (1990). Prison suicide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2-1987.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6, 40-45.
- d'Orban, P. T., and Dalton, K. (1980). Violent crime and the menstrual cycl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0, 353-359.
- Dorus, E. (1978). The findings of a higher frequency of long Y chromosomes in criminals: does the Y chromosome play a role in human behaviour? *Clinical Genetics*, 13, 96-98.
- Douglas, J. W. B., Ross, J. M., Hammond, W. A., and Mulligan, D. G. (1966). Delinquency and social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6, 294-302.
- Dreher, R. H. (1967).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us of insanity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mmon law.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 47-57.
- Drinkwater, I., and Gudjonsson, G. H. (1989). The nature of violence in psychiatric hospitals. In K. Howells and C. R. Hollin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Violence*. Chichester: Wiley.
- Duguid, S. (1981). Moral development, justice, and democracy in prison.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3, 147-162.
- Dunford, F. W., and Elliott, D. S. (1984). Identifying career offenders using self-report dat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1, 57-86.
- Durlak, J. A. (1985). Primary prevention of school maladjust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623-630.
- Dutton, D. G., and Browning, J. F. (1988). Concern for power, fear of intimacy, and aversive stimuli for wife assault. In G.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Zurilla, T., and Goldfried, M. (1971). Problem solving and behavior modific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8, 107-126.
- Eastwood, L. (1985). Personality,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 space among violent and nonviolent delinqu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 717-723.
- Ebbesen, F. B., and Konecni, V. J. (1982).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V. J. Konecni and E. B. Ebbesen (ed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San Francisco: Freeman.
- Edwards, G., Hensman, C., and Peto, J. (1971). Drinking problems amongst recidivist prisoner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 388-399.
- Egeland, B., Jacobvitz, D., and Soule, L. A. (1988). Breaking the cycle of abuse. *Child Development*, 59, 1080-1088.
- Ehrenkranz, J., Bliss, E., and Sheard, M. H. (1974). Plasma testosterone: correlation with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social dominance in ma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6, 469-475.
- Ehrlich, I. (1975). 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capital punishment: A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397-417.
- Ehrlich, I. (1981). On the usefulness of controlling individuals: An economic analysis for rehabilitation, incapacitation, and deterr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307-322.
- Eisner, M. (1972). Characteristics: self-esteem, sex, and resistance to temp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4, 68-72.
- Eisenberg, K., and Lennon, R. (1983). Sex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related capacit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4, 100-131.
- Elison, K. W., Peterson, D. M., and Hadaway, C. K. (1983). Religiosity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1, 305-327.
- Elliott, D. S., and Ageton, S. S. (1980). Reconciling race and class differences in self-reported and official estimates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95-110.
- Elliott, D. S., and Huizinga, D. (1983). Social clas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in a national youth panel, 1976-1980. *Criminology*, 21, 149-177.
- Elliott, D. S., and Voss, H. L. (1974). *Delinquency and Dropout*. Lexington: Heath and Co.
- Elliott, D. S., Huizinga, D., and Ageton, S. S. (1985). *Explaining Delinquency and Drug Us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Elliott, P. A. (1982). Neurological findings in adult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and the dyscontrol syndrom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0, 680-687.
- Ellis, A. (1977). The basic clinical theory of Rational-Emotive Therapy. In A. Ellis and R. Grieger (eds), *Handbook of Rational-Emotive Therapy*. New York: Springer.
- Ellis, L. (1987). Relationships of criminality and psychopathy with eight other apparent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of sub-optimal arousa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 905-925.
- Ellis, L. (1988). Criminal behaviour and r/K selection: An extension of gene based evolutionary theor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 697-708.
- Ellis, P. I. (1982). Empathy: A factor in anti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 123-143.
- Emery, R. F. (1984). Family vio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321-328.
- Emery, R. F., and Marlborough, D. (1977). An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of delinquency: The irrelevance of relevant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860-873.
- Emery, R. F., and O'Leary, D. (1982).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marital discord and behavior problems of boys and girl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0, 11-24.
- Emler, N. (1984). Differential involvement in delinquency: 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reputation management. In B. A. Maher and W. B. Maher (eds), *Progress in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Research*, Volume 1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mmer, N., Heather, N., and Winton, M. (1978). Delinqu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reason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7, 325-331.
- Engel, G. L. (1977). 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 *Science*, 196, 129-136.
- Ennis, B. J., and Litwak, J. R. (1974). Psychiatry and the presumption of expertise: Flipping coins in the courtroom. *California Law Review*, 62, 694-753.
- Epps, P., and Parnell, R. W. (1952). Physique and temperament of women delinquents compared with women undergraduates.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25, 249-255.
- Epslein, S. (1973). The self-concept revisited: Or a theory of a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 404-410.
- Epstein, S., and O'Brien, F. J. (1985).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in historical and current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513-537.
- Endicott, M. (1985). *Psychoanalysis: Freud's Cognitive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 Ericksen, P. G. (1984). Diversion—a panacea for delinquency? Lessons from the Scottish experience. *Youth and Society*, 16, 29-45.
- Erving, H. (1974).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the subculture of violence thesis. *Social Problems*, 22, 280-292.
- Fenn, L. D.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developing behaviori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435-443.
- Fenn, L. D., and Huesmann, T. R. (1986). The role of televi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D. Olweus, J. Block and M. Radke-Yarrow (eds),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yo, L. D. (1981). British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on seven domains of the self-concept.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9, 137-145.
- Eysenck, H. J. (1960). Classific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iagnosis. In H. J. Eysenck (ed.), *Handbook of Abnormal Psychology*. London: Pitman.
- Eysenck, H. J. (1974). Crime and personality reconsidered.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7, 23-24.
- Eysenck, H. J. (1977). *Crime and Personality*, Third Edition. London: Falmer.
- Eysenck, H. J., and Eysenck, S. B. G. (1975). *Manual for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Eysenck, H. J., and Gudjonsson, G. H. (1989).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Criminalit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Eysenck, S. B. G., and Eysenck, H. J. (1963). On the dual nature of extravers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 46-55.
- Eysenck, S. B. G., and Eysenck, H. J. (1977).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prisoners and control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0, 1023-1028.
- Eysenck, S. B. G., and Eysenck, H. J. (1978). Impulsiveness and venturesomeness: Their position in a dimensional system of personality descrip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3, 1247-1255.
- Eysenck, S. B. G., and McGurk, B. J. (1980). Impulsiveness and venturesomeness in a detention centre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7, 1294-1306.
- Eysenck, S. B. G., Rust, J., and Eysenck, H. J. (1977). Personality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adult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7, 169-179.
- Fagan, J., and Wexler, S. (1987). Family origins of violent delinquents. *Criminology*, 25, 643-669.
- Farley, F. H. (1986). The big E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Today*, 20 (May), 44-52.
- Farley, F. H., and Farley, S. V. (1970). Impulsiveness, sociability, and the preference for varied experience. *Perception and Motor Skills*, 31, 47-50.
- Farley, F. H., and Farley, S. V. (1972). Stimulus-seeking motivation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among institutionalized delinquent gir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9, 94-97.
- Farley, F. H., and Sewell, T. (1976). Test of an arousal theory of delinquency: Stimulus-seeking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black adolesc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 315-320.
- Farrington, D. P. (1972). Delinquency begins at home. *New Society*, 21, 495-497.
- Farrington, D. P. (1981). The prevalence of convi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1, 173-175.
- Farrington, D. P. (1985). Delinquency prevention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 3-16.
- Farrington, D. P. (1989). Early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aggression and adult violence. *Violence and Victims*, 4, 79-100.
- Farrington, D. P. (1990). Implications of criminal career research for the prevention of offend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3, 93-113.
- Farrington, D. P. (1992). Explaining the beginning, progress, and ending of antisocial behavior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In J. McCord (ed.), *Facts, Frameworks, and Forecasts: Advance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Volume 3.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Farrington, D. P., and Bennett, T. (1981). Police cautioning of juveniles in Lond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1, 123-135.
- Farrington, D. P., and Dowds, E. A. (1985). Disentangling criminal behaviour and police reaction. In D. P. Farrington and J. Gunn (eds), *Reactions to Crime: The Public, the Police, Courts and Prisons*. Chichester: Wiley.
- Farrington, D. P., and Tarling, R. (1985). Criminological prediction: An introduction. In D. P. Farrington and R. Tarling (eds), *Prediction in Crimi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Farrington, D. P., and West, D. J. (1990). The Cambridge study in delinquent development: a long-term follow-up of 411 London males. In C. Kaiser and H.-J. Kerner (eds), *Criminality, Personality, Behaviour, Life History*.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 Farrington, D. P., Biron, L., and Le Blanc, M. (1982). Personality and delinquency in London and Montreal. In J. Gunn and D. P. Farrington (eds), *Abnormal Offenders, Delinquency,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hichester: Wiley.
- Farrington, D. P., Osborn, S. G., and West, D. J. (1978). The persistence of labelling effect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8, 277-284.
- Farrington, D. P., Ohlin, L. E., and Wilson, J. Q. (1986).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ling Crim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Farrington, D. P., Gallagher, H., Morley, L., St Ledger, R. J., and West, D. J. (1988). Are there any successful men from criminogenic backgrounds? *Psychiatry*, 51, 116-130.
- Faust, D. (1986). Research on human judg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linical practi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7, 420-430.
- Faust, D., and Miner, K. A. (1986). The empirist in his new clothes: DSM-III in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962-967.
- Faust, D., and Zucko, I. (1988). The expert witness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Science*, 241, 31-35.
- Feld, H. S. (1978). Attitudes toward ra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ce, rapists, crime counsellors, and citize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56-179.
- Fendler, F. T., Marnett, S. A., and Ivata, M. (1984). Group anger control training for junior high school delinquent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8, 299-311.

- Feldhusen, I. E., Johnston, J. R., and Benning, L. J. (1972).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linquency and other aspects of children's behavio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sychology*, 1, 341-351.
- Feldman, D. (1964). *Psychoanalysis and crime*. In B. Rosenberg, J. Cerver, and F. W. Houston (eds), *Mass Society in Crisis*. New York: Macmillan.
- Feldman, M. P. (1977). *Criminal Behaviour: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Chichester: Wiley.
- Feldman, M. P., and Peay, J. (1982).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In A. S. Bellak, M. Hersen, and A. E. Kazd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New York: Plenum.
- Felson, R. B. (1978). Aggression as impression management. *Social Psychology*, 41, 205-213.
- Felson, R. B., and Steadman, H. F. (1983). Situational factors in disputes leading to criminal violence. *Criminology*, 21, 59-74.
- Felson, R. B. (1986). Linking criminal choices, routine activities, informal control, and criminal outcomes. In D. B. Cornish and R. V. G.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Fellthous, A. R., and Keller, S. R. (1987). Childhood cruelty to animals and later aggression against people: A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 710-717.
- Fenton, G. W., Fenwick, P. B. C., Ferguson, W., and Lamb, C. T. (1978). The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in antisocial behaviour: A pilot study of Broadmoor 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2, 368-377.
- Fenwick, P. (1990). Automatism. In R. Buglas and P. Bowden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Forensic Psychiatry*. Edinburgh: Churchill Livingstone.
- Ferguson, J. J., and Rife, B. G. (1983).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 on anger and aggression. In R. G. Geen and F. I.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erguson, D. M., Horwood, L. J., Kershaw, K. I., and Shannon, F. T. (1986).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ports of wife assault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 407-412.
- Fersch, E. A. (1980). Ethical issues for psychologists in court settings. In J. Monahan (ed.), *Who is the Client? The Ethic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Feshbach, S., and Price, J. (1984).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competencies and the control of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ur*, 10, 185-200.
- Field, L. (1967). A validation study of Hewitt and Jenkins' hypothesis. *Studies in the Causes of Delinquency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 No. 10. London: HMSO.
- Figueras-McDonough, J. (1984). Feminism and delinquenc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4, 325-342.
- Filipczak, J., Friedman, R. M., and Reese, S. C. (1979). PREP: Educational programming to prevent juvenile problems. In J. S. Stumpflauer (ed.), *Progress in Behavior Therapy with Delinquents*.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 Fincham, F. D., and Jaspars, J. M. (1980).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rom man the scientist to man as lawyer.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ingarette, H., and Lasse, A. L. (1979). *Mental Disability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nkelhor, D. (1986). *A Sourcebook on Child Sex Abuse*. Newbury Park, Ca: Sage.
- Finlayson, D. S., and Joughan, J. L. (1976). Pupils' perceptions in high and low delinquency schools. *Educational Research*, 18, 138-145.
- Fischer, D. (1984). Family size and delinquency, perception and motor skills. *SS, 527-534*.
- Fitch, E. S., and Papantoniou, A. (1983). Men who batter: Some pertinent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1, 190-192.
- Fitzgerald, E. (1987). Psychopaths and the law of evidence: Admissibility and confidentiality. In G. Gudjonsson and J. Drinkwater (eds), *Psychological Evidence in Court Issues in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 No. 11.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Finsen, D. F., Phillips, E. L., and Wolf, M. M. (1973). Achievement Place Experiments in self-government with pre-delinquent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6, 31-47.
- Fior-Henry, J., Lang, R. A., Koles, D. J., and Frenzel, R. R. (1991). Quantitative EEG studies of pedophi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10, 233-258.
- fo, W. S. O., and O'Donnell, C. R. (1975). The buddy system: Effect of community intervention on delinquent offences. *Behavior Therapy*, 6, 522-524.
- Fodor, I. (1971). Moral development and parent behavior antecedents in adolescent psychopath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22, 37-43.
- Forbes, G. B., and Lebo, C. R. (1977).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lunar activity: A failure to validate the lunacy myth. *Psychological Reports*, 40, 1309-1310.
- Forkas, J. P. (1986).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ggressive situations. In A. Campbell and J. J. Gibbs (eds), *Violent Transactions: The Limits of Pers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 Fotrell, E. (1980). A study of violent behaviour among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hospital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 216-221.
- Foucault, M. (1978).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dangerous individual in 19th century legal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1, 1-18.
- Foulds, G. A. (1971). Personality deviance and personal symptomatolog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 222-233.
- Fowles, D. C. (1988). Psychophysi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A motivational approach. *Psychophysiology*, 25, 373-391.
- Frank, J. D. (1985). Therapeutic components shared by all psychotherapies. In M. J. Mahoney and A. Freeman (eds), *Cognition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Plenum.
- Frederiksen, L. W., and Rainwater, B. (1981). Explosive behavior: A skill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treatment. In R. B. Stuart (ed.), *Violent Behavior: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es to Prediction,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New York: Brunner/Mazel.
- Freedman, B. J., Rosenthal, J., Donahue, C. P., Schlundt, D. G., and McFall, R. M. (1978). A social-behavioral analysis of skill deficits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adolescent boy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 1448-1462.
- Freedman, J. I. (1984).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aggressive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6, 227-246.
- Freeman-Longo, R. F., and Wall, R. V. (1986). Changing a lifetime of sexual crime: Can sex offenders ever alter their ways? *Psychology Today*, 20 (March), 58-64.
- Freud, S. (1915/1957). Criminals from a sense of guilt. In J. Strachey (ed.),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14.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20/1955).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J. Strachey (ed.),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18.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nd, K. (1967). Erotic preference in pedophilia.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5, 339-348.
- Freund, K. (1980). Therapeutic sex drive reduction.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2, 5-38.
- Freund, K. (1990). Courtship disorder.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Freund, K., McKnight, C. K., Langevin, R., and Cibir, S. (1972). The female child as a surrogate object.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 119-133.
- Friedrich, W., and Burskin, J. (1976). The role of the child in abus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6, 580-590.
- Friedrich-Cofer, L., and Huston, A. C. (1986). Television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ebate continu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0, 363-371.
- Fromm, E. (1973).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Frosch, J. P. (1983). The treatment of antisocial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s.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sychiatry*, 34, 243-248.
- Furby, L., Weinrott, M. R., and Blackshaw, L. (1989). Sex offender recidivism: A review. *Psychology of Women*, 105, 3-30.
- Gabryell, W. F., and Mednick, S. A. (1980). Sexuality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9, 658-661.
- Gaes, G. C. (1985). The effects of overcrowding in prison. In M. Tonry and N. Morris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ume 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dner, L. R. (1984). A multiple choice test to measure social skills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adolescent gir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911-912.
- Gagnon, J. H. (1974). Sexual conduct and crime. In D. Glaser (e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Gale, A. (1976). Psychopathy and the EEG: A critical re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York.
- Gale, A. (ed.) (1988). *The Polygraph Test: Lies,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 Gale, A., and Edwards, J. A. (1983). EEG and human behaviour. In A. Gale and J. A. Edwards (eds),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Human Behaviour*,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anzer, V. T., and Sarason, I. G. (1973).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recidivism among juvenile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0, 1-5.
- Garabedian, P. G. (1963). Social role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isation in the prison community. *Social Problems*, 11, 139-152.
- Garland, D. (1985). *Punishment and Welfare: A History of Penal Strategies*. Aldershot: Gower.
- Garrett, C. J. (1985). Effects of residential treatment on adjudicated delinquent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2, 287-308.
- Garrett, M., and Short, J. F. (1975). Social class and delinquency: Predictions and outcome of police juvenile encounters. *Social Problems*, 22, 368-382.
- Gavaghan, M. P., Arnold, K. D., and Gibbs, J. C. (1983). Moral judgment in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recognition versus production measur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4, 267-274.
- Gayford, J. J. (1975). Battered wives.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15, 237-243.
- Gearing, M. L. (1979). The MMPI as a primary differentiator and predictor of behavior in prison: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and re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9, 929-963.
- Gecas, V. (1979).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the family. In W. R. Burr, R. Hill, F. I. Nye, and J. L. Reiss (eds),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Volume 1. New York: Free Press.
- Geen, R. G. (1983). Aggression and television violence. In R. G. Geen and E. I.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een, R. G., and Quanty, M. B. (1977). The catharsis of aggression: An evaluation of a hypothesi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elles, R. (1973). Child abuse as psychopathology: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1, 611-621.
- Gendreau, P. (1985).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practice of clinical criminology. In M. H. Ben-Aron, S. J. Hucker and C. D. Webster (eds), *Clinical Criminology*. Toronto: Clark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 Gendreau, P., and Ross, R. R. (1979). Effective correctional treatment: Bibliotherapy for cynics. *Crime and Delinquency*, 25, 463-489.
- Gendreau, P., and Ross, R. R. (1987). Revivif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Justice Quarterly*, 4, 349-407.
- Gendreau, P., Freedman, N. L., Wilde, G. J. S., and Scott, C. D. (1972). Changes in EEG alpha frequency and evoked response latency during solitary confine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9, 54-59.
- Gendreau, P., Grant, B. A., Leppinger, M., and Collins, S. (1979). Norms and recidivism risks for MMPI and selected scales on a Canadian delinquent sample.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11, 21-31.
- George, W. H., and Marlatt, G. A. (1966). The effects of alcohol and anger in interest in violence, erotica, and dev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5, 150-158.
- Leisinger, S. H. (1976). Sociopathy, self-actualisation and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0, 398-402.
- Gibbins, T. C. N. (1963). *Psychiatric Studies of Borstal Lads*. Maudsley Monographs No. 1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bbins, T. C. N. (1981). Shoplif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8, 346-347.
- Gibbins, T. C. N., and Robertson, G. (1983). A survey of the criminal careers of restriction order 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370-375.
- Gibbins, D. C. (1965). *Changing the Lawbreak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ibbins, D. C. (1971). Observations on the study of crime cau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262-278.
- Gibbins, D. C. (1988). Some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criminal types and criminal career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8-23.
- Gibbs, J. C., and Schnell, S. V. (1985). Moral development "versus" socialisation: A critiqu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071-1080.
- Gibbs, J. C., Arnold, K. D., Ahlborn, H. H., and Cheesman, F. L. (1984). Facilitation of sociomoral reasoning in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37-43.
- Gibbs, J. P. (1972). Issues in defining deviant behavior. In J. Douglas (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Devi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bbs, J. P. (1985). Review essay. *Criminology*, 23, 381-388.
- Gibbs, J. P. (1974). Effects of juvenile legal procedures on juvenile offenders' self-attitud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1, 51-55.
- Gibson, E. (1975). *Homicide in England and Wales 1967-1971*. London: HMSO.
- Gibson, H. B. (1964). The Spiral Maze: A psychomotor test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delinquenc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55, 219-223.
- Gibson, H. B. (1969). Early delinquency in relation to broken hom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0, 195-204.
- Gibson, H. B. (1971).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 study of self-reported ac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 1-9.
- Gibson, H. B. (1975). Correspondence.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28, 212-213.
- Gifford, R., and O'Connor, B. (1987).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as a behavioral ma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019-1026.
- Gillan, P. W. (1965). The measurement of impulsiveness in female delinquents.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more, M. R., Hawkins, J. D., Catalano, R. F., Day, L. E., Moore, M., and Ahlert, R. (1991). Structure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preadolescenc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9, 499-506.
- Giordano, J. C., Cernkovich, S. A., and Pugh, M. D. (1986). Friendship and delinqu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170-1202.
- Given, J. B. (1977). *Society and Homicide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D. (1956). Criminality theories and behavioral ima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433-444.
- Glaser, D. (1977).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in criminology: Comments on an alleged problem.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67, 486-490.
- Glaser, D. (1987). Classification for risk. In D. M. Gottfredson and M. Tonry (eds),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lasser, W. (1975) *Reality Therapy: A New Approach to Psychiat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lover, T. (1960) *The Root of Crime*. London: Imago.
- Glueck, S., and Glueck, F. (1950) *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The Commonwealth Fund.
- Glueck, S., and Glueck, F. (1964) Potential juvenile delinquents can be identified: What next?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215-226.
- Goddard, H. H. (1914) *Fetile-Mindedness: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 Gold, M. (1978) Scholastic experiences, self-esteem,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A theory for alternative schools. *Crime and Delinquency*, 24, 290-308.
- Golden, K., Twentymann, C. T., Jensen, M., Karan, J., and Kloss, J. D. (1980) Coping with authority: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the complex offender.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7, 147-159.
- Goldstein, A. P. (1986) Psychological skill training and the aggressive adolescent. In S. J. Apter and A. P. Goldstein (eds), *Youth Violence: Progra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lenum.
- Goldstein, A. P., Click, B., Irwin, M. J., Pask-McCartney, C., and Rubens, I. (1989) *Reducing Delinquency: Intervention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Pergamon.
- Goldstein, M. Brain research and violent behavior. *Archives of Neurology*, 30, 1-35.
- Goldstein, P. J. (1989) Drugs and violent crime. In N. A. Weiner and M. F. Wolfgang (eds), *Pathways to Criminal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Goma, M., Perez, J., and Torrubia, R. (1988) Personality variables in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inhibitory behaviour.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Goodman, J., and Loftus, E. F. (1988) The relevance of expert testimony on eyewitness testimon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 115-121.
- Goodstein, L. (1979) Inmate adjustment to pris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community lif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6, 246-272.
- Gordon, D. A., and Arbutnot, J. (1987) Individual, group, and family interventions. In H. C. Quay (ed.), *Handbook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Wiley.
- Gordon, D. A., and Arbutnot, J. (1988) The use of paraprofessionals to deliver home-based family therapy to juvenile delinqu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364-378.
- Gordon, D. A., Arbutnot, J., Gustafson, K., and McGee, P. (1988) Home-based behavioral systems family therapy with disadvantaged juvenile delinqu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6, 243-253.
- Gordon, R. A. (1977) A critique of the evaluation of Patuxent Institutio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dangerousness and recidivism.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5, 210-255.
- Gorenstein, E. E. (1982) Frontal lobe function in psychopath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1, 368-379.
- Gorenstein, E. E. (1984) Debating mental illness: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medicine, and social poli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50-56.
- Gosselin, C., and Wilson, G. (1980) *Sexual Variations: Fetishism, Transvestism and Sadomasochi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Gostin, L. (1977) *A Human Condition*. London: MIND.
- Gottesman, I. I., Carey, G., and Hanson, D. R. (1983) Pearls and perils in epigenetic psychopathology. In S. B. Guze, E. J. Earls and J. E. Barrett (eds), *Childhood Psychopatholog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Raven Press.
- Gottfredson, M. R., and Hirschi, T. (1987) The positive tradition. In M. R. Gottfredson and T. Hirschi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Gottfredson, M. R., and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ttfredson, S. D. (1987) Prediction: An overview of selecte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D. M. Gottfredson and M. Tonry (eds),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ttschalk, R., Davidson, W. S., Mayer, J., and Gensheimer, L. K. (1987) Behavioral approaches with young offenders: A meta-analysis of long-term treatment efficacy. In F.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Gough, H. G. (1948)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sychopath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359-366.
- Gough, H. G. (1969) *Manual for the 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Gough, H. G., Wenk, E. A., and Rozycka, V. V. (1965) Parole outcome as predicted from CPI, MMPI, and a base expectancy tabl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0, 432-441.
- Graham, J. (1988) *Schools, Discipline Behaviour and Delinquency*.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96. London: HMSO.
- Graham, K. (1980) Theories of intoxicated aggres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2, 141-158.
- Graham, K., LaRocque, L., Yetman, R., Ross, F. J., and Gustira, E. (1980) Aggression and bar-room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41, 277-292.
- Grant, J. D., and Grant, M. Q. (1959) A group dynamics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nonconformists in the nav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2, 126-135.
- Grasmuck, H. G., and Green, D. E. (1980) Legal punishment, social disapproval and internalisation as inhibitors of illegal behavior.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71, 325-335.
- Gray, J. A. (1981) A critique of Eysenck's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H. J. Eysenck (ed.), *A Model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Greene, F., Schooler, J. W., and Loftus, E. F. (1985) Expert psychological testimony. In S. M. Kasson and I. S. Wrightsman (eds), *The Psychology of Evidence and Trial Procedure*. Beverly Hills: Sage.
- Greenwald, A. G., and Pratkanis, A. R. (1984) The self. In R. S. Wyer and I. K. Sc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ume 3. Hillsdale, NJ: Erlbaum.
- Grew, E. (1986) Reducing murder to manslaughter: Whose job?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12, 18-23.
- Grisso, T. (1987) The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future of forensic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831-839.
- Groth, A. N. (1977) The adolescent sex offender and his pr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1, 249-254.
- Groth, A. N. (1983) Treatment of the sexual offender in a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In J. G. Greer and I. R. Stuart (eds), *The Sexual Aggressor*.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Groth, A. N., and Burgess, A. W. (1977a) Rape: A sexual devi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7, 400-406.
- Groth, A. N., and Burgess, A. W. (1977b) Motivational intent in the sexual assault of childre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253-271.
- Groth, A. N., Burgess, A. W., and Holstrom, L. L. (1977) Rape: Power, anger and sex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 1239-1243.
- Groth, A. N., Longo, R. E., and McFadin, J. B. (1982) Undetected recidivism among rapists and child molesters. *Crime and Delinquency*, 28, 450-458.
- Grimm, D. H. (1991) Unfit to plead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6-1988: A surve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8, 540-548.
- Grunfeld, B., and Noreik, K. (1986) Recidivism among sex offenders: A follow-up study of 341 Norwegian sex offen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9, 95-102.
- Gusford, J. P. (1977) Will the real factor of extraversion-introversion please stand up? A reply to Eysenc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4, 412-416.
- Gudjonsson, G. H. (1984) 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 Comparison between "false confessors" and "deniers" in criminal trials.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4, 36-41.
- Gudjonsson, G. H. (1985) Psychological evidence in court: Results from the BPS survey.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8, 327-330.
- Gudjonsson, G. H. (1986) Criminal court proceedings in Engl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sychologist as an expert witness. *Medicine and Law*, 5, 395-404.
- Gudjonsson, G. H. (1988) 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 Its relationship with assertiveness, social-evaluative anxiety, state anxiety and method of coping.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7, 159-166.
- Guerra, N. G., and Slaby, R. G. (1990) Cognitive mediators of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offenders: 2.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 269-277.
- Guidano, V. F., and Liotti, G. (1985) A constructivist foundation for cognitive therapy. In M. J. Mahoney and A. Freeman (eds), *Cognition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Freeman.
- Gunn, J. (1977)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disorde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0, 317-329.
- Gunn, J., and Bonn, J. (1971) Criminality and violence in epileptic prisone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8, 337-343.
- Gunn, J., and Fenton, G. (1971) Epilepsy, automatism, and crime. *Lancet*, 1, 1175-1176.
- Gunn, J., Maden, A., and Swinton, M. (1991) Treatment needs of prisoners with psychiatric disorder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3, 338-341.
- Gunn, J., Robertson, G., Dell, S. and Way, C. (1978) *Psychiatric Aspects of Imprisonment*. London: Academic Press.
- Gurchari, C., Phelps, E., and Selman, R. (1984)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A longitudi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mal and disturbed youth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26-36.
- Guze, S. B. (1976) *Criminality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äfner, H., and Böker, W. (1982) *Crimes of Violence by Mentally Abnormal Offen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gan, J. (1975) The social and legal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a study of the pre-sentencing process. *Social Problems*, 22, 620-637.
- Hagan, J., and Leon, I. (1977) Rediscovering delinquency: Social history,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law.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587-598.
- Hains, A. A., and Hains, A. H. (1987) The effects of a cognitive strategy intervention on th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of delinquent youth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0, 399-413.
- Hains, A. A., and Ryan, L. B.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 among juvenile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 peers. *Child Development*, 54, 1536-1544.
- Halbach, K. (1974)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theory examined. *Criminology*, 17, 217-229.
- Hall, C. S., and Lindzey, G. (1970)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 Hall, G. C. N. (1988) Criminal behavior as a function of clinical and actuarial variables in a sex offender popul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 773-775.
- Hall, G. C. N. (1990) Prediction of sexual agg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0, 229-245.
- Hall, G. C. N., and Proctor, W. C. (1987) Criminological predictors of recidivism in a sexual offender popul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111-112.
- Hall, G. C. N., Proctor, W. C., and Nelson, G. M. (1988) Validity of physiological measures of pedophilic sexual arousal in a sexual offender popul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 118-122.
- Hall, G. C. N., Mauro, R. D., Vitaliano, P. P., and Proctor, W. C. (1986) The utility of the MMPI with men who have sexually assaulted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493-496.
- Hall, G. S. (1904) *Adolescence*. New York: Appleton.
- Hall, H. V. (1987) *Violence Prediction: Candidates for the Forensic Practitioner*.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Hallack, S. I. (1987) *The Mentally Ill Offend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Halleck, S. L., and Witte, A. D. (1977) Is rehabilitation dead? *Crime and Delinquency*, 23, 372-382.
- Haller, R. M., and Deluty, R. H. (1988) Assaults on staff by psychiatric in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2, 174-179.
- Hands, J., Herbert, V., and Tennent, G. (1974) Menstruation and behaviour in a special hospital.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14, 32-35.
- Hanley, C. W. (1983)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lawful: An essay on psychological injustice. In W. S. Laufer and J. M. Day (eds), *Personality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Behaviour*.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Hanks, S. E., and Rosenbaum, C. D. (1977) Battered women: A study of women who live with violent alcohol-abusing me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7, 291-306.
- Hanson, C. L., Henggeler, S. W., Haefele, W. F., and Rodick, J. D. (1984) Demographic, individual,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correlates of serious and repeated crime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ir sibling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528-538.
- Hanson, N. R. (1958)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dt, R. G., and Peterson-Hardt, S. (1977) On determining the quality of the delinquency self-report metho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4, 247-261.
- Hare, R. D. (1965) Temporal gradient of fear arousal in psychopath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0, 442-445.
- Hare, R. D. (1968) Psychopathy, autonomic functioning, and the orienting respon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Monograph Supplements*, 73, No. 3, 1-24.
- Hare, R. D. (1978) Electrodermal and cardiovascular correlates of psychopathy.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 Hare, R. D. (1979) Psychopathy and laterality of cerebral func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8, 605-610.
- Hare, R. D. (1980) A research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psychopathy in criminal popul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 111-119.
- Hare, R. D. (1982) Psychopathy and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of psychotism,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 35-42.
- Hare, R. D. (1983) Diagnosis of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two prison popu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887-890.
- Hare, R. D. (1984) Performance of psychopaths on cognitive tasks related to frontal lobe func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3, 133-140.
- Hare, R. D. (1985) A comparison of procedur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psychopath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7-16.
- Hare, R. D. (1986)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the Cleckley psychopath. In W. H. Reid, D. Durr, J. Walker and J. W. Bonner (eds), *Unmasking the Psychopat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and Related Syndromes*. New York: Norton.
- Hare, R. D., and McPherson, L. M. (1984) Viol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ur by criminal psychopat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7, 35-50.
- Hare, R. D., and Quinn, M. (1971) Psychopathy and autonomic condition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7, 223-235.
- Hare, R. D., McPherson, L. M., and Forth, A. E. (1988) Male psychopaths and their criminal care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 710-714.
- Hare, R. D., Williamson, S. F., and Harper, T. J. (1988) Psychopathy and language

- In J. I.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Hare, R. D., Harpur, R. J., Hakstian, A. R., Forth, A. L., Hart, S. D., and Newman, J. P. (1990). The revised Psychopathy Checklist: Reliability and factor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 338-344.
- Hargreaves, D. H. (1980). Classrooms, schools,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Discriminal Analysis*, 2, 75-80.
- Harden, P. B., and Singer, J. L. (1974). Women's fantasies during sexual intercourse: Normativ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311-322.
- Harper, J. A. (1975). The scope of offspring effects: From care giver to cul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2, 784-801.
- Harpur, R. J., Hare, R. D., and Hakstian, A. R. (1989). Two-factor conceptualisation of psychopathy: Construct validity and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 6-17.
- Harpur, R. J., Williamson, S. F., Forth, A. F., and Hare, R. D. (1988).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resting EEG in psychopathic and nonpsychopathic criminals. *Psychophysiology*, 23, 439.
- Harré, R. (1985).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G. T., and Vaneoy, L. W. (1986). A ten-year study of assaults and assaults on a maximum security psychiatric uni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 173-191.
- Harris, G. T., Rice, M. J., and Cormier, C. A. (1989). Violent recidivism among psychopaths and nonpsychopaths treated in a therapeutic community. *Research Reports*, Volume 6, No. 1. Mental Health Centre, Peterborough, Ontario.
- Harris, P. W. (1983). The interpersonal maturity of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In W. S. Laufer and J. M. Day (eds), *Personality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Behaviour*.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Harris, P. W. (1988). The interpersonal maturity 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1-level.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ur*, 15, 59-77.
- Hart, H. L. A. (1968). *Entitlement 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rt, S. D., and Hare, R. D. (1989).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Psychopathy Checklist in a forensic psychiatric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 338-341.
- Hartgen, C. A. (1972). Legalism and humanism: A reply to the Schwendingers. *Issues in Criminology*, 7, 59-69.
- Hartill, E. M., Monnelly, P. P., and Elderkin, R. (1982). *Physique and Delinquent behaviour: A Thirty Year Follow-up in William H. Sheldon's Varieties of Delinquent You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rtmann, H. J., Kris, E., and Lowenstein, R. (1949). Notes on the theory of aggression. In A. Freud (ed.),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Volume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Hartshorne, H., and May, M. A. (1928). *Studies in Deceit*. New York: Macmillan.
- Harvey, O. J., Hunt, D. L., and Schroeder, H. M. (1961). *Conceptual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New York: Wiley.
- Haward, L. R. C. (1981). *Forensic Psychology*. London: Batsford.
- Haward, L. R. C. (1987).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psychological evidence. In G. Gudjonsson and J. Drinkwater (eds), *Psychological Evidence in Court: Issues in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 No. 11.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Hawk, S., and Peterson, R. A. (1974). Do MMPI psychopathic deviancy scores reflect psychopathic deviancy or just devia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38, 362-368.
- Hawkins, J. D., Catalano, R. F., Jones, G., and Fene, D. (1987). Delinquency prevention through parent training: Results and issues from work in progress. In J. Q. Wilson and G. C. Loeber (eds), *From Children to Citizens: Volume Three: Families, Schools,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Hayes, I. M. (1983). And darkness closes in: A national study of jail suicide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ur*, 10, 461-484.
- Hayes, S. C., Brownell, K. D., and Barlow, D. H. (1978). The use of self-administered covert sensitis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xhibitionism and sadism. *Behaviour Therapy*, 9, 283-289.
- Haynes, J. P., and Bensch, M. (1981). The P-V sign on the WISC-R and recidivism in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9, 480-481.
- Healy, W., and Bronner, A. (1936). *New Light on Delinquency and its Treat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arnshaw, J. S. (1964).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Psychology 1840-1940*. London: Methuen.
- Heath, L., Kruttschnitt, C., and Ward, D. (1986). Television and violent criminal behavior: Beyond the Bobo doll. *Violence and Victims*, 1, 177-190.
- Heather, N. (1976). *Radiant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London: Methuen.
- Heather, N. (1977). Personal illness inifers and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indeterminate sent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7, 378-386.
- Heather, N. (1979). The structure of delinquent values: A repertory grid investig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8, 263-275.
- Hebb, D. O. (1946). On the nature of fear. *Psychological Review*, 53, 259-276.
- Heitman, A. B. (1982). Cognitive models of criminal violence based on intelligence and psychopathy leve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0, 546-557.
- Heitman, A. B., and Heitman, M. R. (1985). Psychopathy and dangerousness: Compassion, integ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wo psychopathic typologie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4, 181-195.
- Heitman, K. S., and Annis, L. V. (1988).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forensic psychology: National survey of forensic facilitie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 211-215.
- Heitman, K., Bennett, W. S., Evans, J. H., Offutt, R. A., Reiff, H. J., and White, A. J. (1988). Assessing treatability in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note.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6, 479-486.
- Heim, N., and Hirsch, C. J. (1979). Castration for sex offenders: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recent European literatur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8, 281-304.
- Helman, D. S., and Blackman, N. (1966). Enuresis, foresetting and cruelty to animals: A triad predictive of adult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2, 1431-1435.
- Hempel, G. C. (1965).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Henderson, M. (1982). An empirical classification of convicted violent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2, 1-20.
- Henderson, M., and Hewstone, M. (1984). Prison inmates explan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ccounts and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789-794.
- Henderson, M., and Hollin, C. R. (1986). Social skills training and delinquency. In C. R. Hollin and P. Trower (eds), *Handbook of Social Skills Training: Volume 1: Applications Across the Life Span*. Oxford: Pergamon.
- Henggeler, S. W. (1989). *Delinquency in Adolesc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Henker, B., and Whalen, C. K. (1989). Hyperactivity and attention defici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216-223.
- Henn, F. A., Bardwell, R., and Jenkins, R. L. (1980). Juvenile delinquents revisited: Adult criminal activi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7, 1160-1163.
- Henn, F., Henric, M., and Vanderpearl, R. (1976). Forensic psychiatry: Diagnosi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2, 423-429.
- Hennigan, K. M., DelRosario, M. L., Heath, L., Cook, T. D., Wharton, J. D., and Colder, B. J. (1982).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elevision on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 461-477.
- Herman, J. I. (1990). Sex offenders: A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J.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Herrberg, J. I., and Fenwick, P. H. C. (1988). The aetiology of aggression in temporal lobe epileps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50-55.
- Hertzberger, S. D., Potts, D. A., and Dillon, M. (1981). Abusive and nonabusive parental treatment from the child'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9, 81-90.
- Hetherington, E. M., and Martin, B. (1979). Family interaction. In H. C. Quay and J. S. Weary (eds), *Psychopathological Disorders of Childhoo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 Hetherington, E. M., Stouwe, R. J., and Rudberg, E. H. (1971). Patterns of family interaction and child-rearing attitudes related to three dimension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8, 160-176.
- Hewitt, I., and Jenkins, R. L. (1946). *Fundamental Patterns of Maladjustment*. Illinois: State of Illinois.
- Hickey, J. E. (1972). The effects of guided moral discussion upon youthful offenders'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33, 1551A.
- Higgins, J. P., and Thies, A. P. (1981). Social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olving thinking of reformatory inmates. *Journal of Offender Counseling Services and Rehabilitation*, 5, 93-98.
- Hill, A. M., and Griffiths, R. C. (1982). English law and the psychologist. In J. Shapland (ed.), *Lawyers and Psychologists—Gathering and Giving Evidence: Issues in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 No. 3.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Hill, D. (1947). Amphetamine in psychopathic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44, 50-54.
- Hill, D., and Watterson, D. (1942).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tudies of the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Journal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5, 47-64.
- Hindelang, M. J. (1974a). The Uniform Crime Reports revisite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 1-17.
- Hindelang, M. J. (1974b). Moral evaluations of illegal behaviors. *Social Problems*, 21, 371-385.
- Hindelang, M. J. (1978). Race and involvement in common law personal cri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93-109.
- Hindelang, M. J. (1979). Sex and involvement in criminal activity. *Social Problems*, 27, 143-156.
- Hindelang, M. J., and Weis, J. G. (1972). Personality and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An application of cluster analysis. *Criminology*, 10, 268-294.
- Hindelang, M. J., Hirschi, T., and Weis, J. G. (1979). Correlates of delinquency: The illusion of discrepancy between self-report and official measur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995-1014.
- Hindelang, M. J., Hirschi, T., and Weis, J. G. (1981). *Measuring Delinquenc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inshaw, S. P. (1987).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ttention deficits/hyperactivity and conduct problems/aggression in child psychopat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 443-463.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rschi, T. (1978).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Sociological Inquiry*, 47, 322-341.
- Hirschi, T. (1986).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control theories of crime. In D. B. Cornish and R. V. G.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Hirschi, T., and Hindelang, M. J. (1977). Intelligence and delinquency: A revisionist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571-587.
- Hirschi, T., and Gottfredson, M. (1994).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In W. Bulthuisen and S. A. Mednick (eds), *Explaining Criminal Behaviour*. Leiden: Brill.
- Hobbs, L. K., and Holt, M. M. (1976). The effects of token reinforcement on the behavior of delinquents in cottage setting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9, 189-198.
- Hodges, L. F., and Tait, C. D. (1965). A follow-up study of potential delinqu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0, 449-453.
- Hodges, E. G. (1971). Crime prevention by the Indeterminate Sentencing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8, 291-295.
- Hodgens, J. B., and McCoy, J. F. (1989). Distinctions among rejected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peer-nominated agg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Clinical Psychology*, 18, 121-128.
- Hodgins, S. (1992). Mental disorder, intellectual deficiency and crim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9, 476-483.
- Hoffman, M. L. (1971). Father absence and conscienc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6, 400-406.
- Hoffman, M. L. (1977). Moral internalisation: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ffman, M. L. (1982).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Empathy and guilt. In N. Eisenberg (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ffman, M. L., and Saltzman, H. D. (1967). Parent discipline and the child's mo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 45-57.
- Hoffman, E., and Pluck, D., and Twentyman, C. T. (1984). A multimodal assessment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deficits in abused and neglected preschoolers. *Child Development*, 55, 794-802.
- Hogan, R. (1969). Development of an empathy sca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 307-316.
- Hogan, R. (1973). Moral conduct and moral character: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9, 217-232.
- Hogan, R. (1975). Theoretical egocentrism and the problem of complia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533-540.
- Hogan, R., and Jones, W. H. (1983). A role-theoretical model of criminal conduct. In W. S. Laufer and J. M. Day (eds), *Personality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Behaviour*.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Hogan, R., DeSoto, C. B., and Solano, C. (1977). Traits, tests, and personality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255-264.
- Hoguchi, M. (1979). The Aschle token econom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384-399.
- Hokanson, J. E. (1970). Psychophysiological evaluation of the catharsis hypothesis. In E. I. Megargee and J. F. Hokanson (eds), *The Dynamics of Aggres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olcomb, W. R., Adam, N. A., and Ponder, H. N. (1985). The development and cross-validation of an MMPI typology of murder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240-244.
- Holder, T. (1978). A review and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corrections.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 7-16.
- Holland, T. R., and Holt, N. (1975). Personality patterns among short-term prisoners undergoing presentence evalu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37, 827-836.
- Holland, T. R., and McGarvey, B. (1984). Crime specialisation, seriousness progression, and Markov chai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837-840.
- Holland, T. R., Holt, N., and Beckett, G. E. (1982). Prediction of violent versus nonviolent recidivism from prior violent and nonviolent crimin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1, 178-182.
- Hollander, H. F., and Turner, F. D. (1985). Characteristics of incarcerated delinquen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environmental and family factors, and patterns of offence and recidiv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24, 221-226.

- Hollin, C. R. (1990). *Cognitive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 with Young Offenders*. New York: Pergamon.
- Hollin, C. R., and Henderson, M. (1984). Social skills training with young offenders: False expect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treatment. *Behavioural Psychotherapy*, 12, 331-341.
- Hollin, C. R., Hut, G. J., Clarkson, F., and Edmondson, A. C. (1986). Social skills training with young offenders in a borstal: An evaluative stud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 289-299.
- Holmes, R. M. (1989). *Profiling Violent Crimes: An Investigator's Tool*. Newbury Park, CA: Sage.
- Holmes, R. M., and De Burger, J. (1988). *Sexual Mur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 Holt, R. R. (1962). Individuality and generalis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 377-404.
- Home Office (1986a). *The Sentence of the Court*. London: HMSO.
- Home Office (1986b). *The Ethnic Origin of Prisoners: The Prison Population on 30 June 1985, and Persons Received July 1984-March 1985*. Home Office Statistical Bulletin 17/86. London: Home Office.
- Home Office (1987). *Criminal Careers of those Born in 1955: Persistent Offenders and Desistance*. Home Office Statistical Bulletin 35/87. London: Home Office.
- Home Office (1989a). *Criminal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1988*. London: HMSO.
- Home Office (1989b). *Crime Statistics for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District by Ethnic Group, 1987: Victims, Suspects, and Those Arrested*. Home Office Statistical Bulletin 23/89. London: Home Office.
- Home Office/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1975).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Abnormal Offenders*. London: HMSO.
- Hooper, F. A., and Evans, R. C. (1984). Screening for disruptive behavior of institutionalized juvenile offend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8, 159-161.
- Hope, K., Philip, A. E., and Loughran, J. M. (1967).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XYY sex-chromosome complement in a state mental hospital.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3, 495-498.
- Hough, M., and Mayhew, P. (1983). *The British Crime Survey: First Report*.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76. London: HMSO.
- Hough, M., and Mayhew, P. (1985). *Taking Account of Crime: Findings From The Second British Crime Survey*.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85. London: HMSO.
- Hough, M., Clarke, R. V. G., and Mayhew, P. (1980). Introduction. In R. V. C. Clarke and P. Mayhew (eds), *Designing Out Crime*. London: HMSO.
- Howard, R. C. (1984). The clinical EEG and personality in mentally abnormal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4, 569-580.
- Howard, R. C., Fenton, G. W., and Fenwick, P. B. C. (1984). The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personality,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 463-474.
- Huwarth, F. (1986). What does Eysenck's Psychoticism scale really measur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77, 223-227.
- Howells, K. (1978). The meaning of poisoning to a person diagnosed as a psychopath.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18, 179-184.
- Howells, K. (1979). Some meanings of children for pedophiles. In M. Cook and G. Wilson (eds), *Love and Attraction: Oxford Pergamon*.
- Howells, K. (1981). Adult sexual interest in children: Considerations relevant to theories of etiology. In M. Cook and K. Howells (eds), *Adult Sexual Interest in Children*. London: Academic Press.
- Howells, K. (1982). Mental disorder and violent behaviour. In P. Feldman (ed.),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Criminal Behaviour*, Volume 2. Chichester: Wiley.
- Howells, K. (1986). Social skills training and crimin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adults. In C. R. Hollin and P. I. Zuckerma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Skills Training, Volume 1: Applications Across the Life Span*. Oxford: Pergamon.
- Hsu, I. K. G., Wisner, K., Richey, E. T., and Goldstein, C. (1985). Is juvenile delinquency related to an abnormal EEG? A study of EEG abnormalities in juvenile delinquents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inpati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24, 310-315.
- Hubble, I. M., and Groff, M. (1982). WISC-R verbal-performance IQ discrepancies among Quay classified adolescent male delinqu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1, 503-508.
- Hucker, S. J., and Bain, J. (1990). Androgenic hormones and sexual assault.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Hucker, S. J., Langevin, R., Wortzman, G., Bain, J., Handy, L., Chambers, J., and Wright, S. (1986).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pedophile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18, 440-448.
- Hucker, S. J., Langevin, R., Dickey, R., Handy, L., Chambers, J., Wright, S., Bain, J., and Wortzman, G. (1988). Cerebral damage and dysfunction in sexually aggressive men. *Annals of Sex Research*, 1, 33-47.
- Hudgens, W., and Prentice, N. (1973). Moral judgment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adolescents and their moth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2, 145-152.
- Hudson, B. (1987). *Justice Through Punishment: A Critique of The Justice Model of Corrections*. London: Gower.
- Huesmann, L. R., and Eron, L. D. (1984).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10, 243-251.
- Huesmann, L. R., Eron, L. D., and Yarnel, P. W. (1987).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232-240.
- Huesmann, L. R., Eron, L. D., Lefkowitz, M. M., and Walder, L. O. (1984). Stability of aggression over time and genera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 1120-1134.
- Huizinga, D., and Elliott, D. S. (1986). Reassess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self-report delinquency measure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 293-327.
- Hunt, D. E., and Hardt, R. H. (1965). Developmental stage, delinquency,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 20-31.
- Hunt, I. McV. (196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i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D. Levin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unter, N., and Kelley, C. K. (1986). Examin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Adolescent Problem Inventory among incarcerated juvenile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301-302.
- Hutchings, B., and Mednick, S. A. (1975). Registered criminality in the adoptive and biological parents of registered male criminal adoptees. In R. R. Fieve, D. Rosenthal and H. Brill (eds), *Genetic Research in Psychia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acono, W. C., and Patrick, C. I. (1987). What psychologists should know about the detection. In F. B. Weiner and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Irving, B. L., and Hilgendorf, E. L. (1980). *Police Interrogation: 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 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Procedure Research Study No. 1. London: HMSO.
- Izzo, R. I., and Koss, R. R. (1990). Meta-analysis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A brief report.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7, 134-142.
- Jackson, E. P., Little, C. R., and Burke, M. J. (1985). Offense-specific models of th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process. *Social Problems*, 33, 335-356.
- Jackson, H. T., Glass, C., and Hope, S. (1987).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recidivist arson.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6, 175-185.
- Jackson, P. R., and Warr, P. B. (1984). Unemployment and psychological ill-heal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uration and ag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4, 605-614.
- James, D. V., Fineberg, N. A., Shah, A. I., and Priest, R. G. (1990). An increase in violence on an acute psychiatric ward: A study of associated facto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6, 846-852.
- Jarvik, J. F., Kindin, V., and Matsuyama, S. S. (1973). Human aggression and the extra Y chromosome: Fact or fantas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 674-682.
- Jeffery, C. R. (1965). Criminal behavior and learning theor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6, 294-300.
- Jeffery, C. R. (1976). Criminal behavior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A perspectiv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 149-174.
- Jenkins, P. (1988). Serial murder in England 1940-1985.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16, 1-15.
- Jenkins, R. L. (1960). The psychopathic or antisocial personality.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31, 318-334.
- Jennings, W. S., Kilkenny, R., and Kohlberg, L. (1983). Moral-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youthful and adult offenders. In W. S. Laufer and J. M. Day (eds), *Personality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Behavior*.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Jensen, G. F. (1972). Parents, peers and delinquent action: A test of th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562-573.
- Jensen, G. F., Erickson, M. L., and Gibbs, J. P. (1978). Perceived risk of punishment and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Social Forces*, 57, 57-78.
- Jensen, C. F. (1971). The Preston typology study: An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an institu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8, 38-52.
- Jessness, C. F. (1975).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and transactional analysis programs for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758-779.
- Jessness, C. F. (1988). The Jessness Invento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78-91.
- Jessness, C. F., and Wedge, R. F. (1984). Validity of a revised Jessness Inventory I-level classification with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997-1010.
- Jessness, C. F., Allison, T. S., McCormick, P. M., Wedge, R. F., and Young, M. L. (1975).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Demonstration Project*. California Youth Authority.
- Jessor, R., and Jessor, S. L. (1977). *Problem Behavior and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Jew, C. C., Clanton, T. L., and Mattocks, A. L. (1972).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in a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9, 602-605.
- Johnson, A. M. (1959).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S. Aronson (ed.), *American Handbook of Psych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Johnson, E., and Payne, J. (1986). The decision to commit a crime: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alysis. In D. B. Cornish and R. V. G.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Johnson, V. S. (1977). Behavior modification in the correctional setting.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397-428.
- Johnston, J. M. (1972). Punishment of human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27, 1033-1054.
- Johnston, M. (1976). Responsiveness of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to social reinforc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5, 41-49.
- Johnston, M. E. (1988). Correlates of early violence experience among men who are abusive toward female mates. In G.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F.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Jones, A. (1969). Stimulus seeking behavior. In J. P. Zubek (ed.), *Sensory Deprivation: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Jones, E. E. (1986). Interpreting interpersonal behavior: The effects of expectancies. *Science*, 234, 41-46.
- Jones, P. D., Stayer, S. J., Wichlacz, C. R., Thomas, L., and Livingstone, B. I. (1977). Contingency management of hospital diagnosed character and behavior disorder.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8, 13.
- Jones, M. (1963). The treatment of character disord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 276-282.
- Jurkovic, G. J. (1980). The juvenile delinquent as a moral philosopher: A structural developmental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 709-727.
- Jurkovic, G. J., and Prentice, N. M. (1977). Relation of mor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to dimension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6, 414-420.
- Jussim, L. (1986).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A theoretical and integrative review.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429-445.
- Justice, B., Justice, R., and Kraft, J. (1974). Early warning signs of violence: Is a triad enoug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 457-459.
- Kahn, J., Reed, F. S., Bates, M., Coates, T., and Everitt, B. (1976). A survey of Y chromosome variants and personality in 436 borstal lads and 254 control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 233-244.
-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84).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341-350.
- Kandel, D. B. (1978). Homophily, 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t friend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427-436.
- Kandel, E., Mednick, S. A., Kerkgaard-Sorensen, L., Hutchings, B., Knop, J., Rosenberg, R., and Schulzinger, F. (1988). IQ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subjects at high risk for anti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 224-226.
- Kanfer, F. H. (1980). Self-management methods. In F. H. Kanfer and A. P. Goldstein (eds), *Helping People Change*. New York: Pergamon.
- Kaplan, H. B. (1980). *Deviant Behavior in Defense of Self*. New York: Pergamon.
- Kaplan, P. L., and Arbuthnot, J. (1985). Affective empathy and cognitive role-taking i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youth. *Adolescence*, 20, 323-333.
- Karli, P. (1981).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study of brain mechanisms underlying aggressive behaviour. In P. J. Brain and D. Benton (eds), *The Biology of Aggression*. Alphen aan der Rijn: Sijthoff and Noordhoff.
- Karpman, B. (1948). The myth of the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4, 523-534.
- Karpman, B. (1949). Criminality, insanity and the law.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39, 584-605.
- Kassebaum, G. G., Couch, A. S., and Slater, P. E. (1959). The factorial dimensions of the MMPI.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3, 226-236.
- Kassebaum, G. G., Ward, D., and Wilner, D. (1971). *Prison Treatment and Parole Survival: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 Kaufman, J., and Zigler, E. (1987). Do abused children become abusive pa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186-192.
- Kazdin, A. E. (1986). Comparative outcome studies of psychotherapy: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95-105.
- Kazdin, A. E. (1987). Treatment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 187-203.
- Kazdin, A. E., Esvelde-Dawson, K., French, N. H., and Unis, A. S. (1987). Problem-solving skills training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ntisocial child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76-85.
- Keat, R. (1971). Positivism, naturalism and anti-natur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 3-17.
- Kegan, R. G. (1986). The child behind the mask: Sociopathy as developmental delay. In W. H. Reid, D. Dore, J. I. Walker and J. W. Sommer (eds), *Unmasking the Psychopat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and Related Syndromes*. New York: Norton.
- Keller, D. J., and Goldstein, A. (1978). Orgasms, reconditioning reconsidered. *Behaviour Therapy and Research*, 16, 299-301.

- Kelling, G. (1986). Neighbourhood crime control and the police: A view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K. Heit and G. Laycock (eds), *Situating Crime Prevention: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London: HMSO.
- Kellner, R. (1978). Drug treatment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delinquents. In W. H. Reid (ed.), *The Psychopat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ntisocial Disorders and Behavior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Kelly, F., and Veldman, D. I. (1984). Delinquency and school dropout as a function of impulsivity and nondominant valu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190-194.
- Kempe, C. H., Silverman, J. H., Steele, B. F., Drusemuller, W., and Silver, H. K. (1962). 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1, 17-24.
- Kernoff, R. (1986). *Offensive specialisation: Does it exist?* In D. B. Cornish and R. V.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Kendall, P. C. (1984). Cognitive-behavioral self-control therapy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5, 173-179.
- Kendall, P. C. (1989). The generalis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ehavior change: Comments, considerations and the 'no cure' criticism. *Behavior Therapy*, 20, 357-364.
- Kendall, P. C., Dearthoff, P., and Finch, A. (1977). Empathy and socialisation in first and repeat offenders and normal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5, 93-97.
- Kendall, P. C., Reber, M., McLeer, S., Epps, I., and Ronan, K. R. (1990).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conduct-disordered childre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4, 279-297.
- Kendell, R. F. (1975). *The Role of Diagnosis in Psychiatry*. Oxford: Blackwell.
- Kennard, D. (1983). *An Introduction to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ennrick, D. J., and Junder, D. C. (1988). Profiting from controversy: Lessons from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23-34.
- Kernberg, O.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Aronson.
- Kerns, M. H., Grannemann, B. D., and Banday, J. C. (1989). Stability and level of self-esteem as predictors of anger arousal and host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1013-1022.
- Kerr, C. A., and Roth, J. H. (1986). 'Population' practices and problems in forensic psychiatric facil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84, 127-143.
- Khantzian, I. J., and Treece, C. (1985). DSM-III psychiatric diagnosis of narcotic addicts: Recent finding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2, 1067-1071.
- Kiesler, D. J. (1983). The 1982 interpersonal circle: A taxonomy for complementarity in human transac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90, 183-214.
- Kiesler, D. J., Denburg, T. F. V., Sikes-Nova, V. L., Larus, J. P., and Goldston, C. S. (1990). Interpersonal behavior profiles of eight cases of DSM-III personality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6, 404-413.
- Kifer, R. E., Lewis, M. A., Green, D. R., and Phillips, L. (1974). Training preadolescent youth and their parents to negotiate conflict sit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7, 357-364.
- Kilpatrick, D. G., Best, C. L., Veronen, I. J., Amick, A. L., Villeponteaux, L. A., and Ruff, G. A. (1985).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of criminal victimisation: A random community surve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866-873.
- Kinzel, A. F. (1970). Body-buffer zone in violent prison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7, 59-64.
- Kipnis, D. (1971). *Character Structure and Impulsivenes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irchner, E., Kennedy, R., and Dragun, I. (1979). Assertion and aggression in adult offenders. *Behavior Therapy*, 10, 452-471.
- Kirgin, K. A., Braukmann, C. J., Atwater, J. D., and Wolf, M. M. (1982). An evaluation of teaching family (Achievement Place) group homes for juvenile offender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15, 1-16.
- Klassen, D., and O'Connor, W. A. (1989). Assessing the risk of violence in released mental patients: A cross-validation study.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 75-81.
- Klein, M. W. (1984). Offense specialisation and versatility among juvenil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4, 185-194.
- Klein, M. W. (1986). Labelling theory and delinquency policy: An experimental test.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3, 47-70.
- Klein, N. C., Alexander, J. F., and Parsons, B. V. (1977). Impact of family systems intervention on recidivism and sibling delinquency: A model of primary prevention and program evalu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5, 469-474.
- Kleinmuntz, B. (1990). Why we still use our heads instead of formulas: Toward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 296-310.
- Kline, P. (1987). *Psychanalysis and crime*. In B. J. McG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mprison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Knight, B. J., Osborn, S. G., and West, D. J. (1977). Early marriage and criminal tendency in mal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5, 43-50.
- Knight, R. A., and Prentky, R. A. (1990). Classifying sexual offen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corroboration of taxonomic models.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Kohlberg, L. (1976). Moral stages and moralisation: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T. Lic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ohlberg, L., and Candee, D. (1984). The relationship of moral judgment to moral action. In W. M. Kurtines and J. W. Gewirtz (eds), *Morality, 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Development*. Chichester: Wiley.
- Kolvin, I., Miller, P. J. W., Meeting, M., and Kolvin, P. A. (1988). Social and parenting factors affecting criminal offence rates: Findings from the Newcastle Thousand Family Study (1947-1980).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2, 80-90.
- Konecni, V. J., and Ebbesen, E. B. (eds), (1982).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San Francisco: Freeman.
- Kornhauser, R. K. (1978). *Social Sources of Delinquency: An Appraisal of Analytic Mode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oss, M. P., and Leonard, K. E. (1984). Sexually aggressive men: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N. M. Malamuth and F. Donnerstein (eds),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oss, M. P., Gidycz, C. A., and Wisniewski, N. (1987). The scope of rap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sexual aggression and victimisation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162-170.
- Kozol, H., Boucher, R., and Garofalo, R. (1972).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angerousness. *Crime and Delinquency*, 18, 371-392.
- Krakowski, M., Volavka, I., and Brizer, D. (1986). Psychopathology and viol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27, 131-148.
- Krauss, H. H., Robinson, J., Ianzon, W., and Cauthen, N. (1972). Predictions of ethical risk taking by psychopathic and nonpsychopathic criminals. *Psychological Reports*, 30, 83-88.
- Kremsdorff, R. B., Holmen, M. L., and Laws, D. R. (1980). Orgasmic reconditioning without deviant imagery: A case report with a pedophile.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18, 203-207.
- Kroll, J., and McKenzie, I. B. (1983). When psychiatrists are liable: Risk management and violent patients.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sychiatry*, 34, 29-37.
- Kruppa, I. (1991). Perpetrators suffer trauma too. *The Psychologist*, 4, 401-403.
- Krus, D. J., Sherman, J. L., and Krus, P. H. (1977). Changing values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e story of Thurstone's crime scal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0, 207-211.
- Krymcki, Y. (1978). Cerebral dysfunction in repeatedly assaultiv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6, 59-67.
- Kurtines, W. M. (1984). Moral behavior as rule-governed behavior: A psychosocial role-theoretical approach to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In W. M. Kurtines and J. W. Gewirtz (eds), *Morality, 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Development*. Chichester: Wiley.
- Kurtines, W. M., and Hogan, R. (1972). Sources of conformity in unsocialise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0, 49-51.
- Kurtines, W. M., Alvarez, M., and Azmitia, M. (1990). Science and morality: The role of values in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ral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 283-295.
- Kutash, S. B. (1978).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of aggression. In I. L. Kutash, S. B. Kutash, I. B. Schlesinger and others (eds), *Violence: Perspectives on Murder and Aggress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ahey, B. B., Conner, R. D., Atkeson, B. M., and Treiber, F. A. (1984). Parenting behavior and emotional status of physically abusive moth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1062-1071.
- Lahey, B. B., Hartdagen, S. E., Enck, P. J., McBurnett, K., Connor, R., and Hynd, G. W. (1988). Conduct disorder: Parsing the confounded relation to parental divorce and antisocial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334-337.
- Lambert, N. M. (1988). Adolescent outcomes for hyperactive children: Perspectives on general and specific patterns of childhood risk for adolescent educational, soci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786-799.
- Landau, S. F. (1976). Delinquency,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tim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4, 745-759.
- Landau, S. F. (1981). Juveniles and the poli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1, 27-46.
- Lane, D. A. (1987). Personality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A long term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 797-806.
- Lane, P. J., and Kling, J. (1979).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Overcontrolled hostility scale of the MMPI.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7, 781-782.
- Lane, R. (1974). Crim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ish and American view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287-303.
- Lang, R. A., Holden, R., Langevin, R., Pugh, G. M., and Wu, R. (1987). Personality and criminality in violent offend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 179-195.
- Lange, J. S. (1931). *Crime as Destin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Langevin, R. (ed.). (1985). *Erotic Preference, Gender Identity and Aggress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Langevin, R., Joubert, D., and Russon, A. E. (1985). Are rapists sexually anomalous, aggressive, or both. In R. Langevin (ed.), *Erotic Preference, Gender Identity and Aggress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Langevin, R., Ben-Aron, M. H., Coulthard, R., Heasman, G., Furness, J. E., Handy, L., Hucker, S. J., Russon, A. E., Day, D., Roper, V., Bain, J., Wortzman, G., and Webster, C. D. (1985). Sexual aggression: Constructing a predictive equation: A controlled pilot study. In R. Langevin (ed.), *Erotic Preference, Gender Identity and Aggress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Lanyon, R. I. (1986a). Theory and treatment in child molest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176-182.
- Lanyon, R. I. (1986b).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procedures in court related setting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7, 260-268.
- Larance, D. T., and Twentyman, C. I. (1983). Maternal attributions and child abu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2, 449-457.
- Lattimer, P. R., and Sweet, A. A. (1984). Cognitive versus behavioral procedures in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15, 9-22.
- Laub, J. H. (1987). Data for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M. R. Gottfredson and T. Hirschi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aufer, W. S., Johnson, J. A., and Hogan, R. (1981). Ego control and crimin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 179-184.
- Laufer, W. S., Skoog, D. K., and Dav, J. M. (1982). Personality and criminality: A review of the 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8, 562-573.
- Laws, D. R. (1974). The failure of a token economy. *Federal Probation*, 38, 33-38.
- Laws, D. R. (1984). The assessment of diverse sexual behaviour in human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major methodologies. In K. Howells (ed.), *The Psychology of Sexual Diversity*. Oxford: Blackwell.
- Laws, D. R. (ed.). (1989). *Relapse Prevention With Sex Offender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Laws, D. R., and Marshall, W. M. (1990). A conditioning theory of the etiology and maintenance of deviant sexual preference and behavior.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Laws, D. R., and Osborn, C. A. (1983). Setting up shop: How to build and operate a laboratory to evaluate and treat sexual deviance. In J. G. Greer and I. Stuart (eds), *The Sexual Aggressor: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reatment*.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Laws, D. R., and Rubin, H. B. (1969). Instructional control of an autonomic sexual respons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 93-99.
- Laws, D. R., Meyer, J., and Holmen, M. L. (1978). Reduction of sadistic sexual arousal by olfactory aversion: A case study.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16, 281-285.
- Lazarus, R. S. (1980).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as psychodynamics. In M. J. Mahoney (ed.), *Psychotherapy Proces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ew York: Plenum.
- Lazarus, R. S. (1991).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in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352-367.
- Leary, T. (1957).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Ronald Press.
- Lee, M., and Prentice, N. M. (1988). Interrelations of empathy, cognition, and moral reasoning with dimension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6, 127-139.
- LeFlore, L. (1988). Delinquent youths and family. *Adolescence*, 23, 629-642.
- Lemert, E. M. (1967).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eschied, A. W., and Thomas, K. E. (1985). Effective residential programming for 'hard to serve' delinquent you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raigwood program.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7, 161-177.
- Levander, S. E., Schalling, D. S., Lidberg, L., Bartfai, A., and Lidberg, Y. (1980). Skin conductance recovery time and personality in a group of criminals. *Psychophysiology*, 17, 105-111.
- Levey, A. B., and Martin, J. (1981). Personality and conditioning. In H. J. Eysenck (ed.), *A Model for Personalit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Levey, S., and Howells, K. (1990). Anger and its management.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1, 305-327.
- Levine, W. R., and Bornstein, P. F. (1972). Is the sociopath treatable? The contribution of psychiatry to a legal dilemma.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693-717.
- Levenson, R. B. (1988). Developments in the classification process. *Quay's AIMS approach: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24-38.
- Levy, I. H. (1983). Trait approaches. In M. Hersen, A. E. Kazdin and A. S. Bellack (eds), *The Clinical Psychology Handbook*. New York: Pergamon.
- Lewis, D. O., Shanok, S. S., and Balla, D. A. (1979). Perinatal difficulties, head and face trauma, and child abuse in the medical histories of seriously disturbed delinquent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 419-423.
- Lewis, D. O., Pincus, J. H., Shanok, S. S., and Glaser, G. H. (1982). Psychomotor epilepsy and violence in a group of incarcerated adolescent boy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882-887.

- Jewell, G., and Appleby, L. (1988) Personality disorder: The patients' psychiatris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44-49.
- Lewis, R. V. (1983) *Straight and Twisted: California's Styl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0, 209-226.
- Lizaro, A. (1978) School, alienation and delinquency. *Crime and Delinquency*, 24, 375-379.
- Lickona, T. (1976) Crit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T. Lic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Lidberg, L., Levander, S. E., Schalling, D., and Lidberg, Y. (1976) Excretion of adrenaline and noradrenaline as related to real life stress and psychopathy. *Reports from the Laboratory for Clinical Stress Research*, Stockholm No. 20.
- Lieber, A., and Sherrin, C. (1972) Homicides and the lunar cycle: Toward a theory of lunar influence on human emotional disturb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9, 69-74.
- Lindon, E., and Hackler, J. C. (1973) Affective ties and delinquency.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6, 27-46.
- Lindqvist, P., and Allebeck, P. (1990) Schizophrenia and crime: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of 644 schizophrenics in Stockholm.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7, 343-350.
- Linn, D., Dunneister, E., and Penrod, S. (1987)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Do the psychological facts fit the political fu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946-953.
- Lilly, J. R., Cullen, F. T., and Ball, R. A. (1989) *Criminological Theory: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Lion, J. R. (1978) Outpatient treatment of psychopaths. In W. H. Reid (ed.), *The Psychopat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ntisocial Disorders and Behavior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Lipton, D. S., McDermid, F. C., and McFall, R. M. (1987) Heterosexual perception in rapis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17-21.
- Liska, A. F., and Tausig, M. (1979)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class and race differentials in legal decision-making for juvenil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 197-207.
- Litwack, T. R., and Schlesinger, I. B. (1987) Assessing and predicting violence: Research, law, and applications. In I. B. Weiner and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Lloyd, C., and Walsley, R. (1989) *Changes in Rape Offences and Sentencing*.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105. London: HMSO.
- Lobitz, G. K., and Johnson, S. M. (1975) Normal versus deviant children: A multimethod compariso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 353-374.
- Lochman, J. E., Burch, P. R., Curry, J. J., and Lampron, L. B. (1984) Treatment and generalization effect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and goal-setting interventions with aggressive boy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915-916.
- Locke, E. A. (1972)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causality in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ports*, 31, 175-197.
- Loeber, R. (1982) The stability of antisocial and delinquent child behavior: A review. *Child Development*, 53, 1431-1446.
- Loeber, R. (1990) Development and risk factors of juvenile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delinquenc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0, 1-41.
- Loeber, R., and Dishion, T. J. (1984) Boys who fight at home and school: Family conditions influencing cross-setting consistenc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759-768.
- Loeber, R., and Stouthamer-Loeber, M. (1986) Family factors as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juvenile conduct problems and delinquency. In N. Morris and M. Tonry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ume 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ugan, C. H. (1972) Evaluation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63, 378-387.
- Lundom, H., Schubert, D. S. F., and Washburn, D. (1972) Increase of autonomic arousal by boredom.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0, 29-36.
- Longo, R. L. (1982) Sexual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among adolescent sexual offen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6, 235-241.
- Lopatto, D., and Williams, J. L. (1976) Self-contr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26, 3-12.
- Looney, K. (1966) *On Aggression*. London: Methuen.
- Lorr, M. (1982) On the use of cluster analytic technique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8, 461-462.
- Lowie, C. F., and Higson, P. J. (1980) Self-instructional training and cognitive behaviour modification: A behavioural analysis. In G. Davey (ed.), *Applications of Conditioning Theory*. London: Methuen.
- Luckenbill, D. (1977) Criminal homicide as a situated transaction. *Social Problems*, 25, 176-186.
- Luckenbill, D., and Best, J. (1981) Careers in deviance and respectability: The analogy's limitations. *Social Problems*, 29, 197-206.
- Lund, N. L., and Salary, H. M. (1980) Measured self-concept in adjudicated juvenile offenders. *Adolescence*, 15, 65-74.
- Lundman, R. J., Sylkes, R. E., and Clark, J. P. (1978) Police control of juveniles: A repli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5, 74-91.
- Lungo, A. J., and Lewis, D. A. (1987) The criminal mental patient: A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4, 268-287.
- Lykken, D. T. (1957) A study of anxiety in the sociopathic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6-10.
- Lykken, D. T. (1988) The case against polygraph testing.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 Maccoby, F. F., and Martin, J. A. (1983) Sociali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L.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4. New York: Wiley.
- Maccoby, E. F., Johnson, J. P., and Church, R. M. (1958)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the control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4, 38-51.
- MacCulloch, M. J., Snowden, P. R., Wood, P. J. W., and Mills, H. E. (1983) Sadistic fantasy, sadistic behaviour, and offend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20-29.
- MacDonald, J. (1967) Homicidal threa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4, 61-68.
- MacDonald, J. E. (1955)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01, 704-717.
- Mack, J. I. (1969) The MMPI and recidivism.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4, 612-614.
- Mackay, R. D. (1990) Fact and fiction about the insanity defense. *Criminal Law Review*, 247-253.
- Mackenzie, D. L., and Goodstein, L. (1985) Long-term incarceration impa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ng-term offend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2, 395-414.
- MacNamara, E. J. (1977) The medical model in corrections. *Criminology*, 14, 419-448.
- Madden, D. J. (1986) 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es in the treatment of violent persons. In L. H. Roth (ed.),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Violent Person*. New York: Guilford.
- Mahoney, M. J. (1974) *Cognition and Behavior Modification*. Cambridge: Ballinger.
- Mahoney, M. J., and Arnoult, D. B. (1978) Cognitive and self-control therapies. In S. L. Garfield and A. F. Bergin (e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 Magnusson, D. (1988) Antisocial behaviour of boys and autonomic reactivity. In T. B.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Malamuth, N. M. (1984) Aggression against women: Cultural and individual causes. In N. M. Malamuth and E. Donnerstein (eds),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alamuth, N. M. (1986) Predictors of naturalistic sexual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953-962.
- Malamuth, N. M., and Check, J. V. P. (1983) Sexual arousal to rape depiction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2, 55-67.
- Maloczky, B. M. (1984) Self-referred versus court-referred sexually deviant patients: Success with assisted covert sensitisation. *Behavior Therapy*, 11, 306-314.
- Maloczky, B. M. (1991) *Treating the Sex Offen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 Malphrant, R., Watson, S. A., and Daniels, D. (1990) Disruptive behaviour in schoo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heart rate (HR) levels in 7- to 9-year-old boy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 199-205.
- Malinquist, C. P. (1968) Conscience development.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23, 301-331.
- Manicas, P. T. (1987)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Blackwell.
- Manicas, P. T., and Secord, P. F. (1983)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y of the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399-413.
- Mannheim, H. (1965)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nnheim, H., and Wilkins, L. T. (1955) *Prediction Methods in Relation to Biostatistics*. London: HMSO.
- Mannuzza, S., Klein, R. G., Koenig, P. H., and Giampino, T. L. (1989) Hyperactive boys almost grown up: IV. Crimin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psychiatric statu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6, 1073-1079.
- Marcel, J. C. (1977) Implicit dimensions of idiography and nomothesis: A reformul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1046-1055.
- Margolin, G. (1979) Conjoint marital therapy to enhance anger management and reduce spouse abus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7, 13-23.
- Margolin, G. (1988) Interperso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arital violence. In G.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ark, V. H., and Fray, F. R. (1970) *Violence and the Brai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Marques, J. K. (1981) Effects of victim resistance strategies on the sexual arousal and attitudes of violent rapists. In R. B. Stuart (ed.), *Violent Behavior: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es to Prediction,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New York: Brunner/Mazel.
- Marsh, P. (1985) Patterns of aggression—not unnaturally. In E. Karas (ed.), *Current Issues in Clinical Psychology*, Volume 2. London: Plenum.
- Marsh, P., Rosser, F., and Harre, R. (1978) *The Rules of Disord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shall, R. J. (1983)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the diagnosis and development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W. S. Laufer and J. M. Day (eds), *Personality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Behavior*. Lexington: Heath.
- Marshall, W. L. (1979) Satiation therapy: A procedure for reducing deviant sexual arousal.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12, 377-389.
- Marshall, W. L. (1989) Intimacy, loneliness and sexual offender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7, 491-503.
- Marshall, W. L., and Barbaree, H. E. (1984) Disorders of personality, impulse, and adjustment. In S. M. Turner and M. Hersen (eds), *Adult Psychopathology and Diagnosis*. New York: Wiley.
- Marshall, W. L., and Barbaree, H. E. (1990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the etiology of sexual offending.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Marshall, W. L., and Barbaree, H. E. (1990b) Outcome of comprehensive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programs.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Martin, H., and Rudeheffer, M. (1976)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abuse on children.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1, 12-16.
- Martin, S. E., Sechrest, L. B., and Redner, R. (1981) *New Directions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riminal Offend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Martinson, R. (1974)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The Public Interest*, 35, 22-54.
- Martinson, R. (1979) New findings, new views: A note of caution regarding sentencing reform. *Hofstra Law Review*, 7, 242-258.
- Mason, S. I. (1984) The noradrenergic locus coeruleus—the centre of attention?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7, 445.
- Matarazzo, J. D. (1990)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ersus psychological testing: Validation from Binet to the school, clinic, and courtroo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999-1017.
- Matsueda, R. L. (1982) Testing control theory and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 causal modelling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489-504.
- Matsueda, R. L., Piliavin, I., and Gartner, R. (1988) Economic assumptions versus empiric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305-309.
- Mathews, V. M. (1968) Differential identification: An empirical note. *Social Problems*, 14, 376-383.
- Mattson, A., Schalling, D., Olweus, D., Low, H., and Svensson, M. A. (1980) Plasma testosterone,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dimensions in young male delinqu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19, 476-490.
- Matza, D. (1964) *Delinquency and Drift*. New York: Wiley.
- Mawby, R. I., McCulloch, J. W., and Batta, J. D. (1979) Crime among Asian juveniles in Bradf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w*, 7, 297-306.
- Mawson, A. R., and Mawson, C. D. (1977) Psychopathy and arousa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sychophysiological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Psychiatry*, 12, 49-74.
- Mayhew, P., Clarke, R. V. G., and Hough, J. M. (1980) Steering column locks and car theft. In R. V. G. Clarke and P. Mayhew (eds), *Designing Out Crime*. London: HMSO.
- Mayhew, P., Elliott, D., and Dowds, I. (1989) *The 1988 British Crime Survey*. London: HMSO.
- Mazur, A. (1983) Physiology, dominance, and aggression in humans. In A. P. Goldstein (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gression*. New York: Pergamon.
- McGaghy, C. H. (1968) Drinking and deviance: Disavowal: The case of child molesters. *Social Problems*, 16, 43-49.
- McCallum, C. (1979) The CNV and conditionability in psychopaths.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Supplement*, 31, 337-343.
- McCandless, B. R., Persons, W. S., and Roberts, A. (1972) Perceived opportunity, delinquency, race and body-build among delinquent yout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6, 281-287.
- McClintock, F. H., and Gibson, E. (1961) *Robbery in London*. London: Macmillan.
- McCloskey, M., and Eggett, H. E. (1983)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What can a psychologist tell a ju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550-562.
- McCord, J. (1978) A thirty-year follow-up of treatment effe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284-289.
- McCord, J. (1979) Some childbearing antecedents of criminal behavior in adult 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477-1486.
- McCord, J. (1985) Deterrence and the light touch of the law. In D. P. Farrington and J. Gunn (eds), *Reactions to Crime: The Public, The Police, Courts, and Prisons*. Chichester: Wiley.
- McCord, J. (1986) Instigation and insulation: How families affect antisocial aggression. In D. Olweus, J. Block and M. Radke-Yarrow (eds),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cCord, J., McCord, W. M., and Thurber, F. (1962) Some effects of paternal absence on male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361-369.
- McCord, W. M. (1983) *The Psychopath and Milieu Therap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cCord, W. M., and McCord, J. (1964) *The Psychopath: An Essay on the Criminal Mind*. New York: Van Nostrand.

- McCrae, R. R. and Costa, P. T. (1985). Comparison of EPI and Psychocism scales with measures of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 587-597.
- McCrae, R. R. and Costa, P. T. (1986). Clinical assessment can benefit from recent advance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1001-1003.
- McCullough, I. P., Hunsinger, G. M., and Nave, W. R. (1977). Self-control treatment of aggression in a 18-year old ma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5, 322-331.
- McDougall, C., Barnett, R. M., Ashurst, B., and Willis, B. (1987). Cognitive control of anger. In B. I. Me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mprison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McLwan, A. W. (1963). Eysenck's theory of criminality and the personality types and offences of young delinqu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 201-204.
- McLwan, A. W. and McIluck, B. J. (1981). The professionalism of prison psychologists.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4, 415-417.
- McFall, R. M. (1982).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skills. *Behavioral Assessment*, 4, 1-33.
- McGarry, A. T., and Parker, I. T. (1974). Massachusetts' Operation Baxstrom: A follow-up.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4, 27-41.
- McGarry, B., Gabrielli, W., Bentler, P. M., and Mednick, S. (1981). Rearing social class, education, and criminality: A multiple indicator model.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0, 354-364.
- McLee, R., Williams, S., and Silva, P. A. (1985). Factor structure and correlates of ratings of inattention, hyperactivity,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a large sample of 9 year-old children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480-490.
- McLennan, C. (1979). Action and its explanation. In N. Belloni (ed.),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Psychology*. London: Methuen.
- McGuire, J., and Presley, P. (1985). *Offending Behaviour: 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Going Straight*. London: Batsford.
- McGuire, R. J., Carlisle, J. M., and Young, B. G. (1965). Sexual deviations as conditioned behaviour: A hypothe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 185-190.
- McGuirk, B. I. (1978). Personality types among normal human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8, 146-161.
- McGuirk, B. J., and McGuirk, R. E. (1979). Personality types among prisoners and prison offic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31-49.
- McGuirk, B. I. and McDougall, C. (1981). A new approach to Eysenck's theory of crimi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 349-349.
- McManus, M., Alevet, N. E., Grapentine, W. L., and Brickman, A. (1984). Psychiatric disturbance in serious delinqu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23, 602-615.
- McMullan, M., and Hollin, C. R. (1989). Drinking and delinquency: Another look at young offenders and alcohol.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9, 386-394.
- McMullan, M., and Shapland, P. (1989). What do prison psychologists do? *The Psychologist*, 2, 287-289.
- McNee, M. P., Felt, D. S., Marshall, R. S., and Ridley, T. R. (1976). Shopping prevention: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rough sign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9, 399-406.
- McNeil, D. F., and Binder, R. L. (1987). Predictive validity of judgments of dangerousness in emergency civil commi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 197-200.
- McReynolds, P. (1987). Lightner Wimer: Little known found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849-856.
- Mednick, S. A. (1975).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recovery and psychopatholog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Behavioral Therapy*, 4, 55-66.
- Mednick, S. A., and Kandel, L. (1988). Genetic and perinatal factors in violence. In F.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Mednick, S. A., Gabrielli, W. F., and Hutchings, B. (1984). Genetic influences in criminal convictions: Evidence from an adoption cohort. *Science*, 234, 891-894.
- Mednick, S. A., Volavka, J., Gabrielli, W. F., and Rill, T. M. (1981). EEG as a predictor of antisocial behavior. *Criminology*, 19, 219-229.
- Meehl, P. E. (1954). *Clinical Versus Statistical Predi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eehl, P. E. (1986). Causes and effects of my disturbing little boo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0, 370-375.
- Meehl, P. E., and Rosen, A. (1955). Antecedent probabil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psychometric signs, patterns, or cutting scor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2, 194-216.
- Megargee, E. J. (1966). Undercontrolled and overcontrolled personality types in extreme antisocial aggression.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0, Whole No. 611.
- Megargee, E. J. (1970). The prediction of violence with psychological tests. In C. D. Spielberger (ed.), *Current Topics in Criminal and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egargee, E. J. (1976). The prediction of dangerous behavior.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 1-22.
- Megargee, E. J. (1977). A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riminal offenders: I. The need for a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107-114.
- Megargee, E. J., and Bohn, M. J. (1979). *Classifying Criminal Offender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egargee, E. J., Parker, G. V. C., and Levine, R. V. (1971). Relationship of familial and social factors to socialisation in middle-clas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7, 76-89.
- Meichenbaum, D. (1977). *Cognitive-Behavior Modification: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Plenum.
- Meichenbaum, D., and Gilmore, J. B. (1984). The nature of unconscious processes: A cognitive-behavioral perspective. In K. S. Bowers and D. Meichenbaum (eds), *The Unconscious Reconsidered*. New York: Wiley.
- Metzger, G., Vanyouse, F., Joshua, S., and Hicks, A. (1982). The reliability of Axis II of DSM-III.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1360-1361.
- Mellon, G., Pettilä, J., Jyhtess, N., and Slobogin, C. (1987).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for the Courts: A Handbook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Lawyers*. New York: Guilford.
- Melizer, L. F., Rodin, B. N., and Fenton, T. (1986). Cognitive and learning profiles of delinquent and learning-disabled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1, 581-591.
- Menard, S., and Morse, B. J. (1984). A structuralist critique of the IQ-delinquency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1347-1378.
- Menzies, R. J., and Webster, C. D. (1989). Mental disorder and violent crime. In N. A. Weiner and M. E. Wolfgang (eds), *Pathways to Criminal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Menzies, R. J., Webster, C. D., and Butler, B. I. (1981). Perceptions of dangerousness among forensic psychiatrist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22, 387-396.
- Merton, R. K. (1936).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894-904.
- Mietzel, M., and Loxell, C. (1942). Recent literature on individual correlates of cri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9, 134-164.
- Milan, M. A. (1987). Token economy programs in mental institutions. In E.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Milan, M. A., and Evans, J. H. (1987). Intervention with incarcerated offenders. In L. B. Weiner and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Miller, L. (1988). Neur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delinquency.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6, 419-428.
- Miller, W. B. (1958). Lower class culture as a generating milieu of gang delinquen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4, 5-19.
- Millon, T. (1981). *Disorders of Personality: DSM-III, Axis II*. New York: Wiley.
- Mills, C. M., and Walter, F. L. (1979). Reduc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A behavioral employment intervention. In J. S. Sturphauter (ed.), *Progress in Behavior Therapy with Delinquents*.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 Miner, W. W. (1980). The neutralisation of criminal offense. *Criminology*, 18, 103-120.
- Mischel, T. (1964). Personal constructs, rules, and the logic of clinical activ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71, 180-192.
- Mischel, W. (1961). Preference for delayed reinforce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62, 1-7.
- Mischel, W.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 Mischel, W. (1964). Convergenc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search for consist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 351-364.
- Mischel, W., and Mischel, H. (1976). A cognitive social-learning approach to morality and self-regulation. In T. Lic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Mischel, W., Shoda, Y., and Rodriguez, M. I. (1989). 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children. *Science*, 244, 933-938.
- Moffitt, T. E. (1983). The learning theory model of punishment.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0, 131-158.
- Moffitt, T. E. (1988). Neuropsychology and self-reported early delinquency in an unselected birth cohort: A preliminary report from New Zealand.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Moffitt, T. E., and Silva, P. A. (1987). WISC-R verbal and performance IQ discrepancy in an unselected cohort: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longitudinal stabilit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768-774.
- Moffitt, T. E., and Silva, P. A. (1988). IQ and delinquency: A direct test of the differential detec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330-333.
- Moffitt, T. E., Gabrielli, W. F., Mednick, S., and Schulsinger, F. (1981). Socioeconomic status, IQ,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0, 152-156.
- Monahan, E. D., and Hathaway, S. R. (1969). The personality of delinquents. In J. N. Butcher (ed.), *MMPI: Research Developmen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 Monahan, J. (ed.) (1980). *Who is the Client? The Ethic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onahan, J. (1981). *Predicting Violent Behavior: An Assessment of Clinical Techniq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onahan, J. (1984). The prediction of violent behavior: Toward a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ory and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1, 10-15.
- Monahan, J. (1988). Risk assessment of violence among the mentally disordered: Generating usefu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11, 249-257.
- Monahan, J. (1992). Mental disorder and violent behavior: Perceptions and evid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511-521.
- Monahan, J., and Loftus, E. F. (1982). 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441-475.
- Monahan, J., and Steadman, H. J. (1983). Crime and mental disorder: An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 In N. Morris and M. Tonry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Volume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nahan, J., Novaco, R. W., and Gey, C. (1979). Corporate violence: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 In T. F. Sabin (ed.), *Challenges 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New York: Human Services Press.
- Money, J. (1990). Forensic sexology: Paraphilia, serial rape (bestiality) and lust murder (anthrophili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44, 26-36.
- Monroe, R. (1978). *Brain Dysfunction in Aggressive Criminals*. Lexington: Heath.
- Moon, J. R., and Eisler, R. M. (1983). Anger control: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three behavioral treatments. *Behavior Therapy*, 14, 493-505.
- Muore, D. R., Chamberlain, P., and Muka, L. H. (1979). Children at risk for delinquency: A follow-up comparison of aggressive children and children who steal.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7, 345-355.
- Moore, I. R., and Finn, P. F. (1986). Forensic psychology: An empirical review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2, 675-679.
- Moore, M. (1984). *Law and Psychia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 Moos, R. H. (1975). *Evaluating Correctional and Community Settings*. New York: Wiley.
- Moran, R. (1985). The modern foundation for the insanity defense: The cases of James Hadfield (1800) and Daniel McNaughtan (1843).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77, 31-42.
- Morash, M. (1982). Juvenile reaction to labels: An experiment and an exploratory stud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7, 76-88.
- Morey, L. C. (1988). The categ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A cluster analysis of DSM-III-R personality featur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314-321.
- Morris, A. (1965). The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of adult offender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6, 197-202.
- Morris, E. K., Higgins, S. T., Bickel, W. K., and Braukmann, C. J.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behaviorism: History, concepts, and a systematic analysis. In E.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Morris, N. (1974). *The Future of Impriso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ris, N. (1983). Mental illness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P. Bean (ed.), *Mental Illness: Changes and Trends*. Chichester: Wiley.
- Motandon, C., and Harding, T. (1984). The reliability of dangerousness assessments: A decision making exercis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 149-155.
- Mowat, R. R. (1966). *Mortal Jealousy and Murder*. London: Tavistock.
- Moyer, K. (1981). 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aggression: Implications for control. In P. F. Brain and L. Benton (eds), *The Biology of Aggression*. Alphen aan der Rijn: Sijthoff and Noordhoff.
- Moyes, T., Tennent, T. G., and Bedford, A. P. (1985).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of a ward-based behaviour modification programme for adolescents with acting-out and conduct problem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7, 300-305.
- Mueller, C. W. (1983).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R. C. Geen and L. L.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ullen, P. E. (1990).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sexual assaul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victims.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1, 13-34.
- Muller, D. J., Blackman, D. E., and Chapman, A. J. (eds) (1984).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Mulvey, E. P., and Larusa, J. F. (1986). Delinquency cessation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6, 212-224.
- Mulvey, E. P., and Lidz, C. W. (1984).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prediction of dangerousness in mental pati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 379-401.
- Mungas, D. (1983).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ecific syndromes of violent behavior.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1, 354-361.
- Munsterberg, H. (1908). *On the Witness Stand*. New York: Doubleday.
- Murphy, J. E. (1988). Date abuse and forced intercour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G. I. Hotaling, D. Funkhouser, I. T. Ky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urphy, W. D. (1990). Assessment and modification of cognitive distortions in sex offenders.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Murray, C. A. (1976). *The Link Between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 Murray, D. I. (1989). *Review of Research on Re-offending of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Research and Planning Unit Paper 55. London: Home Office.
- Myers, R. C., and Herath, E. A. (1983). Some features of Australian exhibitionists compared with paedophil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2, 541-547.
- Myers, T. (1982). Alcohol and violent crime re-examined: Self-reports from two sub-groups of Scottish male prisoners.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77, 399-413.
- Nass, M. L. (1966). The superego and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ies of Freud and Piaget. *Psychosomatic Study of the Child*, 21, 51-68.
- Nasse, A. J., and Abramowitz, S. I. (1976). From phrenology to psychosurgery and back again: Biological studies of crimi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6, 541-617.
- Nelson, J. R., Smith, D. J., and Dodd, J. (1990). The moral reason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8, 231-239.
- Newman, D. I. (1956). Pleading guilty for considerations: A study of bargain justic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ublic Science*, 46, 780-790.
- Newman, J. P., and Kosson, D. S. (1986). Passive avoidance learning in psychopath and nonpsychopathic offen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5, 252-256.
- Newman, J. P., Widom, C. S., and Nathan, S. (1985). Passive avoidance in syndromes of disinhibition: Psychopathy and extraver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1316-1327.
- Newman, O. (1972).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New York: Macmillan.
- Newton, A. (1980). The effects of imprisonment. *Criminal Justice Abstracts*, 12, 134-151.
- Nicholson, R. C. (1970). Transactional analysis: A new method for helping offenders. *Federal Probation*, 34, 29-39.
- Nietzel, M. T. (1979). *Crime and its Modification: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New York: Pergamon.
- Nietzel, M. T., and Dillehay, R. L. (1986).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in the Courtroom*. New York: Pergamon.
- Nietzel, M. T., and Himelein, M. J. (1986).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In B. A. Edelstein and L. Michelson (eds), *Handbook of Prevention*. New York: Plenum.
- Nietzel, M. T., and Himelein, M. J. (1987). Probation and parole. In E.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Nietzel, M. T., and Moss, C. S. (1972). The role of the psychologis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3, 259-270.
- Noble, P., and Rodgers, S. (1989). Violence by psychiatric in-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5, 384-390.
- Nomellini, S., and Katz, R. C. (1983). Effects of anger control training on abusive parent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7, 57-68.
- Normandeau, A. (1969). Robbery in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9, 71-79.
- Normandeau, A. (197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eighted crime indices for eight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Review*, 25, 15-18.
- Norris, A. (1986). Practical reasoning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 jurisprudential approach. In D. B. Cornish and R. V. Clarke (eds), *The Reasoning Criminal: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s on Offend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Norris, M. (1983). Changes in patients during treatment at the Henderson Hospital therapeutic community during 1971-1981.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56, 135-143.
- Novaco, R. W. (1978). Anger and coping with stress. In J. P. Foreyt and D. F. Rathjen (ed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New York: Plenum.
- Novaco, R. W., and Wells, W. N. (1980). Anger disturbances: Cognitive mediation and clinical prescriptions. In K. Howells and C. R. Hollin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Violence*. Chichester: Wiley.
- Nünner-Winkler, G. (1984). Two moralities?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ethic of care and responsibility versus the ethic of rights and justice. In W. M. Kurtines and J. L. Gewirtz (eds), *Moral Behaviour and Moral Development*. Chichester: Wiley.
- Nurco, D. N., Ball, J. C., Shaffer, J. W., and Hanlon, T. E. (1985). The criminality of narcotic addict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3, 94-102.
- O'Callaghan, M. A. I. (1986). Bio-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control of aggression/aggressive behaviour in mental health settings.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O'Connor, A. A. (1987). Female sex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0, 615-620.
- Offord, D. R. (1982). Family backgrounds of male and female delinquents. In J. Gunn and D. P. Farrington (eds), *Abnormal Offenders, Delinquency,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hichester: Wiley.
- Ogloff, J. R. P., Wong, S., and Greenwood, A. (1990). Treating criminal psychopaths in a therapeutic community program.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181-190.
- O'Keefe, E. J. (1975). Porteus Maze Q score as a measure of impulsivity.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41, 675-678.
- O'Leary, K. D., Barling, J., Anas, J., Rosenbaum, A., and Tyree, A. (1989). Prevalence and stability of physical aggression between spous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263-268.
- Ostapuk, A. (1980). Adults' moral reasoning with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1, 1285-1288.
- Ollendick, T. H., and Hersen, M. (1979).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7, 547-554.
- Olweus, D. (1979). Stability of aggressive reaction patterns in males: A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852-875.
- Olweus, D. (1981). Continuity in aggressive and withdrawn, inhibited patterns. *Psychiatry and Social Science*, 1, 141-159.
- Olweus, D. (1986). Aggression and hormones: Behavioral relationship with testosterone and adrenaline. In D. Olweus, J. Block and M. Radke-Yarrow (eds),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Olweus, D., Matison, A., Schalling, D., and Low, H. (1980). Testosterone, aggression, physical and personality dimensions in normal adolescent male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42, 263-269.
- O'Neal, E., Brunault, M., Marquis, J., and Carifio, M. (1979). Anger and the body buffer zon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8, 135-136.
- Opton, E. M. (1975). Institutional behavior modification as a fraud and sham. *Arizona Law Review*, 17, 20-28.
- Orcutt, J. (1970). Self-concept and insulation against delinquency: some critical not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1, 381-390.
- Osborn, S. G., and West, D. J. (1980). Do adolescents really reform?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 99-114.
- Osgood, D. W., Johnson, L. D., O'Malley, P. M., and Bachman, J. G. (1988). The generality of deviance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81-93.
- Ostapuk, E. (1982).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intervention in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An overview. In M. P. Feldman (ed.),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Criminal Behaviour: Volume 1: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ffending*. Chichester: Wiley.
- Ostrom, I. M., Steele, C. M., Rosenblond, L. K., and Mirrels, H. L. (1971). Modification of delinquent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 118-136.
- Ottensmeyer, K. F. (1979).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rape. *Aggressive Behavior*, 5, 425-435.
- Quinlan, C. (1969). Aggression and epileps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3, 237-241.
- Quston, J. (1984). Delinquency,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4, 2-26.
- Overholser, J. C., and Beck, S. (1986). Multimethod assessment of rapists and child molesters and three control groups on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662-669.
- Overson, W. I. (1973). On the assumptive base of 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 Additive versus interactive conceptions. *Human Development*, 16, 74-84.
- Owen, D. R. (1972). The 47 XY male: A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8, 209-233.
- Owens, R. G., and Aschurst, J. B. (1982). Functional analysis in applied psych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2, 181-190.
- Ozer, D. J. (1985). Correlation and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7, 307-315.
- Pachella, R. G. (1988). On the admiss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testimony in criminal justice proceeding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 111-114.
- Palmer, I. (1977). Economic analyses of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punishment: a review.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4, 4-21.
- Palmer, I. (1974). The Youth Authority's Community Treatment Project. *Federal Probation*, 38, 3-14.
- Palmer, T. (1975). Martinson revisite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2, 133-152.
- Palmer, T. (1983). The effectiveness issue: An interview. *Federal Probation*, 47, 3-10.
- Palmonen, T., and Wiscott, B. (1980). Risk factors for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re of limited value for predicting the violent behaviour of acute involuntarily admitted patient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1, 152-155.
- Palys, J. S., and Dvorsky, S. (1984).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An examination of sentencing disparity among Canadian provincial court judges. In D. J. Muller, D. F.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Panton, J. J. (1958). MMPI profile configurations among crime classification group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4, 305-308.
- Panton, J. J. (1979a). MMPI profile configurations associated with incestuous and non-incestuous child molester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5, 335-338.
- Panton, J. J. (1979b). Longitudinal post-validation of the MMPI Escape (E) and Prison Adjustment (Ap) scale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5, 101-103.
- Parke, R. D. (1974). Rules, roles, and resistance to deviance: Recent advances in punishment, discipline, and self control. *Minnesota Symposium on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arke, R. D. (1977). Socialization into child abuse. In J. Tapp and F. Levine (eds), *Law, Justice, and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Parker, E.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e provision. In L. Gordon (ed.), *Secure Provision: A Review of Special Services for the Mentally Ill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Tavistock.
- Parker, H., and Ciller, H. (1981). More and less the same: British delinquency research since the sixti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1, 230-245.
- Parke, J. G., and Asher, S. R. (1987). Peer relations and later personal adjustment: Are low accepted children at ri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 357-389.
- Parson, M. B. (1984).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nd its incredible credibility cri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 95-109.
- Parrot, C. A., and Strongman, K. I. (1984). Locus of control and delinquency. *Adolescence*, 19, 459-471.
- Parsons, O. A., and Hart, R. P. (1964). Behavioral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esions. In H. E. Adams and P. B. Sutker (eds),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Plenum.
- Paschark, R. A. (198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84, 100-114.
- Paschark, R. A., and Pantle, M. L. (1979). Insanity plea: Legislator's 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 222-227.
- Paschark, R. A., Pantle, M. L., and Meadman, H. J. (1982). Detention and recidivism rates of persons found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and convicted fel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892-897.
- Passingham, R. E. (1972). Crime and personality: A review of Eysenck's theory. In V. D. Nevelstein and J. A. Gray (eds), *Biological Bases of Individual Behaviou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atterson, G. R. (1974). Interventions for boys with conduct problems: Multiple settings, treatments, and criteri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471-481.
- Patterson, G. R. (1982). Coercive family process. Eugene, Or: Castalia.
- Patterson, G. R. (1986). Performance models for antisocial boy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472-484.
- Patterson, G. R., and Stouthamer-Loeber, M. (1984). The correlation of famil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delinquency. *Child Development*, 55, 1299-1307.
- Patterson, G. R., Chamberlain, P., and Reid, J. B. (1982).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a parent-training program. *Behavior Therapy*, 13, 638-650.
- Patterson, G. R., DeBarryshe, S. D., and Ramsey, E. (1989).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329-335.
- Parson, M. Wilmot, E., and Padu, M. (1986). A study of violent behaviour among inpatients in a psychiatric hospital.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9, 232-235.
- Pease, K. (1985). Obscene telephone calls to women in England and Wales. *Howard Journal*, 24, 275-281.
- Pendleton, L. (1980). Treatment of persons found incompetent to stand trial.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 1096-1100.
- Pernasse, I. S. (1939). Mental disease and crime: Outline of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uropean statistics.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18, 1-15.
- Perkins, D. F. (1987). A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programme for sex offenders. In B. J. McG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the Prisoner: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Pernanen, K. (1991). *Alcohol in Human Violence*. New York: Guilford.
- Perry, D. C., Perry, L. C., and Rasmussen, P. (1986). 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mediators of agg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57, 700-711.
- Persky, H., Smith, K. D., and Basu, G. (1971). Relation of psychologic measures of aggression and hostility to testosterone production in ma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3, 265-277.
- Peters, R. W. (1967).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therapy with institutionalized boys and subsequent community adjust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1, 137-141.
- Petersen, K. G. I., Matousek, M., Mednick, S. A., Volavka, J., and Pollock, V. (1982). Etiologic antecedents of the very.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5, 331-338.
- Peterson, R., and Hagan, J. (1984).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race: Towards an account of anomalous findings of sentencing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6-71.
- Petronila, R. C., and Poythress, N. G. (1983). The quality of forensic evalua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1, 76-85.
- Petrie, A. (1967). *Individuality in Pain and Suffer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hillips, D. P. (1983). The impact of mass media on homicid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560-568.
- Phillips, E. I. (1986). Achievement Place: Token reinforcement procedures in a home-style rehabilitation setting for pre-delinquent boy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13, 213-221.
- Piaget, J. (1959).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Pichot, P. (1978).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 Phavin, I., and Pinar, S. (1964). Police encounters with juvenil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240-254.
- Piquero, J. J., Han, L. A. J., and Vidum, A. C. (1988). Constraining effects of personal costs on the transgressions of juveni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227-233.
- Pisavini, L., Thornton, C., Cartwright, R., and Malisweda, R. L. (1986). Crime, deterrence, and rational cho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101-119.
- Pithers, W. D. (1990). Relapse prevention with sexual aggressors: A method for maintaining therapeutic gain and enhancing external supervision.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Pittman, D., and Hanay, W. (1964). Patterns in criminal aggravated assault.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5, 362-370.
- Planas, K., and Johnson, R. (1977). Homicidal aggression in schizophrenic men.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55, 65-75.
- Platt, J. J., and Piquero, M. F. (1987). Cognitive-behavioral theory and interventions for crime and delinquency. In E.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Platt, J. J., Scura, W., and Hannan, J. R. (1973). Problem-solving thinking of youthful incarcerated heroin addict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 278-281.
- Plummer, K. (1979). Misunderstanding labelling perspectives. In D. Downes and P. Rock (eds), *Deviant Interpretations*. Oxford: Robertson.
- Pokorny, A. D. (1965). Human violence: A comparison of homicide, aggravated assault and attempted suicid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6, 448-497.
- Pollack, N., McMan, L., and Webster, C. D. (1989).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assessment of dangerousness. In K. Howell and C. R. Hollin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Violence*. Chichester: Wiley.
- Porteus, S. D. (1959). *The Maze Test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Palo Alto: Pacific Books.
- Powell, G. L., and Stewart, R. A. (1983). 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o antisocial and neurotic behaviours as observed by teach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 97-100.
- Power, M. J., Alderson, M. R., Philipson, C. M., and Morris, J. N. (1967). Delinquent schools? *New Society*, 10, 542-543.
- Prentiss-Dunn, S., and Rogers, R. W. (1963). Deindividuation in aggression. In R. G. Green and L. I.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rentky, R. A., Cohen, M. I., and Seghorn, T. K. (1985). Development of a rational taxonom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xual offenders: Rapist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13, 39-70.
- Prentky, R. A., Burgess, A. W., Rokous, F., Lee, A., Hartman, C., Renier, R., and Douglas, J. (1989). The presumptive role of fantasy in sexual sexual homicid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6, 887-891.
- Preston, M. A., and Carnegie, J. (1989). Intermediate treatment: Working with offenders in the community. In C. Hollin and K. Howell (ed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Working With Offenders: Issues in Criminological and Legal Psychology, No. 24*.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Price, K. H. (1978). *Abnormal Behavior: Perspectives in Conflic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Price, W. H., Strong, J. A., Whitmore, P. B., and McClelland, W. L. (1966). Criminal patients with XYY sex-chromosome complement. *Lancet*, 1, 565-566.
- Prins, H. (1986). *Dangerous Behaviour, The Law and Mental Disorder*. London: Javistock.
- Pritchard, D. A. (1979). Stable predictors of recidivism: A summary. *Criminology*, 17, 1-21.
- Plack, J. (1988). The clinical literature on men who batter: A review and critique. In G.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I.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Pulkkinen, L. (1986). The role of impulse contr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D. Olweus, J. Block and M. Radlo-Yarnis (eds), *Development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yle, G. F. (1976). Spatial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crime in Cleveland, Ohio.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 175-198.
- Quay, H. C. (1965).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as pathological stimulation see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2, 180-183.
- Quay, H. C. (1977a). Measuring dimensions of deviant behavior: The Behavior Problem Checklist.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5, 277-287.
- Quay, H. C. (1977b). Psychopathic behavior: Reflections on its nature, origins, and treatment. In E. Weizmann and I. Ugras (eds), *The Structuring of Experience*. New York: Plenum.
- Quay, H. C. (1977c). The three faces of evaluation: What can be expected to work.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341-354.
- Quay, H. C. (1984). *Managing Adult Inmates*. 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 Quay, H. C. (1986). The behavioral reward and inhibition systems in childhood behavior disorder. In L. M. Blumhage (e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Volume 1*. New York: Spectrum.
- Quay, H. C. (1987a). Patterns of delinquent behavior. In H. C. Quay (ed.), *Handbook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Wiley.
- Quay, H. C. (1987b). Intelligence. In H. C. Quay (ed.), *Handbook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Wiley.
- Quay, H. C., and Love, C. T. (1977). The effects of a juvenile diversion program on recidivis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377-396.
- Quinn, J. T., Harbison, J. J., and McAllister, H. (1970). An attempt to shape penile response.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8, 212-216.
- Quinsey, R. (1974). *Critique of Legal Order*. Boston: Little, Brown.
- Quinsey, V. L. (1984). Sexual aggression: Studies of offenders against women. In D. Weisstub (ed.), *Law and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Volume 1*. New York: Pergamon.
- Quinsey, V. L. (1986). Men who have sex with children. In D. Weisstub (ed.), *Law and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Volume 2*. New York: Pergamon.
- Quinsey, V. L. (1988). Assessment of the treatability of forensic patient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6, 443-452.
- Quinsey, V. L., and Abtman, R. (1979). Variables affecting psychiatrists' and teachers' assessments of the dangerousness of mentally ill offend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7, 353-362.
- Quinsey, V. L., and Earls, C. M. (1990). The modification of sexual preferences.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Quinsey, V. L., and Laws, D. R. (1990). Validity of physiological measures of sexual arousal in a sexual offender population: A critique of Hall, Poxon, and Nels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8, 686-688.
- Quinsey, V. L., and Maguire, A. (1986). Maximum security psychiatric patients: Actuarial and clinical prediction of dangerousnes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 143-171.
- Quinsey, V. L., and Marshall, W. L. (1983). Procedures for reducing inappropriate sexual arousal: An evaluative review. In J. G. Greer and I. R. Stuart (eds), *The Sexual Aggressor*.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Quinsey, V. L., Chaplin, F. C., and Upfold, D. (1984). Sexual arousal to non-sexual violence and sadomasochistic themes among rapists and non-sex offend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651-657.
- Quinsey, V. L., Maguire, A., and Varney, G. W. (1983). Assertion and overcontrolled hostility among mentally disordered murder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1, 550-556.
- Quinsey, V. L., Warnerford, A., Pinesse, M., and Tink, N. (1975). Released Oak Ridge patients: A follow-up study of review board discharg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5, 264-270.
- Rabin, J. G. (1979). Criminal behavior of discharged mental patient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1-29.
- Reichlin, S., Halpern, A. I., and Portnow, S. J. (1984). The volitional rul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the insanity defense. *Psychiatric Annals*, 14, 139-147.
- Rachman, S. (1977). The conditioning theory of fear-acquisi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15, 375-387.
- Rada, R. T. (1978). *Clinical Aspects of the Rapist*.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 Rada, R. T., Laws, D. R., and Kellner, R. (1976). Plasma testosterone levels in the rapist.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 257-268.
- Radden, J. (1985). *Madness and Reas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Rader, C. M. (1977). MMPI profile types of ex-prisoners, rapists and assaulters in a court service popul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5, 61-69.
- Raine, A. (1986). Effect of early environment on electrodermal and cognitive correlates of schizotypy and psychopathy in crimi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4, 277-287.
- Raine, A. (1989). Evoked potentials and psychopat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4, 277-287.
- Raine, A., and Venables, P. H. (1981). Classical conditioning and socialisation—a biosocial intera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 273-283.
- Raine, A., and Venables, P. H. (1984). Tonic heart rate level, social class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adolescents. *Biological Psychology*, 18, 123-132.
- Raine, A., and Venables, P. H. (1987).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P5 evoked potential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Psychophysiology*, 24, 191-199.
- Ranin, J. H. (1983). The family context of delinquency. *Social Problems*, 30, 466-479.
- Ranin, R. J., and Wilkoff, R. L. (1964). The IES Arrow Plot performance of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Perceptual Motor Skills*, 18, 207-210.
- Rapaport, K., and Burkhardt, B. R. (1984). 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ly coercive college mal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3, 216-221.
- Rasch, W. (1981). The effects of indeterminate detention: A study of men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4, 417-431.
- Raskin, D. C. (1988). Does science support polygraph testing? In A. Gale (ed.), *The Polygraph Test: Truth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 Rathus, S. A., and Siegel, L. J. (1980). Crime and personality revisited: Effects of MMPI response sets in self-report studies. *Criminology*, 18, 245-251.
- Rauma, D., and Berk, R. A. (1987). Remuneration and recidivism: The long-term impact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on ex-offender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3, 1-28.
- Rausch, H. L. (1965). Interaction 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 487-499.
- Reckless, W. C. (1961). *The Crime Proble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Reckless, W. C., and Dinitz, S. (1967). Pioneering with self-concept as a vulnerability factor in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58, 515-523.
- Reicher, S., and Emler, N. (1986). Managing reputations in adolescence: The pursuit of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identities. In H. Beloff (ed.), *Getting into Life*. London: Methuen.
- Reid, J. D. (1982).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 behavioural regime in a secure youth treatment centre. In M. P. Feldman (ed.),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Criminal Behaviour: Volume 1: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ffending*. Chichester: Wiley.
- Reis, D. J. (1974). Central neurotransmitters in aggress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52, 119-148.
- Reitsma-Street, M., and Leschuel, A. W. (1988). The concept-level matching model in correcti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92-108.
- Reitsma-Street, M., Offord, D. R., and Finch, T. (1985). Pairs of same-sexed siblings: discordant for antisocial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6, 415-423.
- Remington, B., and Remington, M. (1987). Behavior modification in probation work: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4, 156-174.
- Renwick, S., and Emler, N. (1984). Moral reasoning and delinquent behaviour among studen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3, 281-283.
- Renwick, S., and Emler, N. (19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kills deficits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0, 61-72.
- Repucci, N. D., and Chingampet, W. G. (1978).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research with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 727-746.
- Rescorla, R. A. (1988). Pavlovian conditioning: It'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151-160.
- Ressler, R. K., Burgess, A. W., Douglas, J. E., Hartman, C. R., and D'Agostino, R. B. (1986). Sexual killers and their victims: Identifying patterns through crime scene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 288-308.
- Ressler, R. K., Burgess, A. W., Hartman, C. R., Douglas, J. E., and McCormack, A. (1986). Murderers who rape and mutilat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 273-287.
- Rettig, S. (1984). Ethical risk-taking sensitivity in male prison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 582-590.
- Rettig, S., and Rawson, H. E. (1963). The risk hypothesis in predictive judgments of unethical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243-248.
- Reynolds, D. (1976). The delinquent school. In M. Hammersley and P. Woods (eds),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ce, M. E., Quinsey, V. L., and Houghton, R. (1990). Predicting treatment outcome and recidivism among patients in a maximum security token economy.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313-326.
- Richard, B. A., and Dodge, K. A. (1982). Social maladjustment and problem-solving in school aged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0, 226-233.
- Richards, B. (1978).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impriso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8, 162-169.
- Richman, C., Brown, K., and Clark, M. (198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maladaptive behavior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2, 177-185.
- Riddle, M., and Roberts, A. H. (1977). Delinquency, delay of gratification, recidivism, and the Porteus Maze Te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4, 417-423.
- Ries, A. J., and Rhodes, A. L. (1964). An empirical test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 5-18.
- Rimé, B., Bouvy, H., LeBorgne, B., and Rouillon, F. (1978). Psychopathy and nonverbal behavior in an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 626-643.
- Roberts, A. H., Erikson, R. V., Riddle, M., and Bacon, J. G. (1974). Demographic variables, base rat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recidivism in male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833-841.
- Roberts, R. J., and Weerts, T. C. (1982). Cardiovascular responding during anger and fear imagery. *Psychological Reports*, 50, 219-230.
- Robertson, G. (1989). Treatment for offender patients: How should success be measured?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9, 303-307.
- Robertson, G., and Gunn, J. (1987). A ten year follow-up of men discharged from Grendon pris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1, 674-678.
- Robins, L. (1978). Sturdy predictors of adult antisocial behaviour: Replications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8, 611-622.
- Robins, L., West, P. A., and Henric, B. L. (1975). Arrests and delinquency in two

- generations: A study of black urban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6, 125-140.
- Robins, L. N., Helzer, J. E., Weissman, M. M., Orvaschel, H., Gruenberg, F., Burke, J. D., and Regier, D. A. (1984). Lifetime prevalence of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three sit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1, 949-958.
- Robinson, N. (1974). Hara, offense, and nuisa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9, 233-238.
- Robinson, W. S. (1950).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351-357.
- Rock, P. (1979). The sociology of crime,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some problematic qualities of radical criminology. In D. Downes and P. Rock (eds), *Deviant Interactions*. Oxford: Robertson.
- Rodin, F. A. (1973). Psychomotor epileps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8, 210-213.
- Roesch, R., and Golding, S. I. (1987). Dehning and assessing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In L. B. Weiner and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Rogers, R. (1987). APA's position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Empiricism versus emotional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840-848.
- Roele, D. G., and Erickson, M. L. (1982). Delinquent careers: A test of the escalation model. *Criminology*, 20, 5-28.
- Rohrbach, C. A., and Twyman, C. T. (1986). Multimodal assessment of impulsiveness in abusing, neglecting, and nonmaltreating mothers and their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231-236.
- Rollin, H. R. (1969). *The Mentally Abnormal Offender and the Law*. Oxford: Pergamon.
- Roth, C. (1973). Exhibitionism, sexual violence and paedophili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2, 705-710.
- Rosch, F.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L. Rosch and B.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Rose, S. (1987). *Motives and Muds: Essays on Biology and the Social Order*.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Rose, S., Kahn, L. J., and Lewontin, R. C.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Rosen, A., and Schalling, D. (1974). On the validity of the 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socialisation scale: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757-765.
- Rosenbaum, A., and O'Leary, K. D. (1981). Marital violence: characteristics of abusive coupl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9, 53-71.
- Rosenberg, F., and Rosenberg, M. (1978). Self-esteem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7, 279-291.
- Rosenberg, M. S., and Repucci, N. D. (1985). Primary prevention of child abus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576-585.
- Ross, H. L. (1973). Law, science, and accidents: The British Road Safety Act of 1967.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 1-78.
- Ross, H. L., and Glaser, D. M. (1973). Making it out of the ghetto.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4, 347-356.
- Ross, R. R., and Haberman, E. A. (1985). *Time I. Think: A Cognitive Model of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nd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Johnson City, Te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Arts.
- Ross, R. R., and Mackay, H. B. (1976).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progra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 165-173.
- Ross, R. R., and Price, M. J. (1976). Behavior modification in corrections: Autopsy before mor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 4, 205-215.
- Ross, R. R., Fabiano, T. A., and Ewles, C. D. (1988). Reasoning and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 29-35.
- Rossi, P. H., Waite, E., Bose, C. E., and Berk, R. F. (1974). The seriousness of crimes,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224-237.
- Rutenburg, M. (1974).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notes on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role-taking (sympathy and empathy): An illustrative experiment with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boy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25, 177-185.
- Rutter, J. B. (1975). Some problems and misconception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 of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56-62.
- Rotton, J., and Frey, J. (1985). Air pollution, weather, and violent crimes: Concomitant time-series analysis of archival dat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1207-1220.
- Rourke, B. P. (1988). Socioemotional disturbances of learning disabled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 801-810.
- Rowe, D. (1983). Biometric genetic models of self-reported delinquent behavior: A twin study. *Behavioral Genetics*, 13, 473-489.
- Rowe, D. C., and Gage, D. W. (1984). Heredity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delinquency: A reconside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26-540.
- Rude, B. G., and Niesdale, A. R. (1976). Emotional arous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3, 851-863.
- Ruma, J. H., and Mosher, D. L. (1967).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judgment and guilt in delinquent boy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2, 122-127.
- Rushton, J. F., and Chrisjohn, R. D. (1981).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psychotism and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Evidence from eight separate samp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 11-20.
- Rushton, J. P. (1990). Race and crime: A reply to Roberts and Gabor.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2, 315-334.
- Rushton, J. P., Fulkner, D. W., Neale, M. C., Nias, D. K. B., and Eysenck, H. J. (1986). Altruism and aggression: The heritabilit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1192-1198.
- Russell, D. E. H. (1984). *Sexual Exploitation: Rape, Child Sexual Abuse, and Workplace Harassment*.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utter, M. (1971). Parent-child separation: Psychological effects on the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2, 233-260.
- Rutter, M. (1982). Syndromes attributable to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in childhood.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21-33.
- Rutter, M. (1987).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316-331.
- Rutter, M., and Giles, H. (1983). *Juvenile Delinquenc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Rutter, M., Maughan, B., Mortimore, P., and Ouston, J. (1979). *Fifteen Thousand Hours: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ir Effects on Children*. London: Open Books.
- Safran, J. D. (1990). Toward a refinement of cognitive therapy in light of interpersonal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 87-105.
- Sakloffe, D. H. (1977).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psychotism in adolescent schoolboy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1, 425-426.
- Salter, A. C. (1988). *Treating Child Sex Offenders and Victims: A Practical Guide*. Newbury Park, CA: Sage.
- Sanday, P. R. (1981).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rap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7, 5-27.
- Sandhu, H. J. (1970). Therapy with violent psychopaths in an Indian priso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14, 138-144.
- Santrock, J. W. (1975). Father absence, perceived maternal behavior, and moral development in boys. *Child Development*, 46, 753-757.
- Sapp, A. D., and Vaughn, M. S. (1990). Juvenile sex offender treatment at state-operated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34, 131-146.
- Sappington, A. A. (1990). Recent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free will versus determinism issu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39-29.
- Sapolsky, R. (1983). *Life Sentence: Prisoners' Reactions, Response and Chang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Sarason, I. G. (1968). Verbal learning, modeling,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3, 254-266.
- Sarason, I. G. (1978). A 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 Sarason, I. G., and Ganzer, V. J. (1968). Concerning the medical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23, 507-510.
- Sarbin, T. R. (1967). On the futility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some people be labelled "mentally ill".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31, 447-453.
- Sarbin, T. R. (1979). The myth of the criminal type. In T. R. Sarbin (ed.), *Challenges 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New York: Human Services Press.
- Satterfield, J. H. (1978). The hyperactive child syndrome: A precursor of adult psychopathy?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 Satterfield, J. H., Hoppe, C. M., and Schell, A. M. (1982). A prospective study of delinquency in 110 adolescent boy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nd 88 normal adolescent boy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795-798.
- Saulnier, K., and Perlman, D. (1981). Inmate attributions: Their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n coping.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8, 159-172.
- Saunders, J. T., Repucci, N. D., and Sarata, B. P. (1973). An examination of impulsivity as a trait characterizing delinquent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3, 789-795.
- Saunders, W. M., and Kershaw, P. W. (1978). The prevalence of problem drinking and alcoholism in the West of Scotland.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3, 493-499.
- Sawyer, J. (1966).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clin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6, 178-200.
- Scarr, S., and Carter-Saltzman, L. (1979). Twin method: Defense of a critical assumption. *Behavior Genetics*, 9, 527-542.
- Scarr, S., and McCartney, K. (1983). How people make their own environments: A theory of genotype \times environment effects. *Child Development*, 54, 424-435.
- Schacter, S. (1964).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In I.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acter, S., and Latané, B. (1964). Crime, cognition, and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In D. Levin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Schalling, D. (1978). Psychopathy-related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the psychophysiology of socialisation.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u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 Schalling, D., and Rosen, A. S. (1968). Porteus Maze differences between psychopathic and non-psychopathic crimin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 224-228.
- Schalling, D., Asberg, M., Adnan, G., and Ornlund, I. (1987). Markers for vulnerability to psychopathology: Temperament traits associated with platelet MAO activity.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76, 172-182.
- Schalling, D., Lidberg, L., Levander, S. E., and Dahlin, Y. (1973). Spontaneous autonomic activity as related to psychopathy. *Biological Psychology*, 1, 83-97.
- Scharf, P., and Hickey, J. (1976). The prison and the inmate's conception of legal justice: An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educ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 107-122.
- Shelton, R. C., Thielgaard, A., Uwen, D. R., and White, D. (1984). Sex chromosome anomalies, hormones and aggressivi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1, 93-99.
- Schöber, D. (1980). The new criminology: Some critical issu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 1-19.
- Schluchter, K. J., and Moran, J. J. (1981). Effects of stress inoculation on the anger and aggression management skills of institutionalized juvenile delinquent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5, 359-365.
- Schmidberg, M. (1961). Psychotherapy of the criminal psychopath. *Archives of Criminal Dynamics*, 4, 724-735.
- Schmuck, F. J. (1970). Punishment, arousal, and avoidance learning in sociopath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5, 323-335.
- Schneider, K. (1950). *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 Ninth Edition. London: Cassell.
- Schoenthaler, S. J. (1983). Diet and delinquency: A multi-state repl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social Research*, 5, 70-78.
- Schroeder, M. L., Wormworth, J. A., and Lavesley, W. J. (1992).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big five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4, 47-53.
- Schwartz, R. A., and Schwartz, I. K. (1976). Are personality disorders diseases?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36, 613-617.
- Schwartz, R. D., and Orleans, S. (1967). *On legal san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34, 274-300.
- Schweinhart, L. (1987). Can preschool programs help prevent delinquency? In J. Q. Wilson and G. C. Loury (eds), *From Children to Citizens: Volume 3: Families, Schools,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Schwendinger, H., and Schwendinger, J. (1970). Defenders of order or guardians of human rights? *Issues in Criminology*, 5, 123-157.
- Schwitzgebel, R. I. (1967). Short-term operant conditioning of adolescent offenders on socially relevant variabl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2, 134-142.
- Scott, W. A. (1958). Research definitions of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ill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5, 29-46.
- Scully, D., and Marolla, J. (1985). Riding the bull at Gile's: Convicted rapists describe the rewards of rape. *Social Problems*, 32, 233-251.
- Sechrest, L. (1987). Classification for treatment. In D. M. Gottfredson and M. Tonry (eds),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chrest, L., White, S. O., and Brown, E. D. (1979). *The Rehabilitation of Criminal Offender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Secord, P. F. (1983).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in life situ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Potentialities of Knowledg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ecord, P. F. (1986). Social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In J. Margolis, P. Manicas, R. Harré and P. F. Secord (eds), *Psychology: Designing the Discipline*. Oxford: Blackwell.
- Segal, Z. V., and Marshall, W. L. (1985). Heterosexual social skills in a population of rapists and child molest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55-63.
- Segal, Z. V., and Stermac, L. E. (1990). The role of cognition in sexual assault.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F.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Issues, Theories,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Selby, M. J. (1984). Assessment of violence potential using measures of anger, hostility,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8, 531-544.
- Sellin, T. (1938). *Culture Conflict and Crime*.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Sellin, T., and Wolfgang, M. E. (1964). *The Measurement of Delinquency*. New York: Wiley.
- Sepeck, D. S., Webster, C. D., and Meazens, R. J. (1984). The clinical prediction of dangerousness: Getting beyond the basic questions. In D. J. Müller, D. E. Blackman and A. J. Chapman (eds), *Psychology and Law*. Chichester: Wiley.

- Serber, M. (1970) Shame aversion therapy.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1, 213-218.
- Sereno, R. C. (1991) Psychopathy and violence in criminal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6, 423-431.
- Serna, I. A., Schumaker, J. B., Hazel, J. S., and Sheldon, J. B. (1986) Teaching reciprocal social skills to parents and their delinquent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5, 64-77.
- Shah, S. A. (1978) Dangerousness: A paradigm for exploring some issues in law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224-238.
- Shah, S. A., and Kuth, L. H. (1974) Biological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factors in criminality. In D. Glaser (e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Shanok, S. S., and Lewis, D. O. (1981) Medical histories of female delinquent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8, 211-213.
- Shapiro, D. (1965) *Neurotic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haw, C. R., and McKay, H. D. (1942)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eard, M. H., Marini, J. L., Bridges, C. I., and Wagner, F. (1976) The effect of lithium on impulsive aggressive behavior in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3, 1409-1413.
- Sheldon, W. H. (1949) *Varieties of Delinquent Youth*. New York: Harper.
- Shields, N. M., and Harnecke, C. R. (1988) Multiple sexual victimisation: The case of incest and marital rape. In G. J. Hotel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hinozaki, M., and Jenkins, R. I. (1967) MMPI study of three types of delinqu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3, 156-163.
- Shore, M. F., and Massimo, J. L. (1979) Fifteen years after treatment: A follow-up study to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ly oriented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9, 240-245.
- Short, R. J., and Simonson, R. J. (1986) Social cognition and aggression in delinquent adolescent males. *Adolescence*, 21, 159-176.
- Shover, N. (1983) The later stages of ordinary property offender careers. *Social Problems*, 31, 208-218.
- Shupe, L. M. (1954) Alcohol and crime: A study of the urine alcohol concentration found in 882 persons arrested during 8 hours immediately after commission of a felon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44, 661-664.
- Siddle, D. A. T., Mednick, S. A., Nicol, A. R., and Fergus, R. H. (1976) Skin conductance recovery in antisocial adolescen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5, 425-428.
- Siegel, R. A. (1978) Probability of punishment and suppression of behavior in psychopathic and nonpsychopathic offen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 511-522.
- Siegmán, A. W. (1966) Effects of auditory stimulation and intelligence on time estimation in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30, 320-328.
- Silva, J., Martorelli, C., and Clemente, A. (1986) Socialisation and personality: Stud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 a preadult Spanish popul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 355-372.
- Silverman, D. C., Kalich, S. M., Bowie, S. L., and Edibel, S. E. (1988) BBZ rape and confidence rape: A typology applied to 1,000 consecutive ca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 1438-1441.
- Silverman, J., Buchsbaum, M. S., and Sterlin, H. (1973) Sex differences in perceptual differentiation and stimulus intensity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5, 309-318.
- Simon, F. H. (1971) *Prediction Methods in Criminology*. London: HMSO.
- Simon, H. A. (1978) Rationality as a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hough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 1-11.
- Simon, R. J., and Baxter, S. (1989) Gender and violent crime. In N. A. Weiner and M. L. Wolfgang (eds), *Violent Crime, Violent Criminals*. Newbury Park, CA: Sage.
- Simon, W. I., and Schouten, P. C. W. (1991) Mithysmography in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sexual devianc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 75-91.
- Simclair, I. A. C., Shaw, M. J., and Troop, J. (197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oversion and response to casework in a prison sett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3, 51-61.
- Singer, J. L. (1955)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nd ego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19, 259-266.
- Singh, A. (1979)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studi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4, 987-993.
- Skinner, B. 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 Skinner, B. F. (1978) *Reflections on Behaviorism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kogan, W. G. (1977) Dimensions of the dark figure of unreported crime. *Crime and Delinquency*, 23, 41-50.
- Slaby, R. G., and Guerra, N. G. (1988) Cognitive mediators of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offenders. I. Assess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 580-588.
- Slutske, K. (1973) Evaluation studies on group treatment of juvenile and adult offenders i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0, 87-100.
- Smith, B. D., Davidson, R. A., Smith, D. L., Goldstein, H., and Perlestein, W. (1989) Sensation-seeking and arousal: Effects of strong stimulation on electrodermal and memory task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 671-679.
- Smith, D. A., and Visser, C. A. (1960) Sex and involvement in deviance/crime: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691-701.
- Smith, D. A., and Visser, C. A. (1982) Street level justice: 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of police arrest decisions. *Social Problems*, 29, 167-177.
- Smith, D. E. (197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ysenck and Jesness personality invent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4, 376-384.
- Smith, M. L., and Glass, G. V. (1977) Meta-analysis of psychotherapy outcome stud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752-760.
- Snarey, J. R. (1985)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of socio-moral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7, 202-232.
- Snyder, J., and Patterson, G. (1987) Family interaction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In H. C. Quay (ed.), *Handbook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Chichester: Wiley.
- Snyder, J., and White, J. J. (1979) The use of cognitive self-instru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behaviorally disturbed adolescents. *Behavior Therapy*, 10, 227-235.
- Snyder, J. J., Dishion, T. J., and Patterson, G. R. (1986)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ssociating with deviant peers during preadolescence and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6, 29-43.
- Solomon, G. S., and Ray, J. B. (1984) Irrational beliefs of shoplifter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0, 1075-1077.
- Solorzano, R. I. (1964) Punish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 234-253.
- Solursh, L. P. (1984) Combat addiction: Overview of implications in symptom maintenance and treatment planning.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 451-462.
- Soothill, K. L., and Gibbins, T. C. N. (1978) Recidivism of sex offenders: A re-appraisal.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8, 267-276.
- Soothill, K. L., Way, C. K., and Gibbins, T. C. N. (1980) Rape acquittals. *Modern Law Review*, 43, 159-172.
- Sosowsky, I. (1980) Explaining the arrest rate among mental patients: A cautionary not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 1602-1605.
- Spence, S. H. (1981) Differences in social skills perform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ised juvenile male offenders and a comparable group of boys without offence record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 163-171.
- Spence, S. H. (1982) Social skills training with young offenders. In M. P. Feldman (ed.), *Offending: The Study of Criminal Behaviour. Volume 1: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ffending*. Chichester: Wiley.
- Spence, S. H., and Marshall, J. S. (1981) Social skills training with adolescent male offenders: II. Short-term, long-term and generalisation effec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 349-368.
- Spivack, G., and Rigler, D. (1972) The child abusing par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7, 296-304.
- Spivack, G., Platt, and Shure, M. (1976) *The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to Adjust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pruiell, J., and May, J. (1988) The mentally retarded offender: Prevalence rates based on individual versus group tes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ur*, 15, 489-491.
- Sroufe, L. A., and Fleeson, J. (1986) Attach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s. In W. Hartup and Z. Rubin (eds),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 Hillsdale, NJ: Erlbaum.
- Stathis, H., and Magnusson, D. (1989) The role of early aggressive behavior in the frequency, seriousness, and types of later crim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710-718.
- Stattin, H., and Magnusson, D. (1991)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criminal behaviour up to age 30.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1, 327-346.
- Steadman, H. J. (1977) A new look at recidivism among Patuxent patient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5, 200-209.
- Steadman, H. J. (1985)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77, 58-71.
- Steadman, H. J., and Keveles, G. (1972) The community adjustment and criminal activity of the Baxstrom patients: 1966-1970.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9, 304-310.
- Steadman, H. J., Cocozza, J. J., and Melick, M. E. (1978) Explaining the increased arrest rate among mental patients: The changing clientele of state hospit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5, 816-820.
- Steadman, H. J., Monahan, J., Hartstone, F., Davis, S. K., and Robbins, D. C. (1982)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A national survey of patients and facilitie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6, 31-38.
- Steffensmeier, D. J. (1980) Sex differences in patterns of adult crime, 1965-1977: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Social Forces*, 58, 1080-1108.
- Steffensmeier, D. J., Allan, F. A., Harer, M. D., and Streifel, C. (1989) Ag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803-831.
- Stem, K. B., Sarbin, T. R., and Kulik, J. A. (1968)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ts relation to the socialisation process and the delinquent ro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2, 257-264.
- Steinberg, L. (1986) Latch-key children and susceptibility to peer pressure: An ecological 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433-439.
- Stermac, L. E. (1986) Anger control treatment for forensic pati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 446-457.
- Stermac, L. E., and Quinsey, V. L. (1986) Social competence among rapists. *Behavioural Assessment*, 8, 171-185.
- Stermac, L. E., and Segal, Z. V. (1989) Adult sexual contact with children: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Behavior Therapy*, 20, 573-584.
- Stevens, J. R., and Hermann, B. P. (1981) Temporal lobe epilepsy, psychopathology, and violence: The state of the evidence. *Neurology*, 31, 1127-1132.
- Stewart, D. J. (1972) Effects of social reinforcement on dependency and aggressive responses of psychopathic, neurotic, and subcultural delinqu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9, 76-83.
- Stokes, T. Y., and Baer, D. M. (1977) An implicit technology of generalis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10, 349-367.
- Stone, A. A. (1984) *Law, Psychiatry and Morality: Essays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Stort, D. (1982) *Delinquency: The Problem and its Prevention*. London: Batsford.
- Straus, M. A., and Gelles, R. J. (1988) How violent are American families? Estimates from the National Family Violence Resurvey and other studies. In G. J. Hotel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traus, M. A., Gelles, R. J., and Stelmets, S. K.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 Strauss, J. S. (1973) Diagnostic models and the natur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9, 445-449.
- Stranger, A. Y., and Josef, N. C. (1983) Methylphenidate in the treatment of aggression in two patients wit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1365-1366.
- Strong, S. R., Halls, H. L., Kilmartin, C. T., DeVries, H., Lanier, K., Nelson, B. N., Strickland, D., and Meyer, C. W. (1988) The dynamic relations among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A test of complementarity and anticomplementar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798-810.
- Stuart, R. B. (1971) Behavioral contracting with the families of delinquents.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2, 1-11.
- Stuart, R. B. (1972) Situational versus self-control. In R. D. Rubin, H. Fensterheim, J. D. Henderson and L. P. Ullmann (eds), *Advances in Behavior Therapy*, Volume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tuart, R. B., Jayaratne, S., and Tripodi, T. (1976) Changing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through reprogramming the behavior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 8, 132-144.
- Stumphauer, J. S. (1976) Elimination of stealing by self-reinforcement of alternative behavior and family contracting.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7, 265-268.
- Stumphauer, J. S. (1986) *Helping Delinquents Change: A Treatment Manual of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e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Stumphauer, J. S., Velloz, E. V., and Aiken, T. W. (1981) Behavioral analysis of communities: A challenge. *Psychological Reports*, 49, 343-346.
- Struman, A. (1980) Damage on buses: The effects of supervision. In R. V. G. Clarke and P. Mayhew (eds), *Designing Out Crime*. London: HMSO.
- Suedfeld, P., and Landon, P. B. (1978) Approaches to treatment.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y: Behavio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New York: Wiley.
- Sullivan, C., Grant, J. D., and Grant, M. Q.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maturity: Application to delinquency. *Psychiatry*, 20, 373-385.
- Sutherland, E. H. (1945) Is "white collar crime"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132-139.
- Sutherland, E. H. (1950) The diffusion of sexual psychopath law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142-148.
- Sutherland, E. H. (1951) Critique of Sheldon's varieties of delinquent you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0-13.
- Sutherland, F. H., and Cressey, D. R. (1970) *Criminology*. Eighth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Sutker, P. B., Moan, C. E., and Swanson, W. C. (1972) Porteus Maze qualitative performance in pure sociopaths, prison normals, and antisocial psychotic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8, 349-353.
- Sykes, G. (1966) *The Society of Captives*. New York: Atheneum.
- Sykes, G., and Matza, D. (1957) Techniques of neutralis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664-673.
- Syndulko, K., Parker, D. A., Jens, R., Maltzman, I., and Ziskind, F. (1975) Psychophysiology of sociopathy: Electrodermal measures. *Biological Psychology*, 3, 185-200.

- Szasz, I. S. (1961).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5, 113-118.
- Szasz, I. S. (1979). Insan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H. Toch (ed.), *The Psychology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Tappan, P. (1947). Who is the crimin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96-102.
- Tarling, R. (1979). *Sentencing Practice in Magistrates' Courts*.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56. London: HMSO.
- Tarter, R. F., Hegedus, A. M., Alterman, A. I., and Katz-Garris, L. (1983). Cognitive capacities of juvenile violent, nonviolent, and sexual offender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1, 564-567.
- Tarter, R. F., Hegedus, A. M., Winsten, S. J., and Alterman, A. I. (1987). Intellectual profiles of violent behavior in juvenile delinquent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9, 125-128.
- Taylor, L., Walton, P., and Young, J. (1973). *The New Criminology: For a Social Theory of Devi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aylor, P. (1982). Schizophrenia and violence. In J. Gunn and D. P. Farrington (eds), *Abnormal Offenders, Delinquency,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hichester: Wiley.
- Taylor, P. (1985). Motives for offending among violent and psychotic me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7, 491-498.
- Taylor, P. (1986).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London's life-sentenced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6, 63-78.
- Taylor, P., and Gunn, J. (1984). Risk of violence among psychotic me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88, 1945-1948.
- Taylor, S. P., and Leonard, K. F. (1983). Alcohol and human physical aggression. In R. C. Geen and E. J.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edeschi, J. T. (1983). Social influence theory and aggression. In R. C. Geen and E. J.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empleman, T. L., and Wollersheim, J. P. (1979). A 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psychopath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6, 132-139.
- Tennant, C., and Gath, D. (1975). Bright delinquents: A three year follow-up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5, 386-390.
- Tepin, L. A. (1984). Criminalizing mental disorder: The comparative arrest rate of the mentally ill.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794-803.
- Tepin, L. A. (1985). The criminality of the mentally ill.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2, 393-398.
- Thomas, C. W. (1977).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prisonis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importation and deprivation model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68, 135-145.
- Thomas, C. W., and Cagge, R. (1977). The effect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n juvenile court disposit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8, 237-252.
- Thomas, M. H., Horton, R. W., Lippincott, E. C., and Drabman, R. S. (1977). Desensitisation to portrayals of real-life aggression as a function of exposure to television viol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450-458.
- Thompson, W. E., and Dodder, R. A. (1986). Containment theory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 reevaluation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dolescence*, 21, 365-376.
- Thornberry, T. P., and Farnworth, M. (1982). Social correlates of criminal involvement: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atus and criminal behavi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505-518.
- Thornberry, T., and Jacoby, J. (1979). *The Criminally Insane: A Community Follow-up of Mentally Ill Offend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orne, F. C. (1959). The etiology of sociopathic re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13, 319-330.
- Thorne, G. L., Tharp, R. G., and Wetzel, R. J. (1967). Behavior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New tools for probation officers. *Federal Probation*, 31, 21-27.
- Thornton, D. (1987a).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In B. J. McG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mprison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Thornton, D. (1987b). Assessing custodial adjustment. In B. J. McG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mprison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Thornton, D., and Reid, R. L. (1982). Moral reasoning and type of criminal off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 231-238.
- Thornton, D., Curran, L., Grayson, D., and Holloway, V. (1984). *Tougher Regimes in Detention Centres: Report of an Evaluation by the Young Offender Psychology Unit*. London: HMSO.
- Thurstone, L. L. (1927). The method of paired comparisons for social valu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21, 384-400.
- Tisdelle, D. A., and Lawrence, J. S. St. (1986). Interpersonal problem-solving competency: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6, 337-356.
- Tittle, C. R. (1977). Sanction fear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Social Forces*, 55, 579-596.
- Tittle, C. R. (1983). Social class and criminal behavior: A critique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ocial Forces*, 62, 334-358.
- Tittle, C. R., Villerme, W. J., and Smith, D. A. (1978). The myth of social class and criminalit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643-656.
- Toch, H. (1969). *Violent Me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Toch, H. (1975). Reducing violenc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D. Chappell and J. Monahan (eds), *Violence and Criminal Justice*. Lexington, Mass: Heath.
- Toch, H. (1987). Supplementing the positivistic perspective. In M. R. Gottfredson and T. Hirschi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Toch, H., and Adams, K. (1989). *The Disturbed Violent Offen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ong, J. E. (1959). Stress reactivity in relation to delinquent and psychopathic behavior.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05, 935-956.
- Tracy, P., Wolfgang, M., and Figlio, R. (1986). *Delinquency in a Birth Cohort 2: A Comparison of the 1945 and 1958 Philadelphia Birth Coho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Final Report).
- Trasler, G. B. (1962). *The Explanation of Criminali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rasler, G. B. (1978). Relations between psychopathy and persistent criminality. In R. D. Hare and D. Schalling (eds), *Psychopathic Behavior: Approaches to Research*. New York: Wiley.
- Trasler, G. B. (1979). Delinquency, recidivism and desistan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 314-322.
- Trasler, G. B. (1986). Situational crime control and rational choice: A critique. In K. Heal and G. Laycock (eds),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London: HMSO.
- Tremblay, R. E., Masse, B., Perron, D., LeBlanc, M., Schwartzman, A. E., and Ledingham, J. E. (1992). Early disruptive behavior, poor school achievement, delinquent behavior, and delinquent personality: Longitudinal analys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0, 64-72.
- Trower, P. (1984). A radical reformulation and critique: From organism to agent. In P. Trower (ed.), *Rad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Skills Training*. London: Croom Helm.
- Truscott, D. (1990). Assessment of overcontrolled hostility in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 145-148.
- Tsujiimoto, R. N., and Nardi, P. M. (1978). A comparison of Kohlberg's and Hogan's theories of moral development. *Social Psychology*, 41, 235-245.
- Tullock, G. (1974). Does punishment deter crime? *The Public Interest*, 36, 103-111.
- Tunstall, O., Gudjonsson, G., Eysenck, H., and Howard, I. (1982). Professional issues arising from psychological evidence presented in court.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5, 329-331.
- Tupin, J. (1986). Psychopharmacology and aggression. In L. H. Roth (ed.),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Violent Person*. New York: Guilford.
- Turco, R. N. (1990).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34, 147-154.
- Turk, D. C., and Salovey, P. (1985). Cognitive structure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cognitive-behavior modificat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9, 1-17.
- Turner, S. M., Turner, J. H., and Fox, A. B. (1976). Throwing the head back out: A closer look at van Den Bergh's "bea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551-555.
- Tutt, N. (1973).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delinquenc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2, 223-230.
- Tutt, N. (1984).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understanding,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delinquency. In J. Nicholson and H. Relford (eds), *Psychology Survey 5*.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1124-1131.
- Twain, D. C. (1957). Factor analysis of a particular aspect of behavioral control: Impulsivit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3, 133-136.
- Twynman, C. T., Jensen, M., and Kloss, J. D. (1978). 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the complex offender: Employment seeking skill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4, 321-326.
- Tyler, P. (1988). *Personality Disorders: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Course*. London: Wright.
- Tyler, T. R. (1990).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Ulrich, P., and Huber, J. (1981). Observing parental violence: Distribution and effec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3, 623-631.
- United Nations (1988).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shing Division.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989). *Uniform Crime Reports 1988*.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Vaillant, G. E. (1975). Sociopathy as a human process: A viewpoint.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2, 178-183.
- Valenstein, E. S. (1976). Brain stim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violent behavior. In W. L. Smith and A. Kling (eds), *Issues in Brain/Behavior Control*. New York: Spectrum.
- Valliant, P. M., Asu, M. E., and Howitt, R. (1983). Cognitive styles of Caucasian and native Indian juvenile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Reports*, 52, 87-92.
- Vamberg, R. (1941). Criminology and behaviorism.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32, 158-165.
- Van den Haag, B. (1982). Could successful rehabilitation reduce the crime r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73, 1022-1035.
- Van Eyken, A. (1987). Aggression: myth or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4, 165-176.
- Van Hoorhus, P. (1988). A cross classification of five offender typologie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109-124.
- Van Ness, S. (1984). Rape as instrumental violence: A study of youthful offenders. *Journal of Offender Counselling, Service, and Rehabilitation*, 9, 161-170.
- Venables, P. H. (1988). Psychophysiology and crime: Theory and data. In J.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Venables, P. H., and Raine, A. (1987). Biological theory. In B. J. McG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mprison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Veneziano, C., and Veneziano, L. (1988). Knowledge of social skills among institutionalized juvenile delinqu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152-171.
- Virkunen, M. (1988). Cerebrospinal fluid: Monoamine metabolites among habitually violent and impulsive offenders.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Virkunen, M., Dejong, J., and Bartko, J. (1989). Relationship of psychobiological variables to recidivism in violent offenders and impulsive fire-setter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6, 600-603.
- Virkunen, M., Nuutila, A., and Huusko, S. (1976). Effect of brain injury on social adaptability.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53, 168-172.
- Von Hirsch, A. (1976). *Doing Justice: The Choice of Punishment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Wadsworth, M. E. J. (1976). Delinquency, pulse rates and early emotional depriv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6, 245-256.
- Wakefield, J. C. (1992). The concept of mental disorder: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biological facts and social valu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373-388.
- Waldo, G. P., and Dinitz, S. (1967). Personality attributes of the criminal: An analysis of research studies, 1950-1965.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 185-202.
- Walker, J. L., Lahey, B. B., Hynd, G. W., and Frame, C. L. (1987). Comparison of specific patterns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conduct disorder with or without coexisting hyperactivit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910-913.
- Walker, L. E. (1988).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In G.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Walker, L. J. (1986).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reasoning: A rejoinder to Baumrind. *Child Development*, 57, 522-526.
- Walker, M. A. (1978). Measuring the seriousness of crim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8, 348-364.
- Walker, N. (1983). Side-effects of incarce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3, 61-71.
- Walker, N. (1985). The insanity defense before 1800.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77, 25-30.
- Walker, N. (1987). *Crime and Crimin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N., and Farrington, D. P. (1981). Recidivism rates of adult males after different sent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1, 357-360.
- Walsh, A., Peter, T. A., and Beyer, J. A. (1987). Intellectual imbalance and delinquency: Comparing high verbal and high performance IQ delinqu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4, 370-379.
- Walters, G. D., Greene, R. I., and Solomon, G. S. (1982). Empirical correlates of the Overcontrolled Hostility Scale and the MMPI 4-3 highpoint pai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0, 213-218.
- Ward, C. I., and McFall, R. M. (1986).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Problem Inventory for Adolescent Girls: Comparing caucasian and black delinquents and nondelinqu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0, 213-218.
- Ward, D. (1987). *The Validity of the Recidivism Prediction Score*.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No. 94. London: HMSO.
- Warren, M. Q. (1971). Classification of offenders as an aid to 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62, 239-258.
- Warren, M. Q. (1983). Applications of interpersonal-maturity theory of offender populations. In W. S. Laufer and J. M. Day (eds), *Personality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iminal Behavior*.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Waterman, A. S. (1981). Individu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 762-771.
- Watkins, J. T. (1977). The rational-emotive dynamics of impulsive disorders. In A. Ellis and R. Grieger (eds), *Handbook of Rational-Emotive Therapy*. New York: Springer.
- Watson, D., and Clark, L. A. (1984). Negative affectivity: The disposition to experience aversive emotional stat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6, 465-490.

- Weathers, L. and Lerner, R. P. (1975) Contingency contracting with families of delinquent adolescents. *Behavior Therapy*, 6, 356-366.
- Webster, C. D. (1984) On gaining acceptance: Why the courts accept only reluctantly findings from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7, 407-414.
- Weinberg, R. A. (1989) Intelligence and IQ: Landmark issues and great debat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98-114.
- Weinert, B. (1986)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emory, Intelligence and Learnin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Weiner, I. B. (1987) Writing forensic reports. In I. B. Weiner and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Weiner, I. B. and Hess, A. K. (eds), (1987)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Weinert, N. A. (1989) Violent criminal careers and 'violent career criminal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N. A. Weiner and M. E. Wolfgang (eds), *Violent Crime: Violent Criminals*. Newbury Park, CA: Sage.
- Weintraub, K. J. and Gold, M. (1991) Monitoring and delinquency.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1, 268-281.
- Wells, J. G. (1987) Social class and crime. In M. R. Gottfredson and T. Hirschi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Weiss, G., Hechtman, I., Milroy, T., and Perlman, T. (1985) Psychiatric status of hyperactive as adults: A controlled prospective 15 year follow-up of 63 hyperactive childr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24, 211-220.
- Welford, C. (1975) Labelling theory and criminology: An assessment. *Social Problems*, 22, 332-345.
- Weller, M. P. I. and Weller, B. G. A. (1988) Crime and mental illness.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8, 38-46.
- Wells, J. F. (1978) Theories of deviance and the self-concept. *Social Psychology*, 41, 189-204.
- Wells, L. E. and Rankin, J. H. (1983) Self-concept as a mediating factor in delinquenc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6, 11-22.
- Wells, L. E. and Rankin, J. H. (1986) The broken homes model of delinquency: Analytic issu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3, 68-93.
- Wenk, E. A., Robison, J. O., and Smith, C. B. (1972) Can violence be predicted? *Crime and Delinquency*, 18, 393-402.
- Werner, E. F. (1989) High-risk children in young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birth to 32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9, 72-81.
- Werner, E. F. and Smith, R. S. (1986) *Vulnerable but Inmune*. New York: McGraw-Hill.
- Werner, J. S., Mink, N., Mink, B. L., Fissen, D. T., Phillips, E. L., and Wolf, M. M. (1975) 'Intervention Package': An analysis to prepare juvenile delinquents for encounters with police officer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 55-83.
- Werner, P. D., Rose, L. L., and Yesavage, J. A. (1983) Reliability, accuracy and decision-making strategy in clinical predictions of imminent dangerousn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1, 813-823.
- Werner, P. D., Yesavage, J. A., Becker, J. M., Brunsting, D. W., and Isaacs, J. S. (1983) Hostile words and assaultive behavior on an acute inpatient psychiatric unit.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1, 385-387.
- Wessely, S. and Taylor, P. J. (1991) Madness and crime: Criminology versus psychiatry.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1, 323-328.
- West, D. J. (1980) The clinical approach to criminolog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0, 619-632.
- West, D. J. (1982) *Delinquency: Its Roots, Careers and Prospec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st, D. J. and Farrington, D. P. (1973) *Who Becomes Delinquent?* London: Heinemann.
- Wetherick, N. F. (1979)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 In N. Bolton (ed.),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Psychology*. London: Methuen.
- Wetstein, R. M. (1984) The prediction of violent behavior and the duty to protect third parties. *Behavioral Science and the Law*, 2, 291-316.
- Wexler, H. K., Falk, G. P., and Lipton, D. S. (1990) Outcome evaluation of a pris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7, 71-92.
- Wheeler, S. (1961) Socialization in correctional commun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697-712.
- Wheeler, S. (1962) The social sources of crimin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32, 139-159.
- White, H. R., LaBouvie, E. W., and Bates, M. E. (198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ation-seeking and delinquency: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2, 197-211.
- White, J. L., Moffitt, T. E., and Silva, P. A. (1989) A prospective replication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IQ in subjects at high risk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719-724.
- White, J. W. (1983) Sex and gender issues in aggression research. In R. C. Geen and E. I. Donnerstein (eds), *Aggress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s*, Volume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hitehead, J. T. and Lab, S. P. (1989) A meta-analysis of juvenile correctional treat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6, 276-295.
- Whitman, S., Coleman, I. E., Patmon, C., Desai, B. T., Cohen, R., and King, L. N. (1984) Epilepsy in prison: Elevated prevalence and no relationship to violence. *Neurology*, 34, 774-782.
- Wietrowski, M. D., Hansell, S., Massey, C. R., and Wilson, D. I. (1982) Curriculum tracking and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51-160.
- Widiger, T. A. and Frances, A. (1985a) The DSM-III personality disorders: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2, 615-623.
- Widiger, T. A. and Frances, A. (1985b) Axis II personality disorders: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issues.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sychiatry*, 36, 619-627.
- Widiger, T. A. and Frances, A. (1987) Interviews and inventori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 47-75.
- Widiger, T. A., Frances, A., Spitzer, R. L., and Williams, J. B. W. (1988) The DSM-III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 over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 786-795.
- Widom, C. S. (1978a)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female criminality. In B. A. Maher (ed.), *Progress in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Research*, Volume 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idom, C. S. (1978b) An empir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emale offender.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5, 35-52.
- Widom, C. S. (1989a) Does violence beget violen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 3-28.
- Widom, C. S. (1989b) The cycle of violence. *Science*, 244, 160-166.
- Widom, C. S. and Ames, A. (1988) Biology and female crime. In T. E. Moffitt and S. A. Mednick (eds), *Bi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rime Caus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 Wiggins, J. S. (1981) Clinical and statistical prediction: Where are we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 3-18.
- Wiggins, J. S. (1982) Circumplex models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ur in clinical psychology. In P. C. Kendall and J. N. Butcher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lin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 Wiggins, J. S. and Broughton, R. (1985) The Interpersonal Circle: A structural model for integrating personality research. In R. Hogan and W. H. Jones (eds),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ity*, Volume 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Wiggins, J. S. and Pincus, A. L. (1989) Conception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 305-316.
- Wilkins, L. T. (1985) The politics of prediction. In D. P. Farrington and R. Tarling (eds), *Prediction in Crimi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illiams, D. (1969) Neural factors related to habitual aggression. *Brain*, 92, 503-520.
- Williams, G. (1978) *Textbook of Criminal Law*.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 Williams, J. R. and Gold, M. (1972) From delinquent behaviour to official delinquency. *Social Problems*, 20, 204-229.
- Williams, L. M. and Finkelhor, D. (1990)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estuous fathers: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In W. L. Marshall, D. R. Laws and H. E. Barbare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Theory, Treatment, and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New York: Plenum.
- Williams, M. (1987) Radical behaviourism. In B. J. McGurk, D. M. Thornton and M. Williams (eds),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mprov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MSO.
- Williams, W. and Miller, K. (1977) The rol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 perceptions of dangerousnes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 241-252.
- Wilson, E. O. (1978)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G. D. and Cox, D. N. (1983) Personality of pedophile club memb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 323-329.
- Wilson, H. (1980) Parental supervision: A neglected aspect of delinquenc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 203-235.
- Wilson, J. (1987) Parental supervision re-examined.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7, 275-293.
- Wilson, J. Q. (1980) 'What works?' revisited: New findings on criminal rehabilitation. *The Public Interest*, 61, 3-17.
- Wilson, J. Q. and Herrnstein, R. S. (1985) *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Wilson, S. (1980) Vandalism and 'defensible space' on London housing estates. In R. V. G. Clarke and P. Mayhew (eds), *Designing Out Crime*. London: HMSO.
- Witkin, H. A., Mednick, S. A., Schulsinger, F., Bakkestuen, E., Christiansen, K. O., Goodenough, D. R., Hirschhorn, K., Lundsteen, C., Owen, D. R., Philip, J., Rubin, D. B., and Shoking, M. M. (1976) Criminality in XYY and XXY men. *Science*, 193, 547-555.
- Wober, J. M. (1989) Screen violence: A psychologist's view. *The Psychologist*, 2, 162-165.
- Wolke, D. A. (1987) *Child Abuse: Implica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Wolke, D. A., Jaffe, P., Wilson, S. K., and Zak, L. (1985)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The relation of child behavior to family violence and maternal str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3, 657-665.
- Wolfgang, M. E. (1957) Victim precipitated criminal homicid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and Police Science*, 48, 1-11.
- Wolfgang, M. E. (1958) *Patterns in Criminal Homicid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Wolfgang, M. E. (1983) Delinquency in two birth cohor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7, 75-86.
- Wolfgang, M. E. and Ferracuti, F. (1967) *The Subculture of Violence*. London: Tavistock.
- Wolfgang, M. E., Figlio, R. M., and Sellin, I. (1972) *Delinquency in a Birth Coho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ody, G. F., McLellan, A. T., Luborsky, L. and O'Brien, C. P. (1985) Sociopathy and psychotherapy outcom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2, 1081-1086.
- Wootton, B. (1959)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atholog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Wootton, B. (1980) Psychiatry, ethics and the criminal law.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 525-532.
- Wright, J. C. and Mischel, W. (1987) A conditional approach to dispositional constructs: The local predictability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1159-1177.
- Wright, K. N. (1985) Developing the Prison Environment Inventor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2, 257-277.
- Wright, K. and West, D. J. (1981) Rape: A comparison of group offences and lone assaults.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 21, 25-30.
- Wulach, J. (1988) The criminal personality as a DSM-III-R antisocial, narcissistic, borderline and 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32, 185-199.
- Wurtelle, S. K., Saslawsky, D. A., Miller, C. I., Marrs, S. L., and Britcher, J. C. (1986) Teaching personal safety skills for potential prevention of sexual abuse: A comparison of treatm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688-692.
- Wylie, R. C. (1968) The present status of self theory. In E. T. Borgatta and Lambert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 Yaryura-Tobias, J. A. and Nezuoglu, F. A. (1975) Violent behavior, brain dysrhythmia, and glucose function: A new syndrome.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ic Psychiatry*, 4, 182-188.
- Yates, E., Barbaree, H. E., and Marshall, W. L. (1984) Anger and deviant sexual arousal. *Behavior Therapy*, 15, 287-294.
- Yesavage, J. A. (1983) Bipolar illness, correlates of dangerous inpatient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554-557.
- Yeudall, L. J. and Fromm-Auch, D. (1979)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s in various psychopathological populations. In J. Grueter and P. Fine-Heur (eds), *Hemispheric Asymmetries of Function in Psychopathology*. Amsterdam: Elsevier.
- Yeudall, L. J., Fromm-Auch, D., and Davies, P. (1982)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of persistent delinquency.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0, 257-265.
- Yochelson, S. and Samenow, S. (1976) *The Criminal Personality: Volume 1: A Profile for Change*. New York: Jason Aronson.
- Young, J. (1986) The failure of criminology: The need for a radical realism. In R. Matthews and J. Young (eds), *Confronting Crime*. London: Sage.
- Young, J. and Matthews, K. (1992) Questioning left realism. In R. Matthews and J. Young (eds), *Issues in Realist Criminology*. London: Sage.
- Yule, W. and Brown, B. J. (1987) Some behavioral applications with juvenile offenders outside North America. In F. K. Morris and C. J. Braukmann (eds),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A Handbook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Concepts*. New York: Plenum.
- Zager, L. D. (1988) The MMPI-based crimi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A review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5, 39-57.
- Zamble, F. (1990)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success of prison reform. In J. W. Murphy and J. E. Dixon (eds), *Are Prisons Any Better? Twenty Years of Prison Reform*. Newbury Park, CA: Sage.
- Zamble, E. and Porporino, F. J. (1988) *Coping, Behavior, and Adaptation in Prison Inmates*. Berlin: Springer-Verlag.
- Zekay, I. (1933) Feeblemindedness and criminal conduc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8, 564-576.
- Zigler, E. and Hall, N. W. (1987) The implications of early intervention for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J. Q. Wilson and G. C. Loury (eds), *From Children to Citizens: Volume 3: Families, Schools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Zillmann, D. (1979) *Hostility and Aggress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Zimbardo, P. G. (1970)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In W. J. Arnold and D. Levine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Zimmerman, J., Rich, W. D., Keilitz, L. and Broder, P. K. (1981)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ink between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9, 1-17.
- Zimring, F. E. (1981) Kids, groups, and crime: Some implications to a well-known secret.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72, 867-885.
- Zuckerman, M. (1969) Variables affecting deprivation results. In J. P. Zubek (ed.), *Sensory Deprivation: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